



昨天的记忆
(中)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昨天的记忆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中)



北京地质学院



定价：HK\$260元(上中下三册)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昨天的记忆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顾问：陶世龙 何蜀 吴迪

策划：蔡新平 田春林 伏庆是

编辑：张运鈞 李颖

特约拟稿人：本书所有文稿的作者

二〇一九年一月

昨天的记忆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记述

责任编辑：许 阳

封面设计：铁 壁

ISBN 978-988-77056-1-1

2019 年 1 月第一版

开本：210mm X 285mm

字数：1200 千字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 33 號豐盈工貿中心 5 字樓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 l: 00852-3921 6033

Fax: 00852-2529 5333

定價： HK \$ 260 元

敬畏历史
说出真话
留下真相

——陶世龙

总 目 录

上 册

序一 陶世龙：说出真话，留下真相	i
序二 闫长贵：北京地院文革的几个特点	v
序三 孙怒涛：我与地院文革	ix
序四 何蜀：面对历史，沉默不是金	xvi
阅读指南	xix
前言	1
第一篇 北京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0
第二篇 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上）	50
目录明细	
【乱世的记忆】	
蔡新平口述：北京地院文革经历	53
伏庆是：我与北京地质学院文革	73
田春林：田春林的回忆录	141
蒋良朴：在校友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176
李颖：我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185
张华府：从“东方红”成立到朱成昭拒绝“归队”	194
张华府：无罪的囚徒——从功德林到半步桥再到秦城	207

梅建明:	梅建明与朱、叶反党集团	272
陈永迪:	我见到的北京地院批斗朱成昭和关押叶向真	280
陈永迪:	到军事科学院抢”黑材料”	287
程关林:	被遗忘的群体	292
殷惟侯: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	315
林天民:	文革回忆录	333
胡昌铭:	文革回忆录（节选）	343
何建勋:	文革回忆录（节选）	370
陶世龙:	我的 1978 年	396

【六二〇事件】

万天丰:	回忆“六二〇事件”	411
------	-----------	-----

【九四事件】

大批判联络站:	关于北京地质学院“九四”反革命报复事件告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书	423
聂树人:	“九四”事件：“二团”分裂阴谋的破产	429

中 册

第二篇 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中）

目录明细

【神秘人物】

蔡新平:	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5
------	---------------	---

王大宾： 我陪肖力去京西门头沟煤矿 27

王广宇： 寻找肖力 28

王大宾： 叶向真与朱成昭 30

【老师的昨日心迹】

宋翔雁： 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1-6） 32

宋翔雁： 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7-12） 129

唐振权： 地质学院里的文化大革命 279

钱佩娟： 文革回忆录（提纲） 291

【岁月的印迹】

古宝琳： 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299

古宝琳： 古宝琳日记摘抄 336

梅 村： 工作组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 351

【外地串联】

丁育民： 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二个事件 352

陈永迪： 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365

张华府： 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 381

庄一龙： 文革中在地院、上海和北京的几件事 407

【保护老干部】

王大宾： 地院东方红成了部分被冲击的老干部的
避难所 414

【忆旧思亲】

石白河：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节选） 416

下 册

第二篇 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下）

【口述历史】

梅建明： 我的文革回忆

1

第三篇 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

重要人物专题

目录明细

一、 “高安郑反革命阴谋集团”专题	120
二、 周永璋两次被抓专题	181
三、 王大宾专题——王大宾庭审记录	213
四、 揪彭德怀专题	226
五、 朱成昭专题——朱成昭八大观点	256
六、 杨雨忠跳楼自杀专题	274
七、 二进地质部专题	287

第四篇 因文革非正常死亡与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

目录明细

一、 北京地院因文革而非正常死亡人员统计	317
二、 工作队领导期间，因“反干扰”而遭受打击、 挨整的地院师生	320

三、地院革委会领导期间，因清理“阶级队伍”而 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	326
四、军宣队进驻地院后，因文革、因清查“五一六” 分子而遭受关押、审查的地院师生	335
第五篇 涉及地院文革的回忆、讨论、反思和研究文章汇集	
目录明细	
【文革研究者专论】	
一、陶世龙：不能压制不同意见——“620事件”中 应记取的最大教训	343
二、何 蜀：北京地院东方红与重庆肖李廖、罗广斌案	346
三、敖本立： 红楼座谈会王大宾没有参加	360
四、肖劲东 蔡新平：独立思想家——安静中	363
五、蔡新平：记安静中老师文革中为保护地院做出的 重大贡献	372
六、蔡新平： 从《东方红报》一篇文章看 “高安郑反革命集团”险遭“覆灭”的命运	386
【对地院文革的反思和研究】	
一、张运钧、李颖：《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兴衰沉浮》 ——对文革的反思、研究和再认识	392
二、刘建业： 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兴衰沉浮》	406
三、肖劲东： 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兴衰沉浮》有感	408
四、王 锐： 谈丁育民对“安亭事件”的回忆	409

五、 晓 星： 谈伏庆是回忆录	410
第六篇 本书编辑中所涉及的参考文献、史料	
一、 中央领导人和有关人员对地院文革的指示、谈话	412
二、 地院文革期间重要文字史料	413
三、 地院师生已发表的关于文革的书籍、文章（目录）	414
四、 其他参考文献史料	417
编辑后记	420
附 件	422
一、 蔡新平： 关于请张运钧、 李颖着手整理编撰《地院文革史料汇编》 致信各位校友	422
二、 蔡新平： 《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 电子版代序	424
三、 蔡新平： 《昨天的记忆——北京地院文革记述》 电子版导读	426

第二篇 北京地质学院师生对文革的回忆（中）

目录明细

【神秘人物】

蔡新平： 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5
一、前言：日记、档案与记忆	
二、肖力何时来地院	
三、我传达“中央文革三条指示”之后	
四、肖力与8·24大辩论	
五、肖力没有参与策划一进地质部	
六、肖力在地院会见蒯大富	
七、什么时候知道了肖力的真实身份	
八、肖力在地院文革中的作用	
王大宾： 我陪肖力去京西门头沟煤矿	27
王广宇： 寻找肖力	28
王大宾： 葉向真与朱成昭	30

【老师的昨日心迹】

宋翔雁： 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1—6）	32
前 言	
（一）回校参加“文革”至“反干扰”时期	
（二）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大串联	
（三）到工人群众中去——赴京西煤矿串联	
（四）在革委会简报组时期	
（五）从积极参予到逐渐“逍遙”	
（六）工、军宣队进驻和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	
宋翔雁： 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7—12）	129
（七）五七干校——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新场所	
（八）灭绝人性的干校“抓五一六”运动	
（九）抓“五一六”时我的悲苦处境	
（十）清查运动无收尾，五七干校又迁移。	
（十一）“四五”事件与总支书记的嘴脸	
（十二）高院长为我平反和不得不提的一个人	
唐振权： 地质学院里的文化大革命	279
钱佩娟： 文革回忆录（提纲）	291
说 明	
一、李纳来地院干什么？	

- 二、地院革委会成立后镇压蔡派
- 三、迁校
- 四、江祖如在北京研究生部期间
- 五、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

【岁月的印迹】

古宝琳： 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299
简介	
初识王大宾	
从回避到约会	
校园里的流言与父母的规劝	
爱情路上总会有风雨坎坷	
李仲学之死	
第一次逮捕和查抄	
一次又一次的上书与失望	
前往江陵闯禁区	
我又一次撬锁	
见到被囚禁的李贵	
王大宾发酒疯	
王大宾杀狗	
有“保镖”跟随的城墙散步	
高元贵为我写证明	
携王大宾“潜逃回川”	
陪王大宾回乡探母	
我们的婚礼和监视下的“蜜月”	
父母为我操碎了心	
第二次逮捕与抄家	
带着女儿探监碰壁	
女人的艰难	
上书国务院、党中央	
我这个“反革命家属”到处碰壁	
王大宾出狱和我们的分手	
结语	
古宝琳： 古宝琳日记摘抄	336
梅村： 工作组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	351

【外地串联】

丁育民： 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两个事件	352
楔子	
事件一、上海安亭事件	
事件二、新疆乌鲁木齐八楼事件	
陈永迪： 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365
一、大串联到成都	
二、成都军区黄、郭垮台，甘、韦主政	
三、参加对军区的静坐示威	
四、中央军委2·17信件	
五、逃回北京	
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	
七、“五六”事件后张国华、梁兴初入川	
八、在成都“民委联络站”	
张华府： 我当逍遥派后的“大串联”故事	381
对广州、桂林的好印象	
在贵阳斥退抄家的中学生	
平静的思茅	
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征”见闻	
上海之行	
南下广州	
返校后又随朱成昭南下	
游了杭州再去广州	
警备区军官陪同到从化参观领袖“行宫”	
南京印象	
到海边去	
在大连看到武斗死者	
太阳岛的奇遇和哈尔滨的机枪声	
庄一龙： 文革中在地院、上海和北京的几件事	407
和旷伏兆的一段交往	
关于上海联络站和《首都红卫兵》报（上海版）	
为“抗癌骗案”调查翻案和首都抗癌联络站	

【保护老干部】

王大宾： 地院东方红成了部分被衝擊的老幹部的避難所	414
---------------------------	-----

【忆旧思亲】

- 一、前言
- 二、我们从相识而成为学友
- 三、文革中我们成了战友
- 四、同时落难
- 五、一起下乡成了荒友

【神秘人物】

记忆中的肖力与北京地院文革

蔡新平

一、前言：日记、档案与记忆

早就有人让我谈谈有关肖力到地院来的事情，迟迟没动笔。后来看到了其它几位校友的回忆录中有涉及肖力与地院文革的内容，感觉与我的记忆对不上。虽然我现在的记忆也自感不一定可靠，很多细节都已模糊，但几个关键点的印象还很深。随着大脑的老化，再记下来恐怕今后就更说不清了。

如果有日记参照就好。以前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从高中到大学三年级，共有六本，就放在我床头书架上，文革初期被专案组给抄走了。因发起反工作队的6·20游行，被地质部派的工作队打成了反动学生，设立了我的专案组，撤销了我班长职务，并在全校广播宣布（同时撤职的还有三个同学）。以此惩罚反工作队的学生。工作队驻校期间，好像就干过这一次）。我的专案组成员除了工作队的人外还有我们班的几个同学，为首的是班团支书。平时我们俩关系还真好，我大学的第一个寒假不是回湖北老家，而是去了河北农村他的家。我城市人的洋布衣服给他穿，他农村家织的土布衣服换给我穿。但再好的友谊，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如同一张薄纸不堪一击。有人告诉我，我的日记就是他们抄走的，但没人认账。

目睹了太多因日记而倒霉的人，从那以后，整个文革十年，我就再也不记日记了。但活动中还是积累了一些文字材料。1968年3月和5至6月期间，聂树人、王大宾控制的地院革委会以清理阶级队伍和反击二流派为名，多次发起对“高安郑江”和“蔡派”骨干的抓捕，很多老师同学都被关押和抄家，我侥幸逃脱，直到军宣队进驻后我才回学校。回来后发现我“一无所有”了，几乎所有的各种记录本，积攒的各种资料，小报，包括读过的几本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上面有读书时留下的批注、心得等，一样都找不到了，仅有“仓促出逃”时随身带的两个小本保留了下来。如果毕业后能够及时做些追记，可能对现在的回忆会有帮助。

从1968年分配晋东南长治212地质队，到1978年考研究生离开，十年里什么也没写。地质队的这十年里总的运气还不错，也就头一年被整一段时间，但很快就翻身了。从没有写过什么交代，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后，对政治心灰意冷，对文革中的事已懒得回忆。新建的地质队革委

会的党委书记郭雪虎，是李顺达派来的一个老县委书记，和我关系非常好，我们无话不说，成立党委时的工作报告都是我这个非党员给起草的，他让我写份入党申请书，被我婉言谢绝（后在 1995 年前后我获得了种种荣誉，也曾经有类似机会，我也同样放弃了）。1978 年考取中科院地质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是老所长张文佑的得意弟子，开始也顺风顺水，被委托负责组建全所当时最大科研项目¹，因经费多，人人眼红。

到 1985 年全国开始搞清查“三种人”的时候，恰逢张先生去世。当所里撤了我项目负责人并要我写文革交代材料时，我还以为是因为张先生去世，他们要夺我课题经费而找茬，我不配合。在僵持一段时间后，他们给我看了一份中组部的红头文件，文件指名道姓将我列为审查对象，文件列述了我在文革中的简历，包括我岳父“可能是部队高级干部”也写上了。文件系统列举了从 1966 年 6 月到 1968 年军工宣队进院之前地院“东方红”所干的一切有名的“坏”事，如驱赶工作队、发起组建“东方红”、四次冲击地质部、抢广播电台挑起武斗、抢民委档案、火烧英国代办处、冲击天安门金水桥、围困中南海的“揪刘火线”、抓彭德怀、“东方红”和首都三司驻外联络站有关的各地武斗、抢军火库、电台事件……有些都是我根本不曾听说过的事件，林林总总，我已都记不清了，有二十多项吧。其它还有我到东北去串联的事，等等。要求查清我在这每一个事件中的表现、作用、影响，并做出结论。从此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专案组一年多时间内查外调，一遍一遍要我写交代材料，短短几个月我就白了头。因我在“东方红”总部一共就干了三个来月，绝大多数“东方红”的事件都与我无关，“交代”其实并不难写。但因离文革开始也过去快 20 年了，很多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再加上是写交代，“宜粗不宜细”，能糊弄就糊弄，所以留下的东西也是比较粗糙的。这些交待材料的草稿我还有，但价值不大。

在审查我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我所党办的办公室里至少有三铁皮柜装有对我内查外调收集来的材料，其中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复印回来的文革档案资料占有最重要地位，数量也最多。能够看到这些东西也纯属偶然。1986 年 4、5 月，专案组给我写了审查结论要我签字，据说审查结论要与被审查人见面，签字是必须履行的手续。我发现有许多不实之词，我说你们都内查外调一年多，明明没有的事，你们还要胡写，我绝不签字。一直拖到了上面催要的最后期限了。专案组长石玉泉，当时是所党办副主任，南大文革期间毕业的，据说是南大保守派的一个头头，因此我当时就有一种“老保搞报复再整造反派”的感觉，所以也不买他的账。石玉泉急红了眼，要我具体指出哪些内容不实，我说比如这一条，说

¹ 国家“75”能源重化工基地重大攻关项目：“晋中、晋北四矿区中深层岩溶地下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研究”煤炭部委托组织，中科院地质所和山西煤田水文地质队共同承担，总经费 3000 万，地质所直接支配 900 万。项目顾问张文佑、沈尔炎，项目负责人蔡新平。

我是二进地质部的发起者、组织者，带头冲击国家机关，揪斗何长工等地质部革命老干部（这罪名很严重的啊！），就是不实之词，这个结论就是错的。当年我恰好是反对二进地质部的，我没有斗过任何一个老干部，别说何长工，就连直接整我的邹家尤我也没有斗过。石玉泉说是你自己写的材料交代承认的，白纸黑字。我说如果你能把这份材料找出来给我看，我真是这样写的，这个结论你爱怎么写就都随你便了，否则你就得推倒重写。“看来你还真够狂的，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开始打开铁皮柜找材料。虽然故意挡着我不让看，但我也瞅了个大概。抽出来塞进去，抽出来塞进去，直到翻到第三个铁皮柜才从中拿出了一份材料，这是 1968 年初我在北京市委党校首都高校两派头头学习班，按要求各自做自我批评时写的材料，有十多页，标题就是《我的自我批评》，其中有一项就是检查自己在二进地质部时犯了右倾错误，题目是“我为什么反对二进地质部”。我一看就乐了，我说：“标题就是我反对二进地质部，你识字吗？”他说你别得意，你看，你说二进地质部是革命行动。我说再往下看，“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使我认识到自己在这问题上的确犯了错误”，那可是周恩来说的，不是我说的，因此我才不得不检查自己犯了右倾错误。我看到这份材料的页面码已经编到 1000 多页了，我当时就对石玉泉说，这些材料你可给我保管好，将来我还用得着。

有了这一回合，对于他每一条我认为是错的，我都要他找出证据给我看，他找不到，没办法，就说你自己写吧。我一晚没睡，重新给自己写了“结论”，一早交给他们，让他们去誊清。我说你们要给我改回去一个字我都不签字。因为我写的很客观，有就是有，错就是错，没有就是没有，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专案组的三个人关起门商量了半天也没有再说什么。他们誊清完了后我在签字时还添了几条说明。胡耀邦时代政策还是不错的，要是换到其它年头，说你是你是不是也是，你还敢顶嘴？结论往档案袋一装，谁知道写的是什么？近几年我多次到所里党办，人事处和档案室，想找到这几铁皮柜材料，为此还专门找了当时负责审查我的党委书记胡××，这老头脑袋也有些问题了，结果都是“记不清”，“查不到”。但我坚信这些东西一定还在。我们批判工作队，大闹地质部，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要工作队交出黑材料，销毁黑材料。其实这些材料根本就没有销毁，包括后来王大宾、聂树人掌权的革委会（他们已建有“高安郑”和“黑二团”的专案，都编了“高安”和“黑二团”的“反革命活动大事记”）和军宣队掌权期间形成的档案资料，我相信都不会销毁，只不过不会让我们看到。文革研究是禁区，文革档案的重要内容在现阶段肯定不会公开，否则研究文革、写回忆录就不会这么艰难。这里插一句，我最近从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编的《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中看到了关于清理“三种人”的一系列文件。其中就有不要销毁文革

中形成的档案材料的通知。特别是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派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1983年4月23日，中组发〔1983〕6号文），审查“三种人”的材料也是必须归档的。文件也强调了“应该就基本事实同被记录人核对”，“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经过核对的记录材料连同本人意见一并存入本人档案”²。

我院保守派红卫兵头头程关林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黑材料”的文字，很有意思，摘录如下：

1966年8月上旬（工作队撤离后），胡守安叫上我，从木工厂后院挖出一包东西，我一看，是“反动学生朱成昭”及“反动学生蔡新平”的材料。转移到何处，还是销毁了，我没过问。我只是明白，工作组确实整了学生的黑材料，但我见到的也就是这两个人，真有先见之明。……“文革”初期，我与“东方红”头头打交道最多的是蔡新平。66年8—9月，我与蔡新平有过多次交锋……

我估计，这包东西一定可能就在我外调档案里，其它就应当是地院东方红公社和革委会期间保留下东西。我奇怪的是，高校两派头头1967年底到1968年3月在市委党校办的学习班是市革委出面领导的，谢富治、李钟奇主持的。我是和王大宾作为对立面头头一起参加，我的“自我批评”检查材料是交给学习班领导小组的，肯定不是交给王大宾的，最后怎么落到院革委会手里而且也装进档案了？

由于动笔之前已经看到了其它人有关肖力的回忆，他们的回忆在先，当与自己的记忆有冲突时我还自话自说就不合适了，因此不可避免的要对他人的回忆内容做一些比较分析。孟繁华在整理自己的文革笔记资料时，发现记忆这东西有时很不可靠，明明当时的笔记是这样写的，可记忆中要么完全没有，要么很谬。我们在讨论中交换意见，深有同感。我在此声明，对他人的回忆中与自己的不一致的地方，虽提出自己的分析，但不做定论。对方回忆的内容可能是有的，是他们经历的一个侧面而我自己没有经历，问题也可能出现在时间、地点的错位上。不管怎样，对错都留给研究者们判断。

二、肖力何时来地院

目前我看到涉及肖力主要是殷惟侯和田春林的回忆，聂树人的回忆录中有关肖力部分，因不是他自己的亲历，内容有明显不合逻辑的地方，基本可以断定是

² 《干审工作政策文件选编》（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干审局编，党建读物出版社，1993年12月。P1385

后来写书时的臆想³，如说肖力总是穿军装来地院看大字报，自称自己是“中央工作人员”，等等，这里就不列举了。王大宾的回忆录有关肖力部分主要是引用田春林和我的回忆，但其中去平顶山部分是他经历的，比较详细，而我完全没有介入，这里也不讨论。我与殷惟侯、田春林的回忆的矛盾主要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肖力第一次来地院是什么时候，或“东方红”总部的人第一次见肖力是什么时候？第二个是“东方红”总部的头头最早是在什么时候知道了肖力的真实身份？

关于肖力来地院时间的第一个版本是殷惟侯的⁴，他写道：“‘东方红’成立不久（按：是‘东方红大队’还是‘东方红公社’，原文没有指出），一天，我在学九楼前看大字报，边上有一位高个子，穿普通灰色两用衫的女同志向我打听：‘东方红’是怎么回事？我向她简要说明后，她问我：‘东方红’在哪里办公？我问她：您是谁？她说：我叫肖力，是解放军报的。我就把她带到教四楼201‘东方红’队部，把她介绍给朱成昭等头头。很多天后才知道：肖力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有人回忆说肖力第一次来地院穿军装、说自己是北大的，与我的记忆不符。如果她是北大的，我只会给她指路，不会专门陪她去队部。”

第二个版本是田春林的⁵。他回忆肖力来地院“发生在1966年的7月底、8月初，工作队刚撤离地院。时间正是在‘东方红’战斗队成立的前后几天”。（按：工作队是1966年8月13号撤离地院的，“东方红”战队是8月8号成立的）。在教四楼“东方红”战斗队的办公点，是负责接待的贾维谦领到总部来的。他描述了初见时的情景和外表，如穿什么戴什么长什么样，走路怎么样等等，来人自称是北大历史系五年级学生等（按：王广宇、阎长贵的关于肖力的文章说肖力65年就已经毕业了⁶），拿出了陈伯达写的条子：“兹派肖力同志为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 陈伯达”。由此建立了联系。

这两个版本说法中似乎是两个肖力，都是第一次来地院，前一个自称解放军报社的，后一个自称是北大5年级学生，一个是殷惟侯领进的，一个是贾维谦等接待人员领进的。两个人都说印象深刻，还具体描述了特征和当时情景。

³、“正当朱成昭等酝酿成立一个全院性群众组织的时候，……一个有‘闲暇’看大字报的军人经常出现在大字报的席棚前，这本身就不同寻常。而且这军人还是个女的，20多岁，圆润的脸蛋上戴着一副精制的眼镜，聪慧漂亮，引人注目。……她的一身军人装束，……自称自己是‘中央工作人员’……对这个突然从天而降的中央工作人员，我们对她只有百分之百的信任，而没有丝毫的怀疑。” 摘自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第十三章（电子版194页）。

4、殷惟侯《北京地质学院文革点滴回忆》，2012-11，未发表稿。

5、参见《昨天》第54期地院专辑，田春林回忆录中“肖力”来地院一节。

6、1965年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没有分配工作，就去参加“四清”了。待她参加“四清”工作结束后，“文革”开始了，她没有回北大，留在妈妈即江青身边，1966年7月，开始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工作，和工作人员住在一个楼里（因为她是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女同志，有单独的房间），后来她经常住在江青住的楼里。（《南方周末》：李讷在“文革”初期，2012-07-22 09:10 作者：阎长贵、王广宇）

可我的记忆版本和他们都不一样，而且也自认为印象深刻。我的时间地点内容都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它发生在地院文革史中的一个关键时刻：1966年8月23号，也就是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当天。大约在下午3、4点钟，我刚从地质部回到教四楼（“东方红”的总部办公楼）不久，留守负责接待的同学（我已不记得是谁）就来找我，说有人要找公社负责人。他领进了一个女同志，指着我向她介绍说这就是我们“东方红”总部的负责人，其它头头都去地质部了。没有寒暄，她直接问了我的姓名和肯定我是总部负责人之后，拿出了一封介绍信，介绍信是中央文革的红字抬头，下面有中央文革的大印。天哪！中央文革派人来了！我当时异常激动。信的样式我记不住了，但信的核心内容：“肖力”，“中央文革工作人员”，“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记忆深刻。当时我们的队伍在地质部正处在僵持状态，地质部领导对我们的要求不予理睬，纠集西纠、地院保守派红卫兵对我们围攻。我们“东方红”是“倾巢而出”，大约有八九百人，顶着日头，坐在院子的水泥地上，从一大早步行到地质部直到现在，没吃没喝已七八个小时了，甚至连上厕所都非常困难。西纠的皮带不时在头上挥舞，有的女同学被揪出队伍给剪了辫子（所谓的“破四旧”），有的同学被对立面指认为“狗崽子”被拉出队伍批斗。朱成昭已经将口号升级，在不交出邹家尤就绝不收兵的口号下，局面已陷入僵持状态，如果没有高层的支持，这个僵持局面就很难打破。

这要说一下当时的大形势。虽然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在8月5号已出笼，但并没有在社会公开，至少在地院我们学生中还没人知道。“16条”发表后，工作组虽已于8月13号撤离学校，但由于“16条”里没有公开给工作队的错误明确定性，而是把工作队和领导分为四类，只有第四类才是坏的。这就给工作队掩盖自己的错误留下空间，他们自认为还是比较好的，顶多是好人犯错误，撤走时都安排了代替工作队行使权力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造反派称之为“伪文革”），并不真心给被整的学生老师平反。当时派出工作队的国务院各部委还没有一个领导被点名批判，政府机构还十分稳固，堂堂的国家部级机关怎么会向一群闹事学生低头？何况这些学生中很多是已被工作队定为“右派”、“反动学生”的，在部领导心中这就是“右派闹事”。让部党委把一个副部级干部交给这帮闹事的学生去批斗，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东方红”总部“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口号一出，队伍就完全陷入了被动，处境是进退两难。此时我们多么需要中央文革能够知晓我们情况，获得他们的支持啊！当时朱成昭已经派出了几拨人到各处去反映情况。

肖力的到来，这是不是我们的行动已惊动上面了？因此中央文革真的派人来了？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迅速闪过。肖力问我去地质部没有？目前情况怎样？我急切地告诉了她我们的困境。在我回答后，她就继续提问，让我详细介绍东方红

公社的发展状况，政治目标，组织章程，怎么组织发动群众的，为什么要采取这个行动，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分析，下一步有什么考虑，等等。听完后她对我们队伍能够很快发展到上千人很感兴趣，对参加“东方红”的人不限制成分特别赞赏，她说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是党的一贯方针，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正确的，要进一步发扬，团结更多的同学，包括工人教员，要努力壮大队伍。

不超过一个小时她就结束了谈话，叮嘱我赶快回地质部去，把她的意见告诉总部同志，让我告诉大家，斗争才刚刚开始，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要有理有节；要我告诉同学们，中央文革已经知道了“东方红”的革命行动，中央文革非常关心大家。她说很快会有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要沉得住气，要听从安排。我体会这意思是中央文革要派人来解决问题，听从安排就是听中央文革的安排。

于是我又很快骑自行车赶回到了地质部。到地质部时已是傍晚了。顺便提一句，文革期间我经常骑的一部自行车是曾婉娥，水文系五年级一个印度尼西亚华侨同学借给我的。

在我的记忆中，肖力就是在8·23这天来的地院，而且亮出了中央文革工作人员身份（而不是含义不清的“中央工作人员”）。在这之前她是否来过我不知道，至少是我没有见过，否则我不会这么惊讶。

三、我传达“中央文革三条指示”之后

到了部里，我记得我是站在一个凳子上，将肖力的谈话归纳为中央文革的三条意见向同学们做传达的。在困苦中的同学们由此获得极大鼓舞。地院保守派斗批改红卫兵头头程关林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文字，恰好可与我的记忆相印证⁷：“‘东方红’在地质部闹腾未果（指一进地质部），无奈之下，宣布绝食。我在那里保卫地质部，当然知道他们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并无当年革命烈士在国民党监狱绝食的境界。所以，我令人从地质部食堂抬来两筐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几个人分头劝说‘东方红’的同学吃饭。眼看我们有所收效，刚刚赶到的蔡新平急眼了。他站到凳子上，张开双手吼叫：‘大家不要上当。我们绝食的革命行动已经得到中央文革的重视和肯定。’他接着讲了中央文革是支持他们的三条指示。不仅重新鼓起了‘东方红’同学的士气，我方顿觉：‘这下完了。’”

大约晚上8、9点钟，有人来让我们总部派代表到北京新市委去开会，实际是谈判。总部指定了十来个人，朱成昭要掌握队伍，让我负责带队去谈判。具体都有谁去已记不清了，但从殷惟侯的回忆录来看，有他，有黄平稳。殷惟侯写道：

⁷ 参见《昨天》54期，程关林回忆录

“一进地质部期间戚本禹召集地院两派在北京市委辩论，‘东方红’由蔡新平、我、黄平稳等十余人参加，具体情况记不得了，只记得黄平稳坐在我和蔡新平之间，他在本子上写了：蔡新平侃侃而谈……”不过要指出的是他的回忆中说是戚本禹召集，其实是北京新市委的领导陶鲁笳召集主持的这个会，是否戚本禹参加了我已没印象。如果戚本禹参加了，他应当会出面替我们说话，可我的印象这个会开得相当艰苦。参加会的有地质部副部长旷伏兆、胥光义为首的地质部有关干部，有地院校文革的负责人，有保守派组织斗批改和红卫兵的负责人，可能还有西纠的中学生，他们的人很多，会场乱哄哄的。谈判就像在泥淖中跋涉。会场上唇枪舌剑，争得不可开交。陶鲁笳和地质部领导根本不站在公正立场主持会议，大有坐山观虎斗的架势，都吵到大半夜了，他们的表态就那么一句话：“你们双方什么时候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就按你们意见办。”这实际上就是要看我们笑话，要拖垮我们。看来朱成昭给我预设的谈判目标暂时是达不到了，我想，我们必须要有台阶下，要不近千的队伍就还得僵持在那里。我决定让步，按对立面的调子妥协，改批判会为辩论会，改让邹家尤接受批判为工作队和部领导听取两派意见。我心想，到了大会上，嘴巴是自己的，我爱怎么说他还管得着吗？辩论会和批判会有什么本质差别？听取意见和被批判你分得出来？退一小步是为了进一大步。直到半夜 3 点，总算达成了一致决议，内容大概是：① 8 月 24 号晚上，由新北京市委领导主持，地质部领导、工作组领导都到地院去，参加听取双方代表发表对工作队的意见，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辩论。② 具体如何组织会议，明天双方领导班子再协商，原则上主席团成员和参加发言的人双方对等，轮流发言。这就是 8·24 大辩论的起因。（下图：1966 年 8 月 24 日凌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进地质部”后撤回学校。）



回到地质部，我把这个谈判结果向朱成昭汇报后，他对我的让步非常不满，说我右倾（这是他第一次说我右倾），我说当时情况下我只能如此，以退为进，先撤回去再说，辩论会上再和他们斗。朱成昭心里不痛快，但他也不可能有其它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在 8·24 大辩论获得巨大成功后，他又转怒为喜，一高兴就封了一个政治部主任的头衔给我，

说斗争讲政治，讲策略，你干得不错。说蒋良朴敢打敢拼，有指挥能力，封了个副总指挥；王大宾能团结人发展队伍，封了个组织部长。早期“东方红”领导班子的核心基本上就是原东方红战斗队的核心，也就是朱成昭和我们这几个人，东

方红公社成立后增加了各系联队的负责人。早期的东方红公社领导班子并没有明确的分工，组织机构没有成型。一进地质部和 8·24 大辩论后队伍迅猛发展，但也没有经过选举什么的，就是朱成昭口头这么一指定，大家也就这么认可了。如后勤部长朱德瑜就是二进地质部时朱成昭提议增加的，因为要解决吃饭问题，也同样被大家认可了。朱成昭是直接在地质部礼堂的大会上提议的，说看来作战后勤保障还真重要，我提议朱德瑜为总部后勤部长。大家鼓掌就通过了。作战部也是在一进地质部后才正式建立的。二进地质部由于斗争的发展，核心组成员扩大，各种机构进一步完善而且逐渐固定了下来。可以说领导班子是在战斗中自然形成的，巴黎公社大民主选举根本不适合这种战时状态。

大约半夜 3 点多钟，我们和市委派的人一起回到了地质部，由陶鲁笳宣布了谈判结果，“东方红”也就决定撤回学校。陶鲁加是如何宣布市委决定的具体过程我已经没印象了，可以参考聂树人的回忆⁸。

四、肖力与 8·24 大辩论

回校后，8 月 24 号上午，“东方红”和校文革、“斗批改”又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后对晚上的辩论会的组织方式和程序达成了协议。这个谈判朱成昭全程参加了。辩论双方在主席台上各派两名代表，一名首席代表，一名主辩人，朱成昭是“东方红”首席代表，我是“东方红”主辩人。辩论会以我们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辩论会后“东方红”队伍急剧壮大，是地院文革造反派与保守派力量转换的分水岭。

辩论的当晚，我和朱成昭一直在台上，对台下的情况不了解。事后大家告诉我，肖力当晚一直在台下观看辩论会，看到我们被围攻和坚定的斗争意志，看到我们后来的巨大成功，她几次都流泪了。我想这也因为是她介入高校文革运动打响的第一炮，是她高校“支左”的漂亮的处女作。她流泪一方面是感动，一方面是欣慰与得意，因此也是高兴的流泪。田春林的回忆录里专门记述了这个经过（见《昨天》第 54 期，田春林回忆录），当晚他和伏庆是陪着肖力。后来听说除肖力外，中央文革还有人观察了这次辩论会，传说江青、戚本禹曾经来过。

8、到 8 月 24 日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从办公大楼东边门洞里走出来一个身份不明的年青干部说：待会儿中央首长要接见你们，你们的人到这个大楼门口集合。……，东方红总部负责人和骨干都齐集在东边那个楼门洞口，准备听取传达，……国务院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传达中央指示：1、地质学院学生到地质部要求工作队领导回学校听取师生批评意见的行动是正确的，合理的；2、现在决定，地质部领导于今天晚上到地质学院听取师生意见，并对工作中的错误进行检查。3、师生如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辩论。（摘自聂树人《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第十五章 一进地质部）

这里插上一段保守派红卫兵代表程关林写的回忆录，他写得比较简单，但符合基本事实，特别是他对陶鲁笳在大会中态度变化的观察很有意思，这点我们当时都没有注意到，直到现在看到了他的回忆录后才知道。程关林写道：

8月24日晚，地院操场西头搭了个台子，造反派、老保两派大辩论。中央派陶鲁笳主持会议，自然居中而坐。他右边是代表我方上主席台的任士田（斗批改）、程关林（红卫兵）、胡守安（工人赤卫队）；陶鲁笳左边是对方代表：朱成昭、蔡新平、蔡文怀（？）。这也是地院文革中唯一的两派同台亮相。

蔡新平振振有词地引用中央文革一个又一个最近讲话，但很快被我方几千人的嘘声所淹没。这时，朱成昭神情肃穆地起头：“暮色苍茫看劲松……”“东方红”几千人齐呼：“……无限风光在险峰！”上万人的操场笼罩在一种哀兵动人的气氛中。

我在辩论开始前还跟蔡新平就主席台名额、辩论次序等争得面红耳赤，此时，我颇有理亏心虚之感。

震惊北京的地院“8·24”大辩论以我方大败而告终。当晚，我派不少人就宣布退出红卫兵（或斗批改）。我方辩论组组长谷尚（上？）礼、副组长王××也被撤换。可以说，“8·24”大辩论后，院红卫兵已名存实亡，坚持的只是勘探系“红卫兵”等各系保守派战斗小队及工人赤卫队。

奇怪的是，一直支持我们，这次又主持辩论会的陶鲁笳，在辩论会前还热情与我方代表握手，还拍拍我肩膀。而当双方正辩论时，一个秘书模样的人向他递了张纸条后，他一下就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对“东方红”代表唯唯诺诺，低声下气。

因为辩论会的过程中，老保冲上台，对我又扯又打，不让我发言，说我父亲是叛徒，根本没有资格当红卫兵，不能作为“东方红”的红卫兵代表，要把我轰下台。我记得我大声问台下：“东方红的战士们，我能不能代表你们？”下面异口同声大呼：“能够！”我向陶鲁笳表示抗议，要他主持公道，但他也只是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根本不采取实际措施。

就在拉扯的过程中，当我快被他们扯下台的危急关头，陶鲁笳在后面终于大声说话了，制止了即将发生的更大规模的揪斗（当时还相对文明，还不能叫武斗）。于是辩论又恢复了常态。趁此机会我做了半个多小时的激情演讲。整个会场形势急剧转变，首先是我们班的一个同学跳上台，当场表示要坚决参加“东方红”，我马上代表“东方红”欢迎他加入，并把我的“东方红”臂章给他戴上了。全场热烈鼓掌，更多人表示参加“东方红”。这个同学我已记不清是谁了，模模糊糊

记得像是丁育民。恰好去年丁育民到我家来，我问他 8·24 大辩论你在场吗？他说老蔡你忘了，就是我第一个跳上台要求加入“东方红”的。还果然是他，我的不清晰的记忆得到了确认。丁育民后来是三司住沪联络站的办公室负责人，陪同张春桥参与了中央文革处理上海的“安亭事件”，又帮助总理处理新疆的“八楼事件”。他写有回忆录。

当晚的大辩论奠定了“东方红”胜利的大局，保守组织从此开始迅速瓦解。

程关林的回忆终于解开了陶鲁笳态度急剧转变之谜。是有人在关键的时刻向他发出了警告。具体是谁递的条子，条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都不重要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能够镇得住陶鲁笳的人，能镇得住他的不是国务院就是中央文革，很可能就就是在台下观战的中央文革成员，这应当与肖力有关。

程关林后来还写道：

8月25日凌晨，我正为陶鲁笳在辩论会上表态支持“东方红”而恼火，祝天惠来电话，说陶鲁笳、李人林要接见祝、程等人。我正生着陶鲁笳的气，未去。一个多小时后，祝天惠敲开我的门：“国务院工交口是支持我们的，会上表态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中央文革的人也到了辩论会现场。今后调子要变……”

这就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可以肯定，正是 8 月 23 号肖力到地院，也可能去了地质部，观察调研后向中央文革，向周总理，甚至向他父亲做了汇报，这个汇报导致高层（可能是毛泽东、周恩来或中央文革）敦促北京新市委和地质部出面解决问题。学生冲击部委机关毕竟是第一次，作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这次冲击的性质当天并没有公开明确地表态，中央文革除了肖力，其它主要领导当时也都没有直接走向前台公开表态。这和后来的发生类似事件时领导人的应对方式有明显差别。后来频频发生的对中央机关的冲击事件，总理和中央文革往往都会有及时明确的表态，或肯定，或否定，或劝阻。如地院“东方红”的二进地质部，周总理就说了是革命的行动，而冲击民族文化宫，发生抢民委档案的事，就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是被坏人利用了。对于冲击国务院直属部委机关这样的事，这绝对是大国总理的噩梦，周恩来是绝不会鼓励支持这样的行为的，除非有毛泽东的表态。对我们这次行动，为什么一直拖到下半夜才解决问题，的确是有很深的背景，值得思考。当时的中央文革还没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步，薄一波、陶鲁笳和何长工们腰杆也都还不软，是很不甘情愿向造反派低头的。程关林回忆录中描写的陶鲁笳在大辩论后对地院保守派说的那些两面色彩的话，也的确就是他们的内心话。如果没有高层发出指示，我们冲击地质部的行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五、肖力没有参与策划一进地质部

有人说肖力参与出谋划策了一进地质部，我没有这样的印象。在我记忆中，一进地质部就是朱成昭的创造。在我们讨论进军地质部及事前的全部活动中，完全没有肖力的影子。文革期间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听人说肖力参与过策划一进地质部这样的话。现在有的回忆录中提出肖力参与了一进地质部的策划，或许只是一种推测，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回忆录中把肖力来地院的时间提前到了8·23之前。因为殷惟侯和田春林回忆都说肖力在8·23之前就已经到地院来活动了，已经和地院“东方红”头头们很熟了，那推测肖力参与策划也似乎顺理成章了。可她8·23下午来地院给我的感觉好像她并不很熟悉地院文革情况。如果她已经认识总部的人了，也已很熟悉“东方红”的情况，她就没有必要到地院来找人，她可以直接去地质部找“东方红”的头头下达指示就行（她的外表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她也更没有必要出示介绍信，也没有必要问我那么多问题，还做出分析，说我们大方向正确，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正确等等，还让我立即到部里去传达，向我们暗示了中央文革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这实际是要我去鼓舞斗志，稳定军心，等待问题的解决，同时达到既向“东方红”、也向地质部和保守派群众亮明中央文革态度的目的。从程关林回忆录来看，还真的起了很大作用。



我这个肖力到地院的回忆的版本，时间、地点、过程等要点都是清晰的，而且有对立面的回忆录作为旁证。8·23下午我回到地质部，当我把这事都告诉总部成员时，我印象中没有听他们谁说早就认识肖力了，他们也都似乎是第一次知道中央文革来人了，他们的情绪和我一样兴奋激动。（上图：1966年9月5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这是6日冲击地质部办公大楼的情景。）

大闹地质部是朱成昭的一个大胆决定，他很明确地在总部对我们讲，我们地院不像北大、清华那么重要和有影响，不会有中央领导人到地院来，要揪邹家尤就得自己去找地质部，地质部一定要保邹家尤，事情一定会闹大，我们先礼后兵，口号开始不要太高，如果他们不答应，引起大家的愤怒了，就可以把口号升级。只有闹大了，上面才会有人来管，没有中央文革出面表态给地质部施加压力，要揪出邹家尤几乎是不可能的。果然他达到了目的。顺应大方向，抓住政治敏感点，采取过激行动，把事情闹大，给总理施加压力，给中央文革一个表态的借口，就获得了胜利。这个策略，在一进地质部后，朱成昭一再使用，而且多数情况下都很有效。如二进地质部、抢夺广播台等。

我认为在一进地质部之前，朱成昭和地院“东方红”中还没有人和中央文革挂上钩，也还不认识肖力。认为肖力参加了策划，那除非肖力和朱成昭是特级演员，首次大闹地质部是他们从头到尾瞒过了其它人合演的一出戏，这也太夸张了。

在二进地质部之前，我和朱成昭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和总部其它人关系也是融洽的，总部有什么大事一般我都知道，如果他们那时都已经知道肖力了（按田春林回忆，已经知道是陈伯达派来的中央文革小组驻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观察员，8·18后就知道她是主席女儿了），而我竟然一点不知，8月23号下午见到肖力时对她没有任何印象，她也不认识我，谈话中也没有感觉到她已经认识了总部其它人。“东方红”刚成立不几天，对外还没有任何影响，陈伯达就派肖力来当观察员，这种可能性不大。当时我们和其它一般高校的情况差不多，不像北大、清华等少数几个特殊的学校，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引起陈伯达的兴趣。

为此我在一次聚会时专门问过王广宇，王广宇当时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我问肖力刚到中央文革时穿军装吗？她外出活动穿军装吗？王广宇说没有。我说殷惟侯说他见肖力时（8月初）肖力说她是解放军报社的，王广宇认为这不太可能。他说肖力是9月底10月初才到解放军报社去的，在这之前她是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他说肖力是江青、陈伯达明确安排到中央文革办事组来工作的，那段时间常到高校去活动，带中央文革的介绍信是很自然的事。我也问了，有没有可能带陈伯达写的条子？他想了想，觉得可能性不大。我也推测，一个不知其身份的人，给一个对陈伯达的字迹完全不认识的人看陈伯达的条子，看者怎么就能相信这就是陈伯达的亲笔信？写条子只能在身份相互熟悉的人之间才管用。在一进地质部闹出大动静之前，地质“东方红”组织也就是首都高校众多反工作队组织中的一个，那时地院这个学校不出名，“东方红”队伍也不出名，领导班子中也没有一个有特殊背景的高干子弟，朱成昭的父亲才是上海一个建工局副局长，顶多才沾点高干的边，也不是京官。“东方红”什么名气也没有，凭什么陈伯达亲

自派肖力来？再说了，一个你毫不知底细的人拿一张只签陈伯达名字的纸条，没有公章，就代表了中央文革，这似乎不合常理，谁能够断定那条子或签名的真假？

我的印象中也只是在 8·23 这次接触后，我们才开始了与肖力的频繁交往，包括二进地质部时她和我、朱成昭几次见面谈运动的问题，她帮我们分析，提醒我们要注意的问题，这些我多少都还有一些记忆。

有一天肖力把我、朱成昭，可能还有蒋良朴，从地质部叫出来谈话，我们在地质部附近的一个小饭店要了一碗汤，几个烧饼，这次吃饭的事让同学看到了，传开后说总部头头不和战士同甘共苦，大家挨饿，头头下馆子，使我们很尴尬。最近看了印红标 1990 年采访我的录音整理稿，里面对二进地质部期间肖力的接见和谈话都有记载。

六、肖力在地院会见蒯大富

网上传有宋永毅的文章《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他写道：朱在采访中告诉他：“‘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但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他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他当即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是如何向朱成昭交代的，由于朱成昭的去世已经不可能还原。但肖力要朱成昭支持蒯大富，我们派人到清华去给蒯大富助威却是真实的故事。这在印红标 1990 年采访录音整理稿中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一进地质部后，肖力和我们建立联系。23 号那天她是持介绍信到地院来的，已经亮明了她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身份，尽管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她是毛主席女儿，但在事实上已经表达了中央文革支持地院“东方红”，支持“东方红”造地质部的反的立场。当天她没有机会和“东方红”总部其它成员见面，8·24 那天晚上也仅见过个别的人，这之后她很有必要再到地院“东方红”总部来会会大家。8·24 大辩论后，地院“东方红”名声大震，北京市高校，外地来京串联的学生，都纷纷到地院看大字报和到“东方红”总部接待室访问，每天车水马龙。肖力也时不时就会来地院。来时一般都没有事先联系，她总是先在校内转转，看看大字报，也偶尔和同学聊聊，然后到教四楼来。总部办公室人员流动不定，不同时候和她见面的人会有变化，经过几次后，总部大多数人都已经认识肖力了。

有一天朱成昭和我都在，她很直接地问有没有清华的同学到这里来串联，知不知道蒯大富的消息。我估计她是刚去过清华，没有找到蒯大富。朱成昭说蒯大富就藏在地院，我当时也一愣，我说我还不知道老蒯躲地院了。朱成昭说，老蒯

让保密，知道的没几个人。肖力一听就说快把他找来。朱成昭向一个同学交代了后，很快就把老蒯找来了。

我是第一次见蒯大富，瘦脸尖下巴，戴副眼镜，事后我还说过，怎么长得像我们班的杨××（我班的团支部书记）。老蒯激动地与肖力握手，肖力却很平静地看着他。她对老蒯说，在清华找不到你，听说你躲起来了，原来你跑到地院来了。相互没有什么寒暄介绍，感觉好像他们可能已经认识。老蒯说清华的老保红卫兵疯了，到处在抓人，学校现在比工作队时还恐怖，叫他们逮着就没命了。清华没有我藏身之处。肖力说，蒯大富你不要忘记，你的阵地在清华，你要尽快回到清华去。老蒯说我在清华臭得很，没有战斗队敢要我。肖力说你要向地院“东方红”学习，没人要你，你自己不会组织队伍？朱成昭，你们要帮帮他。朱成昭说一定大力支持，需要我们时只管来找我，找老蔡和总部其它人都行。谈的时间不长，肖力就和蒯大富一起离开了总部，他们之间是否还有谈话就不得而知了。

蒯大富是怎么到地院的？前不久清华 105 周年校庆时蒯大富请清华红教工的老师聚会，鲍长康参加了，地院陶世龙老师（已故清华红教工托德坚老师的丈夫）也参加了。他们谈到了老蒯到地院的事。事后陶老师告诉我，鲍长康在地院有一个老乡同学，是把他老蒯带到他这个老乡那里住下的。我问了田春林，这个同学是勘探系 63 级的，红色尖兵战斗队的，叫奚戌，现在海口。

在二进地质部期间，有一天蒯大富来找我们，说他正在筹建井冈山红卫兵，他谈了他的处境和进展情况，要我们给他助威壮声势，朱成昭让我去安排一下。当天我们派了几支战斗队，夜里从地院出发，差不多上百人，几部平板车，拉着大字报纸，胶水浆糊墨水，一晚上就将清华主要的大字报席棚区糊满了支持蒯大富的标语口号，那晚我跟着去了，顺便看了看他们的大字报，确实感到老蒯在清华还没有火起来。到 9 月 23 号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开成立大会时，地院那天正好发生了抢广播台的事件，总部几个主要头头都没有去，但还是派了几个战斗队去助威。这个情况在吴鉴的回忆中也提到了。最近看老蒯的谈话，也说道这情况：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 月 23 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⁹

1966 年 9 月 6 号，蒯大富在三司成立大会上宣读誓词，但他那时还没有拉起队伍，还是“光杆司令”，按常理他不可能进入三司的核心圈子。串联三司时，

⁹、《蒯大富：在文革浪尖和人生低谷中摆渡的人》，作者：田炳信，原载于：新华网

周永璋在清华联系的是唐伟，唐伟代表清华的八八串联会（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一共有十四个学校的反工作队的组织参与组建首都三司，代表清华参加三司的只有唐伟。在学校里蒯大富要加入“八八”，“八八”硬没有让老蒯参加。在正常情况下，三司的成立大会是轮不到由蒯大富来宣读誓词的。肖力与蒯大富谈话后一再嘱咐朱成昭要帮蒯大富一把，不过仅仅是朱成昭个人的面子，也不见得就能把蒯大富送到三司成立大会去宣读誓词。如果如朱成昭对宋永毅说的那样，周总理有过扶持老蒯的意见，那分量就不一样了。我推测请蒯大富宣读誓词很可能就是中央文革，或者就是周总理本人的直接指示。想想当初周总理亲自到清华去解放蒯大富，受主席之托连续召见，彻夜深谈，蒯为毛提供了打倒刘少奇的炮弹。周对蒯倾注了特殊的关切和寄予期望。借首都三司成立的声威来扶持老蒯一把，这是很可能的。此外，三司是由地院周永璋负责串联起来的，周永璋和蒯大富又都是苏北老乡，三司成立大会是由周永璋主持的，在有上面的指示和朱成昭的关照的情况下，周永璋特意安排老蒯宣读誓词的程序，就是合情合理的了。这之后老蒯在清华就有了名分，胆子也就渐渐壮了起来。随着三司的迅速壮大，声望人气和在中央文革心目中的地位不断提高，蒯大富头上的光环也就更加耀眼了，以至于外界很多人都以为蒯大富就是三司的“司令”。但老蒯有自知之明，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且还向人解释这是个误会。

三司成立大会的前一天，9月5号，地院“东方红”发起了二进地质部行动。我们对地质部提出的要求在当天就遭到了部领导的拒绝，第二天就爆发了对部办公楼的冲击（揪邹家尤），地质部召集了地院“斗批改”、西纠红卫兵、部职工，还调来了一些工人来保卫地质部，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攻防战，所以9月6号当天，朱成昭、蒋良朴和我都没有去参加三司成立大会，总部安排了王大宾，田春林去参加了大会。

七、什么时候知道了肖力的真实身份

我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肖力的真实身份的呢？目前也有不同的版本。田春林最初的回忆是这样的：

肖力真实身份的确定是由于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检阅来京串联的红卫兵，那天朱成昭受邀作为「东方红」的代表上了天安门，当毛主席从天安门城楼休息大厅走出来时，发现搀扶老人家的是一位青年女军人，当朱成昭仔细端详时她当时惊呆了，天哪，那不是肖力吗？她怎么搀扶着毛主席，她和主席是什么关系？这时传来了革军子弟也是「东方红」老战友张玉晋的声音，他告诉朱

头，肖力是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这时朱头激动万分，原来如此，怪不得我们听肖力的点拨步步得胜，炮炮打得准呢。朱头回来后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知了核心组的几个人，大家别提多高兴了，我们的腰杆更硬了，我们是通天的，我们的后台是毛泽东看你斗批改还能蹦跶几天。肖力是不是中央文革成员并不重要，陈伯达签名的介绍函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肖力的特殊身份，她来自于中国的第一家庭，她是毛主席的女儿，与其说是陈伯达中央文革派出的文革观察员，不如说她是毛泽东的文革观察员，只此一点就足以具有地震效应了。（在正式发表时田春林已经对这段回忆内容在时间上做了修改。和我后面叙述的时间一致了。）

但我的记忆告诉我，我们知道肖力就是李讷，就是主席女儿这一特殊身份，是朱成昭在二进地质部期间上天安门之后，时间应当是 1966 年 9 月 15 日，在这之前朱成昭还没有上过天安门。8·18 第一次接见时，能够上天安门的好像还没有几个造反派头头的身影。8 月 17 号地院东方红公社刚刚宣布成立，既没有多大势力，也没有多大影响，连一个有点名气的高干子弟都没有，怎么可能邀请上天安门？地院东方红公社是一进地质部后才开始扬名，二进地质部实际上已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暗地支持，请朱成昭上天安门就是特别的鼓励。那天朱成昭上天安门回来后，兴奋地告诉我们，在天安门城楼上他见到了肖力，知道了肖力就是“小李”，小李就是李讷，李讷就是主席和江青的女儿！他兴奋地说：我们通天了！他在地质部礼堂向大家传达介绍时，“东方红”战士全场欢呼雀跃，高兴之极，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这个场景留下了照片。（右图：朱成昭在地质部礼堂向东方红战士报告上天安门见到了肖力，知道了肖力是主席女儿的喜讯。拿话筒的是朱成昭，旁边鼓掌的是蒋良朴，蒋良朴边上是田春林。下图：听到这一喜讯后的欢腾场面。）



席女儿的喜讯。拿话筒的是朱成昭，旁边鼓掌的是蒋良朴，蒋良朴边上是田春林。下图：听到这一喜讯后的欢腾场面。）

大约在 1966 年 10 月后，“东方红”总部的头头都常驻地质部了，肖力也就不来地院了。后来我们知道她去了解放军报社。1966 年 11

月我正式退出了“东方红”总部。这之后，我个人、有时和其它人还多次去解放军报社找过肖力。记得有一次是为彭小蒙的事，彭小蒙在北大被批斗，批斗完了后被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里。我和杨淑荣、殷惟侯去看彭小蒙，主要是想让她给我们谈朱成昭与他们之间交往的情况，彭小蒙托我们向肖力反映她的处境，希望解救她，我们答应了，这之后彭小蒙还真给放了。有一次是和周永璋、刘富元为三司的事（周永璋在三司被朱成昭夺权，刘富元抢了三司大印），为此向肖力反映情况，我记得肖力当时批评了刘富元。有一次为朱成昭的事去见肖力，记得我还问过她：朱成昭说你曾经要和他一起去串联，是真的吗？肖力只笑了笑，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在1968年3月6号和3月11号中央领导接见北京高校办学习班的两派头头时，肖力都在场。（从王广宇和阎长贵的回忆知道，肖力1968年3月又从军报重新调回中央文革办事组任组长¹⁰）。3月6号那次接见中间休息时，肖力和我们说了不少话，下面摘录笔记本中的一段记录：

肖力（对蒯）：你们红卫兵造反都好几年了，就是这样子，伯达开会开宗明义，今天就是听你们讲，畅所欲言。老蒯：我不敢，肖力（对蔡）：你大概也有意见？（蔡答：有），就讲嘛。（蔡：发言人太多，争不上），可以递条子嘛，（我写条子给了肖力）。肖力（对孙蓬一）：大炮，放嘛！（孙蓬一：我有些问题要讲，我想单独和你谈谈。）肖力：走吧。带孙走了。

会议继续发言……

伯达：还有半个小时，大家都不要讲了。

江青：蔡新平递了个条子给我，说和王大宾，谭厚兰意见不同，还有十分钟，请蔡新平谈谈。

我发言完后江青没有说什么，就说今天会就开到这里，明天再继续。第二次接见实际上一直等到了11号。11号的接见气氛和6号就大不一样了。这次会上，江青和各位与会的领导都频频插话，打断一些人的发言，江青还大发脾气，有一个同学（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的）发言谈到二月逆流的问题，大概是为某些“二流派”人物辩护，江青突然站起来说我看你就是二流派，吓得这个同学再也不敢吭声了。这次会议肖力开始也在场，我本想再和她聊聊，但她中途就离开了。

在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肖力。

八、肖力在地院文革中的作用

肖力对地院文革的确有重要影响，她的支持和指点的确对地院“东方红”的

¹⁰ 《南方周末》2012-07-20，阎长贵、王广宇：《李讷在“文革”初期》

取胜有重要帮助，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鼓励，而不是参与“东方红”行动的策划，最多也就是在“东方红”行动已经酿成了大的事件后，在政策和策略方面做些指点，这种事后的指点与事前幕后的策划是有原则区别的。从“东方红”早期战斗队的发起串联，到成立东方红大队，进而发展到组建东方红公社，这一阶段她都没有现身介入，可以说我们的行动都是自发的。我们这些人能够聚集在一起，提出主张，发出宣言，制定章程，发起一个又一个的“造反”行动，主要是凭借大家思想的共鸣，而不是“上方”“高人”的直接指点指示。

策划一进地质部是叫形势逼的，而不是因为知道了《炮打司令部》。东方红公社成立后实际上面临巨大压力，我们仍然是少数派，老保天天在学校搞斗“黑帮”（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抄家破“四旧”。他们搞得红红火火，完全掌握着运动的主动权。当时我们“东方红”也有人想和他们比着干，也想去抄家破“四旧”斗当权派斗权威，都叫我和朱成昭制止了。我说我们不干这些，我们就是一心批工作队，不把工作队的反动路线批倒，“反工作队就是反党”的帽子就永远压在我们头上，工作队不彻底向我们认错，检讨，交出黑材料，给我们彻底平反，我们就永远是“右派”学生。要批工作队不能空喊口号，贴再多大字报也没有用，必须把工作队领导，主要是队长邹家尤给弄回来，面对面地开展斗争。工作队不低头，老保的气焰就下不去。进军地质部，要邹家尤回地院接受批判，作检讨，打老保气焰，在当时成了我们的共识，也成了我们唯一可以采取的有效作战方针。我们一进地质部的决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这是一个运动发展的自然过程，与肖力来没来地院无关。

此外，朱成昭还有他自己更深的想法，在一进地质部前就对我们说过，一进地质部后就更进了一步。听他的那些想法，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令脑洞大开，因此印象很深。他说：中央有三根线，边说边拿了三根筷子比划，一根是毛泽东为首的在中间立着，一根是刘少奇为首的，上左下右，一根是周恩来的，上右下左。工作队是刘少奇指示，周恩来派遣，刘少奇的路线是通过周恩来派出的各部委工作队来执行的，要揭开中央的盖子，就得通过攻打各部委的工作队，往上揪。他这个思想成了发动二进地质部行动的理论指导，已经不再局限于批工作队了，把造反派的行动意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这套思想现在看当然很肤浅，但在当时却让我们感到很有“深度”，眼光已远远超越了我们的单纯。这个思想显然不会是肖力给灌输的，在我们串联成立东方红战斗队时，在不同场合，他就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别说那时还不认识肖力，就算认识，肖力那个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想法，我也怀疑。到了三进地质部，朱成昭胃口就更大了，口气也就更大了，就有了野心。他要在地质部安装几百部电话（交换机），要指挥全国。在占领地质部后，主要领导办公室都被“东方红”的人占领，部长们的红电话也

在他们控制之下。有人开玩笑说“你可以当地质部长了”，他说“颜宽就行”。颜宽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是朱成昭的老乡，也是“东方红”最早发起串联的人之一，他紧跟朱成昭，但因出生资本家，朱没有给他封什么官。他说颜宽就有资格当部长，可见部长地位已不在他眼里。他在接触叶向真之后，思想就开始“右倾”，由左向右急转，与中央文革的思想格格不入，已开始分道扬镳。伏庆是在回忆朱成昭“闭门思过”后也有一个关于“三条线”的说法，而且更为奇特，变得更具体更形象：

朱成昭在西三楼 327 房间“闭门思过”……在这段时间里，朱对我说了很多话，但并不系统，陆陆续续说的。他说他与戚本禹谈了 3、4 个小时，戚辩不过他，无法批驳他的观点，只能让他闭门思过。说叶帅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争论，拍桌子把手指都折断了。将来如果打起仗来，还是要靠老帅，中央文革这帮文人能干什么。毛主席现在只是利用这帮文人，迟早要把他们抛出来当替罪羊。又说中央有 3 条线，一条是毛，下粗上细，因为长期的宣传，把共产党的一切功劳都归到毛一人身上，老百姓只知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不知道别的，所以越往下层，拥毛的就越多，其实毛在中央是少数；另一条线是刘少奇，上粗下细，跟毛相反；第三条线是周恩来，上下一般粗。还说造反夺权，国家部门瘫痪，国家经济已撑不住了。他对我说，如今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你随便说 3 句话，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开玩笑说，我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 3 句话，你如何把我打成反革命？他说那可以说你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照样是反革命。

我认为这是他思想的新发展，和他早期的“三条线”理论相比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朱成昭和他的追随者们是真正的造反派，是有独立思考的“造反者”，他们的头脑并不是简单接受来自各方的“灌输”，虽然也在努力窥测领导意图，但更多的是在用自己脑子在思考，并不是上面怎么说就一定会怎么做。他从来都不会言听计从，更不是驯服工具，再加狂傲自负的倔强性格，在毛时代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是导致他们走上不归之路的内在因素。“神”让你按他的指点方向去造反，可你反过来却要造“神”的反，其下场可想而知。朱成昭对“神”经常出言不逊，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他后来与肖力的绝交。田春林回忆，当他劝朱成昭说，正是因为肖力的指点我们才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肖力是谁，肖力是主席的女儿。朱成昭勃然大怒，猛一下站起来，脸色通红，说：“田春林你以后在我面前少提肖力！”可见他根本不买肖力的账，也可以说肖力对他的影响有限。

毛泽东既有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又有驾驭群众运动的高超手腕。他利用林

彪的邪教式的鼓吹中央领导集体的认同，使自己高坐到了圣坛之上，使他的思想具有了对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巨大控制作用，“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用无比巨大的号召力把这帮学生鼓动起来造反，造成了天下大乱。在大乱的混沌之中，他在仔细观察，他要从中找到符合他的战略目标、可以为他所用的那股力量，按现今时髦的说法就是要找到“抓手”，树立起风向标，规划出模板，将运动推向他期望的方向。毛还有一个在运动中选拔接班人的想法，要在运动中寻找发现符合他思想，有培养价值的青年领袖。在这一点上毛和那些说“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的领导人不同，毛泽东不太看得上八旗子弟。

根据王广宇的回忆，肖力其实是主席让她到中央文革来的，她有些活动连江青都不一定清楚。她那段时间主要在各个高校活动，就是在替主席收集高校运动情况。由于她的外表和普通大学生没什么区别，能够直接深入到学生中去获得第一手资料，是主席观察学生运动的重要帮手。地院在一进地质部之前她可能来过，但亮出自己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这个身份，应当就是在 8·23 那天。那天是学生第一次向国家部级机关发起冲击，事件惊动了“上方”，肖力及时介入，她所了解到的情况符合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为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抓手”，从此地院“东方红”就成了可以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利用的得力工具。为此肖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和地院“东方红”头头保持着频繁的联系。王广宇回忆，一次戚本禹告诉他赶快通知肖力回家，王广宇领会是主席找肖力了。当时没有便携式移动联络设备，要找肖力就只有根据她的活动规律来搜索，第一可能就是找朱成昭。而且果然在地质部找到朱成昭后就找到了肖力。由此可见肖力与地院“东方红”的关系，特别是与朱成昭的关系是很不一般的。当朱成昭在下面议论中央文革的不是，发出批评中央文革的系统言论的事被人报告给中央文革后，中央文革也就只是通过陈伯达发出警告。后来发展到公开发布对抗中央文革的“宣言”，以检查为名宣扬他反中央文革的八大观点，按说这态度是够恶劣的了。但中央文革也就只是让他“闭门思过”。再到后来朱成昭“叛逃”被抓回后，也还只是让学校限制他行动。宋翔雁老师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宋翔雁回忆录的第二部分，未发表稿），说王大宾领他到解放军报社去见肖力，让他有机会亲自聆听肖力对朱成昭的看法，让宋翔雁了解肖力是真心想让朱成昭回头的，然后让宋老师到校革委会软禁朱成昭的地方去，做朱成昭的思想工作，希望“浪子回头”。看过这段回忆后，我深感肖力的用心良苦，对朱成昭是多么看重。如果朱成昭真像戚本禹说的那样“悬崖勒马”，我相信他肯定会“回头是岸”“立地成佛”，如果他能诚心投靠，一定还会被继续重用。要是换个人如此公然地反中央文革，早就被打成“反革命”送进监狱去了。在朱成昭反中央文革的前后，北京乃至全国反中央文革的事件此起彼伏，像朱成昭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宽恕真是罕有。可惜他是一

个不肯回头的死硬分子，肖力想救他也无可奈何了。最后终于在 1967 年 11 月被正式逮捕，这距他反中央文革的事情败露过去了十个多月。在毛泽东活着时，他始终再没能脱了囹圄。只到打倒“四人帮”，1978 年释放，1981 年才平反。

应当说通过肖力，在“五大领袖”产生之前，朱成昭就已为毛泽东所知。中央文革对他的器重实际也是传达了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他走红在“五大领袖”中除聂元梓外的四个“小将”之前，但这个“小将”太有主见，个性太强，太桀骜不顺，最后扎了他老人家的手，不得不放弃。朱成昭之后，毛泽东又百般呵护培养那“五大领袖”，还有那个也是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但最终都成了毛泽东的伤心泪，一个也扶不起来。毛泽东希望在大风大浪中选拔接班人的计划终于彻底破产。毛熬到最后选择了他认为最老实可靠、“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结果“尸骨未寒”就违背了“圣意”。“圣意”把圣上自己也糊弄了。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 2016 年 7 月 30 日《昨天》第 73 期)

我陪肖力去京西门头沟煤矿

王大宾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重新回到一線。毛澤東需要隨時瞭解與掌控北京高校工作組撤走後的文革運動形勢。北京地質學院的文革運動應在北京高校中具有典型性。地院的文革運動受到了上層的關注。

毛澤東的女兒肖力，到地院調查瞭解文革運動情況，我是事後朱成昭告訴我才知道。據當時東方紅戰鬥隊核心組的田春林回憶： 肖力到地院，找東方紅戰鬥隊瞭解情況，第一次是他首先接待的。

我和肖力也常有接觸。記憶深刻的一次，是 1966 年 9 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和朱成昭幾個人開了學校的小車，去釣魚臺接了肖力，一起去門頭溝的京西煤礦，調查瞭解煤礦的文化革命運動情況。這次活動是肖力安排的。因為我是學探礦專業的，鐵礦、煤礦都去實習過，到過礦山，下過礦井，對井下工人艱苦的掘進工作情況也比較熟悉，肖力要去京西煤礦，朱成昭特地叫上我陪同。

到了京西煤礦，礦上的造反派頭頭先給肖力介紹礦上的文革運動情況。聽完介紹，肖力提出要下礦井，親自去看看採掘工人的工作情況。下礦井，肖力這是頭一次，朱成昭等人從前也未下過井。我陪同肖力他們下到井下，前行 3 公里左右，就到了一個煤礦工人操作的採掘工作面。見到採掘工人的工作條件，看見煤礦工人，個個一臉都是黑頭罩面。停下來說話時，祇能見到他的眼睛在轉動，肖力不禁哭了。肖力對我們說：不是親眼所見，真不知道，也想不到煤礦工人的工作這樣辛苦、危險。毛主席搞工人運動，最早就是去的安源煤礦，他下過井，瞭解煤礦工人的艱難困苦，解放後他也一直關心著他們的工作、生活。

聽了介紹，下了井，肖力對京西煤礦運動情況有了初步瞭解，我們就連夜返回京城了。回城路上，我就向他講述我在河北龍煙鋼鐵公司龐家堡鐵礦和山西臨汾煤礦實習的情況，講了礦上一些領導幹部的特殊化作風和工人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肖力聽後很受震動。她說：她祇去農村搞過四清，瞭解一些農民艱苦生活的情況。沒有到過礦山，這是第一次瞭解，見到煤礦工人這樣辛苦。肖力對農民、工人的感情留給我深刻的印象。

路上，她還談到地院東方紅的情況，可以感受到她對我們東方紅的主要頭頭，都有較多的瞭解。我亦相信，毛主席、中央文革對地院文革運動，對工作組撤走後，北京高校反工作組的造反派與保工作組的保守派之間的激烈爭辯與鬥爭的形勢，是非常瞭解非常明白的。毛主席常說，情況明，方向對，決心大。現在想來，毛主席應正是評估了當時北京高校以及全國，在工作組的問題上與群眾分裂對抗的形勢，作出發表《紅旗》十三期社論，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決策的。

（编者注：该文引自《王大宾回忆录》一书的第 20-23 页）

寻找肖力

王广宇

有一天（1966年9月——编者注）下午六点左右，戚本禹把我叫去，对我说，毛主席想见肖力了，要她今晚回中南海。她不回去毛主席会着急的。你知道吗？毛主席是最喜欢他这个小女儿的。戚本禹对我说：你马上出去想办法把她找回来。我说，她去哪儿一点线索都没有。戚本禹说，要千方百计地找，比如各高校红卫兵总部，造反派活动的场所。正因为有困难才让你去想办法。戚本禹见我面有难色，便严肃地说：你不要小看这种小事，这样跑腿的事，别人想去我还信不过他呢？这是直接为毛主席服务的工作，你想毛主席日理万机，今晚想轻松一下，和小女儿团聚，如果见不到，那该多么扫兴啊！我觉得你这人忠诚老实，才把这个差事交给你，这事都是保密的，不要告诉别人，你一个人去办就行了，要想办法完成任务。戚本禹这番话我觉得有理。回来我开始打电话了解肖力可能去的地方，集中在高等学校，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找到。最后，我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前一段到地质部绝食静坐，要求和何长工谈判，静坐数日没有结果，不妨去那里看看。于是我要车直奔地质部，去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我所以想去找朱成昭，是此前肖力曾同我说起地质学院学生绝食斗争，学生那种执着劲挺可怜的，没人理，肖力有可能又去地质部。

我去地质部找朱成昭，当然是保密的，此时，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由在院子里静坐绝食，转为冲进了地质部办公大楼占领了一层楼。而地质部还没瘫痪，地质部的原领导还在坚持工作，传达室和收发室仍然在正常工作，但地质部和学生对立气氛很浓，我以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进地质部大楼时，传达室并没阻止我。在地质部大楼一楼，由一位学生引导穿过几个房间，左拐右拐找到了朱成昭。其他办公室都住满了学生，朱成昭住个小房间。这是我第一次同朱成昭见面，我要单独同他谈，他叫几个同他商量事的人出去后，我向他亮明了真实身份。我们寒暄了几句后，我问他肖力是否来过？朱成昭对我说，肖力同他谈了一下午，晚饭

前走了。我问朱成昭肖力去哪儿了？他说。回家了，可能回中南海了。我找到朱成昭距肖力离开地质部不过一两个小时。虽然有了肖力行踪的线索，但她是否真的回中南海还难以肯定，我必须继续追踪找。我在朱成昭那里坐不到十分钟便向他告辞。。。。。

(编者注：该文引自 闫长贵 王广宇 《问史求信集》 红旗出版社 2013 年

1月第三次印刷 第 182—183 页)

葉向真与朱成昭

王大賓

我相信地院東方紅的戰士和我一樣，都承認朱成昭是地院東方紅成立後的一把手。1966年8月後，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组的造反派、批判工作组錯誤路線的鬥爭中，地院東方紅能脫穎而出，能牽頭建立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组的造反派聯合的組織“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首都三司，而使其迅速發展壯大，成為全國造反派的一面旗幟，其中朱成昭的作用不可否認。1966年9月，朱成昭已是文革運動中，受到毛主席 周總理、中央文革關注的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我相信，此時的朱成昭也已被葉劍英知曉與關注。朱成昭才是北京高校反工作组造反派的真正的學生領袖。到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召見北京高校我們五個人的談話中，毛主席亦將我稱為所謂五大學生領袖之一，我真的徒有虛名。不是後來發生了那些事情，坐在這裡代表地院東方紅聆聽毛主席批評的人應是朱成昭，而不會是我王大賓。

我總認為，影響朱成昭對文革運動，對中央文革思想認識變化、進而影響他從地院東方紅一把手位置退出的，不是決定性因素，也是主要因素的，是他的身邊來了一個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

1941年出生的葉向真，為葉劍英元帥的二女兒。當年葉向真是中央戲劇學院即將畢業的大學生。畢業前夕，因毛主席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還未分配的葉向真也就成了中央戲劇學院和文藝界文革運動中的風雲人物。

6月1日，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廣播後，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線決定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代替學校黨委領導文化大革命。和其它文化口、文藝口的院校不一樣，與文藝口、與中央戲劇學院完全不搭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科學院，向中央戲劇學院派出了工作組，而自1958年起，直到1972年，軍事科學院的院長一直就是葉劍英。軍事科學院派至中央戲劇學院的工作組，進校後是支持葉向真的造反活動的。

1966 年 8 月底 9 月初，葉向真和當時造反明星朱成昭認識。我們開始知道的是，是葉向真主動來地院尋訪朱成昭而相識的。9 月 6 日，在首都三司的成立大會上，朱成昭介紹我和葉向真見面了（**编者注**：此处有误）。當時葉向真被任命為三司文藝部的負責人。但朱成昭後來對我們說過，是在中央文革的一次接見中，江青介紹葉向真和朱成昭認識的。江青向朱成昭介紹說：這就是葉帥的女兒葉向真同志。

不管葉向真和朱成昭是怎麼認識的，他們的親密關係發展迅速，這在地院東方紅是大家都知道的公開秘密。這樣，我們和葉向真也常見面，就也熟了，我們見到葉向真也直呼其名，有時就叫她的小名“牛牛”，也亂開玩笑，葉向真都不在意。的確，這位葉帥的女兒、祖籍廣東的葉向真，長得個高漂亮，顯得機靈、隨和，有一種北京姑娘沒有的風韻。我們常拿她和毛主席的女兒肖力比較，私下開玩笑說：“公主”還沒有“郡主”漂亮。我們將肖力稱“公主”，將葉向真稱為“郡主”。

（**编者注**：该文引自《王大宾回忆录》 第 94 页-96 页）

编者按：神秘人物来到地院，是地院文革史上的一个特色，很值得一叙。田春林、伏庆是等当事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已提到此事，此处不再重复。此处只引入了以上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来证明其真实性与可靠性。

王大宾： 1961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81611 班），文革期间曾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主任，曾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老师的昨日心迹】

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

(1 — 6)

宋翔雁

前　言

由我们伟大的导师和领袖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时最长（十年有余）、涉及和参与人数最多（从未成年的孩子到耄耋老人达几亿人口）、打击面最宽（几乎涉及到所有层面的各个阶层）、迫害方法和手段最为残忍的一次政治运动。它不仅迟滞和破坏了国家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和发展，使国家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而且，它还完全否认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层面的破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文革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异类，为文明人类所不齿。但它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却不是偶然的，因在长期的领袖崇拜和愚民教育的熏陶下，再加上阶级斗争大棒的威逼和迫害，为这一反人类政治运动的推行，提供了充足的人众。

遗憾的是，至今执政党仍不能直面文革历史。对这场由自己的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因为害怕否定自己领袖的荒唐作为而影响自身的统治地位和合法性，而不敢真正彻底予以否定。导致当代年轻人对当年祖、父辈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很难理解，也无法想象。更有甚者，在个别人的蛊惑下，还认为文革运动有它的合理性、必要性，应当予以肯定。更有甚者，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所积累的弊端，一些人还寄希望于再搞一次文革似的运动来加以解决。

为了作到以史为鉴，国人，尤其是众多的文革亲历者，确实有必要回顾并写出自己亲历过的这段历史，以示后人。这不仅是对历史、对国家，也是对自己和自己家人负责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亲历者参与和看到的，虽仅是文革沧海之一粟。但众多人的回忆、反思的汇集，必可还原出整个文革的全貌和历史真

实。从而为警醒国人不再狂热、不再盲从、不再重蹈历史之覆辙，作出自己的贡献。

这也正是我愿意回忆——我在地院文革中——这段历史的原因和动力所在。

但我在文革中毕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参与者，所闻、所见和所参与的终归极其有限。加之事过已近半个世纪，自己现在又定居国外，与其他参与者联系、交流的机会极少，能接触和促使自己回忆的资料也颇为稀缺。且因年近耄耋，加之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的记忆力模糊时多、清晰时少。所以，我只能说在我所写的回忆中：所述事情（或事实）是真实的，但时间、环境、相关人等细节难免会有出入。这也是我虽有参与书写回忆文革历史的心愿，但又迟迟未敢动笔的原因所在。

但在陶世龙老师的鼓励下，特别是在蔡新平同志陆续发来一些“小将”们所写的回忆启发下，又经吴迪老师的指点，我总算开始动手了。我相信，因所写的事情是真实的，故对恢复地院文革历史原貌总是有益的。至于某些细节上的模糊或差错，只会对这些事情的认识、分析带来某些不利的影响罢了。而且，如果业经发现，也欢迎读者予以指出，届时我会注意及时加以更改。

（一）回校参加“文革”至“反干扰”时期

1、由四清而文革

1964年九月，按北京市委的部署，由北京高校教职工、中央在京事业单位职工和郊区县的职工，共同组成农村四清工作团，先后按中央‘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三个文件的精神，在北京市郊区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以地院教职工为主体，包括个别其他院校的教工和郊区县的少数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团，由李贵同志任团长。先后于 1964.9.—1965.8. 和 1965.10.—1966.5. 在通县张家湾公社和大兴县大辛庄公社开展了两期四清运动。我也是该工作团的成员之一，并先后参加了这两期四清运动。在四清期间，我主要协助大队工作队队长做好资料调查、整理、核实和上报方面的工作。

在张家湾四清时，大队工作队负责人是孙××（在学校负责人防方面的工作，未参加二期四清，后调往海淀区人防部门）；在大兴县四清时，大队工

作队负责人是后勤部门的许登士同志。

二期四清时，主要依据‘二十三条’文件精神开展工作，纠正了一期工作时，因贯彻《桃园经验》而带来的很多过左的做法。但当运动进入大队领导班子调整、完善阶段时，我们突然接到通知，工作团中的高校教职工，立即返回原单位，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们约于1966年5月底回到学校，下车后，工作团负责人宣布：四清工作队就地解散，休整两天后，所有工作队员回原所在行政单位报到，参加运动。

就这样，我从一个“阶级斗争的最前线”，被换到了另一个“阶级斗争的最前线”；从一个发动群众揪斗阶级敌人的革命者（工作队员），换位为被工作队发动的群众，批判、斗争、关押的“反革命小爬虫”。当然，对两个不同的阶级斗争最前线的认识在返校时就已明确，但对运动中个人角色的转换，却是在运动进程中才逐渐感受到的。

回校后，我对当时校内的形势是一头雾水。因一直在农村搞四清，虽然在报上看过姚文元和戚本禹等人的文章，但对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为何要在高校搞文化大革命等却无从知之。但凭借四清时先后学习、讨论、贯彻‘前、后十条’和‘二十三条’文件的经历，我懵懂地觉得，可能中央对文化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和估计吧！

2、从相信到反对

休整两天后，按要求我去探工系钻探教研室报到。但被教研室负责人告知：你现已调往新成立的系半工半读教研室，应到那儿报道并参加运动。

这一变动来得突然，回校两天来，也未听同事们说起。对此，当时也没多想，问清半工半读教研室所在地后，即前往报到。新的行政领导是原探工系副主任屠厚泽副教授，他向我作了很简要的说明，指出该教研室是为贯彻教育革命的新精神刚成立的，为今后加强实践环节，高等教育必须要走半工半读的道路。现在我们有些人也是刚从半工半读的生产现场回到学校参加运动的，目前运动正处于学习文件阶段。

到教研室后，看到参加学习的人除部分原探工系两个专业教研室、实验、实习室，和机械、制图教研室的老师外，还有好几个数学、物理、外语等原基础课教研室的老师，总计有三十多人，大多数都是年轻教师，可能是为了适应野外

教学的需要吧！

六月初教研室的文件学习内容还比较泛，虽然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揭发北京市委的文章，但大家的讨论也比较泛，而且言谈也比较谨慎，很少涉及本校的事情。校内也开始有了一些揭发个别党委成员的大字报，但所涉及的问题颇为零散，也远不及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深刻。我则 因离校时间很长了，对情况更不熟悉，所以在教研室的讨论中很少发言，想借机更好的学学文件，以便领会精神、把握方向。

记得好像是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为群众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呐喊、鼓噪。因我属性牛，乳名在家里就称呼为牛。故知我乳名的一位好友就半开玩笑地提醒我：你要知道自己的地位和出身，要谨言慎行，否则小心会被横扫的。但经过两期四清熏陶的我，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的阴影，整个身心热血沸腾，要按革命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在阶级斗争第一线锻炼自己。对友人的善意劝告，并未当真。但文革十年的经历，这一半开玩笑的好意提醒竟箴言成实！

文革结束后方知，当时我们这类头脑简单、只有热情的年轻人（当时自己刚过 29 岁，尚属年轻人范畴），完全不懂政治，更不懂得中国政治之复杂。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中，须知单凭热情、直觉、良知、正直等人品，是既保护不了自己，也挽救不了他人的。故文革结束后自己就认定：今后，只要不是外敌入侵，还是在自己的业务岗位上，做好做强为首选。这对国家、人民和自己都更实际和更有利。简言之就是，面对不可改变的环境，只能去适应。当然，这种适应是有底线的，即待人以诚，行事要真。

六月上旬得知地质部工作组进校，我从四清中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中得到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大好事，对学校运动的健康开展意义重大。基于这种认知和感受，一天下午，我即只身前往工作组住地（学十二楼），想说明自己的情况，请教运动的精神和方向，表达自己积极投入运动的决心。

当时学十二楼的三个门均有学生守卫，除工作组成员外，一般人不许入内。当我向守门学生说明情况后，他让我稍等。请示后，将我带进一层东侧一朝阳的房间，由一位工作组的成员接待我。当我简单说明了自己的姓名、政治面目、所在单位和此行的目的后，他首先肯定了我积极靠拢工作组的态度，希望在今后

运动深入的过程中，要更加坚定这一立场。然后简单、笼统地说，当前的斗争形势极其尖锐，北京市委和各高校的阶级斗争盖子尚未完全揭开，群众也未完全发动起来。地质学院的情况也不例外，长期来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此，部党组按中央指示精神，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学校，领导运动。过一两天，工作组成员就会进入各个系处和基层单位，按工作组党委的统一部署，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广大学生揭盖子……。

接待谈话的时间不长，大约十几分钟，但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主要是：已经认定学校党委长期来执行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权，地质学院的问题是与北京市委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主要依靠的对象是广大学生。

运动一开始，我能只身前往工作组表态确实反映出当时自己经历两届四清锻炼后的精神面貌——按毛主席提出的五项革命接班人条件锤炼自己，做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种出自内心深处的真诚意愿和勇气，是我29年人生经历中从未有过的。这也是阶级斗争理论对我的熏陶和影响之深的一种表现。

但在离开工作组接待室返回的路上，我内心却一直在想，为何把地质学院的问题与北京市连在一起呢？地质学院是部属（教育部和地质部双重领导）院校，并非市属院校呀！为何部工作组进院刚两三天，就给地院的问题定性了呢？群众揭发还没有真正开始呀！但对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要依靠广大学生的观点，我倒是没有疑义的。

基于这种疑惑，加之自己是一名教师，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上尽管自己真心要求进步、靠拢组织、努力工作尽职尽责，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过去总与教研室里的一些党员存有歧见和争议，不点名的被批为只专不红，甚至被撤去教研室团支部负责人的职务。此外，在个人问题的处理上，一直以来我对一些人的异议始终认为是成见而不予理睬，从而导致和一些人关系的疏远。所有这些让自己不得不承认，如若像农村四清时搞阶级排队的话，我肯定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因此我意识到，自己今后在运动中应当谨慎，要知道自己的地位——既非党员和出身好的群众，又非学生，既要听工作组的话（他们代表党的领导），

又要注意谨言慎行。当真遇到自己看不清的问题时，应注意向工作组的人员请教，避免犯错误。真正实现在运动中锤炼自己、改造自己做一名合格接班人的愿望。

此后，随着工作组在全院大会上点名前党委书记、院长高元贵，批判其长期来不进地质部汇报工作，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罪名后，霎时间大量的大字报就指向了在地院有深厚基础和人望的高院长身上。

但工作组对高院长的这种指责却勾起了我对学生时代的一段回忆。那是在 58 年国庆前的某一天，我们团支部组织了一次访问何长工部长的活动。在那次访问座谈中，何部长除讲了他在井冈山时期的艰苦斗争和在反围剿时受伤的经历，以及地质工作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外，还专门讲到：为了加强地质教育、培养地质人才，最近给你们请来了一位了不起的老干部当你们学校的院长，他不仅是老干部，他还是一位大学生呢！这在我党老干部中所占比率是不高的，说明党对地质工作和地质教育的重视，你们要很好珍惜，努力学习。当时，何部长讲话的语气和表情（如，是请来而非派来，不仅是老干部，还是一位大学生呢等）很真诚也很亲切，让我们这些当时还未见到、没接触过新院长的学生们，在脑海里留下了既深刻又美好的印象。而八年的今天，同样出自何部长和工作组之口的高院长竟成了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魁祸首。这种评价上的反差所带来的冲击，让我的思想认识很难立马跟上工作组所定的调子。

加之，因苏联专家奥斯特洛夫斯科来校指导探工系的科研工作，我自 58 年 11 月中起，被调离学生班，从密云基地（当时因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需要，地质学院在密云建立了勘探密云铁矿的基地，探工系 54 和 56 级的学生均在此进行钻探工作）调回学校，和钻探教研室的老师们一起听专家讲课，并跟随专家从事科研工作中的试验和相关辅助工作。在 60 年苏联专家撤走后，我就留校工作了。在与专家一起从事科研试验或留校当老师后，我与高院长虽没有什么单独交往和工作上的直接接触，但和学生时代相比，听院长讲话、开座谈会等机会，却明显增多。他的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作风，他对知识分子、教授、老教师的尊重和对年轻教员群体的亲切态度、期望，在广大教师心底里构筑起很高的人望，引来了广大教师真诚的尊敬和爱戴。由于这种心境和上述反差所带来的冲击，更拉大了我与工作组情感上的距离，使我对工作组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我当时处于一种矛盾焦灼的心态，自己一时也难以理清。

当时内心里的一个声音是：我刚从四清工作队回校，满脑袋充塞着工作队是代表党来领导运动的。而且，工作组领导也在全院大会上宣称自己是党中央派来的。所以，要想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把自己锻炼成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必须跟工作组保持一致，不能动摇；

而另一个声音则是：一个在教育改革中，自身坚持在教改第一线领导工作，甚至不辞辛苦下班级听课，抓教学内容的精简；一个如此勤奋工作，和大家又极其亲近、并被众人爱戴尊敬的院领导；这样的领导怎么会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人呢？而且，高校的教育改革一直是在高教部的领导下进行的，难道是高教部提出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成？。

在这种心境下，六月中旬某日午休时，王大来同志到西一楼宿舍找我（我们是大学同年级同学，他后因半脱产搞团的工作而比 54 级同学晚毕业一年。这次是因系里在揭发原探工系总支书记王虹时，被点名要求回校交代、揭发问题的。当时他作为革命接班人培养对象，已被组织上派往北京市房山县官道公社任公社党委书记）。除看望外，他还问到目前学校和教研室的情况及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因我们是老同学，彼此关系较近呼，而且，他对人真诚，勇于担当，我对他比较信任。所以，我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前两天去找工作组表态，和眼下的矛盾心态都向他作了倾诉，想听听他的看法，求得他的帮助。此外，也向他简单介绍了教研室目前的情况。

这次相见他讲了很多，我印像深刻的是：他肯定我通过四清思想上有很大提高，头脑里有党的领导这根弦了。找工作组表态没有错，但要注意当前的斗争形势是很复杂的。比如你从四清中懂得了‘二十三条’与‘前、后十条’有很大区别，反映出上层领导对四清运动的性质、打击对象、依靠对象和工作方法等，在认识上、做法上存有差异。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先后有‘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两个文件，二者对运动的性质、打击和依靠对象和运动如何展开等问题的理解和看法也存在很大差异，从中央对北京市委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上就可看出。最重要的是，他对我内心中存在的疑惑十分肯定的说：应当很好的深入想下去，从这里就可以看清楚当前工作组的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还是画框框

发动群众？最后，他建议我可以在教研室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疑问。因为，有你这类疑问的人，在教师中绝非少数。大家可以一起讨论。学习文件就应该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掌握和理解文件精神的过程，就是一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如果大家同意，你可以把这些疑惑都整理出来，写成大字报贴出去。

3、探工系老师们的第一个大字报

大来与我的这次长谈，结束了一段时间来我心中的矛盾和疑惑，坚定了紧跟毛主席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当日下午在教研室的讨论会上，我就谈了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对工作组刚进院没几天，广大学生和教职工尚待更好发动的形势下，就定性宣布高元贵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觉得很不妥当，与毛主席关于结论应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的思想不符。此外，我还提到：地院并不是市属院校，它接受高教部和地质部的双重领导。高等教育方面的事，更多的应当是来自高教部的旨意。现在工作组说高院长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不就等于说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高教部制定的，地质部与此无关。现在，地质部工作组是否要借揭批高元贵，进一步揭发高教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呢？

我的发言，引起了好几位老师的共鸣，他们也纷纷提出了各自的疑惑和问题。会后，大家推我把大伙儿的发言整理出来，晚上再写成大字报贴出去。

根据大伙的意见，我整理成七八个问题，写成了《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底稿。晚上，我还约了王大来到钻探教研室工具实验室一起参加讨论。到会的有三十多位探工系的老师，大多是年轻教师，但也有个别教研室的主任和辅导员到会。讨论时，大家的发言远较下午开会时激烈，但都认为大字报以提问的形式写出较好，并建议问题可提得比较尖锐，但对立的情绪要显得缓和一些。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参与讨论的老师们，其内心深处还是有相当顾虑的。

我遵照大家的意见，尽量简明地列出了十个问题，大家讨论通过后，大来又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后请张希浩老师抄写成——《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这也是文革运动中探工系部分教职工的第一张矛头指向工作组的大字报。

大字报写好后已是第二天凌晨（大约是6月15日或16日），同意大字报观点的都纷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印象中签名人数不少于30人，现能回忆起的人有：王大来、陆炎德、戎信、吴力文、许高燕、钱天宇、金希华、周秉义、张希浩、刘大权、白明义和我。

签名后，大家一起前往大饭厅前，选了一处比较明显的地段（东饭厅和大饭厅之间的马路边），将大字报贴好。我记得在我们大字报的东侧是岩石教研室李明哲等人的大字报，题目虽然忘记了，但也是针对工作组的，彼此正好相互呼应。

就在我们的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或第二天），工作组在全院大会上宣布高元贵停职反省。散会后，工作组领导和李人林等人在会场（大饭厅）外被众多师生围住，受到大家的质询。尽管当时我处于圈外较远的地方，但我也参与了这场质询（后在反干扰时期，就被称为“围攻”）。当获得提问机会后，我就将大字报中提出的十个为什么和盘端出。每当我提出一个问题后，都得到在场群众的响应和支持，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面对这些提问，工作组领导或李人林均未回答，也未承诺回答。只是一味强调：我们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领导运动的，高元贵停职反省是工作组党组决定报部党组批准，并得到国院工交办支持的。希望大家要相信工作组。

在我的记忆里，整个向工作组领导质询的过程中，有两点是值得提出的：（1）应当说，面对众多的问题质询和群情激昂的人众，工作组的领导和李人林等人尽管对所提问题均取回避态度，不做正面回答，但他们讲话的言辞还是比较中性、比较平和的；（2）质询过程中没有遇到持相反观点群众的阻挠或干扰，尽管在已贴出的大字报中，可明显看出支持和反对（或怀疑）工作组人群都有。

4、“六·二〇”事件

六月二十号清晨八点上班前（即在教研室开会），院内的大字报仍是围绕工作组在大会上所定的调子在争论，而且无论从论点还是从气势上看，反工作组的大字报明显占了上风。从教师们互相介绍大字报的情况里，也明显可以感到，大家对反对、质疑工作组的大字报更加关心和注意。但对双方大字报能明确表态赞同或反对的声音，在教师群体中还是少数。正当大家议论时，有人到教研室来说：李贵在大饭厅前讲话揭发工作组呢（当时教研室的运动仍处于按部就班的状态下，即按平时上下班时间开会、学文件、讨论、交流大字报揭发的问题，或留出一些时间让大家看看大字报，再回来交流等）！听到这一信息后，我立即建议让大伙儿去看看实际情况。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故教研室运动领导小组即决定上午的会到此结束，下午再说。

但当我们赶到大饭厅前广场时，李贵同志已不在现场了。我从广场上三五成群的议论人群中了解到：李贵等人昨晚去国务院接待室反映了当前学校运动中存在的不正常情况。明确指出工作组进院后，没有真正发动群众深入揭发地院党委存在的问题。相反却遏制了工作组进院前群众大胆揭发院党委中个别领导人工作和作风上存在问题的大好形势，扭转了继续深入揭发的方向。同时，还有意诱导群众将运动矛头转向现院长高元贵同志，这引起了广大学生和教职工的不满。

得知这些情况后，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觉得李贵同志不愧为一名组织性、纪律性极强的老干部，发现问题能立即向上级反映，以便能尽快得到解决。结合四清期间与他接触中留下的良好印象（四清期间，我经常会去公社所在地送交材料或汇报情况。有一次李贵同志在场，汇报后他问我：你怎么来的？我说：走来的呀！说毕，他大笑，并说：我还不知道你是走来的，我是问你走哪条路来的。当他听我说完后，很严肃地说道：以后你来回不要走同一条路，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来回路径的规律，要早出早回，不要走夜路。思想上要有所警惕。同时还讲了一些解放前他在敌后斗争时期，因出行不注意而造成的损失和牺牲。这次谈话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让我感受到他对年轻人的关心和爱护是无时不在的），也很自然地将自己拉向了李贵同志一边——一定要支持李贵同志的革命行动，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和李贵同志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后来看到很多师生员工（以学生为主）正在院内举行支持李贵同志革命行动的游行，我也立即加入了游行队伍，奔赴学 12 楼工作组驻地。在游行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工作组领导人邹家尤同志不得已从学 12 楼出来了。能让自视为运动领导者且说一不二的工作组领导人屈身以就，在桃园东侧马路边与游行群众见面，并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这本身就是革命群众的不小胜利，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

“六·二 0”革命群众反工作组的游行和集会，在工作组同意群众可以继续前往国务院接待室反映情况的要求后散去。让大家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党中央派来领导运动的、是和大家站在一起的、欢迎大家给我们提意见的工作组，在用美好言辞敷衍广大革命群众的同时，已在磨刀霍霍，准备把运动的大方向立即转向敢于对工作组表示不同意见的革命群众了。

5、第一回合镇压——“反干扰”

“六·二〇”游行的第二天，工作组在地院大饭厅召开了全院大会。由计委工交办主任李人林牵头，地质部的主要领导人副部长、党组书记何长工、副部长胥光仪等全都到场坐镇。为了标明自身的正统性，给自己壮胆，会议一开始首先传达了薄一波副总理关于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批示（大意）：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领导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革命。“六·二〇”围攻工作组是少数人闹事，是反革命事件。

紧接着邹家尤就宣布：撤销高元贵党内外一切职务，下一步运动的中心是反干扰，要揪出地院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工作组的黑手。从而将地质学院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大方向完全转向了广大师生员工，展开了对地院广大革命群众第一回合的疯狂镇压。

动员会后的当天下午，探工系的教职工就在工具试验室举行批判会，对《这是为什么？》大字报和主要参与、组织者们进行上纲上线式的批判。在系核心组事前作工作的基础上（这是我个人据过往经验的估计。因大会后，我看到系核心组的人正与几位大字报的参与者在实验室前的场地上谈论呢），部分大字报参与者也积极配合，痛哭流涕地做检查，悔恨自己上当受骗，干扰了运动大方向，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当会议气氛达到一定程度后，我和几个被内定的干扰黑干将们就被一一点名，并要求站起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由于会议参加者几乎都是系里的教师和职工，加之会议室较小，到会的人数不太，所以会议的进行还比较文明，没有推搡、按头、搞“喷气式”等不文明的批斗行为，故我称之为“批判”而非批斗。

但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因一小插曲导致“批判会”有点走火。即，当时个别大字报的参与者，建议发表一个检查、认错申明，否定原先《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借以挽回给党的事业带来的损失。这可能出自建议者的真诚认识和悔恨，当然，我认为也不排除含有个人的些许私念，借此减轻点自己的罪负。

因对该建议不好指责什么，故获得了很多大字报原参与者的响应和支持。但因系里的这次批判会王大来同志并未到场，故他不可能对此事表态。面对这一情景，我只好表态说：发表申明检查认错，我也同意。但希望能找到王大来同志，在确认他的态度后再发！这样，就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即，探工系只有王大来同志一个人不肯认错（因王大来同志并未住在学校院内，他家在中关

村科学院的宿舍区)。

此言一出，得到很多参与者的认可，但反对者也颇占比率。在意见相左的争执中，个别情绪激动者语言带粗的呼喊也随之而出，但毕竟没有出现肢体接触现象，故我仅视其为一插曲而已。反对等待找王大来同志的人们能讲得出的理由依就是：“我们的错误已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不能再为等一个人而延误时间了”。这个理由确实有相当的“感召力”，让一些认可我的观点的同志有些两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在那个年代，“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教育，已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切要求进步的年轻人行为准则的标杆。它既可以是政工干部思想工作的制高点，也可以是党的干部用来压制不同意见的、做到舆论一律的有效武器。

在当时较为混乱的情况下，我即约戎信同志（他与大来同班毕业）一起退出，让他立即去找王大来同志告知情况，并速来学校。同时，我也请他转告大来，说我准备签字认错检查，并承担责任。事后得知，双方的争执最终还是对同志负责的理智略占上风，同意在得知王大来同志的表态后，再贴出认错声明的大字报。这一结果确实让我感到欣慰。

这是我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批判），也是生平第一次公开面对数十名群众上纲上线的批判。但当时我并无畏惧感，内心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与当时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认识水平低下有关。因为，尽管我经历过“肃反”、“反右”、“反右倾”等运动，甚至还参加过四清工作队，在农村搞过两届四清运动。但思想上对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由进行的历次运动，给涉及到的整肃对象所带来的悲惨遭遇，并无真正的了解和认知。也就是说，历次运动受害者的恐怖而悲惨的真实人生遭遇，在长期正面灌输的宣传环境下，年轻的后来者是很少能知情的（除本人的亲属或家属外）。因此，年轻人思想、政治上的单纯性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每次运动都不乏后继者会落入新一轮的整肃对象群体，使“地、富、反、坏、右”这一阶级斗争的对立面得以永续。内心压力还不太大的另一原因是，与我面对的批判者主要是过去的同事，对方也都是教师，批判过程除上纲上线的一些套话外，所用语言基本上还是比较与人为善的、文明的，尽管个别人也不乏使用当时的流行用语，诸如，上串下跳、恶毒攻击、态度嚣张、阶级本能决定的……。

大约工作组领导对这次批斗会的效果不甚满意，继而几天后又组织全校教职工，在教工之家对反工作组的教职工进行批斗。批斗会的声势很大（教工之家已被挤满，估计有数百人之多），主席台上挂着批斗大会的横幅，房柱和墙壁上贴了很多“打倒×××”、“××× 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那个时代特有的标志性标语。

这次批斗除了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和强制性地向下按头以示接受批判和认罪外，也未能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其中有两个小插曲，至今却还记得。一是，当我被按下头接受批斗时，只要不继续用力按压时，我就直起身抬起头面视台下群众，这时马上就会有人继续按住我的头。如此反反复复多次后，按头者低声地对我训斥道：你要老老实实地低头接受批斗。对此我也低声答道：低头看不到群情愤怒的场面，影响批斗效果。尽管我抗辩的声音不大，但估计主席台上有的人大概能听得到。所以下边就立马就有人高喊：“打掉××× 的嚣张气焰！”但毕竟绝大多数人听不到这段对话，故这一口号喊毕并无多少人迎合。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接下来的批斗中，按头人也不再使劲、持续地按着了，难道是主席台上听到我们对话的人认可了我的诉求不成？！这一插曲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被持续按压之苦，更重要的是确实让我看到了会场上的真实气氛。即除了少数人声嘶力竭地呼喊以表达对批斗者的愤慨外，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只不过是随大流的举举手臂、出出声音而已。这也是教职工群体有别于众多小将们的地方。后者在批斗会上往往是义愤填膺、激情满怀地投入，尤其在运动初期的批斗会上表现就更为突出。这与他们长期接受“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作驯服工具”的熏陶有关，而教职工们毕竟经历过的事要多一些，思想上的盲从性相对于小将们要少了许多。另一插曲是，在批斗会上，结合我曾是四清运动中工作队成员的经历，故专门请了政治教研室的李云生老师到会参加对我的批斗，可谓用心良苦。李老师也是两届四清运动的参加者，在政治教研室内，是为数不多的非党人士之一。四清之前我们并不相识，在近两年的四清运动中，我们之间很少有工作上的接触，彼此间的了解可以说少之又少。但他却给我留下一个即使走路也是斯斯文文地迈着方步缓缓而行的文邹邹的书生印象，而绝非一个能上阵冲杀的士兵。因此，对他的批斗发言我一开始就心存怀疑——他能说些什么呢？让我没想到的是，为说明在四清期间我就是李贵的团伙成员之一，他竟牵强附会地举例说

(大意): 李贵在四清期间，就曾以保证春播抗旱有功为由，在 66 年春耕后的全团大会上，表彰过 × × × 。这说明 × × × 这次紧跟李贵反对工作组、干扰文化大革命绝不是偶然的。对此我只能哑然一笑了之。因这原本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情，如今却反被恶意的安上相互勾结的罪名，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之所以说这原本是很正面的事是因当年北京地区的春旱特别严重，大兴县地区的机井普遍因地下水位严重下降而无法继续使用。面对如此旱情，北京市农机公司按市委要求组织了一批水泵支援各相关区县公社抗旱播种使用。但运往大辛庄公社 × × × 大队的水泵经一天一夜的安装调试、检修后，仍然不能正常抽水。随设备下乡的技工也无计可施，想回市内找人，但又不能保证返回时间。此事令公社、大队干部十分着急。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从公社大喇叭里听到四清工作团让我速到 × × × × 大队有急事的通知。当时我问过我们工作队的许登仕同志什么事，他说他也不知道，你快走就是了，显得很急。当我匆匆赶到 × × × × 大队后，方知是让我帮忙，看看抗旱用的水泵能否修好。从大队部出来后，四清工作队的一位同志对我说：抗旱春播的任务很紧迫，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待我们到工地后，我首先向随机技工问明了情况，看了水泵的安装、管线的连接和设备运转状态，结果确实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和异常。据此，我只好将水泵解体，以探明究竟。水泵解体后我就发现问题所在，即水泵叶轮上叶片的结构旋向和水泵外壳上标注的水泵叶轮的旋转方向反了。致使尽管技工师傅是按设备标识的转向，正确地进行了安装，但因叶轮实际上是反方向旋转的，故无法产生离心力将水排出（即抽水）。故待我将水泵重新装好后，再请技工师傅略调了一点传动中心距，将原来的普通平皮带传动改为交叉式传动。事毕，在水泵、动力设备和管线等安装均不变的情况下，再次试车就一次成功地将水从地面下四米左右的小河沟里抽上来，流入灌渠进入农田。霎时围观的众多农民喊呀、跳呀，拉着我的手向我道谢。这一刹那农民们心坎里的真情流露，让我永生也难以忘怀。为此，大队的领导一定要留我在村里用饭。我解释再三，说明我是一名工作队员，有纪律约束，不能答应。辞行后，老乡们和干部一直把我送到村口，等我已经走出很远再回头看时，发现还有很多人没有离去。面对这一感人的情景，在我回驻地的路上，内心也极不平静。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在四清中好好锻炼、好好改造，做一个农民、工人喜欢的知识分子。此事过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我受到工作团的口头表扬。但我

至今也不知道是谁派我去修水泵的，事后又是谁将这一情况汇报给四清工作团的。因我自己并没有将修水泵一事看得有什么了不起，我只是将它看作是一次普通的业务考察而已。在这件事上，真正让我看重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农民对我的肯定和喜爱！

在整个“反干扰”期间，除了上述两次专门组织的批斗会外，其它批斗（包括在教研室内的小批判）会的印象就很淡薄了。特别要指出的是，发生在“反干扰”时期的批斗会尽管很多，但并没有将我下放到学生班中进行批斗，这也许是我不够格吧！

但却有一张来自学生班级的批判大字报值得一提。该大字报的题名是《看黑雁翔过的道路》，署名是 71622。该大字报贴在大字报区很醒目的地方（学九、十楼前马路南侧的大字报席棚上），而且全文较长，抄写也相当工整。我发现后，立即作了尽可能的详尽的抄录，以备今后需要作答或反驳时参考。之所以要提及这张大字报，并不是因其对我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也不是它揭发出什么重大问题。事实上该大字报贴出后，不论是在“反干扰”期间，还是工、军宣队进院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或在“五七”干校抓“五一六”期间，在对我三次大的整肃中，均没有涉及到该大字报对我提及的任何“问题”。更有甚者，即使在“反干扰”时期对我的批斗中，大字报的参与者们——71622 班的小将们，也没有一人上阵以大字报中的揭发内容，对我展开批斗。这一事实就充分说明了该大字报出现的怪异性，值得令人思考。

下面我将自己当时看完大字报后的想法和立即采取的行动公诸于世，借以说明其怪异所在。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几乎涉及到我个人经历（中学——大学——工作）中的所有时期，同时，还揭发了我家庭出身、个人交友等方面的情况，可以说相当用心和详尽。面对大字报中真真假假的揭发和批判，我首先想到的是，学生们不可能知道我个人如此多的个人经历和家庭情况，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以抹黑为手段，达到诬陷、攻击为目的的有意编造。那么，大字报中所涉及的这些是是非非的“事实”，学生们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答案只能有两个：其一，是从档案里面查阅的；其二，是从与我交往较多且比较相好的朋友处获得的。对第一种可能我当即否定了，因当时学生们还不具备查阅档案的可能性，而且档案中也不可能有那些是是非非的编造（这是当时思想上对档案的严肃

性、神圣性认识决定的，时至腐败丛生的今日方知，虚假档案的存在即使在当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既如此，学生只能从比较详细知道我个人、家庭、甚至交友情况的朋友那里收集到这些情况。当然，在收集情况的过程中，也不能完全排除学生们自身的联想和编纂。

根据这一判断，我当即认定：向调查我个人和家庭情况的学生提供虚假信息的人，肯定是钻探教研室的×××老师。因为我们不仅是中学近六年的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大学近五年的同学，其中还包括一年同班。后来又一起提前留校被分在同一教研室工作了近八年时间。此外，在学生时代我们还是十分相好的朋友，经常一起外出打猎、钓鱼和野游。更重要的是，当时我要求进步、靠拢组织，曾向党支部提交过书面入党申请书。故支部就指定他作为我的入党联系人。基于这一认定，在大字报贴出后的当晚，我就约他到西一楼我的宿舍来谈谈。

当他如约前来坐下后，我很平和地向他说明，想问问71622班《黑雁想过的道路》大字报中有关我个人和家庭情况中的一些事，是否是他向同学介绍的。对我的直率提问，他回答得比较含糊。他说：根据他们的要求，我说了一些你的情况。但他们怎么写的，我不清楚。鉴于此，我向他复述了大字报中的有关内容，建议他再仔细地去看看。与此同时，我还向他强调了三点：

(1) 我父亲的历史情况，你是清楚的。说解放后被镇压，这是不存在的虚构，这样做的用心也是不言自明的；

(2) 说我中学时就是小流氓，这是怎么回事？是你说的吗？若此说成立，我们彼此当时可谓是很朋友，岂不也把你放在里面了吗？幸好，我们朋友圈里还有四、五人在京，你也可以让学生们找他们去问问，有小流氓之说吗；

(3) 最容易引起人们联想的是，大字报特意将“小流氓”的说法与我个人交友一事混在一起写，其用意明眼人均会知晓。对此，我说道：对我交友一事你和有的同志有不同看法，这我有感觉。如果说我真有什么不对，为何长时间以来，你不能像过去我对你交友时有不同想法就直接向你提出那样，摆到桌面上来交换意见呢？只在背后议论，我反觉得只是成见，不解释也就罢了。但如今大字报这样的写法让不了解情况的人们去联想难道这竟是是你的意图吗？

最后，我坦诚地向他表明道：鉴于我们之间，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同学，

后又一起留校，有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交往，并被外界认为彼此是好友的现实，而如今因我在运动中对工作组的做法有看法，提出了一些意见，因此被定性为反工作组、反党，正被批斗。这让你感到有压力，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为划清界限，参与斗争，今后无论是你自己参与揭发、批斗，还是向调查者揭发，都是应该的。但前提是：所有的揭发都必须是真实的！而今，面对学生大字报中存在的很多不真实之处，如果是你告诉他们的，或是因他们自己误听、误想导致的，我希望你能自己去向学生们更正或指出。只有这样才是对同志、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态度。

对于我最后的要求（向学生们指明更正不实之处），他没敢作任何承诺（这是他自身一贯存在的弱点）。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我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去谈什么维权问题，所以，也只能点到就是了！

用如此篇幅去写一张对我个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的大字报，并非它对地院文革历史的认知有多大影响，而是想借此说明“文革”时期对人人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扭曲和伤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与人之间只能讲阶级关系，其他关系都要服从于它；“亲不亲，阶级分”，阶级感情被认定是统领人类的最高感情。在“敌对”阶级之间，只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只讲阶级性，否定人性。人性论被定义为资产阶级为掩饰阶级斗争、麻痹人民的工具……。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一旦被置于“敌对”双方时，就再也不能谈论友情，只能奋起揭发、批斗，以求自保、免被牵连。但我至今仍然认为并坚持，即使如此，做人也必须有个底线。这就是实事求是，讲真话。即，批判时，你可以上纲上线；但揭发的必须是实情而非虚构。正基于此，对在运动中整我、批我，即或说了一些过头的话，或作了一些过头的事的人，我均能释然。但对×××而言，后来除工作上必须面对外（因后来不在同一单位，工作上的交往只有很少几次），也只是在老同学聚会时，才保持点必要的、礼节上的交往，以免其他同学误会。

在整个“反干扰”期间，我知道工作组的人对我的评价是很负面的，即他们已把我定性为态度最差的一类，诸如我在批斗会上不肯低头、检查中始终强调自己的动机是好的等。因此对我的问题工作组是决不会放过的，有了这一估计，我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也做好相应的准备。即在面对极大的压力下，面对群众的批

斗，要避免态度上直接顶牛，说话时在语气和用词上都要特别注意。当时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对待来自群众的揭发，不要轻易反驳，但也不能简单地接受。对一切属实的揭发要一律承认，不属实的则不予承认。而且，因为事情是刚刚发生过的，不太可能出现遗忘的情况，所以不需要留下含糊的词语，免得后来生事；对来自群众的善意批判，即使有的上纲上线很高，也要注意很好听取，不可轻易反驳，免得造成不接受群众批判的把柄。而对个别秉承工作组的意图，欲置我于死地的高调批判，应尽可能在批斗会上不直接表态，当要求必须表态时，也必须实事求是，而不能先全盘接受，待过关后再翻案。譬如，在一次批斗中硬说我之所以猖狂地反工作组，是和反动老子划不清界限的阶级本能表现。对此，我坦诚地说，一直以来我都承认存在和家庭划清界限的问题。但怎样才能划清界限，却又存在实际困难，这成为长期困扰我的魔障和不解难题。因北京解放时，我还没有到十二岁，而且，此前又长期没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具体他都做了哪些反党反人民的事情，犯了那些罪行，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对他，我只知道一点很笼统的情况，即他是 1924 年国共合作时，由共产党派往黄埔军校，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他黄埔一期毕业，是国民党高级军官，1948 年 12 月在北平和平起义。起义后成为解放军，并赴石家庄陆军学校参加整编学习。1952 年被判劳动改造，1954 年提前释放。但因何被判刑，又因何提前释放，原因我也一概不知。而且，长期来各级组织也从没有具体向我讲述过我父亲的具体情况，帮我提高对自己家庭出身的认识。面对不了解自己生父的具体情况和问题的我，怎样求解与家庭划清界限这一难题呢？因为，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嘛！面对我的陈述，批斗会的主持人和参与者看来也难于立即给予正面回答，只能圆滑地说：自己的问题还需要自己去解决，外因还需通过内因来起作用。所以在“反干扰”后期的批判中，就基本没有人再提与家庭划不清界限的问题了。总之一句话，面对由工作组组织的群众批斗，既不能“屈打成招”全盘接受，也不能硬顶而激化矛盾、激怒群众。学会用党的政策化解可能产生的不利情况。

“反干扰”进行了大约四十天，于七月下旬收场。当时，工作组在学校大操场召开全院大会，由邹家尤作“阶段总结”，在讲话中一方面说“反干扰”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说，这次派工作组进院领导文化大革命在时间上很仓促，在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问题上，特别当群众对工作组的一些部署不理解时，我

们在处理上，有时也可能会有些简单、生硬，从而难免会挫伤了一些群众的积极性。这可以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今后我们也需要很好总结和学习。面对讲话中的晦涩用语，明眼人，特别是在“反干扰”中首当其冲的所谓黑干将、黑手、黑线人物们，内心却敏锐地感受到其中的变化。如，被说成是当前运动大方向的“反干扰”，摇身一变而成为“是必要的”；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变成了群众对工作组的一些“部署不理解”；甚而承认道：我们处理上可能会有些简单、生硬，……伤害了一些人的积极性等。

当时我也明显感觉到这一变化，巨大的“反革命”压力尽管还未完全消失，但也因各类批斗会的终止而顿觉轻松，终于觉得可以喘口气了。尽管当时对发生这种变化的因由毫无所知，但从校内外大字报的内容和来势可以看出，新一轮反对工作组的浪潮正在以更加猛烈地势头蕴蓄着，爆发之势指日可待！

（二）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大串联

1、“反干扰”后出现的初次大辩论

时至七月下旬，在京各高校的革命师生们，普遍都经历了反对工作组后类似于地院的“反干扰”镇压，身心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此时，北京大学却出现了公然点名张承先在北大执行了一条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将此前革命群众反对工作组的行动，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毕竟，北京大学是经中央通过《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肯定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诞生地，所以，燕园内的这一动态，对北京各高校运动的走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此时，地院内部的“反干扰”表面上已偃旗息鼓，工作组的威望也已跌入谷底，运动似乎处于群龙无首的无政府状态。当时地院的众多学生，都纷纷前往北大或其他院校看、抄大字报、听北大学生们的辩论，并将相关信息带回学校。而很多教职工则主要通过亲友和老同学的关系，将北大、清华等高校的信息传回地院。在这种形势下，各基层（主要指教师们所在的教研室）的学习、讨论会上，大多是在相互交流信息，别说批判，就连激烈的辩论都很少听到，原来批判和被批判的对立双方，又似乎成了一个统一体，都在观望、等待下一步运动将如何推进。尤其是“反干扰”批斗时，已被工作组定性的高元贵、李贵、安静中、郑伯让、王大来、陆炎德、张海涛、刘万翔等十三名反党分子，及类似与我一样的所

谓“黑干将”、“小游鱼”等（虽工作组并未宣布统计数字，但估计也会有数十名之巨）等教师中的少数派们，此时的心境就更为复杂。因为，当初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抱着一颗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投身文化大革命的。面对工作组进院后的一系列违背群众意愿、偏听偏信地将地院拥有极高人望和群众基础的高院长定性为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帮分子的错误做法，对工作组提出了批评，并予以抵制。未曾想，工作组竟挥舞起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大棒，将这些好同志打成了反革命，并在“反干扰”批斗期间，对这些人进行了残酷的人身迫害！因此，这时我们这些人也在不断地从各种相关信息中思考分析，力图辨别真伪，从中掌握哪些才是中央真正的声音。彼此有机会相见时，也会尽可能交换些意见，相互间互道问候和珍重。但因形势终究尚不明朗，“反干扰”中的一些干将尽管公开不再批判、指责呵斥我们，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到，对我们的行动和言论，无时不在的进行着暗地监视和注意。因此，我们之间若有交往时，都会非常注意，尽可能避开公众的视线，做到隐蔽一些。以免又被抓“现行”，被诬为继续搞“黑串联”等。当时的这种状况，也可算文革中的一种“奇葩”——群众在自己的国度里生活，为避免“惹事”，处处需防范来自对立一方人员的盯梢和窥视，就如同生活在一个特务横行的国度一样（事实上这种现象——一部分人（多为出身好的或积极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监督另一部分人（多为出身不好的，或被定为落后分子及有各类历史疑点的人），并将听到或看到的对方情况，向相关的部门或人员汇报。——自建国后就始终存在，并被当政者美其名曰“群众专政”而加以充分肯定。

我从这类有限的交往中感到，在我们这群人中，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在内心涌动着：我们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者，我们不是工作组给定性的反革命分子、黑干将、小游鱼。但这顶帽子的摘除却不能靠工作组发善心，而只能靠我们自己不断地据理斗争来实现。（但现在看来，这种来自理想主义熏陶的信念，在一党领导制、一人说了算的政治体制下，也只是一种十足的政治幼稚。当时如果没有毛泽东一言九鼎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公开于世，没有最高指示——“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的见诸报端，没有“工作组执行了一条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一系列指示的下达，我们这批人的反革命帽子再据理力争也是摘不掉的。这种情景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上，是不乏实例的）。

也正因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中的很多人很快就不再受原来按系、教研室等划分的基层运动单位的羁绊，开始自己外出看大字报、自己学文件、与不同的人交换信息和意见。这种现象的出现，预示着教职工中的造反派打破系、教研室界限的大联合形势的即将到来。但必须指出，经历了“反干扰”冲击后的教师队伍，自身的包袱和私心、顾虑（如出身、历史、家庭等）远较学生为大，因此在具体行动上就显得谨慎有余，魄力不足。如写大字报时大多数均以个人署名而不再联合署名，少数派教职工的联合组织（红教练及红干联）的成立也晚于学生造反派大联合组织——东方红公社——的建立。而且，在我的印象中，红教联和红干联最终还是在《东方红公社》宣告成立的洪流冲击下，顺势而立的！

与此同时，来自学生的揭批、反对工作组的势头更远高于教工队伍。他们因有不背包袱（出身、个人历史、家庭和社会关系等）的巨大优势，再加上敏感的政治嗅觉和时不我待的革命激情等因素的推动，很快就组成了各系、各年级、各班级内不同的战斗队，贴出了各类观点明确的揭发、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一下就把运动的大方向从“反干扰”扭转到反对工作组的反干扰的正确方向。不仅如此，少数学生的大字报（如水文系四年级学生朱成昭）还借力北京大学反对张承先的声势，明确地指出以邹家尤为前的地质部工作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一石激起了千层浪，面对这类诘问异常尖锐的大字报，工作组还想死守“反干扰”是必要的、成绩是主要的最后防线，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于是再次暗中组织不明真相、支持工作组的师生，发起对这类大字报的攻击和围剿。从而地院内再次爆发了支持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论战，但这次论战与“反干扰”前期的论战已有了明显的不同，尽管支持工作组的大字报明显多于反对、谴责工作组的大字报，但前者却处于守势，经常以邹家尤副部长此前总结时强调的话作遮羞布（即，此次工作组进院时间仓促，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简单、生硬，从而挫伤一些群众的积极性），而不像过去那样以势压人，一再强调我们是党中央派来领导运动的；相反，后者的大字报尽管数量相对少些，但却完全是一种积极进攻的态势，因当时大的舆论环境中，“凡镇压学生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的论述已见诸报端，北京大学围绕张承先工作组的大字报和大辩论在地院已广为人知，这一切都给了所有持反对工作组态度的革命群众以巨大的支持。小将们对来自多数人的不理解，毫不退让据理力争。通过回顾工作组进院后的一系列反常举动，

如不顾广大群众对个别党委委员聂克、周守诚、李庚尧等人的大量揭发，就将运动矛头锁定在高元贵头上；面对革命群众对院党委的问题和工作组的部署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不是引导群众继续深入揭发地院党委存在的真正问题、听取不同意见求得统一认识，而是拉大旗作虎皮，挑动群众斗群众，扭转了运动的大方向，掀起了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干扰”运动等……坐实了工作组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这一阶段就工作组进院后的工作是正确还是谬误的大辩论，事实上已经不仅仅是“反干扰”前革命群众与工作组对运动矛头指向、运动如何开展等重大问题上的对立、分歧，而进一步演变成了“反干扰”真的是必要的吗、“反干扰”错误的性质是什么等原则问题的大辩论。以小将为主的少数派的观点非常明确，即“反干扰”是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疯狂镇压学生运动、转移斗争大方向罪恶的铁证！工作组自始至终执行的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一条反对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地院内部两派关于工作组错误性质的辩论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上层内部斗争的反映，但当时这些身处底层的广大学生却难以知之。但何以小将们又能如此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与多数派和工作组展开毫不妥协的唇枪舌战呢？对此，我以为，也是与他们在前段运动中的经历分不开的。即这些小将们特别是他们中的中坚骨干们，在“反干扰”时期也都成为被打击和批斗的对象，他们同样会有一个如何面对今后的出路问题。大家都懂得，唯斗争而自由的简单道理，这既是人类生存之道，也是共产党几十年来对青年人教导的必然结果。

“反干扰”之后出现的这场关于工作组是否犯了错误和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的辩论，是在工作组已经失去了其领导高校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即因报刊上不断透露出来的毛主席七月中旬回京后的一系列指示，剥夺了工作组继续领导运动的合法性），无法再站在前台直接指挥、干预、掌控的状况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但当时中央尚未形成正式的中央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所以今后的形势尚有待进一步明朗。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惯性理念（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下来的，是党领导的化身）依然控制着众多群众。因此地院师生员工中的大多数或绝大多数仍继续支持、袒护工作组，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为工作组所犯错误辩解，并支持工作组所下的结论：“反干扰”是必要的，

黑线人物和反党分子是存在的。这样，以对工作组的态度为分界线，使地院师生员工明显地分化为两大派别，保皇派（保工作组），为多数派；造反派（反工作组），为少数派。

“反干扰”落幕后出现的这场辩论，其直接后果是孕育了地院造反派的大联合。因辩论中尽管少数派的立论有据、观点清晰、行文和言辞犀利，但毕竟人数较少（回想起来，现在我估计少数派所占人数比率不足总数的 10%，而多数派估计占 65%，其余 25% 左右多为左右摇摆的和逍遥、观望的），多少有点势单力孤之感，难于打开局面。为了改变这一不利局面，打破系、年级、班级（对教职工而言，则是打破系教研室和基层行政单位）的界限，走联合起来的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2、《东方红公社》成立，地院实现造反派大联合

当地院文革的进程已经呼唤着造反派联合起来的客观形势下，随着 1966 年 8 月 8 日中共中央文件《十六条》的公开发表，给地院少数派送来了最及时、最宝贵的有力支持和指导。随即于八月中旬，小将们的造反组织之一《东方红战斗队》就一跃变革成为全院各个造反《战斗队》的联合组织——《东方红公社》。在小将们大联合的推动下，教职工中的造反派们，也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相继以“红教联”、“红干联”的形式，加入到《东方红公社》中。从而实现了北京地质学院少数派的大联合。自此，《东方红公社》就成为北京地质学院全院性唯一的造反派组织。应当指出的是，《东方红公社》所代表的地院少数派的大联合，引领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群众运动的发展潮流，她不仅是北京地区第一所少数派走向联合的高等学校，而且也是全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后，就很快实现了造反派大联合的高校。

还想指出的是，在北京红八月的特殊政治、社会氛围下，该组织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与当时北京各地区、各单位出现的“红卫兵”造反组织不同，她不要求其成员的个人出身必须是“红五类”的，从而打破了当时盛行于社会上的“血统论”对广大革命群众的桎梏，受到广大师生员工的欢迎和肯定。这一特点既反映出当时《东方红公社》核心组成员们（含“红教练”、“红干联”）的胸怀，也表明《东方红公社》成立时继承了共产党“既讲成分又不唯成分”的建党原则。这也是其后能迅速发展壮大、并继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度成为地质学院文

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组织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使地院在“文革”初期（工作组撤离至工、军宣队进入学院期间——1966.8. --1967.9.）的两派对立争斗中，和京城的其他高校相比，因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遭到的破坏、损失和人员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降到最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当文革结束后，很多地院教职工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和历史上有些疑点的教职工们，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在“文革”最动乱的时期，和北京其他高校相比，是《东方红公社》的小将们，使他们免遭了很多非人的待遇和迫害。人们对此是心存感恩的！

还应指出的是，伴随地院少数派大联合形成的同时，与之对立的多数派师生员工群众也形成了统一的组织——“斗批改兵团”（即所谓的保皇派）。尽管该组织联合前各单位的战斗队均得到工作组的支持和肯定，并一度成为工作组发动“反干扰”镇压革命群众的有力助手。

“斗批改兵团”尽管是一个多数派组织，但与《东方红公社》相比，她在地院缺少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惠顾。所谓“天时”，指在政治上，随着《十六条》文件的公布，来自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声音，已宣告了工作组最终的命运——成为文革发展进程中的罪人，走向了其自身的反面。因此，依靠工作组支持，并得到其肯定的多数派群体，在政治上就处于劣势；所谓“地利”，指在地院广大师生员工的心目中，对地院党委主要领导人的评价，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心向背。可以这样说，在地院原党委的主要领导人中，高元贵院长无疑具有最高的声望和人气。他在近八年的领导岗位上，辛勤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抓教改和教学质量；他坚定不移的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老教授、关心爱护年轻教师的成长；他平易近人，联系群众，深受广大教工的尊重和喜爱。正因此，当工作组进院后立即将运动矛头指向高元贵同志时，立即遭到很多教工的质疑、抵制和反对。而多数派的群众恰好在这一问题上唯工作组的旨意而是从，故势必会越来越背离地院广大教工的心愿，而失去来自他们的支持；所谓“人和”，指造反派群体特别是其中的核心成员们，他们经历了运动初期的迫害和批斗后再度重生，这就犹如凤凰涅槃一样，心灵经受了一次大的洗礼，斗志变得更加坚定、视野变得更加宽广、心胸也更加开阔。从而使这支队伍变得更加团结、更能吃苦、更有战斗力。与之相比，多数派群体包括其核心成员们，他们没有凤凰涅槃的人生经历，加之长期习惯于唯上是从和跟风的行事原则，其内部就很难达到“人和”

的境界。尽管暂时人多，也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决不可能变成一个特别能战斗的群众组织。

地院两派群众组织的形成和“对峙”现象，表面上看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和全国各地区、各单位的情景一样，但有一点重要的区别是：《东方红公社》从成立之初，就始终将斗争的指向和切入点对准了由地质部党组派出并得到国家计委工交口党委支持的工作组，而不是纠缠于对地院党委个别成员问题的争论上。即当时大家所说的：“矛头向上”。因地院“文革”初期出现的问题是因工作组自身所犯错误引起的，但其根子却来自它的领导——地质部党组和计委工交口党委。若不抓住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就很难解决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和认识，所以在《东方红公社》成立之初不久（约八月下旬），即组织了和平进军地质部（即所谓一进地质部），静坐部大院，要求部党组交出工作组组长邹家尤，回地院检查交代！

应当说，《东方红公社》核心领导的这一认识和大胆行动在京城造成了一次不小的“地震”，引起了上层和中央文革的注意。由此不仅迫使北京新市委不得不派领导人陶鲁笳同志来地院“过问”运动情况，而且更导致中央文革也在此后的不同时期先后派出了肖力、关锋、戚本禹、阎长贵等人作为联络员来地院了解情况、指导运动的进行。因此，地院《东方红》也就得到了通天的美誉。可以不过分地说，在那个时段（1966.8.下旬——1967.4.），《东方红公社》领导下的地院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成了中央文革推动和指导各地运动发展进程的一块“试验田”。也正因此，后来地院《东方红》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都成了一个一块响当当的造反派铭牌。

现在回顾起来，可以说当初地质东方红之所以能红遍京城乃至全国，其根本原因是：《地质东方红》通过批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而抓其在部委、计委等中央上层的黑后台。小将们的这一手，恰好与当时伟大领袖毛泽东意欲“炮打司令部”，抓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的剥笋战略吻合。从而得到他老人家的默认和首肯，并由以他本人为后台老板的中央文革出面予以支持，并不断地暗中引导、指点，促使《地质东方红》（当时社会上比较普遍的将地院《东方红公社》简称为《地质东方红》）跨出校门，杀向北京乃至全国。

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几近五十年的今天，再冷静深思之

后，不得不令人痛心地承认：《东方红公社》（《地质东方红》）所代表的地质学院造反派群体（无论是才智过人、嗅觉敏锐、充满献身精神且又激情满怀的众多小将，还是有一定社会阅历的革命干部、教师和职工们；不论他们最初的心愿多么高尚、纯真，也不论他们后来的人生经历多么跌宕起伏），不管其主观意愿如何，他们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作为，就其性质而言，也和公审“四人帮”时伟大旗手江青在自己的抗辩词中所坦诚道出的：“我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一样，只不过充当了伟大领袖在其权力斗争中的鹰犬角色，最终也难逃“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命运。现在要心悦诚服地承认这一点，对我们来说肯定是难堪的、痛苦的，因为，这样做岂不完全否定了我们当初满怀激情投入“文革”的初衷？！但只有勇敢地承认这一点，我们方能从文革的浩劫中完全并真正地解脱出来，并彻底地清算我们头脑中残存的文革因子，确保不会再盲目跟进今后可能再次出现的文革式运动，真正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这也是我愿意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回顾自身在文革中的表现的重要原因。

作为《地质东方红》造反群体的一员，在对我们当时的行为定性的同时，我也还想为自己特别是为那些才智过人、心无城府、胸怀坦荡的小将们辩护几句。即这一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与“四人帮”江青之流相比有本质的区别，这一群体不是阴险的政客，也不是出尔反尔的阴谋家。他们是一群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虔诚信徒，坚信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苦行僧，诚心诚意地要按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锤炼自己做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们受理想主义的灌输和熏陶，身陷于伟大领袖布局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冲冲杀杀、自我陶醉，而难于自拔。因此，这些人是有理想的战士，既与阴谋家、政客不同，也与绝对盲从的“愤青”（找不到合适的词，只能用现代流行的词汇）有别。和前者相比，他们心存底线，有相当的是非界限。如奉中央文革旨意，两次派人赴川抓彭德怀同志，但当听取了彭总的自辩了解相当真相后，相继抵制没有执行。但得知中央文革意欲换将再抓时，不得已才第三次将彭总抢到自己手中并护送回京，沿途并无任何不当的暴力举动，直至将彭总安全、完好地交到中央为止。又如，无论在京或在外地，尽管《地质东方红》在各地各单位支持造反派，参与了派性斗争，但基本上没有去迎合或挑起当地的武斗。

在一进地质部的“地震”压力下，地质部党组不得不允许邹家尤同志回地院听取群众意见。为此地院对立的两派（《东方红公社》和《斗批改兵团》），在地院大操场举行了地院文革两派之间的大辩论（根据田春林同志的回忆文章，确切时间是 1966. 8. 23. 夜至 8. 24. 凌晨）。辩论会由北京新市委的领导成员之一陶鲁笳同志主持，显然，如果没有中央文革打招呼，北京新市委未必会直接出面过问地质学院两派群众之间的争论和矛盾（就我的回忆，在文革之初的八月下旬，新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到基层了解和指导运动尚属首次。当然，新市委领导人的到来，究竟是新市委或李雪峰同志自身的决定，还是有中央文革意见，这只能靠知情者来披露）。

两派大辩论的全过程充分展示出《东方红公社》的才智、勇气和冷静，最终在《斗批改兵团》无言以答的窘境下，以《东方红公社》的全胜而告终。从此，《东方红公社》这一少数派群体，一下变成了地院的多数派，使地院的文革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造反派的逆转！在此应当特别强调的是，这场辩论是文革运动中少有的说理斗争的典范（除辩论过程中，双方群众呼喊口号时有些剑拔弩张外），为地院运动的后续发转开了一个好头！

当《地质东方红》发展壮大成了地院多数派后，《公社》领导们的注意力仍然继续放在院外、放在上层。相反，对院内的运动进一步开展却较少关注。如对地院党委的问题、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问题（当时社会上，特别是知识份子成堆的高校，都比较重视）、其他所谓牛鬼蛇神等问题的揭批，以及学校自身的教育改革/革命如何深入进行等都缺少应有的关注。应当指出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上层关于文化大革命与高校的教育改革/革命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等院校应当如何办，甚至关于高等院校究竟要不要办等重大问题，并无比较清晰又可操作的设计、考虑和相对比较明确的指示。当时人们只知道刘少奇同志曾说过：理工科高校要搞半工半读；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理工科院校还是要办的。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左倾思潮泛滥的当时，更多来自上层的“传闻”犹如：农业大学办在城里简直莫名其妙（大意）等“名言”，令人捧腹。为此，我们一些人也顺其意讥讽地说：今后地质学院就应当办在火车和轮船上（因搞地质的必须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上踏勘）。所以平心而论，在那个时间点上，要求小将们考虑教育改革问题也是不切实际的。更重要的是，文革当时的斗争焦点仍处

在中央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上，小将们要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也就无可厚非了。

放在院外、放在上层的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在北京已经有了两个红卫兵司令部的情况下，《公社》核心领导之一，周永璋同志积极活动筹备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并以《东方红公社》一把手朱成昭同志为“首都三司”的负责人。

“三司”成立后明显得到了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从而使《地质东方红》更加显赫京城。同时，也为其执行自己的战略思路提供了组织上更为有力的保障；

2. 为了推动相关部门和单位、地区的运动，在北京市组建了许多联络站（如驻地质部联络站、驻民委联络站、驻文艺口的联络站等），此后，更在京外组建了许多驻外联络站，重要的有驻上海、重庆、成都、武汉等地的联络站。其任务就是支持当地“真正的造反派”，并将运动的矛头指向当地上层；同时也借助自身的渠道，将外单位或外地文革中存在的问题、矛盾等及时反映给中央文革，借以寻求来自中央对相关地区和单位造反派的支持。

正如前所述《地质东方红》“在外、向上”的造反战略，既反映了其核心领导人的胸怀和魄力，也适应了当时毛主席需要最广泛地发动全国各地的群众，完成上层夺权斗争需要的战略部署。所谓“时势造英雄”，《东方红公社》这支特别能战斗的造反派队伍就是这样铸就而成的！

在《东方红公社》基本放弃学校内部运动而走向社会的情况下，《斗批改兵团》则跟随红八月时北京兴起的“破四旧”浪潮，在地院对所谓五类分子（主要是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查抄老的高级知识分子和运动初期被点名的个别院内领导人的家）进行了抄家，并在“教工之家”展出了他们的查抄成果。这是文革开始后，地院内发生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全员统一部署、针对教职工家庭的查抄行动。这种举动在广大教职工队伍中是没有市场的，但迫于形势（所谓的“红色恐怖”），人们只能哑口面对并在基层单位的组织下，还必须前往观看、接受所谓的阶级斗争教育。

在地院红卫兵的这次全院统一查抄行动中，我个人也是受害者之一。因我从中学时代起就经常参加在北京南河沿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古典音乐欣赏晚会（每周一次），从而逐渐养成了对西方古典音乐的喜爱，而且这一爱好一直延续至今。所以当我工作后，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因中央提出了“劳逸结合”的政策，

以应对当时因粮食、副食供应匮乏造成的浮肿、夜盲和女性闭经等营养不良疾患。所以大大削减了各类非教学活动，即使是教学活动，也必须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这样就使个人支配的时间明显增多。我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时机，跑旧货店、废品店、委托行，购买了为装音箱、中放、多速电唱机等音响设施所需的元器件和半成品。确实不负天下有心人，经过一段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能播放 78、45 和 33 转/分唱片的音响装置。并在国际书店和委托店逐渐购买了一些新的或旧的古典音乐唱片。自此以后，我就不再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播放时间的制约了。因中央台（包括北京台）古典音乐的播放时间绝大多数都安排在午夜 23:00 时之后，这对需要正常作息的上班族而言，显然是不合适的。就这样，闲暇时我就自己放点古典音乐唱片听听，它就成了我业余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且，有时也会有喜好古典音乐的其他老师甚至学生到我宿舍来听音乐，大家一起欣赏也是一种乐趣。这一现象尽管和现代年轻人搞的“派对”没法相比，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算异类了。所以困难时期结束后不久，很快就有“喜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议论传出，因为这些都是“西方”的，即使是苏联的，也因苏联已经变成了“苏修”，而统统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甚至被冠以“精神鸦片”而纳入必须被否定的范畴。对于这些议论，我觉得只不过是成见或偏见，一以贯之均不于理睬，因我觉得自己没错，这也是我个人的性格使然——面对是非之争，只要我认为自己没错就我行我素。但因地院查抄之前，周围有些院校特别是北京市内的红卫兵小将们的查抄活动早已展开，形成了令人生畏的所谓“红色恐怖”浪潮，这也给我敲了警钟。因文革初期“红色恐怖”的震撼则远非上述的议论或成见可比，加之经过“四清”历练后的我，也不再像当初那样单纯了，而且，“反干扰”期间的批斗，也让我领略了阶级斗争的暴力性和残酷性，所以面对这类可能涉及到自身的查抄活动，绝不可等闲视之，应当有所防范，避免留下后患。基于这一认识，我认真地思考着红卫兵小将们是否会抄我的家（当时我尚未成家，住的是西一楼 209 室的集体宿舍）。思考后我的结论是：被查抄的可能性极大。尽管当时我已是东方红的一员，但对立方“斗批改兵团”的红卫兵们出于两派斗争的需要，恰恰可以利用我的出身问题做文章，特别是又有“反干扰”所做的铺垫，更可以捞一把稻草。加之又有得到当时中央某些领导人对红卫兵打人行为认可的所谓“好人打坏人活该”的舆论可以掩饰，何乐而不为呢？！由此考虑后，我仔细想了家

中可能存在的隐患，认为有两方面必须尽快处理。即 1. 所有的古典音乐唱片；
2. 从儿时至今我所集攒的中外邮票。

对于近百张唱片我真舍不得毁掉，这不仅是我节衣缩食一点点集攒下来的，而且今后不见得还能买到。故我找到文革期间结识的勘探系 63 级学生王群，问他是否想要这些唱片（文革初他到我家来过，看到我的唱片并表现出他对古典音乐的喜爱）。他当即表示：要，而且是替我保存。对此我分外欣喜，但表明是奉送而非保存，并约好他来取的时间。后我如约将全部唱片整好（只留了一套《东方红史诗》），让其带回他的家中（其父是留苏的铁路系统的干部）。约 75 年秋，他在北大进修遥感地质期间，还多次到地院打听我，并最终找到了我。因当时尚未给我落实政策，在院内领导打招呼不得给我安排工作的情况下，教研室领导还是网开一面，同意我参加一外协项目，借调到铁道部第三设计院从事施工钻机设计。为避免在外扎眼，我们就在家里聊了很久，分手时互道珍重而别。

当唱片问题解决后，我又着手处理我二十年来积攒的邮票。首先我将民国时期的邮票全部销毁了，因为怕被说是政治问题，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头像、开罗会议三巨头、中美友好条约纪念邮票等；另外，还销毁了一张清朝末年的小龙邮票，我清楚地记得这张邮票是我刚开始集邮时，我父亲给我的，而且当时我也知道该邮票是稀罕物，价值不菲，但为不惹事，我还是狠心烧掉了。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因当时我住的是集体宿舍，而非个人的封闭空间，所以从事这些活动时，就必须考虑到同室居住同事的态度。好在他是我的中学校友，比我高一届的留苏生，因我提前毕业，所以他反比我晚工作一年。后因其母在 57 年被打成右派，故回国后他一向谨小慎言，只专注于自己的业务工作。但他为人正派，极少卷入他人的纷争之中。基于对他的了解，我坦诚地向他讲述了自己担心有被查抄的可能，想抓紧整理一下自己的唱片和邮票，希望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他很爽快的表示没有任何问题，他可以给我创造条件，而且不会向任何人谈起此事。有了他的理解、配合和支持，我很顺利的就完成了这两项清理工作，觉得即使被查抄，似乎再也没有任何把柄会被抄到了。但人算不如天算，此话不可不信。

对我的查抄是在统一查抄那天的傍晚，来的是探工系 65 级的学生，带队的是于长友同学（70 年分配后被河南省地质局退回，故留校任钻探教研室教员）。他们进屋后就亮明身份，称奉“斗批改”总部的指令，要查点我个人的物品中有

哪些四旧的和反动的东西，并让我指明那些东西是我的。宿舍面积仅 12 平米，个人物品有限，查抄过程看来很快就能结束了。这时有位同学问我有没有照片和相册，于是我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了一本相册给他。相册并不大，保存有我儿时、中学和大学时期的照片，以及我生母和姐姐们的照片，此外还有两张我父亲带着我们在生母墓地祭奠时的合照。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竟对这两张照片发生了兴趣，相互传看，并低声仔细地推敲着什么。后来就拿着这两张照片问我：这是什么照片？我回答说这是我们全家人在祭奠我生母时在墓地的合影。继而又问我：哪个是你父亲？我指着照片说，抱着我的人就是我父亲。接着又问我：站在两边的两个军人是谁？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时其中一个学生很气愤地喊道：给你妈上坟的人是谁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当时我极其冷静地指着照片上的我，回答道：你看看，这就是当时的我，刚满三岁一个月，你说能知道吗？这时带队的于长友赶快转移话题问道：他们为什么穿的是国民党的军服？我也随即回答说：当时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他们应该是陪同我父亲一起来的，所以会穿军服。这时又有学生说到：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你至今还保留有穿国民党军衣人的照片，我们得好好的查查。说毕将两张照片收入了他们带来的解放军用的小背包中，并以命令式的语气说到：这个问题你也得好好想想并交代清楚。说完他们就撤走了，这时我才注意到 209 房间的东西两侧已围了很多人在观看，但并非本层居住的探工系的教工，多数是学生（红卫兵）。这就是对我家查抄的全过程，再查抄过程中除个别学生的言语比较粗暴外，其间没有任何肢体接触发生。但被抄没的两张照片时至今日依然没有还给我，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再还给我了（大约在步行串联前，我曾问过于长友同学当时抄没的照片是如何处理的，能否帮我找回。事后他对我说：查抄回去后，就马上将照片交到总部那了。这次他去问，管事的说，一些大的实物和财物，都有登记和保存，但照片和一般的纸质资料，几经搬迁恐怕很难查寻了）。这样就使我不仅失去了生母墓地的全景照（因我文革结束后，大约 1977 年夏季，我借出差之机去湖南耒阳扫墓，但生母墓地已不复存在。经打听方知，因文革时耒阳火车站扩建，墓地已被平毁了。如今我的子女均在国外，想让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知晓他们的奶奶和曾祖母的墓地情况已再无可能了，这是多大的遗憾呀！），此外，这次查抄也使我永远丢失了保存在我手中的生父的唯一一张照片（我生父后于 1980 年经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重审宣布平反，肯定了他在

北平和平解放中的贡献，按起义人员对待，历史问题一律不计。但此时作为长子的我，手中竟然没有一张他的留影，只能在解放军发给的起义军人证书上，复印一张他的人头小照作为安慰了）。

到此，我还想再说一点，尽管这类查抄活动带有一定的恐怖味道，但若与北京市内中学红卫兵的血腥查抄相比，应该公道地说《斗批改兵团》小将们的查抄相对还是比较“文明”的。即除了语言呵斥和责令外，基本上没有听说发生过恐吓、体罚和残暴的殴打现象。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类活动给当事人心灵上带来的创伤却是难以抚平的，故我觉得参与当时查抄活动和指挥这次查抄活动的小将们，似乎也应有所反思和自责，不能因院的查抄活动比较“文明”而自慰了。而更重要的是，“斗批改兵团”组织的这次全院大查抄，恰恰执行的是地质部工作组进院后所执行的资反路线的继续，或者说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仍然继续在迫害文革初期反对工作组的广大革命造反派群众。这可以从当时查抄了“反干扰”时期被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黑线人物、小游鱼等造反派们的家得到充分证明（但我无法证实在这次查抄中，被工作组在“反干扰”中定性为反革命和小游鱼的打击对象，是否全部都被查抄？这有待于更多人的回忆来证实）。

3、响应号召，“长征”——步行串联

在《东方红公社》的小将纷纷去外地串联，支持当地造反派的同时，从八月中旬至十月下旬的两个半月时间内，外地红卫兵也纷纷来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的检阅达八次之多。

“八·一八”，毛主席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首都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这既是对红卫兵小将造反精神的支持，更是对自己获有深厚群众拥戴这一不争事实的最好展示。从而既可进一步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按他旨意起来造反；又可进一步敲打、震慑他的政敌，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但接踵而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检阅”，使北京市的接待能力已不堪重负，加之即将进入冬季，天气渐寒，南方北上的小将们衣单体弱已渐难支。同时铁路客运因小将们南来北往、东行西奔的无序串联，使正常客运几近瘫痪，对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生活的有序管理造成极大的威胁。

面对这一不利的形势，考验着中央高层管理者们的智慧和能力。一方面，既

要支持“文革”运动的继续深入进行，保护小将们对伟大领袖近乎疯狂的效忠之情（否则，在那个年代什么帽子都会给你戴上）；另一方面，又要妥善处理实际存在的无法继续“接见”的矛盾现实。应当承认，在我们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内，不乏具有大智慧和超强组织、管理能力的高人。于是在十月下旬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从而使众小将乘车来京被接见接受洗礼的模式，一下就变成小将们自己背负行囊步行去各个红色地区瞻仰，接受教育的步行串联模式了。

在步行串联的号召下，我系半工半读教研室在钱天宇、杜昌林牵头和倡议下，邀集了其他七位老师（计有许宪书、张润生、程银水、谭义贤、柯火炉、和我）组成一支完全由教师参加的《东方红长征队》，准备从北京步行至韶山。在步行串联的起终点的决定上，一开始就存在不同想法。我出于参加者中绝大多数都非红五类出身（可能均非红五类出身）的考虑，建议终点以兰考——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生活、战斗的地方——为宜，这样用时也就两个月左右，而且河北和豫北距京相对较近，万一有何意外或需要，联系和补救都会比较方便。因为，我考虑到长征队里尽管其中八人都是造反派，且第一批就参加了《东方红公社》。故若仅在地院参加运动，一般无需担心出身的负面影响。而今要走向外地，但当时社会上唯成分论的影响极大，可以说几乎占了主导地位，故我坚持长征路程不宜过长。此外，当时我内心还有一个想法没敢直接讲出，怕被误解为自己以造反派自居，不愿接受教育（因当时我认为：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要在斗争中接受锻炼和考验，这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这也是我在近两年的“四清”运动中的切身体验）。但我的想法没能说法大家，最后只好互相妥协：我以兰考为目的地，其他同志则以韶山为终点，大家在一个长征队里，从北京出发，经兰考再至韶山。在求得统一的过程中，还有一点我隐而未言不便谈及，避免被误认为是对毛主席的大不敬，而变成政治问题（在个人崇拜鼎盛的时期，有这种思想顾虑的人十分普遍）。这就是，我感觉去韶山多少有点“朝圣”的味道，从接受教育、改造自己的角度讲，有点牵强。

到兰考的线路是：北京—固安—雄县—高阳—安新—保定—蠡县—安平—新河—巨鹿—曲周—内黄—濮阳—乐明—兰考；接下去就是奔向“红太阳”的出生地，因我不想前往，故接下来的路线怎么走，我现在已经毫无印象了。

达成上述统一后，《东方红长征队》于 1966. 11. 2. 上午从北京出发，出发前还在探工系试验室前举行了一个简短仪式，并宣誓、授旗（《东方红长征队》队旗），搞得有模有样，在教师层级上这样作，在当时也是很少见的。

对于这支队伍和步行串联有以下几点是值得记述的：

1. 就我所知，这支以教工组成的步行串联队伍在地院文革运动中是唯一的（在北京高校中我也没有听说有过类似的步行串联队伍）。成员的平均年龄估计约 35 岁，最大的四十出头，最小的近三十岁。每天背负行囊坚持步行 35–40km，有时还会更多一些（在某些接待点如老根据地要采访或参观时则需停留），总里程分别达到一千七百余公里和七百余公里。特别是进入 12 月后已是天寒地冻的情况下，对这个年龄段的人，的确是一种意志和信念的考验。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这些同志要想在“文革”中接班人五项条件锤炼自己的真诚心愿；

2. 在人员组成上，我们也按《东方红公社》吸收人员的原则，不拒绝真心要求参加步行串联、诚心要求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同志参加。所以长征队中有一位尚未“解放”的干部许宪书同志。他是一位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十七级干部，五六年时响应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重新报考大学进入地质学院探工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文革前任探工系办公室主任。“文革”一开始，他在半工半读工地就被学生们揪斗（因他是半工半读现场教学、实习的负责人），回校后就一直被挂着，说要审查他的历史问题，但事实上当时对他的问题却无人问津，他只能规规矩矩每天按时到教研室参加会议、学习文件，对大家的争论、来自社会上的“小道消息”很少发表看法，处事十分谨慎。我个人却觉得他是一个好同志，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平时他和大家在一起，没有任何架子，少有那些年轻党员高人一头，自认是改造别人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以和他相处觉得很随便，没有任何拘束感。此外，他为人老实而且诚恳，对我这样出身有问题又心直口快的一般群众，时不时的还给以必要的善意提醒，这对当时的干部而言，是难能可贵的。记得我刚从“四清”回到学校与他在其宿舍聊天时，他就曾告诫过我：“要小心炮打将军隔一家的道理，现在形势是很复杂的”。他毕竟有相当阅历，了解政治和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所以才这样提醒我，完全是善意的，体现了爱护关心年轻人的品格。他的这一告诫给我极深的印象，想不到二十二年后，在“六四”前夕，我也用“炮打将军隔一家”的同样教诲，告诫我单位（因

两地分居，我于 1985 年底从武汉地质学院调至中国地质矿产信息研究院）方法室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同志们，要求他们这段时间谁也不许去天安门“看热闹”，抓紧完成各业务组长交给的任务，上下班需经过天安门的可以在家工作，但每天需来电话汇报工作进度，公用电话费留下单据交室里报销。没想到我的善意劝告和行政要求起到了作用，“六四”后，在上级要求下，各单位每个人都要“反思”并表态，在全院 22 个处室中，唯有我们方法室的年轻人没有一人上街、也没有一人去过天安门，从而他们很轻松的就从“六四”后的审查中过关了。这虽是趣事，但却是事实。许宪书他是长征队中年岁最大的，当时约已四十一、二岁了，但他一直跟随大伙儿步行到韶山，很不容易；

3. 离京后，我们经河北固安、雄县到达保定。在此因我们接受了当地少数派的邀请，与他们举行过一次座谈会，听取了他们受到保定市和多数派打压的一些情况。但我们出发前就有思想准备，长征中我们主要是接受教育，加强对自身的改造，对各地的两派争斗不要轻易表态。因此，在座谈中我们虽强调要有造反精神，但反复叮嘱一定要按《十六条》的要求办事。尽管如此，这次座谈还是引起对立一方的警觉和不满。

当晚我们正在讨论次日的行程时，突然闯入许多人将我们几个参加过座谈的同志连推带拽地拖出室外，令我们交代到保定来的目的和参加对立派座谈会的用意。我看当时的架势，操场上黑压压的一片（接待站设在一座学校里），估摸着得有数百人之众，而且气势汹汹，很多人还手持棍棒、农具等家伙，看来来者绝非善茬。因事发突然，没有时间让我们商量对策，但也不允许我们犹疑不决。这时要做的就是勇敢、坦然而又冷静地面对。要直言不讳地宣传我们步行串联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革命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宗旨；亮明身份，我们是《地质东方红》的成员、是革命教师（因当时就有人怒吼着：他们不是红卫兵小将）；注意讲话技巧和用词，避免刺激性语言，以免激化矛盾引起正面冲突；注意斗争策略，讲话时该说的说，不该说的要尽力回避，学会外交语言，绝不可授人以柄陷自己于被动。当我大致想清楚这些原则后，就自告奋勇地向队长钱天宇表示：我先上去讲（在一张桌子上）。因我毕竟在农村锻炼过近两年，了解农村用语和农民的一些特点，保定尽管是河北省一个较大的城市，但从能看到的群众可以断定他们中大多数应是农民，起码是长期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同样也不是学生娃。

当我走上“讲台”后，我就按自己的思路，用尽量通俗且农民习惯的语言讲述了我们长征队的宗旨、背景和成员，大力宣讲了《十六条》，阐明毛主席号召广大群众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警惕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开始讲时，还有一些群众气势汹汹很不友善地喊口号，过了一段时间后，大家就平静下来注意听我讲的话了，特别是当我讲到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身体很好、号召我们“红军不怕远征难”进行步行串联时，大家还给以掌声并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予以呼应。最后，他们一个领头的还和我握握手，说：对不起，误会了！

就这样，我们总算度过了一次“危机”。事隔四十六年后，长征队在京的五位同志来我家里聚会，政委杜昌林同志还特意翘着大姆子对我当时的勇气和表现赞叹有加呢！当然，这只是大伙儿一笑而已，都已经七老八十了，不可当真。

4. 在奔赴兰考的行程中，我们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很有影响的地区都作了一定时间的停留，听老人讲解或采访他们，了解当时的斗争情况、参观当地的展览和实地考察等。如蠡县——三十年代初的高蠡暴动就发生在这里；白洋淀地区的抗日斗争；在解放战争发生前“军调处”美军在安平县发生的安平事件；内黄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通过这些活动，我们都觉得获益匪浅，内心产生很大的震动，觉得似乎把我们也带回到当时血与火的惨烈斗争环境中。至今我还认为，能到“实景”地观看并走访一些当事人或听亲历者讲述，远比在礼堂里听报告，或在专门的展室里参观，所产生的心灵震动要大得多。比如，在内黄，我们亲眼看到掩埋同胞尸体的巨大万人坑和坑内的白骨，面对这惨不忍睹的情景，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的认识就不仅是报告里的言辞和文章内的数字，它已然是一幅有血有肉的画卷，牢牢地刻印在我们的心中。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内黄人民的崇敬！

5. 兰考，不仅是我个人此次步行串联的终点，也是我们整个长征队的一个重要造访地。因为，在文革前发表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事迹成为每个有志青年的学习榜样。当文章发表时，我正在农村搞“四清”，对这位书记的事迹感触极深。因为近两年的农村生活，让我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生活太清苦了，而他们的劳动又太艰难了。反映前者的是一幅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的画卷：一次在老乡家吃饭（那时叫“派

饭”——指工作队的成员单个轮流到各家但不包括四类分子家吃饭），他们给我包的饺子（当然不是现在习惯的大肉饺子或海鲜饺子，就是一般的蔬菜饺子，但却是细粮白面包的。须知，白面，老乡们只能在大年夜才能享用呢），为了打两分钱的米醋，还得让她的孩子捡个鸡蛋，走约两里地外的合作社去换。孩子回家后，再把大约半瓶多醋和余下的几分钱交给他妈妈，我问孩子他妈，得知一个鸡蛋视大小在合作社只值三五分钱。老乡的这种生活和他们对我的感人情怀怎么可能忘记呢？！反映后者的是他们长年背脊朝天脸面对地劳动场景的写照。所以，我对这样的书记内心就有一种崇敬感，很想利用步行串联的机会，去看看焦裕禄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从中接受革命教育，坚定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在兰考，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办公室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摆设，也看到了那把陪伴他克服、减轻肝癌疼痛煎熬的藤椅上留下的窟窿；在为纪念他而建造的塑像前，我们留影并内心发誓：立志学习焦裕禄的革命品德，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还走访了他带领大家治沙种桐（泡桐）的现场，当时的泡桐林还处于初始阶段，只是刚现雏形而已；同时我们还走访了几位与书记一起查风沙走向和种泡桐固沙的乡亲。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我们好像真的接受了一次生动的革命洗礼，坚定了人生的信念。

如今我虽已退休多年，年近耄耋。但我坚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做一个真正的人需要有信念、有榜样、有追求！

长征队在兰考大约停留了三到四天，约在六七年元旦前后，队伍就一分为二分开行动了。我完成了预定的任务，送别大队其他同志继续上路后，就乘火车返回北京了。尽管当时已经不再是乘车串联的高峰期，但火车上仍很难找到座位，几乎是一直站到北京的！

4、震惊与不解——朱、蒋、杨走向反面

回校后稍事整理，很快就回到教研室继续参加运动，并在学习讨论中，应领导小组的要求，向大伙简单介绍了我们步行至兰考这段路上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受与收获。对我们能走出去接受教育，经受锻炼，很多同事还是赞赏的，但也有人不冷不热的说：你们这一走倒是把老许头（指许宪书同志）给保起来了！对此我也不客气的回敬道：人家主动要求接受教育、经受锻炼有什么不好？再说，每天他要走七、八十里路，可是实实在在的，这对他也并非易事！在那个年代，

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蛊惑，一些人在心理上总愿看到有人被批、有人被整，好像只有这样的生活才充实、才有意义。

从教研室的活动中给我的感觉是学校的运动进程似乎有点停滞，这可能与很多小将均外出串联有关。后来我去学九楼作战部办公室找金希华老师想问问情况，他只说现在很多学生都出去了，有事时有时连人都找不到。他只倒自己的“苦水”，竟没有对我说任何情况（也可能他确实不知道更多的情况）。后来在办公室遇到几个也来问事的动态组的学生，其中一个也是水文系 62 届的邱培信同学。他见到我后就把我拉出了办公室，不由分说地说：走，告诉你点情况！我们一直走到学九楼大字报栏南边的桃源深处他才停下来，他告诉我东方红恐怕要出大事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他：你没头没脑地说什么呢？他并未回答我的问题，又问我：你认识叶向贞吗？我回答说：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刘诗昆的媳妇，而且是叶剑英的女儿。这时他才平静下来说到：对，是这么回事。现在叶向贞老来找朱成昭，给他灌了很多上边的事，把朱成昭给搞糊涂了！他对中央文革现在意见很大，听说还想给中央文革贴大字报呢！我问他：确实吗？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是跟他很紧的同学传出来的，肯定有这么回事！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在下面议论，担心要出大事，心里非常着急！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这段话时，眼睛红红的，泪水都快出来了，一个老东方红战士对前程的忧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分外感动。当我再问他朱成昭具体有那些意见时，他说：更具体的事，我就不清楚了。接下来我又问他：蒋良朴、王大宾他们知道吗？他也回答说：不清楚。因为当时我对中央文革是百分之百地信任的，所以我建议他去找蒋良朴、王大宾等核心组的成员，反映你们下边同学的担心，请他们注意这一动向。一定要帮朱成昭转过来，别给别人当枪使，毁了自己、毁了《东方红公社》。分手前，他也叮嘱我别在老师中传这件事，否则一旦有人把这事捅上去就麻烦了！

事后，我确实没有向校内的任何人提起过朱成昭事发前我就知道一点蛛丝马迹。但周末回家时，我将此情况告诉了我姐姐（她解放前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先”，解放后在五十年代初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并在师范大学与浦安修一起工作，而且关系密切），因《东方红公社》成立之初，她曾来学校看我，并让我陪她去《东方红公社》在教四楼的总部造访。她在接待部谈了很久，但具体说了些什么并未和我讲过，只是说：你们那个姓朱的负责人很有头

脑、很有魄力，是个人才。当时，她是否见到并与朱成昭交谈过我也不清楚。但从她所说的话看，他见到过朱成昭，并与朱交谈过。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所以我才把同学告诉我的这一情况告知于她。她听后直摇头，并说：可惜了，还是年轻，未经世事。政治斗争哪像你们想的那样简单！同时，还特别嘱咐我：你千万别去打听，但要注意听，注意观察。这事不发生最好，万一挡不住，你千万别头脑发热随便表态。听中央文革的，暂时想不通的，就先别说！

大约一月底的某日晚上，总部（不记得具体人是谁了）让我随他们一起去车库上车进城，但始终没有向我说去哪、干什么？我只记得连我一共五个人（不算司机），正好乘一辆嘎斯 69 吉普车。在车上只听见领头的跟司机说去平安里解放军报社。沿途大伙儿没有一个人说话，气氛异常沉闷，但因是夜晚，沿途几乎无人无车，我们很快就到了解放军报社，所以也没感到有多大的别拗。汽车停在报社北门对面的公交车站处（那时还是 331 路公共汽车的总站）。下车后，我们穿过马路来到报社门口，我隐约地听到领头的与门卫说：我们是《地质东方红》的，找肖力同志。门卫回过身向传达室里边的人打了个招呼，让他打电话通知肖力。时间不长，只见一位身穿棉军大衣戴眼镜身材较高的女军人向我们走来（我是第一次见到肖力，此前只听学生们说过肖力同志常来地院，是支持我们的），见面后她主动与每个人都握握手，和我握手时还说：我们以前好像没见过吧？我点头说：对！同时通报了姓名。这时领头的对肖力说：他是探工系的老师，是第一批东方红的成员。见面后，肖力同志示意我们到马路对面去，可能是因报社门口灯光太亮，还有站岗的，大伙儿站在那不大方便吧。过马路后我们往东边走了一段路，停在一辆 331 路公交车旁边，车身正好挡住路灯的光线，显得稍暗一些，我们在哪就不太显眼了。站定后，大家围成了一圈，肖力同志开门见山就问领头的：朱成昭现在的情况怎样？领头的向他汇报说：陈伯达同志的批示给他看过后，我们已和他谈过两次，表达了我们大家焦急的心情，希望他能很好地认识自己的错误、作出检查并彻底改正，继续和大伙儿一起战斗。这两次谈话他不像刚得知陈伯达批示时情绪那样激烈、带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相反，谈话时他的情绪都很平静，第一次谈话后，他表示让他再好好想想；第二次谈话后，他表示同意检查，并希望给他几天时间。听后，肖力同志表态说：这样就好。但你们还要继续做工作，坚决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争取他能转变！说到此，肖力话锋一转继续说道

(此时肖力的头也转向大伙儿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今已经半年多了，但北京市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工人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在这方面上海走在了北京的前头。回去后，你们也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学生要到工人群众中去，要与工人群众很好结合才行！最后，肖力同志说：天很冷，今天就这样吧。有问题以后再联系！说毕，我们大伙儿一起回头沿马路向西走，而她还在与头儿边走边说些什么，快到解放军报社大门对面时，她停下来和大伙儿告别，然后斜穿马路进入解放军报社。等他进入报社后，我们才继续往西走了一小段路，上车后头儿说：今晚回校后就先休息了，下一步怎么办，明天研究后再定。故回校后，大伙儿就分头回去休息了。

对我来说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是很突然的，至今想来也觉得很奇怪。因为，一来我不清楚总部的人为何要带上我去找肖力同志汇报朱成昭的事情，因为事前“官方”没有任何一个人与我讲过朱成昭的问题，更没有讲过陈伯达同志有指示让朱成昭作检查；二来，自文革发生以来，我也从未见过肖力，也从未听总部的头头向我说起过肖力其人和她与《东方红公社》的关系（以上两点，尽管我略知一点，但均是来自“传闻”，而非正式的消息）；其三，自回校参加文革起，特别是《东方红公社》成立后，我知道因自己出身不好、被人认为是“只专不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风上一些人也有所非议等原因，在领导眼中我属于可用而又不能重用的人物，口碑不算很好。对此，我有自知之明。故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就是尽量与公社的头头们（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过分去接近他们，更不要向他们表示或要求什么。以免影响他们，让反对者借我的所谓“有问题”去抓他们的辫子，而影响大局。运动以来，我恪守着对自己的约束，我始终按自己的看法参与运动，以备今后自负其责，不致影响他人。正因为觉得突然和奇怪，再加上当时去解放军报社的其他四人都是学生，此前和事后似乎与他们交往得也不很多，故在整我“五·一六”被关押近两年的时间内，对此事和接下来发生的总部让我单独去作朱成昭工作一事，我都绝口不言，始终未向专案组作“交代”，以免波及他人并陷自己于被动。

次日下午（或再一天下午），带我去解放军报社的那位头头在学九楼三层东边一间朝北的房间里对我说：宋老师，关于朱成昭的事，总部研究后想请你去和他再谈谈。好好劝劝他，让他冷静下来，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同时告诉他总部所

有的人和广大造反派战友们的心情是：希望他能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很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想法，尽快做出深刻的检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一定要让他明白，陈伯达的批示尽管严厉，但这是出于对他的爱护，千万不要有情绪。中央文革是爱之深，才责之严的！告诉他现在的要做的事情很多，中央文革要求我们下厂、下矿发动广大工人大众起来闹革命，向工人群众学习。听后，我对他说：我与朱成昭从未单独说过什么，他能听我的吗？他回答道：你别担心，他知道你。而且这些天来我们也找一些平时与他沟通不多的造反派老人去劝他、帮他，因为总是我们几个人和他谈，他也会腻的，反而听不进去！宋老师，你就放心去吧，我们已经告诉他了，他没意见！最后，我答应他，表示一定尽力而为。我走之前，他又嘱咐道：最好能请他定一下检查的时间，尽量早点为好。同时又加上一句：去解放军报社的事就不要提了。

根据总部的这个意见，我即赶往西三楼三层朱成昭的住地（在三层东头一间朝南的房间）。一路上我就反复琢磨谈话如何开始为好，如果开不好头，话也就很难谈下去，总部托办的事也就难于完成。但我既不太了解他的个性，又不太了解他错误的具体情况。只笼统地知道他犯了反对中央文革的严重错误，个人性格上比较自负。越想越觉得这事比较棘手，眼看就到西三楼了，心里还是没能捋出个头绪，不能再瞎想了。最终，我决定以自己这段历程来的感受作引线，以对《东方红公社》的期盼入手，打感情牌，希望能有所成效。这样，我内心就少许平静了一点，待敲门进屋后，我先向朱成昭简单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他倒是挺客气的站起来说他知道，并请我坐下再说。坐下后，我就开门见山实话实说地对他讲道：总部×××让我来看看你聊一聊，但过去我们之间从没有单独接触过，而且，对你这一段的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所以我内心也有些顾虑，不知如何谈才好。可能因我的表白极其坦诚的缘故，他竟笑出声来，并说：宋老师，你别客气、也甭担心，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没想到开场竟如此顺利，身上的重负似乎也一下放下了，觉得起马我能按自己的设想把想说的话说完，他不至于因心烦或被触怒而中途“送客”。

接下来的谈话大约进行了小一个小时，主要是我讲，他偶尔插问一下我谈话中他想了解的个别事情，如当我讲到因我知道自己的出身不好比较复杂，怕因此给公社的头头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让老保抓辫子，所以我尽可能注意与你们保

持点距离。此时他插问道：“怎么个复杂法？”这时我只好简单地说一下我父母的历史。在近一个小时的聊天中，我主要谈了个人和我知道的《东方红公社》小将们的一些感受，希望能唤起他往日的情怀，作出检查，幡然悔过。

1. 从个人角度，我讲述了自己始终抱着跟党走，好好改造自己，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心愿回校参加文革。但因对工作组开始的做法有不同的想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就在“反干扰”中被打成反革命，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精神压力极大，想到未来，前景暗淡。这时，如果没有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没有中央文革的指点和支持、没有东方红小将们的奋力抗争，这个案是不可能翻转过来的。虽然，在这一翻案的过程中主席和中央文革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他们终归离老百姓很远，我能切身感受到的，就是《东方红公社》小将们对我的态度和鼓励，让我第一批就参加了东方红，成为地院造反组织的一员。我珍惜这一切，希望《东方红公社》的成员，特别是领导成员，能团结一心，继续带领大家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建功立业，继续前进；

2. 从我了解的小将们的角度，我讲述了邱培信同学和我讲的情况，但我有所取舍，不想触动他的自尊心，而着重于大家对《东方红公社》前程的担忧。我说：也是你们水文系四年级的学生邱培信（这时他插话说他认识），前些日子，我刚步行串联后从兰考回校，在学九楼作战部办公室遇到他，。他拉我去桃园，急切地对我说：《东方红》怕要出大事了，朱成昭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陈伯达让你做检查。现在很多同学都在议论，担心会出大事，心里非常着急。同时我特别强调地说道：他说这段话时，双眼红红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些老东方红战士对公社前程的焦虑之情，真是令人感动啊！

在我说后面这段话时，他没有再插话，头略低着，手将一支未抽完的烟碾得粉碎。看得出他内心也是波澜起伏的，我当时主观觉得，他对和他一起战斗过来的伙伴们，还是很难割舍的。

至此，我觉得应当见好就收，时间也够长的了，所以我做出了到此为止的决定。就继续说道：朱成昭同学，我今天想谈的就是这些，也是我和关心你的小将们内心情感的真实反映。我们大家真诚希望你丢掉包袱向前看，勇敢承认自己的过错，及时作出检查，继续带领大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尽管听说陈伯达对你的批评很严厉，但我和大伙儿一样觉得，爱之深，才会责之

严呢！对此，你千万不要带着情绪去想，人犯错误难免也不可怕，浪子回头金不换嘛，何况你是一个有思想、有魄力的革命小将呢！我还要感谢你耐心听我讲了这么长的时间，供你参考吧。最后我也转告他了，**x x x** 希望他能尽快定一个检查的时间，以便能及时安排。

最后，当我告辞准备离去时，朱成昭站起来握着我的手，很诚恳地说了两声谢谢，并说检查时间他会很快告诉**x x x** 的。

离开西三楼后，走在路上我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我内心却没有朱成昭能接受规劝改正错误的把握。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能成事者，都是极具主见的人，岂能为说客的感情牌所打动和扭转呢？！而且，规劝过程中，我反复观察着他住室内的状况，空酒瓶桌上、窗台上凌乱的摆放着，烟蒂满地，油印的小报散落各处，床铺也很零乱。一点也不像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对自己在各方面都有严格要求的样子。相反，映衬的倒像是一幅失落、颓废的画面，给人一种无奈花落去的悲沧感觉，这和过去他在集会上给我的印象——坚定、意气风发——截然不同。

回到学九楼我将劝导的情况向**x x x** 作了汇报，听后，他反觉得挺好，并说：那就等他的时间吧，希望能有好转。

现在回想起来，当朱成昭的问题暴露并遭到陈伯达同志的严厉批评后，总部核心组的成员确实按中央文革的指示与朱成昭谈过，并力图让其很好检查、承认错误后再回到领导岗位。为此还经常向肖力等通天人物汇报进展情况，争取得到更多的指导。同时，为了能让朱成昭接受劝导，也的确煞费苦心找个别老东方红的成员与他谈心，争取他的转化，其中我也是这类对象之一。但从让我去做工作的过程可以看出，核心组在如何做好转化工作上，研究得不够细致，故针对性不强，收效自然不高。当然，这也与时间紧迫、核心组面临的压力过大有关，不能求全责备。何况，转化工作成功与否，更重要的还是与被转化对象本身有关，即内因起主要作用嘛。

（三）到工人群众中去——赴京西煤矿串联

大约六七年春节刚过，按总部的要求，我们探工系的师生由 71631 班的吴**x x** 带队（地院革委会成立后，吴某任探工系革委会主任），奔赴北京门头沟的京西煤矿的门矿、王平村矿、木城涧矿、长田矿（属房山县），这大约就是为

了落实肖力同志一月底在解放军报社会面时所作的下厂、下矿指示——发动工人群众起来造反而采取的行动。当时领队给我的任务是留驻矿务局广播台（我们一到门头沟矿务局，吴××就立即向矿务局党委宣布：我们是奉中央文革的指示进驻京西矿务局的，任务是发动广大工人群众积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揭发、批判矿务局党委和北京旧市委的黑关系，揭发批判矿务局党委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并要求他们立即交出广播台的钥匙，同时责成我带人去接收），负责宣传、播音工作。我们总共有七、八个人，只有我一个是老师。除我外，在广播台的还有两人，一人负责机务、另一人是女性，负责节目编排，播音则大伙儿轮流担当。其他几人则分别下到各个矿山，提供素材或稿件，负责报道所在矿山的运动进展情况。

说句老实话，吴某当时对矿务局党委所做的宣布以及分派给我的任务，我内心丝毫没有任何不妥的感觉。在当时《地质东方红》在京和全国红得发紫的大气候下，我甚至还觉得小将们做事很有气魄和胆略。而对我的信任和重用，内心除觉得很兴奋外，倒是还有点自知之明，觉得应更好地工作，加强锻炼和改造自己，不要辜负大家的信任。我能把兴奋和责任联系在一起，说明自己尚未到忘乎所以的地步，后来每每想起，也只有这一点是自己京西一行中值得肯定的。但后来随着文革中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造反派唯我独尊的气势越发张扬，慢慢自己也开始产生一些不再完全盲目紧跟的想法。这时，自己才初步觉得这种做法与地质部工作组刚进地院时如出一辙，毫无二致！但真当有这么一点粗浅认识的时候，我们已经早就离开京西矿务局，回到学校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京西矿务局，也没有直接或间接听到任何当地干部和工人对我们在京西作为的评价，但我心底里是明白的：他们不会给予任何正面评价的！

在京西，很快我们自己也变成了文革初期进驻高校的工作组。因为我成天在矿务局广播站处理稿件，从事播音工作，很少到基层各矿井去，所以对下边的同志们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工作知之甚少。但起码从上来的稿件和材料中可以看到，下边发动群众的工作，主要停留在召集工人群众开座谈会，向他们介绍北京和外地工人起来揭批领导问题，甚至夺权、罢官等一般情况上。对矿山的建设和发展、对当前矿山的生产、安全，对各矿山领导班子的基本状况等重要问题，基本上没有反映。由于我们的到来，打着支持造反派的旗号，使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越加

尖锐，一派群众随即将矛头指向革命小将，终于在京西矿务局所在地的门头沟矿出现了轰赶《地质东方红》的标语和大字报。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反应就是要坚决迅速地给予反击，支持造反派群众、支持革命小将。于是，我立即着手赶写一篇回击这股轰赶“逆流”的文章，由于当时的情绪异常亢奋，文章几近一气呵成。文章的具体内容现在已毫无印象了，无外是大讲《地质东方红》的成长历史，自我表彰一番，并警告“轰派”群众认清形势，指出对待革命小将的态度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奉劝他们及早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上来。但题目至今似乎还有点印象，可能是《岂怕一个斗大的“滚”字》（据当时反映情况的同学讲，除贴大字报和标语外，还在他们住宿楼的墙壁上贴了一个很大的“滚”字）。

让我们自己没有想到的是：1. 上述文章在当晚播出后，听到广播的门矿工人群众竟误认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这时，“轰派”的群众一下就“傻眼”了，相反，造反派的工人群众则兴奋异常。但双方都没有仔细去辨别，而是将误传一个个绘声绘色地继续传下去，搞得众人皆知，认为《地质东方红》小将在门矿的行动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所以“轰派”的驱赶行动随之很快就偃旗息鼓了；2. 第二天一早，门矿点的负责人蔡文芳同学（7161 级的）就跑来矿务局，找到我们告知了一切，感谢我们的声援和支持。并极力夸奖文章写得好，请我们将稿件给她，以便抄成大字报贴出去，好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无论是误传带来的意外效果，还是小将们对我工作的赞誉，在这次下厂下矿的行动中也只是小小的花絮而已，真正从受到教育和锻炼来说，则远不如步行串联了。这里附带说一下蔡文芳同学，她是探工六六届的女生，后分配到冶金地质局（在天津），很有才华和组织能力，在引导冶金地质局探矿队伍转向工程市场上做出了很好的贡献，受到了探矿界前辈们的积极肯定。她待人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却少了一点警觉性，致使在九十年代后期，被其同单位职工的孩子为劫财所杀害。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没有下到矿山与工人师傅直接接触的机会，宣传广播工作已忙得不可开交。即使随下矿核心组去基层，也只有一两次（如去木城涧矿），而且主要是听取在矿上的负责人汇报情况，同样没有机会接触广大工人群众。因此，“到工人群众中去，与工人群众相结合”无论对我个人，还是对东方红的小将们而言，其实只是一块遮羞布——为我们自身去厂矿鼓动工人群众

造反，为文化大革命进一步造势遮羞而已。但当时的自己对此却不以为然，反而觉得作为一名造反战士，能战斗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剩余的只有内心的激情和兴奋，不论多忙、不论睡得多晚，人的精气神总是处于亢奋之中。与工人结合、改造自己等就自然地被努力工作、尽职尽责所代替了。

我们在京西煤矿的串联大约到四月中下旬就匆忙结束了，原因我不太清楚，可能与院革委会的成立有关吧。京西煤矿所在地区就是北京西边门头沟和房山县地区，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地下武装积极活动的地区。建国后，京西煤矿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因受资源条件的限制，其产值和规模当然无法与其他大型煤企相比。虽如此，但该矿在六十年代初也曾发生过轰动全国的“挽救六十六名阶级弟兄生命”的矿难奇迹。面对有如此丰厚的革命史资源的大地，我们却未能很好地发掘和利用，作为充实自身的营养。相反，却成为一群革命造反的鼓噪者，支持一派反对一派，还自诩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如今想来真是愧对京西那片热土，愧对当地为革命和建设都做出很大贡献的广大人民群众！

（四）在革委会简报组时期

我们从京西矿务局撤回学校后，我即被安排在院革委会简报组工作。当时是谁找我谈的，为什么让我去？现在我已毫无印象。说句老实话，自《东方红公社》掌权后，对来自领导安排的事，我的一贯态度就是努力尽职去做，并争取做好。对安排工作的细节、谁的意见等，基本上我都不打听。再说，当时领导布置个工作，也远非现在这样有一定的工作程式，随意性的安排、设想也是很普遍的，因此即使打听，布置者可能也难讲其详。

我只记得对简报工作的几点要求大致是：1. 简报内容以文革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和动向、社会反响为主，与此前的动态报相似，但应进行很好的梳理，更简练、更突出。重点在报道而非述评、分析；2. 发放范围，除送院革委会成员外，还要求报送北京市革委会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3. 组成人员没有给我规定，给我的印象好像是根据需要可以由我自己决定。但却指定了一名打字员（是原党委办公室的一名机要打字员，女性，年岁比较大估计近 50 岁，姓名已记不清了）和一名简报递送人员（一位李姓男同志，年龄也较大约 50 岁左右，也是原院党委办公室的机要员）。并告知我，当简报编好即可直接交给打字员打印。打印毕再返还由我校对，待校对后再送到她那，由她负责印刷、装订，再叫老李负责外送

和分发;4. 简报所需素材由动态组负责提供，但同时告我也可依靠石油教研室的郑××等人，说他们过去也给动态报提供素材，他们整的材料可作为简报资料的来源之一；5. 简报出版时限一周1—2期，若有特殊事件须报，则中间可以加刊。简报组办公室就设在学九楼原动态组的一间房子内(在作战组办公室斜对面)。

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根据我的印象，当时向我谈成立简报组一事时，并未言明任命我作简报组组长，也未明确今后谁任组长。但自谈话后，至最后我离开简报组（实际上也是简报组自行消亡）时，革委会也从未任命或指定过简报组组长人选。但军宣队进驻后开始整肃造反派时，为防止伤及无辜，在我写的交待材料中，我自认自己是简报组的实际负责人。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出于实事求是的处世原则。因为在简报组存在期间所发送的简报，尽管简报刊出总量我早记不清了，但有关简报内容的选材、编纂、定稿和校对等，可以说几乎全部是由我一人完成的。因此，我自诩为简报组负责人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并无夸张之嫌。譬如，石油教研室郑××曾就简报内容向我提出过比较尖锐的意见。他说：目前的简报内容比较一般，缺少深度和对动向方面的分析，对领导的参考意义不大。对于他提出的意见，我知道是源于简报中曾在使用他们提供的素材时，对他们提出的一些看法和分析我基本上均略去了的缘故。所以我只好向他解释说：你说的意见确实存在，但这是革委会领导在成立简报组时明确要求的“重点在报道，而非分析和述评”。而且，我也觉得这一要求是实事求是的。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很多也很杂，要弄清事实并作出恰当的、有深度的分析和述评绝非易事。若某件事确需查明真相、做出分析和评论，可能需要专门组织人力，做更多细致的工作方有可能，单纯依靠简报组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在简报组内工作时，是敢于也可以做主的。但我的这种担当也是有分寸的，并非一览无余地全都承接下来。如当军宣队整我、批我时，探工系的军宣队负责人之一（二把手，姓名已忘）就我交代的简报组材料（指我说自己是简报组实际负责人）批我“避重就轻、躲躲闪闪”，并拍桌子吼道：你的态度极不老实。对他们这种以势压人的恶劣作风，我很平静地说道：我写的材料是实事求是的，确实我没有接到或看到院革委会对简报组负责人的任命通知，所以我说没有正式任命。若为此说我避重就轻，那只好请你们从革委会找出任命档案来加以证实了。面对我的驳斥他无言以对，只好不了了之。

在这段时间里值得一提的是革委会关于简报编写内容的要求非常中性，把自身的位置也摆得恰到好处。而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对此两点也能中规中矩，未有偏离。即，内容上以报道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和动向、社会反响为主，而非述评、分析；在自身定位上，我们就是一个动态情报人员，负责将杂乱无序的事例梳理清晰供领导了解和分析判断。因此，当军宣队进驻学院后，在整肃造反派的过程中，使他们没能从“简报组”身上捞到整人的任何稻草。就我自身的判断而言，起初，军宣队是想从“简报组”身上取得点突破的，想从中捞取造反派整无产阶级司令部黑材料的“证据”。因简报组确实是造反派掌权后的组织机构之一，而我又是一个出身不好的白丁，如果有点问题就可上纲上线，并顺藤摸瓜。这是历来政治运动中整人者惯用的伎俩，军宣队重操此业也不足为奇。正因如此，军宣队在我时，首抓的就是我在简报组的工作，而且押上探工系军宣队的二把手负责，在宣布让我交代在简报组时期的问题时，该二把手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要把简报组都整了那些黑材料写清楚，其意图岂不昭然若揭？！但按上述要求编写和报送的简报，所写的都是北京市和个别外省市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两派对立的焦点（公开的），两派的支持者，我们所知道的双方下一步的打算等相关事实。内中基本没有我们的看法与分析，从某种程度讲，“简报”用现代语可以说是“透明的”，与整中央的黑材料沾不上任何边！所以他们折腾了一段时间后，大概察觉到再搞下去也不可能如愿，更无法向上延伸，故就只能彻底放弃了。此后，无论是清队、抓我现行反革命或抓“五·一六”的各个阶段里，均再未涉及“简报组”时的问题就是明证。

我在简报组的工作大约维持到八月底或九月初，实际上此前简报工作就已经难以为继了。这主要是因为编写简报所需的情报资料的提供渠道日益不畅，动态组也因“人荒”运转失灵，很多原来定点跑材料的小将长期不见踪影，有需求时找不到人是经常现象。如此，想要简报组正常工作，实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样，绝无可能。我个人觉得这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1. 文革运动开展已一年有余，长时间的群众运动已让人们有些疲了，缺少新的刺激感。再加上相当一部分人对运动的发展、走向，已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尽管还说不出什么道道。总之，群众已不再像运动初期那样充满着激情，中央文革指向那儿，小将们就冲向那儿；2. 由于《东方红公社》内部的分裂，朱成昭被扑，蒋良朴、杨雨中

及一些朱成昭的坚定追随者们被隔离审查，革委会内部也因反右倾而出现裂痕。以致广大造反派心目中的领导核心，已不再像造反起家时那样具有权威性。同时，广大群众的团结也如同核心领导层一样不复存在了，只不过没有出现两个不同的组织罢了。基于此，院内群众的涣散性开始滋生、蔓延，逍遥派日益增多，关心运动进展并积极投入运动的人群，反而日趋减少了。面对这一难于由我个人逆转的态势，我不得不向革委会的领导（具体找的是办公室还是宣传口的负责人已记不起来了）说明简报组的实际情况，建议暂停简报的编写和发送工作，视今后的需要与否，再定是否恢复。大约到九月上旬末，革委会领导就正式通知我，同意我的建议，暂停简报组的工作，并让我通知负责打字和递送的员工回原单位参加运动。据此，我通知了负责打印的女同志和老李，并感谢他们前段的辛劳。与此同时，我自己也收拾了东西和房间，并把房门钥匙交还给动态组的同志，就此结束了近五个多月的简报工作。

这里还想补充一点，即当我去简报组工作之前，约在四月初，我曾两次被总部召唤，随王大宾等人一起去人大会堂接受总理和中央文革首长的召见。这两次都是通过学校的广播喇叭直接呼叫找人，说有紧急任务，让我和我系的陆炎德老师去车库集合。由此可以判断这两次出行都是临时决定的，但由谁决定、为何会让我参加，我自己同样也并不知晓。当我赶赴车库后，除见到陆炎德外，还看到王大宾也在场，另外还有四、五名同学。大宾看我赶到后就让我立即上车，并在车上对我说是去人大会堂参加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召见，并让我注意做好首长讲话的记录。但大宾对这次召见的原因和有哪些单位被召见都未作任何说明，事后我估计当时他也并不清楚，通知他参加会议的人员也未向他透露任何信息。我们很快就到达人大会堂的北门广场，下车后在北门由工作人员将我们领入人大会堂接见大厅。同时也有其他被召见的人员由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进会场，但他们究竟是哪个院校的代表，我都不清楚。我们在会场等了不长时间，就看到总理和中央文革的成员依次陆续进入会场并在前排主讲位置就坐。首长都落座后，就见总理向左侧的工作人员询问人员是否都到齐了，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总理就面向大家宣布开会。

总理和中央文革各位首长在这两次召见中的具体讲话内容，今天我已难以再回忆复述了，但两次召见留下的总体印象还是比较清晰的。这就是：1. 这两次召

见会上的讲话和会场气氛都比较严肃，不像过去接见中对小将们的活动肯定和赞赏那么多；2. 整个讲话的基调是批评性的，让会议参与者感到有些压力。批评涉及的主要方面是指小将们不大注意运动的大方向，而只顾打派仗了。

会议结束已是次日凌晨，回到学校后，大宾让大家先回去休息，天明后再研究怎样传达。我的印象是大会传达定于下午在大饭厅举行，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宾在看过相关记录后，决定让我进行传达。对此我当即表示是否由其他同志传达更为合适，但大宾完全不考虑我的意见，并严肃地说道：就由你来传达，我会在旁边给你补充。看到大宾的这种态度，我感到他可能对我的过多考虑不满，因此就不再坚持了。事后我借了其他几个人的记录回去查对和整理，因时间很紧，根本来不及整理出完整的传达稿，只能在我的记录基础上，作出必要的补充和修正。所以在正式传达前，我再次请示大宾道：因来不及整出传达稿让核心组审查，能否在传达后告诉大家，大会传达后，再将召见会讲话内容整理打印后发给各单位。对此建议大宾表示同意。

当天的大会传达由大宾主持，他“遵守”自己的承诺，在我传达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我的身边，极为专注地听着我传达的内容，几乎很少打断我的传达过程。他的这种信任，对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支持，令我内心充满了感激。

在整个传达过程中，我忠实履行了传达者的职责，除了严格“照本宣科”（记录本）外，也把我在召见过程中所感到的氛围和印象通过自己的语音、语调带给了大家，因此使整个传达过程也显得相当严肃，让大家有一种受批而非受捧的感觉。可能也因为这个原因，在整个传达过程中，广大师生听得也很专注，基本没有被掌声打断过，直到传达完毕，才给以些许掌声。对此，我理解这仅仅是表达对传达者辛劳的感谢吧。所以当我回到学九楼简报组后，动态组的郑文卿和胡乐成对我开玩笑地说：传达首长讲话，怎么连掌声都没有得到多少，真是苦命！对他们的所言，我也只能一笑以报之。

此外，在简报组工作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想提一下。因简报组的办公室是原动态组用的房间，而且就在动态组旁边（学九楼东侧朝南），加之简报所需的素材多数均来自动态组收集到的资料，因此，动态组的头头和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学生）经常到简报组来聊天和交流。大约在八月下旬的某一天，动态组头头（是郑文卿还是吕×× 记不清了）到我办公室来，交给我一份电报，并说：宋老

师你看看这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帮个忙？我打开一看，是一封没有译出的电报，整张纸都是打印的四组一节的标准电码。看毕我说：你可以到院办或收发室借一本标准电码本查对一下嘛。接着他说道：我们已经查对过了，译文很乱，完全看不懂说的是什么。所以想请你帮个忙看看能否译出，以便得知其真实意思。因当时简报组的工作已近尾声即将结束，我也没什么事，就答应他试试看吧。说实话，破译密码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我并未接受过这方面的点滴训练，是否能解开电报的密码完成此任务，当时我也毫无把握。

他走后，我借了一本标准电码本，对照电文认真地进行了译电工作，所得结果确实如同天书，完全搞不懂电文的意思。但我知道，此时若想直接找出密码的规律显然是有难度的，因为，在完全不知道收发双方的背景情况下，是很难找出破译规律的切入点，也会大大增加破译的难度。所以，我改变了想直接破译的简单想法，希望能从收发双方的背景着手，看看能否找到破译规律的切入点。因此，我仔细研究了收发电双方的地区和邮电局，发电方是四川成都或重庆（记不准了），收电方是北京学院路邮电局。因此判定发电方肯定与四川的两派人员有关，而收电方则是同方派到北京来的人员（因当时全国各地矛盾双方均有大量人员到北京告状或打听消息，用现代语言就是上访人员），从而大大缩小了人员的背景范围。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在研究电文时发现，在成组都是四位数字组成的标准电码中，却不断会出现三位数字的电码，而且该电码都是：826。据此，我联想到在四川有个“川大八二六”的造反组织。我觉得这一线索极其重要，说不定就是打开密码规律的切入点呢！因此，我立即查看电文原文中“826”前边的两个电码，并记录下来仔细分析。一经分析就发现了规律：即在这两个电码组合中加一或减一（记不准了），就变成了“川大”两字的标准电码。这下，我兴奋极了，立即将电文中所有的电码均加一或减一，然后再译该电文，结果就得到了完全通顺的电报译文。我将电文译出并誉清后，立即去动太组交付，从而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该电文现在我大致记得的是说“川大八二六的头头 x x x，即将赴京，并于 x 月 x 日 x 时在北京医学院 x 楼 x 室开会，介绍当地情况并商量对策，请准时参加”。我的印象该电报是发给我院二团的，但具体请谁去参加会议已经记不清了。

能比较顺利地完成从未接触过的译电工作，当时我内心还是挺得意的。所以

回家后，我就将此事如实地告知老人。（注：他是我父母大革命时期的好友，待我和我姐姐们都非常好，解放后我几乎就把他那里当作自己的家，而且我上学期间所需的生活费用几乎也是由他提供的。他是 1923 年的老党员，在总理领导下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是中共中央某部的副部长，于 1976 年 6 月谢世。因工作性质关系，文革期间他未直接受到冲击，但林彪一号命令后，也被疏散到江西抚州，后于 1972 年回到北京。在我个人档案里，我曾作为社会关系填写在案，但按我姐姐的嘱咐，我从未与同事、朋友们谈过我与他的关系。但文革反干扰期间，在揭批我的大字报中，却有一张掘进教研室程锡宁老师署名的大字报，揭发我有高干后台，并点出该老同志的名字。程锡宁老师是如何知晓这一关系的，确实令我费解。但幸好在文革我被整、被批斗、被隔离关押期间，并无人再次提到这层关系，因我确实担心由于我的出身和被整肃的现况会给老人带来不好的影响。）没想到他老人家非但没有给我任何肯定，反而很严肃地对我说：你等于是再搞特务活动，你们这样做很不好！老人的这一批评，确实出乎我的预料，但也让我开始有所清醒，迫使我开始进一步地思考自己的所行和……

周末回校后，出乎我意料的是，译电的事并未因电报译出而结束。相反革委会通知我，届时由我冒充收电方去北医参加会议。同时嘱咐我注意两点：只听对方介绍，不具体表态承诺，推诿回校汇报以后再作答复；若对方产生怀疑，尽量辩解。万一无果甚至被识破后，就坦率承认冒充，避免发生冲突和遭到殴打。有我们安排的人会回校报信，届时再派人前往谈判、营救。面对领导的这一安排，尽管有老人的告诫在我耳边回响，但我确实难于拒绝。因为，一方面这是组织上安排的任务，也是组织的信任；另一方面，组织上已经考虑得很细致了，连万一需要“营救”都考虑到了，根本没有商量的口气，不容我再有任何异议。因此，我也未再多想为何我们要这样做，也未想这样是否合适，相反只能坦然地接受并认真去执行了。所幸一切顺利，在我一人冒充前往参加会议时，我首先以真实姓名做了自我介绍，（但冒充是蔡派派来的），对方对我并无任何怀疑。至会议即将结束时，我才表态说：回去后我会将情况马上汇报，待研究后再将情况转告你们（但究竟对方讲了哪些问题，需要我院蔡派哪些协助，为何要搞得如此神秘等问题，如今我一点也回想不起来了）。回校后，我立即将会议情况作了汇报，至于革委会为何需要这种情报我当时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但却觉得老人对我的告

诚是对的，这种事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极不光彩，所以再也没有电文译出时的那种得意了。从这一小插曲中可以看到，当时自己已经陷入到派性斗争的盲目性泥潭，丢弃了对大方向和大原则的思考和辨析，思想的惰性增加了，服从、任劳任怨、认真负责等驯服工具教诲中提倡的意识品德，又重新以完全正面的美德和高深修养的面貌，再次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站了上风。也就是说，从对过去领导的盲目服从，重新回到对现今领导的盲目服从，其劣根性的本质——盲目（从）性却丝毫没有改变。

（五）从积极参予到逐渐“逍遙”

自六七年九月中下旬简报组停止工作后，我就离开了学九楼逐渐过起了逍遙派的生活。从一个虔诚地要求做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锻炼自己，渐次转变成一名逍遙派成员的直接原因是：从九月底起，我经常发现自己肝区疼痛，且大便不成形（稀便）。经北医三院检查后发现血检中胆红素指标超高，但原因难于确定（即难于确诊），只是让我服药并全休（当时医院开诊断证明给假一般最长只给半个月。若需继续休息，则必须再挂号就诊，经检查确诊后，再由医生追加假期。因此，若需延长假期，我必须每两周就得抽血化验一次。这不仅繁琐，而且也极易交叉感染。故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向教研室领导小组提出，可否一个月交一次假条？因当时院内的运动进展情况抓得并不很紧，他们研究后同意我一个月抽一次血，上交一次假条）。在这种情况下，不逍遙也得逍遙了。三院的检查和治疗大约一直进行到年底，肝区的疼痛和胆红素指标均无明显改善，而且还经常出现腹胀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我姐姐让我去西苑中医研究院看中医。经中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肝炎后胆红素增高症”。除继续全休外，连续服用中药（汤药）并辅以西药维生素B12针剂治疗。这样大约治到六八年二月底，病情就大大好转，尽管胆红素指标依旧有些偏高，但已不太吓人，而且其他症状也基本消失了，从而结束了全休状态。但每次复查时，若胆红素超过一定数值后（具体数值记不清了），大夫还是继续让我半休。

除了患病这一直接原因外，让我渐次走向逍遙的重要原因是思想上起了某些变化。变化主要是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和中央文革在运动过程中的行事方式、作派等产生了一些抵触和怀疑。从而使我对中央文革的信任度产生了动摇。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件事引起的：

1.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后，中央文革开始把其重要成员之一的王力捧上了天，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大会，欢迎王力胜利脱险回京。但时隔不足半月，在王力“八七”讲话后不久，中央又以“反党乱军”之名将其逮捕，从而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与此同时，在文革之初声名赫赫，且在中央文革小组中与王力齐名的关锋、戚本禹二人，先后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由被罢黜。而关、戚二人，恰恰又是《东方红公社》成立之初的有力支持者，也是《东方红公社》近一年来执行“在外、向上”路线的唆使人和推动者。正因为王、关、戚等人与《东方红公社》有这种特殊的关联，所以很自然使我将“王、关、戚”事件与地院《东方红公社》“朱、蒋、杨”三小将走向反面相类比。可以坦诚地说，前者在我心底里产生的震动远小于后者。因我认为，朱、蒋、杨毕竟是学生，心地单纯，仅凭激情和对伟大领袖的忠心投身文化大革命，因不懂政治、不懂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而犯错误或大错误。而且，我还觉得朱、蒋、杨等人的犯错与党内一些老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犯错有某些类似之处。当初这些老同志也风华正茂，他们凭着拯救中华的理念，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马克思主义而投身革命，但在其后的斗争中犯了各式各样的错误甚至是路线错误，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到民主革命的胜利。基于这种类比，所以当时我心底里认为，朱、蒋、杨等人的错误虽是严重的，可以免职。但应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假以时日，说不定有可能和民主革命时期犯过路线错误的老同志一样，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应当承认，对朱、蒋、杨等人错误的这种认识，在他们被隔离审查时起就有，但因当时对中央文革的认识绝对正面，因此只不过一闪即过。而当“王、关、戚”问题暴露时，我对中央文革的绝对信任已有所变化，所以对朱、蒋、杨问题的认识就出现了上述改变。但我深知这种想法存在的危险性，所以直到今日之前，我也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但“王、关、戚”则不同，他们是一批打着革命旗号的政客，目的是打倒反对他们的“政敌”，取而代之以谋取更大的权力。所以“王、关、戚”事件的出现，带给我的只是更深一步地看到了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给我的警醒则是比较消极的保护好自我的处世理念。即像我这样出身不好又不懂政治的人，还是远离政治为好！时至今日再看，我才似乎懂得：王、关、戚等人实则也是伟大领袖文革战略总布局中的几枚棋子而已，一当事关大局因矛盾激化需要重新考虑力量或权力平衡时，则需要抛出一些替罪

羊来缓解被激化的矛盾，维持大局和总体的稳定，以利再战，达到他老人家所设计的最终战略目标的实现。具体到当时的现实，就是群众运动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裹挟下已显现出失控的苗头，激化了与掌握枪杆子的军队间的矛盾，危及到毛政权本身，故不得已只能“杀卒”以谢国人，使被激怒的部队能够稳定下来。

2. 大约在六七月间，伟大旗手江青在某高校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不记得因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公开咆哮地向小将们喊道：像周荣鑫这样的人，你们还不赶快去把他抓起来（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长）！对于这种在群众集会上公开鼓动群众去抓中央干部的作法，让我感到不可理喻而难于接受。而且联想到自文革发动以来，江青曾多次在不同类别的公开场合讲话中，点一些领导人的名字并给以严厉的指责，从而诱发了小将们对这些领导人的冲击和批斗，而这些人是否有问题和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并未经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审定。对江青个人的这种盛气凌人的霸道作风，让人越来越反感！我内心的这种感觉，曾在 1967 年夏季一次与刘昭明的闲聊中，无意中向她谈论过。情况我记得是这样的：当时我骑车回家（即前述老同志的家），大约骑到师范大学时，遇到了她也骑车进城。我们一同骑到新街口豁口处要分手时，彼此停下来说了会话。她问我近来忙什么呢？我说已经不太忙了，而且我也不大想继续做了。她又问起原因，我告诉她这段时间资料上不来，我想跟上面反映，暂时停下来（指简报）。另外，有些事情我也看不惯，于是就把对江青的上述看法对她讲了，但也嘱咐了别对他人瞎说。之所以要谈及此事是因为，68 年当我们俩准备结婚时，我曾带她去前述老同志家看望，老人见到她很高兴，让我感到老人对他很满意。拜望毕，我送她回家后再返回老人家中，想听听他老的真实看法。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当他肯定了昭明的很多优点后，特别严肃地嘱咐道：她太单纯，以后政治上的事不要和她多讲。所以当抓“五一六”把我隔离起来后，因我曾向她谈到过对江青有些负面看法，于是这就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极其担心她会在军宣队和专案组的“劝说、诱导”下，出于对党的信任（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性），交代（或揭发）我的上述言论。若如此，则定罪现行反革命，就确实是板上钉钉了！这块心病可以说一直折磨我到隔离被解除之后，当正式宣布对我解除隔离，允许回家，但要继续把问题交代清。所以我回到家中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彼此相拥，好好看看、亲亲儿子，而是迫不及待

地悄声问她：67年夏我们在师大偶遇同行至豁口时，我们聊天说的事你还记得吗？她回答说：怎么了？我说：就是想问问你是否还记得当时我们聊天的内容。因赵璧媛（抓“五一六”积极分子，后来大约成了我专案组的负责人，也可能是干校抓“五一六”的负责人。这里提及赵只是我无奈找的借口而已）还让我再想想简报组的事，我觉得自己都交代清楚了，但还想问问你，因为当时我不想再干了，好像和你谈过一些简报方面的事。她想了想后说到：我一点也想不起来，连豁口相遇的事都不记得。听后我就说：你不记得就算了，甭想了。反正我觉得都交代清楚了，就到此为止吧！（当时，我生怕再勾起她的回忆，她能彻底忘记最好，我也就彻底“安全”了。我之所以绕个弯打马虎眼似地问她，一方面是怕直接相问等于再次告诉她这件事，如同再次“放毒”，反倒坐实“罪证”；另一方面是因为干校的住房非常简陋，屋顶三角房架支撑的顶部空间都是连通的。隔墙也只是土坯垒的，缝隙很大，墙面也不抹灰，所以各家的住房都不隔音。故我担心这样的谈论若被别人听到后，再向上反映可就糟了）。这件事直到20世纪末，她初中时一位好友的弟弟（美籍华人）回国在北京聚会，彼此聊到文革时期人与人的复杂关系时，他说因和朋友言谈中说起过一些江青三十年代的有关情况，被别人揭发后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的经历。这时，我也将自己和昭明谈论江青的事和盘托出，道明此事在我被隔离审查时带来的后怕和对我的折磨。但昭明听后显得很无奈地说道：我确实一点都不记得了。对此，友人开玩笑地说道：如果你当时还记得，我看宋兄那就真该倒大霉了！！听后，大伙儿哈哈一笑。

在逍遥初期因身体不适，不再直接介入学校内部的运动进程，对校内外发生的相关事情，也只是听听而已。但因我曾是地院摩托车队的负责人之一，而且是地院摩托车队内唯一拥有驾驶执照的队员。因此，一些学生，特别是动态组的学生，时不时的会求我开车带他们外出看大字报、找人和收集情报。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是67年底至68年初，动态组负责人吕××找来了一辆苏式依日-49型三轮摩托车（属重型四冲程），让我带他去建外社会科学院看大字报。到后，他即在社科院正门的大院里观看大字报。我则想借此空闲检查一下车子（因该摩托车变速箱可能有点毛病，一档起步时总滑挡而导致熄火。故当在十字路口遇到红灯停车后，待绿灯亮后再启动时就极易因滑挡而熄火，所以在来的途中就曾熄火两次）。因车上没有足够的随车工具，故我只能通过调整怠速油门（加大），

想利用二档直接启动（对于功率较大的车型是可能的）。经过几次调试后，在他看完大字报前我就调好了。在回校的路上，他主动说起这次主要是想看看有关揭发潘梓年的大字报，因为他是潘汉年的哥哥，江青在接见红卫兵时，已多次提起要注意潘梓年的问题了。当车快行至师范大学时，他说想去师大找个人。于是我们就从师大东门进去，直接将车开到了师大主楼。进楼后我们乘电梯去到他找人的地方（看来是师大井岗山的总部，但当时已是革委会了），只见他进屋后与一男性学生打招呼后就一直在聊，间或听到一些他们的谈论，主要还是围绕潘梓年的事情，我估计双方是在交换有关潘梓年个人历史方面的情报信息吧！因我此时已处身世外，对潘梓年的事知知有限也不大关心，所以我就自己在室内随便翻看一些摆放在桌上的油印资料和报纸，并未介入他们之间的谈论。

在这段时间里，因服中药，煎药就成了我逍遥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一个较大的负担。因我当时仍住在集体宿舍，只能用自己装配的简易电炉在白天非用电高峰期把药煎好，以避免电源保险丝熔断造成断电影响大家。此外，煎药时不能离人，也就把我牢牢地拴死在宿舍里，这样倒好，等于强制我在宿舍里休息了。说不定自服中药后，病情很快得到控制并日趋接近正常，可能就与这种“强制”有关呢。

当进入春暖花开的季节时，我的肝功指标已基本稳定在一个略高于正正常值的水平上了。大夫言要完全恢复到正常范围内，看来有相当难度。鉴于其他异常感觉均已消失，故建议停服汤药，改服丸药（舒肝丸）以利巩固。而且建议今后可改为两到三个月复查一次，现仍继续半休，但没有必要为续假专门来院复查，但自己必须注意控制活动量，少吃油腻食物。我叹服这位老中医的水平和医德，回校后尽管觉得解脱了疾病的内心压力，但却十分认真地按大夫的嘱咐管好自己的生活。在肝病压力基本解除的同时，我与昭明之间的交往也越加频繁，进入五月风和日丽、百花盛开的季节，我们决定共结连理。为此我还专门去西苑中医研究院向老中医咨询，请教目前情况下是否可以结婚。他老爽朗地笑道：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向我道喜。让我感到他不仅是位令人尊敬的好大夫，还是一位让人可亲的好长辈。同时我还向他请教了在共同生活中是否需要注意预防传染的问题。对此，他又对我进行了科普教育，说到：你是肝炎后胆红素增高症，这时甲肝病毒早已不存在了，没有传染性，放心就是了。这样我也就不再有包袱了，因我不

愿意对她造成任何伤害和不良的影响。在当今社会，结婚在形式上不仅要搞得隆重，而且还特意追求豪华和张扬。但在文革特有的政治环境下，这些都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种表现。加之，因我们的出身都不好，一些人过去对我们还有过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的结合采取的是极度低调。除因婚姻登记需开证明、需申请结婚用房，我们不得不向系革委会办公室相关人员打招呼外，我们只告诉了几个最关心我们的朋友。其他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的。新婚之日也没有任何仪式，只是在五道口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算作是我们的结婚照了。当写到这里时，我想说一句心里话：我们由衷地感谢探工系掘进教研室的任大本老师（他是我系工会的负责人，是50年代中来华苏联专家培养的第一批的研究生），感谢他为我们争取结婚用房过程中所做的一切。因为地院职工住房是很紧张的，一般职工结婚多数都是暂时借用，符合条件的双职工，也需再等待分配。但任老师在与院行政处房管部门打交道中，多次反驳房管部门的“歪理”（指刘昭明北京家中有房，不能分房），指出现在刘昭明家中是祖孙三代租住的一间住房和一间厨卫同室的房间，并交出了他的调查材料。同时强调中央和北京市分房是以男方为主的一贯政策，不应拿刘昭明母亲北京有租住房说事。此外，还强调我们是五十年代毕业的教员（刘昭明是1960年毕业的，打了个擦边球）是晚婚（31岁）等理由。在任老师的多次力争下，房管部门最终在眷属楼单元房中分给了我们一间10平米的住房（与物理教研室的高老师合住一个单元）。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当我们拿到钥匙去看分给的房子时，才发现分给我们的住房已经放有物理教研室另一年轻的时老师的东西了，可见当时对此房“争抢”的激烈程度了。但任老师在交给我们住房的钥匙时，对争抢过程中的难度却只字未提，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我知道的这些情况，已是在数月后一次去同单元一层居住的郭声远老师家拜望时，听郭老师告知的（郭老师当时是掘进教研室主任）。从这件事也可看到任大本老师人品的一个侧面。

逍遥的日子也为婚后的两人生活提供了相对充裕的时间，除了在各自教研室参加学习、讨论外，对院外的事（主要是北京市其他院校发生的事）已经不大关心了，对院内的事主要也只是听听而已，完全不再卷入其中。但总觉得对下一步学校运动怎样进展，感到有些茫然。虽革委会也根据中央的精神，提出“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等，但我们尚未感到对自己有多大压力。尽管如此，我们

还是相互提醒着，注意在说话、做事上以谨慎为好，少出头、少惹事，能过上平平安安的日子就好。可见逍遙的心态这时已渐渐成了自己思想的主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高指示，随着时光的推移，到 68 年夏季似乎已经失去了运动初始时对自己的那种鼓舞和激励！究其原因除新婚后的分心和身体上还有些小恙外，很重要的原因仍然是思想认识上与当时进行的运动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疑惑，或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随着运动的继续进行和东方红在中央首长多次批评后，已将过去“向上、对外”的做法逐渐转移到校内后，在自己思想上除前述对中央文革的一些做法存疑未能解决外，对院内运动进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则增加了自己的不解和疑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67 年底，革委会根据中央精神，在校内开始了“复课闹革命”，从而结束了近一年半的停课状态，学生们回到了原有的系、年级和班级，重新开始中断了近一年半的室内教学。应当承认，在经过一年半停课闹革命后，可以说绝大部分学生表面上还是遵从革委会的要求，回到了学校、进入教室，听课、复习、完成老师布置的相关作业。形式上确实基本上做到了复课的要求，学生们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求知欲望。对于革委会的这一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也是支持的。而且严格讲，这也是在中央感到对文革运动的领导有某种失控后，所采取的纠正措施之一。但我认为革委会在落实“复课闹革命”这一任务时，却缺少宏观的设想和要求，也缺少细致而周密的设计和安排。采用的仍是一哄而上的运动方式来领导。既没有看到已被严重破坏了的学习环境、氛围和学习素养的重建谈何容易；也没有让教师和学生很好地领会中央所要求的“复课”和“革命”的内涵与关系。今天看来，那时中央对复课闹革命也未准就有清晰而完整的指示下达，这从其后直至文革结束之前，无论是中央文革或当时政府主管高等教育的相关机构，均未就高等教育如何改革，和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上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等重大问题有过任何实质性的重要文件下达即可证明。就我所知，只是在 73 年停止高校招生达八年之后，方就以推荐的方式，从上山下乡的知青中“选拔”工农兵学员，才有了相关的文件下达。即使这样，为了“选拔”工作，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还因害怕被扣上走回头路的帽子，不敢把选拔过程中的文化水平检测说成考试。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白卷先生张铁生式的闹剧干扰。所以我认为，“复

课闹革命”很可能也就是一种召回在社会上冲冲杀杀的学生，以恢复中央领导权威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复课”一开始就遇到如何与中断前的教学进程接续好这一大难题，而且越到基层（教学小组和承担课程的教员）就越觉得难办。譬如我当时所在的半工后半读教研室已失去了“半工”的现场条件，各门课程如何接续就成为一个很现实而且确实不大好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实际问题，教研室领导既不同意先按“全日制”教学大纲要求“填平补齐”，怕被扣上走回头路的帽子；又担心原本的半工半读教学大纲是在刘少奇“理工科大学要搞半工半读”的指示下制定的，完全照搬已因没有“半工”的现场无法实施，而且还有政治风险。故领导小组则希望能尽量通过实习室的参观来弥补，弥补不了的再以室内讲授或自学解决之。正因为有这些具体问题的存在，而又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故“复课”的真正效果就可想而知了。对这种以运动的方式开展教学工作，有大跃进时期的教改教训在先，我仍认为是不可取的。但因我当时尚处于全休养病阶段，当休假期限结束而我未拿到新的假条时，才会去教研室参加活动，所以室领导并未安排具体任务给我，这既是一种照顾，同时也使我回避了在如何“复课”问题上的争论。得以在复课闹革命阶段作壁上观，掩藏了自己内心的真实疑虑。

应当承认的是，在“复课闹革命”这个环节上，革委会是按中央指示执行的。地院小将们也按要求回到了学校、坐进教室，这在北京乃至全国也带了好头。但这只不过是把中断学业走向社会搞串联、打派仗的学生们，重新收拢到学校并进入教室而已。它只对解决学生在外可能引发新的派性冲突有好处，而对学生的知识获取则极其有限，至于说什么是“对教育革命的深化和探索”，那更是无稽之谈。即使有所讨论或辩论，也不过是纸上谈兵肤浅得很！

2. 进入 1968 年后，革委会相继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整顿革委会领导班子。因清理阶级队伍本是文革运动中的应有之意，是早晚必定要进行的。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当时自己也坚信不移，故一开始思想上对此并无任何抵触。而且就个人而言，自己既无历史问题，文革以来的表现也是明摆着的，所以自身也无包袱和压力，应能积极投入运动并接受教育。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清理和整顿的矛头，很快就指向了已被结合进革委会老院长高元贵同志身上。并以“高、安、郑”反革命集团的名目公之于众。对此，不禁让我疑惑丛生，而且令我吃惊！因高院长在地院师生中的人望之高是院内其他干部难以企及的，而且，反工作组

的导火索就是因工作组把运动的矛头错误地指向高元贵同志而点燃的。难道这些刚刚发生事，就那么轻而易举地翻转了？安静中，虽知其人，但我与他没有任何接触；郑伯穰，文革前我根本不知其人，文革开始后因反工作组才知晓，但与他也无任何接触。他们二人都是因反工作组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怎么会时隔不到两年而今又成了反革命呢？因此，高、安、郑问题的抛出（特别是高的抛出），我思想上非但无法接受，而且还觉得革委会在拿自己的造反历史开玩笑，自己否定自己，后果是非常可怕的！但因自己已经逍遙了一段时间，对内中的因由一无所知，加之此间又发生了杨雨中跳楼自杀的事件的影响，思想上更觉茫然，颇有无可适从之感，故在所谓的揭批“高、安、郑集团”问题上，我就以不了解情况作挡剑牌，基本不发表什么意见。

3. 约 68 年初夏，革委会主办的地质学院教育革命回顾与总结展览经长时间的筹备终于在教三楼（或教四楼）揭幕了。这项工作是有价值的，而且也值得肯定。当我们观看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展出中内容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可以证实。第二感觉是：这些探索是在党的领导下，是为践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而进行的。展览的图片、文字和实物都印证了这一结论。与此同时，该展览也向所有地院的革命师生们提出了一个既尖锐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展览反映的现实与文革提出的十七年来教育战线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评价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而且，展览涉及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要部分中，1958 年“大跃进”时，为保证“钢帅升帐”的需要，地院师生在全国各地的为寻找铁矿和勘探铁矿资源的教学实践，恰恰发生在高元贵同志调入并主持地院工作之时，那么，高元贵同志究竟执行的是哪个阶级的路线呢？当我再深入思考看展览过程中产生的这一看法时，我不禁觉得这个展览孕藏着极大的风险，它不仅涉及到对高院长的定罪的否定，更严重的是涉及到对十七年评价的挑战，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当然，我不了解革委会主办该展览的意图是什么，想告诉观众尤其是地院师生些什么，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展览的审查者又是谁？事后对该展览的效果、问题等是否有总结，又是如何总结的呢？今天当我在写这段回忆的时候，我还在问自己：当时看完展览后的感觉，会不会是由于当时自己思想上有些不同的看法、想法而产生的“错觉”呢？但答案是否定的。因我清楚地记得，当看到在

三年困难时期，为减负要求教学中贯彻“少而精”的教学原则时，展览展出现场教学的图片中，就有由我带队的 58 级探机专业在密云边实习边讲解钻机结构课的照片。对此我还问身边的一位老师：这与你们在现场搞半工半读时讲课有何区别？记得当时他回答说，我们回校后，大纲要求对现场讲解过的内容，在室内需进行必要的深化。对此，我当时也说到，那会儿回校后，对设计专业学生还要讲结构设计和结构分析，也是深化呀！所以当时在我的脑海里，就留下了文革前推行的“半工半读”，与困难时期执行的“现场教学”有所雷同。差别可能主要在“半工”上，因为前者学生是以工人的身份定班、顶岗的，而后者仅以实习身份参加劳动，学习和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罢了。展览后来顺利结束了，工、军宣队进驻后尽管干了一系列的整人勾当，但所幸并未对革委会主办的展览是否存在间题进行查证，可谓万幸。而我这个人比较机械，思考问题爱刨根问底。面对工、军宣队没有再去审查教改展览有无问题的现实，我仍在想难道真是简单的疏忽吗？所得结论仍然是否定的！如今我的看法是，文革初期中央之所以反复强调否定十七年，目的就是为了营造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造舆论，一旦这一政治目的达到了，对十七年是否必须彻底否定已经不再是主要问题了。而当时，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给刘少奇做了结论，全国（台湾除外）各级党政机构已经“一片红”了，所以进入地院的工、军宣队的注意力自然没有放在是否有人在为十七年涂脂抹粉上了。

（六）工、军宣队进驻和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

1、毛主席的召见和“自己解放自己”领导方式的终结

文革进行到 68 年夏时，两派之间的斗争越演越烈，不仅全国多个地区出现了激烈的武斗，造成很多无辜群众的伤亡，而且在北京也听到了枪声（清华团派为阻止工人群众的进入学校，公然开枪拒止）。这引起了中央的嗔怒。在派性情绪的煽动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裹挟下的群众，对中央文革的权威性造成了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终于走上前台，显示出他的老练、沉着、胆识和权威。他于清华枪声响起的次日（1968 年 7 月 28 日），在人大会堂召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不抓大方向，成天打派仗的严重错误。并在诙谐和戏谑的召见中指出：你们不怕我，不怕陈伯达……，但你们害怕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害怕解放军战士。毛泽东以这种看似

宽厚、爱护、随和的“谈话”方式，严肃地宣告了要通过适当的手段——军管或派宣传队进驻的方式，终结“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运动领导方式。而这正是文革初期批判工作组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时所倡导的。毛主席的这次面谕，犹如古代北宋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开国武将的军职那样，以“现在该轮到小将们犯错误了”的论断，让五大领袖从文革的历史大舞台上谢幕，这也预告了五大领袖最终悲惨命运的开始！

继 68 年 7 月 26 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后，时隔一个月，按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 1968 年 8 月 25 日，由北京橡胶总厂和空军政治学院联合组成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进入北京地质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之所以能浩浩荡荡地进入高校，实乃因为他们确实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要解决派性、解决两派的对立甚至武斗，实现大联合。有毛主席的尚方宝剑，谁人还敢质疑？！基层只能按林副主席的教导：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但应当指出的是，当时地院内部早已实现了以东方红公社造反派为核心的革委会，时至工宣队进驻时，地院内原有的保守组织（斗批改兵团）已不存在，**东方红内部虽有不同派别，但整个学校内没有公开的两派对立，更没有出现过对立派别间的武斗，与其它大专院校内部普遍存在两派激烈争斗现象相比，这是地院文革进程中最大的闪光点之一，也是地院广大师生员工，尤其是广大教职工群体对以东方红公社为核心的地院革委会最为肯定的一点。**尽管在院内斗批改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在教育改革方面的探索上不深入、不细致；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问题上存在敌我不分和相当程度的派性……。但应当看到，这既与小将们的经历（他们自身尚处于接受高等教育之中，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也）、经验和水平、能力有关；也与所结合的干部更多的是从他们的政治状况和表现考虑的，而对他们自身的受教育水平和以往在教育战线上的作为和能力、水平则注意不够有关。除此之外，必须指出的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如何进行，即使当时的中央文革和主管文教部门的领导们，也从未有过让基层领导能很好领悟和执行的指示或文件出台。时至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时，主席对教改的讲话让人感到也仍是停留在摸索的阶段，出于一种探讨的语气。如主席说：我说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并不是说文科大学就不办了，而是应怎么办的问题……劳

动是最好的大学，不在劳动中锻炼、学习，怎么能写好哲学论文。更有甚者，历史进程已经延续到近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问题能说解决了吗？究竟应当怎么办才能办好大学，怎样才能既要出人才、大师；又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要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要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构架的重任呢？应当说这一难题至今也还远远没有解决，这一看法想必国人还是能够认同的吧！所以，对东方红公社掌权后，在院内斗批改和教育革命方面的相关指责，似乎有欠公允吧。至于在清队（清理阶级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既要看到当时大环境下（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指导一切、衡量一切的指针，左成为一种时尚，深深地烙印在绝大多数人们的头脑中，有所差别的仅仅是左的程度不同而已），左的思潮干扰所造成了一些过失；也应承认掌权后小将们头脑中的“私”字和派性也是造成清队工作中不应有的失误的原因之一。但没有比较就不好鉴别，如果以造反派掌权作为一个时段来比较，与北京地区其他高等院校相比，恐怕应当说地质学院清队阶段所犯的左的错误可以说是最小的吧！

工、军宣队进驻地院后，他们对地院实际情况的把握如何？对东方红公社成立后，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授意下所从事的一切如何看待？对地院文化大革命下一步应抓什么？作为一般群众来说是很难准确知晓的。但从他们进院后于 1968 年 9 月 3 日就急于宣布解散成立两年多一点的《东方红公社》来看，他们对此前在东方红公社和院革委会领导下所做的一切基本上是否定的。他们忘记了，即使在发生了“朱、蒋、杨”事件后，总理和中央文革在接见地院革命师生时，还多次强调：《东方红公社》这面旗帜不能倒！这就是历史，就是地院十年文革历史中必须正视的一段历史，就是在文革初期，为了实现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战略需要时的一段真实历史！但时过境迁，今天，“炮打司令部”的战略任务已经胜利完成（1968 年 9 月 5 日除台湾外，全国山河一片红已经实现），《东方红公社》的历史使命业已结束，因此今后的任务已不再需要这面旗帜，即使它没倒，也需将其拔除而后快！因为，当局的需要已不再是“造反有理”，而是又回到了“驯服工具”的时代。一党政治的统治格局就是这样循回的，这才是符合一党政治结构需要的永恒历史。

但也应当看到，工、军宣队不管他们内心多想彻底荡涤造反时期留下的一切，但一方面有工作组的前车之鉴在先，过急反会脱离群众，有还乡团变天的嫌疑，

犹如电影中的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一样；另一方面，造反时期产生的“五大领袖”的光环虽已暗淡，但尚未完全消失（如王大宾仍保有院革委会主任、市革委会常委等合法头衔）。因此他们就以合法的身份，采取迂回的方式，以整风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为口实，通过“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红化、献忠心”（“红化”是指将购自市场的毛主席像、语录等，外边再镶一个用红纸条做的边框，然后再贴（或钉）到墙壁上；“献忠心”是指让群众制作各种推崇毛泽东的手工制品如雕塑、绘画、烙竹等，表达对领袖的忠心）等一系列造神、奉神、尊神、敬神的手段，对两年半来犹如脱缰之马的广大群众进行皈化教育，达到驯服的目的。应当承认工、军宣队的这一手是聪明而有效的，尽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这类宗教似的礼仪难于接受，但在毛泽东已被神话供奉多年的政治环境下，谁也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一令人窒息的“礼仪”，顶多只能在私下议论议论，但还得谨防告密者，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应当看到，高校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工、军宣队进驻时两派矛盾尖锐甚至发上动武的现象，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广大学生群体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唯我独左，唯我独革”思想侵蚀的结果。若不很好地解决小将们思想上的这些问题，大联合也就无从谈起。而高校问题要想真正按斗批改的思路进行到底，解决好工人阶级占领高校阵地问题，则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变成了高校教职工队伍的清理、改造、充实和建设问题了。所以在工、军宣队进驻后的整风中，对学生和教职工队伍态度和作法上就不尽相同。套句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就高校而言，学校本身和支持它正常运转的高校教职工群体就是“营盘”，高校内的学生则是“兵”。所以对这两个群体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待也是中央派驻工、军宣队进校决定中应有的题中之意了。

就学生群体而言，在这种“天天读”和学习最高、最新指示的氛围下，宣传队还通过小会、大会讲读、作报告，通过典型写文章在报上发表造势等手段树立典型，向广大群众宣传大联合的样板。这样既可展示他们的工作业绩，显示他们进驻高校就是要落实中央指示，促进两派大联合的初衷以博得人心！应当看到，工、军宣队这种大联合的工作，主要对象是针对学生群体，解决好两派学生间存在的对立情绪。如前述地院的实际情况，要做到这点相对是比较容易实现的。而对学生中的个别人的个别问题，也不一定非要在校内运动中彻底解决，解决不了

的可以放到社会上去解决(待学生毕业分配后,由接收单位去处理),但这要视学校运动进展的整体需要而定。且当时应于 66 年毕业的学生,到 68 年底已经开始进入毕业分配阶段,陆续准备离校。应于 67 年毕业的学生,在 69 年春夏之交也进入毕业分配阶段了。到 69 年夏,在校学生的主体只有 63、64 和 65 年入学的学生了。

相反,对教职工群体而言,相对就比较复杂。因为在教职工队伍中,自 52 年院系调整至 68 年秋,已经历过思想改造、“一边倒”(全盘照搬苏联的做法)、肃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直至今天的文革等历次运动,队伍本身虽已有了很大的调整和变动,但每个人的历史经历和政治面貌、家庭和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都远较学生群体复杂得多。而且他们彼此间的关系特别是党群关系远非学生那么单纯,尤其在地质学学科内,因地质界的学部委员(今天称中科院院士)较多,都有相当的学术造诣。在科技手段相对比较原始、落后的 20 世纪 20-30 年代,他们对中国地质科学体系的建立、发展,均做出过程度不同的贡献。如何做好这批老知识分子的工作,让他们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也是党长期来统战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由于这部分人在地学界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今后只要不是政治问题,加之他们的年龄相对较高、体质相对较差,估计不会再出现运动初始时发生的那些粗暴批斗的做法。但他们对地质教育究竟是以理科为主还是以工科为主,长期来争论不休。内中有些实质上是学术问题,但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月,也都被上纲为政治问题,使原本学派上的歧见也被涂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譬如,就连学校名称是“北京地质学院”或“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就争论了数年之久。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远非靠政治运动式的争论就能解决,它既需要严谨的理论探讨,也需要科学的实践总结,才能最终求得大家认可的方案。此外,就是如何对待一大批中年骨干教师的问题。他们是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可以说是挑大梁的群体。他们大多毕业于解放前期或解放初期,涉及到地院未来发展的根基。这批人家庭出身好的不多,社会关系相对也比较复杂,但经历了解放前后的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对比性的影响,在政治上是爱国的、是相信共产党的。他们中有相当一批党员,甚至是解放前就加入党的地下党员,也有的是一解放就被派往苏联去留学的人员。这批人有相当的业务能力和政治上的敏锐性(文革前就被赋予双肩挑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典型),所以这些人 17

年来日渐成长为党在学校各层面上的依靠和领导力量。这部分群体因与十七年教育系统的发展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相当一部分人或出于个人理想主义的认知，或出于个人发展和立足的需要，长期来都表现得相当左，在校内的人际关系上并不理想，这也是文革初期，这些人普遍均受到了程度不同冲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工、军宣队进驻之前，这批人中只有少数人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并被结合进入到革委会内，而大多数则多处于逍遥和观望之中。但与其他高校相比，无论在东方红或革委会时期，在我的印象中，均并未对他们采取过激烈的打压、强迫劳动或隔离审查等严重侵犯人权的措施，这也是地院在造反派掌权时期的一个亮点。即对于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干部，在整肃中尽管也犯有一定的错误，但左的程度要好许多，故地院干部和教员在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相对于其他院校要少许多。尽管我拿不出具体数字，不了解地院、北京市、乃至全国在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作比较，但笼统的感觉和印象也是不会骗人的！可以肯定预判的是，今后这批人中的相当一部分将会通过适当形式继续成为工、军宣队管理学校中的依靠力量。因为谁都清楚，没有一批能够被驾驭的得力干部，外来的宣传队是无法领导整座高校的。教师队伍中最后就是一大批 30 岁左右的年轻的教师队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院系调整后考入高校，毕业后再被分配或留在高校任教的。这中间还有一定数量留苏学成归来后被分配在高校工作的。这部分人的政治积极性是教师队伍中最高的，绝大多数都积极靠拢党组织，有相当一批人本身就是党员；在业务上，能留在或分配到高校工作的，也都是原来各自专业领域内的学习尖子，但缺少的是专攻和实际上的工作能力。这批年轻教师被誉为“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作为改善高校教师队伍政治素质的一项组织措施，用来充实高校教师队伍，成为原高校党委重点依靠和培养的对象。但因受十七年被否定的影响，加之他们在文革开始后的表现，如今在工、军宣队心目中也还需有一个梳理、鉴别的过程，合格的肯定将会成为清理、改造教师队伍工作中的重要依靠力量。

基于上述的分析和认识，我觉得大联合只不过是工、军宣队入驻后领导运动向纵深发展的一个切入点而已。他们最终想要解决的仍然是揪出高校领导系统中的“黑线”人物及其在教职工特别是教师中的代理人，建立工人阶级在高校中的领导地位。而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入驻高校的工、军宣队的领导。因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指导下，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必将继续下去。有了这种认

识，也就给自己在今后的运动中打了“预防针”（面对工、军宣队的言论，少较真，因我有这种毛病，特别是对那些自诩为改造别人的领导，从来不服）。而且，因我已成家，彼此恩爱有加，而且她也已怀孕，无形中多了后顾之忧，故以少惹事为原则，成了我对自己日后处事的告诫！这时的我自持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虽家庭出身不好，但自 1957 年下半年起，我就和家庭失去了联系（我继母连同他的子女搬离了原来的住处，因我不知他们迁往何处，故就此失去了联系。同时，自解放后我父亲前往石家庄参加整编起，我也从未与他有过任何联系，甚至从未见过面），同时有过“反干扰”时期对所谓划不清界限的公开交锋，对可能来自家庭出身的压力也觉得不是很大的问题了。尽管文革初期我因反工作组被扣上反党、反革命小游鱼的帽子，但随着《十六条》文件的公布，工作组已被定性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否定，所以在这点上，我也觉得宣传队不可能再做什么文章。据此，我觉得今后在运动中只要自己不对工、军宣队的安排、决定妄加评论，学习、讨论中，尽可能少说或不说，即便必须要表态的，也以正面的方式简单说说就行，避免别人抓“辫子”。我想，只要注意了这几点，自己今后应当是“安全”的。由此可以看出，文革开始时抱着要按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锤炼自己的我，两年半后，已然变成了一个“苟且偷生”只图平安过日子“庸人”了。作革命接班人的“梦”从此碎了，这也算时势造“狗熊”吧。确实可悲呀！但值得让人思考的事是：为什么一个而立之年刚过，原本充满革命激情、追求进步，努力想把自己锻炼成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青年，在经过了两年半的文革后，会失去了信仰，放弃了追求。难道这只能责怪其本人的懦弱、经不起考验，或批判其是自身阶级本性的使然？但我可以坦诚地表明自己的心迹，那就是我不会接受这类套话式简单化的结论，但我确实承认自己变了、“退缩”了的这一现实。面对现实的社会，为了自己更为了家人，我认定今后只能远离政治，不再参与任何政治运动，在政治上做一个庸人（不问政治）。但必须在给予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以报答祖国和人民的培育之恩。为此，我当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为人的底线，即：政治上做一个庸人，不参与政治斗争。这并不可耻，因为搞政治的必定只是少数人；但就社会而言，必须做一个好人，作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应当说，自 1968 年底至 2002 年 4 月退休止，我没有违背自己的许愿，就是按照这一原则走过来的。

2、渐次被划入遭清理的行列

随着 1968 年 10 月 31 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中央夺权——已经完成。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三重罪名被永远清除出党，林彪被正式指定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最可靠的接班人。为了让人承认、接受并巩固这一胜利成果，在全国范围内还要继续清算、肃清他的影响，并挖出其在党内的党羽和持有异议的民间人士。

在此形势下，地院工、军宣队于 68 年 11 月以全院大会各学生班级大联合成果介绍的方式，“含蓄地”宣布地院已实现了两派的大联合，所谓的整风就宣告结束了。此后，一方面需要按中央的统一部署，着手处理各届在校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将高校内的学生分配问题作一了断；另一方面则将工作重点转向对教职工队伍的清理。前者可依靠学校人事、政工系统的工作人员来完成，而后者则成为宣传队自身的工作重点了。

就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期间，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即大约在十月中下旬的一个星期天，我去王府井大街北口东侧中国工商银行储蓄所取我一笔到期的存款。当我填好取款单并和存折一并交给柜台的工作人员后，她问我你都取了？我回答道：连利息一起都取了。她让我等一下就起身去到后边的办公区。我在窗口等了比较长的时间后，她与一名年岁较大的女工作人员（我估计是该所的一名负责人吧）一起来到柜台，并问我：这是你的存折吗？我回答后，她又继续问道：你有证件吗？我边问：现在取钱还需要证件吗？边将自己的工作证掏给了她。她拿过我给她的证件看了一下后又说：你等一下。说完就转身又回到后边的办公区去了。这事当时搞得我一头雾水，从来银行标榜的都是“存款自愿，取款自由。”而且一直以来我从未听说取款还需要查看证件的事！正当我纳闷时，偶然抬头张望看到墙壁上“存款自愿，取款自由。”的标语照旧堂而皇之的贴在储蓄所的墙壁上，真是绝妙的讽刺！既让我不解，又令我气愤和无奈，只能乖乖的等该女性出来后给我一个说法了。我等了大约有十几分钟后（六十年代时，银行业务量都不大，一般存取狂业务几分钟内即可完成，等十几分钟的事可属罕见），终于看到那名看似领导的工作人员出来了。见面后她对我说：这钱今天你还不能取，需回单位开个证明后再来取（六十年代末国内尚无电脑、网络，人们在银行的那个店铺存的钱，只能还在那个店铺提取）。我问她为什么

要开证明，开什么样的证明？她回答道：这是新规定，证明这笔款是你的，可以提取。当时我并不清楚此事的原因，但当时的政治态势下，我也不想与之争辩，只能拿了我的证件和存折回到家中。

第二天周一上班我就先去教研室打了招呼，然后去系办，说明昨天在王府井银行取钱时，对方要求我回校开具证明的事，并给他们看了我的存折。当时系办由张有容老师负责，听后他说：我们从来没开过这种证明，等我问问院里，再给你答复。工间操时张老师到教研室找我并告知：院里也说从未开过这类证明，不知有什么新规定还需请示，并让我别急，同时还问我是否等钱用？我回答道：我并不着急，只是钱到期（已过期几天）了，我取出来想换到五道口银行改存活期，这样也近些，存取方便。因为昭明的预产期十二月中下旬，此前还需买些分娩前后母婴需用的东西。说毕，张老师再次嘱我别着急，他会尽快去沟通问清楚的，对此我向他表示了感谢。

没想到的是，当天中午在教工食堂前的大字报栏上就贴出了 7165 级的一张大字报，质问我为什么要取钱，哪来的那么多钱，令我老实交待！对这张大字报我真有些“莫名其妙”之感，但我深知此事与张有容老师毫无关系，纯属一些想整我的人在千方百计地找茬儿，我当冷静面对，先静观事态如何演进再说，不必急于回答。

当日晚饭后有一学生来家叫我去教研室回答大字报的提问，我应召前往。到教研室后看到除五、六名 7165 级的学生外，还有参与教研室领导运动的军宣队人员叶 × × （一名连级干事，是教研室核心组的成员。平常他在教研室的会上极少讲话，也可能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谈或因稍有口音不愿讲话。但他有点艺术细胞，经常可以看到他给一些制作歌颂毛主席作品的老师作指导或代为修改），但没有任何老师包括核心组的老师在场。因此让我意识到，这是军宣队牵头而让学生们出面对我取钱的事进行“开审”。叶 × × 见我到后还是比较客气地让我坐下，并接着问道：学生给你贴的大字报你看到了吗？我做了肯定地回答后，他又继续说道：那你就把他们提出的问题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清楚吧！面对这种提审的方式，我内心是很反感的，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而且又完全是自己私人的事情，我又没偷没抢，也非非法收入，学生不懂政策，难道军宣队也不懂得？！但我从银行让我开证明时就意识到绝非个别人的胡作非为，肯定有相当的背景，

只不过我不知道罢了。因此尽管内心反感，但理性告诉我，不能用对立态度来处理。因此我还是用比较平和的口气，将我在系办与张有容老师谈为何去取钱的话重复了一遍，至于哪来那么多钱的问题，我明确而沉稳地向学生们说道：除了我个人的工资之外，我没有其它的经济来源。存折里的钱都是我劳动所得的节余部分，因我成家前没有任何经济负担，如俗话说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平时自己也比较节俭，再加上四清一年的开销更少，三年前积攒下来的，都存在银行里了。面对我的回答，学生们一方面似乎觉得所言属实也有道理；但好像还不大愿意就此放过，故又有学生问道：你为什么现在取钱，你知道不知道，现在很多有问题的人都到银行去取钱？我回答道：你说的情况我前段时间在大字报中看到了，是揭发 ×××（当时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好像是一位系处级的女领导，但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去银行大额取钱的事情。但我的情况与她不同，因一方面我的三年期存款刚刚到期（已过了四、五天了），需要去银行办理手续；此外，我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家中确实需要添置一些东西，要用点钱。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存款地点改到五道口办事处来，这样离家近点，今后存取会更方便。至此，学生们再未提出问题，彼此交换了会儿意见后，叶代表对我说道：今天对你的提问就到这里，以后有需要时，还会找你的，要有思想准备。现在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了，每个人在运动中都要接受群众和组织的审查，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叶代表的简短小结可谓滴水不漏，既把非法“提审”干预公民个人权益的违法行为，说成为“每个人在运动中都要接受群众和组织的审查”，又提醒了被审查者应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和接受这类审查。从叶代表的小结中也间接地能辨别出他的言外之意是：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我已被定为审查对象了！看来新的厄运又将开始，这将不以我的意愿为转移，只能做好精神准备，真的需要“正确对待”了。

现在想想，共产党接管政权迄今已六十六年有余，仅在毛泽东主政的二十七年里，所进行的各类运动我能说的上来的就有：土改、镇反、思想改造、高饶反党集团、肃反、合作化、整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反修、文革等达十一次之多。运动的频度已接近每两年半搞一次，近乎达到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提出的今后每两年要搞一次文革运动的要求。而每次运动经历的时间（跨度），少则数十天，多则几个月到一两年，更有甚者，文革运动历时十年有余！由此可以看出，表面

上看是两年多搞一次运动，实际几乎是一个运动刚搞完，另一场运动又粉墨登场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每次运动中都会有一批人（或党内、或党外；或多、或少；而且有一定比率要求）会以各种不同的名目受到审查，并被处理。此外，每次运动，都会部分停工、停产、停课，或占用工余、课余时间超时进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生产次序和人民的生活次序，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受到极大的损失和干扰。在共产党领导下这类人与人斗的内耗，其残忍程度，对国家和百姓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华大地有史以来之最吧！我多么渴望，在当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许诺下，能责成国家的权威部门组织相关人员对二十七年来历次运动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做出一个科学而权威的真实统计，并公之于众，以警示执政党自己和国人，确保今后再也不犯此类过失（实为罪行）了。

“提审”后两三天，张有容老师找到我说：没事啦，你就直接去取钱。不用开证明，学校也没法开这种证明。都是银行自己在哪儿瞎胡搞，乱弹琴！说毕我向他讲述了学生“提审”的事，他笑笑摇摇头，嘟哝了一句“瞎搅合”就走了！

这笔钱事后我也没有时间去取或办续存手续，因一方面手头的钱还够，而且进入69年后，我一直忙于应付，真没时间进城去办此事。直到70年4月，因孩子在京被烫伤住院救治，昭明回京料理时，才将这笔款（近八百元）全额取出都交给了儿童医院，但作为孩子的救治费用还不够（因我们当时去五七干校时，孩子还不足一岁，故未随行。为此，学校强行终止了职工子女医疗统筹的政策照顾，故全部医疗费用均需自己承担。这就是地质学院工、军宣队对待广大职工施行的非人性的铁腕政策的一个侧面缩影），不足的部分还是由我姐姐垫付的。回忆写到此时我心潮激荡，愧疚万千，泪水止不住地流落下来。这是因为事后我忘记了应将姐姐垫付的欠款及时奉还，尽管她不会在意也并不缺钱。但这样做却能显示出我已真正懂事，不再像以往总让她惦记和担心了。她疼我、爱我，关心我的家庭，疼爱她的侄子。若非她坚持让照看孩子的阿姨将孩子马上送医院，并陪同前往就医检查，当确诊为烫伤处已因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导致急性败血症，北医三院因无有效药救治已拒收时，是我姐坚持再送北京儿童医院，在使用当时的新药红霉素后，孩子才得救。否则，我儿子的小命就会因阿姨的隐瞒和耽搁而送命了！如今我姐离我而去已近二十载，我只能写下这几个字，以此寄托我们全家

人对她的思念和感恩吧！

3、一场“风波”

进入 69 年后，我心里最着急的是二月中下旬昭明就将分娩，如何安置才能让她产后得到很好的休息，以保证母子的身体健康。因为此时她娘家自住房的产权在文革之初已“自愿”交公，房产改由房管部门管理。但在文革的特殊政治形势下，房管部门根本不考虑该住房是老人将自己的私房产权无偿交公后，再改为自己租用的事实。房产上交后不久，他们就来人以在册户口人数过少为由（当时只有我岳母和他的孙子两人户口在册），通知老人住房面积超标，必须调整。并以照顾不迁址的美言，强令老人家退出她原住的两间正房，迁入另一间主房和一间厨卫合一的房间居住。但因居室面积骤然减小一半以上，家具、钢琴（是老人婚配时的嫁妆，后来成为昭明的心爱之物，55 年报考大学时她一度曾想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等杂物实在无法安置。在这种情况下，房管部门同意，将钢琴等放不下的东西，暂时寄存在已腾出的两间住房内，待全部物件处置后，再将空房交由房管部门管理。就这样，一位来自农村本人是中农成分的无业老人（当时已近七十高龄），就因为其丈夫被诬为反革命（昭明父亲——刘锡嘏——是 1923 年清华学堂毕业生，毕业后以庚子赔款保送去美国普渡大学留学，学土木工程专业。学成后，于 1928 年回国，解放前就职于开滦煤矿任总工程师。为确保开滦煤矿进出口海运的需要，整座秦皇岛市从渔村变成了一座设施完备的海港城市。在秦皇岛的历史变迁中，从刚去最初的选址踏勘，再到城市和港区的地质地形勘测、市区和港区的勘察设计、城市和港区码头规划和设计、一直到建设施工的全过程，都是在他一手负责下完成的。为了保证港口码头的选址正确，他甚至身着潜水服潜至海底，观测海流不同季节的变化，补取海底岩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对秦皇岛市耸立在神州大地的渤海湾畔，是居功至伟的！但解放后，在开滦煤矿总经理为推诿己罪——令刘锡嘏将秦皇岛港口水深航道图带到天津开滦总部，面交交美军并作说明。从而促使蒋军很快经由秦皇岛港登陆，开赴并占领东北——的诬告下，一个无党无派的爱国知识分子，为此竟被判定为反革命罪，险被枪决。但后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后又改为 15 年监禁而监外执行，以便利用他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继续为秦皇岛市和北戴河的建设和发展服务。他于 1964 年由于立功表现，被提前 2 年释放，在秦皇岛市建设局工作到 1974 年退

休。最终历史宣告刘锡嘏无罪，他老人家终于到 1980 年去世后获得平反），而几乎被扫地出门！这也是文革欠中国人民一笔迫害债的缩影！

随着堆放的东西逐渐清理，钢琴则被抄走（落实政策时，得知钢琴被中国芭蕾舞剧院占用），大约到 66 年十月，那两间住房就全部腾空，交给房管部门。这时，在同院住户王淑兰的暗中窜夺下，大约在 67 年春，房管所就将此房改租给王淑兰住了。这种无偿剥夺私人房产，还要下狠手砍上一刀，削减老人一半以上的住房面积的恶劣行径，在中国的文明史上，大约也算前无古人了吧。由此，昭明产后就不可能再回娘家居住了。为此，我只好与我中学时好友的母亲商量，看看她老人家有无可能帮我一个忙。幸运的是老人家毫不犹疑地答应帮我，同意让昭明产后搬到她哪儿与她同住，并帮忙照顾昭明坐好月子。这样我心中的一块石头就算落地了。

孩子于二月中春节前降生了，尽管难产，大人受了很大的罪，但母子均还平安，这就算万幸了（因属大龄产妇，又处于管理比较不规范的文革年代）！出院后，昭明在我同学母亲家住了一个月。一切还比较顺利，母子休息也还可以。但因昭明不太习惯让她不大熟悉的老人照料，觉得于心不忍，所以精神上总有些紧张、不自在，从而对她的休息多少有些影响。所以孩子满月后，他们母子还是搬回了娘家，挤在厨卫同室的小间屋内，白天请一名阿姨来家照料孩子。直至昭明产假结束后（因难产，产假比顺产多 10—15 天），她回校“上班”（实则除搞运动开会外，主要是在学校机工厂的车床上干活，生产掘进教研室研制的钎头库体），孩子仍留在姥姥家，由阿姨照应。

上述经房管部门帮忙逼我岳母退租了两间住房后，她自己得以入住的邻居，自从昭明母子回娘家暂住后，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经常让她的孩子们敲打墙壁、窗户（老人被迫腾出三间主房中的两间后，房管部门在其间打了隔断，壁厚很薄，所以敲打时响声很大墙壁震颤的也很厉害），吵得孩子经常被吓醒而哭闹，同时也影响大人休息。为此，我回家之后，曾过去跟新邻居的主妇（王淑兰）很客气地打了招呼：希望她能让自己的孩子们注意不要老敲打隔墙墙壁，因我们的孩子刚出满月，经常被吓醒后啼哭不止，望能体谅！但打招呼后毫无效果，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原打算还是回到学校去住，我争取到教研室的实验室暂住一段时间。回校后，我将家中的情况向教研室领导作了汇报，并提出想暂时到实习室住一段

时间的想法。但领导面有难色地和我说，因半工半读教研室是 66 年初刚组建的，探工系的所有实验室仍归原全日制教研室管理，复课期间少量的实习课也需经他们来安排，以不妨碍全日制班级的教学活动为主。所以我们有难处，不好答应你！看来领导也并非不给我面子，情况也确实如此，不好让领导为难了。后来我与昭明相商，决定先凑合一下，等天气再暖和点后，孩子就可以搬到厨卫合一的房间居住（因此房间较凉），他们再吵时的影响就会小很多了。

但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五一”放假期间，我回岳母家帮忙将取暖煤炉和烟筒拆除后搬放到四合院的院子里，然后再拿到街门外的胡同里清除烟筒里的煤灰。当我在院门外胡同拐角处每清完一根烟筒后，就先将清好的烟筒送回院内姥姥住房的窗跟儿下面，再拿一节没清过的烟筒出去继续清理。往复几次清理后，当我把最后一节烟筒清理完毕带回院子时，发现原已清好并堆放在窗跟儿下的烟筒几乎均被踩扁，散落在房门门口。面对这种欺人太甚的恶劣行为，我真是气极了。但我还是压着内心的火气，对正在院内晾晒被子的邻居主妇问道：老王，这烟筒是谁给踩扁的？她竟回答道：我怎么知道！我接着问道：我进进出出，每次均看你在院内晾晒被子，你怎能不知道呢？何况，我把烟筒堆放在他姥姥住房的窗跟儿下，对你晾晒东西也不碍事呀！对我的质询她气急败坏地吼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啦！这时，她老公（柴 × ×，是北京公交部门的司机，转业军人）手握一根一米五左右的长木棍，从屋内冲到我面前喊道：嘿，干嘛，你想打架呀？！面对来者的蛮横架势，我冷冷地道：柴师傅，您这是说啥呢？我是好言问您爱人是谁把我们家的烟筒踩扁了，那来打架的事！面对我的回答，他一时不好发作，拿着棍子的手也放下了。这时我看他们又出来一名年轻女性，一手拿了把菜刀，另一手提了一把拖布从从住房里走出来，并将菜刀交给了王淑兰。看到这架势，我知道是祸躲不过，要动真格的，就得做好心理准备！面对这三个人，我毫无畏惧，而且我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要想制止这场恶斗，就必需先制服姓柴的，不能去和女人斗！因我知道柴某是复转军人，若是步兵，手中又握有棍子，若使起枪刺动作，还真不好对付。但他是名司机，估计很可能是汽车兵复原的，即使会使枪刺，水平可能也有限。自己先别心虚，只要能近身，我还真的不怕（因我初中时参加过拳击训练，懂得一点格斗和近身防卫的技巧），而且近身后，棍子就很难发挥作用了。总之，只要他不擅长枪刺格斗，我就有绝对把握拿下他。

当他也看到他老伴和另一女性也手持器械站在院内时，底气好像又足了，说道：她已经说了不知道，你还缠着她不是想打架是干啥？边说又迈了一大步，与我的距离已经不足一米五了，而且两个女人也围拢过来，我近乎被围在中间。这时我挪动了一下双脚的位置，斜身保持着对柴某的最佳占位，同时，因我这时看到一位街道办的女性刚从北屋出来，就放声对对他们喊道：你们别想动粗斗狠，那是犯法的，街道的人也在可以评评理。若要动粗我接着，绝不客气！这时只见街道办的人慢慢移步站到晾晒的被子后边，想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而柴某则慢慢挺起胸部，看来是欲挥棒打人了。这时我想机会到了，一则他不会（或不善）枪刺，我无忧了；二则，只要你挥棒，我既不躲也不挡，立马纵步近身，挥拳猛击面部打你个满脸花，让你啥也看不清，拿住后，让两个女的罢手就没问题了。事情的进展完全与我一闪而过的预案一致，对方是仰身挥棒横扫打向我的上身，我则纵步一拳猛击对方正面偏左的鼻口眼的交汇处，柴某一个踉跄差点跌倒，满脸是血，棍棒也丢失一边了。这时两个女的也傻眼了，又哭又喊地对街道办的人说：他打人了打人了。这时我也看清楚街道办的人已经从晾晒的被子后边走出来了，同时也看到王淑兰手中仍拿着把菜刀。所以我立即朝街道办的女同志走去，并指着王手中的菜刀说道：同志，您也看到了，事情不是我引起的。柴师傅打人在先，王淑兰还拿着菜刀，我不得不自卫。街道办的人明知我说的是实情，但在什么时候都以阶级路线为前提，不能只看事实。所以她只能避开实情说道：你看，你把人打得满脸是血，先处理一下，然后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再谈。当柴某处理完面部的血迹后，我们一起去到派出所。街道办的人先在另一间屋里将情况与派出所的人讲了（估计讲的还是实事求是的），后来派出所的人让我们各自讲明了情况后，同样不便依事实真相处理，而以和稀泥的态度说道：你们打架是不对的，以后不能这样。柴师傅出了不少血、牙也掉了一颗。因伤的治疗费用和误工费用，要由你承担。这一处理意见显然不公，而且烟筒被毁的事只字未提。但那个时代，哪有什么公道可言。所以面对柴某不敢再提任何异议的情况下，我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只能吃个哑巴亏吧！

4、搬 家

事毕回到岳母家中先将在派出所的情况说明后，我匆匆将散落在院子里的已经不能再用的瘪烟筒收拾起来，将仅余的两三节能用的用废纸张包起来存放在室

内。回屋后，昭明对我说当时她的双腿已经吓得都站不住了，姥姥也非常担心。对此我只能好言安慰一番，并告诉他们我现在的想法。我说：回校后立即将今天发生的情况向系里如实汇报，这样可以避免他们恶人先告状，让我们处于被动解释的地位。二是，老柴家这回吃了点苦头，但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不断找茬儿，欺负老人和孩子。所以，今后继续住在这里对姥姥、小益——昭明侄子和儿子的安全都不利。我想将这一情况向学校领导说明白，请学校行政部门看看校内职工是否有人愿意换房住到城里，因为姥姥家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市内最好的地段了（东城灯市口东），看看有无可能帮忙了解和协助调整一下。因为这涉及到职工及家属的人身安全问题，我估计也许会引起领导重视的。昭明同意我的意见，对我的想法老人也丝毫没有故地之恋，完全同意。我岳母是一位极其理智的老人，尽管她只上过四年私塾，但遇事孰轻孰重，她内心却明镜似的。如“红八月”期间经历了红卫兵的查抄、罚跪、抽打后，对这些非人性的野蛮行为，她没有畏惧，也没有逃避。事毕，她老人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好家中全部细软、现金存折和房契、地契（文革之前，私人房产包含房产和地产两部分，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房产税和地产税。但随着土地收归国有政策的执行，地产部分实际上就等于被国家无偿没收了），然后亲自送到街道办事处上缴。她内心深处担心的不是自家的钱财，她说过，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她老人家担心的只有她已经辛辛苦苦带了近十年的长孙，希望她孙子能有一个既有安全保障，又不会受到歧视的生活、学习环境（“红八月”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孙子不敢去上学，因在路上经常被同行的“红小兵”打骂，在学校里红小兵们不愿和他玩，他自己对红小兵的“神气”劲儿，既羡慕又自卑——事实上孩子父母都是解放后上的大学，当时都是沈阳医学院的老师和大夫，但就因为他爷爷的问题而受牵连。为此老人只能自己亲自接送孙子上下学，尽管她本人还是缠过足的小脚，每次接送要走很长的路，但老人都咬牙挺过来了）。她老人家的这段经历都是我婚后我才知晓的，这一切令我感触不已，直到现在，我都很难想象，对这样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当初需要何等坚强的信念方能走过来呀！？

回校后，我立即将在岳母家和邻居争执、打架一事的前因后果向系里作了详细汇报，并提出为防止邻居挑衅、报复，希望能请学校行政部门协助和帮助我们解决一下换房问题。对我的汇报系里未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对我打人的事提出

批评，也就是说对事件的是与非未作明确的表态。但对协助换房一事，却一方面让我去找相关部门联系，另一方面也说他们会就此事和行政部门打个招呼，请他们帮助解决。

汇报后，我立即到院行政处联系，并向他们简要的说明了希望学校协助换房的原因。行政处表示探工系已打过招呼，但他们需要与房管科的人一起摸一下情况，然后再看有无可能。而且表示他们会抓紧时间处理的。

因那时我的心情异乎寻常的紧张，故当时系和行政处是谁接待我的，以及当时的场景，现在竟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但他们在那个年代能理解我们当时的困境和急迫感，我和家人是永远记得并感激他的。如果他们至今依然健在，就请接受远在万里之遥的我和我的家庭对他们的真诚祝福和由衷的敬意吧！

为了防止对方报复，我和昭明决定，我每天回家过夜，以便让老人能够安心，若有情况，也好应对。昭明虽同意，但千叮咛万嘱咐地要我遇事一定冷静，即便吃点亏，也不要引发正面冲突。对此我表示一定遵从。

大约三、四天后，房管科的人就给我带来了消息。说有一实验员奚 x x，现住眷三楼 316 房间，有意换到城里住，但要看看房子再定。他也向我介绍了奚的住房情况，说她与另一家共住一套四居室的房子，她本人住一大一小，居室面积共 20 平米多点。你们可以先互相看看，若双方同意，就可来办换房手续。并告知她一般五点以后就会在家。这一消息令我异常高兴，当天下午五时左右我和昭明就前往联系。见面后，昭明向她介绍了她母亲住房的情况，她表示想去看房后，又定下了第二天一同去看房的时间。同时她也让我们看了一下她的住房情况。回家后我们觉得房子还算可以（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房管科尽管帮了我们的忙，但也打下了他们自个儿的埋伏，最终出于安全和老人为确保孙子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考虑，我们也只能依从、就范。这是后话），只是住在三层，姥姥是否能够适应，还需要与她老人家商议后，再做决定。第二天如约带奚某两口子一同去看房，看毕他们对房子本身和住处环境均很满意，表示只要我们同意，就可以立即办理换房手续。我们也告诉她，因她家住三层，老人能否适应，需听听她的想法，若老人同意，我们明天就会告之，并抓紧理办手续。送走奚某夫妇后，我们又与姥姥仔细商量很久。姥姥明知上下三楼对他这样一位缠足老人是十分困难的，但她心中从来没有自己，一生心中所想的都是子女，而今又转到了孙辈的

前程，令人可敬可亲。商量时老人反复说：换房很不易，就这样吧。上下楼难，我慢慢练着，还是孙子们安生要紧！看到老人的坚定态度，而且这时小益听说要搬到地质学院去住和上学，高兴得不得了（因他小时暑假曾在昭明宿舍住过，喜欢哪儿的环境）。同时我们也考虑到小益已快十一岁，他也能帮奶奶外出买些东西了，所以也就下决心同意与奚某换房了。

当换房手续办好后，如何搬家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家中有老有小，昭明产后的恢复也不理想，而且当时我正面临军宣队对我进行审查的时刻，找谁帮我确实是个难题。如今已记不清学生们是怎么得知我要搬家的，但大家对我们的那份关心和帮助，至今却记忆犹新。记得当时 7162 的白秀春、7163 的王文翰等部分学生向我表示，他们可以组织同学来帮我，让我放心。白秀春甚至气愤地说，我在城里找一帮中学红卫兵，去他们家（指王淑兰），看他们谁还敢欺负人！对他们的直率和热心我表示由衷地感激，但对他们想打抱不平的激愤，我则非常担心地对白秀春说：你可千万别惹事，你真这样非但不是帮我，反倒会把我放到了蒙骗你们搞阶级报复的危险境地，到那时真是百口难辨了！我心领你们的情谊，但千万听我一劝。白秀春是一个讲义气的孩子，是北京地区的考生。67 年夏，学校邀请解放军来院表演潜水囚渡等军事游泳课目，让我开摩托带他去玉泉山那边解放军某部联系接洽，经过那段时间的相处，彼此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了。毕业后他分在山西冶金系统，后还多次到学校来看望过我们。可惜因身体原因，在 90 年代中后期就过早谢世了。

有了学生的帮助我就没急了，很快与奚某定好了同时搬家的细节，顺利地将我岳母从居住了 22 年的故地搬入了地质学院。老人在地院住了八年多，于 1977 年春过世，享年八十岁。

搬家时有件“趣事”不得不提一下，那就是白秀春尽管听取了我的劝告，没有招一帮中学红卫兵去“示威”，但却让参与搬家的学生每个人都打扮的精精神神的，每个人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而且胸前还佩戴着《东方红公社》的徽章（尽管东方红公社当时已被工、军宣队宣布解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专门让别人看的。而且，在车上白还叮嘱我：宋老师，搬家时你啥也别动，指挥我们搬就成。让他们也知道咱宋老师是什么人，谁还敢欺负！我只能不得已的苦笑道：你们也别太张扬了，平平安安就好！从这件所谓的趣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文革

期间提倡的诸多行事风格和口号中，诸如：横扫、砸烂狗头、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有权就有一切……，不仅毒害了一大批自持出身优越而心存杂念和私心的人们，也使很多心地善良、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的小将们受到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而对这种影响失去警惕，任其发展则是危险的。但不得不说的是，小白的这种安排，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从当时在胡同和院落里看搬家的群体中，我看到除了街坊邻居外，还有街道的干部、积极分子，甚至还有一名穿白制服的派出所民警，但王家自始至终没有一人在院子里观看。从他们异样的眼神中可知，他们对老太太家能得到这么些红卫兵学生的帮助是很难理解的！我自己不自觉的也从中感到某种欣慰，但我也真的深知，这类做法的负面作用发展下去对小将们的健康成长是有害的。

当我们搬家顺利完成并基本安排下来后，我立即去房管科一是表示感谢，二是办相关手续。但没想到房管科的人说：根据院里的房管政策，职工和家属不能占用两处住房的规定，你必须与你岳母合住，将原来分给你们的结婚用房交还后，再来办相关手续。同时还拿出相关的材料让我看，表明他没有骗人。对这种预设埋伏的做法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我还是力争了一下。我说：学校的规定当时我不知道，换房时你们也未提及。再说，我们是换房，双方是对等的，当时很明确说的是用我岳母的住房与小奚的 316 住房换，并未涉及到学校分给我们的住房。而且我岳母的住房面积比小奚的住房面积还多出六、七平米，还有一个独立小院，在换房这点上，学校一点都不吃亏。对此，房管科的人反驳道：你岳母的住房情况我们不十分清楚，但小奚搬过去后，她只有使用权，产权是北京市的，与学校是否吃亏没有关系。我们只能按学校的规定办。因介于有明文规定，我知道再争辩也无益，而且换房在当时最主要的，吃个哑巴亏也只能认了。因此，事后我们只好退了原来任大本老师费了大力气为我们争来的房子，搬到姥姥那只有六平米的小屋内住，直到去干校离京时为止。

5、对我的审查正式拉开帷幕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因去银行取钱一事，军宣队借学生大字报质疑为幌子，就开始对我“关顾”了。到 69 年初，以系副指挥房（或方）××牵头，另外还有两名军宣队员参加，多次让我去北五楼探工系宣传队指挥部，交代在院革委会简报组工作室的情况和问题。开初他的口气非常大，说道：一般情况如机构、成

员等写清楚就可以了。重点要交代你们整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哪些黑材料，是何人指使的，何人提供的？对这些重大问题，你必须端正态度，老实交代。如前所述，经过几个回合后，似乎发现他们自己的估计有所偏差后，房某就不再来了。此后每次找我谈话或问问题时，就只有一名军宣队员在场（这样肯定不符合规定，但事实如此。从中可知，他们已不再将简报组问题当成大事来抓了）。在审查简报组工作问题上，除房某开始时说话比较没谱外，其他倒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如有段时间大夫开了假条让我半休，他们就只在上午找我去交代或质问，并未发生不让我半休的情况。尽管简报组不存在整黑材料的事，审查只能不了了之。但在简报组审查的最后一次谈话中，他们却不愿说出审查未发现问题的结论。相反还要打个圆场，说什么：简报组的事就先到这儿，以后想到什么还可以交代，我们是对事不对人的。总之，正确的永远在他们方面。

因有人打小报告，再度引发对我的批判和审查。几乎就在审查简报组的同时，一天下午（因那会儿我身体确实有些不适，只因没有去就医拿病休假条，故按以往核心组同意的办法，若无特殊情况，下午仍允许我在家学文件，实则是照顾我休息），教研室通知我去参加室内环境“红化”。因对当时的所谓红化方式（将主席像和语录的外沿儿都加上一圈红纸边，然后再将加了红边的主席像和语录钉在墙上），我觉得实属浪费，没有必要。加上自己没能休息，也有些情绪。所以干活时就情不由己的说了几句牢骚型实话：主席像和语录都是经中央批准，指定在新华印刷厂印的。若真需要加红边，在印刷时就加了。因干活时环境比较噪杂，我说话的声音也不是很大，估计也仅是靠近我的几个人能够听到。但未曾想到，这句牢骚话就被听到的人反映给军宣队了。当快收工时，来了两名军宣队员，其中一人是我教研室的叶某。他们进屋后检查了一下房间红化的情况，接着另一名军宣队员说道：今天绝大多数人都做得很好，干得很认真，表明我们对伟大领袖具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是，也有个别人，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对红化问题评头品足，说什么红边让印刷厂一印就可以了。他不懂得这里有一个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问题！我们不能让这种错误的言论过夜，今晚大家还要到这里来，对散布这种错误言论的人进行批判。最后他才点名说道：宋翔雁，你对自己散布的错误言论要做出深刻的检查，并很好地接受大家的批判。散会后我一路无语地回到家中，尽管我内心并不害怕，但我真不知道检查该从那里谈起？而更重要的

是，这让我警觉到：我已被军宣队列为异类，而且肯定他们还在群众中宣布了今后要注意我的言行。也就是说，我已经成了一名被人监视的对象，这才是真正令人生畏的事情！因为，谁也保不准一个凡人平时会做错什么、说错什么？晚饭后，我按时到教研室接受批判。这是自反干扰后，我第一次站在对立面的位置上，接受大家的批判。批判毕竟与批斗不同，除黑板上写有“批倒批臭宋翔雁的错误言论”外，没有其他标语。而批判者的发言，除上纲上线很高、带有很强的谴责语气外，并无声嘶力竭地呵斥，更重要的是没有强迫让我低头或弯腰的粗暴举止。四五名批判者发言后，主持人让我表态并做检查。在表态时，我除了官样文章似的讲到感谢大家的批判和帮助外，我死死地守住了下面一条底线，说道：基于过去的教育，我心中只知道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肖像和毛选等政治性很强的物品，在制作时都要经过中央指定部门的严格审查，是不允许擅自改动的。但我没有考虑到军宣队是要通过“红化”这一群众自己动手参与的方式，表达和深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的崇高情感这一深深的含意，辜负了领导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改造自己的良苦用心。今后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领导决定背后的政治含义，不清楚的要及时请示，不可用自己的一知半解瞎议论。总之，借坡下驴的目的达到了。当我表态后，主持人悻悻地但略带暗示地说道：今天对宋翔雁错误言论的批判帮助就到这里，宋翔雁，你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努力改造自己，不要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明！

吉语说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年初刚刚因评论红化时潮受到过批判，但时隔不长，大约在 69 年开春的四月份，某日一大早我去西苑中医研究院看病（当时要想看病，必须起大早排队等着挂号。挂号一般七时开始，但五点半前必须赶到才可能挂上）。在漫长的排队等待中，病号们除了看一些自己带的报纸、刊物外，前后相识的往往会聚堆闲聊或听别人闲聊。而我就是在这种情境下的闲聊中，又遭到告密者的暗算。事情是这样的：周末，我回岳母家看望家人、孩子（当时岳母还住在城里没搬），当八九点钟孩子大人都要睡觉时，我才起身骑车前往前面提到的老人家那儿（因岳母家实在挤不下）。在路经外交部大门前时（当时外交部在东交民巷），我偶然发现站岗的解放军士兵右手弯着放在腹部前方（虽然天黑光线也较暗，但执勤战士因手戴白手套，就非常显眼）。尽管我骑车一闪就过去了，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想，站岗的战士为何不是双手下垂，而是一

手弯曲放在腹前呢？为探明就里，不死心的我又调转车头往回骑了一段路后，再度折返回来。当快到岗哨前，我极其注意地朝站岗的士兵方向看，终于看清了战士弯曲的手臂是因他手中拿了一本 64 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并紧贴在他的腰带处。

“探明”就里后，我想真应了别说怪事年年有，哪有今年怪事多的传言。文革中的怪事就可谓很多了，诸如“忠字舞”、红化、“红海洋”、早请示，晚汇报、要先与总机话务员对讲主席语录后，才能接通分机号码进行通话等。但我觉得今晚我所看到的哨兵右手持语录本站岗可谓怪事之最了！因为常识告诉我，哨兵是在要害部门前，或最重要、最容易出事的地段，执行警戒任务的特殊武装人员。对他们的要求是警惕性极高、基本功过硬、遇事冷静且反应敏捷。如今却让哨兵右手持语录本站岗，一旦遇到敌特来袭当如何处置呢？！若先将语录本放入衣带内再掏枪，则肯定晚敌一步而失去战机命丧敌手，而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而若立即将语录本丢弃并掏枪拒敌，虽可能还来得及，但这又有对伟大领袖不够尊重之嫌。这可真让战士为难了！带着自己也觉得难有两全解决办法的疑惑，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求战士手持语录本站岗，建议最好改为左手持语录本，这样就不会影响战士遇到情况立即掏枪的要求！一路上我还为自己的忧患意识和奇妙想法十分得意呢！正是因为这种心境，故在等待挂号的过程中，我就将所遇到的“怪事”和我前后的想法与我身后排队的人谈了。对方听后既未符合也未反对，似乎此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没想到的是，下午当我正在家中休息时（当时我仍在半休中），突然听到单元门被很重的敲打着。开门后，一看是 7165 级的两名学生。只听一位大声说道：马上到北五楼 4×× 室接受批判。我奇怪地问道：我现在是半休，正在煎药呢！他回答道：知道你在半休，是军宣队叫你去的！于是我只好穿好衣服，把药锅端下火炉，封好火炉后随学生一起前往北五楼。一进 4×× 室，就看见墙壁上贴着“批判宋翔雁的反动言论”，而且宋翔雁三个字还东倒西歪地贴着。看来屋里有二十几名学生和两名军宣队员，他们依墙围坐着。对着屋门处有一小块空地儿，让我站在那儿（实际上等于将我围在了中间）。对此，我十分纳闷，究竟又出什么事了，如此这般！这时只听一名军宣队员站起来说道：宋翔雁，今天叫你过来，就是让你如实交代自己的反动言论，接受群众的批判。你要端正态度，绝不允许躲躲闪闪。因事发突然，我是丈二和尚摸不清门道，真是觉得无从谈起！但我也深知，此时绝不可简单化地否认、硬顶。必须耐心找到原由，方能

比较好的加以处理。因此，我尽量用缓和的语调说到：刚才您让我如实交代反动言论一事，我真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我深知自己出身不好，思想上还存在很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工作和生活上难免会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需要认真地接受教育，很好地改造自己。但我也知道，自己是在红旗下长大的，自初一下学期开始不久，一直接受的都是党的教育。我热爱党，积极靠拢党的组织，一心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动的思想，所以也就不会有反动言论。我真的不知道我又犯了什么违规的事情，引发今天对我的批判。我诚心地请求给我必要的指点，如果我有什么错误言行，我绝不会有任何隐瞒。我的上述表态尽管中间被一名学生和宣传队员打断，但主持会的军宣队员还是让我把想说的话讲完了。面对我诚恳的表白，会场的气氛略有缓和。于是有的同学问我：你说过哪些解放军的坏话；有的问：你对解放军有过哪些攻击；责问最重的的是：你为什么总把仇恨对准了解放军？对于这一系列的责问，我都沉思状的缓缓摇头并轻声地回答道：没有！在这一系列的责问未能达到目的之后，突然有一名学生问道：你今天上午到哪儿去了？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我立马就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身心压力也就立刻全部释放了。所以我即刻坦诚地回答道：我想起来了，请允许我把问题交代清楚。我今天是按医生的要求去西苑中医研究院看验血结果，并就诊取药。在排队等挂号的时间里，我与一名排在我身后的学校职工讲述了前晚在路过外交部门前时看到的情况，并和他讲了我的想法。接着，我将相关事实和我的想法如实详细地陈述了一遍。并接着说道：如果大家说的就是这件事，那我认为也许是当时我没能仔细地将情况向他讲清楚，或也可能他有所误解。但我认为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任何恶意，没有攻击解放军的意思。只是觉得应该提高对阶级敌人的警觉性才这样想的。面对我的陈述，因觉得我没有回避和隐瞒，学生们似乎认可了，甚至有的学生还点头也觉得我的想法不无道理；而两名军宣队员，只见他们彼此低语了一会儿后，主持会的人说道：你能如实把事情说出来还是好的，但因你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看待解放军战士，所以总要犯低估他们的警觉性和对敌斗争的实力。这就要求你今后必须努力学好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自己，不断提高思想觉悟水平。散会后我如释重负，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在医院我是和谁谈起了这件事呢？但我始终也想不起来，而且事后我还多次想过，也都是无果而终的。此事令我非常气愤，因为当

时我是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重要情况讲给他听的，如果听者觉得不妥，为何不能直接提出批评，甚至提出警告，而偏偏采用卑鄙小人的告密伎俩呢？！应当说，告密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告密和极权是一对孪生兄弟，极权统治者需要告密者作为震慑民众的一种辅助工具，以便让民众能够俯首贴耳，听命于极权统治者的号令。

所幸的是，诸如“红化”、“红海洋”等极端媚俗的个人崇拜浪潮，疯狂到 69 年三、四月份，就因中央文革领导人在一次接见革命群众的集会上予以否定而寿终正寝，与此同时，哨兵也不再持语录本上岗了。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人对我过去的这些言论再说三道四，更没有人再加以指责了。当然，也不会有人因中央文革否定了“红海洋”，而反过来对我加以肯定。因在极权时代，真理从来也不在平民百姓一边，只有掌权者本人，才是真理的化身，才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资本。面对当时的现实，我内心已十分平静，完全不会为这些事再去争论谁是谁非了。但我深知，军宣队既然已经盯上了我，今后肯定还会有各类审查等着我呢。他们和工作组一样，绝不会认错，也轻易不会放弃对怀疑者的审查。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抓的阶级敌人越多，就说明他们越革命、成绩就越大。这就如前阵子的官员们追求 GDP 数字一样，GDP 值越高，就表明他的政绩越好，高升的机会就越大。从某种程度上讲，二者如出一辙，反映出的问题实质就是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不高，综合素质低下。但就当时的自我而言，我只能落脚于今后做任何事都要更加谨慎，以不出大的差错为原则。

6、与工宣队员的一次有益沟通

打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的旗号，工宣队和军宣队一起进入了高等院校。但时至六九年夏，工宣队在地院里的作用有限，事实上给人的印象也就是一个摆设罢了。工宣队至多也就是开大会时主持一下会场，真正掌握大方向、主事的都是各级的军宣队干部。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在地院干尽坏事，迫害无数知识分子的都是那些军宣队的干部。相反，工宣队员给我的印象反倒比较注意政策和思考。在 69 年夏，宣传队组织全院职工和学生去首钢 850 工地劳动，接受再教育。当时因病我正处于半休之中，所以军宣队安排我在实验室劳动，并让工宣队探工系副指挥刘 x x 监督和管理。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全面检修一台苏式 200/30 往复式泥浆泵，确保学生出队时可以正常使用。全面检修就意味

着必须完全解体，但却不给我安排助手，这样当大部件解体需用手动倒链起吊时（当时探工系实习室的装备条件还是比较差的，在室内起吊设备和实验用大块岩样，并无电动倒链），如何保持大部件本身的平衡和准确就位，确实是有相当难度的，而且要想准确就位一个人是根本办不到的。万一因不平衡，大部件（这里指的就是皮带轮、离合器、减速齿轮轴和曲轴大齿轮组件）在起吊过程中很可能会歪倒，而发生大部件落地被砸坏的事故。我想这也可能是军宣队不懂业务瞎安排所致，但也不排除是有意出难题，找茬儿整人。对此我要有所警觉，绝不能大意和勉强从事。故我当时就想好了预案，在该组件起吊前，我自己可先试试能否平衡吊起，若三次试吊均有歪斜不平衡的现象出现时，就绝不能蛮干。而要请示说明情况，提出需请实验员前来帮忙的要求，否则只能暂缓该组件的拆解，先修理或更换其他元器件。当我正式开始检修时，水泵已被其他同事卸载在钻机实习室内，有点像道具已经运到，就等我来开场似的。我每天从八时工作到十二时，中间没有平时的工间操，但一切均井井有条的进行着，卸缸头、拆卸进排水阀和阀座、卸十字头、拉杆、曲柄和轴瓦（曲柄因大组件尚未吊离，故还不能从泵体内取出），这一切都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但当要起吊皮带轮、离合器和减速齿轮轴和曲轴大齿轮时，果然因一头过重，很难平衡起吊。试了三次都不能确保平衡后，我随即向刘代表请示道：刘师傅，这个部件是由四个部件组合而成的，只能从泵壳内吊起后，再放到地面上才能拆解开来。但它本身一头沉，起吊时很容易歪斜而导致坠地事故，所以我需要请一名实验员来帮忙。在起吊时，请他帮忙控制组件的歪斜，保证起吊时的安全。自从检修开始，刘副指挥就一直在实习室专注地看着我干活，什么话也没说过。这时听我喊他刘师傅，起初有点一愣的味道，但当听完我的话后，毫不迟疑地说道：没问题，你看找谁合适，就让他过来帮忙吧。这样我就到实验室办公室，找朱春发师傅来帮我。因我事先已将大组件的绳结绑好，起吊时，朱师傅帮我扶住组件的皮带轮，这样在起吊过程中组件就不会再转动了。我们很容易就将该组件吊离水泵壳体并卸到地上，谢过朱师傅后，我拆下了皮带轮、离合器，减速齿轮轴和曲轴大齿轮，使大组件解体为四个单独的部件。当所有元件都拆解并清洗完毕后，我检查了需要更换的元件和可以修复继续使用的曲柄轴瓦，再按检修要求，作了笔录登记，将需要更换的零件单独堆放。然后向刘副指挥汇报拆解工作已经完成，说明轴瓦刮修后仍可使用，其他单堆放

在一旁的零件则需更换。刘副指挥大致看了一下登记的表格，然后问道：你们每次检修都要填写这种表格吗？我说：大修的都要求填写，还要补上开始投入使用的时间，以便确保每次大修的时间间隔。听毕他点了点头并说道：今天就到这儿吧，你洗洗手，坐下来咱们聊聊。我还以为他要和我谈谈有关我的问题呢，没想到当我洗好手坐下后他却说道：我看你修理设备还比较在行嘛。面对他的夸赞，我实事求是地说道：在行谈不上，只能说还会修吧。接着他就很不解地问道：姚文元的文章不是说“学理工的不会开机器吗？”针对他的提问，我谨慎但又事求是地说道：解放前毕业的工科学生是否都会开机器我不太清楚，但像我们这些解放后毕业的大学生，绝大多数人应该都会开机器。因为大家除了要学习很多理论科目外，还要参加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而且在一年级时，还有一周多的参观实习，加在一起，总的实习时间有半年之久。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会开机器，大家只有开得好和差的区别，开的熟练程度的不同而已。至于完全不会开的，可能也会有个把人，那是因为胆子小或本人的动作协调性太差造成的。这些个别没有代表性。但对姚文元在这段话中违背常识和不科学性的一面（譬如，“开机器”一词就极不科学，也不严谨），我十分谨慎地回避了。我说完后他又点点头问道：你是学什么的，哪年毕业的？我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专业和毕业时间，并说道：我工作已经十年多了，在设备的修理技能方面，主要还是毕业后在工作和科研中慢慢学会的，在学生阶段不可能什么都学到。比如，六十年代初，在改装钻机试验台时，刚才来帮我吊装的朱师傅，就手把手地教过我重量大的零部件，吊装前绳扣结该如何打才能避免滑脱。这些最基本的干活技能，只能在实际生产劳动中学习，不管学什么专业，学校教的只能是最基本的。有两句老话说得很对：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才成。对于最后我讲的这点浅显道理，作为一名老工人，肯定他要比我清楚得多。所以，他只是接着问道：明天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安装了？我说：等一会儿我要将需更换的零配件明细送交实验室办公室，请他们审批后帮我准备好。明天一来，我需要先刮磨曲轴大瓦，直到曲轴瓦的接触面积达到80%以上时，才能开始安装。此外，摩擦离合器的摩擦片，我觉得还能继续使用，但摩擦片表面光滑了些，是打毛一下，还是将其更换，我没有把握。还得请实验室刘主任来看看，但他今天没在。若真需要打毛处理，我也得请人来帮我，因为这么大的摩擦片，我从未打磨过，万一打磨不平，

反而会报废掉。我说完后，刘副指挥就说：那就这样吧，等明天来后再说。

和工宣队队员的沟通让我觉得心情舒畅，因为他们谈话的态度首先就给人以平等相待的感觉，没有军宣队员那种盛气凌人、高人一等的训斥味道。而且，从刘副指挥的疑惑中也让我感到，他毕竟是从生产第一线中干出来的，并非完全是一个唯上是从的干部，他肯从客观观察中去思考和判断，这才能算是真正有觉悟的干部。而在以服从为天职的军队体制下，再加上理解的和不理解的都得执行的要求，简单地将军宣队员和工宣队员作比较，恐怕也欠公允。

第二天上班后，我先请刘士迈老师（实验室主任）前来看过离合器摩擦片的情况，他看后说道：虽然还可以用，但不值得再打磨了。还是换个新的算了，省事，重要的是可以保证下个大修之前不用再次修理和更换了！说毕，他又让实验员将要更换的零配件送过来，并问我还需要些什么？我说：若刮瓦顺利的话，到时安装皮带轮和曲轴组件时，还得请朱春发师傅来帮我吊装。如果刮瓦不顺利，可能会拖到明天再吊装。刘老师听后说到：行，到时你去叫他就是，我会先向他打个招呼的。说毕又补充道：一个人干活悠着点，注意安全。刮瓦进行得很顺利，随后我很快将需提前装入泵体的十字头、拉杆和曲柄安装就位，不到十点我就请朱师傅再次前来帮我将曲轴大齿轮组件和皮带轮、摩擦离合器和减速齿轮轴组件分两次吊装就位。然后，我陆续将已安装就位的零部件互相连接牢固。十字头滑块和曲轴瓦的间隙调好、并注入润滑油。最后将缸套、阀座更换后，再将柱塞橡胶环安装就位并调好间隙，装上新的进排水阀门，将缸头、拉杆盘根紧固后，最终将进、排水管安装到位，整个水泵的大修工作就全部完成了。这时我看表，时间已经快十二点半了，因为一切都有序地进行着，我竟一点也没有察觉！为此，我只好对刘副指挥表示歉意：对不起，我没注意时间，要影响您吃饭了。他大约也看出了我的兴奋劲儿，笑容可掬的说道：没关系。这就算完工了吧！我说：还没完工，明天还得来灌水试泵，如果排水量达标而且稳定，曲轴箱和十字头温度正常，那是才算完成大修了呢。

第二天的试车非常顺利，灌满水后开车一次成功。运转半个小时后，十字头和曲轴箱的温升也正常。至此，经过近六个半天，苏式 200/30 往复泵的大修工作就结束了。从刘副指挥的表情也可看出，他对我这一周来的劳动是肯定的。当我关车后，他对我说：回去以后，你把这几天的劳动情况写个总结给我，有什么

收获和体会，有什么问题和需要改进的地方都可以写出来。因你还在半休，给你三天时间够了吧？答应后，我看到刘副指挥没有回北五楼办公室，而是往实验室办公室那边走了，可能他还想到那边听听实验室成员们的反应吧！但我深信他们对这次任务的完成情况肯定是会满意的，事后，当我将总结交给刘副指挥时，他没有讳言而是直接告诉了我：实验室方面的人，对你这几天来的工作都很满意。但他并没有谈自己的看法，这也是政治思想工作者比较普遍工作方式——对直接表态极其慎重。

当第三天我去北五楼宣传队办公室交劳动总结时，刘副指挥向我说道：张指挥长得知水泵检修任务已经完成后，让你今天下午随车前往石景山工地，继续和大家一起劳动，接受再教育。那边可以煎药，你可以带上药锅、中药和行李、换洗衣物等，在那边半日休息半日劳动。面对军宣队这种让病患人员带着药锅去现场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的安排，看似笑话，但却是事实。这种决定对一般病患者来说，往往会冠以“革命化”的要求，而对于有问题的人来说，则是带有强制性的改造措施了。因此，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军宣队已经把我当作清理对象看待了，否则不至于如此。

7、清理阶级队伍

当工、军宣队进入地院后，其主要工作尽管表面上讲的是：批派性、搞好大联合；抓好“斗批改”。但实则如前所述，前者只是后者的切入点，而后者又只放在斗和批上，并以清理阶级队伍的面目出现。至于改的问题，即毛主席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信中提出的教育要革命的问题，在落实“五七”干校的指示之前（这里指的是落实毛主席于1968年9月30日批转的关于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指示），则根本就没有提及，更不要说具体做过哪些教育改革方面的工作了！如果从“改革教育”的角度来看工、军宣队在地院的作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除了破坏、砸烂、瘫痪了原来的教育体系和管理制度外，毫无积极的探索和建树。甚至还远不如东方红掌权时革委会所做的相关教改的回顾和总结呢！

但就具体时间段而言，清队（即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工作何时全面展开，在我的印象中却很深刻，因为工、军宣队似乎没有像工作组搞“反干扰”动员大会那样，在全院大会上统一宣布。但从面上了解的情况看，各个系和基层单位则是按统一部署，各自分别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审查、个人交代和基层批斗等项清

队工作。因当时我自己就是被清理的对象，再加上家庭负担的加重，所以对全院清队运动的关注度就明显不足。而且，在此期间，尽管审查对我个人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给予我的精神压力却远小于“反干扰”时期。其原因主要在于，反干扰时已将反工作组定性为反党、反革命，这样一项巨大的政治帽子，确实让人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即使自己再怎么说我的动机是好的，但事件已被定性，厄运也就难于逃脱了。但在工、军宣队的清队期间，如前述，我自知自己没有个人历史问题，在历次运动中也没有犯过政治性错误，“反干扰”期间的问题，军宣队没有那个胆量去翻工作组的案。基于我内心有底，所以对来自工、军宣队的相关审查，我认为真正值得认真对待的也就是关于简报组问题的审查，因为，随着工、军宣队的进驻，就意味着由造反派所主持的革委会必将退出历史舞台，此间所做的一切被审查也就成为必然。但对自己在简报组的工作，我个人也是信心满满，觉得最多只能说简报反映的情况不准确、存在派性，绝对不可能上纲上线到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地步，而使问题的性质变成反革命的性质。而且，在清队工作全面展开后，简报组的审查早已结束，而且此后再无人向我调查有关简报组的问题。总之，直至被宣布我和昭明将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之前，在京清队期间对我只不过是校友冲击而已。

除个人被审查之外，我所知的全院清队情况有限。但给我的总感觉是：工、军宣队领导的清队工作重点似乎并非党委中的所谓黑线或走资派方面的问题；也未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句话，针对的并非都在上层，而是针对全院职工的全面审查清理，以便对地院教职工重新进行左、中、右的阶级阵线排队。所以几乎每个职工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审查，甚至连同家属、亲属也均不能逃脱。如今我能回想起来的几名普通教职工和家属被清查的情况有：

探工系全日制钻探教研室就针对李砚藻老师的个人阶级成分的划定进行了审查、交代和批判，还让其将过去利用房租收入所得购买的私人物品上交，以表明划清了界限；掘进教研室原党支部书记、系总支委员王首魁老师妻子成分的审查。因她本人是家庭妇女，只在家属委员会组织的缝纫组内从事个体劳动，但说她家庭是地主，其本人是否构成地主成分有不同意见，若是则将面临被遣返回原籍的处理。所以王老师当时的精神压力很大，在一次闲聊中他无意与我谈起此事，因我搞过四清，在农村参加过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知道一些政策。所以，我曾

向他做了相关说明和解释。当时我曾告诉他：你岳父本人是否是地主，决定于他在解放前两年时的经济状况。要注意的是“前两年”，既非笼统的解放前，也非土改划定成分时的“当时”。若那时家中土地业已出售，而投资于城市工商业，本人不再雇工收取地租，那就不能划为地主，只能定为工商业者或资本家。至于他女儿，那要看她当时是否年满 18 周岁、是否已婚、是否正在求学等？若未满 18 周岁，则不在划定个人成分的年龄段，不予划定成分。这时需注意，“周岁”是指达到出生日期时的年年龄，而不是指到了出生年份的年龄。严格讲，差一天都不能算到了周岁的年龄；如已婚，则其成分应随夫家；若正在求学，则本人成分应定为“学生”，即使学校当地尚未划定成分，亦应视为“学生”。若其本人当时不满足上述条件，且闲赋在家，则要视其当时是否主持或协助主持家政而定。在这种情况下，成分的划定就相当困难，会有相当的人为因素干扰。这些解释对他了解、把握农村人员的阶级划分肯定有所助益，他不仅本人是个党员，而且大学毕业后还作为肃反干部延后分配一年，所以他听得非常仔细，还问了一些细节，并道谢再三才彼此分手。以后他爱人的情况如何，因我自身难保，故也从未打听，不知其详；掘进教研室的任大本老师（即前述帮我们争取结婚用房的老师），其弟（其名字我已忘记）是中科院数学所华罗庚的关门弟子（研究生），因其是右派，文革期间又因揭其有攻击江青言论被收监拘捕，拘捕收监时的监外监护人填写的就是其兄长任大本老师（因他本人未婚，在京也无其他亲属）。为此，清队期间，任老师也因其弟问题的牵连，加之在反右期间，他本人对个别右派有些同情言论，曾被定为中右，故也受到一定的审查。但在谢富治的公安六条从严、从快、从重整治的要求下，其弟最初由北京监狱收监改为转移到太原监狱收监，并于 69 年九、十月间被判执行死刑，立即执行。尽管随着其弟的被枪决，对任大本老师的审查也就不了了之了。但这类因亲属问题被牵连而受到审查的人，在文革中绝非个案。在这里我还想就任老师及其弟弟的事件多写几句，好让今天的人们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所受到的残酷迫害，和他们面对不公正对待时所持的宽阔胸怀增多一些感性的了解。当然，我也希望那些在那个时代助纣为虐的人们，也能从中有所反省和忏悔。事情的简要情况如下：我于 80 年中去杭州出差，顺便到地矿部杭州地校看望任大本老师（他因长期两地分居，于七十年代中北京地院迁往武汉时，调至杭州地校）。在他家里我不但受到了贵客般的接待，还有幸

聆听到他讲述的感人而凄惨的一段往事。任老师说道：他出自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有三兄弟和一位长姐。长姐家住嘉兴，长兄抗日战争时期参军抗日，因是空军被送往美国接受训练，回国后一直和日军作战直至胜利。后因国共内战再度爆发，其兄解放前赴美定居。其弟才华出众，56年被录取为华罗庚的最后一届研究生，深得华的喜爱。但不幸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华的呵护下，其弟的学业仍得以保留，没有被下放改造。但文革开始后，因与他人谈论过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劣迹而被告密，随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拘留收监（此时华罗庚也再无力呵护），并在69年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死刑执行后一周有余，作为监护人，他才从学校方面转来的通知中得知他弟弟已经故去。大约在80年春（我记得不准），山西公检法系统派专人赴杭找到任老师，给他带去了其弟反革命案件经法院重审后，被宣布无罪平反的通知，而且给他送去了其弟生前的遗物。当相关手续办完后，公检法系统的来人向任老师说明了国家有关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规定，希望任老师提出后，他们再带回去研究后决定最终赔偿额度，若无异议即会叫任老师收存。闻后，任老师即表态说：因家中长姐现住嘉兴，此事需等告知她后方能决定。故山西来人决定先回住地，等任老师姐弟商定后再回山西。此后，任老师仔细地翻看了其弟留下的遗物，发现其中除了少量的生活用品和衣物、书本外，还留存了很大一摞各色纸张（即大字报用纸），上面书写的都是一些数学式子，他也看不明白，但肯定是他弟弟在狱中思考和推导的有关他研究的课题方面的东西。面对这些记载，任老师讲道：我再也忍受不住了自己的眼泪，只能任其流落在弟弟遗留的手稿上了。他继续说道：从这份手稿中可知，弟弟在那样的环境下，满脑子想的仍然是他热爱的数学。尽管他谈论过一点有关江青的风流轶事，那也只能说明他从过去的报刊中了解的一点情况，哪有什么恶毒攻击的意图呢？！接着他又说道：他整理好遗物后，就立即赶往嘉兴，向其长姐面告一切，并相商了有关国家赔偿的事情。姐弟二人相商的结果和理由，我相信不仅是今天大多数的人们想不到的，而且，即使是当时的很多人，大概也不大会想到。当山西公检法的人再次来到任老师家中想得知他们姐弟二人的想法和要求时，任老师代表他们姐弟二人坦诚地讲述了他们的意见和理由：我弟弟的错案得以昭雪，令我们姐弟二人感到欣慰。他无辜地故去不仅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和损失，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他很有才华，也很专注他的事业，但可惜尚未学成，

未能给国家效力，就被屈致死。这是很不幸的事，也是国家的一大损失！他从中学到大学、研究生阶段的生活费用主要都是国家和人民供给的，家父和我们给予的有限，而且我们现在都有工资，所以，我们决定不再要求国家给予赔偿了。但我们有两点请求：1，请将对他的平反结论转知中科院数学所，恢复他的名誉。并请转告他的导师——华罗庚先生；2，我们在清理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他书写的这份文稿。因为已经写就十年有余，是否还有价值，也请转数学所审查。如还有刊出价值，我们希望能给予发表，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如已无任何学术价值，则作罢，不必退还。因为我们也不懂得，不想再留存它。山西公检法的人听后，请任老师在笔录上签字后即离去。但这感人的事到此并未结束，就在拒绝要求赔付后不久，同年夏季，任大本老师的哥哥从美国回国探亲，住在杭州。在姐弟三人相聚的欢乐时刻，任老师的哥哥问起了小弟的情况，问到了他是怎么死的？何时死的？任老师事前就想到了其兄长会有此一问，为了避免其兄长对党和国家的负面看法，决定对他隐瞒事件的真相。故说道：是 69 年得病死的。当问起得的是什么病时，任老师含混地说道：是和爸妈得的同一种病（暗指肺病。任老师解释说，其兄在国内期间，江浙一带得肺病的人很多，而且死亡率也较高，其兄长是知道的，所以容易骗过）。当他兄长知道这一情况后，也就不再多问了，只是喃喃地说道：肺结核现在有药可以治呀！任老师就推脱道：他在读研究生，发现太晚了。任老师强忍下了个人的悲痛，为了国家的形象和利益，以此遮盖了文革期间，中共当局残酷杀害一名普通知识分子的丑闻。这则动人的事迹，反映出那些心怀坦荡，爱国家、敬事业的普通知识分子的心胸和情怀。尽管这些人的头顶上没有任何政治性的光环和时尚的称号，但他们才是国家崛起、民族振兴的真正脊梁！此外，电工实验室实验员李宽，因历史问题被审查。可能因其隐瞒的问题被查清或不严重，加之本人持有经黄永胜签字的起义人员证件，故在全院清队宽严处理大会上，被宣布“从宽”处理。当宣布时，坐在我身边的屠厚泽老师（探工系副主任、副教授、系总支委员，当时是半工半读教研室的负责人）笑着对我低声说道：巧了，刚好是黄永胜的签字，如果是彭德怀的签字，恐怕就不好说了！从屠老师的这句不经意的话中，就可以看出，军宣队领导的清队运动成果，在地院职工心目中的评价状况了。

8、干部、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兴办“五七干校”

当时间进至 69 年初冬时节时，对地院的教职工队伍来说，在政治环境上也开始进入了寒冬时节。尽管清队期间，在教工队伍中已因清理审查而倍感压力，但那毕竟主要是针对被清理者而言的，而这部分人在整个教工队伍中总归只占少数。但此时，军宣队（这里只提军宣队是因为当时在各项活动中已很少看到工宣队员的身影，是否工宣队已经撤出则不得而知）正为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办好“五七干校”的指示，而全力以赴地忙碌着，因为毛主席批示：这是干部重新学习的好机会，是搞好斗批改的好办法。

当时基层单位每天除学习柳河五七干校的相关文件外，大家需要做的就是表态——表明个人的志向。这时每个人都面临着人生的又一次选择，但此时的选择条件和环境，与大学刚毕业时的情景已完全不同。那会儿刚毕业，满身豪气，志向高远，献身精神充沛，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几乎成为每个有志青年人的不二选择。应当说，这也是当时政治思想工作最大成功的反映。而今情况徊然不同了，连像我这样可以说是年岁最小的教员，也已 32 岁有余，且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如何做出选择，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此时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号召力，也远非文革前的情况可比。在文革已经进行了三年之久后，面对社会的动荡、生产的停滞、正常工作和教育秩序的中断，广大群众人心思定的想法明显上升。而且，文革初期揭露出来的大量问题，也是使党政领导的威望大打折扣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种对领导缺少信任，对前景缺乏信心的政治环境下，让群众做出选择更是难上加难了。

当时对全院教职工来说，只有三个选项：教改试点（探工系主要地点是湖北丹江口）；五七干校（全院性干校，地点在江西峡江县仁和公社原江西共大的旧址——实际上只有几排房子）；北京留守点（维系原校的存在和保障教改点和干校点的后勤需要）。在这三个选项中，表面上是自己报名，实际上是军宣队与个别领导成员按教改和留守的需求，事先就已作出挑选后，余下的人员只可能有一个选项——去干校接受再教育了！而且军宣队的工作重点也是放在干校筹建和赴干校人员的“动员”上面。除了上述三个地点（或说任务）选项外，对地院教职工也做了三类不同工作性质的划分，作为军宣队安排时不同考虑的依据。一类，工人。他们表面上不属于“再教育”的对象，安排他们去哪里都是工作需要，因此是轮换式安排，没有举家搬迁的要求。是否按出差享受补贴则不得而知；二类，

各级干部含政工人员。除少许至各个点仍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不属于再教育对象外，其余也属于再教育对象；三类，广大教学人员。这些人属于接受再教育的主体，若非教改试点需要，其余将全部奔赴干校。

在对待教学人员前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的动员过程中，一些政策不仅不近人情，而且近乎残酷。如对于双职工均是教师的家庭，一般都要求全家老小均前往干校安置。如若不愿意一起同迁时，则老小在京的照料问题需自己解决，组织上或留守处均不负责任。更有甚者，对不同行的孩子原来享有的统筹医疗福利，也就随即终止。军宣队正是想利用这类不近人情的挤压措施，迫使教师举家同迁。如前所述，也正是因为这一规定，当我们前往干校而将未满周岁的孩子留京委托一位大师傅的家属照管。未曾想到，三个多月后孩子即被烫伤，并险些送命。为了抢救孩子生命，仅花销的医疗费用就达一千余元，全部是由我们自己筹款承担的。在双职工中，若另一方为非本校的在京职工，则双方可自己选择举家同往对方干校安置。该措施被在京中央单位普遍采用，以减少同迁干校的阻力。若另一方为京外职工时，政策也允许京外职工随地院职工同迁江西干校，但工资、人事关系不变，今后根据学校教改的情况，可优先考虑解决两地分居的调动问题。

面对当时的局面，我们心知肚明没有别的选择，与其被分配到干校，还不如自愿报名前往干校，起码还落个名声。但是举家全迁还是我们自身前往，确实让我们和广大教工们感到两难。尽管当时军宣队的头头们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房子和孩子们的学校、幼儿园会很快建立起来，生活设施也会很快完善……。但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已过而立之年的知识分子，美丽的谎言岂能令人信服？！就我们自身而言，孩子当时仅八个月；岳母已七十三岁有余，且是缠足女性，还患有较重的肺心病；侄子不足 12 岁，正上小学五年级。将他们老小留在北京，在京城无亲友照看的情况下，万一有何需要时，如何解决？而若与我们同迁，那只能在干校周边农村中的农民家里租房暂住，由我们劳动后回家照料。但侄子的上学，幼儿的照看如何解决？面对如此窘境，确实令我们一筹莫展，日思夜想也难找出解决难题的良策。但时间是不等人的，在军宣队正式宣布去干校的人员名单后，随即宣布了赴干校的时间（我记得大约是十二月上旬）。面对仅有一个月的准备搬迁的时间，让我们已无回旋余地和犹豫的可能。故决定举家迁往干校。困难自己家有，别人家同样也有，只不过各自的困难程度有所差别罢了，别人可以克

服，自己也一定能够克服！有了这个想法，我们就积极地从事各方面的准备，首先就是购买各类包装用品，因为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包装后方能启运；另外就是与昭明在京外的兄姐们打招呼，告知准备全家外迁的决定，若有何异意望速告或来京相商。当我们的准备工作已近尾声时，昭明在沈阳的兄长回京进一步面商。因他是大夫，知道其母身体的实际情况，说一旦去到江西，老人这个冬天都很难熬过，所以绝不能全家举迁。还是让老人和他儿子留下。并建议我们，让仅八个月的儿子也留下来，托付给一个比较可靠的人帮带，等那边条件好些、孩子也大一点后再接去。若万一老人有事就请留守人员打电报给他，因他们离京最近，再请假回京处理。就这样我们又决定孩子老人都全部留下，我们自己去干校接受所谓的再教育。现在看来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尽管我们的儿子四个月后险些丧生，造成家中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但这完全是因所托付的人不负责任所致，而老人则能健康地又活了七年，至 80 高龄方才谢世。

应当指出的是，军宣队在安排教职工去干校的做法上，可以说完全是强制性的，只能服从组织决定。因接受再教育是最高指示，不前往者就有抗拒最高指示的政治风险，因此即使再困难，也只能就范。他们在一味追求改造干部和知识分子使其成为顺民、愚民的同时，也株连到干部、知识分子的家属和亲属，等于将他们驱离了原本尚属安居的环境，而变成了居无定所，学无定校的可怜的老少群体。这种非人性的举措，完全背离了共产党一直以来宣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因为他们并未认真考虑职工家庭亲属的实际困难，表面上虽说可由职工本人决定随迁与否，但若不随迁，对实际存在的问题如生活、就医照顾等不但根本不予考虑，而且随着人员的外迁，还人为地造出一些难题，增加更多的困难。如家属区的冬季集中供暖就被取消，改由自己解决；双职工子女的就医统筹被立即取消，改由全部自负等。面对这种非常不得人心的作法，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人们也只能无奈默默地去承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69 年的初冬，对地院广大教职工群体，特别是被驱往干校的教职工群体来说，是他们心灵上最为凄惨的一个严冬季节。军宣队毫无人性的恶劣作法，使他们完全处于一个令人摆布而又求助无门的悲惨境地。他们不得不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背井离乡，而且还牵连到他们的子女和至亲也要随之浪迹天涯。与古代中国统治者和斯大林统治苏联时期，强迫少数民族整体迁徙相比，从本质上讲，其残酷性可以说毫无二致。

经过极其紧张的整理，将所有随迁物品交至学校指定的西饭厅接收点后，昭明随第一批人员一起，于十二月上旬，经上海、樟树（清江），奔赴仁和镇（属峡江县管辖）后，再到干校所在地龙陂。我则因当时仍处于半休期间，半休后需再做一次检查，故允许我检查后再走。这样，我于 1970 年 1 月 1 日只身经同样路线赶往龙陂干校。从此掀开了我们在文革经历中的另一难忘篇章。

（2015 年 8 月 5 日起草，2016 年 4 月 26 日定稿）

（编者注：该文第一部分发表在 2015 年 12 月 15 日《记忆》145 期）

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

(7-12)

宋翔雁

(七) “五七干校” ——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新场所

1，风潮的兴起和再认识

毛主席于 1968 年 9 月 30 日针对黑龙江柳河干校的一篇报道，批示道：这是干部重新学习的好机会，搞好斗批改的好办法。该批示见诸报端后，各中央和省市机关就陆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的偏远落后地区选点兴建五七干校。并以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接受再教育为借口，将众多下台干部和成立革委会后未被接合的干部群体，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起，迁往这些尚未建成的干校所在地，边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农业劳动），边修建住房、食堂、中小学校等生活设施，边学习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边斗私批修，再度掀起了又一轮针对广大干部的整肃和迫害。有趣的是，办干校的批示原本是针对各类机关暂时未被结合、没能安置适当岗位的干部群体的。但到 69 年中，在京各高校，由北大、清华的军宣队牵头，很快各省市的高校也纷纷开始效仿，掀起了大办五七干校的热潮。让四年未招生的高校教师群体（少数除外）不得不走下讲堂，步入（相当一部分老师被迫只能携家带口地步入）“学堂”——五七干校。让他们丢弃（或言中断）其所学的专业，集体去参加农业生产中的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地院军宣队也不例外紧跟潮流，大约是和地质部军代表（当时中央各部委均已被军管，由军代表主持工作和运动）商议后，各自分别在江西峡江县仁和镇龙陂原“共大”旧址和隔江相望的水边兴办了自己的五七干校。

当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会有人去向军宣队质疑主席关于五七干校的批示是针对未被结合和暂未安排工作的干部群体这个问题的。因为，一方面被质疑一方不仅很轻易地就可以说：教师也是干部编制予以反驳；另一方面，搞不好一上纲，这就会成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问题，落得个悲惨下场。但时隔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民和当时被涉及到的干部、教师们，不仅有权质疑将众多干部、教师驱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这种劳民伤财做法的合法性和正确性，而

且应当进而揭发、控诉当时这种做法的非人性和迫害性的一面，从而让善良的人们能够认识到所谓“再教育”的伪善性。

当今，人们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文革时期，特别是军宣队领导时期，所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批斗走资派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等运动是对干部、教师和学生群体进行残酷迫害这一事实。但对五七干校在迫害干部、教师群体方面的严重和残酷程度上，却认识估计不足。只看到了兴办干校浪费钱财、资源，破坏环境等负面因素的一面，却认为干部和教师们只不过是参加参加体力劳动而已，没啥大碍，甚至还觉得客观上还有利健康呢！在回忆地院五七干校从兴建到搬迁再到消亡的这段历程后，现在我认为，运动中的“清队”等手段与“干校再教育”，都是文革时期执政党对干部和教师群体（即知识分子）进行整肃和迫害的手段，二者是互补的。从整肃知识分子的角度讲，这两种手段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只不过前者针对的是被列为打击镇压的对象，后者针对的则是被列为改造的对象。对前者，偏重于政治层面上的清洗和迫害，属于敌我矛盾；而后者则美其名曰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说得直白一点，即将这部分人，列为人民中的异类），是今后国家在经济建设、科技发展中还必需要使用的一类。即既要用你，又要对你实施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改造，比如集体去干校接受再教育。

但应当看到，按毛泽东关于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在历次运动中对打击面是有所控制的。一般定为3—5%，最多不会超过10%（个别地区和单位，因领导为邀功而更左，导致打击面往往可能会有所增加），故对打击对象而言，它只占干部、教师群体中的少数。整肃后，这些人中的多数仍被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所谓中国特色的群众专政），表面上与常人无异，但在待遇上（如行政级别、工资级别、住房和医疗等）会有所调整。但其中也有更少数的人会直接受到专政机关的镇压（监禁、流放、劳教等），而丧失了行动自由，甚至生命；但对改造对象而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则是针对整个干部、教师群体的，除运动中暂时仍需留用的部分干部、教师外，该群体的其余的部分则均包括在其内。我没有具体的数据统计，但我估计这部分人员应占到干部、教师群体总数的60%左右，涉及面之大，远远超过前者。基于五七干校这种再教育手段涉及面如此之宽，异乡异地从事体力劳动时间很长（从几个月到一年以上），生活、医疗条件又较差，加之当时特有的政治生态环境等影响，可以说五七干校对干部、教师群

体的迫害是不容轻视的。其迫害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作为改造（或被教育）对象，赴五七干校的人员是由军宣队决定，带有相当的强制性，而非人们真正的自愿选择。在失去选择上的自主性后，留给当事人内心上的感受只能是被驱使、被奴役的伤痛。

尽管在表态会上，有人会激昂慷慨高调地要求奔赴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多数人也表示响应号召愿意前往。但在这些表态的人中，其真实的思想却有极大的差异。其中，有些是善良的“臣民”，习惯于领导叫干啥就干啥；多数则是言不由衷的违心之言，迫于政治环境和形势，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有极个别军宣队依赖的骨干们，用现代词语讲则是别有用心推波助澜的“托儿”。如当时被群人戏称为“五朵金花”之首的水文系的梁桂芝，她乃军宣队入院后的依靠骨干，其配偶是院外职工，手下还领着王兆姬、朱思贵、赵璧媛等一群拱卫和追随者。她高调申请赴干校接受再教育，获得军宣队的肯定和表扬。但到干校后，时间不长就被调回北京，离开学校这块是非之地，去地科院任职了。而王、朱、赵等均成为军宣队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的各专案组负责人，残酷迫害被清查者，为地院广大正直的教职工们所唾弃。但他们却得到文革后当政者们的青睐，王、朱等还被提为副局级，这就是中国的人事特点——被领导看中提拔的，往往却是被群众憎恨、唾弃的人；

2、在安排赴干校的干部和教师的名单时，基本上很少考虑其本人和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困难程度，如年龄、身体状况、家属和亲属的具体情况等。采用一窝风、连锅端的驱赶方式，一批奔赴干校。干校原址（龙陂）当时连住房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不带家属的职工均按性别分开居住在“集体宿舍”中。所谓集体宿舍，是指在一间大房子里，搭起了上下两层的通铺，每人可获得 $0.8-0.9 * 1.8-1.9$ 平米面积的睡觉铺位。而全家同迁的人员，则被安置在距龙陂远近不一的农村中，在老表家里腾出的房间里居住。由临时改建的伙房、锅炉房向学员集中提供膳食和饮水，分散住在农村里的学员及其家属，起初则需往返数里到十数里，来“院部”龙陂打饭打水，后来才逐渐自己单独起火，使生活条件得到一点改善。

3、对干校学员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和亲属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诸如老人的生活照顾、子女的求学和托儿、老少的医疗等）基本不予考虑或很少予以考虑，

造成部分干校学员不得不举家同迁的不幸场景。也就是说，原本不属于“再教育”对象的家属、子女和亲属，在这场接受再教育的运动中也被裹挟卷入其中，受尽了背井离乡之苦，个别老者和体弱者还命丧异乡。如干校曾出现过所谓“草葬”电报的“丑闻”（该事件是一干校女学员在回京探亲期间，留在干校家中的母亲病故，干校工作人员发电让她速归处理，但她竟回电“草葬”二字了事）。为此，涉事人广受众人的谴责，认为其无德、不孝。但我以为，除当事人应当受到谴责外，人们是否还应该进一步思考一下：该谢世老者为何会来到干校遭此不幸结局，客死他乡？难道军宣队要求干部、教师前往干校的指导思想和相关政策就没有责任吗？就我所知干校期间人员的死亡事件还有：干校学员，原体育教研室主任刘冠军教授就猝死于干校的劳动中；原岩石教研室李明哲老师在清查五一六过程中，因不堪忍受残酷迫害，而自尽于深山老林；

4、可以说利用五七干校对干部进行再教育，对仁和地质学院五七干校而言，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欺骗！——既是对上级和中央的欺骗，也是对广大地院教职工的欺骗。地院峡江仁和五七干校从建校开始，到中间迁校湖北沙洋，至最终解散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原北京空军政治学院军宣队，还是后来的湖北省军区的军宣队，都没有任何领导组织过当地或地区的贫下中农来干校与干校学员一起活动，具体实施对学员的“再教育”，而且也从未派学员们出去向贫下中农学习过。也就是说，军宣队既未邀请过一位有代表性的贫下中农来校介绍个人或地区贫下中农群体在过往斗争中的英雄业绩，也未派出任何学员或学员代表出去参观或走访当地贫下中农群体的斗争事迹。他们在领导干校兴办的过程中，实际上只是利用这一平台，做了两件事情。其一是，利用学院自身的专业技能和技工的力量，并以广大学员做劳动力，修建职工住房并从事农业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军宣队从未和广大学员一起参加过任何劳动，而是一群典型的不拿枪的督导者。就农业生产而言，主要是插秧、种稻、养鸭、种菜等。对此，军宣队则完全是放羊式的领导，不计成本，不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如乱砍乱伐对林木和水土保持的破坏和影响）；其二是，通过“清查五一六”，继续对广大地院学员（学员中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在京或不在京单位的学员）进行整肃和残酷的政治迫害。而且，因干校地处偏僻的山沟里，加之众人均来自北京，在此无亲无友，除书信外，大家没有对外联系的其他渠道和条件，故众人犹如被禁闭在集中营里一般。

因此，在这里搞运动，没有在北京时的时间限制。即没有上下班一说，只要需要，每天三个单元（上午、下午和晚上），都可用于清查工作，形成一种“全天候”的清查模式。这种集中营式的“清查”平台，也只有在五七干校这一特有的场合下才可能出现和存在。

2，对无冕权威老师的批判

当我奔赴干校报到后，我仍在探工系所在的五连从事最初安顿方面的辅助工作（因当时我仍持有半休的医院证明）。在一次与正在接受批判的成嘉式老师的闲聊中，我问到他挨批的情况。到干校后，校部调他去负责管理柴油发电机组（因他是学热工机械的，在学校是教热工和内燃机的老师）。半个多月前，下班落闸停车后，因疏忽，没有注意到寒潮来袭的预报，忘记将柴油机缸套内的冷却水放空，而当夜气温确实因寒潮到来骤降，致使冷却水结冻，导致柴油机缸套胀裂。因无备用的大马力柴油机，故干校连续多日停电，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件事被定为重大责任事故，成老师为此已连续多次检查，接受军宣队专门组织的班子，对其进行批判。尽管他已承认错误，而且对因自己的不慎给大家带来了那么多不便深感愧疚，并表示愿意承担责任赔偿。但事过近一个月了，军宣队仍未将其放过，原因何在，这还要从成老师的个人经历说起。他是上海交大解放初的本科毕业生，后又考取了清华的研究生，用现在的语汇可说是“学霸”。但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故在院系调整时，其研究生学业尚未结束，就于 53 年底被提前分配到地质学院，讲授热工机械课程。54 年我们入学后，他因已无条件去教堂，加上有很大的无形压力，故他就不再在公共场合里，从事因习惯而做的宗教习俗礼仪，如在学校食堂里，饭前作祈祷等。久而久之，人们觉得他似乎已放弃了原来的宗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上，他较少与旁人主动交往，经常独来独往，人们对他的这种作风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在政治层面上，除规定必须参加的政治学习和活动外，其他各类政治活动他从不参加，而且在各类政治学习讨论会上几乎也从不发言。所以在政工干部眼中一直将其视为异类、是为落后分子。但在行政领导眼里，因他的业务能力较强，给予他的各项工作和教学任务，从来都是兢兢业业地完成的，故师生关系挺好，也让领导放心，是一位能独当一面的教师。加之他出身没有大的问题，本人除信过基督教外，也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又是单身，社会关系简单，故在他结束学业后的历次运动中，包括文革在此

事故发生之前，都没有直接触及到他。而今这次事故，再怎么批也无法说成政治问题，故拖着不放的理由也就只能认为是故意整人罢了。拿班子里的人“有意”放出来的话说：“就是要打打他那权威似的态度”。从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干校，尽管各类批判会都被冠以是对被批判者的“帮助”、“挽救”等美名，但骨子里却是要把被批者改造为一个顺从者、驯服者。不达此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事实上成老师也知道班子里放出来的话，所以，他对我说道：我并不是权威，但我看不惯那些自己不懂，还要瞎指挥的人！我听出来他对眼下的情况有看法，也感到此事发生前，他肯定与相关领导有过一些争执，但我不便也不想卷入其中，故我未进一步再问，只是劝他不要太介意，也不用背包袱。而且告诫他，对有些批判你不同意的，可以回避暂不表态，若一定让表态时，千万要注意态度。

闲聊分手后，有一天我遇到了地院车队的原负责人宁师傅，他是元旦前因运设备从北京过来的，但卸货后被要求留在这边帮帮忙而未归。当我对他说起成老师的事时，宁师傅说到：也算他倒霉，我们这边的六辆车都没放水，没一辆冻了的。他算白信上帝了，说毕还做了个鬼脸。对此我说道：您也是的，人家挨批您还挤兑人家，太不厚道了吧！？他忙解释道：小宋，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总怀疑这里有问题。我问他啥问题， he 说道：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你想，他拉闸下班都已经是十点半以后的事了（干校规定十点半熄灯），机器停车时温度很高，再说气温低点，也就零下两三度，一时半会儿哪那么快就会冻裂了？宁师傅是解放前学徒出身的技术工人，开车、修车都是院车队里的顶尖儿的一把手。听后我也觉得他说得有点道理，但我心想，不管时间长短、温度低不低，缸套内水结冰应当是肯定的。故我接着问道：但不管怎么说，缸套里的水总归结冻啦！宁师傅接着说道：我没说缸套内的水没有结冻，但我认为结冻的时间不长，也不可能冻透，否则，车队的车为何都没冻坏？我说：那可能是因为你们那六辆车比较集中，降温结冻的时间比发电机组一台机器要短一些吧！宁师傅继续说道：你说的也有点道理。但我的怀疑是发电机组的柴油机质量上有问题，或者缸体原来就有裂纹但没裂透，故还能照旧使用，而且表面看也没事，这次稍有冻结就给撑裂了。不信你等换缸套后将报废的缸套砸开，如果只有一条新裂纹那没的说，如果有陈旧裂纹存在，那就可证明我的说法。听罢宁师傅的分析，我不得不服气！但我说道：看来用不着砸了，因现在军宣队正让化学教研室的黄×× 老师和我们系的钱天

宇（宁师傅认识）搞高温树脂粘合剂配方，准备粘结裂缝来修复呢。宁师傅说到：小宋，你不懂。如果这事就这么过去了，那就算了。但如果真要给成老师个什么处分，那我还得说道说道，干嘛欺负人家老实人呀！我有把握，砸开验证，肯定我说得对！听到此，我内心深处就不仅仅是服气了，而是宁师傅的一身正气深深地震颤着我的心灵。想起两三天前，我因不愿进一步卷入，而未与成老师深谈的心境，真觉得汗颜、羞耻和渺小了。而且，就我所知，宁师傅与成老师并无多少交往，相互间也谈不上有多少交情，只因成老师的个人经历和为人与一般的人有较大差异，而为地院的老职工们所熟悉罢了的。最终，因粘合法修复成功，成老师的问题也未再追究，所以宁师傅的验证也就不用实施了。但这件事情中衍生出来的“人物故事”却深深地印痕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没有忘怀。尽管柴油机的问题给成老师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一度给他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但坏事变好事，干校之行后，也给成老师人生历程带来了一次转机。即干校结束后，他又回到北京。在 1975 年中，地院迁校去武汉后不久，在系行政领导的照顾下，同意他调往上海。回沪后，他在上海工业大学任教（钱伟长任校长），在沪，他很快就并被评为优秀教师，可谓大器晚成了。

3，调木工队劳动

到干校快一个月了，一天我去木工队电锯组那里，准备捡拾一些废弃的木料，加固宿舍通铺的铺板。经电锯组阮天健老师同意后，我到废料堆处挑选。选好后，我借了一把手锯，将较长的板材按所需的尺寸断开。当锯好后我去还手锯时，木工组的王贻伦师傅见到我问道：小宋，你看这个砂轮片中心眼比砂轮轴大一圈，有办法解决吗？因当时我还不认识王师父，虽我在校工作已十二年，但从未与木工班的师傅打过交道，对他提出的问题，我又不大明白。所以我放下手中的板条块，不好意思的反问道：我不大懂您的意思，您再讲一遍成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带我绕了个圈走到砂轮机处，只见砂轮机已经拆开，旧砂轮已经不能再用，卸下后扔在了一边。王师父将手中的新砂轮片往砂轮机轴上一套，并说：你看！这下我明白了，就说道：需要量好尺寸，加工一个轴套就行了。但要保证加工的同心度精度，否则砂轮轴的转速太高，不同心时离心力太大容易出危险。听后，王师傅说道：这个我明白，但这里没有车床，没法加工轴套。确实，巧妇难为无米炊，而我这时也准确地懂得了王师父的问题所在了！

于是我问他：您很着急要用吗？他回答道：很急，因电锯盘等着打磨，否则很快就得停工！这时我用卡尺测量了砂轮盘的孔径和砂轮轴的轴径，二者的直径差约为 5 mm，也就是说轴套的壁厚约为 2.5 mm。我内心盘算了一下后对王师傅说道：可以用手工做一个木质的轴套试试，但需要一块不太硬而且韧性较好的木料，木料最好是顺纹的，外径尺寸和厚度比轴套略大一些作为轴套加工的胚料。类似兰考的泡桐树那样，但质地要比它硬些才好。此外还需要手动木钻和几把细木锉和平铲刀、曲面铲刀作加工工具。听后，王师父问我，你能帮忙吗？我回答道：我可以试试，只要木料合适，成功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为说明这点，我将自己的想法和为什么成功的把握较大的原因坦率地告诉他了。听后他很高兴，觉得我的想法有道理，并说道：你要求的木料这里有的是，就是樟木。它的韧性很高，而且纹路比泡桐树要好许多，易于手工加工。说毕他问清我住的宿舍，说准备好了后去找我。分手前，我再次仔细地测量了砂轮片的孔径和砂轮机的轴径后，我拿了刚才收集的板材就回宿舍去了。吃过晚饭后，王师父和木工队的李文章师傅带了木料和工具一起来宿舍找我，并带了一块垫在桌上的厚胶皮板，既防滑也可避免加工时损伤桌面。他们问我大约要多少时间，我说因过去没做过木工活，不好说准，但我想明天中午前应能做好的。他们没表示异议，嘱我注意安全后就走了。为不影响他人，晚上我只是在胚料上将线画好，为增加可靠性，我画了两个胚料样，准备第二天早上其他人上班后再开始加工。第二天我很快将两个木质轴套加工好了，当我带去木工班时，也就十点多钟。我将木轴套交给王师父看后，他很满意，说肯定没问题。我们先将木轴套压入砂轮片，再将装有木轴套的砂轮片轻轻地敲打套入砂轮机轴上，最后拧紧固定好再装上防护罩。然后我又用手转动砂轮机，检查了一下砂轮转动时的对中情况，确定没有问题后，王师父即让合闸开机。结果一切正常，这让王师父和随后赶过来看的李师傅非常满意，连连夸我的主意好，手也很巧，搞得我还真的不大好意思了。因毕竟帮助人家解决了一个难题，自己内心还是挺高兴的。但我还是自谦地说道：您二位别夸我，给你们当学徒得份都不够呢！可没想到，这句不经意的话，却给了我一次转行学木工的机会。

就在修好砂轮机后两三天，连领导通知我第二天去木工队报到。当我问起原由时，他告诉我是木工队的王师父找军宣队蒋喜亭要的你，说木工队需要一名懂机械的人管理和维修木工班用的各种机械。这样，我到干校不久（大约一月中下

旬)即离开五连去木工队上班了。到木工队后我才知道为要我去木工队,王师父还与军宣队干校负责人小有争执呢。当王师父提出要我去木工队时,蒋开始并不同意。对王师父说:要懂维修机械的可以在五连找其他人去,干嘛非找他呀?而且他身体也不行,现在还半休一个月呢。这时王师父才把修砂轮机的事说了,并说,他身体不好搞木工班的机械维修正合适,属轻体力劳动。只要他能保证我们的机械运转正常,我们就能保证基建的进度计划按时完成。最终,蒋出于确保基建进度考虑,才勉强同意了王师父的要求。

报到后王师父对我说:今后你主要负责机木工这块的机械,确保它们的正常运行、定期维护,还有就是电锯盘、机刨刃的修磨及电锯盘的整平工作。除一米、一米二、一米四直径的电锯盘修磨整平比较费力外,其他工作的体力消耗都不大,你应当能胜任。大锯盘修磨整平时,可找人帮你一把,成吧? ! 听后我说道:木工机械的运行和维护我需要先熟悉一下要求,估计掌握起来难度不大。但刃具的修磨、修整,我从未接触过,恐怕得有一个学习过程。我注意到王师父他很注意听我的回答,一直两眼注视着我,似乎要看透我的心思一样。当我说完后,他笑道:刃具这块儿我会教你,我相信你会很快掌握。我知道你和薛师傅学过锻工,锤头上的功夫应当可以,这也是我非要你来这儿的原因之一,锯盘整平需要眼力和锤头上的功夫。机械维修那块儿,让李师傅带着你做一遍,然后你自己看看说明书,按上面的要求去做就是了。都交代清楚后,他又问起我的身体情况。我简单地告诉他是胆红素增高症,除了体力上较容易疲劳外,其他方面的反映不明显。并附带说道:感谢他要我到木工队来干活,我会努力干好的,身体不会拉我的后腿。话毕,他让李师傅带我看了一遍机木工用的各种机械,以及各台设备的检查、上油部位和时间间隔。他特别向我强调的是:在检查、维护每台设备前,不但必须先将这台设备的电闸拉掉,而且,因这里都是临时搭建的工棚,线路设施相当简陋,因为没有锁,所以拉闸后还必须将闸上的熔断器取下来,并带在自己的身上,以防他人误合闸时造成事故。当相关的机械都看完后,李师傅又给了我几本说明书,让我拿回宿舍再看,并让我自己建一个设备维护档案,记下每次的维护内容和时间,以防疏漏。言毕,我又去找到王师父,他简单地问了问情况后就让我先回去休息,明天上班时教我锯盘修磨和整平的方法。

此后,我就到机木工处上班。开始王师父给我讲解并做了一遍锯盘、刨刃的

修磨，看后我觉得掌握起来难度不会太大，关键是手要把稳工件（锯盘或刨刃），眼要看准并始终跟着修磨点，压紧力不能太大以防过热锯口退火变软，但压紧力太小时工件会跳动，而难于把持。当王师父修磨好一个锯盘并检查一遍后问道：你能看出点道道吗？我没有隐瞒自己的想法，也坦率地讲了自己归纳的稳、准、力三个要点。但补充道：中国有句老话，看着容易，做起来难。要做好恐怕得练不少日子吧！听后，王师父对我概括的三点非常满意，笑着说：教你们比带学徒要容易多了，多读点书还是好呀！你懂道理后，做起来就不是照葫芦画瓢了。出点问题自己就能找出原因，掌握起来就会快得多。不要急，注意安全最重要。后来，他又找来一个中号锯盘（直径 800 mm），教我整平。他指着锯盘上一些鼓起来的部位说道：由于锯盘开木料时转速很高，虽有冷却水淋冲，但中心部分还会因过热而变形，工作一段时间后，一面就会鼓起来，导致夹锯。这时就必须停下来，卸下锯盘将其整平。否则，继续开料时推进阻力太大，人的体力消耗就太大了，而且锯缝也变宽，出材率降低浪费太大。接着他边敲打锯盘边说：整平很简单，就是那儿凹敲那儿。而不是那儿鼓敲那儿。边敲打边观察，直到敲平为止。整平的快慢，决定于你敲打的力度和准度。一是，开始时要敲击凹部的中心处，而后逐渐外移，力度逐渐减轻；二是，先整平内圈的凹处，逐次整平外圈的凹处，直至全部找平。我边看边听边琢磨其中的道理，看着他那轻重不同、位置不同但频率几乎不变的敲击，我觉得掌握起来有相当难度，远比修磨要难许多，得反复练习才行。但琢磨后，我觉得道理却很简单，我认为就是利用敲打调整金属材料的内应力（即冷作硬化），达到让内应力平衡的目的。一旦内应力平衡了，锯盘也就处于平整状态了。想到此，我突然有所感悟地问道：那您调好的锯盘放一段时间后，岂不又会变得不平了。那到用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再整平呢？对于我的问题王师父明显有些“吃惊”地看着我说：你的悟性确实很高。一般锯盘调平后下一个班就需要用，否则就会又不平了，但不平度比调整前要小得多，再用时只需作些小的调整即可。所以一般长期不用时不用急着整平。说毕，王师父让我接过他刚整过的锯盘说道：你看看哪儿还需要继续整整，试试吧。我仔细观察了很久后，对王师傅说道：我觉得还有这几个地方（边说我边指着该整平的部位）需要进一步整整。王师父听后说道：差不多，你自己试试看吧，记住开始时力度不要太大，别想一下子就矫正过来。整平是个慢活，你整平的越快，它回弹得也越快。

王师父说完后，我就拿起小锤按师傅教的方法开始了我学徒整平锯盘的生涯，师傅看了一会，点点头说，不错，你很快就能出师，好好干。这下电锯班的锯盘就不愁了。并又嘱咐了一句注意安全后，就去忙他的事了！

当时因急于盖房解决干校学员的住房问题，所以对木料（木板和方木）的需求量很大，只要大的圆木一运到干校，就被立即送到电锯组，等着开料了。电锯组主要是地化教研室的老师和实验员，我记得的有：阮天健、沈庸立、余××等，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大个子，即使这样，面对直径 50—60 mm 的圆木，开锯时也是非常吃力的，李师傅说这是非常重的重体力劳动。确实一根圆木开下来，他们都已经累得不行了，但没有一个人在抱怨，都把尽快建成干校当作自己的职责，这就是那个特殊年代造就出来知识分子。为了减少开料时阻力，我向阮天健建议道：只要感到开锯时阻力变大了，就立马停下来换锯盘，我整平锯盘的劳动量远比你们开木料要小很多，而且，这对延长锯盘的寿命，增加出材率都有好处。他（电锯组的组长）接受了我的建议，下班时还在班务会上表扬了我。我并不在意他的表扬，但从中然我感到他的为人是正派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和逐渐掌握了修磨、整平的技术后，我对电锯组的工作程式和要求就比较清楚了，这样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也提高了主动性，而非刚开始时的穷于应付。这样，不仅可以比较从容地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而且还有时间帮电锯组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当时主要是让我另外开了一台小的电锯台（直径 400 mm），帮助做些开小板条的工作，以供应木工队建房的需要。此前小板条一般也由大电锯来开，既浪费又影响大板料和方木的供应。让我开小电锯也是电锯组的同志们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当时我半休已经结束）而采取的措施，因为开大木料的体力消耗对我来说可能还一时难于胜任，对此我是心存感激的。

正当我对电锯组的工作应对已经比较自如的时候，突然于 70 年 3 月 28 日下午三时接到北京的来电称：“小牛病，速回京”（小牛为儿子乳名）。一来因不清孩子的病情和严重程度，二来因请假过程的不顺，致使自己的心绪很差，开料时注意力不集中，在 3 月 29 日出了一次事故，自己的右手拇指被锯伤，给整修锯盘的工作带来了一定影响。为确保大锯盘的及时整平，王师父只好在木工队基建组和电锯组之间来回跑动，以保证电锯组对平整大锯盘的需求，这让我很感愧疚。

为了避免受伤拇指的感染，我将近有十天时间没有再修整过大锯盘。直至伤口确定没有问题后，我才又把大锯盘的正平工作完全接过来。

当电锯组的工作又步入正常后，四月下旬的一天，在全干校大会上公开炫耀自己是侦查员出身，那个人有问题，我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军宣队蒋喜亭的副手（姓名记不得了），突然来到电锯组东看看西看看，并说道你们得加紧干才行，料供不上，现在已经影响基建那边的工作了。因大锯正在开圆木，忙得不行，谁都没有理他。可能对如此怠慢他有些不满，就放大声音地说道：跟你们说话要注意听，光低头干活不行，要注意政治，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确保基建的进度，但你们的工作却没有做好，料供不上，影响了进度。这时，我看出了他确实因众人没有一个理他的而有点生气了，但阮天健他们的大圆木这时刚开到一半左右，确实不便停下来，去听他那不了解情况的“瞎唠叨”。出于怕他因不懂开大料时不便中间停车的特殊性而更加生气，于是我停下了自己的小电锯，走到他身边说道：×副指挥，大木料开到一半左右时，是不便停下来的。而且，开大圆木比较危险，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所以阮组长也不便答话。要不，等这根料开完后您再来跟大伙儿聊聊？没想到副指挥长抓住“聊聊”两字发火道：什么“聊聊”，我是让你们在接受再教育的劳动中，要注意政治。从你刚才的话中，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政治，脑瓜里想的只有生产上的危险性，要高度集中这一套。副指挥的无端指责也激起了大伙儿的不满，阮天健老师这时也将大圆木向后撤回十多厘米，大喊了一声拉闸停车！他抹了一把满脸带水的锯末，掸了掸前胸防水的围裙，走向副指挥长说道：您有什么指示请说吧，并招呼大伙到工棚外堆放圆木处“听训”。这位号称有一双侦查员眼睛的副指挥，似乎没有看出大伙的怒气和不满，倒反以为自己一发火，就让大伙变服帖了而自得。在他走到木料垛边时，又开始了要注意政治，确保基建组的用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等训话。当说道，由于你们供料不及时，基建组建房的速度已经受到了影响时，地化实验室余××实在听不下去了，就站起来反驳道：副指挥长，房建进度受阻与我们无关。圆木是今天才运到的，料一卸下来，我们就马上开锯了，一点时间都没敢耽误。木料我们已经等了两天了，这才导致大板材和方木断档，使房顶施工停了下来。尽管小余打断了副指挥的训话让他有些不悦，但他讲的是事实，副指挥也只能自吞苦果，既不好辩解，更不能发火申斥。但为了维护自身的面子，还是喃喃地说道：我讲要注

意政治是大的原则。你们不要纠缠于具体问题而忽视大原则，要领会精神实质。这次的教训也值得注意，生产环节的顺畅关系，特别是运输环节，今后更要周密考虑。很明显，运输方面的问题和电锯组的工作根本沾不上边，他只不过想以此为自己的瞎指挥所造成的尴尬圆场罢了。

军宣队进院后，我与这位干校副指挥长碰面交谈还是首次，他那种以改造他人为己任不可一世的救世主做派，真令人恶心。尽管短暂的交谈，他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好的印象。但反过来看，估计他对我非但不会有好印象，相反，自反干扰以来积累起来的问题，很可能在他心里已经有了要拔除这根“眼中钉、肉中刺”的决定了。我之所以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事过没几天，在4月27日晚，五连的领导到宿舍通知我说，自明日起，去采石组上班。当我问到是否我应先去电锯组打个招呼，将那边的工作做一个交代呢？连领导说，不用了，军宣队会和他们打招呼的。简单生硬的几句话，让我明白了这是军宣队的决定，没有任何理由，完全是政治上的迫害行为。即使如此，我心想自己也没啥好怕的，今后言谈上多注意些就是了。如果那天我不主动去向他说什么，估计他也不会立马儿就找我的茬，还是自己总觉得是个主人，而没有将自己定位为改造对象所惹得祸。总之，在大讲阶级斗争的那个年代，不懂得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已经被执政者所圈定，盲目相信那些“重在表现”的骗人套话，再努力改造、表现，也不可能变成一名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至多也就是一个驯服工具让干嘛就干嘛而已。即使有个别出身不好的人被吸收入了党，也只不过是政治上或统战上的需要，同时也是作为一个例证，让众多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能够信服党所提出的那套政策是真心的而已。

第二天一早（4月28日）我就随五连采石班上山去了。为避免日照对人的伤害，采石班均早出晚归，故原想走前与电锯组打个招呼的想法也未能实现。但傍晚回到干校后，就听人说起电锯组今天和军宣队的头儿干起来了。起初我没太在意，后来听说是为我被调走的事而争起来的，所以我就比较注意地打听了一下。原来当电锯组的人知道我被调往采石班后，阮天健老师等就找到王师父反映，并一起去找军宣队询问原因。因话不投机大伙儿就与副指挥争起来了。副指挥一再强调，大家到干校来主要是接受再教育，而不是搞技术。让宋去采石班，也是为了五连能更好地监督他的缘故。你们需要一个懂机械的，可以再派一个人去，

不要觉得没有他电锯组就不行了。王师父看出军宣队的决定已不可更改，再争也无意义。就说了一句：您别以为培养一个技工那么容易，我也不想再费这个劲带别人了，既然已经定了那就算了。说毕就和大伙儿一起回到电锯车间，双方的争执也就不了了知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嘛。

听到大伙儿为了能留住我而与军宣队的头头争论，心中还是暖融融的。我在电锯组前后近三个月，此间彼此关系融洽，相互关心，也让我有机会结识地质系的一些老师和木工王师父。三个月的经历说明，大家接受了我，也肯定了我。同时也预示了，今后无论在哪种环境下，只要自己认真去学，踏实去干，就一定能被别人认可，并被社会接受的。只要坚持这样做，就必定是会有前途的。

4. 最让人煎熬的日子——儿病危，母返京

正当我对电锯组的工作应对已经比较自如的时候，突然于70年3月28日下午三时接到北京的来电（儿子突然患病这段时间——70.3.28.——70.5.5.，我又恢复了记日记的旧习，故得以保留了准确回忆的依据）称：“小牛病，速回京”（小牛为儿子乳名）。接电后我们一下就蒙了，不知孩子何病，为何如此突然？但我们还是立即拿着电报前往校部请假。当时校部办公室的负责人看过电报和我们的请假要求后说道：你们先回去，我们要请示一下军宣队领导，再给你们答复。当时的政治形势就是如此，一切都要经过军宣队的认可方能执行，因此我们再急也没用，只好回去先自行准备，并等待批复。可能因为心急如焚，总觉得时间好像停滞了一般，慢的出奇。一直等到晚饭前，才得到通知说（校部派人到宿舍传达的）：军宣队领导说要经过留守处核实后，方能批复。眼下你们需要安心等待，继续完成各自的任务。听到如此冷冰冰而且对下属毫无信任可言的回话，真让我气愤至极，但我知道这与传话人无关，完全是军宣队这帮以改造人自居者的作为。故我还是平静地问道：为何请假还要核实，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孩子才一岁多点，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对我的问话来人的回答是：现在很多都来电报要求请假回京处理，其中真假难辨，所以军宣队决定一律要经过留守处核实后，方能批复。这点也希望你们理解。我又追问道：我们要等多长时间，孩子若真的出了事谁负责？对于万一孩子出事谁负责的问题他始终回避不答，但却明确告诉我们，办公室是通过长途与留守处联系的，他们一经核实，也会通过长途告诉我们的，我们会抓紧处理，这点你们可以放心。但什么时间能得到回音，我也说不好。因

为我们的对话就在集体宿舍门口说的，声音也比较大，所以室内很多人都能听到（因南方的房子隔音很差），为避免不必要的影响，我们也就不再与他争辩，只好提请他注意，如果等的时间长了，请他们能主动再与北京联系，对此请求他同意后，我们就决定自己先去仁和公社，分别给我姐姐及帮带孩子的朱师傅打电报和电话，以便问明情况。给我姐的电报顺利发出了，告知儿子病了，请她速往查看，并回电告知。但给朱师傅打电话尽管等了快一夜，也未能接通。至凌晨只好悻悻而归。29日上午稍事休息会儿，昭明又去仁和想给朱师傅再打长途询问情况。并商量好万一打不通，就发电报，让朱师傅详述孩子病情，不要怕花电报费，以便我们能知详情。我也回到电锯组上班，由于一夜几乎没睡，加上心里对孩子病况的担忧，我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起来，这就犯了电锯操作时的大忌。临近中午快下班时，终于事故发生了。当时我自己操作小电锯开小板条，就是因注意力不集中，右手拇指在送进木料时未能及时脱离（也未按往常要求的，临近送料末端，最好用另一小段木料推送，而不要用手的告诫），导致被锯片切进 12 mm 一个深口子。幸运的是顺指向切入的，并未伤及指骨，但疼痛至极，且出血很多。我立即关了电锯，拉了电闸，打过招呼后，左手使劲掐住右拇指奔往校医室。恰好校医室是外科大夫陈碧燕值班（她是我中学好友的表姐，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熟识），她首先止血、消毒，并仔细检查确定未伤及骨骼后，给我做了紧包扎固定。她说：因伤口两侧均有指甲，这里的条件不便缝合，只要注意不着水、不感染，伤口可以很快愈合。在她为我包扎时，因疼痛过剧我还晕厥过去。当包扎好后，她让我在校医室躺了较长的一段时间，还给我服了止痛药、喝了些糖水（是她自己的糖）。并告诫我不要为孩子的事太过着急，搞得自己心神不定，倒反误事，眼前的工伤就是警钟和教训。事后每当想起，我都真挚地感谢她在那样的环境下，给予我的关心、爱护和忠告。她在 75 年北地迁往武汉时，随其爱人一起从北京调往河南郑州，此后我们再未能谋面，只能借此文祝愿她一切安好了。她若安在，如今已是米寿之年了！昭明到下午才返回干校，告知电话仍接不通，只好发了个电报。看到我手指又受了伤，心情更加不好了。我只能尽力地安慰她，并告知陈大夫说了手指伤只要不感染就没有问题，不用担心。我们都明白，在这种分外焦急的情况下，需要的就是相互间的劝慰，这是渡过难关的唯一方法。到晚上，我们接到了孩子姥姥三月二十四日写自北京的信件。信中还说到孩子很

好，并告知孩子三姑已回京，但还将去山西劳动。从中我们可判断出，孩子的病是在 24 号之后犯的，而且，也知道我姐姐这时大约仍会在北京，若此，北京还有人能为我们暂时分担一些难解的问题了。这样一来，我们两人的心境的苦闷程度也就多少得到些缓解。29 日就是在这种担忧煎熬中度过的，直 30 日早饭后北京方面仍无回电。约到十时，校部通知准昭明回京探亲。这样我们如释重负，昭明立即去仁和乘船赴清江，准备从京广线乘火车回京。中午 12 时左右，通知我有电报，我即刻赶去仁和查询。知是我姐姐的来电，告知儿子肺炎住院，现高烧已退，继续观察。回干校不久，4 点左右，接昭明从清江打回的电话，询问孩子的情况。我告知三姑来的电报内容，让她在清江继续与朱师傅联系，进一步问一下情况，再定有无必要回京探视。31 日正午前，昭明从清江经仁和又返回干校。她告知我在清江与朱师傅联系上了，知道儿子因肺炎住院，现高烧已退。据此，她觉得与姑姑的电报所述一致，加上姑姑现在北京，孩子身边有亲人也可放心，就决定暂先不回京，并委托他好好照顾，等确实好了以后再出院。对于昭明的决定，我完全同意，这也充分表明了我们绝非畏惧干校环境艰苦的好逸恶劳之辈。但我们还是上当受骗了，轻信了朱师傅隐瞒孩子生病真实原因的谎言（当然，这也与姑姑电报中怕我们着急未将全部真情告知有关），导致昭明作出暂不回京并即刻返回干校的决定。就在昭明回到干校仅两三个小时后，午饭时，校部又转来探工系留守处发来的电报，言：宋淳患肺炎，脸部灼伤感染，现住院。见此电报，我们大吃一惊，孩子灼伤感染一事，朱师傅为何在电话中只字未提呢？为何又会感染呢？面对这些疑问，我们决定昭明还是应当迅速回京，一方面可以照顾孩子，更重要的是应当搞清楚情况，以便决定今后如何安排！就这样昭明又立即办了请假手续（准假 20 天），决定四月一日再次赴清江转车赶去北京。我一早送昭明到仁和，直到船离岸驶往清江，渐渐看不清她的身影后，我才慢慢转身踏上返回龙陂的归途。但我的心似乎也被昭明一起带回北京，走上看望儿子的旅程。内心的焦虑、思念，加上这几天的折腾，两腿似如绑了沉重的沙袋，抬不起腿、迈不开脚，晃晃悠悠地直到午后三时许才回到干校。回到宿舍，看到同事们给我打好的饭菜，我很感激。但我毫无食欲，喝了几口水，爬上床铺躺下来想睡又睡不着，只是闭着眼睛，想着儿子的病情和伤势，惦记着妻子的劳顿和身体。我的心境越来越低沉。再过几天我就 33 周岁了，从来没有过的悲苦折磨着我，令我喘不过

气来。一直以来，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乐观、坚定、向上的人，而今为何竟会如此儿女情长呢？我一时找不出答案，但我意识到，无论如何，不能被这种悲苦的情绪所左右，如此只有百害而无一益。于是我坐起来，并从床上爬下来，强迫自己吃了点东西，然后到电锯组看看（因我手指有伤，还不能干活）。看到大伙儿都在忙着，我也无法插手，只能与大伙儿打个招呼，然后收拾一下工棚内外的环境，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下班时，我才把孩子的情况和干校已准假，昭明上午即赴清江转车赶往北京的事和大伙儿说了说。大家均劝我不要着急，身体不好不用急着来上班，而且告诉我，今天王师父已经来把大锯盘整出来了（自我能比较熟练地掌握大锯盘整平后，王、李二师傅基本很少到电锯组来，电锯组的工作，主要由阮天健老师管理安排。他们则把主要精力完全放在木工队建房那边了），这两天都有得用。并说，王师父讲了，这几天他都会抽空过来整修大锯盘的，你的手必须完全好了以后再接过去。我谢过大伙的好意，面对大家的关心和周到地考虑，犹如一股温馨的暖流，驱散了几天来一直压在自己心头上的悲苦愁情，似乎我又活过来了一般！

四月九日，我接到了昭明回京后的第一封来信，告知我孩子此次患病的真实原因。对此一方面真让我吃惊，看似一对相当老实的工人夫妻，竟如此不敢担当，用谎言欺骗，险些葬送了我儿子的幼小生命；另一方面又非常庆幸孩子的姑姑恰好回京，没有听信张阿姨（朱师傅的爱人）的谎言，坚持去医院检查，从而赢得了抢救的时间。昭明信中写道：儿子是 22 日烫伤的，但朱师傅他们隐瞒了此事，没有告诉姥姥和姑姑。姑姑 24 日回京后，就立即去地院看望孩子和他姥姥。发现孩子脸上包着纱布，问时，阿姨说是孩子学走路时不小心摔了，脸部有点擦伤，已经在校医室上过药了。因孩子学步时摔跤很自然，加之当时孩子并无异常，故姑姑并未指责，但却提醒阿姨要注意防止感染，然后就离开回师大去了。26 日，姑姑不放心再次去看孩子，这时孩子有些低烧，姑姑建议去医院检查。但阿姨说到校医室看过，而且已经打了青霉素了。姑姑见孩子精神还可以，也未坚持一定要去医院就回去了。到 27 日，姑姑仍不放心再去时，孩子已发高热，姑姑让去医院检查，阿姨仍不同意。这时姑姑发了狠话：他父母不在，孩子有病去不去医院必须听我的，我负责。在这种情况下，阿姨只能按姑姑的要求，随姑姑一起带孩子去了三院。即使这样，她在医院还继续欺骗大夫，隐瞒烫伤实情，说脸部

只是摔伤，不让大夫打开包着的纱布查看。最后因找不到高烧和白血球奇高的原因，大夫怀疑是因伤口感染引起，而强行将包裹的纱布打开，才发现烫伤处已开始化脓，呈现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而青霉素对此不起作用，故孩子的病情得不到控制，有转成败血症和肺炎的危险。但三院无特效药不好收治，建议迅速前往儿童医院抢救。正是由于姑姑的坚持和三院确诊的正确和转院及时，才使孩子的小命得以挽回！

从信中我也得知，孩子的肺炎已经好了，原本已想出院。但因又开始发烧，故还需再留院观察，让我放心。有昭明在京，加之病情已得到控制，故我的心情就稳定多了。而且手指的伤口已完全长好，虽用力时有些异样的感觉，但基本不妨碍锯盘的整修了，所以我又将这项工作从王师父手中接了过来。似乎一切又回归常态，但孩子原本已打算出院了，为何后来又会发起烧来呢？这个问题总缠着我，让我不能完全踏实下来，直至四月十二日再次接到昭明来信方知，因孩子大病后体质下降，开始受到麻疹病毒的侵袭，故又开始发烧。直至4月5日全身出满疹子，高烧达39.9℃，被确诊为麻疹后，孩子才慢慢退烧，总算又过了一关。因为孩子又出麻疹，出院时间后延，故我于4月15日再次给五连打报告，申请续假两周，以便能有利于孩子的身体恢复。但16日连里答复说，续假期限只批给一周，对此我也不好说什么，只能赶紧去仁和将情况电告昭明，好让她尽快考虑好孩子下一步如何安置的问题。18日接到昭明来信，知孩子已于12日出院，但身体很弱，至今还站立不稳（病前一开始学走路了），要想恢复到生病之前的体质，看来还需不少时日。这也是我们不敢贸然将孩子带来干校的重要原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间的两地传书，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孩子的安置问题。鉴于孩子当时的体质很弱的现实情况，立刻带来江西恐难适应，万一患病更不好处置。若另找新人托带，情况不熟悉风险会更大。继续让朱师傅家人照应，虽有这次事件的阴影看出他们的自私和狭隘，但这次的大风险，对他们也是一次大的教育，说不定坏事能变成好事，今后会更尽心一些。再不济，也不至于隐瞒实情，捅出这么大的漏子！思前想后，我们终于在4月22日作出决定，将孩子继续留在朱师傅家照看，照看待遇不变，但必须对孩子尽职尽责，今后决不允许再隐瞒实情，不管出什么情况，必须实话实说。有问题不好处理的，就打电报或褂长途，费用由我们负担。这些意见，均由昭明向朱师傅和张阿姨两人一起交代讲清。我

们估计他们不会拒绝，万一拒绝，则不勉强也算让我们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那时只好带孩子来干校了，届时我再以要带孩来干校为由，申请续假了。事情一旦作出决定，我的心情也就完全踏实下来了。5月2日接道昭明4月27日的信，知道已与朱师傅家谈妥，他们同意继续照看孩子，并承诺尽职尽责，实话实说，至此因孩子突然患病住院造成的沉重精神压力，终于得以缓解。昭明也于5月5日回到干校，继续开始接受毛泽东独创的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生涯，而我们在分离一个多月后，又得以过上分居式的团聚生活了。

5，巧合，水边又见何部长

当我在木工队电锯组劳动期间，一天上班后王师父让我随军宣队蒋喜亭指挥长去一趟水边地质部干校，了解一下他们那边机木工方面的情况，为今后可能的合作趟条路。至于蒋为何去水边，王师父没说我也没问。上车后发现除蒋和司机外，还有物探的柴文全同志（当时他在干校具体作什么我不清楚，只知道文革前他是辅导员，文革中好像也是“红干联”的头头，但我们之间从未打过交道）同行。因为蒋原来是探工系军宣队的成员，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故相互间不怎么说话。而柴与蒋之间沿路几乎说话从未间断，因我觉得和我无关，所以也就不大注意他们之间的谈论。行车的路上，蒋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干校木工队的情况，我简单地向他汇报道：设备维护和刃具修磨已基本掌握，现已经能够独立应对了。但电锯盘的整平还不太行，一般我调好后，还需经王师父检查和找补一下才好用。接着他又问起此次去水边的具体任务，我简单告知是让我看看他们那边机械设备的情况，怕万一需要时，可知他们那边能否给以帮助。蒋听后说道：到水边后，你就直接去木工队办你的事，我们在校部有事与他们商量，大约要一个多小时，你要提前赶回校部来与我们会齐。

到水边下车后，我打听了电锯车间的具体位置，就按指点直接朝电锯车间的方向走去。当快到锅炉房时（因电锯车间就在锅炉房西边不远处，人家告诉我到哪就能听到电锯的声响了），我看到对面有一位老者右手杵着一根木棍，左手拎着一个花镂铁皮暖壶，有点瘸行似地向我走来。当我们相距只有三四米时，我发现来者竟是何长工部长。这时我极其自然地迎了上去，很有礼貌地向他鞠了个躬，并脱口而出地喊了声：“何部长您好”。根本也没有注意周边有没有人听到或看到，也没有想到若被别人听到、看到后，会有什么后果。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条件反

射，是在地质系统多年来（从进入地质学院起，已快整十六年了）深深留在脑海中的印迹的自然流露。而奇怪的是，我在反干扰时期的疑惑、震撼和愤恨却荡然无存了（后来在我回干校的路上，我想当时那种感情的自然流露，也与文化大革命延续到现在，在自己脑海中，好的印象留存的已经不多了，相反，内心反倒存在很多疑问。而且，也与内心对如此动荡不定的生活状况和不知明天该干什么、前途何在等，越来越感厌倦和忧心的心绪也有很大的关系）。老人对突然出现的这一情况肯定也感意外，但他的第一反应却是，立即用拿木棍的右手食指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并轻声地说道：别这样叫，别人听到了对你不好。面对他的话语和说话的神情，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和冲击，让我感到，在任何时刻总能把他人安危、好坏放在第一位的人，不可能是走资派，不可能是反党分子，他仍然应当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一个老革命、老领导。尽管他平时讲话过于随便，即使在公开场合的大会上，也会口无遮拦地说出诸如：你们都是我的兵——何家兵；地质队缺女的没关系，可以从苏联找，苏联人男少女多嘛；我不是中央委员，但毛主席说了，中央委员会不是湖南同乡会，你就委屈点算了等。但这些不着边际的戏言，对当时在大饭厅听讲的学生们来说，有几个会认真相信呢，大家只不过将其看作一种玩笑话，用以调节会场气氛而已，听后大伙儿会报之以一笑罢了。想靠这些去打倒一个人，岂不也是以言治罪乎！当时对何部长的告诫我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您又没被正式免职罢官那该叫您什么呀？！何部长轻声地说：就叫老何多好！并接着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告诉他我是地质学院的老师，现在仁和干校接受再教育。接着他又问我：你在文革中挨整了吗？我笑着如实地告诉他，开始挨您派的工作组整，现在又挨军宣队的整。听后他也禁不住笑着说道：革命嘛，难免不挨整呀。正确对待吧！说毕又问道：你是不是还有事呀？我说：对，我还得去电锯车间办事。他说：那就这样，并把木棍靠在腹部和我握握手。我又向他鞠了个躬，说道：再见何部长，祝您保重。他点了个头说声谢谢，就迈着瘸行的步子继续朝前走了。我看着他缓慢前行的背影，若非有事在身，我真会帮他老人家拎着暖壶，陪他走回宿舍，当时他的年纪应当已是古稀之年了。看他大约走出十来米后，我才继续向电锯车间大步急行地走去。自此之后我再也没有再见过何部长。

大约在 74 或 75 年夏，何部长还未能解放。一天他的一个侄子辈的亲戚何谓

平同志找到我（他是探工系钻探实习室的实验员，我一进入大学时，他就在学校探工专业工作，那时探工还没有建系），问我能不能带他去我父亲的老友家去看望一下老人？他说，想问问老人家是否知道何部长大革命时期在湖南的相关情况，因为组织上正在审查这段历史。我答应他这事我需要先去问问后再回答。我问后老人同意接待他，这样一天下午他开了一辆小吉普（当时他与郭兴老师和我系掘进教研室的汪铁铭老师等，都借调在体委登山处，正筹划着再登珠峰呢），由我带路去到老人家里。我向老人介绍后就退出来了，他们似乎谈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结束。再回学校的路上，小何（他年岁比我大，但系里的老师们都称呼他小何，故我也就随大流如此称他）告诉我，他此行收获不理想。因他老当时是以记者的身份作掩护，现需要证明的那个段时段，他恰好不在湖南省。因此，想帮老人做点事的想法，也没能实现。最终何部长再也没有回到地质部，是何原因就不得其详了。但老人最终的结局还是挺好的，在部队系统结束了自己革命的一生，而且是高寿而终！

6. 调回五连采石组劳动

4月28日一早，我就随五连采石班上山打眼放炮开采建房所用的石头。因在学生年代，我曾是年级“出名”的锻工，曾带我的薛师傅说过：你可以说已经出师了。被评为当时年级第一名“出师”的技工！所以头儿就让我抡锤打眼，因一般生手是不让抡锤的，怕打不准伤了扶钎人的手（当时在干校为炸石头，都是人工打眼，钎杆需要另一人来扶正，以保证炮眼的方向）。出于安全考虑，当时连里选的是小号锤（重12磅），而且因怕伤人，抡锤的人也是打会儿歇会儿，我估计连续抡锤的时间也就10—15分钟，歇着的时间也差不多如此，所以体力消耗并不算太大，只是晴天时太阳照的邪乎，故采石组均是早出晚归，中午在林子里歇着，下午两点以后再干。因为一出工就是一整天，所以刚到采石组时，我担心的是能否及时接到昭明准时回到仁和的时间，以便我去接她，减少一点她的负担。这下倒好，只能听天由命了。但她是怎么从仁和回到龙陂的，我不仅已毫无印象，而且也无法查询了。因这段时间最后一天的日记（70年5月5日）是昭明记的，她可能因为劳累，只写了：“妈妈今日回来干校”几个字。为避免记日记出事，我此后又终止了写日记的习惯。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在干校的生活尚属稳定，除了“双抢”（收早稻、插晚

稻)全校人员集中去大田劳动外，其余时间都在各自的班组里干活，我在采石组，昭明在菜班和编筐组劳动。个别时段，我又被机工车间借去帮助锻打割稻器的刀刃，当打造了几十对刀刃后，我仍然回到采石组干活。在干活过程中，我并没有“接受五连监督”的特殊感觉或压力，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和大家的关系也很随和。但我自己比较注意两点：一是，当听喝的，不发表意见；二是对文革中的人和事一概不发表评论意见，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表态，这也是“久经”运动之后，学会的一种自我保护方法。尽管我自己十分明白，这是一种个人思想上的倒退，是导致失去朝气、毫无主见人云亦云的“臣民”恶习。但在文革那样言路完全闭塞的政治环境下，对于老百姓而言，要想平平安安过日子，这也就是唯一可选的生活之道了。所以，我想只要不让军宣队抓住什么新辫子，你们爱怎么监督就怎么监督吧。当时我个人的情绪已经从对待运动的逍遥，变成了对现行做法的暗中抵制（或准确地说是内心抵制）了。说实在的，我当时在思想上对国家今后的发展和走向是比较悲观的。记得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周总理在一次全国性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四个有所”的号召，即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是否记得准确，有待查证）。这一号召给予我们这些年轻人以极大的鼓舞，自己也有决心要在专业领域里，努力钻研，做到四个有所的要求。而如今，面对现实，成群的知识分子挤在山沟里接受再教育，难道就能做到四个有所吗？尽管在儿子患病抢救期间，从广播中得知四月二十五日我国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取得圆满成功，这很令人鼓舞，在那样焦虑的心境下，我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当时的感受。但一枝独秀的技术成就，与四个有所的要求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这一点点成绩无论如何也不能遮掩当下科技教育战线上的茫然和无序，长此以往后果必将会显现出来。说心里话，当时我内心觉得，今后即使在干校干一辈子，也没啥了不起。自己绝不担心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而且还能做到被贫下中农接受和欢迎。因为有四清时农村的实践基础，眼下这点艰苦，又何惧之有呢？！在那段动荡的时间里，我也拷问过自己的灵魂（如果说人真的有了灵魂的话），可以说，对当时的一些措施慢慢滋生起来的暗中抵制情绪，是有一个逐渐演变和发展过程的。即从开初的不理解和不满意，渐次演变为逍遥。但逍遥是有条件的，即事情还不涉及到自身，你可以视而不见，或不予理睬，从而允许自己逍遥待之；但当事情已然涉及到自身而且必须表态时，则不可能再逍

遥，而只能用口服心不服的方式，行动上从之（所谓保持一致），而内心不满的情绪则日益加重，进而演变成暗中抵制情绪的滋长。而在这一演变过程中，首先起作用的不是思想想法，更不是什么理论诘问。首先起作用的同样是切身利害受到了冲击，从而产生了一种本能的“自卫”——内心抵制。如一说要去干校，而且地点偏远、时间“无期”，在这种情况下，家中老小怎么办？就如泰山压顶一般，来不得半点含糊。就觉得，解放以来，共产党为教育干部、改造知识分子，就从来没有拖家带口且不给时限这么做的。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改造问题，哪能株连无辜的家属、亲属和子女们的正常生活呀！这类与切身利害的碰撞的做法尽管有多年来服从组织决定的纪律教育做基础，但在完全无视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个人利益的文革环境中，这些措施必将导致人们内心日益反感和抵制，那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为了获取建房用的石料，我们基本上采用的是松动爆破技术，爆破后，再将炸裂的石头用人力撬落下来后运走。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只开采边坡处的石材，因平房对石材坚固度的要求不是很高；另一方面，这样也可避免爆破时被抛出的碎石过多过远，而造成搬运和安全方面的问题。在撬动裂开的石块时，我们经常会在石头落下后的裂缝处看到毒蛇（蝮蛇）卷曲着或正在蠕动、爬行。起初大家怕蛇，就哄走了之。尽管人们知道蛇胆是药材，蛇肉可食用，但无人敢于尝试。面对这一“资源”的浪费，我颇觉可惜，总想一试为快。为此，我专门走访了当地老表，问清了剖腹取胆和食肉的方法及要领，并拿了一条已被我们弄死的毒蛇请他示范后才离去。告别前，我将蛇胆和蛇肉都作为“酬劳”送给了他。开始老表不肯接受，我再三表示了自己的心意后，他才勉强接受并一再感谢。分手时，他还再三强调道：剁下的蛇头和食用后留下的蛇骨，一定要深埋在地下，因老表大多打赤脚，万一踩到毒蛇的骨头上，扎破脚后也会中毒的。由此可见几千年来流传并保留下来的，为他人安全着想的生活理念和品德，是多么的淳厚。当我掌握了取胆食肉的方法后，在采石班里我捕捉到好几条蛇，有的我们自己食用了（味道确实很鲜美），有的就送给他人同享。这也算干校生活中的一乐吧！除了食蛇肉外，在采石班我还利用休息时间，去深山里寻找合适的黄檀树，采伐后准备做木工工具（刨床、凿把、锯把等）用，以便今后自己制作家具时有工具可用，也不枉从王师父那学到的点滴木工手艺。别说，在干校期间，我给自己制

备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个体木工用的手动木工工具，包括刨、锯、凿、铲、边刨、槽刨、划线器、角度尺、直角尺等。并用这些工具在沙洋干校给自己打了一个纱厨柜（我的第一个作品），用于放置待加工和已加工过的食品（为了防蝇虫）。该橱柜在沙洋的个人制作中还被评为“第一”呢，当然，这只是众多留在沙洋，尚未借由返京的人们的一种自我调侃，并从中取乐而已，不可当真。但那个柜子的木料、样式、质地和漆色等，确实我都是比较满意，只可惜回北京后，因为卫生条件的变化和冰箱的出现而被淘汰了。淘汰，也可以说是社会进步、完善的一种体现吧。

7，又有新家了

干校的基建（主要是住房）在全力确保下，进展还是可以的。大约到八月下旬，六排或七排住房已经建起。每排住房由七八间到十三、四间房子不等，房子基本按北京的习惯是坐北朝南的，而且南向还有一个前廊，十分实用。但毕竟干校职工人数很多，这近百间房子难于满足要求。所以干校领导决定，每间房子再由中间打一隔段，将其一分为二，变成前后两间，分别分配给双职工和带孩子的双职工居住。尽管这样以来房间的面积较小（我估计每户有近十平米左右，前间要稍大点），但对一直挤在集体宿舍上下层通铺的双职工而言，特别是那些还要带一个同性别孩子的父母亲而言，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建一个自己的家是何等的奢望和迫切呀！今天看到一排排的住房已经建成，尽管新房既非豪华美观，也非宽敞明亮，但大家看后还是赞叹不已。因为新房的质地远在当地老表住房之上，起码新房墙体不透风，有透光的玻璃窗，室内比较明亮；而老表的住房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洞，白天室内也是漆黑的（当地有一种越黑越富的说法，窗户绝不能开大了），墙壁多数就是竹子编成的竹排，在其两面再抹上粘泥而成。粘泥干后往往会有许多裂缝，故四面透风。两相比较，说有天壤之别也不为过。此外大家满意还在于，一则这是众多双职工日思夜盼梦寐以求的住所，渴望的家终将落地；二则，这又是大伙儿齐心协力艰苦劳动的结晶，人们在直接享受自身的劳动成果时，欢愉的心情总是十分特殊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大约到九月初，分房方案终于下达了，我们分到一间处于最后一排北向的住房。尽管房间得朝向不好，最后一排房又对着通往坳下村的路边，正处于北风尽吹的风口处，冬天西北风一吹室温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我们想到的首要问

题，因为既然分到了房子，我们就想立即将孩子接来干校，完全由自己照料，以免再发生意外。但孩子终归还太小（一岁半多点），冬天太冷孩子会受不了的。所以在看完新分配的住房后，昭明就向我提出，要抓紧时间在接孩子来干校之前，在房前搭一个小棚子，既可在里面烧水做饭，放一些零碎。更重要的是棚壁可以起到挡风的作用，避免寒风直吹，让室内的温度能少许高些。对于她的建议，我认为很有必要，而且还觉得完成此事对我毫无难度。只要抽时间上山多砍一些小山竹，外加一些小树干作支柱和棚梁就行了。因为粘土可以就地取材，竹篾就用小山竹破开即可。但我也知道，因采石班的工作还在进行，要求早出晚归，在外的时间延续较长，所以备料只能放在周日休息时进行。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当我突然被军宣队宣布隔离审查后，让我对她和孩子的承诺落空了，导致孩子来到干校时，我搭建的棚子还未上顶、抹泥，给昭明又平添了更多的困难。

大约到九月中旬，我们就搬入了分给我们的新居，尽管房间不大，但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使用的小天地，而且我们也可以尽快地将孩子从北京接过来，让他在我们自己的身边健康成长。从此一块令人永不得安宁的心病，很快就可以彻底放下来了。我们商量好了，昭明准备于九月下旬请假去北京接孩子，而且干校领导也批准了昭明请假的要求。因为要带孩子来，所以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领导批了一个月的假期，对此我们还是很感谢的。

昭明走后，我除了采石外，只要天不黑，我都在山上砍竹子和树枝，准备搭建棚子所需的各种材料。但天快黑时必须抓紧下山，因南方山上的林木较密，黑天后极易迷路，一旦迷路那是很危险的。开始几天一切都很顺利，采石组收工后，我就带着砍刀、绳子等必备用具上山干私活去了，每天大约都在七点左右收拾下山，当天色开始变暗时，我已走上回家的大路上了。但背着长度两米左右的一捆竹子和木料行走并非轻活，到家时尽管天已全黑了，气温不高，但浑身均已湿透了。即使如此，面对备料的成绩，想想母子二人回来时的情景，内心的喜悦将疲惫的感觉几乎完全驱离了。当临近十一前夕，收工后我照例上山砍竹子，因穿登山鞋背着一捆竹子走路较累，所以来我都是穿普通的球鞋上山了。但砍后的竹林地面留下的根节往往较尖，若不慎踩着很容易穿透球鞋的胶底，甚至将脚掌扎伤。所以砍竹子时最好要穿登山鞋，目的就是防止扎伤脚。老表砍竹子穿的都是自己编制的草鞋，而竹尖是扎不透草鞋底的，十分安全。那天就是因为穿的球鞋，

在砍竹子时脚掌被扎伤，而且还扎得比较重。因随身没有救急包一类的急救用品，我简单处理了一下，拿了砍刀和绳子就赶快下山了。回到干校后，自己先清洗了一下，就赶紧去校医室检查处理。护士给做了消毒清洗，并涂了消炎药膏，进行了包扎。大夫还想给我一点口服消炎药，但我告知大夫磺胺过敏后，大夫说没有其他不含磺胺的口服消炎药，那就算了吧。并说估计问题不大，若伤口真的感染，那时只好再打青霉素了。但此前因我已写信告诉我生父的老友，准备十一假期去抚州看望他老人家，故我担心届时万一伤口出问题去不成，会让老人心里不悦的。所以，我还是请大夫给我几片含磺胺成分的消炎药，想作为备用，服量少点帮助控制，觉得不至于出什么问题。大夫没有拒绝我的请求，给了我一些药，但嘱咐我用药一定要谨慎，过敏是很危险的。回到住处后，因心里总想着吃不吃消炎药的事，我只简单地吃了点东西。最终还是侥幸心理占了上风，决定作为预防感染发炎的措施，我服了 1/3 片药，而且睡前还喝大量的水，幻想不至于发生过敏反应。但事实是残酷的，到次日午夜三时左右，口腔和下身粘膜就开始出现红斑，进而演变成溃烂，发展速度很快，令人十分难受。但因时间尚早，去校医室会惊动他人，影响别人休息。故我直到凌晨五时半后才去到校医室，说明了服用含磺胺消炎药后过敏之事。大夫查看了相关部位的溃烂情况，当即让我服了强的松类抗过敏药，指出我既知自己磺胺过敏，还如此蛮干太危险了。并告诉我，因我的服用量很少，估计过敏情况会很快得到控制，但溃烂处只能慢慢地痊愈。当红斑不再继续出现时，抗过敏药需逐渐减量服用，不能立即停止。这次因心存侥幸而导致的服药过敏一事，不仅大大影响了搭建棚子的进度，而且身体的不适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它也给予我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训，即面对科学上已有定论的事情，来不得任何违规，不允许有任何侥幸的想法和作法，否则定将受到严惩。尽管过敏情况迅速得到控制，但因身子下部的溃烂并未痊愈，故行走有些困难。但我还是在十一假期时，乘车去抚州看望了老人。他是按林彪的一号命令，由中组部安排于 70 年 7 月底疏散到江西抚州的。听老人讲，他们这批将近有十名老干部，都住在地委招待所的大院里，在哪的两天里，我在院子里还见到了王震和袁老（名字记不得了），其他几位过去未曾见过，也不很了解。在生活安排上老人的一切都较好地得到了保证，只是身边没有自己的亲人，和社会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感到相当孤独。他跟我讲了，他已向中组部打过招呼，要求调我姐姐过来，

而且组织上已经同意，准备调往抚州市中学任教，届时能帮助、指导服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实际上，从他的讲话中，我理解他主要是想通过我姐姐可以更多的知道一些社会上的鲜活的情况。因为我是一个白丁，很多事他不会和我讲，但看得出他内心对当时社会情况的忧虑，所以他也问了我很多干校的情况，而且还特别嘱咐我在言谈和行事上，要多思，要谨慎。这类嘱咐，以前他是很少向我提及的。我聆听着老人对我说的每一句话，也有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谨言慎行的思想准备。但天算不如人算，在地院，一场更大的整人风暴已经悄然地蕴酿了多时，并已将自己笼罩于其中，只不过还暂时没有收网而已。确实，在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从某种程度上讲，不是自己所能完全掌控的。中共从建党以来，打着革命旗号整人的事例屡见不鲜，要不何部长为何在水边干校会对我说：革命嘛，难免不挨整呀。这也是他自身经历的很好总结。但说句老实话，当时的我，心底里已经没有了文革初期的革命激情了。成了家而且有了孩子，还有需要自己照顾的老人，我只想过一个凡人的安定生活。如有可能，尽量能学有所用，在专业上能发挥自己的所长。否则，即使在干校，能做些实事也就足矣。文革的实践到当时，已经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即搞政治的人，一方面需要有大智慧；另一方面还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品行，而非常人所推崇善良人性。对共产党而言就是阶级性，并常冠以“党性”的美名。没有这两点是不能去从政的！而我自己恰恰在这两方面都不具备，故还是老老实实地顾家为好！但后来的实践又让我明白一点：你个人不想搞政治是一回事，但若因政治需要而整你，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整你没商量！

在抚州我陪老人呆了两天两夜，临行前，他还让我告诉昭明，希望她带孩子回干校时，能绕道来抚州看看他。面对老人的孤独感，我不能拒绝，答应一定写信告诉昭明。

我按时于三号晚回到干校。过敏的症状已得到控制，正在逐渐恢复中。假期结束后，生活似乎又回归正常，但“抓五一六”的风声却越吹越紧，一场新的政治迫害悄然到来，我个人的干校生活，即将掀开更加痛苦的一页。

（八）灭绝人性的干校“抓五一六”运动

1，至今未解的疑惑

在我的印象里，不论是全国范围内的抓五一六或地院内部的抓五一六，都没有像文革发动前那样先大造舆论然后再运动群众，从而哄然一下文革的浪潮就席卷了全国。相反，抓五一六这一涉及到全国范围的整人运动，却没有大块头的文章首先见诸报刊（即先造舆论），而是党内文件或通知一类，秘密地传达至各省市、地区和部门单位的军管、军代表或军宣队负责人和领导成员中（当时各中央部门、省市自治区、各高等院校等均被军管或由军宣队领导），继而就在各部门、单位成立抓五一六的领导小组和相应的专案组，筛选、排队，列出本部门、单位的待查人员，而后逐一地开始对涉嫌者或点名批判、批斗，或办学习班、隔离审查或关押，具体采取何种措施则取决于对涉嫌者问题严重程度的估计、涉嫌者交代认罪的情况（态度）。在此应当说明一点，上述文字所论述的，只是我个人在被关押整肃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复思考而得出的个人看法，带有推测性质，是否符合真实的历史情况，有待于那些参与甚至领导组织抓五一六的人们的觉醒和揭发，否则真相恐难大白于天下！

在我个人的认知中，我认为文革中有两个最大而又令人生疑的事件，即林彪事件和抓五一六事件。前者不在我的回忆范围内，故不费笔墨。后者我觉得有以下几点值得人们探寻、思考：

1、在整个抓五一六的过程中，各单位运动领导小组是否向广大群众完整地传达过中央下达的抓五一六的红头文件？反正我不论在被隔离前或被隔离后，都没有听到过文件的全文。我所听到的只是几句零星定性的话语，即五一六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是反总理的（指周恩来总理）等。由于这个原因，当军宣队换班时，北京和湖北两地的军宣队共四人一起找我到干校“学九楼”（干校学员的戏称，类比北京地院党政领导的办公楼）谈话，时间大约是七一年十月中旬。当时我就向他们提出了我的质疑：既然说五一六是一个隐藏很深的阴谋集团，那为什么地院里有那么多五一六分子，这岂不比一般的群众组织还公开嘛？听后，蒋喜亭（干校北京军宣队负责人）大怒地对我吼道：滚！致使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我又再次被押解到长田村牛棚，继续被关押，而且进一步加大了对我的人身迫害。尽管如此，我的疑惑并未消除。但我政治上的幼稚，加上没有报纸、听不到广播，我还天真地认为问题可能只是出在下边呢。解除隔离后，当我了解到全国各地都抓了很多五一六分子，看来就不单是地质学院一个单

位了。这样我的疑惑不但没有消解，反而更加凝重了。试想，如此众多的成员参加的组织，何以能隐藏很深，又何以能搞阴谋活动？岂不定性和实际相距甚远吗？！

2、抓五一六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数年之久，为何在中央和省地一级的报刊中极少甚至没有正面予以报道过他的成绩、意义、经验，以及进一步深入的方向？这也是历次大的运动中十分少见的；

3、“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最终在胡耀邦领导下的平反冤假错案时，予以彻底否定了。据言，胡耀邦曾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案说过，莫须有。是否属实，我无考据，不好妄言。但这一事件确实被莫须有了，也可以说是一风吹了，而且吹得干干净净，否定之彻底远胜于对反右运动的否定。但遗憾的是，对规模如此之大，历时也的确够长，被整人数和被牵连人数不见得比反右少多少，但为何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错误的性质和责任没有任何说法呢？而且迄今为止，对抓五一六一案的调查、研究、分析的文献和林彪事件相比也少之又少。难道有难言之隐，或为君者讳、或为尊者讳乎？难道这样做也叫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吗？

4、在被隔离审查期间，从多次让我参加的已经交代承认是五一六的人登台亮相的大会，让他们讲述自己加入五一六的情况。从中，我得知参加五一六需要填写表格，要有介绍人，甚至有人还说宣过誓。听后当时我觉得这很正常，毕竟中央给五一六定性的是隐藏很深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嘛，加入需要有一定的组织程序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相信了五一六成员加入时要有介绍人，要填写表格这两点，让我在隔离审查期间，越加坚信自己从未加入过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绝不是五一六分子。我的问题肯定是因为组织上搞错了，相信了他人的诬告。因为文革期间，从来没有任何人介绍过我加入任何组织，也从来没有任何人让我填写过加入组织的任何表格类文挡，我在这方面的记忆是不会有差池的。但在坚持一年多后，在校专案办赵壁媛利用妻子每天一封家书的“攻心”手段下，我曾一度动摇，觉得就违心承认真算了。但又是介绍人和表格两条让我无法编造，而重又“坚定起来”。赵壁媛毕竟是整人高手，从交谈中察觉了我心态上的变化，而更加大了攻心的力度，妄图一举攻破我的内心屏障。当我试探着说我对介绍人和表格一点印象都没有时，她很爽快地说道：你现在的问题不要拘泥于介绍人和表格这类细微末节的

问题上，而要放在加入五一六组织的问题上。何况“五一六”组织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有时让人去参加一个会，就算参加了，他们是不会拘泥于任何形式的！有了这一暗示，就使我从动摇迈上了违心承认自己是一名五一六分子的不齿之途。当我被解除隔离后，在与人交谈中，得知确实人们加入五一六的程序是多种多样无奇不有的，而且都得到了专案组的认可，前提是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就行！因此，人们不禁要问：被定性为隐藏很深的阴谋集团就是通过这种杂乱无章的荒唐方式和手段建立起来的吗？这样建立起来的组织能隐藏得住吗？为什么这类破绽百出、相互矛盾的交待材料，就能成为抓五一六专案项目的定性材料呢？如此的审查方式岂不太不严肃了吗？！

5、就地院和干校抓五一六运动而言（就全国范围而言，因我不了解情况，不好妄言），被整肃的对象，绝大部分都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的造反派群体。想当初是这些人奋不顾身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有理，为实现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按《文革十六条》自己解放自己的要求，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支中央文革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红卫兵战斗组织，为揭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建立各地的革委会等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些今天看当然是不对的，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讲，这些毕竟是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做出的决定，而且是以中共中央全会的形式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公布的，几乎全国人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信之、从之，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无疑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首先执政党就必须拿出敢于担当的勇气从自身做起，而不应当首先拿响应号召而起来造反的群众来问罪）。当然毋庸讳言，后期，各地造反派组织陷入派性斗争，一度对文革的进程造成干扰，“迫使”毛主席不得不派出工人和解放军进驻各高校和各中央部门，直接领导运动，恢复中央领导的权威。中央的这一举措应当说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各地秩序逐渐正常，高校停课闹革命的学生，也于 70 年中陆续毕业分配到全国各地，看来斗批改的文革重任，已经水到渠成地可以进入改的阶段了。但为何中央会杀了个回马枪，开始清洗起造反派来了呢？！难道这确实是毛泽东自己的意图，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版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再现？还是中央内部再次出现派系斗争后的一种以牺牲造反派群体来换取新一轮妥协的产物？！而且令人感到称奇的是，当群众发动起来开始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时，时不时会有个别中央首长站出来替被揪斗的人说几句保护性的话，诸如，某某过去还做过一些好事呀，要一分为二呀，再给他一次机会呀等等。借以缓解双方的对立情绪，让被揪斗干部的处境稍许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而在抓五一六时，竟没有任何一位中央首长，为被以五一六分子名义批斗关押的原造反派群体中的任何人说过类似性的保护性话语，难道对这些人就不需要一分为二，就不必再给一次机会了吗？！

自我被宣布解除隔离后至今，时光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四个年头了，但这些令人生疑的问题却从未在我脑海里消失过，相反，它却成为使我远离了过去成套说教的重要原因。让我曾坚信不疑的所谓“我们的批判是对事不对人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政策条文所展现出来的美好说教，在这些疑惑和残酷审查的现实面前，全部被砸得粉碎，岂能让人再信呢？

2，山雨欲来，被隔离前与亲人的短暂相聚。

地质学院的抓五一六运动是分三个地方同时展开的，即北京地院、湖北丹江及江西仁和五七干校。此外，凡涉及到已经分配到外单位的学生，则统统将相关材料转到该学生的所在单位，由学生的所在单位负责审查，与地院军宣队无关。但军宣队所转出的材料，对这些学生被整肃却是致命的，因为抓五一六是全国性的运动，故对由地院分配出去的学生，各地各单位都尤为关注。因地院《东方红》在文革初期执行伟大领袖关于“造反有理”的指示最为坚决，取得的成果也最大，曾成为中央文革手中向全国各地造反派推荐的一面旗帜。所以对来自该校毕业生中的嫌疑人猛批猛整就不足为怪了，而且这样做也为那些整人者今后的爬升提供了更快向上攀登的阶梯。

我在干校得知地院开始在抓五一六分子一事，大约是在 70 年 6 月份，当时干校中很多人都在传北京地院召开了抓五一六的大会，据说贾振远已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对此当时自己也没太在意，但时隔不久，我得知睡我旁边的陆炎德（当时我们都住在集体宿舍的上层通铺）正在被办学习班，让他交代、揭发地院和他自己的五一六问题。但此事当时在干校并未公开，我之所以得知乃其自己所告。因由就是因我们相邻而卧，一日晨起前，他不断地发出向外作呕的声音，将我吵醒后，我问道：你怎么啦，想吐吗？不行就赶快起来去校医室。他回答说，

不用，过会就会好的。对他这种能够有病不治，想拖着就会好的论调，我生气地说道：真是讳疾忌医！对此他解释道：我这是老病，肝区有些胀造成的，只要注意保证休息就没问题了。因我也肝功不好，对他的这一说法能够理解。所以就对他说，既然你知道注意休息就没问题，那你就跟领导说明情况请几天假不就得啦！接着他又说道：不行，现在正给我办学习班，让我交代五一六问题，成天都在写材料，所以人很累，那还能准我请假呀。就这样，我才知道干校已经开始在抓五一六，而且陆炎德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了。由于话已经说到这一步，我也不便再问了，只说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有病身体不适，还是需要治的。

与陆的上述对话尽管让我获知干校也已经开始在抓五一六了，但我并没往心里去，也没有想到借抓五一六为名，军宣队已经开始将整人的魔爪一步步地向我伸来，这是从昭明的北京来信中得知的。昭明约九月底赴京准备接孩子来干校，在京停留期间，五连指导员周家骏老师曾去北京家中看她（周老师既是干校五连的指导员，也是文革前钻探教研室的主任），并从关心爱护的角度告诉昭明道：干校下一步将要开始抓五一六了，从现在的情况看，有很多的揭发指向了宋翔雁。你要好好劝劝他，如果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就坦白承认，党的政策是明确的，交代清楚后就没事了。如果他确实没有加入过五一六组织，不是五一六分子，面对群众的揭发，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爱较真、很倔，这点你比我更了解，一定要劝他正确对待群众，不要跟群众顶牛。说完后，周老师就走了。周老师是因为到北京调运机床，准备加强和提高干校机加工方面的能力，以适应干校下一步发展的需要。没想到周老师出于关心和爱护年轻人而且又是他的下属考虑，光明磊落很正面地去做工作这件事，却被同行去北京的煤田教研室李树岩老师，向干校军宣队揭发，从而回干校后，周老师以“向五一六分子家属通风报信”的罪名被批判，并免去了连指导员的职务。（对周老师既讲原则，又讲政策，光明磊落的行事风范，我从心底里佩服和赞赏，也非常感谢他的关心和爱护。对他因我而遭到批判和弹劾，我也深感愧疚。他挨整被批、被撤职的事是在我被隔离后被批判时知道的，并心存感激。并且对此我也想好了，只要今后能出来继续工作，我会尽力尽责地多承担些，以作报答。这是我在隔离期间的内心承诺，后来我用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为在武汉地院恢复、重建勘探机械专业付出了极大的精力，确保在文革后恢复高考时，就能立即招收该专业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并

在专业建设和专业教学上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时周老师又担任了勘探机械教研室的主任，我也自然成了他名副其实的副手，尽管学校没有任命，而且即使任命我也不会接受，因家庭原因，我已决定申请调离地院了）。从昭明的家书中使我得知干校军宣队将继承文革初期工作组的衣钵，但换了一顶“五一六”的帽子，想继续把我置于死地。但昭明的信件除告诉我周老师的劝告外，主要是一方面让我仔细想想是否确有其事，有则按周老师的话，老老实实交待、承认，绝不可作五一六的殉葬品；另一方面，则因发生此事后，她有点犹疑是不是还带孩子回干校。她说：如果万一你真出了事，孩子那么小，她一个人怎么弄得。如果那样，还不如继续将孩子留在北京。一想到昭明可能因我会被整而动摇了带孩子来干校的决心，我真有点急了。因为上次朱师傅家的行为已令我对他们失去了信任，加之我姐姐即将调往抚州照顾老人，姥姥自身已七十三四了，加之又是缠足老者，请她老人家下三楼上四楼去看望外孙是完全不现实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若万一孩子再出点什么事，即使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获准回京假期的批文，待我们到京时也是四五天以后的事了；而一旦请假遇阻，时间就更加滞后，届时后果将难于想象。为此，我立即给她回信，坚定不移地告诉她：1、我不是五一六，而且文革中除参加《东方红》外，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其它组织，希望她一定要相信我；2、一定要将儿子带来干校，否则，一旦再出点事，我们将难于及时处理。来干校后，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起总能克服的（显然这一想法被后来的现实所击碎，这是由于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用过往被整的经验，来看待即将到来的抓五一六运动所造成的。我完全没有想到，也低估了他们竟会以扑风捉影的材料为依据，对无辜的嫌疑人实行限制人身自由的隔离和关押式的审查，而且一关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昭明接到我的信件后，经过认真地思考，觉得我的分析有道理，孩子必须带来干校，即使再困难，也不能犹疑了。而且她坚信我是不会对她说谎的，我肯定不会是五一六分子，这也就帮她下定孩子与她同行的决心。当我得知她的决定后，我悬而不定的心才算踏实下来。

昭明母子于 11 月初离京经上海来到江西清江下车，同行的还有我姐姐和李树岩老师（当时昭明告我李是为了照顾她带孩子而特意同行的，为此我接车时还专门感谢了他，因此前我与他并不相识。但当后来得知是他揭发了周老师去向昭

明交代政策后，我立即认为这是军宣队的有意安排，是一种暗中监督的非法勾当，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当接到他们母子后，我们先行到清江饭店安排好住处，因为天已过午，孩子明显有些犯困，昭明准备先安排孩子去歇一会，并告诉我，她在上海为我买了一台春蕾牌的半导体收音机，等孩子睡下后拿给我看，随后就带孩子先行离去了。我姐则约我先到外面看看市面情况，边说她就自己先走出了饭店大门。我没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但迟疑一下后就立即去赶她了。因清江市并不很大，我们两人就向火车站方向走去，并离开了马路，沿着铁道前行。因铁道沿线没什么人，说话比较方便，这也是我姐姐比我老道的地方。这时我姐才很严肃地问我道：周老师与昭明说的话你都知道了吧？我点头应道：知道了。她又说：你到底参加过五一六没有？我有些烦气地回答说：你们怎么啦？为什么都不相信我说的话呢？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我姐太了解我，她并没有因我的烦气而生气，相反更耐心地说道：你要知道，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组织，所以你要好好回忆一下，千万自己不要犯糊涂。这时我的心也似乎平静下来了，很平和地向我姐说道：它再怎么秘密，加入没加入我总不能一点印象都没有吧？！这些日子以来，我反反复复地想过不知多少遍，文革以来，我除了参加过《东方红公社》外，从来没有加入过其他任何组织。包括东方红成立后，教师中的造反派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红教联》，我们先已参加了东方红的人，就顺势也作为红教联的一员，而未再履行加入红教联的手续。这些过程都清清楚楚，怎么可能犯糊涂呢？对于我所说的，我姐虽也点了点头，但还是有些不太放心地说道：这次中央关于抓五一六的是决心很大，政策也很清楚。就是一定要将这个隐藏很深的反革命组织挖出来，而且只要参加者承认了、交代了，就没事了。所以你还是要仔细地好好想想，不要有任何顾虑，也不要因为怕昭明受不了要离婚而担心，我会帮你做工作的。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在感情上真有些受不了了。自幼我们俩一起长大，既是姐弟，也是玩伴。自我 11 岁以后，她就承担起了帮助和指导我健康成长的责任。在学习和工作中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会和她说，不论她说什么，我都不会反驳。她知道我从不说谎，尤其对她；也深知我不服强压，只从说理的个性。所以，我对姐说道：姐，我对你说过谎吗，我对昭明说过谎吗？要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呢？这时我的眼泪已经忍不住地流了下来，我赶紧拿手绢擦了擦。看到这个情况，我姐动情地说道：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如今的斗争太复杂，师大也在

大抓五一六（她是师大的干部），有些情况我都难于想象，但这些都是他们自己交代出来的呀！所以我才劝你要仔细地想想，你们周老师说得很好，如果你确实没有参加，要很好注意自己的态度，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说到这，我们就回头向饭店的方向走去。路上我又对姐说道：通过文革初期地院的反干扰，我已经学会了如何面对不了解实情且带有情绪的群众诘问了，相信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也不会去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而且，我也把在水边遇到何长工时，何部长说的：革命嘛，哪有不挨整的话告诉了她。表明了自己若真的躲不过这一劫，我将持什么态度。面对我的这一表态，她什么也没有再说，只是挽着我的胳膊，慢慢地走着，我知道，此时的她，内心也是很难平静的。在文革那个只讲斗争，到处要制造出对立面和斗争对象的年代里，类似我们这种亲人挨整或即将挨整情况下，亲人内心情感上所受到的煎熬之苦，真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述的。

当我们回到饭店后，见孩子已经醒了，正和他妈玩得高兴呢。但见到我却有点认生，十分不情愿地喊了声爸爸，就又跑回他母亲的身后边去了。看到孩子天真的表现，方才和我姐谈话时的悲苦情绪几乎一扫而空，我走过去抱起了孩子，亲亲他稚嫩的脸蛋，仔细地端详着被烫伤后遗留下来的疤痕，心中确实感到我们对孩子的沉重亏欠。但严格地讲，这种亏欠的直接责任者，应当是文革那个时代，是亲手发动文革的执政党和它的领导成员们，是他们倡导的不破不立、斗争哲学和全面专政的理论和数不清的倒行逆施的政策，使得那些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孩子们受到株连和不应有的伤害。正当我陶醉于孩子的天真可爱，思考着不久前他刚刚经历过的噩梦般的历程时，昭明走过来有些急切地对我说：不好了，给你新买的半导体收音机被别人偷走了。我们赶紧去到他们住的房间，看到她的床位上放着一台收音机的包装盒，但里面却是空空的，收音机已经不翼而飞了。她说，因收音机盒子一直在她的枕头边放着，所以她也未在意。直到我抱着孩子自我欣赏时，她想拿收音机给我看，让我有个惊喜，但当打开盒子时，里面的收音机却不见了。她又气又急的说着，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姐和我都劝她别急，先去前台找一下负责人，向他们反映一下贵重物品丢失的情况（在那个年代，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相当于我们两人一个月的工资总和，确实属于贵重物品范畴），看看有无追回的可能。接着我们下楼去到前台，向饭店领导反映了丢失物品的情况。接待人倒是比较认真地听取了昭明的叙述，并作了比较详细的询问和记录，

并说他会让保卫部门很好的查查，但他也实事求是地说，估计能查到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们一定会好好检查的，并在今后工作中注意防范。对饭店领导人的说法，我们可以理解，对于丢失物品难于找回也有心理准备，所以我们留下联系办法后就返回了房间。昭明对此事一直有个心结，一者总怀疑是同室另一位女客（也是干校的，但已记不清姓名谁了）所为；二者因是特意买了想作为礼物送给我的，但未能如愿，心中总觉得是个不祥之兆。对此，我反复开导她，要她不要瞎想，并表答了对她这份心意的珍惜。所以至今那台收音机的包装盒我一直保留着，目前仍留在北京的家中，尽管那只是一个外观很粗糙的减震马粪纸做的盒子，但它却是一段经历、一份心意的见证，每当我整理东西看到它时，都会想起自那以后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第二天清晨，我们即准备乘船返回干校，我姐也要乘火车前往抚州到新单位报到。我姐先送我们去到码头，分手前，千叮咛万嘱咐地让我自己多加注意，不管遇到何种情况，都要冷静。我也请她替我们问候老人，向老人家解释一下昭明未能前往看望的因由。我答应我姐回去后将会注意可能出现的不测，但我再次向他表明，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弟弟是完全清白的。对此，她默默地点头，低声说道：快上船吧。看得出我姐当时是强忍地控制着自己内心无比忧虑的情绪，我不忍心再让她因为我而煎熬自己，就赶快扭身经趸船走上了去仁和的航班，并在船舷边向姐挥手告别。轮船按时起航了，她仍站在码头上向我们挥手，直到船已经驶出很远了，我才见她扭身离开了码头。看着她离去的身影，想着她为了我的成长所付出的艰辛和忧心，我的泪水终于控制不住的流淌了出来。

清江到仁和的航程很快就结束了，船靠码头后，我们很快登岸，整好携带的行装（主要是给孩子带来的衣物和食品），由于没有便车可搭，东西较多，加上孩子需要抱着，故我们将带的东西大部分留在住在仁和的同事家里，带上孩子必须要用的物品，先行奔赴龙陂干校，然后昭明先在家中慢慢安顿，我又骑车回到仁和，将留存的东西，一并带回干校。孩子来后的最初几天，既让我们分外欢快，又令我们十分忙碌。白天我们各自在自己的班组上班，孩子送到幼儿园，由幼儿园老师（基本上是女教师或女职工担当）看管，晚上昭明哄孩子，安排他洗漱睡觉，我则忙于棚子的搭建，因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风也较大尤其是夜晚，所以，我想抓紧先把围墙搭好。但以整人为自己第一要务的军宣队领导，是一丁点儿也

不会考虑下面职工的实际困难的。当我们再次团聚匆匆忙于安顿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大约在70年11月中旬，军宣队就迫不及待地对我下手了。

3，公开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办“学习班”

七零年十一月中，军宣队在全校揭发批判五一六的动员大会上，公开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学习班”，多么文邹邹的字眼、多么美好的名称，但它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军宣队在抓五一六运动中，残酷迫害、凌辱地院广大教职工的血腥事实。尽管在我姐和我谈话后，我有被揭发、被批判甚至被批斗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但有两点是我没有料到的：1、如此之快运动的矛头就指向了我；2、在不公布任何调查取证材料的情况下，竟立即对“嫌疑人”（这是我自己按现代的法律程序起的名称，当时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时，就是直呼对五一六分子如何如何，似乎对我已经定性了一样）采用限制人身自由的隔离方式，强迫我揭发和交代问题。这充分说明了我在政治上的幼稚，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不按常理出牌的突发性，缺少认知，竟想靠过往自身的些许经历来判断，实乃小儿科的想法，总是被动，可笑之至。

在我的记忆中，地院五七干校抓五一六运动公开全面展开是从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开始的。也就是说，在干校我是第一个被公开认定为是五一六分子的人。而在我之前，虽时有听闻某某已被办学习班了（如陆炎德），但都没有在干校公开过，而是在“暗地里”进行的。而且，所涉及到的人，相对来讲还是少数，只是对个别人在私下里进行着。而自我开始，抓五一六就变成一运动的形式在干校全面铺开了。今天某人还人模狗样声嘶力竭地批斗某个五一六分子，或像正人君子一样，给某某人办学习班，当军宣队整人的狗腿子、帮凶和打手；而到明天，他却又成了另一些人的揭批对象或学习班中的新囚徒。这看似笑话，一点没有政治斗争的严肃性，但那确实是地院干校也包括整个地质学院抓五一六运动的现实写真。所以当时私底下有人说：洪洞县里没好人，地质学院算烂透了，几乎没有人不是五一六！就好像今天老百姓说贪腐一样：把现有干部抓起来排好队，都毙了会有冤假错案，但隔一个毙一个，则会有漏网之鱼。

当我在全校大会上被宣布隔离审查时，我内心毫无畏惧，也非常淡定。我心中想的只有心爱的孩子和他的母亲，因我将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分担昭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也不能陪伴孩子一起玩耍、照料孩子健康成长，我又将对他

们母子欠下一笔难于偿还的债务。只是想起他们，我才会有心情沉重的感觉。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对我的隔离审查会有如此长的时间，自 1970 年 11 月中上旬宣布对我隔离审查起，直至 1972 年 2 月下旬末，宣布解除对我的隔离，继续交代清楚问题止，时间延续了整整十五个月！产生这种误判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我是按常人的思维方式考虑的。因我觉得自己既非造反派东方红组织或院革委会的头头，也非系一级的头头，甚至连革委会任命的干部都不是（在院革委会简报组工作了三个月，并无任命。而为承担责任，我自认是组长）。从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造反派成员出发，我觉得稍有水平的领导也能看出，即使我真如他们所编造的那样，参加过五一六组织，也不可能从我身上榨出多少油水。一句话，从全局部署考虑，是不值得对我花多大力气的。拿老百姓的话来说，对这类人用搂草打兔子的办法，捎带脚就行了，犯不上大动干戈！想不到，军宣队却下了大赌注、花了大本钱，动用了五员大将（杜展凯、黄津生、马德跃、周 × × —— 地化教研室老师，研究生毕业还有李鹤忠等），经历了两任军宣队领导，搞了历时长达十五个月的时间，最后还得请出干校抓五一六专案组的总头目赵璧媛出面收场。尽管最终因我个人的人性弱点——重情感、想老婆孩子，没有坚守住不说假话的做人底线，以不记得谁是介绍人，想不起是否填写过表格的极其荒唐的模式，但却以接受了赵璧媛为我设计的方案先违心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为前提，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可以回家后进一步去想，最终只需交出一份完整的材料，在全校宽严大会上交代后，再正式宣布对我解除隔离审查。这就是我的五一六问题审查收尾时的全过程，也就是说最终是在赵璧媛为我量身定制的“两步走”方案下结束的。即在学习班内先承认加入过五一六组织，以此为条件实质上解除对我的隔离，允许我回家后再补充完善交代材料，经过大会表态承认，最终在形式上完成组织程序，宣布对我彻底解除隔离，回五连参加活动，给人以此后我就没事了的印象；其二则是在经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看法。但这只是自己的分析，是否属实，只能由当时执掌干校权柄、知道抓五一六运动内情的人来印证了。我的分析是这样的：地院军宣队根据上级的指示，在地质学院内展开了大抓五一六的运动。他们自以为有上方宝剑在手，定可所向披靡。而且在北京院部取得了对院革委会委员贾振远的突破，在干校，也取得了对有军师之称的陆炎德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觉得形势大好，在全面铺开抓五一六时，只要选好突破点，势必将大功

告成，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全胜效果。在此思路指导下，他们在分析了已经掌握的揭发材料后，觉得以我作为突破口最为有利。理由是：1、宋不是党员，出身不好，没有任何头衔也没有任何政治资本，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没有抵抗的本钱；2、在地院革委会中，他没有帮派团伙，身单势孤，易于就范；3、尽管他没有头衔不是大人物，但一经突破就可以达到一抓一个准的震慑效果，反而能让大伙儿相信军宣队是不会乱点名的。似乎借此就能证明干校副指挥所说的，“我有一双侦察员的眼睛，我说谁是五一六，他就肯定是五一六”的荒唐论调。我的这一判断应当说是不无道理的，因为这是从历次运动中那些整人专业户惯用的手法和策略中总结出来的，也是依据一贯整人者的思维方式而拟定的战略。在这种思路中，整人者只看到有政治资本的人的正面，没有看到他们的另一面。即这些人在相信组织、相信领导、要考虑全局等党性高于一切的教育下，使这些人中很多善良的革命者，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品格，以致面对诬陷、迫害，会违心承认强加给自己的许多不实的罪名，期待运动过后的甄别来平反。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运动中违心说假话，既非叛变，也不算大错。更有甚者，一些真诚的革命者，直到临终前还要高呼“万岁”或留下自己相信组织的誓言。这类典型的案例，在中共 95 年的奋斗历程中，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正因为这些人在党性高于一切的片面要求下，才造就了许多专门以整人为快的阴谋家们得以发迹。如中共党内的康生之流，就是这类人的典型。当然，不可否认党内也确实有少数的政治投机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见风使舵，投运动领导人之所好，借机把水搅浑，既打击了好人又保全了自己。这类实例也为大众所熟知，以干校抓五一六为例，陆炎德就是这类政治投机分子的典型。在文革之初，他在幕后东走西窜指指点点，成了造反派的一员。后又以有头脑、善分析的特长，成了总部小将们的“军师”，受到器重。但在抓五一六运动一开始，他自觉苗头似乎不对，就立即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而且还大曝地院革委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他的这一爆料正中军宣队极左思维的下怀，为坐实地院存在大量五一六分子的错误估计提供了依据。这一下就使地院广大造反派和相当一部分同情造反派的师生，统统陷入到五一六的泥坛之中，成为被批斗、被打击的对象。正是基于这一逻辑，干校军宣队觉得选我作为他们大抓干校五一六的突破口必将万无一失！但没想到的恰恰是因我没有他们所说的各种头衔，所以

独立思考尚存，作人的底线尚在。因少了那些要相信组织、相信领导的羁绊，我就敢于坚持没有就是没有，敢于说真话。以致打破了军宣队希望迅速拿下的初衷。因此，在清查干校五一六运动中，我不仅没有起到他们预想的那样成为获取全胜的一个突破口，反而变成了一个他们难于迅速攻克的目标，令军宣队十分尴尬。出于政治考虑，他们不可能减轻对我审查的规格和等级，如减少专案组的人员、改变完全隔离的审查模式等，怕因此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就想从继续加大整肃力度，加重对我身体的迫害和身心摧残，来迫使 I 尽快按他们的需要招供。但实践的结果仍未奏效，我继续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的态度与专案组周旋，并在条件极差的境况下，尽量维护好自己的身体和头脑的思维活动能力。在加大逼供强度仍未奏效的情况下，因整个国内政治形势已不允许再久拖不下（林彪事件已发生四个多月了），军宣队对我又从强逼改为软磨攻心的办法，从而上演了由赵壁媛亲自挂帅导演的“苦口劝说”加妻儿书信夹攻的攻心为上的一出好戏，从而令我最终未能逃脱军宣队预设的圈套，违心就范。综上所述，在干校抓五一六运动中，对我的隔离审查经历了在校部“学九楼”众目睽睽下办的“初级学习班”；迁至农村长田牛棚内的“关押学习班”；继续在长田农村关押但条件“大为宽松”的“攻心学习班”三个不同的阶段。最终在攻心学习班时，确认自己的投降承认是五一六分子而结束。

（八—1）初级学习班

4，初级学习班内的批斗生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称为“初级学习班”是基于当时干校校部的住房奇缺和修建特点，我的学习班就设于干校党政办公室所在的建筑物内，故干校学员均戏称该楼其为“学九楼”。它既是干校的党政中心所在地，又可能划出数间作为审查五一六分子的学习班隔离用房（当我在学九楼被隔离期间，有几个夜晚，曾看到过陈代璋老师在学九楼后边的一栋建筑内的房间内被批斗的情景），甚至还有学生班级上课用的教室。这就决定了在这种条件下办隔离学习班，很难做到犹如监狱那样，达到对外界真正封闭隔离的效果，如隔音、梳洗、如厕等。由于这一建筑物的特殊结构，且它本身又处于干校的中心位置，使得这种学习班无论在批斗和日常管理等方面，还需要顾忌到政策限制，不可能做得太左、太随

意，军宣队必需考虑到对外界产生的影响。而且，学习班内的批判、审查交代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因此专案组对隔离对象采取的各种措施，受条件限制相对就要收敛很多，隔离对象的日子也多少好过一些。在此期间，除疲劳轰炸利用夜晚深更半夜让写揭发交代材料清晨即叫起床外（因房间隔音差，夜晚就不能审讯，更不能责骂批斗，只能用不出声的办法——写材料来惩罚），没有发生过明显的打人、恶意的体罚、饿饭、限制大小便等非人道措施。故称之为“初级”。因此从总体上讲，此时的被审查者除没有人身自由外，尚能过上最起码的人过的生活。

我是在 1970 年 11 月中上旬在干校公开抓五一六动员大会上，由军宣队指挥蒋喜亭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的。随着话音落下。我即被人从会场带出并押往“学九楼”事前已准备好的隔离房间内听候处理。在押离过程中，会场内此起彼伏地喊起“打倒五一六分子宋翔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宋翔雁必须老实交代”等口号。进至室内后，首先由专案组的头头杜展凯对我宣布专案组的其他人员名单，计有：黄津生、马德跃、周 x x ——地化教研室老师，研究生毕业、李鹤忠等共五人。然后向我宣布了隔离审查期间的相关纪律规定，指出在审查期间，一切都要听从专案组人员的安排。随后就让我先把根据专案组要求由昭明为我准备好的生活用品（衣被、梳洗用具、碗筷水杯、毛选等）安排就位（为便于他们管理，让我睡在上铺），然后自学毛选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下午结合自己的问题再汇报学习心得。交代完后专案组的人员就都离开了，我则按要求整理自己的床位。面对刚才专案组的乏味布陈，我真觉得无聊至极。但看着昭明为我整就的一件件物品，内心又倍感凄楚，不知她能否经受住这突然降临的这一切？但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告诫我，现在不是怜妻想子的时候，需要的是振作、是积极的面对，对即将可能发生的事必须有应对的预案，必须事前确立一些今后自己必须遵守的原则，必须以一个斗/战士而非囚犯姿态面对今后发生的一切。一旦头脑清醒后，我赶紧整理好内务，翻开毛选，尽管杜文在反干扰时就不知看过多少遍，但我还是耐心地看下去，需做好一个对应的准备。在有了一个应对构思后，我将毛选摊开放在桌面上，看似自己在专心阅读毛选的样子，以防专案组人员进屋时说我不专心学习。但这时我心里想的却是专案组的这些人过去究竟是干什么的，有哪些特点，今后相处中应注意什么？这些人中只有杜展凯以前有过

一点接触，知道他原是探工系总支的人事干事，是解放军转业后来到地院的，但在我参加四清运动期间，他已调离探工系，但调至哪个部门就不清楚了。因无工作上的交往，彼此只是点头之交，更多为人为事的特点就不知晓了；吴津生，我只知他是调干生毕业于地院，文革前在设备科任职，过去外出借用物品时有过接触，其他方面知之甚微；马德耀，我知道他是勘探系64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辅导员，此前没有任何接触；周××，此前完全不认识，后来得知他是研究生学历，在地化教研室任职；李鹤忠，到干校后才相识，知他是复转军人，摘帽右派，文革前在院机工厂锻工车间工作。当我在采石班劳动时，为打制双抢用镰刀，曾一度在干校锻工作组当过他几天的副手，从而得知他的那点简历，也知道了他有点音乐上的天赋，会拉手风琴，嗓门也不错。由于知道他有当右派的历史，而今竟能从事整人的专案工作，这就给我敲了个警钟，要提防他有极左表现的可能。这点事后证明我没有想错。

在学习班的前一周内，应当承认专案组在言谈举止上、对人的态度上还是比较注意的，当然这都是以要想把我迅速拿下为前提的。在第一周，专案组的工作首先还是让我学毛选的老三篇，但与社会上常说的老三篇不是一回事，结合敦促我交代承认的需要，学的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将革命进行到底。每次学习后照例都要让我结合自己的问题讲心得体会。我照例是按主席文章的内容，讲当前对所有五一六分子而言所处的就如同渡江作战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所处的形式势相似，只有迅速投降交代，别无出路的大道理。而就我个人而言，我确实没有加入过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请求组织进一步审查，为了搞清我的问题，我会以积极的态度配合当前的审查。而每次我讲完后，几乎专案组里的每个成员都要大批一顿，内容无外乎就是：态度不老实、想蒙混过关、这样下去决没有好下场等老一套罢了。这种不断重复的学毛选、讲收获、批态度持续了约一周多的时间，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接下来就改为向我讲当前北京院部和干校抓五一六的形势，主要是讲某某交代承认了，某某在交代中对你进行了揭发啦，某某交代后已经落实政策解除隔离了等等。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专案组的人很明确地对我说：钱天宇在北京不仅交代了自己的五一六问题，还对你进行了揭发，你还在那里死扛什么？好好说说你和钱天宇的关系，把问题交代清楚，看你们谁交代的更彻底些。对这种非常明显的挑动和诱供，非但未能达到让我“反咬”钱

天宇一口的目的，反而更让我看清了专案组的虚伪和诈骗。我想他们可能认为我和老钱的关系很好，故想从中进行挑拨（因老钱是在北京探亲期间，接到调回北京院部机工厂，故他委托我帮他将其在干校的行李和各类杂物打包装箱运回北京。由此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加之，文革期间我们又一起步行长征到外地串联，就更加深了他们的这一想法），达到相互乱咬的目的。但他们这只是从表面上看我们之间的关系，却不知我们既非一个学校、同一专业的同学，也非同一时间毕业就职的同事。只是到文革开始后，我们才调至半工半读教研室成为同事的历史沿革。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很一般的关系，加之文革前他就成家，文革时他已不在大院内居住，所以大串连时，当我从兰考和他分手回到北京后，我们之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交往了，而五一六兵团的出现，恰恰是在这段时间之后，怎么可能把我们二人都连到一块呢？所以，我觉得这这是典型的骗术。面对这种恶劣伎俩，我十分坚定地回答道：我和钱天宇的关系只是很一般的关系，他是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他承认自己是五一六，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与我也没有关系。如果他揭发我是五一六，那是他在说谎，我们可以当面对质。面对我的这种回答，当然引起了专案组的极大不满，接踵而至的就是把我押往干校的不同班组，接受来自群众的批判，试图以更大的压力迫使我屈从。

开始，只安排相对比较熟悉我的连队或班组内批斗，如在五连或相关的班组采石班、木工队、电锯组等。批斗中除了呼喊口号透露点气愤情绪外，其他的发言中除照本宣科念从报刊、文件上抄录下来套话外，几乎很少有针对我本人的具体揭发内容。可以说毫无深度和说服力可言。当然在批斗中难免会有些人上台动手按头强迫弯腰的粗暴举动，对此，我的对策是不硬顶，顺其力低头、弯腰，只要你不强压，我就抬起头挺起胸来。既要表明自己作人的尊严，也要避免硬顶可能会造成腰伤，那就不值了。第一轮批斗下来给我的感觉是，批斗的火力还不如反干扰时强。主要是没有能涉及到我就是五一六的实际内容，空洞得很，不像反干扰时，因上级领导定性了反工作组就是反党，我既然反了工作组，就没得好说的了。而现在说我是五一六，而五一六是反总理的，但又拿不出我在什么时间、什么问题上反对过总理，只凭笼统地说有很多人揭发我，但那是难以服人的。对这类批斗的效果连我这个被批的对象都感觉到没有说服力了，显然军宣队和专案组也会有所察觉。所以，当这轮在我呆过或干过活的连队及班组批斗后，又转入

专案组内部写交代、揭发材料、谈认识，并进行专案组内的批斗。但这时的交代揭发越来越没有什么进展了，因为对我来说在文革中的经历就是那么几件值得一说的事：组织书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反干扰期间被批斗；参加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步行串联和去京西煤矿串联；在原革委会简报组工作；患病逍遙直至军宣队进院，参加教研室内的相关活动至今。再怎么写也就是这些，内容无大差异，只不过是写法按专案组的要求略有不同而已。但在书写材料时我异常警觉，提醒自己用词切记严谨，只说事，少说思。要问想法，可在提问时简要回答。因写在纸上的东西总是记录在案的，若有差错，更正起来就很困难。另一点是，凡与大众公开场合发生的事无关的，能回避的就必须彻底回避，尽量减少事端。面对成心想整人还要置你于死地的操刀手们，不存在竹筒倒豆子的要求，何况我自身没有问题，少说一些的目的在于避免使问题复杂化，而并非说谎。所以有关总部让我找朱成昭劝其检查、带我去解放军报社找肖力、破解川大八二六电报密码等我均没有提及。对他人的揭发我坚持必须是自己亲自看到和听到的，不管它是否已经承认是五一六了，绝不去说那些道听途说的或是推测的事情。也就是说，自己揭发的事，必须是经得起检验的。因为当时我的内心还存在一丝想法：只有你说的事能经受起检验，你才能取得专案组的信任，从而改变专案组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我内心还是存在着对军宣队、专案组的幻想，还多少有些认为他们是代表党中央来领导运动的，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仍是一伙打着抓五一六的旗号为名，以镇压文革初期造反派为目的的真实面目。

在经过一段时间专案组内的批判和写交代、揭批材料后，因仍看不到有任何进展，故后来就又改为押我到其他连队接受批斗。这样做的原由我以为可能有两点：1、所选连队显然被认为是干校抓五一六分子比较坚决、得力，在揭发批判上是比较有战斗力上的连队；2、因不是一个连队，彼此不甚了解，相互间较少瓜葛，批判者易于全盘接受专案组提供的材料和说法，故能更好地按专案组的意图行事。开始几次全都是在地质系的相关单位进行批斗的，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岩石教研室的两次批斗。他们采用了与其他部门不同的方式，通过逻辑推理，在揭批过程中以反问的形式要求你立即回答或解释他们的推理是否符合实际？一旦你承认他们所言符合实际、符合逻辑，就转而要求你转变立场老实交代和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事实；如若相反，则猛批你的态度冥顽不化，要转变态度和立

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由于揭批者批斗方式的改变，再用过去我习惯的方式应对显然不合适。所以我在批斗会上精神必须高度集中，要在他们推理分析的过程中，提前预判他们想要引出的结论和问题，并做好应对的准备。譬如，岩石教研室孙桂英老师在批斗中就提到：你在文革中跳得很高，红得发紫，备受重用，是不是事实？面对这一似是而非的含混提问，如果我简单地认可接受这顶“桂冠”，结果必然是，既如此，那这么多人都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你还能不是？！如果没有勇气承认她的说法不无道理，那就说明面对大家都基本认定的事实你都想回避，岂不说明你内心有鬼，企图隐瞒更大的问题。故我当即认定绝不能对这类抽象说法给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必须拆解成具体问题后再加以回答。而且，所谓红得发紫等说法也绝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察分析事物所应得出的结论，恰恰是过去小市民看人惯用的话语。因此我很从容地答道：我很难回答你这笼统的提问，究竟你说我在什么问题上跳得高了、红得发紫得到重用了？面对我的回答她一下楞着了，显然她想让我顺杆爬的，没想到我反将了她一军。迟疑了一会儿她说道：让你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并回校传达还不算重用、不算红得发紫吗？这样一来，进入针对具体问题的批判和提问后，就使我不再处于完全被动的揣摩状态，精神上也就不那么紧张了。故对他的提问我很坦然地说道：对，我承认这不仅是对我的重用，也是对我的一次考验——是否真正领会了中央首长的批评本意，是否能忠实地原意不打折扣地向广大师生作传达。事实证明，我经受住了忠实原意进行传达的考验，原原本本地将中央首长对我们打派仗的批评传达给了大家。但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可“红得发紫”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让我去听首长讲话，只是想让我更好的接受教育而已。确实当我直接听到中央首长对我们打派仗的严厉批评后，我内心是很愧疚的，所以在传达中我也尽力要把这种情感表露出来。而且对这件事本身，我也从未有过任何隐瞒，在多次交代材料中，我都如实做过交代了。面对我把自己放在接受教育、忠实地进行传达的正确地位，使批判者通过资产阶级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那套手法，让被批者上钩而陷入被动的企图未能得逞，从而使他们精心准备的批斗会只能是无果而终了。反而，在这次批斗中我还接过了孙桂英老师的提问主动出击了一次，使批斗者自吞苦果，也让我很感快慰。这就是当孙桂英说我在文革中跳得很高时，我感到有必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澄清一下自己，防止有人企图把反工作组和抓五一六搅合在一起，达到不可告人的

目的。而且我内心肯定即使军宣队想借抓五一六搞造反派，他们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替工作组翻案。所以我说道：在文革初始时，当工作组运动群众圈定黑帮对象时，我确实跳得很高，在探工系发起并写了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还与工作组进行过辩论。但此后，当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后，特别是 1967 年 9 月后，我一直因病休息或半休，并以一个普通群众的身份参加院里的各项活动。对于这一过程，我也如实做过多次交代，并未隐瞒。

经过几次这类批斗后，军宣队、专案组也看出没有多大进展，也就很少再组织对我的单独批斗会，而是让我参加校部组织的批斗大会，听取对其他五一六分子的批斗，然后在专案组内交代自己的认识和收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71 年 2 月底左右。随着春耕时节的到来，又改变了对我的管理办法，即在审查、批判、交代的同时，也押着我去参加劳动，但不允许我与任何人交谈，完全在专案组人员的看管下，干交给我的活。即使这同样没有自由，但我却十分满足，因劳动时我可以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可以晒到太阳，可以看到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干活的人群，尽管彼此没有言语交流，甚至连目光都未曾有过互视（自被隔离后，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即在外面不管遇到谁，不论相识与否、熟悉与否，一律不与对方交流沟通。目的有二：一是自防，避免上专案组特意安排的当；二是他防，免得害了别人，给人家惹事。在整个隔离期间，我都坚守了这一规矩），但这也远比成天被囚禁在一个不大的房间内要好上千百万倍。所以，每当要我外出劳动时，我都把这视作我的重大节日，内心之欢畅是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特别是每次插秧后，或后来天气较热了，劳动后出汗较多时，还能允许我去干校边的小溪里好好洗一洗（尽管当时的水还比较凉），这对于几个月来不提供擦洗用水的我来说，可以说是极大的享受了（在学九楼的学习班里，每天只在早晚提供一盆梳洗用水，只能晚间洗完脸后，擦擦身子洗洗脚了事）。说句心里话，当时我还天真地认为，这种边劳动边接受隔离审查不失为是一种较好的审查方式，使被审查者在审查期间多少还能创造一点劳动价值。殊不知，这是军宣队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措施。他们已经意识到，我的学习班已经办了将近半年，可以说毫无进展，对我的问题如不加大惩处力度，不加大精神和肉体上的压力，是很难取得进展的。因此，对初级学习班的“升级”也就是在必然了，但我内心却毫无所知，

还梦想着能继续边劳动边接受审查呢，简直天真可笑！

5，初级班内的自我调整

在初级班接受审查期间，尽管因条件制约，专案组在人身侵犯、迫害上稍有收敛，但处于被隔离状态下的我，除在批斗、审讯时思维极度亢奋，能有机会与提问和批判者讲话外，在其余时间里，我身居斗室、面壁而坐，除偶尔能听到一些外面传来的声音外，一直孤单地处于静寂无声的环境中。过去所得到的知识告诉我，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下，其思维和语言能力，其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会受到很大的伤害。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批斗与隔离，我也估计到自己的问题绝非短期内能够得到解决的。因此自己必须想办法预防人体在这种状况下的自然蜕变，不仅思想上要和迫害者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且精神和身体上，也要和这种隔离环境作斗争，预防出现所谓的“隔离性病变”（这是我自己的名称，医学上有无专用名称我不清楚）。否则，即使今后保有了政治上的清白，精神和身体上病变的出现，也会让自己变成一个废人，那时将何以面对社会和家人？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我就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调整自己的心态，并尽可能地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加以改善，尽可能减少孤独、寂静、无声、不动等因素对自己可能造成的伤害。这些自我调整措施，说到底实际上就是对专案组的打压迫害措施的隐性抗争。因为学习班是以党领导下的名义办的，专案组成员中，可能绝大多数还是共产党员，公开抗争招致的是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罪名，其后果的严重性不言自明，而且也不可能得到群众的认可。所以，当时我在学习班中就有一种看法：共产党的牢是最难坐的。我指的难坐，不仅仅是牢房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也不完全是刑讯和逼供对人们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身披共产党华丽外衣的牢房中的黑暗和恶势力，受害人几乎失去了精神上的宣泄权——指责和谩骂。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毕竟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深信不疑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如今公开宣布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给我办的学习班，口口声声地说是为了“挽救”我，是为了把我从敌对的阵营里拉出来。面对这种绝对正面的说教，不承认它都意味着是反对，那还能对其公开地争辩、揭露和抗争，将自己明摆着放在反党的位置上呢？！所以，即使知道学习班里所采取的措施都是违法政策规定的，但你也不能采取公开对抗和谩骂、指责的态度，还得口口声声地承认是挽救、是苦口婆心的教育，装出感恩载德的样子。正因为是打着

共产党的旗号给被迫害人办的牢房，所以被关的人们就不可能像江姐那样英雄般地面对刽子手们。当然，面对共产党办的牢房，确实还有个别真正有骨气的中国人做到了直面抗争，英勇就义，书写了历史进程中的光辉篇章。他们就是张志新烈士和尚未被执政党认可的林昭女士。但即使已被追认为烈士的张志新同志，也不可能像其他众多正面英雄那样，受到媒体的多方面的反复光顾，因为执政党还要顾及到负面效应的存在和影响，担心伤及到执政党自身的形象。大概这也可算中国特色吧！

我所想到和所作的调整措施必须是隐性的，即不能让专案组的成员看到或看出来，若万一被看到或看出，也立即能有应对的办法和解释，否则必将遭到惩处或禁止。实施自我调整实则是一种智斗，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是在专案组成员眼皮下作的，他们也会猜测你的意图而加以反制。如你想借上厕所外出（干校是公厕），就限制你喝水量；你想在外面多滞留，就反复催促和申斥等。智斗本身无形中也扩大了自己思维的活动面，对自身也是有益的。

在初级学习班里，我的自我调整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借如厕，争取外出行走和观看景色及人群。从学九楼学习班到公厕估计有 250 米左右，我把自己的步距限制在 0.6 米左右，这样要走 420 步左右，而按平时我的步距约为 0.8 米，则 310 来步即可走到。这样一来，我就需多走 120 步，大约就可多滞留两分钟时间。只要我匀步前行，尽管慢点，押解我的人也不好说什么，因声音大了，路上来回行走的人较多，听到他们催促被隔离者也担心影响不好。此外，有时我还在出行前，特意将鞋带虚系上，出去后，借机另支脚一碰就开了，这样我就必须蹲下来系鞋带，又给自己多争取到一些停留时间。说句老实话，自由人是很难理解被禁闭者渴求在室外多停留片刻的心情，为了多看一眼美好的自然景色，多看一眼行走匆匆的人群，都需要撒费苦心地算计，这真可以说这是另一种分秒必争了。由于往返于厕所和学习班之间的总会遇到其他干校学员，这就让专案组的人特别紧张，但又不能不让我去厕所，故他们就采取限制我的饮水量（以前我都是自己去倒水，室内有我个人的暖水瓶。但从限量喝水后，就需向专案组成员要水喝，这样我的饮水量一下就从每日六杯减到了每日三杯），想借此减少我排尿的次数。对此我曾向专案组人员提出过抗议，指出这将会严重影响人体健康，是不人道的行为。但这毫无作用，几天后，我的口腔就开

始出现溃疡，说话、吃饭度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我向当值的李鹤忠要水时，他非但不允还说：你还想享受呀？要想喝水，就老实交代你的问题。面对这种恶吏（他曾是右派，在运动中会以更左的面目出现，是我一进学习班就预料到的），我知道与之相向非但不会起任何作用，搞不好只会激化矛盾或恶人先告状，使我更加被动。于是我义正言辞地说道：饮水是人体的正常需要，与享受一说无关，请你向军宣队和组领导反映我需要喝水的要求。言毕我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尽管当时他并未给我倒水，但也并未在发出恶言恶语的诋毁声。当晚，在例行的全体会上，在我汇报当日情况后，就又将限量饮水问题正式在全体会上提出，并将上午李鹤忠喝水享受的谬论也作了汇报，谈了自己的想法。重要的是我指出：自到学习班后，我每日一瓶水（5 磅）全部喝光的事实是大家都看到的。我不清楚现在为什么要限制我喝水，这已经导致我尿液很黄，口腔开始出现溃疡，而且下颌淋巴也已肿大，我要求立即向军宣队反映这一情况，解决我的饮水问题，并允许我明日就医。在说话的过程中，我转身向我身边的吴津生张开口，伸出舌头，请他观看我口中的两个溃疡斑块。吴看后向杜展凯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但没再说什么。面对我有理有据的陈述，杜不便当即表态，只简单说道：你的请求我们会向军宣队反映，就医的事明天再说。第二天大约十点钟，专案组终于带我去校医室就医（这是我隔离期间第一次就医，也是唯一一次就医），恰好又是陈碧燕大夫值班。她听了我的自述，看了口腔的溃疡情况，并检查了颌下淋巴肿大的情况。然后对我说道：口腔溃疡比较重，所以导致颌下淋巴发炎。外用药（紫药水）一天两次，涂于溃疡处，其中一次睡前刷牙后涂抹；VB2（核黄素）口服，每日三次，每次两片。因服药尿会更黄，注意大量喝水。拿了药谢过大夫后，我们回到了隔离室。我当即向专案组的人要水服药并上药，因允许就医在前，大夫医嘱在后，故要水再未受到阻拦，而且此后基本上就能满足我每日 5 磅的饮水量了，只不过还需领水喝，而不让自己倒水。只要饮水够量，其他我也就不去计较了。

2、跟学生班“学英语”。在学九楼内肯定安排有学生上课用的教室，所以经常能听到老师讲课的声音。但老师讲话的声音听不大清楚，而学生回答的声音就听得比较清楚，特别是当老师领着学生跟读时，声音就非常清楚了。特别是英语课，学生跟读的情况比较多，我就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跟着学生的发音想偷着学点。因我初中三年学的是英语，而且是教会学校，略微有点底子。只可惜解放

后，在仇视、蔑视、藐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下，不愿意学而白白浪费了可贵的学习时间，后来每每想起都觉得后悔。不知是老师不教拼读还是学生不跟拼读，总之我只能听到跟读字词的声音，听不到拼读的声音

。所以，有些字词虽知道了发音和意思，但如何拼写我只能靠 20 多年前学的印象写出来，是否正确并无把握。而且，学习班里除写材料时给纸，平时我手中并没有纸。所以这时我就比较注意尽可能保留一些用过的废纸，留作我作拼写练习时使用。平时练习拼写的纸我都收藏在枕头下的床褥下面，以免被专案组的人看到。但有一次可能因我大意了，而将写有拼写字词的纸张夹在毛选里面了，结果在他们翻弄我的毛选时被发现了。打开后发现有字还写得整整齐齐的，但几个人看后又不知其意，就问我这是什么？是谁给你的（他们可能担心是外边人传给我的字条）？我回答道：是写材料废了的纸，我留了作书签用的（因恰好夹在老三篇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处）。恰在此时周 x x 进屋了，他是研究生学历，修过第二外语（一般都是英语），杜展凯让他看看写的什么，看后周说：写的是英语。这下杜更觉得有问题了，表情显得挺紧张的，并立马让周和他一起出去。当时我还有点蒙，心想干嘛那么紧张，而且当时我一直考虑的是纸上都写了些什么字，以便能较好地应对他们的发问。可我确实很难想出写的是些什么了，心想所写的英文字绝不会有什麼问题，都是眼下学生学的内容，到时只能灵活应变了，但不能说出我在“偷听”学生的英语课这一事实，否则必将受到更严厉的批斗。过一会儿杜、周二人回来了，从杜脸上的轻松劲儿，我想不会有啥大事了。坐下后，杜手拿着纸问我，这上面的字是谁写的？我答道：我写的。他又问：在学习班里，你不好好交代问题，写这做啥？我说，没啥，随便写写。杜又问：你在学英语？我答道：我上哪学去？接着杜将写有英语的纸给我，我一看上面写的是：

flag, This is a red flag. This is a five star red flag.

The national flag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chairman Mao, Long live chairman Mao.

communist, party , the communist party,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看完后我就放心了，并说道，这是我小时候学的，只是用来抒发情感而已。杜接着说道：你要抓紧时间，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别搞小资产阶级那套东西，

你把问题交代清楚了，才说明你对党、对毛主席有感情，其他都是瞎掰！说毕就走了，我也算闯过了一关，没闹出事来。但跟班学英语的事，后来因学习班“升级”般至长田农村而终止。

3、隔窗观景，调节心情。

学习班的房间有一扇窗户，因原建筑是办公用房，所以窗户较大，而且面向学九楼前面的一片较大的空场地，平时停有各种车辆和拖拉机，还有很多孩子在场地里玩耍。我坐在室内的书桌前（供我学毛选和写材料用）通过窗户就能看到室外的情况和玩耍的孩子们，在场地前面，就是从外面进入干校的大道，人来人往的很多，但因距离比较远了，很难看的十分清楚。因有这样一扇窗户，没人在房内时，我就可以凭窗“远眺”，也不失为一种调节孤独心情的一种有效方法。特别有时能看到干校“鸭司令”（负责养鸭子的一位干部，大家都戏称之为鸭司令）哄赶着一群鸭子沿大道返回鸭棚时的有趣情景。尽管在室内看到的鸭子大约也就像麻雀一般大小，但他们扭摆着走路的样子，再加上鸭司令的那身打扮（头顶大草帽，脚蹬大套鞋，手上还拿着一根很长的鞭子）看了确实令人发笑。由于看的专注，有时尽会失声地笑出声来，这时好像已经忘记自己正处于完全失去自由的隔离之中，由此可以想见其调节效果非同一般了！

在一次隔窗观景时，我偶然看到可能是爱妻带着一个小孩在场地右侧的一辆手扶拖拉机上玩耍呢。这时我身不由主地就站起来走到窗边仔细观看（平时我从不靠近窗户，避免受到申斥，更怕因此专案组的人会把窗户挡上），确实是昭明带着小男孩在拖拉机哪玩呢。我好高兴呀，因为那男孩肯定就是我儿子，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了，但从他一会爬上，一会跳下，一会坐在拖拉机的座椅上的情景，我觉得他很敦实、很好玩，个子似乎也高了不少。这是我被隔离后，第一次看到他们母子在一起的情景。我也看到在看护孩子玩耍的同时，昭明不时还往我学习班住地的房子反复张望，这时我会隔窗向她摆手，但显然她没能看到（可能因反光有关）。我知道这是昭明的良苦用心，想尽办法希望我能看到孩子的情况，内心一股温馨而感激的暖流，让我觉得浑身发热，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眼眶，差点我就有可能失声地喊出来。但现实的残酷让我咬紧了牙关，把思念、关爱、盼望、感激、祝福等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所有美好情感，通通一股脑地深深地掩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只要你们不把我整死，我一

定好好活着，我背负了几十年的家庭出身包袱，绝不能再让儿子也背上同样的反革命子女的包袱，而影响他的一生。眼前的苦痛就算我也包含其母亲，为他的美好未来所作的付出吧！据称，在地院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我是坚持最久拒不承认的一个，对此还得到一些人的赞誉。借此文之机，我只想说明两点以解除内心的不安：①我并未坚持住，最后还是违心承认了。与他人比，只是五十步一百步之别，本质上是一样的；②直白地说，我坚持的动力从根本上讲就是为了孩子。让他能不再背家庭出身的包袱，有一个美好的前程，其他的更多理由都在其次。在观看母子玩耍和思绪跌荡起伏的同时，我十分警惕地看着屋门，担心专案组的人会突然进来。但幸运的是，直到昭明母子离去，都没有人回屋。当昭明带孩子要离开时，我注意到昭明还回过头朝我住的房子看了好一会儿后，才牵着孩子的手一步步离去。自此以后只要有条件，几乎每到下午的这段时间（我估计是昭明从托儿所接孩子的时间），我都会非常注意窗外的情景，希望能再次见到昭明母子在此玩耍的情况。因受条件限制，在我迁往长田之前，昭明母子在场地玩耍的情况，我又在窗前看到过三四次。可以说这时是我在隔离审查期间最幸福的时刻，孤独、苦闷之感似乎都抛于脑后了。

4、注意活动四肢核能活动到的关节。在学习班里是没有运动和锻炼条件和可能的，一开始宣布纪律时就规定了，除睡觉时间外，其余时间只允许坐在给我准备的书桌前学毛选、写交代材料、想自己的问题，不允许在室内随便走动。但我相信生命在于运动的教诲，所以只要条件允许，我就在坐姿条件下，经常活动四肢、腰、颈等各部位的关节。只可惜当时不懂得气功，更不知瑜伽为何物，否则静态养生、入静护体，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此外，我还臀部离开凳面以骑马蹲裆的姿势练习双腿的肌肉（这是中学时蛙泳教练教的）。总之，只要隔离室内只有我一人时，我就在表面上不违规的条件下，尽可能让身体的不同部位都能得到一定的活动量，用现代医学话语讲，就是预防功能性障碍出现。正因我在整个隔离期间都特别注意身体各部位的活动，才使我的身体最终承受住了隔离期间的残酷迫害，但左腿因长田关押时期变本加厉迫害，最终还是患上了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后文再述）。

通过在初级班期间的自我调整，逐渐在我的心底里成型了三条自我约束的准则。即一，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不搞事后甄别那套做法；二是，振作精神

积极面对，以一个战士/斗士而非囚犯的姿态面对可能发生的一切；三是，不轻生、不自残，留取丹心定要对得起妻儿和亲人。万一天不遂人愿，估计垂危难挽时，请妻子代为申诉，要求还我清白。

（八—2）关押学习班

6，升级与对策

大约于 71 年 4 月底或 5 月初，可能因我的问题长期未能拿下而引起军宣队的愤恨，而决定给予更为严厉的处置，故决定将我的学习班迁往农村——长田，距校部大约三四公里。在长田村也有部分拖家带口的地院老师租住在村内老表家中，如我系机械教研室黄作宾副教授和煤田教研室李宝芳老师全家老小就住在长田。

但关押我的地点却不在村子内居民聚居处，而是在村外的一个牛棚中（可能事前略经改造）。之所以选在远离居民点的村外办“学习班”，其理由除表面上的便于管理外，更重要的则是便于他们使用铁腕手段肆意对待手无寸铁的被关押者，而免除被外界察觉的担忧。在此想说明一点，之所以给“学习班”打上引号，一来是因为，这本来就是在毫无法制可言的文革时代，在前面冠以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班实质上只不过是一块欺骗广大群众的遮羞布，以此来掩盖当权者随意关押不同意见者的违法乱纪勾当；二来是，最初的学习班还让被关人员学学被关人员必学的“老三篇”，而此时的我，连主席语录、课桌、板凳等学习必用的课本和器具都不再配备了，世上哪有这样的学习班呢？！所以说，以学习班的名义，干违法乱纪的勾当也可算是文革时代的一项“创造”吧！

关押我的牛棚地处村外的道路一侧，其左前方约 30 多米处有一公厕，牛棚后面，则是一个很大的水塘。这几乎是江西那一带农村典型的建筑模式，因当时农村的农耕机械还很少使用，农田耕种几乎完全依靠水牛，而水牛喜水，故牛棚边必有水塘，供水牛嬉戏。水塘的后面则为一片树林遮掩看不清林后的真面貌，极目抬头望去，则可见重山叠嶂的模糊影像。道路另一侧则是大片大片的农田。

牛棚房舍的俯视外形 颇像俄语字母“Г”的形状，只不过横竖的尺寸大致相当。改装时将一横和一竖间加了一个门，且加装了锁扣，可以加锁把门锁

上。同时，在横向房中间又加了个隔断，将横向房分为里外两间，中间这间就变成了竖向房和横向房之间的通道。这样排列的目的是将竖向房间作为关押我的牢房，故可以加锁，而横向房的里间则是看管人员的休息室了。

到长田后，就将我投入到牛棚的竖向房内。房间的面积很大，据我目测约有 15 平米左右，而且竖向两面的墙壁都开有不大的窗户，约 0.5 平米，但加有直径近 3 厘米粗的木格栅代替了玻璃，大约是为防止犯人钻窗逃跑吧！只可惜窗户开设的较高，其底沿都超过我的身高，可能这是为防止我凭窗外眺之故吧！面对这一特殊的设计，我在室内只能隔窗仰视窗外的蓝天了，好在当时的 GDP 值很低，PM2.5 几乎没有，所以没有雾霾一说，只要是晴天，隔窗看到的永远是一片蓝色的天空。房间靠水塘一侧给我安了一个床铺（一副床板架在两条四撇八叉的长凳上），另外在朝农田一侧的墙边，放了一张课桌和一把方凳。这就是牢房里除我的个人行李和日用品外的全部家当。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再简单不过的家当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加大对我的惩处力度而在日益变少。起初是撤去了课桌，需要时用方凳代替课桌，让我的方凳上写材料，并代之以一根直径不足 20 厘米，长度不足半米的圆木作为凳子，供写材料时作为“座椅”。继而因不再让我学毛选和写材料了，故连方凳也撤去，只留下一段圆木共我当座椅使用。再到后来，就将架设床板用的四撇八叉的两条长凳也撤走了，让床板直接放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这下可真让我接地气了，所幸还保留了块床板，否则当地潮湿的环境（因牛棚靠近水塘，比一般住房还要潮湿得多）给我造成的身体创伤可能再也难于治愈了。只从这里就可看出，军宣队在抓五一六的过程中施虐于人的残酷程度，这些都是后话。

初步安顿好后，又开始了新班址的“开班”训话。专案组的成员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变化，但似乎周 x x 不在内了（也有可能当时还在，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在了。当我被解除隔离后，始知他已调离地院去福建了），这里我之所以要提到他，主要是在我被隔离审查期间，自始至终，只有黄津生和他两人没有动手打过我。只要在杜某指示或暗示下，专案组成员开始打人时，黄某即刻转身外出，周某则原地不动，没有任何表示。而且，在学九楼学习班时期，周某一直在同一房间内陪住，并且有一次睡觉前，还以平常人的态度和语气劝我说：有问题很快交代就没事了，你看学校里那么多负责人交代后都没事了，你又何必硬顶

呢？我从他的语气里知道他说这话是好意，而且也不是以专案组成员的身份在说话，所以，我也很动情的对他说道：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确实未曾参加过五一六组织，我不能瞎编胡说呀！听后他未再说什么，双方的谈话也就到此为止了。但在当时的状况下，它能如此待我，我是十分感谢的。所以，大约在 76 年底，当高院长找我去他家宣布给我平反时，我曾请求高院长将我不是五一六分子一事告知周某，以表明我没有骗他。高院长当时问我想通知他的原因时，我就上述情况告知。当时高院长一笑说道：你的要求我理解，但当前还有很多更紧迫的事要做，周某目前在哪还需去查，是不是就算了吧？！面对高院长的解释，我也觉得不要再坚持己见为好，就同意了。而后，高院长还补充了一句话：在学习班里他能私下那样劝你，已经说明他内心的看法了。

训话一开始就非善茬儿。杜某气势汹汹地说道：宋翔雁，你听好。在整个干校，不，在整个地院抓五一六的运动中，就属你的态度最为恶劣。你要知道，你问题是板上钉钉的，即使你不承认也完全可以给你定案。让你自己交代，只不过是为了给你一个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体现党在处理五一六问题上的政策。你要知道，我们的等待是有限的，党和人民不会无限期的等待你的觉悟。希望你不要错误估计形势，顽固到底只能是死路一条！接下来，几乎每一个专案组成员都程度不同但极其严厉地狠批我的顽固态度。其中更有甚者的是李鹤忠的批判，他手持一根木棒，凶狠狠地说道：宋翔雁，就你这样的我们看得多了。你不要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不承认我们就没办法了。告诉你，是时候不到，到时候撬开你的牙，也得让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来（说着，手里还舞弄着那根木棒）！很明显，这是一种要下狠手的炫耀。从这些严厉的批判中使我感到此乃近乎爱迪美顿书式的最后通牒，如若再不承认，就会立即定案，并劳改、流放或送监。当每个专案组成员都批判后，按初级班的惯例，接下来的应当是责令我对大家的批判、帮助表态。而每次几乎我都是同样的回应：我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最终一定能还我以清白。为了证明自己，无论是那个人对我的揭发，我都愿意与他当面对质，以便能帮助组织查明真相。正当我仍在准备如何应答时，只听到杜某说道：我们今天想对你讲的话就说到这里，希望你能一个字一个字的都听进去，并且好好想想。我们不想再听到过去那一套千篇一律的回答，给你三天时间，记住，只给三天时间，认真地去想想大家说的话意味着什么？自己要下决心，希望

你能和过去决裂，老实交代重新做人。听明白没有？对此问，我点头回应表示听明白了。于是，他们随即退出，并把房门锁上。接下来我想的并不是怎样交代的问题，因为，在历时半年左右的初级班里，我已经想过了不知多少遍了，而且，即使从70年7月份算起（因说那时钢铁学院个别人发起成立了以反周恩来总理为目的的五一六组织），至今也就四年时间，如此重大的问题，对我来说是不可能遗忘的。所以，我有十足的把握说，除参加过东方红公社造反组织和事后自动转成红教练组织外，不论是以单独的或集体的形式，我都从未再加入过任何其他组织。在过去的近半年时间里，上述150余字的内容，我不知说过多少遍，也不知写了多少遍。再想、再说、再写也仍旧如此。所以面对今天格外严厉的训话，表明了是对我的管制措施进一步升级的开始，即使我再怎么想也是无计于是的。基于此，我决定很好地利用给我的三天时间，想一想专案组可能对我采取哪些措施迫我就范，对这些可能的措施，我当如何应对，如何化解。面对今天李某杀气腾腾的言论，他们有无可能采取严刑逼供的手段，实施酷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当如何处理？我觉得自己必须冷静地思考，必须估计到最坏的可能，凡事预则立，必须要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因身处于特定的环境下，物质准备是谈不上的！

首先，我清理了隔离审查以来自己的认识（包括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院革委会、专案组有意对我“透露”的某些信息、批斗大会上得知的一些情况等）上的变化和“提高”，通过理清这个思路，也可作为三天后自己对专案组的一份答卷。清理后使我觉得当时对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认识更加系统和有条理了，这对今后从容应对相关质询也增加了信心。所谓系统、条理就是：五一六是一个以反对周总理为目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它成立于67年7月中旬；地院革委会个别成员在唯我独尊思潮的影响下，到处支持造反、打派仗，干扰了中央的战略部署而卷入其中是有可能的。目前贾振远、陆炎德等人承认参加了五一六组织就是证明；因此在地院开展对五一六的清查是完全必要的；面对清查过程中近半年来对我的审查，我是积极配合组织将个人情况做了如实交代的，并真心希望通过审查还我清白。就这一认识而言，重要的一是时间节点，即67年7月中旬，那也正是我即将结束简报组的工作，并因病开始全休的时间，这一事实是专案组无法改变的；二是定性，即五一六是阴谋集团，这就决定了，一来其活动不可能是大张旗鼓公开造势地进行，二来成员不可能很多，也不可能一窝蜂似

的发展起来。要发展也必然是从上向下逐步的进行，而且必然有一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首先要吸收的也是一些中上层要害部门的负责人，拿现代语来说即大约只能是精英们才有可能被首先吸收，然后再及其他。正因此，我对当时地院有那么多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深感内中有诈，觉得必是有人想把水搅浑，好金蝉脱壳。当时最令我生疑搅混水的人就是陆炎德，但鉴于陆已被军宣队列作样板，我不便直接去揭露，只是在交代和回应质询时，我反复强调愿与揭发者当面对质（因专案组曾透露过陆、钱等人揭发我是五一六）。我深信若能与陆当面对质，我定能驳得他体无完肤，我有这个自信！

其次，当确认自己从未参加过除《东方红公社》（含“红教练”）外的任何其他组织后，我也回顾了自己坚持的底线（或原则）：实事求是——有则有、无则无，接受并配合组织的审查。而不能采取许多党内干部在面对党内残酷斗争时采取的惯用做法——在高压下或美其名曰从党的全局利益考虑，违心先承认，过关后再翻案或等待中央纠偏时，甄别落实的做法。之所以不能采用这种办法的原因是，因为自己不具备党内干部，特别是那些有相当政治阅历的中上层干部的政治资本。对这些人的处理，还需考虑到他们过去的贡献、目前的影响，故有相当的回旋余地，相对讲会比较慎重，且甄别、翻案随时均有可能进行。相反，仅只是一名处于最底层的普通白点教师，一旦违心承认并定案后，要想获得甄别纠偏的机会都少而又少，翻案更遥遥无期，而且很有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会再有人过问此类陈芝麻烂谷子的旧账。如此，不仅会影响自己，更会影响到孩子的前程。而确保孩子有一个和所有人一样不会受到家庭出身影响的成长环境，恰恰是自己长时间来坚持不违心承认的重要原因和动力所在。经过这番考虑，我确认自己的信念和坚持是正确的，今后再也只能继续坚持。当然，这样作肯定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即一方面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和家人团聚、不能给家人分忧；另一方面，个人的身心会因此遭到更残酷的对待，会因此承受更大的肉体上的苦痛，对身体也将造成更大的伤害。但我觉得，这一代价只能由我来承担，决不能父债子还！我甘愿自己承受这些苦痛，也绝不违心承认后而转嫁给孩子，让他因父亲的过失而背上沉重的出身包袱。

再有，面对可能出现的施虐和人身迫害的加剧应如何对待。因施虐、迫害的主动方完全不受我的左右，故作为承受方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如何应对方能使

对已造成的伤害减至最低程度。针对此前学习班经常采用的施虐和迫害手法诸如不让睡觉(疲劳轰炸);限量喝水(减少外出解手的次数);长时间不给提供洗澡、洗换内衣用水或不让外出小溪处冲洗;长期只提供食堂制作的最低档的菜肴和主食,进入学习班后,从未吃过肉鱼之类的食物,即使节假日期间亦如此;除外出参加劳动和如厕外,平时没有放风时间等,我曾采取过一些应对办法,收到过一些微弱的效果但十分有限,如疲劳轰炸、食品营养等就只能听凭专案组摆布,基本无法应对。而今,随着学习班的升级,施虐和迫害必将加剧,应对考虑更显重要,即使效果甚微也不可让自己处于完全被动甘愿承受的状态。为此,我决定采用以下几条办法加以应对,并以此来保护自己:1、利用中央政策和毛的语录对抗施虐、施暴和迫害,进行合法斗争,制止迫害、捍卫自身权利。通过口头或书面的抗争(后来因收缴了我的纸笔,只能在每次施暴时用口头方式了),让施暴方知晓我的态度:接受并配合审查,但拒绝违背政策和主席思想的迫害。让对方知道,我是懂得相关政策的;2、向专案组成员提出要单独找杜某“交代问题”,借此对发生的违背政策的迫害事件提出看法和抗议,要求他立即向军宣队汇报实情,制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通过这种方式,可起到让杜某知道一旦出现问题,他将承担渎职的责任;3、在事态严重危害自身安全时,以要求面见蒋喜亭“交代”为由,上告专案组迫害违纪的严重事实,求得上层领导的直接干预。当然,我深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在蒋某人的默许下发生的,告发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我深信蒋某面对违反政策和毛的教导的诸项事实,绝不敢妄言那样做是合法的,只能回避或假意答应查清后再回复的手法来拖延,甚至不了了之。但即使这样,也能让专案组违纪成员有所压力,短时内不敢继续恣意妄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越加艰难的环境下,继续坚持身心的自我调理尤为重要。我深知,面对残酷而又无休止的迫害,自己的身心健康不受损伤是不可能的,但如何把这种损伤降至最小,则是我必须加以注意并努力做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为了孩子、为了妻子和家庭,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未来,要负起自己应负的一个男子汉责任,面对逆境决不颓废。为此,今后唯一的办法就是有针对性的加强身心的自我调整,而别无其他选择。面对训话时李某手持木棍不断舞弄的凶相,我料到在远离居民点的村边的山沟沟里,专案组成员动手打人的现象在所难免。但对此决不能再采用68年初夏时对付岳母家邻

居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的办法，因为这时打人者身披专案办案人的合法外衣，他们俨然成了共产党的“代表”，执行着“党的指示”，因此绝不可公然与之抗争，而把自己置于了“反党”的地位。唯一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利用党的政策和毛的指示，和他们进行合法的斗争，让他们找不到借题发挥的把柄进一步施害于人。这也就是我常说的：共产党的牢房是最难坐的道理所在。即明知他们并不是真正代表共产党人；也明知他们执行的并不是公开见诸报刊和文件上的中央政策和毛的指示，但你还得违心的承认他们是共产党派来“挽救和帮助”你的，因此还得按此原则自缚手脚地去艰难应对。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意欲施暴打人，挨打就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这时就要求自己全神贯注于施暴者的动向，面对来袭能做的只能是能躲就躲，能挡就挡（尽量躲过棍棒、躲过前胸和头部等要害部位挨打；尽量用四肢接招来抵挡）。同时，尽量向其他专案组成员身边靠近，以增加其大力挥棒打人的可能（因担心误打）。至于是否会出现如李某所言的，“撬开你的牙”之类法西斯式的严刑逼供，我思索后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这里毕竟不是国家专政机关的监狱或拘留所，想要施刑，但他们一来没有相应的施刑器具，二来也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施刑人员。何况，他们是打着办学习班进行专案审查的旗号行事的，在非法逼供上多少还是会有所限制的。但我也有万一遭受刑具逼供的思想准备，即万一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咬牙挺住，而不能失守自己的底线屈打成招，给孩子的前程带来不可挽回的影响。对酷刑下人体的痛苦状况，从中外文学、电影的描述中给我极大的震撼，如小说《牛虻》、《红岩》等，但我相信，若自身这次也不幸落入此种境地，为了自己后代的前程，我也定能挺住。而且，我已想好，即使到那种地步，也决不轻生，绝不落下个畏罪自杀的恶名，因这同样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总之一句话，在干校以致地院揪斗五一六的运动中，我能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拒绝违心承认的精神支柱所在，并非来自什么“伟光正”的理论或其他崇高信念，真实的精神支柱一方面是个人性格的使然——认理而拒绝强权；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儿子，让他的未来不因反革命分子家庭出身而受到影响。现在想来，大约也正是为自己思想深处缺少来自所谓“正能量”的崇高信念做后盾，因此才最终没能坚守住实事求是，不违心承认的底线，而向强权屈服投降的吧？！在注意身心调理中，抗打压、施虐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正常的思维活动、语言功能、肢体关节和肌肉等方面的训练，以及

孤独感的排除等任何可能因用进废退原理而导致的生理功能的衰退现象，都应列入其中。目的就是届时既要确保自己能够活着走出学习班，而且一定要以一个各方面基本上是正常（精神、思维、语言、肢体等）的健康人那样走出学习班。因为在我的生活理念中，人不是单纯为活着而活着，只如此则与动物无异。人只有为他人（含自己的孩子和亲人）的快乐、幸福而活着才有价值和意义。要想做到这点，就必须确保自己各方面的生理功能不会因学习班里的非正常生活环境和所遭遇到的迫害而出现衰退。

经过三天近乎没人打搅的思考，我内心就基本平稳下来，觉得今后一段时间内，无外乎就是再多受点罪，只要自己应对得当、自我调理得当、对路，应该不会出太大的问题。而且这三天里，在管理上尚未见有何特殊的紧缩，如外出上厕所、喝水、盥洗等基本与过去无异，当然，我知道这只不过是对方想借此表达为了让我好好想一想，已经尽力给了我很好的条件，一旦后来看我仍然“冥顽不化”，则会加倍地还以颜色，这是自己要有所准备的。在此期间，我利用如厕的机会，在来去的路上仔细地对关押点的周边情况进行了观察。但这种观察仅仅是借机让自己陶冶于自然美景和田野风光之中，让自己获得一种“拥抱”大自然的满足而已。因为眼下的我，太需要在和大自然的亲近中，享受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了。但一次从公厕出来时，我发现在环绕水塘的树丛后面（即关押我的牛棚旁的水塘后边），有一群人来回走动的身影。但他们很明显不是农民，而是一身干部的打扮，估计也是干校的人员，因距离较远（直线距离起码在百米以上），只能看出模糊的移动人影而难于分辨。回到屋内后，我想，很可能在此办的学习班不止我这一处，那边很可能也有一个学习班，否则不会有干部模样的人群在此人迹罕见的地方来回走动。而且，我估计那边很可能同样也是一处弃用的牛棚经改造后用来办学习班的。

7，施暴与抗争

三天后的第一次对话开始了，杜某一开始就说道：给你三天时间想得怎样了？说说吧。我随即将自己想的第一部分内容——隔离审查以来自己认识上的深化、疑问和态度做了系统的汇报。当我说道在唯我独尊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地院革委会的个别领导人加入五一六集团是有可能的，现已交代的贾振远、陆炎德即是例证。因此，在地院清查五一六分子是完全应当和必要的，此言似乎还得到

杜某等的认可，只见他们在频频点头。但当我说道：既然五一六是一个阴谋组织，其成员就不可能很多，但从告诉我的情况看，地院从上到下已有很多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这有些令人生疑，是否会有人借机想把水搅浑？这时就有人忍不住发狠地说道：你竟敢怀疑军宣队偏听偏信，好大的狗胆！对此，我不等其他人再欲上纲上线设置圈套的发问，就立即平和地说道：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告诫我们，历次运动中都不乏有人搅浑水借以逃脱，否则也就没有“漏网”和“补课”一说了。故不应认为要警惕可能会有人想搅浑水的看法等同于怀疑军宣队。这时杜某插话说道：先听他把这几天想的都说完后再做评论。看来我及时作出回应还是对的。当我继续说道，我认真仔细地审视了近半年来对我的审查，我始终认为对我的审查是必要的，既是对我个人的历史负责，也是对革命事业的负责。半年来，在这一态度指导下，我积极配合专案组对我的审查，实事求是地系统地回顾和交代了从文革开始到来干校以前在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特别是 67 年 7—9 月的那段历史。因这距现今仅三年有余，在这段时间里所接触和参与的事，经反复回忆可以说已非常清晰。我可以坦诚而负责地对组织说：我确实没有以任何形式、经任何人介绍参加过五一六组织。因专案组曾向我说过，钱天宇、陆炎德登不仅交代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而且还揭发了我，说我也是五一六分子。所以我也很认真地想过与此二人在文革期间的关系，并写成了材料，交给了专案组。说明了他们的揭发有误，并指出文革开始至今，我与陆某从来没有过任何个人之间的交往，即使一起参加过一些会议，如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讨论、去人大常委会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及事后大家一起核对记录等，也是很少很少的。只是来干校后，因我们的床位相邻，故睡前或起床后有过一些简短的交流，但因彼此不在一起劳动和学习，所以交谈的内容也很一般，而且也从未涉及过文革方面的事情；同时，在材料中我也将与钱天宇老师的关系和在文革中彼此间的交往情况如实作了交代。材料中特别指出了，当步行串联我从兰考回京后，直到来干校以前这段时间里，即 1966 年 12 月底至 1970 年 1 月之间，我们彼此间再无任何交往和联系，很难想象他怎么会说我是五一六分子？！但为了能尽快搞清我的问题，我真诚地建议，能让我与他们二人对质，如果还有其他人揭发，我也可以和这些人一对质，以便尽快做一了断。同时，我也借此机会再次对专案组并请他们向军宣队转知：在今后的审查期间里，我将一如既往，积极配合组织的调查，本着相信

党相信群众的教导，接受组织对我的审查；同时，我也相信军宣队会根据党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一贯政策，对相关的揭发材料做出进一步的核实。我深信自己的问题最终定会得到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当我将三天来的思考做了以上的陈述后，一开始没人说话，或反驳、或肯定、或敷衍，沉寂一会儿后，杜某开腔说道：你以为你现在的态度就是配合组织调查吗？再这样下去，你会越走越远的。给你办学习班的目的是让你交代自己的五一六问题，而不仅仅是一般地向你调查某些不清楚的问题，这点你不要搞错。同时还要向你指出，你只有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转变立场后，才有可能配合组织对相关问题进行的调查。同时还要告诉你，不要想通过对质来摸底，组织上对他人的揭发也是经过调查后才确定真假的，我们说你的五一六问题是板上钉钉的不是在唬你，你别以为通过拖的办法就能改变这一事实。你若想拖延，我们也会有对付拖延的办法，我们是不会听由你来摆布的。我们会进一步研究你今天的汇报，并向军宣队领导请示。对你的问题要采取哪些措施明天再向你宣布。说毕就示意其他成员一起出去了。

对陈述后没立即遭到批判而冷场，对再请示后宣布对我的进一步措施，这均出乎我的预料。我原准备说完后就会遭到狠批，并进而动粗。若此，我会进一步根据政策说理抗争。而今宣布后即散去，只能说明，我的陈述也是他们事先没有料到的，故进一步的办法只好另行研究再定。但我思想上没有天真地会认为他们会就此罢休，相反，却更增添了我的警觉。既然他们认为已板上钉钉，那就有可能按钉钉的材料做结论，该捕、该监将立即发落。这样，我的问题最终就只能到专政机关去解决了。如此则“祸福”难料，但我的基本态度依旧不会改变，至于如何应对，只能视情况的变化再定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是难熬的，是继续在干校接受审查，还是转至专政机关处理，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最终，我认为即使要想宣判并转送专政机关收审也不会自明日就开始，因要想送监还需有一个报送和审批的过程，绝不是军宣队想送就能送成的。而在这种准备移交前处理的特殊情况下，凶险的变数就会很高，这倒是自己要特别小心应对的。想到此，内心也就少许平稳了一些。

但今天情况的变化也让我感到似乎我的问题已经进到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般的困境之中，即军宣队和专案组认定我的五一六问题已经板上钉钉；而我本人

则认为，我不是五一六，从未参加过该反动组织。而且，不论从五一六组织成立的时间节点和我离开简报组的时间、因患病全体的时间三者对应来分析；或者，从我个人的出身、政治面貌、当时在造反组织内的职务等诸方面的条件来看，我被吸收加入五一六组织的可能性，也能很容易得出不可能吸收像我这样的人加入五一六组织的结论。但为何军宣队就不肯接受或考虑我所提供的的上述情况，以及我所作出的相关分析呢？为何又拒绝我提出来的：为澄清真伪、再做进一步的查证，以及我愿意与揭发者对质的请求呢？甚至专案组还把此斥之为我想摸底呢？而且。既然已经板上钉钉，摸底又有何用呢？面对这些我自己也难于理解的困惑，所以我认为自己的问题已成死结，在军宣队根本不听或根本不想听取我的申诉情况下，前景不容乐观，只能等着最后的宣判了。基于此，我究竟如何处置更好呢？想想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公开宣布说：既然你们不愿听取我的申辩和分析，对我的交代、解释，一律斥责为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那我就不再说什么了，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了；其二，仍按过去的办法呢，不管你们听还是不听，该怎么申辩我仍怎么申辩，直到你们宣判。而且宣判后，我还要继续申辩下去。长考之后，我的心逐渐坚定起来。那就是，我要选择后者。要像一名战士那样为真理坚持去战斗，而不能像囚徒那样消极认命，等待死亡。但需铭记的是，在共产党（或说是打着共产党旗号）办的“监狱”里，要抗争、要战斗，必须要按党的政策、毛的教导，摆出一副接受审查的姿态来进行。这里用得着鲁迅先生说过的：辱骂和恐吓不等于战斗。不能通过谩骂或其他极端方式来发泄自己内心的郁闷和鄙视，既要坚持积极的战斗姿态，又不能授人以柄。要坚定自己的立场，把自己摆在：我是好人，现受诬陷，接受审查、等待结论的位置上。想通这一切后，我的心情也顿觉轻快，对今天的思考过程和最终里出的头绪，我是满意的，这时仰头斜视窗外布满阴云的天空，倍觉人生历程的苦涩与艰辛，但阴云之后难道不就是阳光璀璨的蓝天吗？！

第二天如约对我的批判和所谓“宣布”按时开始了。杜某一开始就说：我们昨天将你的汇报和情况如实向军宣队作了汇报，经研究后认为，历经近半年时间，你自始至终无视我们对你的劝告和广大群众对你的批判、帮助，把目前对你的管理、帮助视为我们的软弱。所以一直以来，你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还企图以积极配合组织调查，愿和揭发人对质等美好言辞，来表明

自己的清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被冤枉的好人，抱着幻想试图蒙混过关。今天我们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早在决定给你办学习班时就已基本查清，而且已经达到了完全可以定性处理的地步。今天之所以还把你留你学习班里继续审查，目的并非想从你嘴里再多得到些什么，如今已有那么多人作了交代和揭发，你的交代还能比他们的总合都多不成？！所以，你要看清当前的形势，现在已对你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抓住了，你就能像其他已经交代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人那样，回到人民内部中来，否则只能落得个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下场。同时还要告诉你，你别想把学习班当成你的休养所，还有好几个人侍候着你。从今后，我们将加强对你的管束，促使你尽快转化。杜某虽然没有明说从哪些方面加强管束，但我心智等待我的必定是迫害程度的进一步升级。

杜某训话后，其打手李鹤忠就开始发威了。他吼道：宋翔雁，你站起来听好了！对他的呵斥我未立即回应，于是，他立即挥棒从左侧向我侧身打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即刻屈身前倾左手随即操起坐凳，双手握住蹬腿，迎击他挥来的棍棒。只听哐当一响，他的棍棒脱手被挡出去落在围坐着的他人脚下。与此同时，我义正词严地问道：杜展凯，学习班里你怎么能纵容手下打人呢？这符合党的政策吗？面对我的质询，杜某一时语塞，他人立即出来替他解围道：让你站起来听，你为何抗拒不站？这时我也毫不相让地回道：什么叫抗拒，我只是回应慢了点而已，难道这就是李鹤忠打人的理由吗？原本因打人的棍棒没有握住反被震落在地，而搞的有些灰头土脸的李某，这时有点缓过气来的说道：对顽固不化的敌人不但要打，若敌人敢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毛选上没说过吗？！对此，我毫不客气地回答道：毛主席说的“打”是指双方士兵在战场上的真刀真枪的打仗，而不是让你在学习班里手拿木棒气止颐使地随便打人！面对我毫不退让的态度，杜某似乎觉得继续这样争论下去，他们未必能占到上风，而且反倒会更让我得理不饶人，不利于以后的管束。故他又说道：宋翔雁，你的态度好嚣张啊，不要以为你多念了几年书，有本钱可以强词夺理了。告诉你，今后你若不服管束，专案组的人，有权采用任何措施加以处置。我注意到他的话语中，有意回避了“打人”一词。所以当他说完后，没有等他再问我听明白没有，我就立即接着说道：对符合党的政策的管理措施，我会坚决服从。但我请求专案组能将今天发生的事向军宣队领导汇报。杜某接着耍了个滑头，含糊地说道：你在学习班的情况，我们每天都要汇报，

不用你来请求！就这样，专案组在学习班里第一次想施暴打人的企图就在我按党的政策据理力争下化解了。但我知道，这更会引起专案组特别是恶棍李某的不满，他们还会借机引发事端，制造打人机会，我必须对此有所警觉。但这件事也说明，面对公开发表的党的政策和毛的讲话，他们即使想违背，也需找借口作遮羞布而为之，故今后当遇到对方施暴时，这就是我与他们进行合法斗争的武器，尽管我只能处于防守地位，但总比束手任人宰割要好。

此后每逢学习班要我交代，施暴、施虐均成常态，如经常让我站着听他们没完没了的训话，而且时不时地以纠正我的站姿为名，挥棒打人（如我单腿站立成稍息状，就会用棒打放松的腿，令我站直了）。大约十月以后，原来室内配置的方凳被一段原木（直径不足 200 厘米，长度不足 0.5 米）取代，从此每次学习班开会，我只能站着听训。但人在久站的情况下，重心在两腿间转换是正常的体位调整，以保证站立时间。但施暴者竟然不允许这种调整，猝不及防的一棒打来确实很难防范。从中可以看出他们为了取得施暴效果，可以说是煞费苦心无所不用其极了。在一次这类施暴中，李某一棒挥来因躲闪不及恰好打在我的左腿脚踝上，疼痛难耐令我当即屈腿跪地。我提起裤腿退下袜口，只见踝骨处外皮翻裂出血并肿起，令我怒气难耐，我踮脚走向李某，他们因不知我的意图都站起来吼道：宋翔雁，你想干什么？！我也毫不含糊地大声说道：我要抗议，我要就医！我深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我不能以牙还牙，而必须有理有利有节，不可陷自己于被动之中。我及时控制住自己难耐的怒火，但我必须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还以颜色。因此，我趁李某迟疑之时，一把夺过他手中的木棒，他们以为我要打人还击，一起上来想抢木棒，但我提着木棒让其一头着地，就势用另一只脚将木棒踩为两截扔在地上。并接着对杜某说道：你们尤其是李鹤忠借纠正站姿为由屡屡打人，这是违反政策的，现在我要求就医，但现在我走路有些困难，请你们考虑安排。说完我不等他们的允许，就势在他们坐的椅子上坐下，并提起裤腿退下袜口让杜某等人查看伤情。面对此情况，杜某等不好立即表态，只见黄某示意杜退出室外再作商议。稍后，黄津生进屋告知：因你走路不便，我们已派人去校部请医务室来人给你处理。今天的情况实属意外，因你长期来拒绝大家苦口婆心的劝告态度，引起众人不满是直接原因。今后你必须改变态度，我们也会注意。黄是调干生，文革前是设备科的一名科长，现是学习班的副组长，但自始至终从不参与对我施

暴的打人行动。我理解他的态度和难处，所以我不想和他争论，更不想反驳他，在施暴中他能保持理性在当时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没有再多说什么，也不做解释，只是对同意派医务人员来此看伤情表示感谢。当日下午校医室来了一名护士，估计事前专案组成员已经与她打过招呼，所以她查看时什么话也没问，只看伤情，给伤口处作了消毒处理，并在纱布棉上涂抹了一层黑褐色的药膏，贴在我肿起的踝骨上。处理后，她留下了一盒黑褐色药膏和三四片纱布棉及少许胶布条。还留了一小瓶酒精和一小包棉签，让我一天换一次药，说毕就收拾她的医疗包准备回去了，在她退出房间前，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在护士处理的过程中，专案组始终有人在旁边守候，大约是防止我借机向外界透露什么吧！在这次事件中，我之所以特别针对李某的行为抗议，原因是，我并非歧视他的右派历史，而是一方面这类人往往因个人的历史污点，在以后的运动中会比别人表现得更左、更激进。每次施暴打人他都属于出手最多打人最狠的一位就是例证；另一方面，其他打人者用的都是直径一两厘米的竹竿，而他用的则是直径三厘米左右类似武术队使用的棍棒。前者因有较大弹性，打人时因着力时产生形变而缓解了其击打的力度，而后者弹性要小得多，打在人身上则是实打实的，极易造成对被击打人的伤害。这也是武术人员使用棍棒而不用竹竿的原因所在。

此后一小段时间内，借故打人略有收敛，但施虐力度却明显加大。我想可能是想把杜某人说的“休养所”彻底改为牢房吧！最恶劣的改变是：1、不再允许出外入厕小便，而让在我住的房间里尿于脚盆内，第二天如厕大便时再倒掉。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专案组改用攻心战术时，才允许我外出去公厕小便；2、撤掉桌子和凳子，只给一根短木桩，因直径不足 20 厘米左右，只能横放在地面坐在其上。久坐其上则双腿发麻，屁股因坐在曲面上，时间也不能很长。为了缓解长久低坐造成的腿脚麻木，我不时将圆木竖起，让臀部的一侧坐于其上，过一段时间后，再换另一侧臀部来坐。只有当让我写交代材料或总结自己这阶段的认识和“活思想”时，专案组才给提供桌子和凳子，一旦材料写完并上交后，桌凳也就随即撤走；3、饿饭。在学习班内，历来吃饭由他们去食堂代打。吃什么、吃多少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但过去饭量还能基本保证一日一斤的定量（我的定量是 32 斤/月），但自从加大施劣程度后，经常一顿饭的主食只有一个馒头（2 两）和相当于二两量的米饭。加之每顿打来的菜都是熬南瓜、空心菜一类的素菜，几

乎从未给我打过荤菜。因此久而久之，饥饿感日益强烈，为此我曾多次要求专案组能按我的定量标准提供主食。但几乎每次均遭拒绝，而且还厉声说道：你要想享受、多吃，那就赶紧交代！对这种任意践踏国家粮食政策、克扣个人口粮供应量的行为，我懒得与他们争辩，因我知道简单地争辩达不到目的。于是，我后来连续十天记下了每天提供的主食类别和数量，得出我每天主食的食用量是六到七两，即使按高值计算，每月实际给我的主食量也只有二十一斤。有了这个数据后，在一次例行的训话会上，我正式对杜某等提出：倾向军宣队领导反映我的口粮供应被恶意克扣和要求按标准提供主食供应量的要求。而且我还进一步指出：每个干部的口粮供应标准是国家规定的，任何人无论用什么理由克扣都是违法的。面对我提供的数据和申辩，包括曾以“赶紧交代”为由不答应我请求人在内，均无言以对。但杜某仍然诡辩地说道：你的要求我们会反映，但我必须告诉你，你的粮是定量我们一两也没有克扣过。对此，我当即反驳道：你能如实反映就好。但我说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们向我提供的主食供应量远远低于我的粮食定量标准，而不是指你们克扣了我的定量标准。口粮标准是国家粮食局制订的，任何个人和其他部门都是无权改动的。面对我的反驳杜某未再争辩，但这次交锋后，我的主食供应量有了一定增加，尽管分量依旧不足，副食仍然是熬菜类的素菜。但我知道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要想根本改变掌权者的施虐状况是不可能的，依据政策维护自身权利也只能适可而止；4、撤去了支撑床板的长凳，让床板直接坐落在地面上。因南方原就潮湿，加之牛棚原就建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方，旁边就是水塘，就越发潮湿，而到入冬季节，因室内不提供取暖炭火则更显得阴湿寒冷，令人难耐。面对这种居心叵测意欲损伤被囚者身体健康的卑鄙施虐措施（含不给坐凳），我还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抗争，只能自己默默忍受，并通过自身调理（如活动四肢、全身搓擦、室内走动等，但这一切都要在不被专案组成员看到的情况下进行）尽量减少其对身体的伤害。

8，突变与换班

时光大约是七月中旬时，一次在夜间对我的批斗和训斥中，又因说我诡辩、态度顽固而对我施暴时，我依旧专注于李某人的棍棒，竭力设法躲过他的攻击（因他下手最黑），其他人的竹竿打上就打上，我从不躲避，也绝不吭一声。因我牢记中学学习拳击时教练的教导：当你被别人击中时，无论多疼也不要吭声，一喊

出来你就泄了内气，就变成挨了一记死打，而受到内伤。如你不喊就不会泄了内气，那只是表面挨打，有点疼而已，很快就会好的！所以，我每次面对他们施暴时，即使中招，也只能自认倒霉，但从不出声。而我的抗议发声，也只是在施暴停止时才进行的。而当晚施暴的同时，就在我专注于抵挡躲避的过程中，突然听到水塘方向连连传来极大的喊叫声，而且从声音判断，喊叫着也是男性。这让我印证了前述我曾在如厕返回时看到水塘后面有人影晃动时的判断，那边也有学习班。这让我断定，那边现在也在开始打人了，所以打人一事，绝非我的学习班所独有，它应当是学习班中普遍存在的施暴方式，而且肯定是得到军宣队认可的行为，从中可见军宣队在领导运动过程中的卑鄙和无耻。这晚当我躺到床上时，在脑中萦绕着的不是我今天挨打的事，反而是水坑那边会是谁呢？怎样才能让他也知道挨打时不要喊叫呢？须知在这远离居民点的偏远地方，夜晚四周没有一个人，当地老百姓也从来是不出家门的，你喊声再打也不可能有人听到，也不会有人知晓这里有人在施暴于人。相反，你喊声越大，自身的消耗也就越大，对自己的损害也就越大。所以，在这种地方挨打时，喊叫既解除不了自己挨打时的苦痛，也无法给外界传递求救于人的信号。只能自己咬紧牙关，能躲就躲，能挡就挡。但思绪过后，我知道眼下我的想法是不可能传递给水塘那边的受难者的，只希望他能早点领悟需要自己解救自己的道理！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时不时在夜深人静地时候，我还能听到时断时续的喊叫声，显然，那边的施暴行为毫无减少的迹象，也不亚于我这边的施暴频度，说不定比我这边更高一些！但因对我施暴时我从不喊叫，故施暴时间上下午和晚上都有发生；而那边，我仔细听过，白天基本上听不到喊叫声，痛苦的喊叫声基本上到夜晚才能听到，当然也不排除因白天外界的声音嘈杂，掩盖了那边传出的喊叫声。

大约到九月上旬，突然专案组检查我进入学习班后带来的，或后由昭明按我的要求交学习班转给我的个人用品，并将剪刀、剃须刀、水果刀、指甲刀及针线和一个塑料钱夹（钱夹内有为数不多的零用钱）等物品挑出，同时又让我交出手表、眼镜和皮带，并说上述物品暂由专案组，同时还问我身上有没有钱和粮票。我答道：我身上没有钱和粮票，钱都在钱夹里。并进一步问道，没有眼镜和皮带我怎能看书写字和走路？专案组人答道：需要时自会给你。对专案组当时的这些举动，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的用意何在？但稍事冷静思考后，我即明白

此举是因怕我自杀和逃跑而作的防范。但为何此时会促使专案组采取这一措施，当时我并未去想。直到当我被解除隔离后，方知水塘后面就是岩石教研室李明哲老师的学习班，在专案人员不断施暴的情况下，他伺机出逃，进入深山后，上吊自杀。据称当李出逃一事发生后，开始并未发现李的尸体，故军宣队一直按在逃定案。故一面派出多批人马去相关部门、地区和李明哲老师父母家里调查、寻访，力图将李擒拿归案；一面就是对其他被隔离对象加强看管力度，防止再次发生出逃事件，此乃我被突然检查个人用品及收缴有关物品和钱、粮票的直接原因。

可以肯定地说，李明哲老师是被其专案组成员残酷迫害而身亡的。我虽不是直接目睹者，但我却是在专案人员夜晚施暴过程中，直接无数次听到李明哲老师悲惨呼叫声的见证人。李明哲老师的死亡是军宣队和专案组人员尤其是李明哲专案组成员，在地院抓五一六运动中犯下的杀人血案！这起案件不应被淡化，更不能被遗忘。此事已过去 36 载，涉案人员不仅理应深刻反思自己对李明哲老师的迫害之罪，以谢亡灵、净化自己的灵魂。更应勇敢地站出来揭露这段罔顾国法、违背政策，打着红旗反红旗恣意妄为的罪恶历史，以及军宣队和专案领导班子在这起案件中不可推卸的罪责。我们大家有责任让这段血淋淋的草菅人命的历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地院的所有师生员工永远铭记。尽管我与李明哲老师并不相识，甚至彼此之间从未说过一句话。我只是在文革初期反工作组时，方才知晓其名和所在单位。但行文至此，面对这一悲惨事件的主角李明哲老师，满目含泪的我诚心实意地向他表达我的哀悼和敬意。他虽被说成是自杀身亡，但他却是一名以血溅轩辕的方式，以身死相抗争的一名战士。他不惜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告诫国人：伟大领袖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罔顾国法、践踏人性、涂炭生灵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血腥整人运动。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有责任奋起声讨文革的罪恶历史，以此悼念亡者，警醒后人！

随着专案组人员完成对我私人用品的清查和收缴后，对我的管束也更加严厉，如每次申请如厕大便时，一度均改为由两人看押，而且返回驻地时，经常喝斥不允许我四处张望并催促快行。此外，每当我申请剃须要求发还剃须用具时都一再拖延。每当我用专用皮带磨锐剃须刀片和剃须时，均一直有人在旁看守，而且一旦剃须结束，专案人员就立即将我的剃须刀具和磨锐皮带收缴回去（因我使用的是英国四十年代出产的 VANLET 剃须刀具，刀片可在刀架上借助配套的磨锐皮带

进行磨锐。因当时国内市场已早无此类民用消费品进口，故我只能继续用手中留存的那些 VANLET 刀片，反复磨锐后使用）。此外就是施虐情况更甚，特别是频繁使用疲劳战术，经常每晚十一点以后让我听训或对我进行批判，而且一训就是一两个小时，个别有时甚至会达三四个小时之久（因这时我的手表已被收缴，具体的时间以及每天我能睡几个小时的觉都只能是估计）。进行疲劳战的施虐者们，其卑鄙、恶劣之处在于，不仅他们自身的作息时间可以不受限制地自行安排，以保证他们自己的睡眠时间，而且，他们采用的是轮流施虐制，每次施训就两人参与，下次施训又换为另外两人进行。因此，施虐者总是精气神十足地对我训话呵斥，而每当我因睏倦难熬站立不稳时，他们就会动粗施暴，用其手中的竹竿打人。我则因睏倦早已失去反应和躲避的能力，只能承受竹竿的击打了（此时专案组成员都改为用粗细不等的竹竿行凶了）。不管专案组的夜晚训话何时结束，也不管我几点“上”床就寝，但到凌晨六时左右，我就会被专案组成员呵斥叫醒，而且在喊叫的过程中，不时还会用脚踢我的腰胯部，借机施暴（因当时我的床板就直接放在地面，施暴者以踢人的方式喊人起床，似乎无可指责），这种施暴方式，在连续数晚的训斥中，几乎已成了惯常现象。所以为了预防施暴者脚踢时可能对我造成的伤害（我因缺觉，清晨六时许，我正处于熟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遇袭时，往往会加重受到伤害的程度），我睡觉前都会仔细将脱下来的衣裤叠好，置于被子内腰胯部位面对床铺外侧的一面，以减轻被踢的力度（因此时已进入十月，晚间和凌晨的气温已经较低，故睡觉时衣裤盖在身上也极其自然，不致受到怀疑）。但我也想指出一点，即在收缴了我的部分个人用品后，尽管施暴打人的现象依然频频发生，但似乎打人的烈度有所收敛，使用木棒狠打的情景基本上没再出现，而且夜晚也再未听到过来自水塘后面的喊叫声（因当时我并不知道李明哲老师已出逃并故去）。故当时我认为军宣队把暴力施压为主，改变为暴虐施压为主，在不致造成被囚者身体外表受伤的情况下，却会给被囚者内在的身心健康造成永久性的损害，可谓更加阴损！

时间已拖至约七一年十月中上旬，我的问题仍僵持着毫无进展。一日，专案组成员主动让我搞搞个人卫生，换衣服、刮胡须，并交还了我的眼镜，然后告诉我军宣队要找我去校部谈话。当我一切准备停当后，行前杜某又对我训话道：这次军宣队领导找你谈话是很重要的事，你要仔细听好。此外，沿路你要很好听从

指挥，不许东张西望。不管路上遇到什么人，都不许与别人说话或打招呼。言毕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方才带我出门，并朝龙陂的方向走去。这是我被押解到长田近半年后第一次“出门”远行，但我却丝毫没有半点兴奋的感觉，而且也没有观看自然风光景色、陶冶于大自然中的闲情逸致。这倒不是因为杜某人事前不许东张西望训诫的威力使然，而是由于此时我全神关注和思索的是军宣队这次找我谈话的原因和目的何在？以便能找到适当的应变措施。须知这是我被隔离近一年后，军宣队第一次主动找我谈话，尽管此前我曾多次因专案组施暴、施虐要求面见军宣队申诉，但都石沉大海渺无回音。因被押往长田后，很快我的问题就形同死结而毫无进展，无论如何批斗、施压、施虐、施暴，我的回答始终如一（出东方红公社外，我从未参加过任何组织，我不是五一六分子。从时间节点、我的身份和我身体的状况分析，很容易加以判别）；我的态度也始终如一（因有人揭发把水搅浑，我相信组织，愿意积极配合调查。为搞清真伪，我愿意和揭发人当面对质）。面对此情难道军宣队萌生解开死结的新打算？抑或是再次发出哀地美敦书，给出期限，先是承认交代，否则到时即刻结案宣判，并转至专政机关处理？沿途这两种想法交替在脑海里回旋，始终难于得到确定的结论。眼看即将到达校部，我停止了内心不着边际的思考，给自己定下了应当遵循的下述原则：即一直以来确定的态度、底线不变；认真仔细听取军宣队言谈的中每句话、每个字的含义；慎思而谨言，不明了的地方，应直接询问清楚绝不主观推断。需要考虑方能回答的问题，以需要回忆或思考为由，要求给时间想清楚后再作回答。一旦确定了自己的应对原则后，我的心情也就稳定下来，在案专案组人员引领下，从容地走进了“学九楼”军宣队的驻地。

当我步入军宣队办公室后，发现室内共有四名军人，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可能又加强了军宣队的领导，以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但不容我多想，蒋喜亭即从座位上站起来，语气和缓地说道：宋翔雁，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你可以坐下来听我慢慢说，并指指我身边的凳子。当我坐下后，他也坐下来并继续说道：你的学习班已经办了快一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地质学院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很多五一六分子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后，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原谅，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中来了。但你却和他们相反，一直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你这样做是很可怕

的，也是没有前途的。尽管如此，但我们遵照党的一贯教导，还是不愿放弃对你的帮助和挽救，不愿意眼看着你滑向反革命的深渊。今天找你来谈话也是我们不愿放弃的一种表现。同时，我也想告诉你，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已决定地质学院今后要迁至湖北省重新建校，故学校今后将由湖北省委和湖北省军区领导，我们将在交接工作完成后撤回北京。今天在座的这两位同志就是湖北省军区派来接替我们工作的（当时蒋指了指身边坐着的另两位解放军同志并说了他们的名字），为了让他们了解你的情况，所以请他们来共同和你谈话。应当说，蒋的这段开场白其语气之平和、态度之诚恳，是六八年军宣队进院以来在我印象中的首次。从他的开场白中也使我知道了这次谈话实质上是京鄂双方就干校工作进行交接的一部分，而从抓五一六运动而言，无疑我的问题又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毕竟隔离时间已将近一年，其中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势必要给接手的一方有个交代。因蒋的谈话仍在继续，故我只好暂时停下自己的思考，专心于听他的讲话。他继续谈道地院抓五一六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说从院到系革委会的各级领导班子几乎无一例外均被五一六分子所把持，地质学院的领导权，实际上已经被他们所篡夺。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下，以王大宾、李贵、聂树人、贾振远、陆炎德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现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众多跟随他们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人，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政策感召下，不仅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还反戈一击揭露出大量在院内外从事的反总理活动。地院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大好形势，在学习班中，专案组已向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了，对此你应当是了解的，今天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讲了。你有什么问题，现在我们也想听听你的想法。面对军宣队心平气和地讲出想听听我的想法，这在近一年的隔离审查中还是第一次。这种平和对等的气氛，给人一种新意，让我觉得是一个能够相互沟通，解开依然处于死结状态的问题机会。于是我稍作考虑后说道：我的学习班办了已快一年了，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也想不通。刚说到此蒋喜亭就打断我的话，但仍用平和的语气说道：有问题想不通就说出来，办学习班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你的疑惑和问题，当疑惑解决后，你的问题也就自然能很快得到解决了。这时，我从他的面部表情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的得意与自信，似乎他真的认为把我的问题拿下，就在这一瞬间了！他继续说道：有什么疑惑今天你就都说出来吧，相信我们会给你解释清楚的。于是我继续说道：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既然中央文

件说了五一六是一个隐藏很深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因此在我的理解中，这个组织的人数就不会很多，而且其成员和组织的活动肯定也是很诡秘的。但为何地院里面却有那么多的五一六分子，这岂不比一般的群众组织还公开了嘛？说到这里，本来我还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为何不仅上层领导班子了有五一六，而且中下层领导班子里也有，甚至连一般老百姓中都有，这样的组织还能隐瞒很深吗？但不等我再发问，蒋喜亭就噌的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彻底抛弃了他那伪善的一面，露出了原本的狰狞面目，大怒地对我吼道：滚！真是不可救药。面对蒋的这种无理谩骂，我鄙视其到了极点。我毫不迟疑的站起来，转身拉开屋门就跨步走出了房间。因事发突然，专案组成员赶出来时，我正沿过道向“学九楼”出口端走去。专案组成员一看急了，大声喊道：宋翔雁你站住！我无所畏惧地回应道：我在过道出口处等你们，我不会跑！我心想，作为一名政工干部，居然如此没有修养和水平，这实出人所料。想想几分钟前，面对其伪善的开场白，我还幻想着能与之沟通以便解开问题的死结，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须知，军宣队所执行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路线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方针是不会改弦更张的。

等专案组的人在“学九楼”出口赶上我后，我们又稍等了片刻才踏上返回长田的归途。沿途我只是默默地走着，毫无心思观看路边的农田景色，也没有心思去思考实现换班后，新的军宣队领导将会如何处理我的问题。这时的我，头脑中似乎一片空白。但我也觉得，让自己能借机放松一下也好，毕竟古人言：有张有弛乃文武之道也！今听从之或许也是有益的。回到驻地当我进入自己的囚室后，专案组的人并未责令我该做什么，锁好屋门就退到室外去了。显然，我估计他们对今天发生的事情也颇感意外。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在他们认为将会有的一场重要的谈话，竟会以他们的领导蒋先生的一个“滚”字而胎死腹中。因此，眼下也就暂时失去了下一步该如何处理我的问题的依据。所以，他们需要等待新的指示。经过回程时的短暂放松后，在囚室内的我，珍惜这难得的无人干扰的宁静。我重新回顾了上午蒋某人的所言和我的对答，同时也极力地回顾着湖北省军区军宣队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的情况。我力图从中发现一些可能出现的新动向。经过记忆的梳理，让我得出了以下的看法： 1、蒋企图通过这种交接方式，给接手的湖北军区军代表一种他们在对待尚未交代的五一六分子，一直是按照党的政策，耐心教

育以等待他们觉悟。同时，对他们在隔离审查期间的生活也是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按革命人道主义原则进行管理的。这一切均可从他的开场白的语调和所流露出来对被隔离人的关心，以及我来前的个人清理换装后的外表得到证明。但假的就是假的，一旦当我提出的问题、疑问令他难以自圆其说时，其暴怒时喊出的“滚”字，就将其原本凶狠、胡来的极左面目暴露无遗了。这也使我更加鄙视蒋某人虚伪和两面派嘴脸；2、我的提问是实事求是的，而且也是切中了地院清查五一六运动的要害之处，否则蒋某也不可能情绪失控到如此不顾脸面的程度。通过我提出的问题和冷眼面对蒋某的怒吼并傲然离开的举动，也向湖北军宣队表明了我不惧强权但却是说理的态度。无疑这对湖北军宣队在接手我的问题时，对蒋某及专案组所言的内容和材料多少会产生些许影响，对避免先入为主和偏听偏信也许能有些微弱的好处。当然我也清楚，北京、湖北的军宣队所接受的都是来自北京中央的指示的，故不可轻易认为湖北军宣队能够避免偏听偏信和先入为主的覆辙，搞不好，甚至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呢。总之，还是老话一句，凡事不能只想好的可能性，这会让自己心存侥幸而麻痹；3、在蒋某讲话、怒吼和我提问、出走的整个过程中，湖北军宣队的两名成员，毫无表情且一言未发，显得相当沉稳，所以在今后的审查中自己需要更加谨慎对待。

军宣队交接时的谈话因蒋某人的的发怒而夭折后，专案组成员有两三天没有对我训话和找茬儿。但好景不长，随之对我的管束就又恢复了常态，继续以夜间听训、审问的方式搞疲劳战术。因睏倦头脑发木，他们说什么和问什么实际上我完全听不进去，但这时有一点我是极其警醒的——在木讷和困倦的情况下，绝不回答任何问题，以免发生错误。因此，每当我困的难熬而又让我回答问题时，我就用：我太困了，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来搪塞！尽管这样往往会被施暴的竹竿伺候，但我总觉得比说错了话要好得多。加之此时天已渐寒，衣裤也穿得比以前多些，在不是特重的击打下，还不至于出大的问题。但因长期缺觉，体力消耗极大，终于在一次夜间训话施暴中，在一次击打后倒地不起。专案组成员再骂再踢我也没有起身，但头脑还是清楚的，知道自己就是困倦而无力，并非因挨打受伤所致（因浑身并无太大的疼痛）。故我也就势装死躺着，当有人弯腰问我：你装是吧？快起来。我含混地说道：太困了，我真起不来了。面对此景，他们也只好作罢，让我去睡了。但我还恍惚地听到有人不解气地说道：这算便宜他了！由此

可以看到，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己任的年代，有些人的心已经被狗吃掉了，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的人性已渐渐为狼性所取代，这也正是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可怕之处，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今人警醒了！

9，广播与智斗

时光大约已进入十一月上旬，我的问题仍毫无进展。我心想，看来湖北的军宣队依旧继承了前军宣队的衣钵，并沿用着前一段的管束方法，以施虐为主迫我就范。当然，我也想到过可能因接手后头绪很多，还很难就我的问题仔细进行研究，故只好维持原有做法，待腾出手后再予以研究解决。因此，我告诫自己，我的问题可能还需假以时日，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还需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可信继而乱了自己的方寸。而正此时，我隐隐约约的从村里的高音喇叭中传出的熟悉的音乐声——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一连几天连续播放着。对此开始我并未在意，但连续两三天来均如此播放，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因到长田已有半年多的时间，此间我从未听到过农村广播发声，而现在听到了播音，但播出的既非公社的通知一类；也非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转播，而是一个劲的连续播放同一首语录歌曲。这绝对是一个异常情况，但问题并非出在公社广播站，肯定是省或中央要通过这首歌曲传递某种声音。我继续专心致志地听着播音，几乎一周有余，都是同一首歌曲连播约十分钟左右，而且中间没有话语播出（当然也不排除我没有听见话语播放，因声音很小，加之可能因风向影响，声音时断时续，致使我难于听到）。反复思索后，我只是觉得有异常，但无法找到答案。尽管如此，我却觉得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现象来保护自己，免受专案组施暴的危害。有了这一想法后，在一次夜晚听训中，当专案组成员再次用竹竿打人时，我毫不迟疑地对杜某厉声说道：杜展凯，你纵容手下不断打人不觉得可耻吗？现在广播里天天都在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吗？你们这样做那点符合毛主席的教导，那点符合党的政策？面对我的严词质问，杜某等人先是一愣（他们可能怀疑我是从哪听到广播的），接着又是李鹤忠搬出了他那套放下武器的才叫俘虏，你不交代就表明你没有放下武器而不在此列那套混蛋逻辑来反驳，并且还想继续挥杆打人。但我毫无畏惧地对李某说道：李鹤忠，你好好学学。毛主席说的是“不打人骂人”、“不虐待俘虏”，你现在是不是又想打人？“俘虏”指的就是被抓住的人，你们为何要虐待被抓的人呢？面对我的质问，他们在一愣之后确实

无言以对了（加之他们当时可能已经听到中央关于“九一三”林彪事件的传达，但这只是我后来的揣测，当时我并不知道林彪已摔死在温都尔汗）。因此，他们不再回答我的质问，并草草结束了当晚的训话。事后，尽管我为自己能以广播讯息作武器，来保护自己很感满意，但我并未停留在抗争小有成功的兴奋上，令我关注的仍然是，究竟是何原因要反复播放主席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语录歌曲。但处于隔离状态下的我，仅凭极其有限的政治阅历，是根本不可能想到点子上的，能想到必有原因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这点倒并非自夸！

经过这次据理抗争之后，专案组持竹杆打人的施暴行为是明显减少了，尽管不时在训话时还要手握竹竿在一旁摆弄，但却极少真正挥杆打人。这也许是他们为了摆出样子，不肯认输的一种阿 Q 精神流露吧！

但随着时光的流逝，眼看七零年即将过去之时，我的身体状况似乎出现一些异常。夜晚睡觉时，有时会因左腿疼痛而醒来，但疼痛的部位却很难定位，自己起来揉搓时也不觉有何异常。但令人不解的是，有时在白天如厕时，在仅有 30 余米的路上，竟会走着走着而突然跌倒在地，而跌倒前并不觉得有身子晃动、站立不稳的情况出现。这种无缘无故的跌倒现象，从出现到我离开长田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生了五六次之多，几乎都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点专案组监护我去厕所的成员看得也很清楚。为此，我曾向杜某正式提出就医的要求，也向他说明了我夜间被疼醒和我起来揉搓的情况（因夜晚囚室里仅我一人，我起身揉搓这些情况专案组成员并不知情）。但杜某却打官腔地回答道：这需请示军宣队领导后再定。结果如石沉大海，将近一个月都无人答复。直至长田关押学习班改由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的赵壁媛亲自挂帅，学习班转入攻心阶段后，才爽快答应并派一新调入校医室的中医大夫（名字忘记，只知道她是我们半工半读教研室物理老师张待勉的爱人）来长田，作为医生的她看得出为人很正直，他并未因我是一个被审查的对象而漫不经心，相反她为我做了一次比较认真的检查。查后她对我说道（当着专案组成员的面）：你这是因潮湿寒冷引起的气血不通所致的病患，现在看来你足背的静脉搏动较弱，气血不流畅，需要注意保暖。目前校医室没有什么对症药物，还需你自己注意，晚上睡前最好用温热水泡泡脚，这会有所缓解（事后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因长田学习班的施虐后果，导致我左腿患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这是后来由北京宣武中医医院确诊的）。

10，陪斗见到王大宾，云山雾罩听妻劝

进入 1972 年后，专案组对我的训话频度明显加大，基调主要是说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放到全院来看就这么大点，但你的态度之恶劣和顽固在全院却可算数一数二的了。全院那么多罪行比你大、职位比你高、资历比你深的人，在党的政策感召下，通过群众的帮助都已悉数交代和承认了自己的罪行，重又回到了人民群众中来。而你，却不知审时度势看清楚这一形势，而是顽固地抱着死不承认的恶劣态度，这不仅会毁了你自己，也必将毁了你的家庭。新的一年已经开始 了，希望你也能有一个新的转变。转变的主动权现在还在你手里，但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等下去，到时候你再后悔就迟了。这期间尽管训话的频度加大了，但训话时间却比以前少许多，更主要的是口气和态度比去年要缓和得多，甚至不记得从何时开始还以因我左腿有恙，给了我一张板凳（但训话后仍旧收回，若想坐还是只能坐在圆木桩上），允许我坐着听训了。此外还有一点变化是，训话后不急于让我马上表态，而是让我自己好好去想想，珍惜他们的劝告。尽管我一直在考虑这种改变的因由，但却难于找出答案，我只能判断可能与去年十一月前后连续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有所关联吧。

大约接近一月下旬，专案组通过训话告知我地院五一六的头头王大宾即将被押来干校，近期将要接受干校全体教职工的揭发和批判，肃清他在地院的流毒，届时你也要去参加。但你是作为揭发者还是作为陪斗者呢，这就要看你的态度和表现了。如果现在你能很好地交代自己的五一六问题，那我们可以给你一个上台揭发王大宾的机会，这对你的问题的最终解决，无疑十分有利；但如果你仍继续坚持以往的顽固态度，那就表明你仍然和王大宾站在一起，那只好让你作为陪斗者接受大家对你们的批斗。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明天回答我们。同时还说道：此前他已从北京被押往丹江基地，接受了丹江基地职工们的批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专案组的这一席话对我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因当时在干校的清查工作中，军宣队以传达中央文件的名义，反复声称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存在，故对此我也深信不疑。只不过对地院会有这么多的人是五一六，总觉得难于理解。而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内心总觉得清查工作肯定存在扩大化的问题。基于这一看法，在得知王将来干校接受批斗时，我认为如果地院有五一六

这个组织存在，那王肯定是五一六分子，也肯定是地院的五一六头头无疑。既如此，从北京，继而丹江、干校对他进行批斗，肃清他在地院的流毒和影响也就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至于以揭批王大宾为诱饵，交代并承认自己的问题，着对我毫无作用。因本来对我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我当然不可能利用这一所谓的机会。所以第二天专案组问我考虑的结果如何时，我就将上述想法作了汇报，只不过没有谈及抓了这么多五一六，可能存在扩大化的想法。面对我的回答，专案组倒没像过气那样又痛批一顿甚至施暴打人。而是无奈地说道：那你就等作陪斗吧，真是顽固到家了。

大约到月底（根据王大宾的回忆录所载是 1972 年 1 月 27 日），干校在“学九楼”前组织了对王大宾的批斗大会。凌晨天色刚亮就把我喊起，让我梳洗剃须，并发还了眼镜、皮带、换了外衣，然后同样宣布了去干校沿途的注意事项后，就带着我奔向校部的“学九楼”。因时间还早，沿途没有碰见任何人，到学九楼后先把我安置在一间没人的办公室内，让我在室内等着，不许乱翻乱动，也不许大声喊叫，并说等会儿会给我打早饭过来。看得出房间是事前整理过的，所有的柜门和抽屉都上了锁，室内没有任何纸张和可以阅读的东西，我只能坐在椅子上脱了鞋按摩我的左脚，同时思考着批斗会上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届时该如何应对？因对我说的是作为陪斗参加大会，因此大会要批判的只是王大宾，不大会涉及到我的问题，但喊口号把我稍上这很自然，这时我不跟着喊就是了。但口号只涉及到王大宾时，则我必须跟着喊，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别让别人抓住辫子。同时我也提醒自己，当别人揭批王大宾时，必须高度集中精力仔细听好，以便能更好地把握五一六的具体罪行及地院五一六组织的一些具体情况，为解开自己问题的死结收集更多的素材。但稍后大会进行的实际情况让我事前所做的上述准备几乎完全对不上号，初始宣布押我上台站到王大宾的对称一侧的瞬间，我是按照自己的设想，在押解人员反手按肩的情况下，尽力保持着自己的体形尊严，迈步走上主席台的。此后的两个因素让我原有的思路和准备几乎完全被打乱，最终是在懵懵懂懂不知究竟的情况下再被押回长田的。所述两个因素是：1、当一上台看到已经站在台上的王大兵时，觉得三年未见的他除了略显消瘦外，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变化，而且从他站立的姿势和表情可以看出，他对眼下即将开始的批斗并不在乎，也不服气。而当批斗开始众人齐呼口号时，他全然不予理睬的态度，更显出

他毫不认罪的心态。这时，开始我心想他肯定也是因没有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所以才导致被游斗的下场，并非完全如军宣队所说的，单纯是为了要消除他在地院的流毒所致。由于内心里的这种揣测，一下子就打乱了我此前对自己的要求，没能很好地注意别人对王的揭批，为自己收集更多关于地院五一六的资料。在这种揣测影响下，我的思绪犹如平原兜马一般易放难收了。他怎么能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呢？他手下的那么多常委、委员等都已纷纷亮相交代了他们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事实，难道他作为一把手的主任还能逃得了干系？！面对这连小孩子都无法骗过了事，他怎可能拒不承认呢？！在当时，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觉得也可能他虽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但却不肯承认已经揭发出来的地院五一六集团参与过的很多比较严重的罪行。因为，在一年多学习班中的批斗和说教下，我思想认识上唯一的“提高”就是接受了地院存在五一六的组织及其成员的这一判断。因此，对一批院、系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及相关的个别人是五一六分子就不怀疑、不奇怪了。所以我又觉得可能自己的后一种判断比较接近实际。但接下来当有人在揭批中质问王的某些具体问题时，却听到他回答时竟说道：“我不是”、“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没有”……。这些语气坚定且否认性的话语，又把我的思绪搅乱了。为何王竟然一点负罪感都没有呢？我总觉得，如果王是五一六分子，即使在个别问题上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也不应该采用这种语气和态度说话。因王大宾在文革中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敢于担当责任的人，在已无法推脱自己是地院五一六集团头头的大前提下，竟然会对一些具体罪行的情节采取此种态度和语气加以否认，实出所料并难以理解。尽管我是探工系原钻探教研室的老师，但因我不是探工教学小组的成员，因此只是在学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时，才会与本专业的学生有所接触，对他们的为人、学习情况才会有所了解。但因我带过 64 届学生的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后，就因参加四清离校去了农村，所以和本应于 66 年夏季毕业的本系学生（含王大宾）基本没有接触过，对王的个人情况在文革开始时可以说没什么了解，直至反干扰时方才知道他的一点简况。当东方红掌权后，因自己出身不好，为避免给造反派头头带来不必要的攻讦，我从未主动与当时掌权的小将或干部、教师等联系、交往。但从记忆中仅有的几次直接接触中（三次，两次是王点名要我去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并回校进行传达，另一次则是探工系革委会主任吴坤正——三年级学生，带我去北医三院看望住院接

受治疗的他)，以及朱成昭事件出现后，他的态度和勇挑重担的表现，让我感到他是一个有是非原则、听中的央话，敢于担当、敢于承担责任，而且能比较严格要求自己的（如我未见过他抽烟、喝酒）小将。当然，我不隐晦，他对我的信任（表现在他让我在全院大会上传达首长讲话上）也是当时和后来我一直对他抱有好感的重要个人原因。正是因为我思想深处对王曾有过的上述相当正面的看法，以致对他今天如此反常的表现更觉诧异！因此，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难道他也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揣测之中。如若这种揣测成立，那地院这么多人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又该如何解释呢？正因我的思绪如此反反复复的变化，导致大会上对王的揭批我几乎一点也没能听下来；2、当大会主持人宣称先将宋翔雁押下去再继续开会时，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分木讷地让押解人带至主席台右侧前排（实则与原站立位置相对）坐下来。接下来我清楚地听到主持人说道：请刘昭明同志上台揭发。这时我脑袋只觉得嗡的一下，什么？难道她要揭发？她要揭什么？难道是揭发我67年夏对她讲到的对江青的看法吗？她会这么糊涂吗？一系列的问号接踵而至，我的心蹦蹦跳都快跳出来了，我看着她手持讲稿一步步走向扩音器，这是我被隔离一年多后，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我每日都在思念的亲人呀，她如今会揭发什么呢，千万别犯糊涂呀！我双眼盯着她的脸，但我看不出她脸上十分漠然的表情想要诉说什么。这时突然我觉得自己的心似乎平静不再蹦蹦乱跳了，因此时我突然下意识地觉得，这也可能就是命吧！尽管我不信神鬼之说，我也不信上帝，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我还是相信命运的存在。因此，当我想到，可能这就是命运的安排，那该怎地就怎么地吧，只要她和孩子能过得好就行了。尽管我的心境似乎平稳下来了，但从她发言开始，我就很难像过去一样专注地去听、去思考，只笼统地记得她说除了一些我认识的人如贾振远、李益民（文革前原探工系总支书记、院革委会委员）、陆炎德、吴力文（探工系革委会副主任）金希华（钻探教研室老师，作战部办公室主任）等，说他们都已交代并承认了自己的五一六问题，你既非党员又不是干部，干嘛还要死不承认呢？但当我突然听到她说我曾在67年夏在北太平庄相遇时向她说过总部现在要把一批老造反派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五一六兵团时，我犹如在云端做梦一下子堕入万丈深谷一般完全不知其所云了。接着我就听到她那撕心裂肺般的呼喊：为了孩子、为了我，也为了你自己赶快交代吧，这样我们全家就可以团聚，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不

忍再听下去，也不敢看她一眼，我低下了原本昂着的头陷入了痛苦而迷茫的沉思，最后是如何走回驻地的读不到了。

（八—3）攻心学习班

11，“班长”换人，手法转变

自作为陪斗参加王大宾的批斗大会之后，我的精神状态似乎就陷入到云山雾罩的迷茫之中，自己就难于理清头绪确定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面对专案组的相关问询，在应答上也缺少了过去的自信和分寸把握。正是在自身怀疑和丢失了应对审查的底线和原则的状态下，我步入了隔离审查的第三个阶段——隔离审查的末期——攻心学习班。

在隔离审查末期（约在1971年1月下旬至二月中下旬之间），专案组对我从逼供、体罚、疲劳“轰炸”、饿饭、限水等威逼手段，一改为“攻心为上”的手段。而且由干校专案办赵壁媛亲自挂帅，出面找我谈话，她不仅“苦口婆心”地开导，而且，还根据我在交谈中流露出来的迟疑，给以有针对性的暗示。与此同时，特别又通过几乎每天给我送一封家书的办法（我印象中共有十一二封，这也是我被隔离之后，首次能看到爱妻的信件），这对一个久无妻儿信息的我来说，其对我心灵震撼的程度，就犹如一颗核弹爆炸那样猛烈！信中既表达出母子二人望眼欲穿的呼唤和期盼，也流露出爱妻深情袒露般的劝慰。而这一切就像一把利刃扎在我的心头，奇痛难忍。读信时，无法控制的泪珠成串地滴落在叠得非常规矩的信纸上，这种情感上的呼唤和折磨，更胜于隔离期间的棍棒，让我难于承受。最终这一杀手锏使我原本坚定的心产生动摇，并有些挺不住了。但一个作正直人的良心底线却始终纠缠着我，让我无法迈出违心承认的最后一步。这就是，因我确实未曾加入过五一六组织，因此就不存在介绍人的问题。但如今要承认是五一六，那就必须事先认定一个介绍人。认定谁呢？这就成了我想迈出这一步的第一个难题。虽然我长期被隔离关押，但每次集中从宽处理的大会还是让我参加的，目的当然十分清楚，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觉悟”，交待。因此哪些人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我是知道的。但我不敢随便拉一个人说他就是我的介绍人。因为万一他的交代中没有说介绍过我呢，岂不让人家背上交代不彻底有所隐瞒的罪名吗。这不是为开脱自身而害了他人的小人行径吗，岂可为之？！此外，从他

人的坦白交代中，我知道加入五一六需要填表，对此我也深信不疑，因为“五一六”被说成一个反革命组织嘛。但也因我确实未曾加入过，哪会知道表格的具体情况和填写要求呢。如若随便一说，万一与“真实”的表格有出入，岂不又会说我不老实而罪加一等吗。再一扩展，说你在这个小问题上都作假，岂不在其他大的问题上更有可能作假了！正因介绍人和表格问题对我来说难于逾越，而使一度动摇的我又坚定起来。心想还是做个老实人吧，省得自己折磨自己。但赵璧媛不愧整人的老手，似乎看出了我的动摇和回摆，继续加强了对我的工作和妻子家书的传递。所谓攻心为上，家书乃攻心之利器也。每读一封家书，就让我彻夜难于入眠。最后，我不得不请求给我买烟，允许我抽烟思考，以便精神上能够更集中一些。对此，赵璧媛也很爽快就答应了（文革中我曾开始抽烟，但隔离后被专案组认为是资产阶级享受，以你还想享受，那就赶紧交代的说教而被禁止）。不仅如此，为了配合攻心的需要，还在管理和伙食提供上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善，如能按定量标准提供主食，副食也能看到点荤腥了；重要的是，小便可以去公厕了，发还了皮带和眼镜，床铺也恢复了原有的高度，并重配了桌子和凳子与刚来长田时一样了。

为配合攻心战的需要，除了管理和伙食方面的改变外，最重要的变化是，赵璧媛在训导的语言和语气上的明显变化。她一改过往批判训斥的语言和语气，而改为劝导、关心和理解的态度，加之又出自女性的口，确实比棍棒和斥责更难于抵挡。与此同时，它还采用欲擒故纵的策略，在每次与我谈话后，或每次让我读家书时，都不是立马就让我谈出听训或读信后的想法。而是很委婉的说道：你不要急于对我说的这些谈自己的看法，你再好好想想，看我说的对不对，你还有哪些不清楚的问题、还有那些顾虑，等下午或明天再回答我。甚至，当拿出家属让我看时，还退出我的囚室，作出“尊重”我个人隐私的模样，让我自己慢慢地阅读，等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后，才转回来对我十分动情地说道：你要珍惜刘昭明对你的感情，这段时期以来，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容易，尽管大家都很照顾她，但她既要参加运动，又要参加生产，孩子幼小很多事是他人是无法代替的。你难道就不考虑她的辛苦，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拖延下去？！你的这种不近情理的顽固态度，外边很多人包括一些已经作出交代的五一六成员，都很难理解的说道：宋翔雁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他不替自己想也就罢了，怎么也不替他老婆和孩子想

想呢？！这就是所谓旁观者清的道理嘛，你啊，好好想想我说的对不对？！谈完这类话，传递了她想要传递的信息以后，她并不急于等着我或要求我作出回答就转身出去了。她的这种不让你立即作出回答的策略，实则起到了不让你立即释放出内心的压力，让你内心集聚着的痛苦斗争继续折磨着你自己，借以动摇和摧毁你的抵抗意志。现在想来，她的这一手段确实有其高明之处，这也可视为蚁穴溃堤的道理吧！

12，精心设计，俯首就擒

我内心的抵抗意志经历了十余天连续的侵蚀后，赵某于二月下旬某日终于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不再等待了。她一早来到长田，就开始对我展开了决战前的最后冲击。她进屋后先让我坐下，自己也坐在我的对面，仍用此前同样平和的语气说道：怎么样，已经十多天了，你有问题应当有个了断了吧？经历陪斗王大宾和听了刘昭明对你的揭发以来，特别是在刘昭明给你的家书劝导下，你内心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想顺应形势承认交代，又因某些具体问题而疑惑，故摇摆不定拖延至今。昨晚你爱人又写了一封信托我今天捎给你（说着她取出了信件，但拿在手里并没有给我），由此可以看出她比我们还着急，希望你赶紧承认交代，尽早回到她的身边。她放下信回家前我还跟她说道：我会把你的心情告诉他的，你就在家等他吧！她不愧为一个打攻心战的高手，上述一席话说的都是昭明，而没有说出她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而且在诉说上述的话语时，手里还摆弄着昭明交个她的信件，两眼一直停留在我的脸上，观察着我表情的变化。面对他的目光和话语的停顿，我没有出声但却不能久视她盯人的目光而移开了自己的视线。这时，我听她继续说道：今天，我想给你一个方案供你考虑。如果今天你能识时务面对现实，也珍惜刘昭明对你的劝导，就承认自己参加过地院五一六组织，是一名五一六分子。那么，组织上将决定今晚就让你回家与家人团聚，并在家里继续完成你对个别记不清的问题再作思考，并完成最终交代材料的编写。我刚刚提到的方案，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军宣队领导研究后慎重作出的决定，是出于对你和你家庭关心的体现，希望你能很好地考虑考虑。当然，你也可以不考虑我提的方案，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我确信，其他任何方案只能给你和你的家庭带来更大的伤害，而非相反。她说完这一席话后就停了下来，她也没有再次催我给予回答，似乎她

决心等待一段时间，似乎她有那个自信知道我会怎样回答一样，时间就在这种等待中一秒一秒地过去。这时的我实际上已经没有继续坚守自己理念的信心和勇气了，事已成定局再无回天之力了。应当说，为了孩子今后的前途，我所追求的确保自己政治上的清白的目标，到此时已经被自己的情感之重所吞噬而不复存在了。之所以一时还张不开嘴违心就范承认，不是因为我还在想什么，还在考虑怎么说，而是因为我的脑子已经空空如也，再也“开动”不起来了。就这样僵持了至少有五六分钟，赵始终未再发一言，看着并等带我说话。经过这五六分钟的长考后，我向赵璧媛说道：我接受你提出的方案，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这一事实。容我再回忆思考后，完成上交材料的编写。说这番话时，我没有正面看着赵的面部，我说不清楚当时自己的复杂心情，作为一名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是羞于还是不愿看到胜利者的面部表情？！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后，赵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并说道：欢迎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爱人的信我现在交给你，你可以回家后再看。现在我代表批清运动领导小组对你宣布：宋翔雁隔离审查学习班今晚正式结束，待送你回家后继续完成遗留问题的交代和最终交代材料的编写。在材料上交和大会正式宣布结束隔离审查之前，不得在外随意与他人交谈有关运动事宜，有需要时应通过家人找领导小组反映、解决。说完这席话后，赵问我听明白没有，能不能做到。对此我给予肯定的回答后，她又说道：现在你可以开始清理一下自己的东西，傍晚时分有专案组人员送你回家，我回去会先通知刘昭明的，以兑现我的诺言。在此我想补充一句，当赵听完我接受他的方案后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再也没有了此前那种关心、理解、温存的语气和语调了，又恢复了她那一贯的对人训导、说一不二的政工干部所习惯的语言和语调了。这恐怕也是在政治运动中，每个政工干部都需要的多重面孔吧！

赵走后专案组将原收走的个人物品悉数交还给我，并让我抓紧整理好个人物品，并清扫住房。当一切收拾停当，专案组看过并认可后，我坐在行李上，打开了昭明请赵带给我的信件。信中所写的仍然是让我当机立断，不可再犹疑不决而错失良机的多次提到过的话。但此信中有一段话（大意）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今难已忘怀。即，你必须看清对被立案审查的五一六分子而言，交代与否其前景有天地两重天的差异。你既非党员又非干部，而且出身不好，无须在意因五一六问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多大影响，而且党的政策是说得很清楚的，切不

可庸人自扰，加重自己的思想负担。我思考着、辨析着这段话的哲理，觉得爱妻的这一看法可谓入木三分极为深刻。这对我能放下“确保自己政治上的清白”这一沉重包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我也懂得，尽管眼下天天在讲有成分，但不惟成分，重在表现。但碰到具体问题时，从来都强调要从阶级分析入手。若犯错误了，出身好的统统说成是认识问题，而出身不好的，一般则成了立场问题。而在作这种分析和判断时，个人政治上的清白与否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这一现实从我个人经历过的历次运动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我们直到天色傍黑才将个人用品装上两轮排子车，在专案组成员陪同下，由我拉着车子朝龙陂家中走去。尽管此行是回家，但我的心情却少有回家的欣喜和激情。脑子里想的不仅是文革以来，特别是一年多来的苦难历程，更多的则是，如何才能及时而又恰如其分地写好个人的交带材料，把违心承认的谎言说圆。“重任”在身大约也是自己兴奋不起来的原因之一吧！

13，终于相聚，彻夜诉谈。

到家门前，专案组的人帮我把东西卸下车并嘱咐我记住赵上午交代过的事项，在他们将车拉走后，我和昭明随即将物品先搬入棚子内放下，然后进入屋内。我看到儿子正坐在床头瞪着眼睛看着从屋门进来的我，不知他是害怕还是奇怪，一个劲地向床里面蹭，既不叫妈，更不叫我。直到昭明抱起他来，让他喊我爸时，他才怯生生地喊了声爸，我答应着他想去抱他，但他躲着不让，我只好作罢。昭明说你别急，他认生得有个过程，孩子的这一状况，也让我想起了一年前在樟树车站接他们母子时的情景。当昭明放下孩子后，我立即将她拉到身傍并低声问她：我于 67 年初夏在新街口豁口和你谈论文革的事是否还记得（因此事让我一直放心不下）？当她表示一点也记不起时，我就以没关系让他不用再去想了，从而也使我心中的一份隐患得以永远化解。当我的一块心病被排除后，回家的感觉方有一点点升温。在和儿子戏耍一段时间后，他也逐渐与我熟识了一些，父子情深之感油然而生，我看着他脸蛋上仍隐约可见的伤疤，又勾起了许多过往的回忆。这时，忙碌的昭明让我放下孩子，说孩子要睡觉了，别让他疯得太厉害。于是我放下了儿子，他妈给他换了衣服、让他撒完尿后，就陪她先睡下了，我则回到棚子里收拾我带回的东西。

当东西基本整好我正在观看昭明搭建好的棚子时，她出来唤我回去赶紧休息了。但我毫无暇意，肚子里有很多话想和她说，为了不被他人听见，我们躲在被窝里“窃窃私语”。当我说道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采用说谎的方式过关，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可能以后会因此而付出代价时，她有些委屈，误以为我是在责怪她。并说道：你是不是觉得我害了你？我搂着她并解释道：我说的话，包括我自己在内。而且，我还把我对她的信件中我认为是入木三分的看法告诉她，觉得自己确实无必要再坚持，而是要永远记住远离政治的原则，经过这次整饬之后，我已再无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想法了。俗话说得好凭本事吃饭，做好本职工作，做一个有良知的人。我深信，凭你我的学识和能力，不必担心有无容身之地之危，也无需害怕有无用武之地之险。我担心的只有一点，即在外界环境较差的境遇下，如何教育孩子成为一个爱科学有知识的人。否则，一旦孩子今后学无所成又一无所长时，那时我们将会有一种负罪感而自责不已的！此外，我还把心里想的一股脑都说了出来了。我继续说道：眼下说谎过关只是应景而为的无奈之举，切不可自己背包袱说什么害了我的话。正好相反，我觉得这次是我害了你。你想，如果你不嫁给我，你一个逍遥派是不可能摊上今天这份罪的，你说对不？！我这一席出自肺腑的心里话，让她释然也让她知道了我对她的真心付出是珍惜有加的。在连续无日无夜的操劳后，她累过头了，终于在我的怀里含笑似地睡着了，而我，守在妻儿身边，想着这一年多来的一切，想着明天开始还要面对的“艰难”任务，想着今后国家、学校可能的未来，想着自己及家庭今后的去从，我却毫无暇意，辗转反复似乎已近天明时分才慢慢地睡去。

14，靠爱妻相助编造谎言，以落败身份亮相换回“自由”。

清晨起床后，我即告知昭明，请她尽速帮我打听清楚加入五一六的表格是啥样的？一般什么样的人才可能作介绍人？其他方面的事不用她在操心，我自己是有办法拿捏的。同时我也问她心中是否已有向她提供这方面情况的对象，并嘱咐她找人时要特别小心，不要被别人发现。此外也要注意是否有人盯梢，因为那些整人的主很可能正瞪着眼睛观察你的动向呢，万万不可大意！当昭明带孩子去幼儿园和上班后，我简单地整理了一下房间，给自己安排好一个书写材料的位置，随即就静下心来思考材料编写中需要注意的方方面面。

经苦思悯想后思绪渐清，在昭明回来前我终于理出了编写时应注意的几个方面，即 1、在大的骨架上（时间、地点、个人状况等）坚持过往历次材料中的真实回顾，让编造的部分嫁接其上。即以真实的东西做基础，自然而有分寸的加一些需用的谎言；2、基于历史真实，绝不编造任何反总理、反中央（或有可能被引申为反总理、反中央）的想法、议论、会议或行动，即绝不在罪行上编造谎言；3、所有编造的谎言，尽可能采用模糊的叙述手法或说法。因模糊既便于谎言被戳穿时易于回还；又可避免直接对他人造成伤害；4、要有自信，坚信我占有时间节点上的巨大优势（即我 67 年 9 月中旬即退出简报组、9 月底即患病全休），故没有多大可能参与五一六的具体活动。而在这点上，军宣队和领导小组也是心知肚明的，只要我材料上明确承认自己参加过五一六组织、是一名五一六分子，那就给了他们“一打一个准”光荣下台的台阶，从而不会再在其他方面与我纠缠了。

昭明回来后告知我准备找唐振权老师打听表格和介绍人的事情，已托小何转告他七点在锅炉房打水哪儿等他。对此，我也觉得可以。但唐老师有大大咧咧漫不经心的毛病，我嘱她少说我的情况，多打听些他是怎样交代的，尤其是表格式样和介绍人的资格，也可再问问加入时有哪些手续，多知道些有备无患嘛。

经过昭明数次与唐老师的交谈，我终于知道了表格的样式和介绍人只需是老造反派即可，而且也知道了唐本人也是编造后才得以脱身的事实。从而也说明他所说的格式也未见得是真的，也说明我原本认定的运动扩大化确实是存在的。但也就在此时，我才自省地看到自身思维模式上过于机械的弱点，既要编造谎言，区区一点小事（表格式样、介绍人等）竟然也会成为我难于解决的难题！难怪惯于用谎言忽悠群众的赵璧媛之流能设计出“两步走”的方案，鼓励我先承认，后圆谎的解困办法。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类似我这类思想方法过于机械而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是不能介入政治的。

有了唐老师告知的情况，我很顺利的就写完了个人的揭发交代材料。因为大的骨架未变，这些材料我已经不知道写过多少遍了，只是需要在谎言部分的编排和嫁接上多做了些考虑罢了，并无太大难度。现在能记得的梗概是：大约八月底或九月初，核心组某人（记不清姓名了，因当时我与总部里的一些小将接触少，对他们的名字不熟悉，更别谈记了）在作战部办公室召集作战、动态、简报组的

成员（三个组的办公室均在学九楼四层西侧）开会，会上召集人说：现在全院的人几乎都参加了《东方红公社》，所以组织有些庞大涣散，大家反映过多次，有时有事连人也找不到。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所以总部研究后决定，把早期的老造反派集中起来，成立一个“五一六兵团”，作为《东方红公社》的核心。今天找大家来就是说这件事的，希望大家珍惜老造反派的荣誉，严格要求自己。表格我已经交给金希华老师了，会后每人领一张，填好后再交还给金老师即可。表内介绍人一栏，你们愿意的话填我就行，不愿意的找其他核心组成员介绍也行。为了避免公社内部人员误解，说东方红内部分三六九等，希望大家不要随便对外说我是东方红核心组织“五一六兵团”的成员。

我记得所填写的表格上印有“五一六兵团”登记表字样，表内栏目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日、家庭出生、政治面目、何时加入东方红公社、现在的工作部门、所在班级或单位、介绍人姓名、审批人姓名、填表时间等。我领了表后，还问了金希华老师主持会议的人叫什么名字，怎么写法，然后才回到简报组填写的，填完后就立即去对门作战部办公室，将表格交给了金老师。

我觉得选择上述方式编造的谎言有以下三点好处：1、在作战组办公室“开会”，由总部的人来讲一些京内外东方红小将们的活动情况，这在当时（67年4月至9月）是极其普通也是很经常的事，故假真不易识破；2、采用集体加入的方式可免除对细节的追究，有利于模糊化处理，而且达到了尽量不涉及具体的人目的，免得无意中对他人造成伤害；3、时间点选在五一六兵团出现一个月之后和我离开学九楼患病全体之前半个月左右，既比较符合兵团从初建到发展需要时间的规律，又可为自己未具体卷入五一六的犯罪活动埋下伏笔。

材料写好后，我不仅十分认真地进行了反复推敲，同时也与昭明讨论过几次，觉得如此编排也与昭明此前的揭发交代吻合，于是我们决定就这样定稿了。当我们将交代材料誊清后，大约在72年3月初将其上交给赵璧媛。赵接了材料后对我说道：你回去后可以自己先休整一下，想想是否还有补充的，若有还来得及添加。我们看过后，若有问题也还会再找你询问和查对。但我回家后直到大会召开前，赵从未就我所交的材料再找过我，可见让我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好让他们尽快收场下台是真，什么进一步再想清具体问题的说道，只不过是让我把谎言编圆的幌子而已，但我自个儿反倒叫起真来了！

大约三月上旬，干校召开全校大会的前一天，赵璧媛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谈话，告知我材料看过了基本上可以。并说，因你的问题已不能再拖了，军宣队研究后决定明天就召开全校大会，让你上台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你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说清自己的问题，特别是要讲清楚为何要拖这么长的时间才承认交代的原因。要看到尽管你的罪行较之有些人为小，但你中毒却远较他人为深。如果不是组织上的耐心等待和帮助，不是大环境给你带来的压力，单靠你自己恐怕很难自拔了。你要看清这些，讲出自己的感受。边听我边想，赵的这番话不仅是让我在说谎骗人的时候，还要把一年多来对我的残酷迫害，进一步编造成是对我的耐心等待和挽救的美好谎言，甚至还要对此表示出感激涕零的心情。作为一出骗局的设计和编导，赵璧媛的所言可谓登峰造极了。但作为该骗局唯一男主角的我，就如任何一部剧作中的演员一样，都必须按编导的要求、意愿来演绎和发挥！

在第二天的大会上，我拿着自己编写的材料，按赵某的要求讲述了自己加入过五一六组织的事实。但我很快就因患病全休而未卷入多少五一六的具体活动，故我在被隔离审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总想侥幸过关，拒不承认加入过五一六组织，而成为地院五一六分子中态度最为恶劣的一个。但党并未因此而放弃我，一年多来不断地向我交代党的政策，耐心等待我转变后能自己主动交代，避免矛盾性质的转化。而且说到动情处还声泪俱下，从某种程度讲，假戏真做还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可惜当时没有录像设施，否则录下来现在再看，也可以审视一下当时的我，已经堕落到何等不堪目睹的程度。此后每每想到为迎合赵某等为粉饰地院抓五一六取得重大成绩的需要，当时自己在台上的丑角表演，殊不说是否达到了对众多听者行骗的效果，但我自己却倍觉羞愧难当。每当回首这段不堪深忆的历史时，对自身灵魂深处创伤的鞭笞，有时竟会让我感到恐惧（原来一个人的堕落竟会如此容易），不可不警惕呀！后来我也曾对昭明说过，这大约也是采用机会主义态度处事后的一种心灵上的自我惩罚吧！

至今我也难于想起当时讲完后我是怎样走下主席台的，也记不起是怎样宣布对我解除隔离审查的。这样重大的事情竟会毫无印象，这在我身上也可为是罕见的了。我反复问过自己，这难道是为了有意忘却而真的忘却了吗？！但至今也没有得到答案。尽管我无惧审视自己的灵魂，但这段不堪回首历史的结尾竟毫无记忆却是不争的事实！

(九) 抓“五一六”时我的悲苦处境

作者注：这部分是在昭明口述基础上，由我整理并经昭明审校后成文的。（刘昭明是宋翔雁夫人）

（九—1）牵连之苦，歧视之痛。

当我带孩子来到干校顶多一周的时间，一切尚待很好安顿之际，在全校揭批五一六大会上，军宣队就宣布对翔雁进行隔离审查。我目睹了翔雁被人押出会场的场景，看到他那不服气的劲头，我真说不清自己当时的复杂的心情。尽管我们有翔雁被整、被批的思想准备，但突然被宣布隔离审查却大大出乎所料，因为当时在干校还没有听说过哪个人被隔离审查呢。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翔雁的问题，更没有心疼他的思虑空间。因为天气已经渐凉，急切需要的防风棚子还只是搭起了一个骨架，棚子骨架的完善，糊泥上顶还有很大的工作量要做。为了照顾好孩子，我每天忙得要命，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真想好好骂他一顿，什么事都全身心投入，但对家里的事反倒不很用心，搞得我现在如此狼狈。有苦、有冤却无人能听我的倾诉，只能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心里！

1，内心的矛盾

我于 70 年九月下旬请假回北京，准备接孩子返回干校自己照看。但正在我紧张地做作各项准备时（如购物，购食品、药品，准备各类衣物等），一天下午周家骏老师（五连指导员，翔雁原教研室的主任）突然来访。他因赴京调运设备而来，说顺便来看看孩子。因家里条件很差，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他的，只给他倒了杯水。他和孩子玩了一会，并问了问准备的情况。此后他向我说道，学校即将全面展开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政治运动，你是否知道？听后我倒反问他抓什么五一六？因我一直以来对政治方面的事很少关心，当时又忙于带孩子去干校的各项准备，还得抽时间给我母亲和侄子准备些过冬用的衣物被子，拆洗老人用的一些东西，真有些忙不过来的感觉，所以回京后与学校留京的人员几无联系，可以说什么情况都不知道。面对我的反问和解释他也哑然了，并笑了笑接着说道：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是反周总理的。现在贾振远已经交代承认了，陆炎德在干校那边也交代承认了，下一步就要在全院展开揭批五一六的问题。对五一六

反革命集团的政策是很明确的，只要自己交代承认了，组织上就按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否则就是敌我矛盾性质了。开始我对周老师所言还有些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后来才觉得他是不是有所怀疑或另有所指呢。我是个直性子人，有话憋不住，就立即问道：周老师，您说这些是不是有所指呀？面对我的诘问，周老师没有回避地说道：对，在前一段揭发中老宋也成为怀疑对象，所以我想请你多做一些老宋的工作，如果他加入过五一六组织，就老老实实向组织交代清楚。党的政策很明确，交代了就按人民内部问题处理，让他不要有顾虑。如果他确实没有参加，请你也要告诫他，一定不要犯态度，他的性格你比我清楚，一定要劝他正确对待群众。总之，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说毕，他又问了问我准备何时回干校？我说假期到月底，我会尽力准时回去的。说完话，他就告辞要回去了，我对他的忠告表示感谢，并答应他一定会好好做翔雁的工作。

周老师走了，同时也带走了我内心原有的宁静，带走了全家即将在干校团聚的美好憧憬。因我和翔雁彼此已相识很久，我对他的品行、为人一直深信不疑。但为了不影响他，也为了避免一些无聊人的议论，67年底以前我尽力回避他，所以对他文革前期的情况我并不十分清楚。再加上我对政治一直提不起兴趣，文革开始后，除了教研室组织学习讨论外，我只和系里的刘宗平、朱定宇、林××等老师一起，聊聊院内外的大字报、相关的首长讲话，有时也帮助系里将取回来的动态报和东方红小报等分发给各教研室。总之，文革中我一直处于逍遙状态，而且只要时间允许，我还需要经常回家里照看我母亲。因文革开始后，街道和红卫兵们，在同院邻居的挑唆下，几次三番地到家中盘查、抄家；还诬告家中院子里有地窖子，要挖地检查，并为地窖子的事罚我母亲跪地、抽打，强令交代；又以住房面积过大为由，强迫腾房等。搞得我侄子不敢上学，我母亲胆战心惊度日如年，故我必须时不时地回家看望并陪伴母亲，让她能少许安心一些。她老人家虽然经历过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近代史上的历次战乱，但因一直本本分分的生活，从未经受过现在这样明火执仗般的洗劫、殴打和恫吓。即使解放后当我父亲于1951年以莫名的通敌协助美军登陆秦皇岛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改为15年监外执行），她老人家在无经济来源的情况下，靠卖掉院内的北房和三间东房和一些其他用品度日的情况下，对党和政府也从未发过一句怨言，总是要求我们好好读书，建设国家。而且，当58年天安门拆迁时，她还响应政

府号召，将自家后院平房腾出出租，为此还受到了政府的表彰。但万万没想到，正是后院的一家租户，借文革之机勾搭街道，诬告我母亲，让红卫兵来抄家打人，而这时政府却没人出面制止。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有时我每天都要回家陪伴母亲过夜，白天还要陪她去街道，交材料、到银行交个人的首饰、存折和家中的其他财物，以及房地产证等。所以，我对当时乱而无序，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的状况也很不满意、很不理解，不知道这种状况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所以心中也无精力顾及其它。故当周老师提及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事时，我还觉得十分陌生，似乎过去自己好像从未听说过一样。但以我对翔雁的了解，我深信他不会卷入其中，而且他也决不会对我隐瞒，特别是后者，我是坚信不移的！但面对周老师的告诫，我又不可能无动于衷，因我过去虽与周老师从无单独交往，对其为人不了解，但他毕竟是翔雁和朱定宇老师原教研室的主任，也曾听他们说过一些对周老师为人比较肯定的评价。何况，周老师的劝告，完全是出于对翔雁的关心和爱护，决不能等闲视之，不当回事。而且退一步考虑，不管翔雁与五一六有无牵连，但万一因此挨整挨批，我带孩子同去干校后，岂不会再次陷入求助无人的困难境地。届时我和孩子能挺得住吗？就这样，翔雁会不会真的是五一六，翔雁会不会再次挨整，这时我要不要带孩子去干校等问题就搅得我难以安静下来，几乎到了日不思食，夜不能寐的地步。而在我身边的只有年已七十三岁还有很重肺心病的缠足老母，作女儿的我不能在她身边尽孝，不能很好照顾她老安度晚年就已很不尽职，哪能再拿自己的事去搅扰她本来就已十分艰辛的生活呢？我的个性属于遇大事需打定主意时，往往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而一经拿定主意后，我会不惧困难刚毅应对，咬牙坚持的女性。如今我主要的不是担心翔雁和我自己，而是在明知翔雁有可能遭到运动冲击的情况下，要不要带年仅一岁八个月的儿子前往干校。为了能尽快地做出决断，我一方面立即给翔雁写信，告知周老师所说的事情，让他按周老师所说的正确地对待清查五一六的问题。同时请他考虑一下，鉴于有可能再次挨整，孩子可否仍暂时留在北京交给原来的阿姨看管，并要求他迅速回信告知。同时，我又打电话给孩子他姑，请她尽快来地院家中，有急事相商。姑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接电话后第二天中午就来了。我将周老师前两天所讲的话，都向姑姑谈了，也讲了自己对是否带孩子前往的犹疑。姑姑听后首先询问了我所了解的翔雁在文革中的情况和我对翔雁的看法，我很坦率地和姑姑说道：对

地院文化大革命和翔雁在文革中的情况我确实知道的很少，但我相信他不会是五一六分子，我相信他不会对我隐瞒。姑姑听后说道：周老师说的话很好，他是一个很正直干部，十分难得。你要翔雁认真好好想自己在五一六事件发生前后，学校的和他自己的情况，不要简单地否定别人的怀疑，在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面前，一定要好好想清楚，按党的政策要求去做。并说师大现在也搞得很紧张，很多造反派都有可能卷入其中了。因我现在正忙于办调离手续、交接工作，没有参与到运动中，所以有些情况也不太知道。但看来上面是抓得很紧的，这点得让翔雁知晓。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错了就承认，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但姑姑又说道：五一六的事发生在67年七八月份，那时翔雁身体已经不大好了，正要离开革委会，而忙于看病呢，也说不定就此逃过了一劫。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真实情况如何需要他自己认真去想。孩子问题姑姑倾向跟父母在一起，因届时她也离开北京了，真有点事就很麻烦。相反，即使孩子在干校生病，也可以马上在校医室就医，自己请假照看，谁也干涉不了。而且孩子的病也不会一来就出大问题的，孩子在自己身边，照看起来要方便得多！最后，姑姑问了我可能的离京时间，说她尽量和我们一起去江西，路上好有个照应。并说，让翔雁到清江接你们，我也想和他直接说说，劝劝他。经姑姑的分析和解说，我的心踏实下来了。主要是决定将孩子带去干校，今后有天大的事也再不分离。翔雁的事我也同意姑姑的分析，不管是非，也必须要求他认真地去想，不能掉以轻心。几天后，我收到了翔雁的回信，他的想法和他姐姐一样，要我坚定地将孩子带去江西。同时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不是五一六，也从不对我隐瞒，让我放心。并说军宣队想借故整他，他有思想准备，他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犹如反干扰时一样。看到他的信，我最后的犹疑（万一非说翔雁是五一六怎么办）也没有了，一方面我相信他不会说假话；另一方面从我父亲被关押至今近二十年来看，错判（我们子女和母亲一致认为是错判）的事时有发生，我们处于社会底层，只能正确面对，我妈妈带着我们还不是照样走过来了吗？若万一又出现同样情况，我们三人也将永远在一起，绝不气馁，一定要教育好孩子，共同度过今后的人生。我妈妈都能做到，我相信自己也一定能够做到！

由于心定了，一切又回归常态。我每天忙忙碌碌的做着各项准备，也帮助年迈的妈妈做好有关的准备，只是在这时往往会影响到前途未卜的干校之行后，何时

才能再回京看望为我们操劳一生的老母，真是内心的凄苦未可名状呀。

在大致准备停当后，我和姑姑商量好回干校的日期，而且此间李树岩老师表示可以和我们同行，以便需要时能够给予一些必要的帮助。对此我非常感谢，心想真是遇到好人了，后来订票时我将此告诉了姑姑，她也挺高兴的。我们订好了十一月上旬初经上海赴樟树的火车票（给姑姑订的是绕经樟树去抚州的票），因我想在上海给翔雁买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作为礼物送给他，尽管我知道价格不菲，但对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还是有益的。他非常喜欢听 18 世纪以来的西方古典音乐，只不过眼下电台极少播放，但只要家里有一台质量较好的收音机，今后收听的机会总是有的。否则今后需要再想买时，还得请假外出购买。现在孩子带来了，今后即使在干校扎根一辈子，只要全家生活在一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当时我内心思想最真实的写照，我已经不再考虑大城市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也不再思考个人业务上的追求和发展，我最向往、最需要的就是全家人能在一起，用不着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平平安安地过着日出而起，日落而归的生活，这就是我和家人的最大幸福了。

路途上一切都比较顺利，到达樟树后，看到翔雁来接分外高兴。我们终于全家人又在一起了，看得出翔雁看到孩子后的兴奋劲儿，看着孩子的脸一个劲的端详，他想抱孩子，但孩子认生，躲到我身后去了。我转身抱起了孩子，告诉他，这是你爸，好好叫爸爸。儿子轻声地喊了声爸爸，就又低头趴在了我肩上。翔雁满意地答应着并俯身亲了亲孩子的脸蛋，他已经有一个半月没有见到日思夜想的儿子了，情感的迸发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低声说道，孩子还认生，慢慢来。他也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喊过姐姐后，我向他介绍了李树岩老师，并告知路上他帮了很多忙，为此翔雁也向他表达了谢意。在站台上激情相聚的一幕过去后，我们拿上行李，带着孩子一起奔向清江饭店投宿。在大厅柜台，我们办好入住手续后立即上楼安顿，因孩子在车上中午没怎么睡，现在已经有些睏得发蔫儿了。当安顿好后，我就先陪孩子休息，翔雁则和姑姑一起，说出去看看市面也离开了。孩子很快就睡着了，我则因为别后再相聚的兴奋，一点倦意都没有，故随即起来，将随身的行李袋打开，把给翔雁买的收音机拿出来，而且还将四节一号电池装好，再将收音机放回盒子里，摆放在我的枕头边上，准备翔雁他们回来后再交给他，让他有一个惊喜，这也算我的一份心意。一切整理停当后，我拿了洗漱用具去洗

脸房洗了脸，并打了点水回房，趁孩子睡着给他擦了擦脸和手。看著他睡的香甜模样，思绪又飞奔到干校的新居，想着即将开始的新生活，浑身都觉得轻松无比。说也奇怪，在这一瞬间，翔雁可能再次被批斗、再次挨整的事，似乎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就在这种轻松中，我也渐渐因倦在孩子身边睡着了。

当孩子醒来后，我又带他去洗脸房给他好好洗了洗，然后带他在过道和房间里玩耍，等他爸和姑姑回来。尽管我不知道姑姑要和翔雁谈些什么，但我真希望他能好好听姑姑的劝说，认真对待可能即将面临的复杂情况，让我们全家的生活少走些弯路。但直到天都快黑时，他们姐弟俩才回到饭店。从表情看出他们的谈话是很好的，这也让我的心请踏实多了。翔雁过来抱起了孩子，尽管他还有些认生，但终于让他爸抱了。我看着他爸抱着儿子的高兴劲儿，我就立刻回身向房间走去，想把收音机拿来送到翔雁手中，让他喜上加喜。但当我打开收音机包装盒后，一下就惊呆了，怎么收音机没了只剩下个空盒子呢？我不可思议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很快就意识到收音机是在我去洗脸房梳洗时被盗走了，而且怕被我很快发现，又将包装盒好好地放回到我的枕头边。我气急了，拿着空的收音机盒回到仍在楼道里玩耍嬉笑的父子俩和姑姑，告诉他们我有意买的收音机被盗了，因心里难过，我的声音都有些变了，孩子也被我的神态吓着了，一下扑到我的怀里。翔雁赶紧过来安慰我，大家又回到睡觉的房间，仔细地查看了一遍，却是再无收音机的踪影。姑姑说道，丢就丢了，下去找经理和保卫部门反映一下情况，请他们帮着查一下。我们按姑姑的意见找到经理和保卫部门的人，向他们反映了情况，并给他们留下了联系地址，但我们都知道找回食物的希望是渺茫的。这事发生后，我的心情一下子又跌至了谷底。我并不在意经济上的损失；也不太看重我想送给翔雁一件礼物的愿望一下子落空了；我忧心、难过的是，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兆头，我们的厄运难道就这样开始了吗？！

第二天清早，我们收拾完行装、吃过早点后，就奔向清江码头。上船后，姑姑一直在岸边看着我们离去，并频频地挥手，直到船已驶出很远，才转身离去。这时我回身看到翔雁眼里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了，我用手绢揩去了他脸颊上的泪水，轻声地劝慰着他，但干瘪的语言是难以抚平人们内心的凄苦和亲人生离的悲痛的。我只能抱着孩子，挽着他的胳膊，回到船舱坐下来休息，并把孩子放在他怀里，我想这可能会有利于他心情的平复。沿途他告诉我棚子还差得很多，骨架

尽管已经起来了，但棚顶的材料特别是茅草还没来得及去割，回来安顿下来后，他会抓紧去做的。看得出他很感愧疚的样子，我也知道他现在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很大，忙安慰他不用着急，以后我们一起做进度就会很快了。为了让他能放松下来，我尽力不问干校的情况，而是将姥姥的安置和身体情况很详细地讲述给他听，他很惦记姥姥，非常体贴和孝敬老人，但总觉得不能给老人一个安全舒心的生活环境而愧疚，但我深知，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很多事是个人无法解决的，有他的张罗、奔走、操劳和努力，我母亲已经很知足了。随着话题的转移，看得出他的心情也平复了许多，于是我们就带孩子一起到船舷旁看沿江的景色、过往的船只和水流碰撞时溅起的浪花。孩子是第一次乘坐江轮，加之江面和两岸的景物的不断变化，孩子显得很兴奋，一会指指这，一会指指那，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着。我们看了这孩子兴奋的劲头，会心地相视一笑。在相互对视的瞬间，夫妻之间的情感纽带，让我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觉得幸福无比。现在想想，这种情感的悠然出现也是极其自然的，因为那可视作我们婚后的第一次“旅游”，也是我们第一次带孩子一起“旅游”。这时，我们享受着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美丽景色，享受着孩子天真、活泼的尽情表演，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沐浴在秋末冬初的温暖日光下，任由清风拂面而过，我们俩，不，是我们仨，此刻完全沉浸在幸福的梦幻之中。在那一瞬间，似乎没有了批判、批斗、交代、打倒、横扫、投降、阶级斗争、划清界限、抗拒从严等梦魇般令人生畏的语汇，没有了围绕在我们周边令人防不胜防的恐怖氛围，也忘记了即将到来的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忘记了那个时代所有以整人为己任的一切。但事后的历史进程证实，当时多少有些罗曼蒂克式的幸福确实只是一个难圆的梦，我和孩子将迎来一场更加严酷的考验。

船溯江而上行驶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仁和靠岸了。下船后我们将所带的大部分东西暂先寄存在家住仁和的地院同事家中，带上一些必要的东西，抱着孩子走上了返回龙陂的路程。因路是上坡，十几里山路走下来还是比较艰辛的。尽管已是初冬，翔雁和我的衣服都已湿透了，我们只能走走停停。孩子终归是孩子，他那会知道父母的艰辛，而是面对从未见过的山路环境，这捡块石头，那拔根小草，高兴地跑来跑去。看着孩子的兴奋劲儿，我们劝李树岩老师自己先行，因他带的东西也不少，满头汗水跟着我们走走走停停更累，最终他听从了我们的劝告，自

己先走了。我们不敢让孩子在路上尽情地玩耍，因回去要安顿下来还需要费一些时间，只能又抱起孩子继续前行了。

到家后，趁身上的余热和天还不太凉，赶紧给孩子洗了洗并换上干净的衣服。这是他到干校后和父母在一起住的第一个夜晚，我们愿意他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地享受和父母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接着我赶紧给他准备晚饭，因路途上的兴奋，他几乎没有午休，肯定一会就会睏得抬不起个来。在我给孩子准备晚饭时，看着翔雁和孩子玩得那么高兴的样子，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他疼爱孩子，我决定把孩子带来干校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也想好了，今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把孩子带好的。

孩子吃过晚饭后不久就睏得不行了，安排他躺下后，给了他一瓶奶，他含在嘴里，没喝完一半就睡着了。我们看着孩子甜美的睡姿相视一笑，赶紧换下汗湿后已经变干的衣服，擦洗后换上干净的衣衫，简单吃了些东西，立即又投入到室内的整理，以免明晨起床后的忙乱。翔雁又让我到室外看了看棚子的搭建情况并说了他的打算，要完全搭好确实还有很大的工作量。看到他那有些愧疚的表情，我劝他不要着急，并说今天已经很累了，赶紧先休息，明天一早还得去仁和取回留存的东西呢。

第二天一早翔雁就骑车去仁和取回了留存的东西，有一些还是请王定山老师驾驶的手扶拖拉机捎回来的，否则还得再跑一趟才行。这一天我们两人都向班组请了假，继续在家里做必要的安顿。回到干校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不管是熟人还是不太熟识的人，相遇或相见时，对方都比较冷淡，只是点点头打个招呼而已，基本上没有人问我北京或孩子的情况。尽管我对此并不在意，但它也明显地预示着某种不详了。当我俩在收拾棚子时，我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翔雁，他很看得开地对我说：不用介意这些。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们为人处世就遵循不卑不亢的原则，正正当当做人，正正当当干事。我们自己心中没鬼，就不用担心鬼来骚扰。别人爱怎么看，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我觉得他说的很对，看着他边干边说的样子，我不禁笑出声来。确实，他遇事后的沉着、理智让我十分欣慰，也让我多了一份应对困难的勇气。我们干活时，孩子就在旁边一个人玩，为了能很好照看他，我们只能一个人在棚子里边，另一个则在外边，隔着棚壁说话，这也算另一种情趣吧！

2，我信任他

回干校后的第一天，就匆匆忙忙的过去了。第二天各自分别去班组干活，他仍在采石班，但因已入冬，所以作息时间和大伙一样。我则先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来干校前翔雁已办了入园手续），继续在编筐组劳动。因担心孩子不适应（他从未进过幼儿园），中间休息时，我还专门去幼儿园看望他。幼儿园老师看到后，还跟我打招呼说，孩子很乖，送来后没有哭闹，和其他小朋友相处也很好，但比较多的时间是自己一个人玩。听了老师的话我就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我一直担心他不适应在幼儿园里托放，总想找妈妈而哭闹，没想到居然没有，真让我惊奇和喜悦。下午下班后我去接孩子，老师又告诉我，孩子午饭吃的很好，午间睡了一个多小时，也大便了，但有点干，要多给他吃点水果。看得出老师心很细，也很喜欢小牛（孩子的乳名）。我带孩子回家前，特意向她表示了深深的谢意，我为小牛在幼儿园里能遇到一个好的老师而高兴，此后，即使当翔雁被隔离后，她对小牛的照看始终如一，这令我非常感激，只可惜如今再也想不起她的姓名了，我只知道他比我们要略大一些，但愿她一切安好。翔雁回来后，我把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也告诉了他，对此他也感到十分快慰，抱起孩子一个劲的举呀、扔呀，孩子就嘎嘎的乐。看到他们父子的欢乐场景，我也乐在其中了。但我又担心万一失手摔着孩子，连忙指责翔雁先去洗洗，换了衣服再和孩子玩。翔雁知趣的作了个鬼脸，放下孩子后去打水洗脸、洗手了。没想到，当翔雁洗脸时，儿子竟自己走过去站在旁边看，他和翔雁已经熟了，喜欢和他爸疯玩，不怎么粘我了，从而给了我一定的自由空间，让我感到十分快慰。

入夜后，我们很快整理就绪后就睡下了。翔雁父子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我却很久没能入睡。我想着我们今天已经开始了正常的干校生活，而且还相当顺利，重要的是大人和孩子都很高兴。如果今后能继续如此，那该多好啊？！即使条件如此简陋，只要我们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全家人不也是乐融融的吗？！

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社会前进动力而非以生产力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前进动力的年代，普通人希望过上安居乐业生活的善良愿望，竟是那样难于实现呀！就在我幻想能过上安稳日子后不几天，大约也就是 11 月 13、4 号，全干校召开揭发批斗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会上，干校军宣队负责人传达

了中央的有关精神，介绍了北京院部的情况和已经取得的成绩，并宣布干校已揪出了五一六分子陆炎德，说他已揭发出很多地质学院的情况等。要求大家擦亮眼睛，积极投入运动，并警告所有的五一六分子，认清形势，坦白交代。接着就宣布对五一六分子宋翔雁进行隔离审查。在我思想上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这一突然宣布让我一愣，接着就看到几个人从会场中将翔雁押离会场，同时骤然响起了“宋翔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惯常的口号。很快我就从最初的一愣中清醒过来，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要理性地对待眼下的一切，大家都在看着我，一定不要惊慌、不要失态，记住翔雁前几天的嘱咐，不卑不亢处理好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切。与此同时，我一直目送着翔雁被押走的情景，这时映入我眼帘的形象丝毫不像个囚犯，即使不像战士一般昂首前行，但确实是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正直的人那样行走着。当时他被压离会场时的形体语言，让我感悟到，这不仅是他性格的使然——他不会屈从任何有形或无形的压力，没有就是没有，不是就是不是；而且这也是他自身的追求和所信奉的格言的体现——在文革前，当因交友挫折而受到非议时，他曾对我袒露过他信奉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每一种科学批判性的意见，都是我所欢迎的。至于那种不过拿所谓社会舆论作幌子而我从来不对它让步的偏见，那么，佛洛伦伟大诗人的格言，现在还和以前一样对我是适用的。——“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因此，我信任他，我相信他不是五一六。至今，他当时的那种淡定、坚毅的形象也未曾从我的记忆中消失。这也算一份珍贵的记忆留存吧，只是它带给我的却是一份凄惨而痛苦的记忆。

大会散后，我感觉到人们都在看我但却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这很自然，因我一下子就“变成”了五一六分子家属，人们躲都唯恐不及呢，谁还敢打招呼呢？！而且，国人在只讲斗争的教育下早已养成了落井下石，再踏上一只脚的帮凶恶习，这倒是今后我需要注意提防的。我先去幼儿园接回孩子，到家后屋里空空，顿时让我感到沉重的压力，我不敢让自己停下来，因为今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人分担我的家务，我必须抓紧再抓紧。我抱起了孩子，赶紧去锅炉房打水，否则排起长队就受不了了。在等着打水的时候，我琢磨着得做一个揩孩子的兜兜，这样我就能空出两只手来，拿水壶或买饭。环境逼迫我必须自立，我相信自己定能做到！

3，坚强面对

自翔雁被隔离后，在编筐组内我就成为被要求揭发和划清界限的对象。每个人的发言无一例外都是要求我揭发翔雁的反革命言行，要我请查并交出他留下的反革命材料，要求我和他划清界限，站到革命群众这边来等老一套的话题。面对这些空洞而又上纲很高的话语，我懒得一一作答，但为了避免无休止的纠缠，我从两个方面铸就了自己的防线。即，1、自文革开始后至67年底以前，我与翔雁之间极少联系，对他在文革中的情况除因反工作组被批斗外，其他方面可以说几乎完全不了解；2、68年起我们来往增多直到结婚成家至今，但我从未听他说起过什么有关五一六的只言片语。我自己知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事也是在开展抓五一六运动之后。至于说到材料问题，除毛选外我们没有带任何文革时期印发的材料，只带了几本数学、力学及学习外语的书，这次还带了一些孩子识字方面的书，此外几乎没有带什么文字资料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大约也看出我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后，转而时不时的让我跟组里的一些人一起去参加对翔雁的批斗会，美其名曰让我接受教育、提高认识，更好地和宋划清界限。大约又担心我会向翔雁传递情报，故总让我呆在角落里，旁边还围着组里的人。对让我参加这样的批斗会我并不反感，反而觉得一方面可以让我知道一些学习班方面的进展情况，但结果是明摆着的，问题毫无进展，批判还是老套；另一方面，可以让我见到自己难于放下的心上人，起码可以从他的外表，看到他的身体情况。尽管批斗过程中，一些人的粗暴动作令我为他心疼，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得到一次看看自己丈夫的机会。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法治状况现实，被判刑在押的犯人都有被探视的权利，相反，一个没有被判刑仅仅是被审查的公民，却完全失去了接受亲人探视的可能。

大约快到年底了，可能出于翔雁的问题仍然没有进展，也可能是因为我不能很好地配合领导的意图，站出来对宋进行揭发批判，所以就对我采取了新的惩罚措施，把我从编筐组调到菜班劳动。编筐组的活相对比较轻，主要是破篾、编筐，个别时要自己外出砍砍竹子，故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凉棚里干活，不但晒不着而且边干边聊，更显得轻松。最紧要的是，劳动地点就在校部内，上下班可以说足不出“户”，上班时带上空的水壶，一下班就先去打水，然后去学九楼后边幼儿园接孩子，这样就可节省很多时间，而这点当时对我是很重要的。因我既要照看孩子又要做饭和整理家务，而且还需搭建未完工的棚子，每天在孩子睡着后，我

还要自己一人干很长的时间。尽管当时我是一个负担很重需要给予一定照顾的“困难户”，但那些口口声声喊着动听口号“关心群众生活”的领导，却一纸令下，让我去菜班报到，在那里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理由就是工作需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对我的一种惩罚。菜班种菜是一项重体力的农业劳动，当地的老表也都是男性劳力从事。因为种菜不仅涉及到整地、培垄、育苗、间苗、移栽、除虫等细活，还需要浇水、施肥、搭架等。特别当地是直接使用人的粪便作种菜的肥料，我们需要从公厕将粪便掏到很大的木桶中，然后再挑到菜地附近，倒出制成粪饼，待干涸后再置于菜株的根部。每担大粪少的也约有七八十斤，重的则在百斤以上，还需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这非一般人能够胜任。干校菜班在我去之前只有一名女性，是数学教研室的高德秀老师。因此前与她很少交往，加之我对传言从不感兴趣，对她的情况很少知晓，不知为何罚她到菜班劳动。我去后，菜班就有了两名女性，这样也好，彼此多少能有些照应。对于菜班的劳动强度我并无畏惧，好强的个性也让我从不害怕与男性比拼。只是挑担行走却让我一下子很难适应，我是北方人而且一直生活在北方，除四清下乡是偶尔挑过一两次水外，基本上没有挑过很重的东西，更没有挑重物走过很长的路程。加之我有平足疾患，空手走长路都有反应，负重而行就可想而知了。而高老师是四川人，加之她已在菜班呆了一段时间，在她的指点下，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项重活，也能挑上八十来斤的担子，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正是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惩处，再加上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好强的性格及无知，让我今天吃到了苦头。医学科学早就指出，平足不宜负重行走。但因我为了“争口气”，咬牙去拼，结果从前几年开始，我已因双脚脚弓塌陷，而不能久立和行走，必须脚着特制的鞋或加特制的足垫后，方能站立和行走，这给我现在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菜班的负责人是政治教研室的徐忠，我与他过去没有任何接触，不甚了解。但呆一段时间后，觉得其人还算正直，在平时的劳动和学习讨论中，对我没有太多的苛责、为难和不公。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些事他也必须得应付，对此我可以理解。但他那油嘴滑舌的腔调和办事作风，我实在听不惯也看不惯，所以不管在劳动中或讨论中经常和他顶撞，有时也搞得他很狼狈，拿我没有办法。在菜班因主要都是男性，所以以议论、贬损别人的事较少，再加上我从不偷懒，不嫌脏、不惧难，所以赢得了男性同仁们的尊重，时不时的还劝我少挑点，歇会儿

再干等关照的话语，让我内心很感安慰，彼此间的相处反倒比编筐组好许多。所以尽管累些、时间上紧张许多，但心情上相对却要好些，这也算有所失而又有所得吧！

闯过了菜班初期时的不适应后，我在孩子的照料和生活上的安排都逐渐好转起来，让我坚定了应对更大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我靠自己的努力还将棚子完全搭好了，所差的只剩下铺放棚顶的茅草，但这只能等到春节放假时再做了，因我需先到低洼处去割茅草，待茅草割够后，方能一次铺就。在搭建棚子时，我和儿子俩苦中取乐，那时他还不足两岁，我就让他充当我的小助手，他还真争气，干的非常好。因搭棚顶的树干需要彼此间用茅草捆绑固定成一个整体，这就需要我站在凳子上才能很好的进行捆扎。为避免经常上上下下，我就将树干、茅草条分别放在靠墙处和小凳上，需要时就让儿子递给我，而且每次他都完成的很好，还不是地喊着：妈妈，还要吗？听到他那清脆的儿音，让我感到浑身似乎流淌着一股透彻、温馨的暖流，舒畅之极！因此，每当我从凳子上下来需要挪凳子换另地方时，我都会抱起他来，使劲地亲亲他的脸蛋。我深信此时的幸福感，是没有经历过当时那种困苦环境的人难于体验到的！在搭建棚子时，我还发生过一个令人想象不到的笑话，即当需要按尺寸要求截断树干时，需要使用木锯将其锯断，我找出了翔雁自己制作的新木锯，我不知道锯条的锯齿是有方向的，自以为只要反复拉动锯弓即可将树干锯断。结果我把手锯拿反了，向下送锯时挺轻松，反之向上拉锯时，树干哒哒哒的弹跳着，使我的脚都很难踩住它。即使这样也未引起我的注意，丝毫没有发现问题所在，反而自责自己没用，连一根并不粗的木棍都很难锯断！尽管责怪自己无用，但我还是坚持着将需要截断的二十来根树干锯断了，并且把顶棚和门都做好、装上，让打开屋门后，有一个封闭的棚子，既可挡风，又能防雨，心中还是美滋滋的。

我的错误持锯方法，直到翔雁解除隔离回到家中后，在一次看他锯木头时，我才发现问题之所在，于是我把自己的上述笑话讲给他听，彼此一起享受着这“劫”后的笑谈，也不失为一种乐闻吧！

适应了菜班的工作后，除了抓紧搭建棚子外，我无时不惦记着被禁闭在学习班的丈夫，如何才能给他一些慰藉，怎样才能让他知晓一些儿子的现况，就成了我经常想到的问题。开始我只知道他的学习班在学九楼，但具体是哪个房间却难

于打探。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他进出房间的大致位置，就正好面对学九楼前面的广场。于是我的主意有了。我决定从幼儿园接孩子出来后，带他先到九楼前的广场玩一会，那里有汽车、拖拉机，同时还有别的孩子在玩，这样我带着孩子在那玩也不扎眼，万一翔雁能看到时该多好呀？！就这样，那段时间只要无雨，几乎我每天都要带孩子在停放手扶拖拉机的地方玩耍近半个小时，并不时回头张望着我估计是翔雁住的那两间房子的窗户，希望能看到点动静。但令人失望的是，因玻璃反光，加之室内很暗，什么也看不出来。尽管如此，我仍坚持这样做，我坚信孩子他爸是能够看到我们的。当翔雁解除隔离回来后怀着激情告诉我，他在学九楼的学习班里，曾多次看到我带着小牛在手扶拖拉机上玩耍的情景，并说非常感谢我的良苦用心。听着这几句出自他肺腑的话，我不仅得到了最好的回报，而且我感到上天的巧安排，是老天爷用他的仁慈让天下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能够得到最低的心灵安慰！尽管我不信奉上帝，但在这一点上，我的确心存感激，是上帝使我们在孤苦的境遇里也能得到善良受苦的人们极其希望得到的特殊“团聚”。没有经受过这种磨难的人，确实是很难体会到这点的！

在春节前夕，我忙着给孩子换了一身新的棉衣棉裤，为了防风保暖，我还想给他做了一个很厚的屁裢。孩子很快就两岁了，加之又是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我的心愿就是必须把他打扮得和常人的孩子一样，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绝不能委屈了孩子。有一些家长要带孩子去樟树或新余游玩，因我想趁春节假期打些茅草把棚顶苫上，再加上我一人带孩子外出太累，万一孩子出点毛病反倒不好，所以我决定春节哪也不去，多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带他在附近玩玩，同时割点茅草借机把棚顶苫上。主意打定后，节前我一直挺忙，心情也显得挺好的，让别人感到我似乎一点也没有愁闷孤独感觉。这倒是事先我自己没有料到的，我想，我们没有做过亏心事，尽量不要把悲苦愁闷的心绪挂在脸上或流露在话语言谈之中。因为，此刻我们需要的是真诚的关心，而非怜悯！人在与困难和强势迫害相争时，需要的只能是坚强，再坚强！但人的个性总归会有她脆弱的一面，有时往往会被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所打乱或打破，而使自己短暂地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而犯错误导致后悔不已，陷入对自己的自责甚而会难于自拔。这种情况这次就出现在我的身上，春节那天，我给儿子换上了一身新的棉衣棉裤，戴上了很厚的屁裢。孩子也懂得爱美，穿好后美滋滋地在床上蹦呀跳呀，高兴异常。穿新衣是为了过

节，穿这么厚实，是因为我今天要带他出去到湿地边上割茅草，让他一人在坡边干的地方玩，怕他冻着。都准备好后，我带上绳子、镰刀，手牵着他出门了。他穿得多屁裢又厚，他有些迈不开步，抱着他走。到了湿地，我找了一块茅草长的较好的地块，准备过哪去割，并将儿子放在离我割茅草最近的坡地干处，告诉他就在干的地方玩，不许过去找妈妈，那边有水，会把鞋和裤子弄湿的。他听话的点点头，我把给他带的小玩具给他，让他自己在坡地上玩耍，就趟着湿地上的积水，走到我要割茅草的地方。春节时分气温还是很低的，一会儿功夫，在雨鞋里的双脚就已经感到有些凉了，尽管我还穿的是厚毛袜。我一边割茅草一边在回身放下茅草时，看看儿子，嘱咐他不要下坡地，在干的地方玩，他也好好地答应着。割了一段时间后，我看他挺乖的低头在玩，就不再老嘱咐他了。正在我想加快点割茅草的速度时，突然听到儿子大喊一声，回头一看孩子已跌倒在泥塘边，正在往起爬呢。我赶紧跑过去把他抱起，一看他的棉裤、屁裢、棉鞋和棉袄的袖子都湿了，让我既心疼又生气，好不容易有个假期这下就泡汤了。我怕孩子冻着，赶紧拿上镰刀抱起孩子就往家里跑，嘴里还不断地骂着他为什么不听话。自我去北京接他直到如今，我从来没有对他发过这么大的火，可能因此也把孩子给吓着了，他没有哭，也不说话，只是紧紧地搂着我，低声似乎有些胆怯地叫着妈妈。回到家后，我赶紧把他的湿衣裤都脱下来，并在他的小屁股上使劲地打了几巴掌，同时嘴里还不停地说道，让你不听话，记住了没有……。说实在的，当时真想狠狠地打他一顿，让他好牢牢记住。但当看到他那噙着泪水的双眼一个劲地点头，而不敢哭出声来的样子，我的心就一下子全软了，亲了亲他那被我一巴掌打红的小屁股，问他疼不疼，他也只是点点头，没敢出声。这时，我总算真正体会到了“打在孩子的身上，疼在妈妈的心里”这句老话，说的太贴切了。孩子确实被我的发泄吓着了，我不敢再紧耽搁，赶紧拿热水给他擦擦身体，又给他搓了搓让他发点热后，给他包上被子并放了一个包好毛巾的热水袋，把一瓶热水递给他喝，呵斥他好好躺着不许动。安顿好后，我才把他弄湿的棉衣裤和屁裢拿到外面去清洗，除去泥迹后再晾晒起来。事毕，我回到屋里，看到儿子乖乖地躺着纹丝未动，喝完的水瓶斜倒在他的枕边，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一声不吭。我看着他又搓了搓双手，然后伸到他的被窝里，觉得挺暖和的，再摸摸他的小手小脚，也挺暖和的，这样我就放心了。这时我的火气已经完全消了，我坐到他对面的床

角边上，手伸到被窝里搓着他的双脚，问他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不在干的地方玩要跑过来找妈妈，结果把新衣服都弄湿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回答道：我是想过去把妈妈割的茅草拿过来放好。听到孩子的这句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是我太粗心错怪孩子了！我立马抱起了孩子亲了亲他，给他穿上原来的旧棉衣服。边穿衣服边对他说，你想帮妈妈做事是好的，但妈妈已经告诉你要在斜坡上干的地方玩，你就要听话。那儿和家里不同，妈妈割茅草的地方都是水，小孩子是不能去的，懂吗？听后孩子又点了点头，他已经能够感觉到我不再生他的气了，依旧靠在我怀里，不急于穿鞋下床，要在平时，他早就张罗着要穿鞋下地出去玩了。我也就依他继续把他搂抱在我的怀里，想着今天自己的大意，对刚才的发泄，后悔莫及。确实因他爸被隔离后他极其懂事，每次我在棚子外剁柴火时（将长的树干剁成长度 25—30 cm 一段段的，以便适应江西当地用的泥土作的小炉子），被剁下来的柴火棍有时会弹出去很远，每次都是儿子跑过去一趟趟地帮我一根根捡拾回来，并堆放在棚子的墙边，码放的很是整齐。这次看我将割下来的茅草，一把把地放在身后，接着又到旁边或前边去割，所以想过来帮把我割下来的茅草捡拾到他玩的地方。他不知道茅草长在湿地，地面有水，所以一滑就跌倒了，反遭我莫名地一顿训斥和痛打。对此，显然他会感到委屈，但见我发火，知道自己闯了祸，也就不敢出声了。我搂着孩子，摸着他的头，想借此表达我的自责，给孩子以更多的抚慰。

孩子的委屈完全平复后，我赶紧准备了些吃的，因为今天毕竟是春节，我还到食堂买了肉菜、鱼菜不能亏了孩子。饭后，在孩子睡午觉前，我让他先到外面撒了尿，并把他的小尿盆放在屋角，告诉他起来后只能在床上玩，妈妈要去把早上割下来的茅草收回来，一定要听话，他答应后就躺下了。说完，我又换上雨鞋，带上镰刀、绳子和扁担，很快朝湿地走去。到后我抓紧又割了些茅草，就赶紧收拾打捆，挑起茅草就往家里走，因我非常担心孩子一个人在家里不安全，害怕出事，即使是不大的事，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我都会带来极打的困难。当我赶到家门外，放下茅草担子，进了棚子后，一点儿也听不到屋里的声响，心里还有些忐忑。但当我开门时，就听到儿子问：是妈妈吗？闻声后，一下子我的心就落地了。我高兴地答道：是妈妈呀，你乖嘛？小东西答道：妈妈我乖。进屋后，我看他已从床上站起来，走到床边想让我抱抱。我亲了他一下，说道：等妈妈换了衣服，

洗过手再抱你好吗？与此同时，我张开双手，让他看手上的脏痕迹，并让他先坐下等着我。当我换好衣服洗净手把他抱起来时，他那高兴劲就好像几天没见到我一样，我想这大约也是上午委屈后的一种“发泄”吧！春节当天，我们母子俩经过了一场小风波后，总算顺利地度过了。第二天，我先把茅草摊开，让它散些水分，并准备好棚顶用的塑料布，找了几块压棚顶用的木块和石头，准备明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将棚顶苫上。为能及时将棚顶苫好，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先将零散的茅草编排、捆扎成几大片，然后我站在凳子上，将塑料布从棚顶的空格中送出去，再一点点地将其摊开，并用几块木板暂时将塑料布压上，免得被风吹开。正当我准备用竹竿将编排好的茅草排挑几片放到棚顶上时，孩子醒了叫我。我赶紧洗洗手进屋去打点孩子，直到孩子吃完早饭，我让他自己在外面玩，看着我将茅草排一片片的挑上棚顶，并彼此压好，以便雨水能顺利流下来。最后，我将准备好的绳子扔过棚顶，两头再坠上石头或木块，以便把茅草排压实，防止刮大风时吹散。直到午时已过我才基本全部弄完，这下子我们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封闭“能挡风雨”的棚子了。想到今后翔雁看到时也定会满意时，为此我很自得。我深信今后不管遇到多大难处，只要自己坚强面对，都会安然度过的。我不能再多想，赶紧清理一下，洗干净手后给孩子准备好吃的，看着他慢慢地把午饭吃完，而我则随便吃了些昨天剩的东西就打发了。当孩子午休时，我也躺在他的身傍，想着今后的日子，可能因为几天来的劳累，也可能因为一件长期未了的心事——棚子——终于了结了，而使心情松弛下来，我也慢慢进入了梦乡。

4，鄙视歧视

当翔雁一经宣布隔离审查之后，我的工作和我与孩子的生活就立马受到牵连，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初期的确有一定的精神压力，但并不是主要的。因在各种批判会上，对我施压，让我划清界限，揭发宋的实质性问题。但尽管我搜肠刮肚地想，确实也没有听翔雁和我讲过任何有关五一六的任何问题。而且婚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之间的交往少之又少，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出现的那段时间里，他的情况我几乎不知。只是让我感到，似乎不是当事人翔雁过不了关，而变成我自己难于过关了。这种奇异的社会现象，在历次运动中，因亲人被整肃而受牵连的群体中，大约都会有这一类似的感受。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觉得我所谈的符合实际情况，故几乎天天照例的批判、“帮助”和勒令揭发、交代等就不再继续进

行，至此我身负的精神压力也就随之消除了。因牵连带给我的主要是身体上的巨大压力，如菜班的重体力劳动、繁杂的家务负担、幼儿的生活照料等，有时真压得我透不过起来，即使有分身术也忙不过来。但我并非娇生惯养之辈，我的成长经历决定了再重的劳动、再差的生活环境、再紧缺的物质条件，我都不会畏惧，而且都能承担得起，并战而胜之。

但因牵连而带来的歧视犹如一副精神枷锁，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既令人隐隐作痛，也令人气愤难忍，但我却不能直白发作。这种歧视无处不在，不仅反映在制度和行政管理上的明文规定或台下的潜规则操作；更多的则表现为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相识或不曾相识的人群之中。这类歧视明显表现在他们的眼神、语言、表情甚至是肢体动作之中。其实这一社会现象并非是我国所特有，被歧视的因由如贫富、地位、衣着、种族等。但人们对被牵连者的歧视恐怕就是中国的特色之一了。这种对被牵连者的歧视不仅是中国的特色之一，而且在我国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这种牵连歧视的因由主要涉及政治层面，诸如阶级出身、个人成分、政治面目等。产生此类牵连歧视的原因既是党内无情斗争向外的自然延伸而遗毒于民间；又是多年来党所倡导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论，和据此而执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各类宣传媒体联合喧嚣，对广大群众原本善良人性的一种改造、变异（或毒害）所造成的结果。时至今日，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喧嚣似乎偃旗息鼓了，但人们对弱势群体、异议人士或与主体意识有所背离人群的有形和无形的歧视，却仍然在延续着。因此，要想真正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成为一个现代型的国家，真正实现主流意识所倡导的中国梦，那就需要让每一个国人都学会并懂得尊重他人、帮助他人这一最基本而又最浅显的做人道理。否则，在处处存在一些人歧视另一些人的国家（即使是多数人歧视少数人），无论其国力多么强大，物质多么丰裕，它都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现代型国家。

因翔雁被疑为五一六分子遭隔离后，遭人歧视的现象比比皆是。印象最深也最刺痛我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人的不尊重、冷漠和不屑一顾的藐视态度，以及讥讽言语的伤害。一次菜班的头头让我去编筐组要一些他们不能使用的竹篾，供我们给蔬菜生长搭架子，故我即刻前往菜班。因到干校后，此前我一直在编筐组劳动，觉得人熟地熟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当我向组长说明来意后，没想到对方连头也不抬一下，将头朝废料堆处一撇，说道：你自己去找呗！对编筐组

一成立就在一起，共事已达十月之久的一名曾经的下属竟如此冷漠，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令我心寒。故我知趣地不再说什么，直奔废蔑堆处挑选我们搭架时能用的竹篾。在我挑选废竹篾时，看到一些废竹篾上有很多痰，就自言自语地说道，怎么将痰吐在竹篾上呀？没想到这样一句不经意的话被离我较近的一位程姓女性听到后大声说道：呦，这还嫌脏呀？那痰可也是肥料呀！她是翔雁原同室而居室友朱老师的妻子，她本人在平谷一地质队工作，每次回京团聚时翔雁从不嫌烦地前往实验室居住，无论时间多长，从无怨言。而且翔雁与朱老师的关系也很好，都是北京 25 中学（原育英中学）的校友，相差仅一年。所以我们婚后，两家相互间还经常走动，真没想到，当翔雁落难之后，她竟然会如此闲言碎语的伤人。尽管心灵遭到如此伤害，但当我挑好竹篾并捆绑好后，还得强忍内心的痛楚走到组长跟前，很有礼貌的打过招呼，表达了谢意，然后才背起竹篾捆回到菜班；

2、儿子也受到牵连。出身不好的子女在当时的特定政治语境下，有一个美好的专用词汇来形容，即“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它表面似乎十分中性，显现不出任何歧视味道，令人无可挑剔，因从一般意义上讲，所有人的子女都在可以教育好的群体范围内，为此真应感谢当时在宣教部门工作的巨匠们的政治智慧。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翔雁的问题尚未定性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顶桂冠，竟然已经有人要将它戴到我儿子——一个刚满两岁的孩子头上了，这真让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幼儿园里，我儿子因与另一个小男孩争抢玩具时不慎手将对方的鼻子抓伤了（鼻梁侧部一条划痕），那孩子大哭。老师发现后，即刻将大哭的孩子抱开，并检查了划伤的情况，见无大碍就用酒精棉签消了一下毒而了事了。与此同时，还派另一老师去菜班找我，让我回去看看（因当时还不清楚孩子被划伤的程度，怕有问题需另行处理时，好与家长相商；与此同时也让另一老师去招呼受伤孩子的家长回幼儿园）。当我到幼儿园时，正听到有几个幼儿园的老师在议论，说什么，幸亏没啥事，否则五一六分子的子女伤人，就可按阶级报复定罪！因她们说话的声音较大，我听到后朝她们看了一眼既觉得可气，又深感世态的炎凉。但这并未让我觉得悲苦难熬，反倒激起了我对这些人的蔑视。她们竟能说出这个种毫无人性和政策水平的言论，一方面只能表明她们自身水平的低下，不值得理睬；但另一方面，也足见客观环境的恶劣，这倒值得今后自己多加注意，从各方面管好孩子，少生事端。当我看过孩子们的情况后，我看得出

儿子知道自己闯祸了，我拉着儿子的手，让他对被他抓伤的小朋友道歉说对不起，他乖乖听话做了。我也拉过被抓伤孩子的手，摸着他的头，向他道歉。因他的父母还没来，我只好在幼儿园里等。这时我看到幼儿园的园长（名字想不起来了），走向仍在议论的那些老师，并对他们说道：你们不要再胡乱上纲了，孩子们争抢玩具打闹的事时有发生，大家在看管孩子时要注意及时劝开，预防出事。大家快散了，各自干自己的事去。听到园长的这些话，让我内心暖融融的，当下班接孩子时，我还专门找到她，对她的上述所言表示真心地感谢，还让儿子深深地给园长鞠了个躬。后来，鼻子被抓伤孩子的父亲来了（我印象中他好像姓黄，不知道他在哪个部门工作，过去也从未有过交往），老师把我们找到一起，说明了事情的情况，也告知孩子被划伤后，因觉得不重，只作了酒精消毒处理，并叫孩子过来，让其父看过。我也当面向孩子的父亲给道了歉，并征询地问他有何要求和想法？他很坦诚地说道：刘老师，您别多想。孩子间为争玩具打闹的事常有发生，就划道印也处理过了，没事的。对他的大度和豁达我很感激地向他道谢和再次致歉，最后彼此握握手告别，分别向各自的班组走去；3、经幼儿园的事件后，面对可能出现的上纲上线议论，相处中的平等原则不复存在，隐忍和回避就代之为我处事的第一原则。但率真直言、争强好胜是我的真实性格，故要我做到这点的确真非易事，但面对现实的政治环境，我必须很好地改变自己。比如，我反复告诫孩子，不许他和任何小同伴打闹、争抢；当孩子在玩耍中如若受到委屈或欺负时，一般我只能抱起孩子哄哄他，绝不斥责对方，更不去找对方孩子的父母讨什么公道，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忍了！如一次，五连指导员刘启千老师（数学教研室）的女儿（她比小牛要大两岁多）到我家要玩小牛的玩具（为了保证对孩子的教育和智力发展，来干校时，我们给孩子买了很多不同年龄段的玩具，诸如惯性或发条动力的汽车、坦克和直升飞机等）。孩子有个玩伴彼此能在一起玩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有好处的，所以每当有孩子来找他要玩玩具时，我都是欢迎的，这次也不例外。但因房间小，我只能让他们在床上一起玩。由于床很高（为便于床下能放东西，故床板架得很高，约70cm），故我还特地嘱咐他们玩时小心别滚下来，说完后我就到屋外棚子里做我的事情，并不时地隔窗看看他们玩的情况。玩了一段时间后，我突然听到屋内哐当一声响，紧接着就是小牛哇的一声大哭。我赶紧转身跑进屋里，只见小牛从床上跌落地下正捂着头哭呢。我立即

抱起孩子，眼看着孩子的额头右侧鼓起来一个大包，我要给他揉揉，手一碰到鼓包他就哭。我仔细看看，除额头外其他地方倒没事，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我一边给孩子揉，一边说跟你们讲过了，为何还不小心呀？没想到孩子指着那小女孩说：是她把我踢下来的。听到孩子的述说，我很吃惊也很心疼，我转过头去看那女孩，只见她很不自然地低下头继续摆弄着玩具，对是不是她将小牛踢下床的事，什么也没说。面对这一情景，我猜想儿子说的是真话，我只能把孩子的委屈、受欺负的苦楚，统统埋在自己的心里，抱起孩子说道：咱们不玩了，到棚子里妈给你擦把脸，拿冷水给你敷敷。而对那女孩我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说，只觉得她很不懂事，今后不想再接待她到家来玩了。隐忍、回避是在法制缺失、社会不公的强权统治下，弱势群体普遍采用的处事原则。尽管这不能给弱势群体自身带来生活上的欢乐和幸福，但起码可以减少或避免灾祸的降临，求得安身立命的可能。总之，这是弱势群体的求生之道，为了儿子的安全和健康成长，我也必须接受并学会这一处事原则，以适应极左政治环境下的社会现实。

（九—2）孤苦中煎熬，权衡后“顺从”。

5，高烧下咬牙力挺

时光过得飞快，转眼我带孩子来干校已快一年了。尽管我在菜班的劳动强度较大，回家后还需尽心地照看好孩子，因为，儿子不仅是我和翔雁未来生活中的寄托，他更是我们未来人生的憧憬和希望。所以，当翔雁被隔离后，不管在干校我多累、多苦，但对儿子的照料、饮食、衣着、教育和呵护，我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尽心竭力地去做，力争做到最好。而每每看到儿子欢快、健康的身影时，一股幸福、温馨的暖流就会回荡在我的心田，而这正是翔雁不在我身边时，让我驱离孤独困扰的特效灵丹妙药。大约十月中旬，当时刮风时已颇觉凉意，而我们在劳动中汗流浃背的情况是经常的，因我没太在意，加之这么长时间的劳累使身体的抵抗力有所下降，导致我终于因感冒病倒了。浑身酸痛乏力，体温较高达 38.6°C 。在校医室就诊后虽服了药，但体温始终降不下来，反而继续升高达到 39.4°C ，这时我头也有些晕眩，但我没有权利躺下休息，还必须咬牙蹒跚着带着孩子去锅炉房和食堂，打水、买饭。但此时我再也没有体力背着孩子去做这些事情，我只能一手提着分为五隔的饭盒，一手拎着两个五磅的暖壶，让刚两岁十个

月的儿子牵着我的围裙，跟在我身边慢慢地往前走着。这段过去我背着孩子五六分钟就能走完的路，如今我们娘俩竟需要走十几分钟。而此时看到我如此狼狈的人们，多数人都因我是五一六家属而熟视无睹擦肩而过。对此我完全可以理解，只要他们不风言风语的议论几句连损带挖苦的话语，我就很感庆幸了（记得此前，大约还是夏天时，各家几乎都坐在屋/棚外乘凉、干点家务或闲聊，此时住在我们同一排东边的朱定宇老师的夫人程爱霞，就带着讥讽的腔调对他人大声地隔空喊话道：也不知宋翔雁现在情况怎样了，有啥好坚持的，真要当殉葬品不成？对她如此幸灾乐祸的挑逗，我真的不屑一顾，而且通过她几次类似的言语，也让我深知其做人的品行了。后来只见朱定宇老师立即出来将程某拉回屋内，朱老师因其母被划为右派的遭遇，胆小怕事，从不介入政治，这点我很清楚。而且他本人也是正直、善良之辈，不会干出落井下石之事。所以一直以来，我对朱老师都是十分尊敬的。但毕竟我的不幸和当时的狼狈相还是得到很多人的善意同情，尽管他们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可能做得更多，但他们纷纷让我打水、买饭不用排队的举动，就令我不胜感激了！善良、同情心，本来就是人类繁衍和完善自身过程中最重要的品行之一，但在只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断人为地制造阶级对立的文革年代里，它却从很多人的心灵中泯灭了，至今我们的社会还在为此付出令人痛心的代价！

当我的体温已经升高到 39.6℃ 时，我开始有些担心了。我害怕万一有啥变故时，幼小的儿子咋办，谁来照顾他呢？！在这种情况下，立即退烧已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了。这时，我从床上爬起来，找出我珍藏的“百宝盒”，取出了离京前母亲交给我她老人家已保存了几十年的退烧良药羚羊角，以及老人用颤抖的手抄写下来的使用方法。见物生情，此时老人家的话语和举止，就像电影一样一帧一帧地从脑海里闪过。当时，老人家把小包打开，拿出了已保存很久了的羚羊角说道：你把这个带上，到乡下有用。万一孩子发高烧久热不退时，你可刮下少许羚羊角粉，用温水让孩子服下，很快高热就会退下，这样就能给后边的治疗赢得时间。记住，男孩子的用量绝对不能多，否则会影响男孩生育功能的。并且还说道：小益（我侄子）现在已经大了，而且北京的条件比乡下好，你带着去，是保命的药，一定要保管好。这药还是解放前我怕你们万一出事买的呢，现在药房里根本没货，有咱们也买不着，千万别丢了！随着这一幕幕情景的闪过，我的泪水就像

启了闸的洪水一样，呼啦一下流了下来。我妈为了她的外孙，把最坏的情况都替我想到了，离京时她一点也没有谈到自己，想的却是我和她的外孙。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母亲感到庆幸，我也为自己不能在她老人家身边尽孝而感到愧疚。我收住了不断涌出的泪水，不敢怠慢赶紧找出翔雁的工具箱，取出一把三角锉，用酒精搽洗后，从羚羊角上锉下一些粉末留存在一个小盘中。然后我又倒入一些温开水，连同羚羊角粉一起吞下。服过药后，我收拾好东西和羚羊角，又喝了一大杯水，就和衣而卧再压上被子躺在儿子身边睡下了。经过一夜的沉睡，醒来时天已大亮，起来后我觉着身子轻松很多，赶紧量量体温，发现体温已接近正常（37.9℃），我太高兴了，一颗绷得很紧心弦，顿时放松下来。这时，我先喝了一大杯水，服下了校医室给的药。我看着睡的正香儿子，赶紧为他准备早起要喝的牛奶。我知道羚羊角只能起到降低高热的作用，并不能代替正常的检查和治疗。因此，我还得去校医室继续检查诊治，继续服用当服的药品，否则将会前功尽弃的。经过校医室的检查和继续服药，第三天我的感冒终于接近痊愈了。但令我不安的是儿子这时的情况似乎有异，食欲不佳，连他每天最喜欢喝的牛奶，也只喝了不到平时的一半，尽管体温还基本正常，但我估计很可能已经被我的感冒传上了。我赶紧带他去校医室查看，大夫说是感冒初起，给了些药。但孩子的病情发展很快，到夜晚时，体温已升至 38.7℃。我又给他服了校医室拿的药，并喝了大量的水。但直到清晨他的体温已达 40.1℃，我赶紧抱孩子去校医室，大夫检查后没有发现其他症状，让继续服药，并又给打了退烧针。回家后，看着孩子的高烧始终不退，内心极为焦灼，我决定若下午孩子体温仍在 40℃左右时，还是应当给他服一点羚羊角为好。于是我又取出了收好的羚羊角，给孩子锉下一些羚羊角粉末，准备需要时服用。大约下午二时，给孩子量体温仍然是 40.1℃，打退烧针后孩子体温丝毫没有一点降低。于是我立即给孩子喂服了羚羊角粉，并继续观察他的体温的变化。当孩子躺下后，可能因高烧很快就睡着了，趁此机会我赶紧拎着暖壶想急速去锅炉处打水。但因我自己的感冒还尚未愈痊，加上孩子生病后精神紧张休息不好，所以两腿疲软，走路时身子都晃来晃去，哪里还能快速前往呢。在锅炉处等着打水时，王彦（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周守成的妻子，后来二人离婚）看我脸色不好，十分关心地问道：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对王的关切问话，我先是一愣，因自翔雁被隔离后，难得有人会关心问起我脸色的好坏，此外，我

们过去并不相识，也无交往，只是均知道彼此都是地院的职工，碰面时相互点个头而已。今天听到她关心的询问，确实很让我感动。所以我如实的告诉她我和孩子都感冒了，我虽已快好了，但孩子还正发高烧呢。她接着说道：你一人带着孩子还得干活，真的很不容易。我建议你将孩子送出去请别人帮带，自己的身体要紧呀。并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人，她人很好带孩子也很有经验，曾给地院很多人带过孩子。我感谢了她的关照，并告知，因孩子现正发高烧，下一步怎么办，需等孩子烧退后身体情况稳定下来再说。如果需要，届时我再找她，请她牵线帮忙。因我怕孩子醒来后家中无人，我匆匆与她告辞赶回家中。王彦本人是十七级干部，但在学校里具体做何工作我却毫无所知。在我最狼狈的时候，她未因翔雁正被隔离审查而歧视我，相反对我还给以关切和叮嘱，从中可以看出她为人善良的一面，至今回忆起来还是让我十分动情的。孩子这次感冒经历了大约一周才好，在此期间我思前想后，觉得王彦的建议值得考虑，但因此前有朱师傅家人帮带时的教训，我想先了解一下此人的情况后再定。所以我先向菜班的头头徐忠打听到王彦的住处（政治教研室的老师和王彦都比较熟），后找到王谈了我的想法和顾虑，王对我的顾虑表示理解，她向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卢大妈的情况，并还介绍了她帮过的几家人，建议我可以找他们再作些了解，一旦有托带意向时，她可以托人捎信让卢大妈来龙陂与我面谈（卢大妈家住在仁和镇）。基于王讲的几个人都是干部，我与他们都不熟悉，加之我当时的处境，怕给别人带去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对王说道：谢谢您的认真，我相信您对人的判断。现在我真的没那份精力再去打听，请您先约她来龙陂，我们先见面前谈谈，合适就可以定下来了。在王彦的帮助下，我与卢大妈见面后很快就定下来，请她帮我带一个月的孩子，月酬 30 元（不含奶粉、鸡蛋、糖、肉等费用），一个月后，再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决定是否继续托带。因此，干校托儿所这边我也不敢立即退出，托儿费每月仍需交付。

大约十月底，孩子和我的感冒均已痊愈，只是经过这次高烧的煎熬后，孩子的身体还显得有些虚，不像感冒前那么敦实。但考虑到我自己的身体情况，确实再这样挺着，很可能一下子垮下来，到时就不好办了。所以，从十一月起，我就将儿子送去仁和卢大妈处，请她帮忙照料，希望能给我一个月的调整时间。因仁和距龙陂还有一段距离，万一有事要联系并不是很方便的，单程步行也需四十

多分钟，慢走需一个小时左右。所以送孩子过去时，还给他带了点羚羊角粉，以防万一，并告诉了卢大妈的用法，请她注意保管。但没想到此事后来会给我带来一些不愉快的麻烦。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到年底或七二年年初时，菜班徐忠突然对我说：政治教研室吴××老师（他们两口子都是归国华侨）的孩子高烧不退，你能不能给她一点羚羊角救救急？！闻后我大吃一惊，想必是卢大妈告知于他的，因我从未和其他任何人讲过我有羚羊角的事。当时这事如何应对确实让我十分为难，因为这是我妈留给外孙的急救用药，而且总量不多，仅仅不足一个拇指长的羚羊角身，外加一粒蚕豆粒大小的羚羊角尖。加之我现今的处境还会持续多久，心中也毫不知晓，怎敢贸然倾囊相助，尽管古人有救人一命胜似七级浮屠的说法，而今人又有舍己救人的共产主义风格之说。但我思考良久，觉得留下骂名也罢，我无法应景高攀，没有那样高的风格和觉悟，得罪人就得罪人吧，故断然回绝了徐忠的要求。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有一些借慷慨他人之慨的手段，彰显自己以助人为己任，谋取声誉的人在，对此我一直都是有看法、有保留的。事后我问过卢大妈，她没有否认是她告诉的吴老师，因她曾带过那个孩子，得知她发高烧时，想到我有羚羊角就告诉她了。对此我没有再说什么，因她也是出于关心她曾带过的孩子，但我也直言不讳的告诉她我无法帮她的原因。到月底时。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好了许多，加之孩子不在身边，我总不踏实，精神放松不下来，因此决定还是把孩子接回来，平时送托儿所为好。故我到干校小卖部买了点吃的，带到仁和送给卢大妈表达我的感谢之情，当我整理孩子的东西准备一同带回时，问到她我给留下备用的羚羊角粉时，她说道：因没放好，叫孩子给碰到地上全撒了。对此，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她是有心留下来准备给她外孙女用的。由此也可看出，人的私心、私欲即使在那个成天讲政治，成天喊阶级斗争的年代也是无法真正清除的，只会让其以更为隐蔽的、或借助某些合法外衣的形式堂而皇之的留存下来。所以说，毛林等在文革期间大力鼓噪的“大公无私”说教，实乃是一种梦幻的乌托邦式说教罢了。

6，转换手法，拿我开刀。

自翔雁被隔离后，除初期时对我进行“帮助”、批判，给予我相当的压力想让我揭发、交代外，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再继续加大批斗的烈度，大约他们也知道再不可能从我这榨出什么油水了吧。此后，他们只是通过劳动惩罚的手段，

不想让我过上清闲的日子，欲借此达到军宣队倡导的划清阶级阵线的目的。但经历过解放后二十余年教育的我，对于劳动或说体力劳动，我从来就没有畏惧过。因此，当我调入菜班，要我像男劳力一样挑大粪积肥时，我也丝毫没有害怕，反而想做出个样子，让那些想整我的人看看，是他们自己把知识分子想歪了、看扁了，把知识分子都说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麦苗韭菜分不清的游手好闲之徒。所以，那时除因牵连而受到的歧视和讥讽令人不快，和因需照料孩子颇感无帮手而紧张及劳累外，我觉得自己活得还是蛮自在的。只是因内心深深地牵挂着被看押着的丈夫和远在北京年事已高的母亲，不可能像其他接受再教育的人那样悠闲自得，苦中取乐罢了！

但从十二月初开始，军宣队和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却对我又重新关注起来，在每日参加劳动的同时，突然加大了对我的“关注”力度。他们利用劳动之余闲暇的时间，在我儿子睡着后（一般都是晚九时左右），派人叫我去领导小组办公室，由赵璧媛亲自和我谈话。应当说她的态度和语气都无可挑剔，从不大声呵斥，而是让我坐着，细声慢语的和我讲“道理”。但谈话的内容确是抓五一六以来专用的那些套话，听得我耳朵都起趼子了，真希望她快些结束，好让我尽快回家睡觉和照看孩子。但我却无权不听她的“劝导”，只能洗耳恭听，以表达对她的尊重、和对大抓五一六分子的拥护。一般这种谈话都要进行到午夜十二时以后，这样就使我的睡眠时间大大减少。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一直担心无人照料的孩子万一醒了或踢了被着凉怎么办？果然，有一次我正在被招谈话时，孩子醒了发现妈妈没在身边，就大哭不止。我们前面住的是数学教研室的黄永昭和物理教研室的丁毓常夫妇（当时新建的住房都是一分为二，前后各住一家），黄老师听到我家中孩子大哭不止，不知发生了何事，就半夜起来绕过将近半排房子（我们的住房恰处于整栋建筑的中部），敲窗也无人应答，黄老师只好直接推门入室，发现只有孩子一人在哭，我并不在室内（当时我被找去谈话，并未要求告诉周围邻居）。当时黄很奇怪，不知我到哪里去了，只能抱起孩子一直哄着他，直到孩子不哭并慢慢睡去为止。孩子睡后，黄老师也不敢马上离去，担心他还会再醒来又哭，就开着灯，坐在一旁看书，一直等我回家后他才离去。对黄老师这夜的相帮，我始终记忆在心里不敢忘却，而且此后，我们始终与黄、丁二位老师维持着很好的同事关系。第二天清晨将孩子送到幼儿园后，就赶往学九楼找到赵璧媛，告知昨夜

家里发生的事情，希望今后不要夜晚找我谈话，我说这样很不安全。但赵当时并未应允，只说再考虑考虑吧！面对当时的环境，我不好再坚持什么，只能等他们答复后说了。当日晚饭前，赵璧媛派人转告我，今后若晚上找你谈话时，事前会请外语教研室姚今淑（原机械教研室主任、现半工半读教研室许高燕老师的爱人）老师来你家里帮着照看孩子的，这样昨晚的事就不会再发生了。尽管领导做了这种安排，但我内心还是很不放心的，但口头上还得感谢再三，真可谓老北京说的：口不对着心说话！

赵璧媛夜晚对我的谈话，断断续续几乎持续了一个月左右，中心就是两个方面：一是，让我开动脑筋放下包袱（指我认定自己文革中一直逍遥，结婚前很少与翔雁交往，对他是不是五一六根本不了解等），很好回顾一下结婚后宋都讲了些什么？这样就会有所发现的。在此基础上，就是以提问和帮助回忆的方式，给予多方面的启发帮助（如，当看或听到总理接见各地革命群众或外宾的消息时，他有没有对你说过有关总理的事情呀等），供我考虑（实则是让我从中选择，犹如当今考试时出的选择题一般）。竭力想“帮”我在揭发宋的问题上，能前进一步；二是，向我一再交代党的政策，说明只要承认、交代了自己的问题，他就可以立即回到人民群众一边，并以院内很多头头交代后的例子作证说明这点。以此让我相信，只要宋交代了、承认了自己的问题，也就马上可以获得解放，回到人民群众中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引导后，赵的一席话就像尖矛一样直戳我内心最大痛处。她说道：我知道你非常喜爱宋翔雁，彼此间感情很好，甚至探工系有人说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呢。而且我也知道你们的婚姻还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难道现在你就能这样眼看着他成天呆在学习班里消磨时光而不闻不问袖手旁观吗？！你要是真正爱他，你就应当很好的劝他、帮他，让他尽快转过弯来，像其他已经交代的人那样，说清自己的问题。届时，你们也就能和其他交代了问题，重获自由的人一样，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了。她的这一席话久久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几乎好几夜让我辗转反侧于床上难以入眠。久思后赵的话有一点让我相信了。那就是：只要翔雁承认了自己是五一六，那他就可以恢复自由，就能够回到我和我孩子身边，我们的家庭就可以再次团聚。这是多么诱人的前景啊，但我又有何办法能让翔雁转圜呢，因为我太知道他认死理的那股子倔劲了！何况，我对五一六的情况知之极

微，我又怎能让他开窍呢？因此，尽管赵的“处方”诱人，但我却无下手的妙着。因此尽管内心有所迟疑，但面对赵的攻势，我仍只能以沉默面对。

赵确实有她高明之处，她很快察觉到我沉默面对的异样，加紧了在攻心战中诱人之术。一次她对我说道：我知道你们两人之间的感情很深，他也非常疼爱孩子，是这样吧？对赵的问话我点头认可后，她继续说道：你完全可以通过他对你和孩子的感情，向他喊话，告诉他你和孩子的心愿，让他交待自己的问题，尽快回到你们身边。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给你一个向他喊话的机会。你愿不愿意考虑一下呢？对此，我当即不由自主地就点头示意表示同意考虑了。见此，赵也立即收住话语，说道：那今晚就到此，你早点回去休息，考虑好后明天再给我一个的答复吧。

在赵的连续夜谈的攻势下，特别是近期通过家庭、感情、婚姻等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一面来攻心，让我实难招架。尽管我内心还是存在着很多疑点，如地院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五一六分子呢？尽管我相信翔雁从不说假话的人品，相信他不会是五一六；尽管实际上婚后我们之间虽有说不完的话，但我们相互间谈的都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极少涉及到文革方面的事情。而且当时我们已经很少关注、谈论院内外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只因迫于当时军宣队领导学校的现实，我们不得不参加相关的活动罢了。我当时的精力也主要是放在帮助翔雁尽快恢复他的健康上面，直到后来确定我怀孕后，才逐渐又放在未来我的生育和相关准备上了。可以坦白地讲，尽管我有些经受不住困倦的煎熬，放心不下孩子单独过夜的状况，思想上有所起伏。但更重要的是，面对众多的党员、干部纷纷交代和承认自己加入过五一六组织、是五一六分子，并反戈一击，揭发出更多的五一六分子的现实。我在想，既然这么多党员干部在高压下都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但在被隔离审查前，他们都曾经信誓旦旦地表态说自己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积极参与对其他五一六分子的揭发和批斗，有的甚至还是专案组的成员或负责人。但一当他们自己被宣布隔离审查后，就全然忘记了自己过往的表态，立马换了另一副嘴脸，并声泪俱下地悔恨交代自己，大胆揭发、切齿批斗另一批同伙的五一六罪行。这类轮番上台表演的政治闹剧，对我的思想产生的冲击是致命的。我想，翔雁连个党员都不是，只不过是个一般的群众，哪有那么多原则好坚持的呢？！加之当时我的确身心俱疲，所以，我决定按赵璧媛的说教和启发去做，我下决心

要把翔雁从苦斗中拉出来，既解放我也把他解救出来，让我眼下这个残破的家，再次团聚在一起，共同承担今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我深信，只要我们能团聚在一起，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是可以战而胜之的。

想通了这些，第二天见到赵璧媛后，我就直接告知，愿意按组织上的要求，去做宋翔雁的工作，争取他能尽快转变，回到我和孩子的身边。赵听后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很自信地说道：欢迎你能有这种转变。组织上会根据你的需要，很好地帮助你做好准备，把宋翔雁这个顽固堡垒攻下来，让你们的家庭尽快团聚。

在此基础上，接着就是要动员我，直接面对宋翔雁进行揭发。拿他们的话说，就是要求我站到清查五一六斗争的最前线，给宋造成众叛亲离的感觉，达到他最终只能低头认罪的目的。在接下来将近一周的时间里，几乎每晚赵都要找我去她那指导并帮助我进行具体的发言准备。并告知我，指挥部还要将地院五一六的总头目王大宾押来干校进行批斗，揭露他的真面目，消除他对我院广大干部群众的影响。组织上想让我能借这个大好时机，揭发宋的问题，让他丢掉幻想彻底交代自己的五一六问题，尽快回到你和孩子身边。赵在具体指导我写发言稿时，反复强调，要通过自己的发言，进一步向宋交代党的政策，即只要彻底交代和揭发后，就是人民内部问题。可以告诉他，现在已有这么多人交代了，交代后他们不仅都和家人团聚了，而且没有一个人受到行政处分。因为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的影响所犯的错误，党的领导会本着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来处理的。但是也要向他指明，如果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代自己的五一六问题，那问题的性质就会转化，我们只能将其移交专政机关按敌我矛盾处理了。在大的原则向我交待清楚后，她又从女性特有的角度告诫我，你的发言和其他人的批判发言不同。你要通过对他的真情袒露和孩子的成长现状及渴望见到父亲的角度来召唤他、感化他，促使他想尽快回到你和孩子身边的欲望进一步增长，转变当前僵硬、对抗的态度。而且你要告诉他，只要他能坦白交待，承认自己的五一六问题，家庭的团聚是马上就能实现的。

一切都想好并有了自己的判断后，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这次也要把翔雁救出来。为了达到目的，我想，既然要说谎，就不如说的大些，不仅要把自己也说成五一六分子，而且还要说成是翔雁把我拉进去的。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这个死脑筋领会我用心良苦的真实意图，在把他逼入死角没有回旋余地的情况下，

不得不借坡下驴，横下一条心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只有这样方能尽快回到我和孩子的身边，达到全家团聚生死相依的目的。当我真正想通后，行文就不再是难事了，很快我就按赵某的意图完成了我的揭批发言稿，并交赵审查。赵看发言稿时露出了一缕诡秘的笑意，当时我突生某种疑虑，担心她看出了我在说谎，想欺骗他们把水搅浑，让仅存救出翔雁的一丝希望落空。但事实证明我的疑虑是多余的，赵看完后带着笑脸对我说道：写的很好，能把自己的问题也交代清楚，说明你真的转变了，我们为你的这种转变感到高兴。当然，这仅仅是开始，你还需要继续努力，好好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当然这都是后话。就发言稿而言，你还可以增添一些内容，谈谈在宋翔雁被审查期间，党和群众对你和你孩子的关心和照顾，让他知道一直以来，大家并未将你们一家人排除在外，他只有尽快说清和交代自己的问题，才能很好地回报大家。听到这些自我溢美的话真让我感到恶心，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救出我日夜思念的丈夫，让我违心地写任何东西，看来我都是会答应的。事后，每每想到此，我对自己灵魂的堕落也是万分悔恨和无奈的。

此后，在赵某的诱导和编排下，我今生唯一一篇谎言连篇的违心之作很快就完成了。内中不仅按照的要求讲了当前地院清查五一六运动的大好形势，党的政策，五一六分子老实交代和抗拒交代的不同前途和后果；也讲到了领导和群众一年多来不但没有把我和孩子打入异类，相反还从各方面给予了尽可能的关心与照顾，让我深受感动；还讲到我和孩子对他的思念和担心，讲到孩子多次问我爸爸为什么还不回家时，让我难于真实回答他的痛苦心情。借此，我劝他像其他交代了自己是五一六的人学习，尽快交代自己的问题，让孩子不再对我提出这样苦涩而又难于回答的问题了；最后的重磅炸弹是我做了如下的揭露：在 1967 年夏初，我回家时一次与你在北太平庄附近相遇，当时你对我说道，现在东方红公社人员太多太杂，总部把我们这些老造反派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了个五一六兵团。你要是想加入，我可以帮你问问去。听后，我当即表态说，好啊！在师大家属区校门分手后没过几天，你就到掘进实习室找我，交给我一张表让我抓紧填好给你。当我把填好的表交给你时，你还对我说道：好，现在你也是五一六的一员了。难道这些事你都忘了不成？！这样，我不仅揭露了他确实是一名五一六分子，而且还将我也拉入到五一六集团里去了。

当我的 煞费苦心编织的谎言终于得到了认可后，我忐忑不安的心情也就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唯一一只希望到大会召开发言时，别因为说谎而心虚，使得说话没了底气而露馅儿就好。但在等待大会召开的那段时间里，始终没有一个人再找我谈话，也没有让我把自己加入过五一六集团的事说清楚，并写成单独的材料以备存档。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似乎我是不是五一六分子这时已经无所谓了一样，这岂非咄咄怪事！当时对这一特异现象，我还以领导小组他们太忙顾不过来作解释，但直至文革结束、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被胡耀邦宣布为子虚乌有之前，都没有任何人向我核实过。事后我才明白，他们自己明知是在导演一出闹剧，目的既已达成，何须还注意哪些区区小事？！由此也可看出地院清查五一六运动多么的荒唐，视众多知识分子的政治生命和做人的尊严为儿戏，简直已经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7，登台表演，谎言劝夫。

在游斗王大宾的大会召开之前，干校的教职工就已经知道王大宾已被押至干校拘押，等待接受众人的批斗。说句心里话，在地院内大多数教职工的心目中，对包括王大宾在内的东方红小将们，是心存好感甚至是心存感激的。因为正是由于他们的心胸和理性，在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初期，在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毫无人性可言的红色恐怖年代，使得很大一部分地院教职工免遭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伤害。也使得整座学校的各项基本设施在迁校之前基本保持完好，较少遭到人为破坏。即使当他们内部因对文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出现分歧，导致形成不同的派别后，他们各自也未公开拉山头挑起或扩大派别争斗，而波及学校的众多师生。所有这一切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国高校中都是少有的，而王大宾就是他们这批小将中的代表之一。当然，他们也非完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或多或少地滋长了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以造反派自居的心态，在北京乃至外地卷入了两派斗争，对国内形势的动荡不定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对这些加以批判和否定，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而就王大宾个人而言，因他是高年级学生（当时是五年级，若非文革突至，他本应在当年毕业），我曾在专业课教学中是他们的辅导老师，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在一年多的教学和实习中，他留给我的印象是良好的。我知道他是生长在偏远山区，是一个出身贫苦、勤俭朴实、心地淳厚、乐于助人的人。但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他不属

于头脑聪慧、思维敏捷的一类学生，但他却是一名踏实勤奋、爱思好问、尊敬师长、严于律己的好学生。老师对学生的这种看法是在教学实践中逐渐积累而成的，是完全非功利性的。不可能因今天说他是反革命，就马上改变我对他已然形成的上述看法。对眼下给他扣上的各种罪名，有些如五大领袖，我觉得是历史的戏弄和误会；有的如五一六，我知道自己就在说谎，对他而言，也未见就是真的！因此，当赵璧媛决定让我出台亮相参与揭批时，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个原则，只以救翔雁为目的，不再涉及别人和其他方面的事情。这不仅是我的为人处事原则，同时也可免得不慎再出纰漏。

游斗王大宾的大会如期于七二年一月底召开。会场就设在“学九楼”前的广场，主席台上方拉起了“揭批地院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总头目王大宾大会”的横幅。当会议主持人宣布揭批大会开始后，随即口号声四起，在口号声尚未停歇时，主持人又喊道：把反革命五一六分子王大宾押上来。这时只见有两个较为粗壮的男子（我认不出，看上去不大像原地院的职工），每人在后各抓住王的一条臂膀，同时另一只手压着王的肩部，将王推上主席台的右侧。在推押上台的过程中，王毫不示弱，看得出他是尽力挺着身子，并环视着台下的众人。这也是自王大宾毕业分配去成都两年半后我第一次看到他，除了略显消瘦外，看不出他有多大变化。当王站定后，主持人又喊道：将反革命五一六分子宋翔雁押上来，两人以同样的形式将宋押至主席台的左侧站定。我目视着宋的上台过程，他那不服气的性格与劲头，与一年多前被宣布隔离审查带走时的情景几乎无异。因我今天要想骗他、“救”他，所以我的目光不敢紧紧盯着他的眼睛，深怕他会察觉到我将要骗他一样；但因我日日夜夜无时无刻地思念着他，我的目光又无法从他的身上离开片刻。当时，这种奇特、复杂的心情，是我出生至今从未出现过的。由于自己情感的起伏和心态的复杂，整个大会的进行过程我似乎丝毫没有注意到，只是当通知让我准备上台发言时，我才发现翔雁已经被人带下主席台坐在靠近主席台正面偏左一点的位置上了。

当我准备上台前，赵璧媛还专门前来给我鼓劲，让我不要紧张。但终究我没有说过谎，更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这种弥天大谎。因此难免紧张，大约这也是刚才赵还要特意再行叮嘱的原因吧！发言开始时，紧张得我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地唸稿，目光不敢离开稿件须臾，也不敢朝台下看，更不敢朝翔雁身上看，生怕

他会把我的神魄摄去。但当讲到我们在北太平庄相遇他向我讲起总部要把老造反派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五一六兵团，并问我是否想加入时，我不经意地看了他一眼，看到他双眼惊异的神态，似乎有点像听天方夜谭故事那样迷茫不解一般。但这时，我对他的感情、我和孩子急切需要他的感情，已经再也无法遮拦地完全释放了出来。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完全离开了稿子，满面泪水大声地呼喊道：你既非党员，又不是干部，出身还不好，硬顶着干什么呀？为了孩子，为了我，也为了你自己，赶快承认吧。这样我们也会和其他已经交代的人一样，全家团聚在一起开始新的生活了！翔雁，醒醒吧，不要再固执了，儿子等着你，我也无时无刻地在等着你！后面这几句原稿中没有的话，我几乎是在声嘶力竭的哭喊中说出来的。这也是记事以来，我在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唯一一次发自内心的情感宣泄。讲完后，当我走下讲台前，我再仔细的看了看翔雁，见他仍是迷茫不解的模样，而且看到他眼里也流出了泪水。但我却丝毫看不出他有怨恨、责怪我的意味，这就让我稍许感到心安一些。事后，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下这令我终生难忘的批斗讲台的，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我似乎也毫不在意。当时我心里只是在想，待到团聚时，我可以向他解释清楚所发生的这一切的因由。而且，我也相信，他定会理解并原谅我之所以要做出这种违背自身做人准则决定的原因的。

下来后，我走向主席台后边。赵璧媛迎上来对我说道：你讲的很好，充满了感情，相信这对宋翔雁是会起到作用的。但当时我确实感到异常疲惫，浑身时不时的还有些发抖，内心不想再谈论此事，就鼓足勇气对赵说道：不知怎的，我特累，口渴得不行，两腿还一直发抖不止。赵说，不要紧，可能是因为紧张造成的。你先回去休息一下，相信休息会儿就会好的。若有事时，我们会派人再去找你。于是我即刻回到家中，喝了很多水，然后瘫倒在床上，回想着刚刚自己的表现和所做的一切……

8，家书劝降，“挽救”夫君

不仅一个多月来的近乎每晚的夜战搞得我精疲力尽，特别是近十天来谎言的编撰，几乎耗尽了我的仅存的些许精力和体力，让躺在床上的我尽然很快就睡熟了。最后，是幼儿园的老师把孩子送回家来的声音，才把我从沉睡中唤醒。醒后我赶紧出来接过孩子向老师道歉，但老师反关切地问我是否人不舒服呀？让我既感激又很不好意思。

送走老师后，我抱起孩子紧紧地搂着他，泪水止不住地就又流了出来。儿子忙用他的小手抹去了我脸颊上的泪水，问道：妈妈，你怎么啦？我相当平静地向儿子说道：妈妈想爸爸了！这是一年来，我第一次向儿子袒露出我对他爸爸的思念，尽管此刻的他还无法理解我的心情，但没想到儿子也接茬儿回应地说道：妈，我也想爸爸了。儿子的话语，再次造成对我内心的猛烈冲击，也更加坚定了我一定要将翔雁救出来的决心，决不能再让他这样一点意义也没有的耗下去了。

游斗大会结束后给了我两三天的宁静，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的人没来再找过我。对这种宁静，我反倒觉得有某些不安和忐忑了。心想，难道他们看出我在说谎，而想另作打算了？亦或翔雁在学习班里有何异常举动发生了？反复思考后，我觉得领导小组花了这么大力气，绝不会就轻言放弃的。而且当我发言后，赵还亲口肯定过我的发言，因此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不要胡思乱想，自寻烦恼。而对翔雁那边会不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倒是让我很难预测的。但有一点我敢于确定，即翔雁绝不会因我说了谎话而动摇对我的那份真诚的感情，相反，他的这份感情反会促使他更好地考虑我为何会说谎。若能如此，则对他转变眼下的僵持状况，肯定还是有好处呢。想到此，我的心有些定了。觉得，领导小组可能也需要观察一下会后的反映、翔雁那边的变化、下一步应如何进行等问题，然后再做出新的决定。

果然，第三天的晚上，赵璧媛又派人找我去谈话。见面后，首先她再一次肯定了我在大会上的发言。接着说道：根据专案组的汇报，这次大会对宋翔雁思想上的震动很大，看得出他内心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尽管外表还装成没事人一样，口头上还不承认自己的五一六问题，而且对你的发言还说很不理解。但说话的语气已然没有过去那种顽固的劲头了。看来，一方面，前段我们所做的工作，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也更加感到自己越发孤立了；另一方面，他还没有勇气真正和过去决裂，还在犹疑和观察。因此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还需要抓紧做好攻心和转变工作，趁热打铁，坚定地把宋的问题尽快拿下来。

继而，赵进一步讲道：今天找你过来，就是想先听听你的意见，看看在下一步对宋的工作中，你有没有决心、愿不愿更好地配合专案组继续展开对宋的攻心工作？好让你们的家庭能尽早得以团聚。赵的讲话结束后，我思考了一会儿，因我不清楚赵具体需要我去做什么，所以我不敢贸然应允。但我也知道，因我既然

决定要把翔雁尽快救出来实现家庭的团聚，所以对此机会绝对不可轻易放过。今晚在场的除赵外，还有其他两位领导小组的工作人员和宋专案组的组长杜展凯。他们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略加思考后我说道：我珍惜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愿意按组织的要求努力做好我能胜任的工作，把宋翔雁尽快从五一六泥坑里挽救出来。

我说完后赵接过我的话讲道：我们欢迎你的这种态度，相信你有能力配合我们做好宋的转化工作。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宋尽管现已动摇，但若不趁热加紧工作，他摆向那边还很难说。我们研究后，觉得你可以进一步通过家书的形式向他讲当前的形势，不怕重复交代党的政策，要多讲你和孩子当前的生活和对他的希望和想念，同时还要特别强调，你对他前一段的抗拒态度可以理解，但不能再继续坚持不改，否则不但会毁了自己，还会毁了整个家庭。说到这她打住了，停了一会儿后又说道：今晚就谈到这里，你回去后可以再好好想想，如果你真有决心去做，明晚孩子睡觉后再来这里找我，我们会很好帮你完成这一任务的。

此后几乎每晚当孩子睡着姚今淑来后，我就带上纸笔去赵的办公室，根据赵的要求完成家书的书写工作。这种情况大约持续了半个月左右，直到允许翔雁回家继续交代揭发为止，我大约共写了十一二封家书，几乎每天一封。在书写家书期间，一般当我到后，赵都会简单说点当天的情况（主要是看过我给他写的信后的情绪变化和说过的一些话语），然后再向我提出信中要在哪些方面多加些笔墨，涉及到相关政策或个别人员交代前后的情况，则都是她边说边记，当记录好请她看一遍认可后，我再抄到信纸上。比如，我记得她说到过原党办的一名中层干部，是机关连的指导员，也是该连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但当他的问题暴露后，他就很快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并进行了揭发。事后组织上根据党的政策，不但没有给他任何处分，还仍让他继续担任该连的指导员工作。

这种在领导人授意下，由被羁押者的亲属写家书，劝告被羁押人认罪的做法，在建国近六十七年来的公检法系统中是很普遍的，也曾被认为是一种体现人性促进罪犯认罪伏法的好方法。但在文革运动期间，在民事机构中私设的牢房中，对运动中被清理或清查但并未经过法律程序定罪、定性的羁押对象也同样采用这种卑劣手段，显然是非法的，也是对人性的更加无视和践踏。

大约二月下旬一天下班前，又来人让我去赵璧媛的办公室。我不知又出现了

什么情况，心中嘀咕、盘算着缓缓前行。到后，赵先让我坐下，然后对我说道：这段时间你配合我们对宋翔雁做了很多转化工作，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经研究后，军宣队和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决定从即日起，让宋翔雁暂先回家继续交代问题、书写交代揭发材料。但因他的问题尚未完全交待清楚，所以现在还不能正式宣布对他解除隔离审查。因此，他回家后，不要让他经常在外随意走动，你要负起监督和帮助他的责任，督促他按专案组的要求专心在家里写好揭发交代材料，争取尽快完全解除隔离，真正回到人民群众中来。赵说完后，我向她表示了感谢，并允诺一定做好监督工作。最后我还是不放心地问道：宋何时能够回到家中？赵答道：傍晚时分专案组人员会送他回去的，你在家里等就是了。

回到家后，我大致作了下打扫、整理，想到离家已一年多的丈夫即将回家，内心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我们终于就要团聚了；而紧张则是面对即将回来的他，我该怎样解释近来这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一切呢？但不管怎么想，一时我也很难理出个头绪。心想，反正人回来了就成。至于怎样解释，以后慢慢再说。他若有什么不清楚的，我可以想法和他说清楚：他有什么不满意的，我先忍着。我相信过不了多久，当他看清了周围的一切后，他就不会再怨我了。有了这种心理准备后，我基本上就踏实了。收拾完后，我先去小卖部买了些吃的和各种罐头食品，然后把孩子接回家中，让他自己在家里玩，并嘱咐他不要外出免得冻着。然后我去打水买饭菜，因我多打了几个好点的菜，卖饭的人还问我，今天怎么打这么多呀？我只是一笑而未作回答。匆匆回到家里，我先给孩子简单洗了洗，并安排好他的饭菜，让他先吃，以便饭后先给他换洗，让他在床上玩了。这样室内就可以稍宽敞一些，翔雁回来后带回的东西也就有地方放了。

一切按我的想像都安排停当后仍未见翔雁回来，心中又开始不安了。这段时间以来总是这样，忙得不可开交时反倒内心踏实些，一旦轻闲了，反而会七上八下胡思乱想，这大约也是我自己不成熟的一种表现吧。当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后，翔雁在两名专案人员的陪同下才回到家中。不知怎地，分别一年多后的相见，彼此都相当拘谨，这也许是各有心事的缘故吧。翔雁走到床边先把儿子抱起来，孩子还有点认生的挣扎着，我赶紧过去对儿子说：快叫爸呀，小牛！儿子盯着翔雁的脸，怯生生地喊了声爸，这一下就把翔雁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看他脸上泛起了满意的笑容，亲了一下儿子的脸蛋，但儿子还是明显不肯接受突然来到的他，

使劲向我身上倾斜，我只好把儿子从他爸爸手中接过来，并一个劲的说：你不是老说你想爸爸了吗？怎么不肯让爸爸抱呢？儿子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却回过头来看了看他爸爸。确实一年多了，孩子的记忆里，爸爸的形象早就没有了。我怕翔雁心里难过，赶忙对翔雁说道：已经一年多了，尽管他嘴里总念叨着爸爸长爸爸短的，但你的样子他肯定记不得了，所以又生疏起来，别急过几天就会好的。说着我顺手将孩子放在床上，让他自己去玩。并转过身来问翔雁要不要吃些东西，而且告诉他我也没吃呢。这时我才觉得翔雁使劲地看着我，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轻声地问道：你还记得六七年夏初，我们回家在豁口附近相遇时，聊起了文化大革命的事吗？他的问题很突然，加之我根本没往这方面想过，我就说道：我不记得咱们聊过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事，怎么了？他嫌我说话的声音较大，还用右手食指贴在自己的嘴唇上，让我小声点。我知道他是怕周围邻居听见而作的手势，就点了点头。接着他说道：没什么，赵璧媛让我再想想六七年六七月的情况，所以问问你，你不记得就算了，不用再费力去想了。然后 he 说道：那我陪你再吃点东西吧，何必要等我呢？你肯定饿过头了。

吃饭时我感到翔雁并没有多大胃口，吃得很少，也许是回来前吃过了吧。但他却目不暇接地一会儿看看儿子，一会看看我，有时还会因看着儿子的动作好玩，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笑容。吃饭过程中，我一直注意着他的表情和话语，我觉得他的话语明显减少了许多，脸上多少有些木讷的感觉，这又让我担心起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让我内心隐隐地作痛。所以，为迎接翔雁归来的这顿晚饭，对我来说也形同嚼腊一般，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

饭后我很快安排儿子睡下，并躺下来和平时一样哄他入睡。翔雁则在屋里整理他带回的东西，需要洗换的都挑出来放到棚子里，我感到他在棚子里呆了很久，我担心他冷喊他快些进屋不要冻着，但怕吵着孩子，又不敢大声喊叫，估计他没有听见，我只好先不管孩子，起来去棚子里把他叫进来。这时才发现他正在仔细地观看着他因审查而没能建好的棚子呢。顿时我的泪水就流下来了，为了不让他发现，我赶紧擦掉了流出的泪水，心里又油然而生了一股暖意，心想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丈夫和父亲，我拉着他的手，劝他赶快进屋别受凉，因当时气温还是很低的，尤其是夜间，很容易感冒。进屋后见孩子还没睡着，我又躺下去哄他，并嘱咐翔雁不要再出去了。

等孩子睡着后，我起来帮他收拾好的东西，分类摆放在我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地方后，屋内立马就显得整齐多了，看起来也让人感到舒服了。这时我们彼此目视了许久，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但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大约彼此都在考虑该说什么，该从哪里说起好呢。最后还是我先开口说道：咱们还是先洗洗后，上床再说好吗？他点了点头，同意了我的建议。

上床后，我们彼此几乎同时指了指左右和前面的房子，大家都明白，这里不隔音，尤其在夜深人静之时，说什么别人都能听见。但我们各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憋也憋不住。想了想，我们把被子捂住头，躲在被窝里开始了彻夜的长谈。首先是他问我为什么要编造谎言说自己是五一六，难道军宣队他们能信吗？听后我一下子就抓住了他的问题所在，即他至今还相信军宣队是认认真真地在抓五一六呢！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道：你真的相信地院有这么多五一六吗？他肯定地摇摇头说不信。这时我才慢慢对他解释道：现在整个形势就是这样，只要有人揭发说你是五一六，那军宣队就认定你一定是五一六，千方百计也要让你承认，一旦承认后，就不再过问了。否则就老关着你、折磨你，直到你熬不过了最终承认为止。到现在为止，革委会从上到下的干部都成了五一六，几乎无一例外。红教联的头头和造反派老师也都是，他们交代后就没事了，你一个小老百姓还顶在那干嘛？对我的这一席话，他听后沉默了很久，然后问道：你难道觉得我欺骗了你，我是五一六吗？听到他如此发问，我更加理解了他心中的症结所在，我立即把他搂在我的怀中，在他耳边亲切地说道：我一直都相信你的正直，相信你绝不会是五一六分子，更不信你会欺骗我。但我不能让你再傻乎乎地瞎坚持，那样做真的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你看看那么多的党员和干部，谁像你一样犯傻？这时，我只觉得他把我搂得很紧，但对我所说的话，却没有做出任何回答。我知道他还在想着我所说的话，我不想打扰他的思绪，确实需要给他时间，让他自己想通才行。否则，下一步他如何交代都会成了问题。我不想，也不能打扰他的思考，我只能顺从地依偎在他的怀里，尽管我都觉得有点喘不上气来了。这是一种令人焦灼、难耐的等待，但最终他终于松开了紧紧搂着我的胳膊，让我得以大大地喘了口气，只听他低声对我说道：看来也只能这样了。但你想过没有，这种机会主义的态度，眼下尽管可以让我过关，但今后就不会受到惩罚吗？！面对他的这一看法，我无言以对，但却感到我的心被深深地刺了一下。所以很快也回了一句：

难道这么多党员干部都是机会主义，就你这个大白点是马列主义啦！他表现的非常敏感，听出了我那带刺儿的话，立即抚摸着我说道：我不是说你，而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已经说了，眼下只能这样走下去了，但今后又会怎样，总得有个考虑吧。至于说到那么多党员干部，我们不要和他们比，我们自己也没有那份本钱。在学习班里我早就想好了，今后不管干什么都行，我们绝不会落在别人后边，但涉及政治上的事，离开它越远越好。你看，如果不是因为我，你这个逍遥派当的该多笃定呀！说着不仅把我引笑了，他自己也笑了起来。为了让我安心，最后他再次强调，今后就按你的想法尽快帮我过关吧！至此，我那高悬的心总算落到肚子里了，我心想，这头犟牛终于被我驯服了！想到此，我会心地偷偷乐了很久。虽很快就将进入梦乡，但我还在为自己的抉择庆幸着，我觉得这一年多的经历，更让我感受到他人品和责任心的可贵，感到他是我终生可以完全信任的人。为此，这一年多的苦难付出也是值得的，所谓日久见人心也不过就是如此吧！

次日一早我将孩子送去幼儿园后，回来告诉他不要外出，好好在家里写材料，赵璧媛事前是打过招呼的。他告诉我回来前专案组也向他打过招呼，并说道：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帮我把加入五一六填写的表格搞清楚，我现在卡壳儿就卡在这里，瞎编出了问题就不好办了！至于介绍人的问题，我还可以再考虑，其他方面如何应对我心里基本有数，你可以放心。

因我还得上班（即在菜班劳动），不可能到处去找人了解情况，而且我熟悉又能相互交底的人也很有限，岂能随便就向他人询问加入五一六的表格是啥样的问题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只能去找五连钻探教研室的唐振权老师打听，因我们与他的私人关系还不错，而且他也比较乐于助人。文革时他是地院《东方红报》的编辑之一，清查五一六开始不久就被办学习班，但旋即他就坦白承认了，所以基本上没有受多大的罪。下班后，我先接了孩子，想以找五连何谓平同志（他原是钻探实验室的实验员，现在干校开拖拉机。在翔雁被关押期间，有事找他时都能尽力相帮）给孩子理发为由，去五连集体宿舍找唐（唐是单身来干校的，故住在集体宿舍）。但直到小何（我们习惯这样称呼他）给孩子理完发，也未见唐老师回来。因此我只好轻声对小何说道：请转告老唐，我有点事要找他，若可能，七点左右我去锅炉那打水，在那见面。听后，小何也低声答应道：没问题。

到家后，翔雁立即问我打听到了吗？我将情况告知，说七点钟打水时看看能

否见到唐老师，届时我会向他打听的。翔雁也觉得这样好，说他知道的情况较多，也许能帮上忙。打水时，如约见到老唐。但因打水的人太多，谈话不便，加之天色已晚，找别的地方再谈又觉不妥。所以，我约他次日下班后在菜班库房后的树林里等他，因他为人大大咧咧，故我未直说，只让他千万别忘了。第二天，我请了会儿假提前将孩子接出来并送回家里，再返回菜班库房后的林地。唐老师见到我后说：什么事搞得神神秘秘的？我才把翔雁现已回到家中，正为交待加入五一六填的什么表着急呢，想问问你那表是啥样子的。听后唐说道：我也是听说的。表有两种，一种是好纸铅印的，另一种是普通纸油印的。表头印的是五一六兵团登记表，内容除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日、籍贯、工作单位、政治面目、家庭出身、职务、参加过那些造反组织、推荐人（也有说是介绍人）、推荐日期（或介绍日期）、批准人、批准日期。他还告诉我，表格的栏目填多填少没关系，介绍和推荐写哪个都行，让老宋别太较真，军宣队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些小事。听说干校这边交代的表格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都是自个儿编出来的。当我说到介绍人或推荐人翔雁不知填谁为好，既怕拖累了人家，又担心说他瞎编。唐又说道：嗨，填谁都行，但需是老造反派，只要那会和他交往较多的就行。即使说贾振远或陆炎德介绍也没关系，对他们来说多介绍一个或少介绍一个都没事的。老宋就是自己想不开，早承认了多好！唐老师的性格如此，拿什么都不当回事，成天乐呵呵的跟没事人一样。但毕竟他是“过来人”，所以我认为他的这套处事“理论”，对眼下帮翔雁走出困境应当是有效的（尽管我知道，翔雁对唐老师的这套处事哲理是有极大保留的）。这大约也是急病乱投医的一种表现，恐怕又要被翔雁说成是机会主义了。但我管不了那么多，只要能尽快让翔雁解脱就行。所以我谢过唐老师后，又告戒他还是小心点好，让他绕点路回宿舍，免得引人怀疑。

到家后，我立即将老唐所言如实告知了翔雁，但有意略去了老唐对他的评价。说完我问道：你觉得唐老师说的行吗？对我的问话他感叹地说道：看来这世道真的变了，对人想怎么整就怎么整，对事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简直实用到家了，逼得被整的人用机会主义的手段，对付整人的人功利主义的态度。听后我的心就完全放下来了，我心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面对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态势，换一种能够保全自己的方式，是不应当都被斥责为机会主义的。看来我的老公正直有余，灵活则欠缺呀！故又说道：你总算看明白了，我还怕你会批评人家老唐的一片好

心呢！

至此，他写材料的事我就不再操心了，相信他定能顺利过关的。因为心境不同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不仅他人体很瘦，而且时不时的表情有些发呆，夜间睡觉时，他有时会起来搓脚，而且左足冰凉。我问他后，他说学习班里大夫给他看过，说左足气血不畅所致。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呀。他的身体状况又突然令我担心起来，我知道这将是我下一步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我必须千方百计为确保他身体和精神的健康作出努力。因为今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某种角度讲，我们这个家的新生活才刚刚要起步，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不仅是新生活顺利起步的基础，更是新生活全面展开并结出硕果的保证。但我知道这一切需待他上交的材料得到认可，并正式宣布解除隔离审查时再做具体安排了。如今，我正急切的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十）清查运动无收尾，五七干校又迁移。

自三月上旬全校大会我上台亮相并正式宣布解除对我的隔离审查后，干校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似乎就正式结束了。这里我之所以称之为“似乎”，实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军宣队并未在全校大会上或全校干部会议上正式对该运动进行过任何总结，也没有正式宣布过干校的清查运动正式结束。如此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仅地院教工就涉及到数百人之众的政治运动，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真有些让人费解和生疑。因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历次运动，都讲究善始善终。有颇为隆重的开头（动员、学习文件、交待政策等）和相当正式的结尾（总结成绩、归纳经验、作出结论等）。但唯有这次对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不论在干校迁址再建时期或地院迁址再建时期，都从未对全院教职工作过只言片语的“总结”，似乎偌大的运动从未在地院发生过一般，这岂非咄咄怪事？！难道在文革发生即将五十周年之际，善良的人们不应问问其原因何在吗？难道在这场对广大群众进行残酷迫害中处于领导和组织实施地位的人们，不应很好反思，并对事件策划、执行过程中的史实作出揭露或说明吗？

当事件进入三月下旬正值将要准备春耕的时节，干校又开始了迁址的动员和准备。所谓迁址是指地院五七干校因军宣队改由湖北省军区派出，地院也经中央批示决定迁至湖北省重建，故干校须由江西再迁至湖北沙洋重建。这种反复穷折

腾式的劳民伤财行为，实乃因毛氏在不同场合、不同因由的非正式会议上，即兴提出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工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领导高等院校；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诗人般遐想”式的论断，在未经严肃的讨论和严谨的设计考量，又未经试验取得经验，就以一系列最新、最高指示公开发表、下达，驱使众多将最高指示奉若神明的追随者们一哄而上所造成的。

正式迁校大约是从五月中旬开始，我们经由井冈山、韶山、长沙、武汉，最后抵达沙洋。因此行众人沿途要参观井冈山、瞻仰韶山毛泽东故居，在长沙、武汉都作了必要的停留，故到沙洋已是六月初了。沙洋原本是一处劳改农场，这时则腾让给我们，成了干校的新址。因沙洋地处江汉平原，土地属盐碱地性质，比较贫瘠，地下水位很浅，但不宜饮用。因周边无山，加之因没有基建任务，无石可采也无需采石，故我被调往放牛组放牛，昭明则安排在食堂干活。

当我们抵达沙洋时，农耕季节已过，大田里的作物都是原农场劳改犯们种的，眼下所需的管理工作量很有限，加之再无各种批斗大会和小会要开，所以众人显得十分清闲，都各自忙于自家的事情。由于传闻地院已初步决定暂先迁至湖北江陵原地质部第五石油普查大队原址，五普的职工已经迁走，房屋院舍已然腾出并交割完毕，现急需一批人迁往江陵接收整理。所以又引起众人对自己去向的关心。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回京已无望，但若能调往江陵这无疑是较好的出路，因彼处毕竟是一个小城市，生活和教育条件要比沙洋好许多，故都眼巴巴地等待着最终决定的宣布。而对经历过此前这场浩劫的我们来说，全然没有这方面的考虑。我们深知，今后不会有什“好果子”吃，争也没用。我们只求生活能尽快安定下来，此后再视可能作出相应的选择。

大约到六月下旬，沙洋干校负责人（姓名我已想不起来了）找我去校办询问打水井事宜。他向我说明因干校人数比原来猛增，饮用水供应压力很大。经了解，当地浅层地下水不能饮用，需要取深层地下水。为此需要哪些设备和器具？我向他说明了打井设备和器具的选择，现在尚无从谈起。必须在明确得知井位处的地层剖面、所取含水层的深度、厚度、补给情况及岩层性状，以及日采水量的要求等相关情况明了后，尚需先完成钻井井身结构的设计，然后方能确定。现在只能笼统地说需要钻机、钻具、钻头、井管和过滤器、动力和发电设备、专用和通用工具等大的类别，但这并不解决任何问题。该负责人肯定是原地院的干部，只不

过对钻井行业全无了解，因此我讲完后他更是一头雾水，只能不了了之。没过了几天，他又把我叫去咨询。他对我说道：经军宣队与部队联系，得知这一带打井需用美国出的牙轮钻头，但这种钻头很贵，一个钻头就得好几千美元，我们怎用的起呀？！对此我解释道：64年以后的情况我说不好，因我64年10月至今没有搞过业务，对这些年来国内外的技术发展情况不了解。但64年以前，我国石油系统确实未能很好解决中硬岩层钻井用牙轮钻头的研制工作，基本是靠进口苏美的产品，地质部门更无这方面的能力。而进口的牙轮钻头确实很贵，但具体数字我不清楚。如果说这一带打水井需用牙轮钻头，那肯定是因为含水层是卵砾石地层，而且所处位置深度较大，只能用回转方式钻井，而在此类地层中钻井确实有相当的难度。听后他接着说道，难道一定要用这种钻头吗？我问过高云鹏（当时他是干校的财务负责人），他说要这么多钱，干校根本拿不出，还是别想了！这样不就等于没路可走了吗？听后我明白了，干校因饮用水紧张，想打一口水井，但又因经费紧张，正在犯难。于是我告诉他，因国内没有大深度钻井用的冲击式钻机，故埋深超过60至70米的卵砾石地层只能用牙轮钻头进行回转钻进。但因水井的井深一般不是太深，故井管、过滤器外径对成井直径的要求远低于石油钻井，所以可以考虑用油田报废但仍能使用的旧牙轮钻头来打井，这样费用问题就不大了。我的这句话让他心动了，随即又问道：到哪儿去找报废的旧牙轮钻头？我告诉他附近的江汉油田正在会战，说不定就能找到所需的旧钻头。但眼下你想在哪打井，井身结构都没有，没有尺寸怎么找钻头？但为让他放心，我又告诉他，江汉油田的会战刚开始，没几年结束不了，等这边的井位和井身结构确定后，再派人去找也不迟。听了我的解释后，他似乎有如释重负之感地说道：干事还是得找懂行的，你说的不仅让我明白了，而且也觉得有解决的希望了。对他这种可能有些喜出望外的情绪，我还是给他泼了点冷水。故说道：我讲的只是大概齐，没有见到钻井井身结构设计和地层剖面之前，刚才所讲的一切你都不能当真。而且届时一切还得和施工打井的机长合计，必须得到他的认可后，方能作数！因为我的想法是因陋就简的凑合干的办法，不像正式的工程施工设计那样，一切都得按规范标准进行。若那样做，可能就得花几千甚至上万美元买新的进口钻头了。他似乎与一般行政领导不同，说话不怎么遮掩。故听后又说道：看来你是被整怕了吧，怕出了问题会找你算账是不？对他此言我回答道：也不尽然，但我说的却是

实情，到时真要实施时，你就会明白的。因为要想打一口超百米的供水井，花费绝非小数，不认真设计并合计好是不允许的。对此言他倒是点头认可了。

又过了几天，他又派人约我去他办公室。见面后他就问我，江汉油田哪儿你有关系吗？我不清楚他的用意何在，故反问道：你想干嘛？他倒也坦率地说道：我想让你跑一趟，看看能否弄一个他们报废的三牙轮钻头回来？听后我一惊地说道：你这也太没谱、太急了点吧？钻头按美国 API 标准是成系列的，每个系列十几甚至二十几个尺寸，你的水井连设计都没作呢，让我怎么个找法？别说我没关系，就是有关系，也不可能给你找十几个到二十几个钻头呀！对我如此不客气的回话他一点没生气，反倒乐呵呵地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给我并说道：就是这个尺寸的钻头。我看纸上写的是直径 $9\frac{7}{8}$ 的三牙轮钻头，就奇怪的问道，你根据什么需要这样尺寸的钻头？他大笑道：我去西边部队的农场看了，他们那的水井就是买的这种钻头打的。我接着问道，那他们用的钻头现在在哪儿？他说，那是部队打井队的设备，和现在的农场没关系。我心想，他在找我了解情况的同时，还是做了一些情况调研的，是一名办事还挺下功夫的领导，不错！接着他又问我：油田那儿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说道：现在不好说，因原来机械教研室一位女老师后因两地分居调到大庆去了（她是 60 年 9 月与刘昭明同时分来地院的，她是石油学院矿机专业毕业的叫段雪润，分在机械教研室。报到后她与刘昭明同住一间宿舍并成为好友，64 年春，小段因两地分居调往大庆），前段听说他们夫妻两可能要调往江汉油田参加会战。但是否已经调来了，却不清楚。听后 he 说道：你设法联系联系看，她现在是否调来江汉，若有熟人办起事来容易一些。若仍未调来，看样子也得跑一趟看看。面对他的执着我不好拒绝，回家后我与昭明说了这一情况，问她是否知道小段两口子现在是否已调来江汉，昭明说他们早就到江汉了，那会儿我们还在江西呢！第二天我就将这一情况向领导做了汇报，听后他特高兴，并很客气的说道：看来得辛苦你一趟了，抓紧去趟油田，看看能否找到这种尺寸的报废钻头，需要多少钱，届时打个长途回来，能定下来最好。你先回去准备一下，先到财务那借点出差费，明天就走行吗？我刚要走他又说道：你先按两个人借出差费，再找一个人一块去，有事好商量。总之，只要能找到仍然能用的这种钻头，就在那把手续办好，咱们派车去拉都行。第二天我和一位姓白的干部一道去了江汉油田（白是政工系统的干部，过去从未与他打过交道，也不知他

在校的具体工作，从干校回京后，他调往地科院并提升为处长了），到油田后，先到招待所住下，再与小段联系，一切都很顺利。当晚我们去到小段家里，向他们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听后，小段爱人仇射阳对我说，这事你们就不要再找指挥部了，走官道太啰嗦。明天我要个车，陪你们到几个井场转转，若有，你们要几个都不是问题。说毕，我们一起聊了很久，他们文革中也都挨了整，对我的事也特别惦记（我被隔离期间，他们与昭明一直有联系），当问起最后情况时，尽管当着白某的面，我也没有隐瞒地说道：不堪回首，苦不堪言！最终还得靠假话违心认罪，否则可能现在也难脱身。总之，这次我算长记性了，今后不会再介入政治纷争了。但今后路在何方，谁也说不清，地院已决定迁来江陵，而我们个人还很难说，先在干校混吧，我自己觉得过去学的那点业务，现在恐怕也扔得差不多了。你想，我已经快八年没摸过书本、也没接触过专业实践了，就是想当个工人，年龄和体力也都存在问题！但小段仍宽慰我说道：你不用这么悲观，你和昭明的基础和能力我清楚，需要时很快就能捡起来的！老友知己相见总有说不完的话，但时间不允许，都快到子夜了，我们才辞行，老仇怕路不熟，坚持送我们回到招待所，并说明早上班后，他要个车子过来，让我们在招待所里等他。

第二天，老仇带我们去了三个井场，其中一个井场挥挥说没有用过这种规格的牙轮钻头。另外两个则说用过，废旧钻头都丢弃在废料堆处，得自己去找，因现在井场人手不够，没法抽人帮忙。于是我们三人就自己去废料堆处查看，很快我们就找出了四五个能用的钻头，我请井场指挥找了一名钻工拿了规尺，分别对钻头进行了测量。测量后，在两个井场分别各有一个直径在 $9\frac{1}{2}$ 和 $9\frac{5}{8}$ 之间，而且周边磨损情况比较均匀、牙轮活动正常且晃动较小的钻头被我们选中。在我们与井场指挥交涉后，他们极其痛快地说：能用你们拉走就是了，并分别让工人帮我们装上了汽车（因一个钻头少说也近 20 公斤呢，而且是个浑身油泥的铁疙瘩，很不易抱起来）。分手前，我谢过了两位指挥，并向他们请教道：按现有的钻头直径在卵砾石地层中打井时，一般裸眼井径能有多大？他们说：这决定于裸眼钻进的时间和泥浆的质量，按公制标准讲，大约能在 280——320 mm 之间。这时我心里盘算着，有这样的井径，对顺利下入 $\varphi 250$ mm 的过滤器丝毫不会存在任何问题。而且每个钻头均具有穿透 20——30 米卵砾石地层的寿命，可为干校打水井节省相当一笔费用，应当说称得上不虚此行。

回招待所的路上，老仇对我说：你们带这么两个铁疙瘩去武汉坐火车太不方便，建议你们从潜江乘船直接去沙洋，让干校派车去沙洋码头接你们更方便些，我可以找车送你们去潜江码头。老仇的主意确实周到，我们接受了他的意见，回到招待所，即打长途向领导做了汇报，并说明准备乘船回沙洋，让车到沙洋码头接我们。

当晚我们仍到小段家作客，对老仇的辛劳和周到，我们再三表示感激。当晚我们又聊得很晚，其间小段把我单独叫到里屋，并与老白打招呼道：我们有点私密话要讲，对不起啊！进屋后小段对我说，她又怀孕了，想要一个男孩，因为老段家“绝后”，为了圆父母的梦，他们决定再要一个，老仇也同意，但能否如愿就要看天意了。他让我将此情况告知昭明，我问清了她的预产期，并祝愿她天随人愿！

第二天，老仇如约将我们送到潜江码头，潜江到沙洋的直线距离不长，但荆江这段水道曲曲弯弯，故航行时间竟需十多个小时。因这几天来，我睡得很晚，加之想事多，睡得也很差，而且在井场里来回跑动，浑身觉得十分疲惫。此时要干坐十多个小时我觉得很难承受，故我与老白说道：因这几天我睡的不好，人太疲惫，我怕坐十多个小时受不了，想去换个卧铺票。老白说，大白天乘卧铺怕不行吧？我回答道：大不了差价我们自己出呗！老白对此无异议后，我就去改了票并搬至卧铺舱躺下了。沿途无话我很快就睡着了，下船时老白还说：看来你真的乏过头了，几乎没醒呀！顺利回到干校交差，头头看到两个铁疙瘩乐得合不上嘴，夸我立了大功！我回道：甭夸，今后不挨整就好！他接着说道：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别尽瞎说！我知道他无恶意，就赶紧去报账了。果然应了老白的话，高云鹏一看大白天坐卧铺就提出了异议。对此，我未做任何解释，只说道：您就按着差价报呗。不知是否老白找了头头，正在结账时，头头来了说道：你这老高怎么死心眼呀？人家辛辛苦苦弄来两大钻头，一分钱没要，你这点差旅费算个啥呀？给我，我来签字！其实，我觉得人家高云鹏并没错，制度嘛，具体负责的主管更需执行，但见头头如此担纲，我也没必要高姿态，否则反会让人反感！

此后一段时间里，干校陆续有人奉令调往江陵，但更多的人，则整好了家档后请假回了北京。人心不定的情景弥漫于沙洋干校。我则借机制备了一些木工工具，开始打制自己的第一个木工制品——储物纱橱，而且一举成功并博得沙洋自

制家具“第一名”的美誉，当然这只不过是干校留下来的人们自取其乐的一种方式罢了。但后来，一名当地的木匠，看到了我打的纱柜后也颇为赞叹，并对我自制的木工工具大加表扬，还邀我到他家作客，结果还醉倒他家住了一夜。

到七月中旬，昭明得知其母去院内小卖部买菜时，被一骑车的学生撞倒腿脚有些不便时，心里极为着急。我们商量后，决定昭明立即请假后带孩子回京看望，并让老人再作必要的检查。请假事宜极为顺利，再无要求核查一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又恢复了过往领导对职工们的基本信任了，这点让人很感欣慰。准假后，我先送昭明母子去潜江看望小段夫妇，在那里停留了三天，由老仇安排我们搭油田的车去武汉，再转乘火车赶回北京。待送走昭明母子后，我即回到沙洋，继续制作我的纱柜。

随着时光的流逝，沙洋干校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数人回京后滞留不归，一部分人奉令调往江陵。昭明母子也随大溜逾期未回，并借机留下尽可能多帮老母做些事情。约到九月中旬我亦奉令调往江陵，到江陵报道后，并无具体任务下达。借此机会我立即向领导提出，因隔离期间的条件恶劣，导致我左腿气血流通不畅，夜晚左足经常疼痛致醒，日间行走时有跛行甚至摔倒的情况，申请前往江陵较大的医院检查就治。对我的申请，江陵学院的医务部门和领导毫不为难就批准了，并介绍了该去的医院。经当地的医院检查后，立即确诊为左腿闭塞性脉管炎。但西医没有很好的对症治疗方法，建议由中医进行保守治疗。基于这一结论及其后果可能十分严重的情况（截肢），我又向领导提出申请回京做进一步的检查并确定治疗方案。

经江陵院领导研究后，准我前往北京检查治疗。行前我将江陵所有的东西均打点装箱并包装好，若学校再迁址时，就可托人直接装车发运，不必我们再回来处理了。这点考虑还算有点远见，最后东西全部请人托运回京了。因学校迁往湖北一直拖到 75 年 8 月 8 日李先念批示下达后方才动了真格的，当时以专列作手段，将学校近千名教职工沿京汉线直接送往武汉，中途停车加水，但不允许任何人员下车。对广大教职工采取的措施不可谓不严，所差的只是没有配备武装人员进行武装押运罢了。而湖北省委出于无奈（因省委反对地质学院选址武汉），只得将来汉的教职工分别临时安置到当地近十个高校点，以及地质局管辖下的有关单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对在京高校的外迁就跟赶鸭子一般，所谓关心群

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最高指示，早就置之脑后了，出于政治上的需求，这种生硬的做法怎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戴呢？

我大约于 72 年 10 月下旬回到北京，到京后即刻去北医三院检查，当检查确诊后，三院大夫推荐我去宣武中医医院（后并入宣武医院）专门治疗脉管炎的科室就医。回校我将三院的确诊和推荐意见向留守的校医室负责人丁大夫汇报，获批后，我即前往宣武中医医院就诊。但当时脉管炎科的专家大夫已病故，接替他的是其夫人石晶华大夫，据称石大夫的医术虽不及其夫，但在国内目前仍是一等一的高手。得知这一情况后，令我十分高兴，觉得还算幸运！石大夫检查后很明确告诉我，你左足足背的血管已基本完全堵塞，现在要通过药物帮助建立侧支循环（即足部其他分支血管），借以尽量消除当前的症状，但要想达到以往正常循环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并告知整个治疗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当前中草药有些短缺，不易抓齐，需要自己去想办法，药味不全会影响疗效的。遵照石大夫的意见，我坚持就医半年有余，最终侧支血管的搏动得以建立，左足夜间疼痛的情况再未发生，而且跛行情况较早就已消失。据此，石大夫对我说道：你的治疗到此就可以结束了。今后要注意下肢的保暖，每晚都要用热水泡脚并注意运动。我感谢石大夫的精心医治和高超医术，这也算上苍对我的惠顾，至今我左足从未在夜间疼过，只是当走路较多时，左足会有被拌的感觉（即由因循环不好出现下垂——没能完全随大腿提起而导致），这也就石大夫所说的不可能和未患病前一样的情景了。在此还要提及一点的是，当时给我开的药剂量大且药味多，在药铺很难抓全。多亏此前在长田给我检查的校中医大夫（物理教研室张待勉老师的爱人），用她在校医室药房里保存的草药为我配齐，否则难有如此效果。

（十一）“四五”事件与总支书记的嘴脸

自七二年十月下旬回京看病起，文革的进程再也无法像此前那样一呼百应、声势浩大地按中央的部署迅即展开。而有些事只在上层展开，诸如主席对四人帮的批评、对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否定等。下边的老百姓无外乎只是跑龙套式的随着各级领导的吆喝，跟着喊喊而已了，真正起劲紧跟的也就是各单位的那些“老左”们了。我在这段时间里就是干私活了，除为家里做了一个五屉柜、一对沙发外，还学了点晶体管电路，在成嘉式、汪铁铭老师的指导下，为自己装

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和外接电源。同时还把原本的电子管元器件重新利用起来，装了一台推挽放大的电子管收音机，但利用晶体二极管用桥式整流电路代替了电子管整流，这样就减少了功耗，也给自己补充了一点新知识。

1，周老师的关照和借调铁三院

大约在 73 年夏初，学校的老师们按校领导的指示重新按各系各教研室原有编制组织起来，除跟着参加运动，学习文件、讨论外，还向上级业务部门申请单独或合作展开科研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天周家俊老师来找我，他先问我目前都做些什么？我如实将自己当时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听后 he 说道：搞点无线电、学习晶体管电路很好，业务上一定不要丢，今后还是要用的。现在校领导让把教师组织起来，搞些科研活动。但总支书记苏晓洁同志告知：因你有问题尚未下结论，故让我们暂不安排你的工作。但我考虑再三，觉得干等着也不是办法，所以想请你在这段时间里为地科院勘探所校对和翻译一些外文资料。不知你有何想法，能否接受？我对周老师是信任和敬重的，他在文革前也是属于“双肩挑”式党政一起抓的基层领导，但从来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是爱护有加的。故我并未问还要等什么结论这样的问题，估计他即使知道也不便直说，问了反倒让他为难。而且我想自己都承认是五一六了，还考虑什么结论不结论的，所以就一口答应了。但我说道：眼下有点困难的地方是，我手头几乎一点外文工具书包括字典都没有，从事翻译、校对恐会有些困难。听后周老师说：他会设法帮助解决的，并嘱咐我道：此事请你暂不要对外说起，怕有人会反映到苏晓洁处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对此我说知道了，再不会给您添麻烦了！听后，他也无奈一笑。这也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写实，想干点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还像犯罪分子式的得防着人，真令人哭笑不得！自此以后，我就把主要精力用在翻译和校对资料上了。初起时，原始资料和翻译、校对过的稿件，都经周老师的手来传递，一段时间后，周老师就让我直接与勘探所情报室联系，包括选题也由我和勘探所情报室主任商量决定了。因勘探所情报室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学外语的，对专业了解很有限，所以后期的资料选题，情报室主任大部分就让我直接处理了。

大约于 74 年 9 月，周老师又对我说：根据法国的资料介绍，铁道部第三设计院（以下简称铁三院）想搞一台多功能全液压车装钻机，为铁道线路的勘测施工服务。他们想从学校借调几名懂得钻探、机械和液压技术的老师参加他们的课

题研究小组，共同完成该项目的研制工作。经系和教研室研究后决定，由杨惠民、厉美恒（只开始时参加了一些讨论，不久就退出了。具体原因不详）、你和陈纪德同志参加，陈是75届的，基础较差，主要是学习、培养，我作组长但不能长期脱产在唐山工作，因校内的事情还需要抓。说完后问我家里有没有困难，愿不愿意参加此项工作？因我已很长时间没有接触专业实践了，特别在前一段的资料情报工作中，我已认定液压技术在工程施工机械应用中的巨大前景，能有这样的机会参加设计实践是极其难得和十分宝贵的。所以我也没想是否要与昭明商量，就直接答应了，因我相信，昭明肯定会支持我的，尽管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儿，刚一岁多点，加之姥姥还需要昭明照顾，她的家庭负担会很重，但我一点都没有犹疑，我深信她能理解我、支持我，因我已然近37周半了，至今仍一事无成，真觉得过去的荒废太不值得、太令人羞愧了，虽然责任并不全在自己，但今天终于有了机会，自己就再也不能让机会白白地从身边溜走呀！要说周老师确实是很替下属考虑的，听后还是让我回去再与昭明商量一下。他说道：昭明母亲年岁很大了（已78岁），老二又很小，你长期出差在外，她一人确实有很多困难。你回去后还是和她好好商量一下再定吧！

果然如我所想，回家后我将老周与我讲的事与她讲了，并说了我的想法和周老师让我回来商量再定的劝告。昭明对此也非常感动，但还是坚决支持我参加。应当说，我们两人都是事业心较强的人，都有要在自己的业务领域内能够做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愿望。文革前我们都是想努力做到“四个有所”的年轻人，而今有了这个机会，岂能图小家的安逸而捨掉自己的志向呢？！应当说，要争取做到四个有所，昭明比我的困难要大得多。她当时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已经决定从专业转向，因她已37周岁，再到井下带学生实习、生产，已有相当困难了。所以她决定转向搞基础课流体力学的教学工作，流体力学是矿山施工、安全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也是文革前系里长期无专人承担的课程。故文革前该课程的设置和讲授效果都存在很大问题，她曾为别的老师辅导过此课程，深知学生们的糟糕反映和学习时的困难程度。所以她决定转向后，立即得到掘进教研室领导的认可和支持。为了能尽快掌握专业方向对该课程的要求，她主动去钢院和清华大学听课、做实验、并义务无偿为钢院学生（当时尚未招生，均是下边送上的工农兵学员）授课、带实验，很受钢院一位老的流体力学老师

的器重和欢迎。有了昭明的支持，我立即向周老师作了汇报，周老师向我简单说明了近期的安排，并给了我一些此前铁三院在法国考察时带回的一些资料，让我先熟悉一下。

自 74 年 10 月中旬后，我即去唐山铁三院一总队参与了钻机总体方案的讨论和研究，并负责完成了回转动力头及气举反循环分离装置的具体设计，参与了钻机的北京性能试验和测试，并于 77 年初完成了地院研究生部科研报告会论文的编写，后在当年夏季召开的研究生部科研成果报告会上，代表研制小组做了 KFY-40 多功能钻机研制的论文报告，受到与会人员的较好评价。此后利用假期又花费了较长时间就气举反循环三相流的理论计算和分析作了梳理（完成初稿），请周老师审阅。后可能因高校恢复招生，新专业成立、教材编写、人员配置、实验室筹建等诸多事务干扰，该稿未能及时得到审查，故最终没能成文，实在有些遗憾。

该钻机的设计有他的先天不足，即在底盘用车的选型上铁三院考虑经费和订购时间过长，坚持用队上已有的一汽生产的仿苏 ЗИС -130 三轴六轮越野车，该车不仅功率较小（仅 110 马力——数据不一定准确），而且是汽油机，过载性能差，所以影响钻进效率。加之当时国内生产的液压元器件的质量较差，特别是液压泵和液压马达，内泄大、效率低，故有效功率输出更显不足。但据称该钻机在一总队的生产中还是用了一段时间，只可惜铁三院在科研管理工作的规范性上有所欠缺，致使该成果仅停留在样机生产和试用中，并未对其进行必要的总结或提出改进意见，直到钻机报废而告终。

但这段实践对我的成长却是有意义的，它是我第一次实际参与机械装置的设计工作，对我认识自己的能力和不足极为重要，使我更加坚信，在业务领域里，今后无论到何处工作，我都有立足的自信。而且，这次科研中，有关气举反循环的学习和实践，是尔后我在情报所从事部七五攻关项目《多工艺空气钻井技术》中的情报课题研究时，能够获得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的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撑。

我花费不少文字诉说这段经历，目的不在于说自己的流水账，也不在于谈自己得了什么奖。而是想说明一点：像我这样资质有限，但愿做些实事而且比较认真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文革那个年代可说有数千万，但他们却被无情地卷入到没完没了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中，而失去了贡献自己的能力和才能的可能和机会。

这不仅是人才的轻视和浪费，更重要的是这迟滞了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速度，更加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甚至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距离。

自 75 年下半年开始，因上级已经下达 76 年将准备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因此我们开始忙于编写勘探机械专业用的钻探机械设计教材的相关准备工作，加之钻机相关零部件正在工厂加工，也无需我们长期在那儿蹲守，只是根据需要，往返于武汉、北京、唐山之间。76 年 3 月因我父母的好友患病住进北京医院治疗，我即从唐山回京，经常往返于家与医院之间，每次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我均要下车进入广场观看，并抄录一些震撼人心的诗篇。到医院后，还把所见向老人如实介绍。我只感到他听时心情凝重，但极少跟我说什么，但每次都嘱咐我：看大字报和抄写诗篇时要注意有没有人注意你，若有则要及时躲开，混入人群较多的地方，再伺机离开广场，而不要直接就离开广场。我心知肚明，老人是担心我被人盯梢，而传授我一些他们当年和国民党特务斗智的简单方法。我应允老人一定好好注意，请他放心！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和全国大多数人一样，对周总理的生涯、经历、为人、处事等极其崇敬，因此我和昭明决定清明时节，应当带上孩子，去天安门广场向周总理的遗像默哀、致敬，并送上我们自制的花圈。但考虑到清明时恐会出乱子，故我们全家四口带上自己做的花圈，写上一个四口之家敬献并用包皮严严实实包好后，骑车带着孩子奔赴天安门广场。我们先把自行车停放在首都电影院旁，而且事前就将自行车的执照（即蓝牌）取下，防止被人抄录后查找车主。然后我们全家从电影院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在革命英雄纪念碑下，先将自制的花圈放好，然后全家四口面对花圈默悼并三鞠躬。一切预先想好的礼仪完成后，看看周围并没有什么人注视我们，但我们还是各带一个孩子，分开各自转身走向南池子在经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后边的路，从南长街出来，到首都影院取了自行车后，回到学校。第二天，我先到北京医院看望老人后，即乘火车转赴唐山，从而“躲过”了四五事件！

2，“四五”事件和再被审查

从北京回到唐山后，第二天就从新闻联播中得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很多人因此被抓，我还庆幸自己有点先见之明，“躲过”了这一劫。但没过几天竟接到了武汉来电，催我立即返汉。要说还是自己头脑简单，接电后并未想到是因“四

五”事件引起，回京后还在家停留一日，也未与昭明打招呼要作好被审查的思想准备。第二天先去医院看望老人，但他老听说是电报催我回汉时，马上嘱我回校后若问及天门事件的事时，一定不要说自己去过，需要表态时，就按中央的定性表态，并让我切记不可实话实说。这是二十六七年来，他老人家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叫我不要实话实说，老人用心之良苦，对时局艰辛之担忧，由此可见一斑！

到汉后，我即直奔汉口航空路原武汉地校旧址，刚到校门就被原院教务处的头头谢增荣（不知他是处长还是书记，名字可能有误）拦住。他向我问道：你这是从哪来的？我告知从北京回来的。他又问道：是叫你回来的吧？我说：是呀，你怎麽知道的？听后 he 说道：你先把东西放到传达室里，跟我出去走走。我说：我还得吃饭呢，一会食堂就该关门了。听后，他说：你就知道吃呀？！待会儿我请你不中？我丈二和尚摸着头脑，只好随他一道向地校大门的对面岔路里走去。因平时我从未与他有过多少交往，只是解除隔离迁往沙洋后，与他家隔着一排房舍相邻而居，一次他送来一瓶红颜色的酒给我，并说这是他自己泡的枸杞酒，要我每天喝两盅补补身子，表现出一位长者对年轻人的爱护与关心，让我颇为感动。当进入小巷后，他问我是谁让你回来的，我说电报上没落款。接着他又问道：四五期间你去过天门吗？我回答道：四五当天我在唐山，但之前去过。他又接着问道：你去的时候有人看到吗？我回答说：没有。于是他很严肃的对我说道：如此，回去后不管谁问你，也不管别人怎么问，你就一口咬定，因任务在身，这个期间我从未去过天安门。而且，你还可以，经过抓五一六后，对这类事我再也不关心了！他告诉我，现在形势非常紧张，中央有文件下达，院内有些人又想立功了，你自己要当心，别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记住一年多受的罪。走到一家餐馆前，他真让我进去请我吃了一顿饭，天都黑了，我们方从饭馆回到学校。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老公安，从北京公安局退下后，即转业进到地质学院，一直在教务部门工作。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他对我的关照却让我永生不会忘怀。可惜好人不长寿，他因严重的哮喘病，大约在八十年代中就已病故，当时我正在武汉给学生上课，未能送他一程，回京后，我曾前往他在高二楼的家，向他夫人刘女士表达了哀悼之意，祝他在天之灵安息，也希刘女士节哀，保重。

第二天我到系办报道，并询问为何事催归？系办让我去总支找书记询问。当

我进到系总支办公室后，书记苏晓洁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怎么今天才回来。我告知昨晚就到了，因已下班，今天才来报道。他又说道：电报不是要你速归吗，怎么要这么多天？我没好气的回道：我一天也没耽误，当天就赶回北京。但当晚37次车没有卧铺了，只能第二天走，你自己算算！面对我不客气而且是当着众人面的回答，她也只能忍着。但她接着就板起面孔对我说道：根据中央文件的要求，在四五事件发生期间，所有在北京或经过北京的人员，必须按要求逐日将自己在京期间的行踪记录下来，交有关部门审查。你必须按要求老老实实的交代清楚，要知道你的五一六问题还未做结论，不要再搞出新的问题来。写好后明天交到总支来，其他时间和探工系在地校的人员一起学习文件、讨论领会精神，接受审查。因是中央精神要求逐日交代在京和经过北京的活动，我是不能抗拒的。但我也吸取了抓五一六事交待的教训，加之我在那儿、干什么等都无地院熟人知晓，故按老谢的意见，一律省略或模糊处理，免生事端。因此，我从三月二十二号填至四月七号，除二十七、二十八日回京度假外，其余时间均填写在唐山工作。材料上交后，苏看毕也无话可言，但不死心还问道：你把证明人填上。唐山那边我填了庄耆、庞瑞珂二人，前者是项目铁三院方面的负责人。北京的我问苏只能填刘昭明行吗？因我是回家度假，就在大院里也没空到别人那去，谁能证明？苏想后只好说那就先不用填了。材料上交后，我一点不着急。因我觉得这种材料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在成千上万的人丛中，如果你不是被当场抓住，或因什么很大的动静，引起监视方的注意而被拍摄下来，再经一点点鉴别，是无法查出究竟的，加之类似像我这样的普通百姓，警方也不可能为地院去费力查找的。至于像铁三院去函调，在当时那种人心所向的环境下，像苏氏那样欲认真查对者，已少而又少了。所以当时我在汉口接受审查时，心里很笃定。我只是在想，苏晓洁这类人的心底深处是极其龌龊的，仅举一例可知：73年夏，就因我的问题尚未作结论，她通知周老师暂先不要给我安排工作的同时，有一天他突然来学十二楼我的家中“看望”（当时好像昭明刚生老二不久），在聊了一会后，突然指着她坐的沙发问道：这是你自己打的吗？真的很好看也很舒服呀！我还客气地说道：嗨，还说得过去吧！接着她又说道：我那儿也有些木料，你也帮我打一对吧！面对她的突然请求让我一愣，竟没有想到应如何回她方好。一方面我不愿意为她这种人帮忙（她也是干校里的“五朵金花”之一），另一方面，周老师刚给了我很多资料，我需

要时间翻译、校对，加之老二出生不久，家中事情很多，也没有时间再做木工，而且我答应为迎接女儿出生，给她们母女打一个五屉柜做礼物还没做好呢，很难再帮别人做活了。在我琢磨着如何答对时，她却迫不及待地说道：怎么，不愿帮呀？她的这话倒反提醒了我该如何回她，我即回答道：苏书记，不是我不愿帮您。因周老师通知我，因我的问题还没做结论，暂不安排我的工作。故这时我要帮你打家具恐不大方便，既会引起别人对您的议论，也会说我别有用心。这对双方都不好的事，我觉得还是暂时放一放为好！无疑，这话让她碰了个软钉子，加之她酷好整人拉资本，岂能有机会不报复的道理！

就这样，我在汉口接受审查至月底，最终只能不了了之。我于五月中返回唐山，问起庄、庞二人前一段时间有无来人向他们调查我四五前后在唐山工作的情况时，他们都说没有。当他们反问我因由时，我告知被审查一事。对此，他们均表示，这世道真让人揪心，还是多加点小心好。

六月中接到北京电报，言老人病危，让我速到北京医院。但当我赶到时，老人已咽气身亡。我当即赶去停尸间看了遗体，后来又在八宝山参加了他老人家的追悼会。尽管规格很高，评价很高，很多老同志都去参加了。但我深知老人内心的苦楚和忧心，这是我从他生前为教育我和我谈过得一件事中，看出他对当时形势的苦楚和忧心。事情是这样的，当他知道我对文革中被整颇有怨言和看法时对我说道：我过去的一名交通员，是延安派过来的。文革前是景德镇的市委书记，文革中被揪斗打断了双腿。但他毫无怨言，如今没事了仍继续为党工作。你要向这些人学习，革命道路就是这么曲折的，要有思想准备。听老人这一席话后，我确实很受启发，这与何部长在水边时对我所言的：革命嘛，哪有不挨整的。其道理不是同样的吗？！确实，共产党内有很多很多老同志，在经历了多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之后，仍然不舍弃革命、不舍弃党，默默无闻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是生命，值得后来人敬仰。但我不愿，也不敢向他们问起，难道党内斗争就非得这样你死我活吗？！难道面对党内斗争只有这样逆来顺受，才称得上是一名共产党员吗？！难道党内斗争不是唯理唯实而只能唯上吗？我知道我不可能找到答案，而且我觉得自己反正不是党员，也无需去找这一答案。重要的是，我只要能做到作一个正派的老实人，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按老人生前的嘱咐，教育好孩子（他很喜欢我的儿子，多次对我和昭明说过：小牛本性淳朴，要很好保持，不要娇惯），

也就不辜负他老人家二十六七年来的关爱了。面对我自己走过的曲折人生之路和孩子的现状，我觉得今天我可以告慰老人在天之灵，我没有辜负他老对我和孩子的祝福和期望！

（十二）高院长为我平反和不得不提的一个人

1，高院长为我平反

七六年十月打倒四人帮，全国人心大快。人们在经历了十年多的磨难之后，多么期盼着能够尽快过上安稳而舒心的日子呀！说真话，老百姓的要求真不高，只希望今后能平平安安过上安稳的日子，吃喝差点都没关系，大家想的只要家人们能生活在一起，孩子们能有学上，有活干就成了。不要再为今天这个亲人，被揭发、批斗，明天那个亲人又被审查、关押，今天这个孩子上山下乡、明天那个孩子在家待业，让人们总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就成了。可惜就这么简单的愿望，在那令人恐怖的十年里，都成了人们难以实现的梦想。如今总算有了盼头和希望，人们上街游行，在家谈笑风生的议论，买串“三公一母”的螃蟹边啖食其美味，并忖度着对他们这帮祸国殃民之辈真应将其碎尸万段以谢国人。当然，数十年来国人没有经历过很好的公民教育，在痛彻心扉的情感蛊惑下生成的这类复仇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能够理解的。

大约在七六年底或七七年初，我在唐山接到武汉的电报，让我回京去留守处，说高院长找我有事。到京后，留守处让我先等一下，说要与高院长联系后再定时间。她们电话联系后，告我：下午三点后，高院长在家等你，并告知了高院长家的地址。当我问找我何事时，她们说自己不清楚。

我如约准时到了高院长家。别人领我进屋后，高院长从沙发上马上站起来，当我给他老人家鞠躬问好后，他老走过来和我握握手，并让我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高院长来地院主持工作已经十八个年头了，而我在地院工作也十五年有余，但能坐在他老身边听他教诲这还是第一次。我真的想不到他老人家为何要找我，又要和我谈什么？但因院长的为人我熟悉，所以我没有一点紧张但略有拘束。坐下后，高院长让家人给我倒了杯水，让我先喝点水。接着问道：你是从唐山赶来的吧，在那边搞什么呢？我简单地回应了院长的问话后，他说道：这很好嘛，文革十年还没有把业务丢掉是好事。今天打断你在那边的工作，让你回来主要是对

你的所谓五一六问题宣布给你平反，同时还想听听你对此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高院长说话时的语气极其平和，说完后双眼注视着我，等待我的回答。听了高院长宣布和问话后，不知怎地，我内心似乎没有太大的反应，既不感到高兴，也没有什么惊喜。相反觉得也很平淡，这是太正常不过的事罢了！但有一点我不想隐瞒的是，能由高院长为我平反，心中感到宽慰，因为他毕竟是深深让我敬重、爱戴的院领导人！高院长和蔼可亲善待年轻人，他没有因我一时语塞而着急，仍很和蔼地看着我。整理好自己的思绪后，我说道：我感谢高院长为我平反，但我听说您已经从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这时我见高院长点了点头），所以我不清楚您今天的谈话是代表院党委还是您个人的意见？高院长听后说道：你说得对，组织上已经让我退下来了。但这次找你谈话，宣布给你平反，却是党委会上的决定，并委托我来执行的。因退下来后我就回到北京家中，而你又在唐山搞科研，找你回京比较方便，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一任务。接着，我又问道：按政策规定，平反时应将审查期间我个人写的揭发批判和交待检查材料一律退还本人，不知此事准备如何处理？对此，高院长对我说道：你所说的这些材料，今后肯定会退还给你的。但目前地院处于一个特殊时期，清查五一六的材料目前全部都封箱存在不同地点，眼下也没有足够的地方开箱整理和清查，只能等日后学校建设到一定阶段，有了足够的地方时，方能完成此项任务。对此，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最后，我向院长提出能否将给我平反一事通知我专案组的成员周××时，他老问了一下周的情况后，对我进行了劝解，希望我不再坚持。我接受了院长的劝解，并说道：对于清查五一六运动一事，我再无其他要求了。因谈话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小时，为了不影响院长的休息，说完我再无其他要求后，就起身向高院长告辞了。高院长也站起来，问我是否还回唐山，我点头回答了他的问话。他老一定坚持要送我走出他家的院门，出了院门，我向高院长深深鞠了个躬，相互握握手并道保重后，我才转身离去。这次在高院长家的停留，成了我一生中难于抹去的珍贵记忆。此后，我与昭明还在春节时期同去高院长家看望和拜年，这一次恰好杨光荣同志也在，他还让我们与高院长夫妇一起，在院长家的大门外拍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还刊登在六十周年校刊纪念册上，成了我们和高院长在一起的永恒纪念！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自高院长正式向我宣布平反后，我先后于七七、七八年多次找过院领导，包括当时负责处理冤假错案善后事宜的陈钟慧付院长数次，问

其何时能退还整我五一六时的材料，但都躲躲闪闪，从未给过令人满意的答复。这种视党的政策为儿戏，不能面对受害群众负起基层干部应负责任的渎职行为，确实令人气愤。这也是现今许多中下层干部不得人心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已经丢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所言所行要对人民负责的基本要求。最后我也不再为退回材料的事情去找他们了，因为我深信，这些材料不归还给我，只能说明他们失职，而不可能再成为加害于我的任何证据！

2，不得不提的一个人

在本文结尾前，我还想提一位我极其不愿再提的人，他就是陆炎德。尽管此人已经故去，再对死者揭丑似乎有失为人的厚道，但我内心一直提醒着我，应当加以揭露，好让善良的人知道，而今的世上，仍有这类人存在，要记住，他们是会害人的！

陆炎德是我大学同班同学，而且后来我们还是一个系的同事。只不过他后来一直在探工系党总支工作，成为一名专职的政工干部（他文革前任系总支宣传委员）。因我们之间工作性质不同，加之也没有什么共同爱好，所以彼此间并无什么私人交往。

文革前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游手好闲之辈，上班时间经常能看到他东走西串，这坐坐、那聊聊，晚上则以他的房间为基地打麻将，满屋乌烟瘴气的。所以也遭到一些人的议论。但尽管他是名政工干部，但又不像某些党员那样左得厉害，总以改造他人而自居。相反，他和任何人交谈总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慢悠悠的从不见他训斥过人。所以也能招揽一些人与他结交，聊天打牌。

但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占小便宜。典型的事例是，在食堂排队打饭时，经常人们会发现当他付钱时（食堂均使用内部粮票和菜票），总会发现他会因缺一两分钱而向身后的同事们“借”，当然别人也会欣然借给他，因为任何人都会有钱没带够的情况。但殊不知，他与别人偶尔钱没带够不同，他的这种“借”乃大有“学问”。一是经常的“借”；二是，从来不还。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即若今天是向你借的，那明天肯定是和别人去借。但因一次的借用数量都不大，只是几分钱的事，所以谁也不会放在心上，过几天后也就忘记了。于是过些日子后，他又很自然地会向你再“借”钱，而你也因忘记他前次的钱还没还呢，又痛痛快快的借给他了。一再反复、周而复始地，他总能达到借钱不还的目的。但这种龌

蹊事还是让一位细心人发现了，只是不好意思公开说穿，而在下边用和私交打个招呼的方法，让其避免上当罢了。但每人都有私交，故日久后，几乎系里的人都知晓了。当初，我只觉得这只不过是贪小便宜的小事，但经过抓五一六后，我才认识到，从此事就可以看出他工于心计的政客嘴脸是无处不在的。

此人在地院文革运动中并非公开出头露面的人物，但却似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鬼魂。他极少在公开场合表露个人的观点、发表激昂慷慨的言论，至多也只是敲敲边鼓，说上几句起到引申他人观点或启发众人进一步思考的言辞。但在下面，他会各处走动，这听听、那看看，查看动静，掌握和了解下边的情绪和动向，必要时也会说上几句煽情的话。对此，过去只是幼稚地认为，这是他工作性质决定的，也是他开展工作，了解情况一种方式。当探工系教职工第一张大字报酝酿、讨论时，他的表现也是如此。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他是个军师角色，从不冲杀在前为人知晓。

经过文革，特别是经过抓“五一六”后，才让我看清，这是搞政治投机高手们一贯视为护身符的城府之术。采用这种方式，就可在复杂、纷乱的政治斗争的环境里应对自如，并保护自己。地院文革中后期大抓“五一六”，打击面之宽、所用手段之卑鄙、残酷，尽管与军宣队所执行的极左路线密不可分，但也与陆炎德从一开始就欲盖弥彰的伎俩，想借把水搅浑使他自己得以脱身有关。如军宣队在诱逼我交代时，就明确告诉我：陆炎德已经交待了，地院东方红、革委会和“五一六”就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你们大家都是五一六分子，谁也跑不掉。这里应当说明，此后我并未向陆炎德本人去证实此说法是否是他向军宣队交代的原话。但我敢肯定，即使我去向他求证，他也会断然地加以否认，此乃其政治品质之使然。但我深信不疑，“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样的话出自陆某的口是完全可能的，他有那种想象力和智慧，正因此，他才获得了军师的美誉嘛！殊不知，正是这句话，害了多少地院的教职工和当年的小将们！当然，公平地讲，没有这句话，军宣队按中央抓五一六的指示，把文革初期的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分子也是必然的，只不过“两块牌子”论更能为中央要抓造反派提供了一块绝佳的遮羞布罢了。估计正是因为陆某人有提供遮羞布之功，故不仅在运动中并未受什么大罪，甚而运动后期还得已调离学校，通过政审娶到了一位部队高干王××（54年授衔时的将军，据说当时恰为武汉军区的高层领导）的女儿为妻，当上了部队高

干的乘龙快婿。

当我1972年11月回京后，陆曾两次找过我（一次是到眷三楼我家里；第二次是在北校门门口，看样子是有意在等我），想跟我解释点什么。但基于我对他的认识，两次我均回绝了他，而且在北校门处，我甚至说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今后老死也不再与你往来！此后他也就没有再找过我。如今他早已作古，再说这些显得自己似乎不很厚道，也无意义，但我内心中留下的心结真的很难释然。所以在八十年代后期，听说《中国青年报》（或《中国青年》）曾在一篇报道中，以正面形象报道过他与其第二位夫人的事迹，鼓噪让人们学习。此事发生后，原我系白明义老师曾找我，说要写信向上级有关部门揭发他。当时我对白说：现在我非常忙，确实没有时间，而且我也不想参与此事。但我可以告诉你，谁和这种人搅合在一起，都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听后，白老师没有勉强我，但事后他是否写了揭发信我就不得而知了。

后记

我在地院文革中的回忆到此就写完了，尽管我自己费了很大力气，但限于水平，我知道很难表述得比较完美，相关的分析也很难说全面、正确。但就个人知道的事实和内心情感的述说而言，我可以坦诚地说是真实的。同时，我还想说，这段历史的回忆，在我是经历了极大的情感冲击的，有一段时间真有点写不下去的感觉。但面对很多人的支持、鼓励、关心和帮助，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终于坚持下来，完成了自己的承诺。

因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文革参与者，涉及到的重大事件极少，涉及的内幕及几乎没有，所以全文对揭示历史真相所能起到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但我毕竟目睹了文革十年血淋淋的历史，而且自身也深受其害，所以我对文革给人们带来的灾难的感受，对众多希望了解文革漠视人权、践踏人权、让人们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甚至亡命他乡的悲剧的真实性，可能会有所助益。若能有此效果，则可达到警醒人们的作用，这样，我的心愿也就达到了。

在此，我要再次感谢陶世龙老师对我的鼓励，感谢蔡新平、孟凡华、朱德瑜等同志对我的支持。还要感谢吴迪老师在我茫然之际，指点我先把想写的事写出来，再对写出来的这些事进行梳理并成文的方法，从而使 I 迈出了苦熬月

余无从下笔的窘境。

当然，我最该感谢的是我的爱妻，即使在她患病阶段，仍全力担起了整个家务，给我尽可能多的时间，好让我能安心去思考和写作。同时，她还是这份回忆的第一位读者和文稿的校对者。读后，她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此外，她口述了在我被隔离审查期间，她所经历过的艰苦岁月，为我的回忆平添了重要一章。可以说没有她的这份辛劳和支持（她坦诚的说，这是孟凡华在下边私下里对她的要求。她答应了，就得做到），我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兑现自己对陶老师和众多“小将”们的承诺呢？！总之，我是欠她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只希望今后我能还清这笔欠债，以求心安！

完稿于 2016. 4. 26. 夜

编者按：

宋翔雁 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教师

地质学院里的文化大革命

唐振权

1966 年 3 月我们就出队了，我带着五年级的学生，到内蒙杭锦后旗冶金部的 405 地质队，进行毕业实习。矿山探区是在黄河河套以北，大青山以南的山区丘陵地带。队部驻地在富饶的河套旁边。队上的生活还比较好，因为靠近农区，食物供应都很便宜。队上给我们提供了一顶大帐篷，我们全都住下了。

我们学生在进行了一段现场生产劳动实习之后，进入了收集专题资料阶段。这时候从报纸、广播传来了闹闹腾腾的大批判的信息，声势浩大地批判“三家村”、《北京夜话》、《海瑞罢官》。报纸上还发表了林彪请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时轰轰烈烈的舆论攻势拉开了，像是要展开一场新的斗争运动。我们也赶紧组织学生学习讨论，完全搅乱了学生实习的心情。紧接着宣传机构公布了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北京各个高等学校里像炸开了锅，沸腾起来了，纷纷向本校的党委开炮，掀起了群众运动的高潮。所有的学校也都自动停课。我们也接到系里的电报，立即停止实习，回到北京。这个时候，5 月 16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通知》，制订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十年大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这个时刻开始了。

回到北京进校一看，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什么声讨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砸烂封、资。修的教学制度，高校排挤工农兵学生，学校里学了许多没有用的东西，学制太长，要抛弃苏修的教育模式……等等。但是直接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倒不是很多。给老师们也贴了不少的大字报。更多的是直指教授们，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这时候各系各班的学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有什么风雷战斗队、打狗队、横扫牛鬼蛇神战斗队……，其中最大的是“东方红”战斗队。它是联络了几个系和不同年级的学生建立的红卫兵组织。6 月 20 日由“东方红”挑头，还有部分教师和干部搞了一个小有声势的游

行，控诉院领导不公平的对待一个处级工农干部，为这个干部鸣不平，闹闹哄哄展示了这个干部的清平生活。的确这老个干部比起其他同级的老干部，廉洁奉公的多，生活非常简朴。这个事闹得很有影响，沸沸扬扬。后来把这个定成了“六·二〇”事件。

学校里乱哄哄给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戴高帽子游街；把“反动学术权威”（其实多数是教授），“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所有的院级领导）集中劳动改造；动手打骂所谓的“牛鬼蛇神”和家属当中的受管制分子；有工人赤卫队到教授家里任意抄家，把教授从教授住宅里驱赶到小黑屋里，抢占他们的住房。

高校的局面越来越难以控制，新北京市委汇报到了中央。刘少奇决定向各高校派出工作组，控制住混乱的局面，整顿学校里的秩序。进校的工作组这在后来被称作刘少奇的灭火队，把烧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给扑灭了。这个烈火实际上是江青、康生那条线上派出的人偷偷跑到高校里煽起来的。跑来我们学校里来的就有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她直接联系的是我们系里的一个政治辅导员叫王大来。后来工作组在批判王大来时说，“你王大来！王大来！是大有来头”，他们确实不知道，其来头之大，是他们想象不到的。（编者注：此说法有误）

毛泽东这个时候呆在武汉，还畅游长江，看着北京的局势任其发展。刘少奇派工作组他也不表态。我们学校里来的工作组是地质部何长工第一副部长（李四光是部长），派出的由一个副部长邹家尤带队。几百个工作组成员分配到各系、各班、各科室都有，首先把挑头的老师、干部和学生都管制起来，重点打击的是“东方红”组织。工作组首先把党委书记王焕扶起来抓好日常工作，把瘫痪的各级党的组织启动起来，发挥党员作用。首先把矛头指向院长高元贵，把他定成为走资派，号召全院师生员工揭发批判高元贵。高元贵在师生中是有很高威信的，学生们并不买账。这和北大清华不完全一样，那里是学生和教师在运动开始时，集中炮轰校党委和校长。地院到没有炮轰院党委和院长，而工作组却是千方百计的想抓出高元贵的罪行，欲置高元贵于死地。但是事与愿违，工作组没有抓到高元贵的任何实质内容，更无从抓到学生和教师、干部的“反党、反革命”的言行（这一点和北大清华大不一样）。工作组接着就是重点调查，整材料，组织批斗那些带头闹事的，学生组织的头头和教师、干部。工作组打的是“反干扰、反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对组织“六·二〇”游

行的学生和干部，成了重点的批斗对象。大会小会批斗那些定性为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教师和干部。工作组共整理了几大箱“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后来被中央文革强令从地质部交了出来。工作组组员被群众追问，说这些人都是要被处理，送去劳改和劳教的，与极右分子同等对待。而对那些迫害教授的所谓“造反者”却任之不管，对受群众尊敬的院领导却不予解放，只是忙于对“反革命”学生和教师、干部进行批斗。激烈残酷的批斗大约持续了 20 余天。这后来被毛泽东斥责为反动黑暗的 20 天，并声言：“镇压学生的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把那场镇压行动，算到了刘少奇的头上。刘少奇（他要求人人应当中做党的驯服工具）是活该倒霉，其实所有的专制者，对不驯服，违抗秩序的闹事者都不心慈手软。

正在工作队有条不紊的组织批斗，“引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回到了北京，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革命群众。在我们这个制度里，最上面的决定从来都是一级一级传达下来。唯独这次毛泽东的这一手，让各级官员意想不到，一下子懵了，不知所措。这一下一个大翻个，工作组一个晚上从审判官坐到了被告席上。工作组长首先溜之大吉，工作组组员们群龙无首，龟缩起来。紧接着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撤销向高等学校派工作组》，至此工作组成员们各自回到原单位，垂头丧气灰溜溜地走了。

“东方红”组织的学生们却是不依不饶，向地质部要求让工作组长邹家尤回地质学院接受，地院革命师生的批判，但是邹家尤躲着不见，于是“东方红”发动更多的学生到地质部大院里静坐。邹家尤还是不出面，坚持了大约十天，直到毛泽东点了何长工的名，把他列入了刘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当中，邹家尤失去了靠山，老老实实跟随着“东方红”的学生们回到了地质学院。

把邹家尤弄到地质学院，没人批判他，更没有批斗，只是叫个工人看着他，关在了小屋里，似乎就是煞煞他这个副部长的威风，让他闭门思过。到了 9 月份，学生们都纷纷出去到校外煽风点火，或是出外大串联。也没有人顾及到这个邹家尤，于是派个车把他送回家去了。地质“东方红”在地质部大院静坐了十天，赢得了声誉，名声大噪，在高校的红卫兵组织里排到了前位，成了经常被召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接见的学生红卫兵组织之一。

“东方红”取得了斗争的胜利，那些各种名称的红卫兵战斗队都合并到了“东方红”，正式定名为“东方红公社”，教师里的“红教联”，干部里的“红干联”。工人中的“工人赤卫队”，也都合并到“东方红公社”里，“东方红”在地质学院里一统天下。“东方红公社”的领导人，经过推荐公选产生了领导机构，负责的头头是朱成昭，其次是王大宾、蔡新平、聂树人等。“地质东方红”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不断扩大，由“地质东方红”牵头联合了一些其他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中学生先成立有第一、第二司令部），“地质东方红”派去了一个常驻的联络员叫周永璋，被人们误认为司令，他也哼哼哈哈默认，被“东方红”撤了回来。实际上“三司”只是一块牌子，没有什么作用。应该朱成昭是司令，但是他自己不承认，也从不去过问“三司”的事，也不过问“东方红”的事物。这时候他已经走向反面，暗中反对起中央文革。

此时的地质“东方红公社”与“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兵团”、北航“红旗兵团”、师大“井冈山兵团”，成为北京赫赫有名的五大红卫兵组织，其中，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在其本校里都是唯一的红卫兵组织。而清华、北大、师大里都有对立派别，原本受压制、受打击时，都是一致的造反红卫兵；后来某些观点不一致，始终没有能够联合起来，倒是从统一的组织里分裂出来新派别。北航虽然只是一个组织，但是职工并没有参与，北航红旗也只是学生团体的组织。地质东方红却是大量的教师、干部、和工人都参加到里头了，形成了一个代替了原来行政机构的、全校性的权力组织。特别是各级的后勤管理部门，从处、科、室到下面的工人的班组，都是“东方红”，保持了原来的管理系统，维持了正常的运作。尤其是财务部门严格地遵守国家的规定，控制着各项经费支出，任何学生的头头都无权去支出现金，都必须通过原来各级行政领导签字和批准才能借款和报销。整个学校都是井井有序的，环境卫生也保持着良好。表明着学校里面没有混乱，没有纷争，职工们也都是正常的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到 1967 年底北京高校红卫兵渐渐地分为两大派，一个是以北航红旗为首的称之为天派，一个是以地质东方红为首的称之为地派。天派观点比较激进一些，地派观点则温和一些。这也有背景上的原因，北航红旗头头多是低年级的学生，背后又没有教师和干部，做事偏激。地院就不一样，头头多是四年级、五年级的学生，背后又有干部教师把握，做事就稳妥一些。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质

东方红和北航红旗，都同样接受了“中央文革”联络员们的暗示和唆使，派出人员到成都去抓彭德怀，地质先找到了彭德怀，派去的王大来直接接触了彭还谈了话，倾听了彭的诉说，他说他不反对毛主席，王大来向总部汇报，立即请示了“中央文革”，被大骂右倾。“中央文革”又责成北航红旗去抓彭。地质东方红先下手秘密把彭德怀带到北京。夜间到北京后，严格保密不向外透露一点消息，不许监护人员对彭有丝毫伤害，保护彭德怀的人身安全。第二天一早就移交北京卫戍区，由卫戍区接走。北航红旗不依不饶向“中央文革”要求批斗彭德怀，“中央文革”居然批准北航要求，指示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共同组织批斗，批斗在北航大操场进行。地质东方红没有派任何人参加，成了北航红旗单独批斗彭德怀。在批斗中北航学生使用了强暴手段，彭德怀倔强，不承认反党反毛主席，北航红旗头头韩爱晶（他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带头动手打了彭德怀。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以后成了韩爱晶判刑的一条主要的罪行。

北航红旗在许多方面与地质东方红，观点不一样，做法也迥异。例如在支持文艺界的“造反”行动方面，他们就支持以打倒“三名三高”为口号的的低层人员为主体的一派，当然这派人多。三名三高则是名演员、名流、名人，高工资、高级别、高地位的少数人。实际上他们也是受压制、常挨整、常受批的演艺、创作、编导人员。东方红并不是要支持他们，但是不认为他们是打击对象。这些人在文革中更是受到迫害，甚至有的跑到地质学院里来寻求保护。例如，总政文工团以马玉涛、马国光为首的《长征组歌》全体演职员，来地质学院演出《长征组歌》，慰问地质东方红，感谢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也是少数派。北影谢芳更是因为演过受批判的电影，再次受到打击，地质东方红的学生把她秘密转移保护起来。北航支持的七机部“915”，地质支持的“916”就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915”是以庞大的工人为主体的一派，而“916”则是以技术人员为主体的一派。在单位里搞文革运动，各自观点绝对是不一致的。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各单位里的的“革命派”，都或多或少表现出“天”派“地”派的特点，一派激进一些，一派温和一些。尤其在几个名牌大学里更是突出，北大、清华、师大、人大里的两派对立、斗争很厉害，校园里双方的广播大喇叭大喊大骂，两派人员相见就像斗鸡一样互相攻击，各执一词，逐渐发展走向武斗。到了 1967 年 1 月上海一月风暴，刺激了这些学校的主流派，想使用强力手段控

制局面，但是上面（中央文革、北京新市委）不支持他们那样做，强调还是要联合。时至 3 月，到处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没有派别斗争的学校顺利地建立起革委会。北大、清华、师大等控制学校的主流派也强行成立了革委会，但是对立面仍然坚持地对抗着。革委会里倒也给对立面留有席位，暂时的稍微消停了一段时间，进入了夏季，激烈的战斗又爆发了，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武斗。

1967 年 3 月中为了庆祝院革命委员成立，“东方红”号召了全校的师生员工，约有两、三千人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游行式的庆祝活动。游行的途中不断地有“东方红”的支持者，推着自行车或是步行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进城之后加入了中央民委和中央民族乐团的人。令人感动的是，胡松华真实地站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前，唱起了他在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里的成名曲《赞歌》。“东方红”广播车里拉出了麦克风，胡松华在麦克风前没有伴奏的条件下，一串高亢婉转蒙古长调的引导之后，唱起了：“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立刻引起广场上、长安街上骑车人和行人注意起来。最初人们并不太相信真的是胡松华在这里唱，但是看到了的确是胡松华，又有身旁其他人传递信息，就都停下脚步围观起来。我想胡松华也是难得大白天在天安门，实地唱起他的最衷爱最动人的颂歌，不禁心潮澎湃；也可能是因为“三名三高”受挤兑，对“东方红”的支持使压抑已久的情感突然释放；或许是看到群众的热情和爱戴，令他激动自豪。他似乎是真正发自内心，唱得无比激动，可以感觉出来他特别动情。曲终人们爆发出热烈地掌声，甚至有尖叫和欢呼。像是对大家的谢意，他回场又重复地唱了一段。这个庆祝活动别的讲话什么的，我都完全忘记了，唯独这一幕深深刻在我脑海里。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人们是傻子吃饱了撑的，还是文革煽动起来的狂热，还是因为打压以后的突然自由放松，并没有人驱赶和强迫，人们从地质学院花两个多小时步行 20 多里路来到天安门。这以后在军宣队进校，庆祝毛主席发表什么“最新指示”时，也搞游行，那好像并不怎么自愿。再后来，1969 年国庆 20 周年，我和我周围的人，完全没有热情报名参加去天安门的游行。

新组建的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基本上是“东方红公社”的班底，但是三结合解放了的院级领导，有院长高元贵，党委书记王焕。地质学院虽然是“东方红”一派独统，但是“东方红”本身也非铁板一块，仍然是派中有派，被称之为“二

团”的就是一批更讲究政策，更注意策略的稳健派，以有头脑的政工干部为核心，学生也多是党员干部，这些人的主心骨就是院长高元贵，和团委书记安静中，这些政工和领导干部，确实在院革委会和“东方红”总部里，起到重要的平衡和把舵的作用。“东方红”里还有一批激进派，这是一批最初造反的人，为首的是朱成昭，而这一批人随着朱成昭垮掉，分崩离析不成气候，在革委会里和“东方红”总部里都没有了席位。

地质“东方红”最开始的造反的学生头头朱成昭垮掉，和大多数造反红卫兵垮掉是相同的。朱成昭也是一个高干子弟出身，他的家庭不在北京，官职也不是很高，但是有着高干子女所共有的通性——狂妄自大，桀骜不驯。文化大革命从中学到大学最早造反的主要是这些高干子女。朱成昭后来与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头头叶向真搞到一起，更是知道了许多中央的内幕，特别是江青的一些所作所为。叶向真是叶剑英的女儿，从小在江青的身边长大，对江青是了如指掌的。朱成昭在知道了一些中央的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事情之后，彻底动摇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信念。还纠集了身边的少数人，悄然反起了中央文革。不再过问“东方红”的事情，不再参加任何召见和会议。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最后和叶向真一起逃到了云南，由公安部派了一个副部长抓回来，送进了监狱。叶向真自然是送回家看管起来。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联动”和“西纠”，基本都是高干子女组成，也都是同样的下场，被宣布为反动组织取缔。正是那样，被请出来打鬼的钟馗，最后也是被当作恶鬼，从阎王殿里清除了出去，只能在民间打鬼。这是 1967 年初，“二月逆流”之后，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大的变化。席卷了一大批的“走资派”被靠边站，挂了起来，更有不少人成了“叛徒、特务、工贼”坐了大牢。保爹保妈派的红卫兵也都成了反革命，毛泽东是否想到文化大革命是这样一个结局。打鬼打出了如此多的鬼，文化大革命将是如何收场？

院革委会的第一把手自然是学生首领，是朱成昭的继任者王大宾。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他是个默默无闻的人，既不是造反的领军人物，也没有受过任何打击和压制，只因为他出身特别贫苦，四川山区里的一个放牛娃，四乡八里唯一一个考上北京的大学的孩子，人并不机灵聪慧，而是非常刻苦用功，只顾学习连班干部都不是。为人非常坦诚老实朴素无华，寡言少语不善言辞，待人随和没有心计。他只是红卫兵的一个小卒，在系里的各战斗队联合起来的推选中，担当

起一个小头目，后来全院红卫兵的大联合，又被推上了总部一级。朱成昭垮台以后，许多人更主要是干部和老师，把他怂恿着坐上了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交椅。也是被中央文革、北京新市委召见的地院第一人。成为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其他的四人是：北大“新北大公社”聂元梓、清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北航“红旗兵团”韩爱晶、北师大“井冈山兵团”谭厚兰。聂元梓不是学生红卫兵，是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一个半老徐娘的官太太。只因为她是被毛泽东钦定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第一署名人，这张大字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浪潮。

五个红卫兵领袖，聂元梓有着深刻背景受康生指使，写出了反对北大校长陆平的大字报，算是文化大革命造反第一人；蒯大富能说会写，清华挑头反校党委，被刘少奇工作组打成头号反革命分子；谭厚兰敢想敢干带头造学校党委反，又把矛头直指冲击了高教部，当然是没跑的反革命；韩爱晶更是愣头青，横冲直闯造反，在有国防机密的高校里，绝逃不了镇压的命运。应该说他们四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拼杀出来的勇士，当之无愧的造反英雄。而唯独地院的王大宾，是在地质学院已经是造反派“东方红”掌权之后，他本身并没有造反拼杀，遭受打击镇压，是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的地位。他确实不是英雄式的人物，也不具备领导的魄力（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任何大小领导），他被推到高位的时候，他拒绝过，不敢担当。支持他的人表示绝对保驾，他也是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在一些很有能力的老师和干部的辅佐下，把地质学院的管理做得很好。他自知自己的分量，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品德，从不狂妄自大，他特别尊重高元贵，要求车队一定按时用轿车接送高元贵上下班，而他自己被召见开会，只坐吉普车。他是以身作则，保持自己仍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在生活上严格律己，不像有的学校传云：“走了老爷，来了少爷”。这就是地质学院能在 1967 年那样混乱的年代里，仍然安定平稳的关键所在。地质学院的全体红卫兵，都保持着地质学院的优良校风。这种“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传统影响了几代的地院人，温家宝总理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1967 年尽管地质学院内风平浪静，井井有序，但是社会上的武斗和纷争却是愈演愈烈。七机部“915”“916”两派武斗有打死人的，惊动京城老百姓。有的工厂因为武斗造成停产，例如纺织系统一个工厂少数派被打出工厂，裹挟了当

权派跑到地质学院，地院的人出面调解才回厂。文艺团体例如北京京剧团，多数派把少数派打出剧团，四处逃散，不少跑到各大学里。就是中央国家，也出现混乱情况，例如外交部激进派就在处理外交关系上造成恶劣影响。大学里的武斗最激烈的是北大、清华、人大，武斗是花样别致，简直是创新。北大学生在所控制的楼房顶上安置了大弹弓，用自行车胎绑在固定起来的铁架上，把石块和砖头弹射到对方控制的楼房。人大学生在大操场摆开架势械斗，一方佯装退却，却在地上撒下豆子，进攻方冲过来踩在豆子上，摔得前仰后合，退到一旁的一方哈哈大笑，真是像儿戏一样。清华不愧是理工科大学，把汽车四周焊上铁板像是坦克，开在校园里高音喇叭叫喊着，耀武扬威地向对方示威，任你用砖头砸还是用棍棒打。不过大学里不管怎么胡折腾搞武斗，没有听说有重伤和死人的。大学生们绝对不那么愚蠢，毕竟头脑尚不糊涂，低头不见抬头见，打斗完毕回头还在一个食堂用餐吃饭。敌人呼？同学呼？说不清楚。

武斗严重的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例如河北、广西、云南，武斗的双方都有军队插手，表面上是武斗双方抢了军队的军械库，实际上是变相地发枪。武斗升级动用了枪炮子弹，形成割据，几乎是要发展成为内战。中央不是不知道，最初还是任其发展，不管不问。那些上面的人心里清楚，孙猴子不论怎么折腾，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到了 1967 年 7 月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放得差不多了，中央喉舌放出了舆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八月一日那天，又是大力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接着不久中央就发出通知，要向全国各级学校派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传队”，同时还要对重要工矿企业和国家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至此，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大开大放，戛然截至。不论什么造反派、革命派，此时起，都要循规蹈矩接受管制，老老实实起来。1967 年 7 月底，首先被派进“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是清华大学。

“军宣队”是 8341 部队（中央警卫师），带队的是迟群、谢静宜。这两人他们后来都是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立即宣布各项纪律，所有人员各回各的原班级和原单位。我们学校的“东方红”就有所准备了，首先他们清理了一年多来的，各种宣传材料和所谓的“文件”。院革委会也开了最后的会议，都预感着灾难即将降临了。

地质学院进驻“工宣队”和“军宣队”已是 8 月下旬了，几乎比清华晚了一个月，这时候的北京高校都进驻了宣传队，是北京市委的统一部署。后来就连中小学也派进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地质学院可能是重点户，“军宣队”是由空军政治学院选派来的，当然在政治力量上是特别加强的。带队的总指挥是空军学院的一个副政委。队员全部是年青的学院政工干部，有少数的老的有系主任，甚至将军级别的，但只是普通队员，据说也是靠边站，跟着来受教育的。“工宣队”是公安部一个制作警具手铐什么的小厂，队员里连车间主任的级别都没有，都是工人，队长只是一个稍老的木工师傅，说话磕磕巴巴，语句不清，文化程度很低。所谓“工宣队”宣传不了什么，只是陪绑。而“军宣队”是真正的全面接管权力的统治者，什么毛泽东思想宣传？瞎扯！就是实行军管，就是要挥舞大棒，整治！所有这一切又是来自最高指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宣传队进校以后，开始似乎按兵不动，没有多少动静，实际上是在调查情况，摸查排队，组织力量。党员又重新被启动，当然那些曾为“东方红”竭力效劳的除外。我回忆宣传队来校之后，所采取的行动，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调查情况，座谈访问，摸底排队，组织基本的依靠对象。第二阶段就是查文化大革命中每人的态度表现，自我交代，背靠背揭发，把文化大革命时，有反动言论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分子挖出来。第三阶段是清理阶级队伍，内查外调，上查三代，下查所有社会关系，把混入革命队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来。第四阶段是“斗私批修”，自我剖析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检查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度，灵魂深处闹革命。而清查和清理中并没有把揪斗走资派和反动权威，冲击、造反、砸烂党委当作问题；甚至是打、砸、抢，等恶劣的暴行不追查、不追究；对制造混乱，浑水摸鱼的“造反”根本不管不问，不理会。看来还是以保护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任务，防止这些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干扰和破坏。这个宣传队绝对是，坚持执行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既定方针。只不过是改变了方式方法，不是再依靠造反学生，推动文化大革命，而是动用军队保证运动的进行。要从疾风暴雨的运动，转化为深入细致地推进“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使命，完成“防修反修”的大业。

这个由军队政治学院基层政工干部组成的宣传队，实际是工作队，确实有一套整人治人的办法，把管军人的那一套来对付知识分子们。他们分别找每一个人

谈话，让你谈自己也谈别人，他们分析捋顺人物间关系，再定性小集团，背靠背揭发，挖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言论。使多年的老朋友老同学反目，甚至使夫妻分裂。达到挖出反文革、反群众运动分子，找到批判对象。他们把学生和老师混合编班一起学习，利用学生去整治老师，因为学生大部分是出身好，阶级立场鲜明，动员学生帮助老师挖阶级根源，批判老师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强调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大力批判只抓业务不问政治的修正主义倾向（这些林彪的忠实门徒，正是在部队里大搞批判“军事挂帅”而升起的少壮派）。

这些宣传队员们，也是推行林彪形式主义的急先锋。除了每天必须进行早请示晚汇报，朗读语录，背诵“老三篇”之外，还要每人表忠心，绣忠字旗幅，做忠字礼品。另外在办公室里，教室里贴挂满了“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三忠于”“四无限”的标语口号，（永远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崇拜、热爱、信仰、忠诚）；还有“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等长条横幅。把广场上、马路上的文革政治气氛，全部都转移到了室内，让你一抬头，就映入眼帘里。

从 1967 年 9 月到 1968 年底，军宣队把学校老师和干部们折腾个够，已经再没有什么花样了。学生除了 69、70 两届的还留在了学校，毕业打发了三届的学生。1969 年新学年之后，部分专业课教师带着 69、70 的学生，组成教改小分队出野外、下矿山，进行现场教学。各教改小分队还跟随的有“军宣队”“工宣队”的人员，他们实际体验了一下地质工作的野外生活。年轻的宣传队员们，在野外跑不过五十多岁的老教授。下矿井、下机台，干着劳累的生产作业，带实习的老师们，还要频频地照顾他们。这些跟着野外教学的宣传队员，亲身经历了地质、矿山的艰辛和劳累，改变了对地质学院知识分子的看法。地质学院的教师不是象牙宝塔里的贵族。

1969 年“军宣队”、“工宣队”撤走了不少人，从上面传下来指示：高等学校、研究单位、部分中央机关，都要外迁搬离北京，学院、地质部联合派人出去选址。同时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教师干部职员们要到“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我们系加部分勘探系的教师干部自组勘探队，带领未毕业的学生，钻探找矿。地质学院的全部教职员，1969 年底

就被分配、调遣，各自准备奔赴所划定的去向。我被圈定去干校，为备战疏散，动员全家一起走，不留下任何物品离开北京。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似乎还在“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而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却已告一段落。当然，学校迁出北京，去干校接受教育，自办勘探队，都是在贯彻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总战略。地质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仍在进行中。

（《记忆》编者注：此文选自唐振权先生的《拾珠串链——我的记忆碎片的整理》2012年，自印书）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5年12月15日《记忆》第145期，文中有些事实与其他人的回忆录有差异，请读者慎用。）

编者按：

唐振权 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教师

文革回忆录（提纲）

钱佩娟

说 明

我作为地院文革的局外人，从记忆中捞出些历史事实，我家几经搬迁，销毁了文字记载，现已无文字记载可查，全凭追忆，内容是确定的，就是事件发生的时间无可查证了。

追忆人：钱佩娟

2015年7月13日

（编者注：钱佩娟老师系江祖如老师的夫人，北京市地质局职工）

一、李纳来地院干什么？

当时文革的形势是北京造反派压垮了保守派，造反派掌了权，但造反派内部又分裂成两派，各自成立组织，唯独地院内部分歧很大，形成朱派、蔡派，均属东方红。朱派是掌大权的，蔡派没从组织上分裂出去。蔡派即二团（以周永璋为首的620革命造反兵团4人，以蔡新平为首的红色革命造反兵团4人）当时因蔡派没拉队伍另成立组织，不知道有多少人，实际上支持蔡派的人很多很多。

李纳来地院找二团，地点在教五楼东北角二团的办公室，鼓动二团拉队伍，从东方红分出去另成立组织，李纳为此事而来。

二团某日晚上在我们家讨论决定：不拉队伍，与主权派在内部斗争，一直坚持到最后。

我作为局外人来看，从当时来讲，蔡派做这决定是了不起的，拉队伍由李纳支持，不拉队伍与当时形势相悖的，在北京独一无二，在全国也许也属少数。某日在市党校召开两派辩论会上，二团只有8个人，江青也不相信蔡派只有8个人，能量这么大。

实际上地院支持蔡派的不属少数也，现写文革史，要坚持实事求是，回顾历史真相，不是挣谁对谁错，对与错，历史自有评述。

二、地院革委会成立后镇压蔡派

1，抓周永璋

地院革委会的某些人，主要是聂树人，他诬陷周永璋是“516”，他在学校发现周永璋后，亲自布置人把周永璋突然抓起来，为掩人耳目，先把周永璋转移到钢院，为了不让周听出审问他的人是谁，给周永璋戴头套，在周的耳朵中灌了浆糊，这是很残酷的做法，影响了周的听力。后又把周永璋转移到市三中（平安里租家街）。某日晚上，殷维侯用自行车带我，我坐在车后架上，满城转，找不到周永璋。我当晚去地矿部借用红线电话给周总理办公室打了电话，周永璋是三司最早的负责人，陪同中央领导参加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周总理很了解他（有照片为证）。总理办公室的人说：知道了，赶快找到他。后来是由谢富治打电话要聂树人放人。

2，抓江祖如、抄我家

以反革委会名义批斗江祖如，并借此机会把江祖如关押在物探系学生宿舍（学13楼）。我是北京市地质局的职工，每天下班回来，都给江祖如同志送去一封信和一盒烟及其他物品。关押老江数日后，要求专案组让老江给我回信，收到我的东西没有，怕你们贪污了。他们让老江写了回信，信经过检查后交给我。老江在信上写了，有一次上厕所大便时间长些，他们以为老江逃跑了，满楼喊：“江祖如逃跑了”。老江在厕所大声喊：“我在厕所呢”！我听后哈哈大笑，他们认为老江的信出了他们洋相，专案组的人回宿舍打了老江两个耳光。

关了老江32天，我写了32封信送32盒好烟，我不支持老江抽烟，平时从不给他买烟，关押他时每天供他一盒好烟。

那时，像搞地下工作时的，老江为了解外面情况，曾二次在夜里光着脚（穿着鞋怕声大）偷偷跑回家问情况（当时我住东4楼203室）

老江离开专案组关押地点后，去三院做了腿部脂肪瘤手术，当他出院时，地院革委会大搜铺又开始了，他们到我家，要江祖如回专案组去取被子，我觉得不

怀好意，又要抓他了，我说他刚手术，又发烧他不能去，我去取，他们说不行，我说：“我们家的事，我说了算！”我跟他们去取被子，专案组负责人（物探系学生）说，你不能取，我问为什么？他说有阶级性，我又哈哈大笑，骂他无知。他说话时手指指点点，指到我鼻子上，我借机大喊，打人了，他还是指指点点，我等他没指到我鼻子上就打他个反掌，两人打起来了，其他同学把我劝拉到旁边房间，说不理他，我们替你把被子拿来，我说不能少一样，我把东西拿回家了。当时我处在他们专案组的包围之中，但专案组长没得到学生的帮助，说明他在学生中是孤立的。

事后听说，他们学生讲：江祖如的老婆真厉害。

我家被抄了，所有东西翻个底朝天（有照片为证），什么也没抄到。



抄家照片

3，抓孙司权

抓了孙司权关押在北翼楼，这些打手真下得了手。孙司权被打得很惨，脱光衣服，仅穿条小裤衩，用皮带卷起来抽，满身是马蹄形皮带伤痕。余久芗用响亮的歌声在楼下唱给孙司权听，让他知道同学们在支持他。后不久余久芗也被关到北翼楼了。

4，抓殷维侯、余久芗；救殷维侯、余久芗；

5，抓安静中、郑伯让；

6，剥夺蔡派人士的基本生活权利

地院革委会领导人打压蔡派人士是够狠的，不给学生发粮票，不发给助学金，不准进校园，把蔡派的主要人生打出学校，他们只能到北大找同盟，住在北大28楼教室里（从西南门进去，路西即是）我从经济上，粮票给予援助是应该的，当时把家里所有粮票都找出来，连一两2两的票也送过去。我不是地院职工，利用我合法身份，下班后三天两头去北大见他们通通情况，别的还能做什么呢？！

三、迁校

1，江祖如同志对待迁校问题的态度

他是不同意迁校的，但后来大势已去。他也认为一定要迁，那就快迁。

当时以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有三条（实际是李先念的批示）。

1. 院党委主要领导煽动群从回京闹事……。

2.

3. 全校职工立即返校（指回武汉地院）复课闹革命……

这批示传达后，马路上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反对批示，反对迁校情绪更严重。

当时党组书记王焕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各系部门总支书记参加。谈及批示后江祖如同志发言：地矿部党组、湖北省委宣传部、地院党组最了解地院情况，你们应如实向国务院汇报，如仍坚持这三条以后再传达也不晚。本来群众反对迁校，现情绪本来已稳定了。这三条不符合地院情况，传达了反而影响迁校----。王焕书记当即说：江祖如反对国务院领导。参会的同志为江祖如同志辩护，驳斥王焕。

这就种下了江祖如同志反迁校的罪名。

2，迁校问题批高元贵、江祖如

湖北省宣传部来文：立即在全院批判高元贵、江祖如，但是地院对高元贵、江祖如批不起来，湖北省委急了，再来文：勒令江祖如带户口、油粮关系来湖北检查。

这时我上阵了，人可以去，因老江是共产党员，服从组织决定。你们有整人的本领，户口卡派出所还有一张，有本事你们尽管去取，要从我手里拿走户口本，没门！你们可以到我单位告我，了不起我陪江祖如一起挨整。另外，你们学校如果能够做到二条：一条是总支书记以上干部的户口统统迁去湖北，二条是单身职工（一方非地院职工）的户口统统迁去湖北，我就会把户口卡交给你们。

当时河南地区水灾（1975年），学校拿来火车票到系里，当即让老江就走，被系里人事干部王葆玉同志截留了，说他爱人在城里上班，得他们见一面再走，第二次拿来火车票要从襄樊走，车上人挤得厕所难上，又是王葆玉同志推迟了，说老江有严重胃病不适合走。第三次是拿来飞机票才走的。整人总有机会，老江去武汉后没整出名堂。掀起农业学大寨后，又派老江去房县学大寨，是湖北最苦的地方，老江与那里的农民关系极好。

3，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当官

1975年学校第一批大规模迁校，我去火车站送老师，马杏垣老师见了我，告诉我，原定校党委要补充5人进班子，其中有江祖如，进党组后任党组副书记，现说他反迁校就除名了，可惜了。我毫不犹豫的说：马老师，一个人入党是为了真理，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了当官，谢谢马老师的关心。

4，顶了朱久思

学校物探系一位老师（记不得名字了，可能是斗批改的）他与朱九思部长说得上话，他找朱部长说：你们不应整江祖如同志，他是好同志。朱说：只要江祖如同志认个错，还可以进党委嘛！朱九思部长找江祖如谈话，问江：“有两个同志在我面前，一个听我的话，一个老反对，你说我应该用哪一个？”老江直言回

答：“那个老反对你的，看他反对什么，反对你的错事，就是好同志，应用这个同志”，老江这个湖南犟牛，这种回答，朱九思能喜欢他吗！？

5， 调回北京

学校复课后，老江又任党总支副书记（全院各系和部门都是副职），我要求老江调回北京。我去武汉后对院党委正副书记、正副院长都谈了，说明要调走的原因，并申明就找一次谈个透，有领导有病在家养病就去家里谈。领导动员我调到武汉地院，我说肯定不去，当时去干校住茅屋是我主动去的，现在武汉高楼大厦我不能来。前些年我单位要我调你院，你们拒绝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彭书记说：我们要任命江祖如同志为正书记（其他系都是副职）我也把话说绝了：“把老江调回北京看门扫地也不要他在你们这里当书记！没商量的余地。”最后还是调回了北京研究生部。

四、江祖如在北京研究生部期间

1，任党委宣传部长

当时全国形势搞批清运动（抓“516”）没谈话，不明不白不让工作了，调***同志去接了老江的宣传部长的位置，一呆就是三年多。

(1) 80年代初，国家人事局发来调令，要求11月15日前去报到，学校卡住了不让走，不开信。当时我们太正统了，不开信就走不了，实际上拿了人事局通知去报到就可以。人事局也说哪怕你们年底来报到也可以的，都算是今年的指标。

(2) 老江找当时组织部长顾**说我到底什么问题，是不是三种人免我职？顾说：“没这么说”，“那是什么？”顾说：“无可奉告”。顾可能一直觉得亏欠老江，老江2007年病中，他还来我们家看望老江，以表示歉意。

(3) 三年多没给工作，老江天天去办公室上班，看书看报练书法。

我出差回来，一看这情况，我直奔中组部接待站，向接待员说明情况，101

接待员说，去国家人事局快走吧，我说学校不让走，不开通行证。101 接待员只得笑笑，快走吧！

2，老江办公司

三年多后也没有说出个所有然。不回原岗，让他筹备一个科技咨询公司。他们认为老江不是干这个工作的，看他能搞成啥样。不料老江一个多月就筹备就绪，按规章办成了。取名大地科技咨询公司，老江任经理。搞得红红火火。老师们在外接项目都愿意与这个公司挂靠。老江这个人就是为大家着想，老师们不容易，想提高老师们这块的分成比例，这又与领导意见不一致了。又不让老江干了，不久公司也就关闭了。

3，翟裕生校长的苦心

翟裕生老师当校长后，他是真诚地想启用江祖如，三驾马车：任后勤这一块，凭老江的实干，与群众同甘共苦，群众关系极好，工作肯定是搞得好的。但学校总有一只黑手挡住他，干什么都有阻碍。多少人想干，容不下老江就位。我觉得实际上帮不了翟老师的忙，我又去找翟老师（当时住北五楼）谈了许多，谈了很多例子………，感谢翟老师的真诚用干部，但不要启用老江为好。

4，何等可笑的蠢事

老江多年手脚冰凉病，据说深圳有个老中医可治。向学校申请去深圳就医批准了，时间是地大（北京）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期间。要求去深圳路过武汉不要下车，不要去武汉地大，这是多么可笑的怪事。怕老江在职代会上有不利他们的行动，太可笑了。你不做亏心事，有什么可怕的，不知是哪头蠢猪做的决定。

5，当工会主席

地大武汉，工会主席享受副校级待遇，而地大北京的工会主席就只是正处级

待遇，老江从没有谈及此事。我这个局外人看在眼里，不是为挣官位，我认为是整人，同一个级别的学校执行不同的待遇。

五、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

江祖如同志一辈子耿直，一辈子只会说真话，办实事。得到群众的信任。选举海淀区人大代表，他获得第七届、第九届、第十届人民代表。从选举看地院文革流毒在上层何其严重。选举第七届代表时没有附加条件，老江获得选票遥遥领先。到第八届时地大领导就找航遥商量，地质大院两个代表，你们出一个男的，我们出一个非党员、教授的女的。用这个条件把老江给卡下来了。到了第九届北京市规定不设条件，不指名候选人，由群众海选。为压制老江的影响力，领导开会回来也不组织向群众传达会议精神。但老江得票还是遥遥领先。到第十届也如此。

【岁月的印迹】

我与王大宾的苦难婚姻

古宝琳

《昨天》编者按：本篇根据作者提供的手稿扫描件录入，编辑时另拟了标题和小标题，最后经作者审定。

古宝琳本是一个普通学生，文革中也只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名普通成员，但因她与该校学生领袖王大宾相恋并在王大宾被“隔离审查”的危难时刻结为夫妻，这就使她的生活也同王大宾一起被卷入了凶险冷酷的政治风暴中。



正如古宝琳所说：“文化大革命的激情造就了我和王大宾的婚姻，文化大革命的无数灾难和痛苦又摧毁了这段婚姻。”从这一段苦难婚姻的记叙中，可以看到那一代青年曾经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

（左图：古宝琳近照。）

古宝琳简介：女，1946年出生于陕西宝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4年由广州广雅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文革中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般成员。1970年毕业分配到成都地质探矿机械厂。1973年初毅然到湖北江陵独闯“禁区”探望相恋多年、正处于隔离审查中的王大宾，并携其不顾阻拦回到四川，陪王大宾回德昌老家探望其母亲后，回到成都正式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女儿不到4岁时王大宾再次入狱。此后带着女儿艰难度日，并不断为王大宾向各方面写信申诉。直到王大宾1983年底“刑满出狱”。1984年起她先后到蛇口、深圳特区从事技术和企业管理工作。1999年提前退休到美国。现定居美国。

感谢蔡新平先生热心协助组稿，感谢古宝琳女士无私提供她珍贵的回忆录与日记！

初识王大宾

一九六四年九月，我进入了北京地质学院。一个月后的“十一”国庆节，我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参加了白天的方队游行和晚上天安门广场的焰火联欢晚会。

晚会中，王大宾来到了我们班的活动圈，并向我们自我介绍他是我系四年级同学，今后会经常到我们班来协助政治辅导员夏志明的工作。当晚他还问我国庆期间准备做什么。我告诉他，我中学的同学将会在天安门广场聚会。王大宾主动提出他可以为我们照相，因为他也会到天安门广场来。我很高兴，因为当时我们很少有人拥有照相机。我多希望能照张相片寄回广州，让我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分享我能来到北京的快乐啊！何况天安门是我们当时多少人向往的伟大祖国的心脏！

国庆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王大宾准时来到天安门广场，为我们广州广雅中学的校友照了相。

一九六四年在北京的第一个冬天，我没有穿棉衣——没有棉衣可穿。母亲给我一件父亲在捷克斯洛伐克留学时穿的皮夹克，男式的，我不愿意穿。王大宾见我没穿棉衣，说我过不了冬就会冻死。他要给我一件棉衣，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从回避到约会

如王大宾所言，他协助政治辅导员工作，经常在我们班男同学的宿舍出现。那时，班上的学习、开会和一切活动，都在男生宿舍进行。而王大宾对我的过多关注和关心，引起了我的反感。我认为他经常到我们班来是有目的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牢记来北京上学之前母亲的千叮万嘱：“上大学不准谈恋爱。哪怕毕业了也要先立业，后成家。”因此，我刻意地疏远他，回避他，一见他来，我就离开。

一九六四年底，王大宾他们年级外出参加“四清”。其间，他给我写过信，谈及他们“四清”工作组的工作及阶级斗争的详细情况。我没有回信。

回校后，他依然如旧地关心我。

我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四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看了王大宾的读书笔记和吴坤正的读书笔记，有些感触。我觉得自己太差了，本来我亦有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愿望，而且很想系统地学习政治经济学，但事与愿违，一天到晚忙于学习……”

一九六五年，王大宾他们年级到甘肃酒泉实习。他写信给我，并托我办一件事情：请我到五道口（或是四道口？）的照相馆替他去取照片，说是他临走前照的，没来得及去取，并告诉我，加印的两张照片中，其中一张帮他寄回德昌老家给他母亲，另一张让我留着。

这次，我回了信，并且是用红笔写的信（不知是从哪里听说的，在中国，用

红笔写的信是绝交信），信中，我把一张照片退给他，并说：“我不会留下一个陌生人的照片。”虽然当时我很单纯无知，但我知道，给异性送照片是示爱的一种方式。当然，另一张照片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帮他寄给了他德昌的母亲。

一九六六年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们都被卷入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当中。在大字报栏里，我经常看到王大宾的名字，我知道我们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

年底，我随“革命造反宣传队”一起“战斗”在祖国的大西南。在成都、南充等地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来我队接到通知，速赶到成都去配合总部的行动。原来是奉中央文革之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王大宾也按总部的通知从武汉赶到成都参加了这一行动。

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宣传队和我校其他同学一起，乘专列护送彭德怀回京。火车上，我和王大宾有机会畅谈了几十分钟。当然不是我们两人，在场还有宣传队的我班同学陶志新和其他队员。我们谈的都是文化大革命和大西南的运动发展趋势。那次长谈，是我认识王大宾两年多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的十分融洽的交谈。

从成都“揪”彭德怀回京以后，王大宾由于身体不好而住进了北京三院，有一天，陶志新来找我说：“吉宝（当时一些同学这样简称我），大宾住院了，宣传队几个队员要我带他们去看望大宾，你也去吧！”虽然我不知道陶志新是从哪里知道王大宾住院消息的，不过我答应了。

当王大宾看到我出现在三院病房时，十分惊讶和高兴。

从此，我没有再回避他。

我们开始了约会。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我们只有在寒冷的冬天的深夜，顶着霜雾，漫步在四道口和五道口的街道上。

校园里的流言与父母的规劝

一九六七年五月，我准备再度“杀”回成都和南充，王大宾制止我再出外串联，说现在全国各地形势严峻，武斗不断，尤其是大西南，很不安全。我没有听他的劝告，执意要走。后来他派了不少人到北京车站阻拦我们外出，但没有成功。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五日的日记中写道：

“真使我感到惊讶，总部王大宾竟下这么大的决心，给我们这么大的压力，不让我们再出门串联。北京车站布下了‘天罗地网’，由田春林、孟繁华、聂树人等带领我系五年级的大队来‘抓’我们这些‘游鱼’回校。我们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竟惊动了这些‘大人物’……上了火车，我想到田春林他们的车站逮捕队灰溜溜地拉着原班人马回校到王大宾那里去领赏的情景，我更是得意了……我

突然感到，我开始了解他……这次又到成都。上次的感觉已成了一种力量。……我害怕事态的发展……我克服了自己的感情，毅然离京……可我了解自己真实的思想，我留恋学校。”（下图：约在 1967 年底或 1968 年初古宝琳班上部分同学与王大宾在颐和园留影。前排左 2 古宝琳，她身后最高者为王大宾。）



一九六七年七月，王大宾的舅母孔庆霞从四川德昌到北京看病，王大宾委托我帮助他接待他的舅母。由于孔庆霞的穿梭，我与王大宾的接触越来越多，对他也越来越了解。

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切清规戒律，同时也摧毁了我母亲对我的叮咛，我

投入了爱河。不过，我的思想，我的感情，还在苦苦地挣扎。

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星期二，我的日记中写道：“生活的潮流毕竟总在滚滚向前，任何人也阻拦不了。这是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看到每逢陷入爱情的人身上所起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女孩子，她们会变得温顺而无能，尽管她们以前是多么地有志气，有毅力，有抱负，有理想，但一旦陷入爱河，就失去革命意志。……我不能步她们的后尘……我有理想，有抱负，不能意志消沉，我要发奋地工作和生活，无人约束地生活，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也许，这只是个幻想。当我们确定自己的命运之前，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已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决定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大宾由于身体不好而到北京郊区小汤山疗养院养病，去时，我随送他的小车把他送到小汤山疗养院，然后我跟车子回学校。过了一星期，我自己骑了两小时的自行车去看望他，我在八月八日星期二的日记中写道：

“……他很愉快，这给我带来无比的宽慰，我们还打了三盘乒乓球，当然他不是我的对手。每人毕竟有自己的特长。随后我们一起游赏了几乎整个疗养院……我们无忧无虑地游玩，当然不可避免地谈政治，谈运动。我尽量回避。此阶段他的主要任务是养好身体，故我没有把学校运动的情况告诉他。天有不测风云，欲下雨，乌云密布……我急着回校，他用自行车载我好长一段路，他自己再走回去……冒雨骑回学校，一身湿透，但心是热的，脸一阵阵地发烧……世界上第一个征服我感情的人……难道这就是爱？啊，可恨！”

自从孔庆霞来京后，我和王大宾较频繁的接触已开始引起学校人们的议论纷

纷，我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

“夏志明又向我报道了一个消息，（对我和王大宾之事）人们在议论纷纷。我很觉茫然……为什么要议论别人的私生活呢？……他们无权干涉我的内政。……如夏志明所说，我的条件很好，政治上进心强，有自己的政治见解。能歌善舞，聪明，能干……但好的条件容易带来自己的弱点，不容易处理好生活，容易出问题。对他的分析，我基本同意。但他（夏志明）也许低估了我，我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处理好个人问题。……爱情对人来说是美丽、可贵的，但她绝不能成为束缚人的力量，她只不过是崇高理想和共同志向的一个结晶……她只能成为我们前进中的加油站，鼓舞我们更好地为理想而奋斗……这是人类最纯洁，最高尚，最可靠的爱。……”（上图：古宝琳与王大宾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随着时间的推进，王大宾和我已经开始深入地讨论一些较严肃的话题，我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一的日记中写道：

“……到疗养院去度过我的生日，快乐和幸福。……我现在已感到不能再做个不可知论者了。从谈话中，我听到了两个设想，要我不得不做仔细的考虑，其一，无疑地，他已被卷入政治生活中去，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不犯错误是不现实的。其二，假如他的病治不好怎么办？……我不是卑鄙自私的姑娘，我会永远忠于他。……我需要的是同志式的鼓舞和革命的享受，而不是商品式的交换的窃窃私语和唯利是图。只要主观上不犯错误，对此我坚信不疑。”

就在这之后，我回了一趟广州，我人还没有到广州，王大宾的信就提前到广州了。我想大宾的本意是把我们的关系公开化，起码在我们家的范围内公开化，



这使我很被动。我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的日记里写道：

“妈妈在沉默中开口了，她责问我为什么要在学生时代谈恋爱，找朋友，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妈妈担心我受骗，说我对她（大宾）了解时间不长，并要我考验他，说他毕业后若有诚心等我，然后再考虑。……妈妈要我不要轻易表态，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难怪我回广州之前大宾说过一句话：你的家庭是不会

喜欢我这样人的。”（上图：古宝琳父母与孩子在上海留影，母亲怀抱者为幼年古宝琳。）

离广州回北京之前，妈妈又跟我谈。我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

“今晚爸妈和我正式谈判。谈了几点意见：①你年纪太轻，还未大学毕业，不宜谈恋爱；②对人要有长期认识过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否则有百害而无一利；③现阶段不可表态。我一言不发。看来他们同意我和大宾交朋友，但反对我们谈恋爱。”

爱情路上总会有风雨坎坷

回到北京学校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王大宾到东北汤岗子疗养院疗养，在学校，对王大宾和我的关系骤然传得沸沸扬扬了。我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的日记中写道：“老夏（志明）向我报信，说对王大宾和我的流言蜚语甚多甚广……其实对我来说，几乎已成家常便饭了。……无须暴跳如雷。生活上琐事的谣传，就应对它轻蔑得眼珠子都不转过去。”

各种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立场，就有不同的看法。东二楼的女同学们对我说：“你和王大宾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车。”“你们俩根本就走不到一起去。”而王大宾周围的同志和战友纷纷对他说：“为了你的政治前途，你应找个政治条件好的姑娘。”“古宝琳会成为你前进的绊脚石。”等等，等等。这都是些好心人的忠告。（右图：古宝琳与王大宾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后合影。）

当然也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丑上窜下跳为我们的关系造舆论。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星期六的日记里写道：

“小陆被我的歌声引来了……她向我报告了不少消息，×××确实是伪君子、两面派的典型，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卑鄙！……我与她既无怨，又无仇，为何值得她这样不遗余力地诽谤？为了证实我和大宾的关系而到处奔波，真好笑！她班那么多对大宾的流言原来都出自于她的口。她一面在巴结，一面在拆台。她忽而散布：‘古宝琳太高傲，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岂会看得上王大宾？’忽而又公开断言：‘古是个狐狸精，想往上爬。’可惜我至今并未捞个一官半职。……”



对我们的关系，除了各种善意的或恶意的流言之外，还真有些是埋头做实事的。校内或校外都有王大宾的爱慕者，送上她们的爱慕信或照片。按照当时和王大宾一起住在北五楼上 01 室的我班同学刘银春的说法：“那是些落选的……”

当然，我很自信，相信大宾不会为这些诱惑动心。但有一件事，我猜大宾是动了心的。

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王大宾到东北汤岗子疗养院疗养了三个多月，东北的××军长有意要把女儿许配给王大宾。这对大宾来说，应该是展示了一幅美丽和诱人的政治蓝图。我想大宾在东北也见过这姑娘。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充满了复杂的心情，怀着不知多少的热情，燃着熊熊的爱火，盼到了他回来，然而失望的心情强烈地冲击着我。回来后和他每次十分短暂的接触，我都感到他精神的恍惚，思想莫测。他几乎不谈自己，我也没有机会谈。……为什么？心脏剧烈地跳动夺去了我一个个不眠之夜……我突然想到了爱情的悲惨结局，不寒而颤了！”

当然，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保持了沉默。几个月以后，从东北来了×××，他不知我是大宾的女友，当我面提起了这事。这样，大宾才向我解释的。

后来不知为何王大宾依然选择了我，我没有问他。也许是我在他心中扎的根太深、太久吧。

尽管有这样一些风风雨雨，我对前途仍然是充满美好幻想的。我在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星期三日记中写了首自由诗，记录下与王大宾从相识到相爱的一些心情，最后写下了豪迈的向往：

我们，
不会在几尺天井内空谈革命，
我们，
不会流连在花园里，
欣赏那红花绿荫。
我们，
胸中能装万里风云，
脚下将踏千山万岭。
我们，
不向往那高官厚禄，
只愿做闪闪发光的螺丝钉。

李仲学之死

一九六八年八月，军、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所谓的“斗、批、改”阶段。红卫兵不再风光，革命委员会名存实亡。随后就是毕业分配。王大宾他们高年级的同学先分配走了。王大宾本应在1966年毕业，因文化大革命而在学校多留了两三年。在他的要求下，终于也分配了工作，于1969年初去了四川成都地质修配厂。

一九七〇年，我们年级终于结束了在河北武安地质队的劳动。虽然推迟了一年毕业，但还是值得庆贺。毕业前，在最后一天晚餐中，我们班的李仲学喝得大醉，他大骂军宣队愚蠢、无能。不少同学都劝他，拉他，怕他惹祸。我想，他是借酒吐真情，不吐不快吧。

因为王大宾已经分配到了成都，照顾我和他的关系，我也被分配到了成都。李仲学分配到陕西。他约我去游华山。我们班上被分配到西北西南的四个同学，除我以外三个男生：李仲学、丘采菱、包根源，就一起从武安乘火车到华山站。

我们用了八小时爬到华山顶上，中途还在山腰一个大岩洞里游玩。在华山顶借宿了一晚，第二天下山。华山的雄伟气概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境，令我们几个人都惊叹不已。我们不断地发出赞叹声。大家都连说可惜没有相机来保留我们的记忆。于是我们四人约定，第二年的今天，我们带着相机，重游华山，不见不散！

到了西安，李仲学要先回家，再到单位报到。我和包根源、丘采菱一起把李仲学送到车站。临别时，他再三叮嘱我：别忘了明年华山之约！

我们万万没想到，还没等到明年约定之时，李仲学就已被专案组打成了“五一六分子”，逼得他含恨弃世！

李仲学生长在陕西安康一个农村家庭，一九六四年他是穿着农村家制的粗布衣服到北京来上大学的。他说话有很浓重的陕西腔。他爱好文学，喜欢写诗作文，还爱唱歌，热爱大自然。

一九六五年，我们年级实行半工半读试点，到山东招远劳动了四个月。我和李仲学在同一个钻塔上班。我上白班，他上中班。经常在交接班时，他会偷偷递给我他写的诗。有时一天写一首，都是旧体诗，有时还填词。我很佩服他的才思如此敏捷。可惜这些诗词都没有保留下来。只是从此我也爱上了古诗词。在山东招远，我们一伙同学常去山边的水库游泳。李仲学喜欢一路走一路唱歌。他最爱唱的是“人说山西好风光”。（下图：古宝琳班上全部女生三人1969年在学校宿舍楼前留影。左起：理雪吟、古宝琳、尹秀琴。）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九六六年八月，西安学生在陕西省委门前静坐示威，抗议省委组织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斗学生造成流血事件。北京有人组织了一火车的各校学生前去声援。这是全国第一批大规模串联的学生。李仲学约我一起随团赴西安。我们到了火车站，只见一大批中学生红卫兵把守着车站，审查每一个上车的学生，凡不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都不准上车。

我看见一个想挤上车的大学生还被中学生红卫兵拉下来用皮带抽打。那时“血统论”正在社会上蔓延。我一见此情景，知道自己这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人肯定会被禁止上车，因此想回校去算了。李仲学拉住我说：“不要怕，我来对付他们。”

很快，两个中学生走到我们跟前大声喝问：“是不是红五类？”我不敢出声。李仲学大声回答：“都是！”于是就放我们上了车。坐下后，我还一直很害怕，唯恐有人查到我的真实身份。李仲学笑我是“胆小鬼”。事后我自己也感到很好笑，那时，到处都乱哄哄的，许多政府机关都瘫痪了，谁有功夫去查一个无名小卒的家庭出身呢？当然，这些中学生红卫兵也很幼稚可笑。

到西安后，李仲学很快就投入到声援西安学生的活动中，他做事大胆，有冲劲。后来，我跟着地院其他同学继续南下串联，他就留在西安。

串联回北京后，李仲学在地院《东方红报》做编辑工作，他曾邀我也到《东方红报》去工作，我说我不是根红苗正的出身，文章也写得不好，因此拒绝了。

李仲学是个很爱思考的人。自“王、关、戚”、“杨、余、傅”事件相继发生后，他对文革局势这样的变化感到很不理解，政治舞台上的一幕幕闹剧使他心灰意冷，情绪陷入极度的低潮，他经常约我到四道口或五道口去喝啤酒，发泄他的怨气。那段时间，我班有些同学对李仲学有些闲言碎语，说他发财了，说是通过《东方红报》发的财。我没有去探究《东方红报》能否使人发财，但我更愿意选择相信李仲学。

一九六八年，李仲学要回老家探亲，临行前，他痛苦地向我倾诉了得知我和王大宾已明确关系后的失落感。我问他：你这种情绪，是在向我示威，还是在伤害自己？他没有回答。

探亲回来后，他告诉我，他结婚了。这种闪电式的结婚使我大吃一惊，我问他：你爱她吗？他说：不爱。至今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事实还是赌气。

李仲学是在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自杀的。他受到了专案组怎样的迫害，

我们不知道，但也完全可以想到。后来包根源告诉我，李仲学本想到华山去自杀，买了去华山的火车票，但被专案组从火车站抓回去了。最后他无奈选择了以触电方式自杀。可怜的李仲学，连死的方式都不能如愿。悲乎！

李仲学死了，他的苦难也结束了。我们活着的人还得承受更多的苦难。

第一次逮捕和查抄

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清晨四点多钟，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与我同宿舍的室友潘红琴睡得迷迷糊糊嘟囔了一句：“谁这么早吵醒别人！”然后又翻过身去睡了。

我匆忙穿上衣服，起床开门，进来的是王大宾，一脸的凝重，后面跟着两个人（好像是军人，记不清了）。王大宾是来向我告别的。

我心里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头一天，“三八”妇女节，厂里组织职工去参观刘文彩地主庄园时，王大宾还跟我谈论着蒯大富、韩爱晶等人最近已先后在北京被捕（从《参考消息》上得知）的消息。也许下一个就轮到王大宾了。不过王大宾还是存在侥幸心理，他说：“我没有他们做那么多事情。”

要发生的终究会发生，只是没想到发生在第二天，这么快。跟随王大宾进来的人命我把箱子打开，把属于王大宾的东西拿出来，让他们带走。当时，我的全部财产也就只有两个箱子。其中一个箱子是王大宾从中学住校的时候就跟随他的小木箱，装的是一些文革资料。这个小木箱是最近才存放在我这里的，以防王大宾会被随时抓走。另一个箱子是我父亲留洋时用的皮箱，装着我的一些衣服，衣服下面放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文革资料和信件、照片等。我告诉来者，只有这个小木箱的东西是王大宾的，皮箱里没有王大宾的东西。

于是我把小木箱打开，他们翻腾着，带去了他们认为有用的资料，很侥幸的是，他们还算客气，没有强行要我打开属于我的皮箱。

抄完了东西，王大宾要求他们到门口等着，他要跟我单独说两句话。他们犹豫着不敢决定。王大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怕什么？我又不会怎么样。”于是他们半信半疑地离开房间，站到门口等着。王大宾无非就是告诉我保重自己，照顾好他的母亲等等。没说完两句，外面就催着王大宾赶快离开。

我把王大宾送到马路边，一部吉普车停在那里，待王大宾上车后就马上开走了。不知往哪里开。

没有眼泪，也没有哭声，待吉普车从我眼前消失后，我转身走回宿舍，去收拾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并擦干净跟随王大宾多年的小木箱。这时，眼泪再也忍不住扑扑地往下淌，接着就大哭起来。这时，东方已开始发白。

后来，我才听说，三月八日我们随本厂职工去参观刘文彩地主庄园时，就一直有人在跟随和监视我们了。三月九日是吴法宪从北京派来的专机把王大宾抓回北京的。那天，由成都警备区包围了我们所住的成都地质修配厂和成都双流机场，真是杀鸡用牛刀！如此大动干戈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可笑！

一次又一次的上书与失望

转眼就是一年过去了，王大宾没有任何消息。我忍无可忍，于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我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吴德写信（并同时寄给《人民日报》），全文如下：

敬爱的吴德同志：

原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大宾，在1969年初由驻地院的毛泽东思想军、工宣队分配到四川成都地质修配厂劳动，到这里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当时的分配情况，吴德同志您是知道的，因王大宾在离开北京前曾向您告别。并且，他在四川劳动中，经常提起临行前您给他的几点指示：消除资产阶级派性，虚心向工人阶级学习，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可是，在1971年3月9日凌晨，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到厂里来突然把王大宾带走了，王大宾的所有东西全部被抄。据说是带王大宾到北京去办学习班。可是办学习班为什么竟一年多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不但没有活动的自由，连写信和被亲人探望的自由都没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要是王大宾是一个社会的罪人，那么法律应该将他依法逮捕或依法审判，可是，现在却没有任何的法律手续，要是组织上审查他，那么在没有定性之前，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更何况，在监狱里的犯人都能够享受探监和通信的权利。现在大宾却连监狱里的犯人都不如。敬爱的吴德同志，他们的这样做法难道符合党的政策吗？主席历来教育我们对犯错误的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何况对这些犯有错误的青年学生更应如此。

直到现在，我还想知道王大宾的下落。敬爱的吴德同志，我恳切地请求和盼望您在百忙中能抽点时间，去调查和了解一下您那还未被取消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的王大宾的情况，去了解一下王大宾专案组的情况。谨此要求，别无它愿。

此致

敬礼！

王大宾未婚妻 古宝琳

在此前后，我还给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教育组负责人和北京地质学院军、工宣队负责人写了信，这些信自然都是没有回音的。

一九七二年七月，我已经得知王大宾被转移到湖北的地院“学习班”关押。我又给王大宾寄去东西，并给“学习班”负责人去信，要求去看望王大宾。没有任何答复。八月七日，我再次给那里的“学习班”负责人写了信：

湖北地院学习班负责同志：

我于7月19日给王大宾寄去的罐头与白糖，7月28日给王大宾寄去的短裤，不知王大宾收到没有？要是收到了，请来封回信，以免我挂念。

前几次我给你们去信都提到去看望王大宾的请求，不知你们考虑了我的意见没有？为什么至今这样久都不给我答复？任何答复，我迫切希望你们给我一个“能”或“否”的答复，并阐明原因。

当然还是没有任何答复。最可气的是，我给王大宾寄去的罐头、白糖、短裤等生活用品，“学习班”管理者也不给我一个回复，后来知道，王大宾也从没有收到过。

八月二十九日，我又给国务院秘书组去信：

国务院秘书组：

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已把我的信件转给了你处，并叫我有事直接与您处联系，因此我现在再给您处写信。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原北京地院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大宾，从1971年3月份被地院弄回学校关押到现在，他被剥夺了人身权利和行动自由，一年半来这种政治摧残，严重地损害了王大宾的身心健康，现在，王大宾只能用注射葡萄糖来维持他那虚弱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他的未婚妻，多次要求去探望他，但都被无理拒绝。为什么这种最基本的人道都不给我们呢？

国务院秘书组：主席对于那些参与了林贼政变阴谋、上了贼船的人还是抱着耐心帮助教育和团结的态度，而地院对这些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喝了几口水的青年学生却采取这种态度，这哪里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呢？列宁说过：上帝是允许年青人犯错误的。主席在1967年7月28日召见他们五个学生代表中也说过，年青人总是会干点好事，也干点坏事。不管他们有多大错误，我还是要保他们（指五个学生代表）的，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多少老干部都在风浪中喝了水，何况是这些还没出校门，没有什么阶级斗争经验的青年学生呢？

国务院秘书组：对这些犯错误的青年学生这样久地剥夺行动自由，我认为是直接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我迫切地要求你们能派人去了解一下王大宾专案组的工作情况，并请你们向王大宾专案组转达我希望去探望王大宾的强烈要求。

可想而知，这些信都没有任何人理睬。

前往江陵闯禁区

一九七三年一月，我突然收到地院黄振群从湖北江陵寄来的一封短信，告诉我，地院自林彪事件出来后，人心已乱，大部分被监禁在江陵的老师和干部都陆续跑回了北京。王大宾被监禁在江陵五普地质队。

这是自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王大宾被吴法宪派来的专机抓到北京后，我第一次知道他的确切下落。这封信无疑是一颗起死回生的灵芝草，使我那压抑、沉闷和绝望的生活重新燃起一丝希望。

我立刻开始筹划赴江陵。我知道地院是不会同意我去探望王大宾的。一九七二年八月，我曾通过组织要求看望他，地院回电说：“王大宾没重病不必探望。”所以我要见他，不可能通过正式渠道。

我写信给在藏北工作的我班同学丘采菱，寻求他的帮助。丘采菱立即回信，说陪我到江陵。与此同时，他写信给工作在江陵地矿部综合大队的我班同学张寄良，要求他先到江陵五普，秘密探明王大宾被关押的具体地点，

一九七三年二月，丘采菱从西藏坐了一个星期的汽车到达成都，然后陪我从重庆坐轮船到达湖北沙市。到沙市后，丘采菱先去把张寄良找到沙市我们下榻的小旅馆，张寄良画了一张五普的地形草图，说王大宾被关押在左边最后一排房子的最后一间，二十四小时有值班士兵轮流看守。张寄良要我记住方位后，马上把草图烧掉，以免惹麻烦。然后，张寄良从沙市把我送到江陵五普的门口。

那天，冷风嗖嗖，我穿着在北京买的处理的旧军大衣，戴上大口罩，肩上背着地院的地质包，里面装的都是带给王大宾的食品：奶粉、罐头等。

走进了五普，真有“风萧萧，易水寒”的一片凄凉景象。已没有几户人家在那里居住了。我按照记忆中草图上指引的路线，急急走到五普左面房子的最后一排，那里有一个士兵在值班，他低着头在专心地做木工活。当我走过他身旁时，他稍微偏了偏头，大约只看到我的军大衣，以为是他的战友吧，便又继续低头干活。我侥幸得心像要跳出胸膛，我不敢再回头看，怕他发现我是生人，只顾赶紧向前找到最后一间房子。

我轻轻叫了两声“大宾”，无人应声，再看看这几间房子，全是上了锁的。

我心一惊：糟了，他们知道我要来，已把王大宾转移到别处去了！一股冷气，从心里一直凉到脚后跟……

我绝望地站在那里大喊：“王大宾！”

应声从中间的一间房子冲出了王大宾，他脸色苍白，形容憔悴，骨瘦如柴。这时，正在前面做木工的士兵也转身冲过来，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地院军管会特设的监狱，是禁区，不经批准是不准进入的。难怪张寄良无法探听到王大宾的确切关押房间。

虽是禁区，但我已经进入，我干脆走进王大宾的房间坐下，赖着不走了。

值班的士兵怒冲冲地命令我跟他到办公室去见他的领导。我想，这是他的调虎离山计，我如果去了，就不可能再回来见王大宾了。于是我问他：“我不是地院的员工，为什么要去见你的领导？我是王大宾的未婚妻，来看看他。”

单纯的士兵憋红了脸也回答不出“为什么”，急得快步跑去汇报这突发事件了。这时，我急忙把带来的食品和日用品交给大宾，因为多次通过组织寄给他的食品，地院都没有交给他。

我看还有时间，就赶快简单地描述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外面发生的各种变化。我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在这里坚持坐着不走，军管会会把我怎样？他们要是把我强行拖出去，难道我需要使出女人最后一招：躺在地上，跺着脚，哭着撒泼？

不过，地院军管会决策人还没这样做。五分钟以后，来了一位不知什么级别的军人，客气地对我说：“我们已经为你准备了一间房子，并准备了被盖和脸盆。”我回答说：“晚上我会过去。”没有感谢他们的盛情。

晚饭时间到了。通常，王大宾的三餐都是值班士兵去买，现在我来了，我的饭不可能也由士兵来“伺候”吧？王大宾说带我到食堂去买饭。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外面值班的士兵竟没有反对。于是，我和王大宾拿着饭盒走在前面，两个士兵跟在后面，到了食堂。

一进去，所有的人和食堂的大师傅都变得鸦雀无声，默默地看着我们。我想，他们肯定猜出了我是谁。所看到的这种奇特的情景会使人浮想联翩：是王大宾多了点自由，还是古宝琳少了点自由？

晚上，王大宾送我到军管会为我准备的房间——当然，后面依然跟着两个士兵。二月的江陵，潮湿而又寒冷。他们走了以后，我一人留在冰冷的房子里。不知是因为对黑夜的恐惧还是对处境缺乏安全感，我不由得直打冷颤。哪怕把薄棉袄紧紧地裹着身躯也无济于事。当晚，我整夜未眠，窗外的寒风透过破旧的玻璃直往屋里灌。快要掉下来的门栓随着薄门板一起被风吹得“梆梆”作响。漆黑的夜，不时传来一声声狗叫，我反复地想，在这块土地上，有多少老师、干部、学

生被关押，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多少人精神饱受非人的折磨，有多少冤魂回荡在这漆黑的夜空……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像王大宾这样一个手无寸铁的学生，难道需要军队二十四小时轮班监守？记得一九七一年三月九日，北京派专机到成都抓王大宾回京时，成都警备区把成都地质修配厂和成都双流机场包围得水泄不通。这种大阵仗是用来对付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可笑的是，这个青年还尽心尽力地想去效忠这个政权。已经建立了二十四年的红色政权为何显得如此虚弱？

我又一次撬锁

第二天天亮时，一夜的恐怖，寒冷，遐想，也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我拿起简单的行李，离开这房子，决定不再回来住。

回到五普，我拿着碗到食堂买早餐，寻觅着我曾认识的人，可惜没有。事实上，在地院我认识的人很少。胆小、腼腆的性格，加上非红五类出身的自卑感，使我任何时候都是低调行事。食堂大师傅见我一人进去，很高兴地跟我打招呼，并到厨房里拿出最热的馒头来给我，我很感激地看着他，只想落泪。是的，在艰难困境中，哪怕有人给你一个鼓励的眼神，也会使你感激涕零的。

我端着碗，拿着馒头，向王大宾的房子走去。经过食堂的后面，看见一堆煤，旁边还有一个独轮小车和铁锹，是食堂备用的。真是天助我也！这都是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在这里，除了被关押的“罪人”，每户留守的人都生着炉火。

一吃完早餐，我就跑到食堂后面，毫不犹豫地拿起铁锹，把煤一锹锹地铲到独轮车里，我压根就没去考虑应不应该这样做，只知道：要生存。我等待着谁来干涉我，可竟然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不叫偷，就叫抢吧。我推着一小车煤，歪歪扭扭地沿着小路推到王大宾房间前的空地上。幸好独轮车在路途中没歪倒。我在读小学时，大炼钢铁浪潮中，曾推过独轮小车。这点小技术竟用在今天偷煤上了。接着，我用小车又去运了些黄泥土，王大宾就开始在门前做起了煤饼。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很熟悉。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已争到了在户外活动的自由。之前，他是一直被禁止跨出户外一步的，哪怕是买饭都不行。

很快，王大宾房间炉子的火生起来了。在原始社会，火的发明使人类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而现在，有了火，不但带来温暖，还将使生活大大改善。

我准备到附近寻找商店，想购买些锅盆什物。还没走出五普的大门，看见一个房子的门口站着一位妇女，向我不断地招手，仔细一看，是老崔，探工系党总支书记李一鸣的妻子。我高兴极了，终于见到一个我认识的人！我环视一下四周，确认没有人在跟踪我后，快步向她走去。老崔激动地拉着我的手，流着泪说：“太

好了，你来了，大宾就有救了。我一直站在门口等你经过……”站在一旁的李一鸣也不断地擦眼泪。这几年，大家所经历的痛苦、辛酸和磨难，都不知如何互相倾诉。但我不敢久留，害怕牵连他们。离开前，老崔给了我一篮鸡蛋，还有一个小锅。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买米要粮票，买肉要肉票，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糖要糖票……主要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都限量供应。在江陵，我们没有户口，也不可能有购物票。只有自由市场是我们的唯一选择。老崔告诉了我这个重要信息。

我匆匆地离开了老崔家，高高兴兴地提着鸡蛋回到了大宾房间。一进门，值班的士兵见我这么快就提着鸡蛋回来，愤怒而无奈。他当然知道我并没有出五普的大门。也许是因为我串来串去，使他们失去了隔离王大宾的意义而愤怒吧？

下一步要解决我自己的住宿问题。我已下决心不再回昨晚那里住，太远而且没有安全感。王大宾告诉我，隔壁房子的主人已走，不知道回来否。我立刻跑到隔壁房前，透过小玻璃窗向里张望：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上面放着一卷铺盖，一张旧书桌，上面放着几本满是灰尘的书，还有一把旧椅子，门上吊着一个小锁。看来主人离开这里已经多日。我征求王大宾的意见，准备撬开这个小锁。我想，江陵五普只是军管会把地院部分员工赶到这里临时居住的“集中营”，不会有什公私人财产。况且，如果隔壁的主人回来住，我会立刻把房子还给他并向他道歉。就这样，小锁被轻而易举地撬开了，我搬了进去。

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感到不安。一九七二年在成都地质修配厂发生的撬锁风波还历历在目。

一九七二年初，成都地质修配厂为配合地院的抓“五一六”运动，专门为我开设了“学习班”，目的是迫我认罪并揭发王大宾和其他地院人的“罪行”。他们为了打击我的气焰，孤立我，便勒令我从四楼搬到一楼，与一个抓“五一六”积极分子住在一起，这样军管会就可随时掌握我的动态。我拒绝了，因他们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这样僵持了两个星期。一天我正在上班，军管会副主任带了两个工人，撬开了我住房间的门锁，把我的所有物品从四楼搬到一楼他们安排的房间。四楼我原住的房间，他们马上借给了一个来探亲的家属。如此侵犯人权和尊严的举动竟发生在“人民的子弟兵”身上，我怒不可遏，但沉默了三个星期，等待那位来探亲的职工家属离去后，我又把四楼房间的门锁撬开，把我的个人物品搬回了四楼。厂军管会勒令我为撬锁行为向全厂职工做检查，我同意做检查，但有一先决条件：军管会副主任必须先做检查。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最后此事就不了了之。我依然住在四楼。这就是成都地修厂人人皆知的撬锁风波。

如今在江陵，我又撬了一次门锁，不知是否有人会要求我做检讨呢？

见到被囚禁的李贵

住下后，就真有打持久战的样子了。我经常跑到江陵自由市场买鱼、蛋、菜等回来做饭，也不时从老崔或其他老师处拿回来一些饺子、馒头之类的食品，地矿部综合大队的张寄良，也帮我们收集到一点油票。这样我们就过起美滋滋的小日子来了。只不过是屋里总有看守的士兵。依然是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

开始我确实难以适应这种天天被看守、被监视、没有自由的生活，说话小心翼翼，只能说冠冕堂皇的“革命”话，这种空气令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可是，慢慢地习惯了，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逐渐能旁若无人，而且胆子越来越大。我很想气走这些士兵，于是从记忆中找些有趣的事情来谈笑风生，故意谈些社会上的八卦新闻，这种状况是让值班的士兵最尴尬的，他们既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也不愿坐在那里近距离地面对我们这对未婚男女的嬉笑和眉来眼去。

逐渐地，值班的士兵不愿呆在屋里，撤退到王大宾的门口值班了。当然，这种值班的形式肯定是经过他们的领导批准的。

到江陵几天后，我才知道老李贵也被关在这排房子的第一间。原来我还以为这排房中，除王大宾的房间和我住的房间外，其他都是空的。而我进进出出都要经过李贵房间的门口，可我竟然不知道有人被关押在那里！他们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一旦知道了，我就故意经过他的门口，来来回回，看能不能看到他。但门始终是关着的，没有任何声音和动静。一次，我经过李贵门前，忍不住大声说：“老李贵，到外面来晒晒太阳吧！”依然没有动静。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李贵撑着拐杖，依在门口，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他一看见我，很惊讶，我跟他说：“我去给你拿些鸡蛋……”

他连说：“不，不……”他像急着要跟我说什么话，可能害怕没有机会了。我赶忙走到他跟前，等待着他要告诉我些什么，或要我转告什么给他的家人。但没有。他只是用颤抖的手艰难地从口袋摸出一张照片给我看，说是他的孙子。我鼻子一酸……也许这个小孙子是他生活在这世界上唯一的精神支柱，是这个小孙子令他支撑到今天。

这个曾经受人崇敬的老长工，老干部，老党员，被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党置于如此惨境，悲乎！

王大宾发酒疯

有一天，不知是什么日子——当时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好像都没有特别的意义，因此也不会去注意什么日子——我们炖了一只鸡，我还去买了一瓶白酒，晚上，我们坐在炉子旁边，一边吃饭，一边喝酒。对于一个关押了近两年的人来说，是难得的享受了。王大宾百感交集，多喝了两杯，就开始发酒疯。他挥舞着拳头，哭着，骂着：“狗日的，说我反毛主席，你们他妈的才反毛主席呢！”“说我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们军管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你们关押了几百教职员，你们是真正的反革命！”“朱恩贵，你这个王八蛋！……”

他越骂越起劲，像要把这几年的委屈和愤怒骂个够。我劝也劝不住，拉也拉不了，拼命用手去捂他的嘴，怕他酒后口无遮拦，惹出更大的祸，但无济于事。我哭着求他安静下来，他根本就像没听见，还拿起椅子向门口砸。门口值班的士兵不知是听见闹声跑了，还是去汇报王大宾的“酒后真言”了。我无法知道，只是担心这一骂，使他罪上加罪。

这一闹，惊动了沉闷安静得像一片荒地的江陵五普，有几个好心人大着胆子来到王大宾的门前，有人还拿来了醋，并劝我给王大宾喝些醋，说可以醒酒。我想这些善良的地院职工从来没有踏进这个被军管会用来关押“犯人”的禁区，不管他们在江陵五普住了多长时间。

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去买酒了。

王大宾杀狗

一天，我兴奋地从外面跑进大宾的房间，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他门口已经没有大兵在值班了，他们撤退到这排房子的进口处了！

这意味着，这又进一步扩大了王大宾活动的空间。自由的空气对人来说是多么可贵！难怪古今中外多少志士仁人为“自由”二字前仆后继战斗，哪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就在这之后的一天，我们正准备做饭，看见一条狗在门前徘徊，久久不愿离去。我们猜测：它是家狗还是野狗，是在寻找食物还是寻找主人？不得而知。再一想，江陵五普这里没有常住人口，应该不会有人养狗。王大宾提议，不如杀掉它。那种想吃肉的饥饿感在我们腹中升腾。我也同意，但顾虑重重：它要是有主人怎么办？它要是叫起来被人听到怎么办？要是……但又想，困难时期，饥肠辘辘的人们为填饱肚子去偷食物，不叫偷，叫为生存而斗争。现在我们也没有肉票可以去买肉，再说狗是自己送上门的。马上动手！再犹豫狗就跑了。

于是乎，半小时刚过，这条可怜的狗就已经下锅了。

当时，我心虚地站在门口“望风”。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王大宾是怎样使那

条狗一声不响地被勒死，又怎样迅速地扒掉狗皮，把狗剖开下锅的。他做这件事内行得使我惊讶：干净、利落。总之，这条狗的肉让我们饱餐了一个星期。

这是王大宾被关押以来最开胃的时候，只是那一阵子，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看到有人走到附近就猜想是否在找寻失落的狗；吃狗肉时，我猜想这狗肉的香味会不会传到狗主人的鼻子里去……真是做贼心虚。时隔几十年，至今想起来，还是觉得愧对狗的主人——如果这狗真有主人的话。

有“保镖”跟随的城墙散步

不知又过了多少天或多少个星期，虽然我们为王大宾争取到了一丁点的自由，毕竟生活得苦闷、压抑。漫长的等待，国家动荡，个人前途无望，想为这批怀有忠于领袖的政治热情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生平反，真是遥遥无期。在那个没有人敢说真话的年代，没有事实，更没有历史真相，唯有小道消息和谣言弥漫了整个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那种背景之下，连高官权贵都是朝不保夕，更何况这批只在政治舞台上风光了几个月的青年学生呢！

就在这无望的苦恼等待中，我们又意外地发现在这房子的进口处守卫的士兵消失了！

这又给了我们一丝新的希望。我们开始尝试走出五普的大门。尽管没有人允许王大宾这样做。

一天，阳光普照，晒太阳和散步是我们最好的借口。我们偷偷地走出五普的大门，没有人来阻拦！

兴奋的心咚咚直跳，走出大门十几米，发现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后面已有两个士兵紧跟着，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不过我们没有停下脚步，一直走向江陵的城墙。

江陵是我见过保留着最完整城墙的古城——除了有一个缺口之外。沿着古城墙上面的路可以绕着江陵走一圈。我们就沿着城墙散步了约两小时回到五普。对于王大宾来说，近两年的关押和非人能承受的精神压力已把他折磨得虚弱不堪。这种晒太阳能有效地帮助他恢复体质。

自此以后，只要天气晴朗，我们都到城墙散步。后面紧跟着“尾巴”。开始是两个“尾巴”，后来可能看到我们确实构不成任何威胁，就换成了一个。这是一幅很滑稽的图像：前面走着一对青年男女，后面跟着士兵做“保镖”。如果有人看见这情景，不知会有何感想？可惜，没有人会看见。那个时代的江陵，贫穷、闭塞而又安宁，像西安一样到处散发着木乃伊的气味。加上人们忙于生计，忙于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斗争，没有人有闲暇去欣赏古城墙上的“游客”。

在古城墙上，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忧国，忧民，忧自己。我告诉王大宾，去年（一九七二年）我写了无数的信给国务院秘书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给吴德，给北京市委，给地院，给中央文革小组，给周总理……但是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响。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一件一件事情的发生，一批一批高官的落马，接下来是一个又一个的运动……这一切使人摸不着头脑，理不清头绪。在这动荡的形势下，有谁会顾及到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和安危呢？我们除了自己解放自己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喜欢别人的拘禁和管制，何况这种貌似理所当然的跟踪和监视？我们渴望能甩掉这个“尾巴”，哪怕是获得短暂心灵上的安宁和满足。因此，有时我们中途会走下城墙，到一间小饭店去用餐，用餐时，“尾巴”仍然会耐心地等待我们用完餐，继续跟随。可怜的士兵！宁可饿着肚子也要尽忠职守。

后来，我们又想出了新招：看电影。那时，全国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部电影可看。于是，上午我趁买菜之机到江陵电影院去预先买好电影票，下午我和王大宾散步到江陵，路过电影院，我们进去了，留下目瞪口呆的士兵在外面。我真担心他会在外面坚守岗位等上两个小时。幸好没有。这一招确实有效。看了两次电影之后，再也没有士兵跟着我们外出了。

高元贵为我写证明

一九七三年某月，高元贵院长来到江陵，听说这是高院长恢复工作以来第一次到江陵。在江陵，高院长接见了我，他问及王大宾的身体状况，也问到了我的情况。当然，我很焦急地向他问到了我最关心的问题：王大宾还要关押多久？高院长对此深思不语。我便清楚：王大宾案是高元贵院长所不能左右和决定的。

高院长知道我到江陵已好几个月了，问我有什么困难。这时，我才猛然想到回单位如何处理我离职几个月的事情。高院长那全面、周密的思维令我惊叹不已。在江陵的几个月，我从来没有去考虑会不会丢掉工作，会不会失去生活来源，今后如何生存……什么都不考虑，不知是幼稚、单纯还是愚昧。总之是我从“大锅饭”中获得的最大好处了。

后来，高院长为我写了证明给我的工作单位成都地质修配厂，证明我这段时间留在江陵是事出有因，由于这封信，成都厂里才没有停发我的工资。

那个时代，大家都很贫穷，对“钱”的概念模糊而又淡泊。不像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人们富裕了，有钱了，钱反而成为人们明确而又坚定的追求目标。也许应该因果倒置：人们明确而又坚定地追求钱，才会变得富裕。

携王大宾“潜逃回川”

没有值班士兵跟踪和监视我们外出了，是否整个形势趋向更好了呢？是否会慢慢结束对王大宾的关押呢？我们开始在幻想，希望，等待。但像以往一样：希望→失望→绝望→又希望→又失望→又绝望……永远在循环。

我们已没有耐心只限于去走江陵的城墙了。

何不再走远些呢？回四川吧，我向王大宾提议。

他沉默了。他还不敢奢望。说实话，王大宾早就想去看望他的老母亲，回去看望那些日夜关心他而且被他株连的父老乡亲。我继续鼓动他，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他终于下决心了：走！

我们开始行动。首先，我到沙市去买船票。那时，从沙市到重庆的轮船东方红号是一星期只有两班，提前三天预售票。买到船票回去后，我们很快就把行李装成一小袋，尽量减小目标，并可随时带走。

三天等待的时间太漫长，我们既兴奋，又紧张。不知将会发生什么。

上船的那天终于到了。提前三小时，我们拿着一小包行李，向五普的大门走去。准备坐公共汽车到沙市码头。这时，一个军官（不是士兵）飞快地跑来追上我们，并大声警告：“王大宾，你不能走！你要走了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大宾站在那里愣住了，还没来得及做出决定，我便冷笑说：“还能有什么后果？现在我们除去脑袋之外还能再失去什么？”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决定不回头。王大宾便对那军官说：“后果我自己负！”

就这样，我们到沙市码头，登上了东方轮船。当船离开沙市码头时，王大宾一直站在船尾，望着沙市和江陵。这片曾给他带来屈辱和绝望的土地。明天，不知道还有什么命运在前头等待着他。

当然，当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在江陵的关押，只是他今后长达八年牢狱之灾的前奏曲而已。

陪王大宾回乡探母

我和王大宾一起离开江陵，从沙市乘坐轮船到重庆，再转火车从重庆到成都。据后来所知，我们还没有到成都，地院军宣队和湖北省委已经发电报到成都，内容是：“王大宾已潜逃回川。”

回成都后，我们仅休息了两三天，就马上起程到王大宾的家乡四川德昌，去

看望他的老母亲，还有那些由于抓“五一六”运动而被牵连受罪的乡亲父老，我们不敢奢望有多少时间，哪怕有仅仅一天的时间也心满意足了。起码可以了却王大宾的一桩心愿。只要追兵不马上把王大宾押回江陵，只要王大宾能看到他母亲一眼。

不过还好，我们在德昌县和王大宾生长的山村停留了近一个星期。

那些曾经看着王大宾长大成人的乡亲父老们，看到我们回去，无不激动感慨得落泪，和王大宾的母亲一样，大家都老泪纵横地询问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王大宾的大起大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也很难解释得清楚当时的处境。更不用说这边远山区的农民了。

不管怎样，亲人们能团聚，能见面，就已是在享受天伦之乐了。况且，看到这贫穷的山区，已在不断地改变，山上的村子里，已经安装上了电灯。一九七二年自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已在悄悄地改变，政策变得松动了，农村也开始多种经营，使农民逐渐解决温饱问题。

想起一九七〇年我第一次来到这边远山区，它给我留下永世难忘的深刻印象，从德昌县乘坐一天只有两班的长途公共汽车，来到山脚下，然后徒步上山，约四十分钟。王大宾家的老屋就在山腰上，屋前屋后草木郁郁葱葱，老屋的后面流过一道山泉，没有被污染的泉水清凉甘甜，这就是这个村子的食用水源，我当时还逞强地用水桶去挑泉水回来做饭呢，以显示一下大城市的姑娘也能干粗活。

从山腰的村子往上走到山顶，就是彝族的村寨。一次王大宾和我一起爬上山顶，随便走进彝族村寨中的一个家庭，只是为了好奇，我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生活的。走进矮屋子，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家具，没有床，地上摆着竹子编的垫子，大概就是床了。炉灶上放着一口大铁锅，正在煮着猪食。门口的外墙上挂满了萝卜，大概这是他们主要的食物了。屋里有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还有他的母亲。一见我们进来，母亲高兴得要马上去捞起猪食，为我们做饭。我们说马上就要离开。然后王大宾递了一根香烟给男孩子，他高兴得跳起来，并立刻到烤火盆边徒手拿起一小块烧红的炭给王大宾点烟，这举动吓了我一大跳，难道他的手就不是肉长的？再仔细一看，这男孩手上长着厚厚的茧，是从小劳作磨出来的。难怪不怕烫。我心想，中国的农村不知有多少这样从小操劳而无法受到教育的孩子。他们活着只是为了生存。

不用说山顶上的彝族山寨了，像王大宾老家这样边远山区也是很贫穷的。冬天王大宾的小弟弟春祥去放羊，只是穿着一件像硬壳一样的羊皮袄，是那种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制作的破羊皮，不知如何能抵御风寒。也许，全靠山区太阳的热量来取暖吧。幸好，德昌的太阳离地面特别近，连太阳也对这些贫穷山区的农民有一种厚爱。只是太阳一下山，热量就消失了，大家就烧起柴火，围着火炉取暖，

否则他们那些单薄的衣裳如何能度过寒冬！反正山上到处都是树林，不怕没柴烧。只怕懒。我想，城里人尤其是西方人喜欢到野外露营，多半就是羡慕这种近乎原始的浪漫情调吧。

那确是令人一生难以忘怀的黄昏和晚上。亲人们围着火炉聊天，嗑葵瓜子，说笑话，讲故事，谈天说地，烤地瓜，烤土豆……多温馨，多热闹！这是真正的天伦之乐。亲友们请我们吃饭，看着他们“磨刀霍霍向猪羊”，吃饭时喝的是大碗酒，吃的是大块肉，使我觉得像是回到了武松那个时代。这里的农民就像大自然一样的纯朴、憨厚、好客，这是在喧嚣的大城市所难于寻觅到的。当然，这里交通不便，闭塞，贫穷，缺医少药，甚至没有电，没有灯，晚上一离开火炉，到处就是一片漆黑。到卫生间还要点燃松明照路。松明是一种极易燃的木材，用火柴就能把它点燃，拿着一根松明照路，就像拿着一根小火炬。

我在地院文化大革命“逍遥”期学到的针灸技术，在这个边远的山区还真的派上了用场，看到我能用一根小小的针为别人解除病痛，我还真后悔为何当初不听我父亲的劝告去学医，而自作主张跑去学地质呢。

如今，一九七三年，文革已进入了第七个年头，这个边远的山区也被文革的烈火燃烧了七年，尤其是它是王大宾的故乡。人怕出名猪怕壮，王大宾在文革中的大起大落震撼着这个曾沉睡的山村，现在人们的思想和关系变得复杂了。尽管招待我们的仍然是大碗酒大块肉，但掩饰不了乡亲们困惑的神情。

我们的婚礼和监视下的“蜜月”

在德昌度过不到一星期，我们回到了成都。在成都，我们尚未发现有任何人来为难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灵机一动：结婚吧！

于是，我们跑到八里庄街道办事处（还是派出所？）去登记，办事员听说我们要登记结婚，愣了一下，看着我们。当时我想：糟了，他肯定要找我们麻烦。王大宾被隔离审查，在四川，在成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正在隔离审查的人怎么能结婚呢？

结果，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个小伙子接着一笑，就给我们盖了章，红色的章，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请示他的上级。这已经意味着批准我们结婚了。可没想到这么简单，这么顺利。一旦顺利反而觉得奇怪了。也许，被隔离审查者禁止结婚还没来得及列入他的工作条例？也许，他很同情我们这些年的遭遇？也许，他也是造反派？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些“也许”。

几天以后，我们买了5斤（还是10斤？）糖果，这是我们结婚的唯一筹备工作。然后，我们就在那十四平方米的单间房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我们没有发请柬，当时也没有任何通讯设施可通知大家，可前来参加婚礼的朋友、同学、同事挤满了小屋和屋前长长的走廊，消息不胫而走，很多朋友是不请自来的。笑声和祝福声响彻了小小的成都修配厂沉闷的夜空……人们是在真诚地祝福这对六、七年风雨同舟历尽磨难的青年终成眷属。

当夜，慢慢地恢复了宁静，王大宾和我都在感叹，这一切好像是在梦幻之中，只是不知道明天又将发生什么……（下图：古宝琳与王大宾结婚照。）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一早，我们刚起床，就来了两位“客人”——地院军宣队和湖北省委宣传部的。

我很清楚他们为何而来。我马上端出果盘，请他们吃喜糖，来者都是客嘛。他们向王大宾传达了明确的指令：马上离川回湖北！

我提出了抗议：我们是新婚，哪怕不给我们度蜜月，起码也应该给我们度蜜周的时间吧？最后他们同意我可以随同王大宾到武汉一周。

于是，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王大宾又被押回湖北武汉，伴随同行的是新婚的妻子我。在武汉地质学校，我和王大宾在监视下度过了十天左右的“蜜月”。

然后，我从武汉回广州去探望我的父母亲。

父母为我操碎了心

虽然我结婚了，可我没征得父母的同意，也没有得到父母给我的祝福。这是我感到很伤心的。尤其使我最伤心的是，由于我不听父母的劝告，生气的父母很久很久都没有写信给我了。

从王大宾红极一时的时候开始，父母亲就反对我和王大宾的关系，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去选择一条风险难料的人生道路。他们更不愿意看到我被卷入深不可测的政治漩涡之中。

父亲年轻时留学东欧，一九四九年被蒋介石列入迁往台湾的高科技人员名单，但战乱中晚到的通知书耽误了他的行程，后来留在大陆，成为永远被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母亲年轻时曾参加国民党，在国民政府后方医院当政治训导员。再加上父母亲的家庭在中共执政初期都被划成了“地主”成份。由于这样的政治历史背景，使他们一直战战兢兢地度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他们

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充当“暴风雨中的海燕”，况且我有一个出色的堂哥哥已经在文革初期被打成“苏修特务”而自杀身亡。

而现在，我已结婚，而且嫁给一个被抛上政治浪尖的人，一个正在隔离审查，被关押着的人，况且不知何年何月能结束这种政治厄运。我如何向父母亲解释我的这种选择？父母亲怎样来接受这个已成事实的婚姻？

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广州。

回到家，我硬着头皮把结婚的消息告诉了父母亲，父母亲都没有感到惊讶。只是看着我沉默了许久，许久。最后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明知道是火坑，你偏要往里跳，你自己去承受一切后果吧。”

是的，我是应该自己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但是话虽这么说，以后那些年，我父母亲仍然为我承受了许多后果，他们为我操碎了心，经济上支持我，为我们扶养女儿，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帮着我带孩子，最主要的是，都日夜担心着我的安危，提心吊胆地害怕我像我堂哥哥那样受不了外界的压力而去寻短见。我父亲有心脏病，后来连看报纸的勇气都没有了。一九八二年，还没有等到女婿王大宾出狱，父亲就死于心肌梗塞。

到广州没有多久，我知道我已经怀孕。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压力，使我出现了先兆流产。母亲坚持留我在广州休息，经过三个月的卧床保胎调养之后，我才从广州返回成都。

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诞下一个女儿，起名古弋。

第二次逮捕与抄家

折腾多年，地院军宣队想给王大宾加的“五一六分子”罪名始终加不上，在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审查也就不了了之。但仍没有给他作出应有的结论，只是让他在武汉地院和地质学校劳动。他仍然有家不能归。

一九七八年四月，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一个朋友，钳工车间的龙万治急匆匆地拿着当天的《参考消息》来告诉我，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已正式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

我一看《参考消息》，逮捕的时间是两天前。我马上警觉到，也许像上次那样，现已有人在监视跟踪我了。于是我叫龙万治赶快离开我家，不要让他受到牵连。于是，龙万治匆匆走了。

这一整天，我关起家门，清理和销毁了很多文革时期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包括很多中央首长与王大宾一起的照片，一起开会的照片，还有一些信件，一些重要的文革资料。这些资料都是一九七〇年王大宾被抓走时，放在我的皮箱里幸存

下来的。那个年代，我已无法弄清党内的路线和派系，也无法判别谁是谁非，因此无法去判断这些资料被抄走对王大宾是福还是祸。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我来保存这些资料，此时所有东西都不宜带出这个房子，谁能保证外面没有眼线？

当时我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很清楚，这些都是极宝贵的历史资料，为对历史负责，就应保存它们。不管它们是好是坏，是黑是白，是对是错，终究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可退一步又想，历史为何不对我们负责呢？仅参加了两年的文化大革命，就被批判、审查、关押了七、八年，现在还要被正式逮捕……我从学生时代一直到现在女儿都四岁了，痛苦的精神折磨永无休止，自己都无法自保，又谈何去承担历史责任呢？于是，我心一狠，把资料全烧了！就烧在我家唯一的下水沟。为了不发出烟味，我不断用水冲到下水沟。就这样，宝贵的历史资料被烧成灰烬，冲到了污水沟里。唯有一封邓颖超写给王大宾的信，我保留了下来。

后来，每每想起我亲手销毁的那些资料，我就后悔不已，觉得自己太短视了。尤其是今天，地院的老师和同学们为了还原一个地院文革的真实历史，呕心沥血地到处奔走，收集各种资料，写回忆录……我就更为我毁掉那些资料而痛心和自责了。可是，当时我又能怎么办？

烧资料后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有几个人到我家来抄家，他们向我宣布王大宾已被公安机关正式逮捕。当时我不知他们是来自北京，来自湖北，还是来自哪里，反正没有什么区别。

这次的抄家可没有上次那样客气，他们把我们这个只有十几平方米大的家翻了个底朝天。这些年来，我已被磨练得麻木了，既没有火，也没有气，可看着他们抄家翻东西如此不客气，我也实在忍不住了，问他们：“你们到底想要找什么？”其中一人可能是他们的小头目，见我话中带刺，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这个小小的家让他们抄了几个小时，仔细得连针都能翻出来。楼下围满了好奇的看热闹的群众，热闹得像四年前我们结婚时一样。不同的只是四年前是喜事，这次是祸事。

最后，他们带走了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资料。但我相信，里面不会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了。只有邓颖超给王大宾的信是我自己交给他们的，我想，也许这封信可以洗刷说王大宾“反对周总理”的罪名吧？

那封信是在 1967 年 8 月，北京出现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之后，当时正在小汤山医院治病的王大宾写给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邓颖超的回信曾在地院革委会向大家传达，内容是：

王大宾同志：

你八月十四日给我们的信已收到了。

你在病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对我们都很关心，你所表现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真使我们感动。希望你利用这次疗养机会，好好治疗，早日恢复健康，尽早重返战斗岗位。

特此专复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邓颖超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天晓得这封信有没有作用。也许，任何证据都不可能改变他们已被政治需要确定的命运，政治和历史的进程都需要他们去坐牢。只要不把牢底坐穿就好。

带着女儿探监碰壁

一九七八年冬，我带着四岁的女儿到武汉探望王大宾。

我们从成都经过郑州转车到武汉。当然，那个年代，哪怕是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也都是硬坐。没有人敢有坐软卧的奢望。一是没有钱，二是买不到卧铺票。

经过三天三夜的路程，火车快要到达武汉，车厢里响起了广播：“武昌站快到了，请下车的旅客准备下车。”我女儿听到是武昌站，高兴得从座位上跳起来，兴奋得满脸通红，笑着叫着：“我爸爸就在武汉！”“武汉到了，武汉是我爸爸住的地方！”

火车慢慢地靠着站台停下来。女儿根本没顾着下车，只是透过玻璃窗到处寻找站台上的爸爸。尽管她不知存有几分对爸爸的回忆。我带着她下车后，她就像脱缰的小野马在站台上乱窜，到处寻找她的爸爸。好不容易把她抓住，牵扯着她走出站台，她不断地发问：“爸爸为什么没来接我？”“我爸爸不是在武汉吗？”“你不是说带我到武汉看爸爸吗？”“为什么？为什么？……”

她的话一刀一刀地刺割着我的心。淌着血的心紧缩着，我一言不发。我能说什么呢？女儿才四岁。她当时那失望的眼神和委屈得想哭的样子，至今几十年了，我还记忆犹新。

自此，我不再经常向她提及她的爸爸了。我不想让她那幼小的心灵再失望和受伤。（下图：女儿3岁时留影。）

在火车站我寄存了行李，带上给大宾的日用品和食物，牵扯着女儿，按照地图的指引往民主路走去。自王大宾在武汉被正式逮捕后，我所知道的联系地址就是武昌民主路415号。写信和寄东西全是通过这个地址。

那天，武汉刚下过一场大雪，不知这雪已经下了几天，路上的积雪足有一尺



厚，我女儿迈着艰难的步子，才没走多远，脚上的棉鞋就湿了。她说脚很冷，不愿意再走了。当时我又不可能有备用的鞋子，附近又没有任何卖鞋的商店，我只有背着她。她穿着一件我给她缝制的厚棉大衣，背在背上，像个大包袱，越走越重。

路越走越长。民主路怎么这么长？我一个个门号数着，数着……不知当时为什么会产生一种天真、愚蠢而又奇怪的幻想：这条路两边看上去都是民房，不应该有监狱或看守所吧？也许，王大宾不是在监牢，而是像在江陵那样，隔离关押而已。要是这样，我们应该能看到他。

当门牌号数到接近我写信来的那个号数时，街边的民房突然中断了，出现了一个凹进去的空地，空地后面就是：高墙，电网！

我两腿一发软，跪倒在地上。女儿从我背上滚到雪地里，在雪地里女儿还有一个劲地内疚：“妈妈，是不是我太重了，把你压倒了？”“妈妈，我听话了，我自己走吧。”“妈妈，你跌得痛不痛？让我来背你吧。”……

到了看守所门口，我要求看望王大宾，值班室士兵去请示。女儿和我站在门口的雪地里等待回话。开始，女儿很高兴，看到门口站着带枪的士兵。电影里，带枪的解放军都是英雄，所以女儿笑着跑去跟他们打招呼，被大声呵斥：“走开！”士兵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把女儿吓哭了。我愤怒地朝那士兵嚷嚷：“她还是个孩子，何罪之有？值得你这么凶？”那士兵轻蔑而又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

那一声，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是的，我们现在是囚犯的家属，囚犯与囚犯的家属是同等地位的。只不过是一个在墙内一个在墙外而已。

四十分钟以后，有人来告知我：不准探监。

我再三请求，说我是远道而来，没有用。我退一步，说让女儿一人去见爸爸，也不行。没有人为此而动心。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把带来的食品和日用品请他们转给王大宾。他们把食品退给我，留下了日用品。

我拖着麻木的身躯，依然背着女儿，像幽灵一样失魂落魄地离开了看守所。

女儿在我背上又开始不断地发问：“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见爸爸？”“为什么他们这么凶？”“这些解放军是不是坏人？”“我们下次还来不来武汉？”“我们能不能叫爸爸回成都？”……

我无言以告。只听得脚下的积雪“吱吱”地化为冰水。

女人的艰难

一九七〇年，我分配到成都地质修配厂时，我就告诉王大宾，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没想到，我却在这个厂一呆就是十五年！在人生道路上不堪回首的十五年，也是我人生中最痛苦、最消沉、最绝望的时期。

我在车间劳动改造了整整八年，美其名曰“接受工人再教育”，搬机器，洗油泥，当钳工……劳动难不倒我，把我当成一个接一个运动的斗争对象，吓不倒我，办我的“学习班”，写我大字报，整我材料，在工作中百般刁难等等等，都压不倒我。我自认为自己做到了“胜似闲庭信步”。但在生活上造谣中伤，无所不用其极，这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它对人的精神摧残远远超出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不是名女人，可已经觉得难上加难。

厂里住宿条件较差，一个小小的空间挤着四栋家属宿舍和一栋单身宿舍，整个生活区只有一个公共厕所。没有一个住家有洗手间。厂里职工的文化意识也较差，加上那个年代没有文化生活，没有娱乐，大家就只有把嚼舌头、传播小道消息流言蜚语作为消遣和乐趣，风气跟边远的农村一样：哪家夫妻晚上吵架了，第二天消息就会从村头传到村尾；哪家来了客人或亲戚，大人小孩都会跑去观看。

而我当时在厂里的处境，更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哪个同学或朋友来看望我，人们就会三三两两地站在那里交头接耳说些闲言碎语，客人走后，我还要被那些多管闲事的人查问各种问题，这就是我的生活环境：封建，闭塞，愚昧，压抑和窒息得令人难以喘气。

在那苦闷的年代，我唯一的消遣是看书——不发声的娱乐。因为原来爱拉小提琴，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地院也被工宣队批判过），从此把小提琴尘封了起来。而看书，又无书可看。除了几本红色著作之外，几乎全是禁书。当然天无绝人之路，厂里有个青年工人，他的一个朋友（或是亲戚？）在成都图书馆工作，经常偷拿出些书籍给我看，看完一本换一本，看完后又偷放回图书馆。将近十年时间，我博览了可拿得到手的所有世界名著和各类人物传记，几乎每个晚上女儿八点钟上床后的所有时间都消磨在书上。经常还请病假在家看书。这可是吃大锅饭的好处。我把这个青工叫做“书童”，可别人不这样看，说他是我的小情人，经常偷偷摸摸地到我家。他能不“经常”吗？我几天换一本书，有时一天换一本；他能不偷偷摸摸吗？他拿来的全是当时的“毒草”、禁书，而且都有图书馆的印章。这些我能向谁去解释呢？

再举个例子。厂里有个上海人，家在厂里，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平时在厂里

我们很少交谈。当时我已被“落实政策”到车间当了机械技术员，有一次被派与他一起到四川某地质队去出差。那几天里交谈多了，熟悉些了。他回厂后就经常来找我。我多次好言劝告他，叫他少来，否则会影响我，也会影响他自己。可他像着了魔一样，越来越频繁地来。我不理他，他就坐在旁边看着我。这种骚扰使我忍无可忍，终于有一天我向他大声嚷：“你不要再进我的办公室！”

万万没想到，第二天他竟在家里自杀身亡。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大祸临头了。顷刻间厂里的舆论和谣言铺天盖地。幸而我的办公室在车间里面，车间工人清楚他的反常行为和我的态度，否则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可有些人不这样想，他们认为我就是第三者，否则他怎么会去死？尤其是他妻子，被这突如其来的灾祸打击得失去了理智，把一切怨恨都发泄到我的身上，扬言要杀掉我的女儿为夫报仇。我如何向她去解释？任何解释她会相信吗？我何错之有？我无法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只有保持沉默。这不幸的女人和两个可怜的孩子是最无辜的受害人。

不过，我从此却生活在恐怖和不安之中，害怕这个受了刺激的女人真的伤害我的女儿。只要天黑了，女儿还没回家，我会像疯子一样跑着到处去寻找。这种恐惧折磨得我筋疲力尽。有一次我甚至想还不如像我班同学李仲学那样一了百了（他被打成“五一六”后被专案组折磨得自杀身亡）。何必生活在世上忍受这么多的苦难。只是实在不忍心丢下年幼的女儿。

确实不假，谣言能杀人。类似上面所说的事情在层出不穷地消磨我的意志，扭曲我的心灵。成都的十五年中，有将近十三年我是单身或“守活寡”，十三年，四千七百四十五天，生活在这块“吃着革命烈士鲜血制成的人血馒头”的土地上，我感到是多么的孤单、无助，我多羡慕那些刚孵出来的小鸡能躲在母鸡的翅膀下面。我渴望着温情，渴望爱，渴望回到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身旁。

我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里独自抚养着女儿，又当妈又当爸，我决不让女儿比同龄的孩子缺少什么，尽可能让她的生活多姿多彩，我教她游泳、骑自行车、打羽毛球、下棋、唱歌、跳舞……特别是教她读书，给她推荐好书，让她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她生日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带她到动物园去过生日。女儿上小学后成绩一直很好，加入少先队后不久就当上了大队长。

（右图：古宝琳在成都动物园为女儿过 8 岁生日时留影。）

女儿 5 岁时，我因恢复了做技术工作，经常要出差，无法照顾女儿，只好把她送回广州沙面，让她跟外公、外婆、姨妈、舅舅一起生活了一年半。生活的磨难，让女儿也



学会了吃苦耐劳，自强不息，这为她后来到美国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书国务院、党中央

一九八〇年一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正式施行。像王大宾这样被逮捕后长期关押而迟迟不作出判决结论的情况，显然已经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我又给国务院信访部写了一封申诉信，全文如下：

国务院信访部：

打倒“四人帮”以后，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于1978年4月29日被关押至今。这种长期关押是违反法律的，是错误的。说“王大宾跟着‘四人帮’干了很多坏事，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说法是言过其实的，是没有充分的事实作为依据的。

法律是应依靠事实来作证据的，而不能以某些“金口玉言”的空编来作为依据，并且，任何地位再高的人，也不应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法律又怎能取信于民呢？

对文化大革命中王大宾自己干的事情，应负起政治责任。但是要把当时地质学院学生干的坏事情都归为是王大宾的错误和罪行，那么，王大宾就是一死也难以承担起此罪了。况且，在那谁也管不了谁的年代里，这种归罪法又是多么地横蛮无理！按此法推理，浩劫中国的十年灾难又该归罪于谁呢？

如果说，王大宾只须对自己所干过的事情负法律责任，那么，现在的这种关押是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的，是错误的。

现实中，不少上了林彪贼船或跟着“四人帮”干了大量坏事的人，现在依然是“官星高照”。他们所干的事情可以算是难以饶恕的，可是被饶恕了。而对于王大宾这样的青年人犯了些错误，却审查清理了整整十年，最后还关押起来。这是为什么？难道就因为王大宾无枪无权，地位低贱吗？

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是怎样发生的，中国人民心中是清楚的，谁也不相信是几个学生在那里兴风作浪而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王大宾跟所有青年学生一样，抱着一股革命热情，响应党的号召投入到运动中去，由于当时对中央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认识不清，因此，单纯的政治热情被“四人帮”利用了，犯了些错误。但是这些错误是跟当时的历史背景难以分开的。不是吗？在67年68年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到底有多少干部和群众能识破“四人帮”的阴谋呢？又有多少干部和群众抵制了“四人帮”的横行呢？

许多党员中到底有几个为正在被洗劫的中国人民说句话呢？要是当时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四人帮”就不可能在中国横行猖獗十年之久了。既然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对还是学生的王大宾要求那么高呢？要求他当时就能去抵制“四人帮”的横行呢？

并且，十年来，王大宾一再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但为什么一直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最后还要置他于死地呢？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不是经常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吗？但为何对当时还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就不能有这种宽恕的气度呢？

古宝琳

1980年1月

同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

呈中央：

我是王大宾的爱人。

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湖北省公安局逮捕以来，现在已经两年多了，仍然毫无消息。祈望中央能对王大宾的案子进行调查，并及早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党号召群众参加的。林彪和“四人帮”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愚弄和运动群众，施阴谋，搞诡计，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党犯了严重错误。群众吸取了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当时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大宾也只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学生，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响应号召参加运动。他是犯了一些错误，办过一些不该办的事情。但文革开始仅一年多以后，王大宾便被林彪、“四人帮”当作替罪羊抛了出来。从一九六八年八月宣传队进校之日起，王大宾就被交替地“办学习班”，“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直至“四人帮”垮台，十二年来，他没有间断过挨批挨斗，写检查，请罪，认罪。并且，加在他头上的帽子也随着政治风向不断地变幻着：陈伯达在台上，说他反陈伯达，陈一倒，又说陈是他的后台；林彪在台上，说他反林彪，林一倒，又说林是他的后台；江青在台上，说他反江青，江一倒，又说江是他的后台……世界上竟有这样奇怪的逻辑和推理。真理何在？

十二年以来，地质学院的每次运动都要以王大宾来划线的。六八年宣传队进校，是以批王大宾开始的；抓“五一六”和清队，以批王大宾为中心，造成地院冤假错案五、六百件；批林批孔，是以批王大宾为“引路”；“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批王大宾；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搞“清查运动”，王大宾依然是首当其

冲的批判对象，并被拿去“依法归案”。

其实远在六八年王大宾就已被打倒在地，在那里一直“认罪不迭”，他只参加了一年多“文化革命”，却做了地院十二年的政治靶子。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提倡讲真话，不讲假话，可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日报》登的署名地质学院的文章《王大宾是恶贯满盈的打砸抢首恶分子》（此文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解放军报》转载）一文，只有耸人听闻之心，少有实事求是之意。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牵强附会，比比皆是。此文控诉的王大宾“罪行”不是事实。

我恳求党中央派人认真核实地院整的材料，调查有关情况。

十二年以来，王大宾一贯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把自己的精力和技术献给我国的建设事业。可是，为什么一直不给他出路，不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呢？我们党，我们的国家，不是经常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吗？但对一个当时还只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为何就不能有这种豁达的气度呢？

最后我再次恳求中央认真调查和核实王大宾的有关问题。

古宝琳敬上

这些信与我在那些年里写出的其他许多申诉信一样，都是没有得到回复的。现在把它们录出来，可以作为一个历史资料，让后人了解我们当时的思想和处境，了解我们那一代人走过的是怎样的人生道路。

从我在一九八〇年写的两首小诗，可以看到我当时的悲苦心情。一首写于那年的四月：

潇潇爱恨满春池，梦沉意茫花不知。
人生春意寻何处？切切悲泪夜雨时。

另一首写于那年的九月十一日：

三杯苦酒邀春风，恨无情彩虹。
断云断桥断路，妻女离散西东。
久思念，梦相逢。
三秋已过，云雾无踪。
肠断心空。

我这个“反革命家属”到处碰壁

一九八二年，我父亲去世。这时，已经关押多年的王大宾仍然没有任何审判结案的消息。父亲所在单位广东省轻工业厅同意家属的请求，以我的户口顶替父亲的户口，将我调过去。于是我的档案从成都调到了广东省轻工业厅，厅人事部一看到我和王大宾的关系，不敢收留我。我和弟弟古榕找了很多人事关系去哀求，都没用。我家为我跑遍了广州所有与我专业有关的单位：地质局、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所有单位都拒绝接收王大宾的妻子。我的档案在广州旅游了两年。从一个单位转到另一个单位，最后退回到了成都。令我这个名符其实的“反革命家属”真正地绝望了。

一九八三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开放了。蛇口的新思维、新意识、新观念，深深地吸引着我。它打破了常规旧俗，给充满木乃伊气味的中国灌进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我弟弟古榕被招聘到蛇口培训中心学习。我请他有机会帮我联系工作单位。也许这是我在中国的唯一出路了。

在那些苦恼的日子里，我经常问自己很多问题：为何我头上的月亮总是缺的？为何我遇到的事情总是悲的？为何我付出如此多却还是步步艰辛？难道王大宾还不清楚吗？可为什么他每次来信都从不问候我，只问候他的母亲和女儿？他从不关心我的日子是怎样过的，难道他认为女人只不过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挑着走？他明明知道在中国墙内和墙外是不会有什么区别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墙外所受到的社会压力还要可怕，可是他为何从来都不劝我：你带着孩子走吧，不要再等着我受苦了。如果他这样说了，我会更尊敬他，爱他，可是他没有。在我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他连问候的话也不施舍给我。我付出昂贵的代价却得不到一点精神上的回报，为什么我不为自己想一想？……

各种问题在纠缠和折磨着我，一个人真正的痛苦来自于内心。是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当年大闹江陵的单纯女孩。

王大宾出狱和我们的分手

一九八三年八月，已经在正式逮捕后又关押了六年的王大宾，终于得到了“依法审判”，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他此前被关押的日期折抵刑期后，到当年十月二十六日就算“刑满了”。王大宾终于出狱。

所有的人都对我说：这下好了，风风雨雨的十二年终于结束，你总算熬到头了。

但是，生活并不像人们期盼的那么简单。首先，我们双方都感到很陌生，从跟王大宾结婚，到他出狱，总共十年，而我们的家庭生活总共不到一年。最长的一段相处是我女儿出生的半年。而那时，王大宾的母亲和我们三代人住在二十几平方米的单间房里。长时间的分离使我们感到生疏。一部文革前的老电影《枯木逢春》里的主题歌第一句歌词就是最适当的写照：“十年相思打了结，想唱山歌怎起头？”确实是这样，我们互相间很少倾诉，很少回忆，也很少沟通。谁都不知道对方是怎样度过这些艰难日子的。也许都麻木了。

最不幸的是，女儿无法适应和接受这个陌生的家庭成员。和我一起相依为命的日子过惯了，她嫉妒第三人进入我们的生活。而王大宾却不理解地责怪我为何不经常向女儿提及她的父亲，以致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可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只有沉默。前面“探监”一段就是为了阐明这个疑问。有时，女儿从学校回来哭诉：“同学骂我爸爸是反革命，骂我爸爸反对刘少奇……”王大宾就气愤地呵责女儿：“你为什么不打他？我们王家的孩子不会像你这样软弱！”我反对说：“他们都是孩子，不懂事。要打，不是天天都有架可打了？”又是一阵争吵。家已不再平静。

本来，出现这些问题都很正常，大家都需要时间来适应这长时间分离后的重逢。可王大宾却没有这样理解，他怀疑或认定了这些不愉快的冲突是因为我有外遇。我想离开他。他宁可听信三姑六婆的流言蜚语，也不愿意相信我。于是就做出了查我的信件，调查我这些年来与谁接触和来往这些极不明智的事。甚至连我弟弟帮我联系蛇口工作，他也说我弟弟是破坏我们家庭关系。王大宾怀疑我想调回广东是因为在广东有我的相好。

这一切，深深地伤害了我。我的心冷到了冰点。我痛苦地悲叹：难道这就是我为他付出了整个青春年华的回报？

客观地说，王大宾由于多年的关押和囚禁，与世隔绝太久。出狱，就像从坟墓爬出来一样，心态是很不正常的。在国外，像这种情况需要长时间的心理辅导才能正常地生活，可当时的中国人不会相信那一套。况且也根本没有那个条件。我也知道他的心态不正常，但我不愿原谅他。因我的付出太沉重，对他要求也越高。他的表现便坚定了我到蛇口去的决心。（左图：王大宾与女儿在深圳留影。）

一九八四年九月，我把女儿和王大宾留在成都，借探亲的机会到蛇口集装箱公司试工，发奋工作一



个月后，集装箱公司决定借聘我，我回成都办借调手续。成都厂里人事科不同意我走，说我不符合任何调动的条件，除非我与王大宾离婚。

我与王大宾商量，动员他办离婚手续，不就是形式嘛，待我在蛇口安定下来后，如果我们大家依然还希望在一起生活的话，再复婚。到时如果他调不进特区，可在关外宝安等地工作。他最后同意了。

就这样，我们办了离婚手续。我带着女儿和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了成都。王大宾把我们送到广州。

我到深圳不到三年，听同学说王大宾结婚了。

听到消息后，我倒吸了口冷气……

我不需要谁为我立贞节牌坊，但我起码等待了他十三年！（右图：1997年古宝琳陪在美国留学第一次回来的女儿去都江堰看望王大宾时母女在青城山留影。）

十三年，“想眼中有多少泪珠儿，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后来的一些新闻报道说王大宾“婚姻不幸”。不知是否有人知道那“不幸”背后有更不幸的弱势灵魂。

应该说，文化大革命的激情造就了我和王大宾的婚姻，文化大革命的无数灾难和痛苦又摧毁了这段婚姻。



结语

像王大宾这样一批被文化大革命的巨浪推向舞台的时代骄子，政治光环只在他们头上晃了几个月。就被他们的伟大舵手投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心尽力去效忠这个政权，也不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肩负历史重托，而是他们的领袖从来也没有信任过他们，也不准备去依靠他们。只是在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阶段，暂时需要利用他们的热情去助燃“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企望达到他发动这次大运动的目的，企望把中华大地引向他苦心设计的乌托邦蓝图。但他失败了。哪怕是一度鼓吹得像神一样的太阳也无法跳出自己一手设计的政治和社会怪圈。他的大胆尝试带给养育他的祖国无穷的灾难和痛苦。当然，对于发生在中华大地，又震惊了世界的长达十年之久的这段历史，如果能简单地用某决议中“动乱”“浩劫”等几个词就能描述清楚的话，当权者就不会设立长达几十年的“文革禁区”了。至今仍看不出有任何解禁的迹象。

弹指一挥间，文化大革命至今已有五十年。所谓的十年“浩劫”中，我们所

参加的活动也不过就是两年，可是这两年，给我们一生带来的影响和伤痛是深重的，甚至跨越了两代人，永远忘不掉，抹不平。

这段历史和生活，是我最不愿意写的，旧的伤痛揭开后，流出来的依然是鲜红的血。但如果不说，恐怕这一生再也没有机会去向人诉说那段历史带给我一生的悲凉和凄楚了。

分别写于 2011 年 2 月 8 日——2 月 23 日

2011 年 2 月 29 日——3 月 9 日

2011 年 5 月 31 日——6 月 4 日

2015 年 12 月 21 日修订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 2016 年 6 月 30 日《昨天》第 63 期)

古宝琳日记摘抄

(1967年5月~1968年1月)

古宝琳 提供 渔歌子 录入、注释

录入者按：本篇按作者提供的手抄稿扫描件录入，文中省略号均为作者抄件上原有。为便于读者理解，酌加了注释。

1967年5月15日

又要杀回南充了！故拿出在南充曾和我并肩战斗的战友送给我的日记本，作为翻开新的一页的标志，以资鼓励自己不要辜负南充战友和四川战友对我们的热切期望。

哈！终于来到成都了。真不容易！总部王大宾竟下这么大的决心，给我们这么大的压力，不许我们再出门串联¹¹。北京车站布下了“天罗地网”，由田春林、孟繁华、聂树人等带领我系五年级的大队来“抓”我们这些“游鱼”回校。我们这些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竟惊动了这些“大人物”，真令人捧腹大笑！我们对大西南运动的向往和参加战斗的渴望是任何力量都不可阻挡的。上了火车，我想到田春林他们的车站逮捕队灰溜溜地拉着原班人马回校到王大宾那里去领赏的情景，我更是得意了。

车一开出北京站，这批大专院校的学生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车站上的反“二七”派故意刁难我们，不给我们开水，不给饭。以为这点小事就能难住我们。真幼稚到了极点。相反，我们的革命热情更高涨了。每到一站，都拼命地呼口号。……如果为了保命，何必来西南？不如在校当逍遥派，打打毛衣，玩玩球……

到了五角坝车站，二七兵团的战友对首都革命派的热爱，那情景实在感人。看到他们激动而又紧张地为我们端开水，看到他们伸出粗壮有力的大手，没有任何语言也能交换着革命的暖流。再看看多少天真纯朴的农村小孩们在大雨中为我们唱语录歌，热泪夺眶而出。但我立即想到回答的应该是战斗！

成都的形势还是很紧张¹²……为什么会那么乱？什么事情都摸不着头脑，简

¹¹ 1967年5月14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经周恩来11日送审、毛泽东批示“照办”的《重要通告》，其中第六条为坚决执行中央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中央特许的外，应立即全部返京；外地来京的学生和群众，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

¹² 1967年5月6日成都发生了造反派与保守派在国防工厂132厂严重冲突引起保守派以“护厂”为名开枪打死造反派数十人的流血事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李全华在宣传车上中弹身亡。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时称“红十条”)，将保守派定为“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保守派强烈不满，与造反派矛盾更加激化。此前在四川省、成都市党政领导机关瘫痪后主持工作的成都军区领导人因“二月镇反”受到中央批评，新任军区领导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

直是人海战术。难道就没有一个得力的人站出来做总指挥？

1967年5月16日

……到南充去的车票今天下午才能落实。

昨晚到地质局¹³住了一夜，当然充满了万分紧张的气氛。一堆堆的石头从楼下被搬到楼上。每间屋子都不例外。对于困难，我们必须充分地估计，但对地质局的紧张气氛起码有70%是人为的。严重的右倾情绪笼罩着我校同学。为什么要把自己看成是孤家寡人？为什么不相信成都人民的觉悟？为什么要把“老产”¹⁴的力量描绘得如此强大和神出鬼没？揭穿实质就是被“老产”吓得失魂落魄了。动都不敢动，十分消极地等着“老产”去冲地质局大楼。可悲！……相比之下，成都革命派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强烈地感染着我。我院在地质局的某些人显得多么渺小！渺小得可怜！

在他们这种极右思想的指导下，当然不准我们到南充去，唯恐有生命危险。……

故我和郑敏华冒了天下之大不韪，离开了地质局，准备去闯闯这条危险的路。……

1967年5月17日

……正因为没有牢固地掌握政权，当然也就不会很好地履行无产阶级专政，难怪至今产业军仍那样猖狂，几天以来产匪活动行迹不断地被发现。抢枪支，抢粮，抢车，活埋造反派，殴打革命同志¹⁵……真难以想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见党、政、军权不掌握在手里多危险！

外面大字报骂我们东方红的很不少，真荣幸，到这里来当“激进党”，“分裂主义者”、“红代会的败类”……有骂，就有赞扬。

听说我校在六月份要和北大摊牌，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有多少问题和原则纠纷？很担心。若处理不好，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虽然不在学校，但心并没有带走。密切地注视着学校的每一个行动的步骤和计划。……

晚上上车，明天将到重庆。“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再三劝阻不要直接坐汽车到南充，危险性太大。

1967年5月22日

员尚未到任，成都一时间处于半无政府的空前混乱状态。

¹³ 指在成都的四川省地质局。

¹⁴ 老产：即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被中央定为受走资派操纵的保守组织。造反派称之为“老产”或“产匪”。实际上这时产业军的组织大部已经溃散，少部分坚持活动的成员已退到成都郊外。

¹⁵ 在当时混乱状态下，这类传言有不少是捕风捉影的夸张不实之词。

奔波的生活很艰苦，但蕴藏着战斗的快乐，饱尝了革命的气息，与人奋斗，确实其乐无穷。

万事开头难。注意调查，看准目标，就狠狠地打。不甘心做××式的人物，碌碌无为的事务主义者。这样说也未免太冤枉了她。革命热情实在高，看她整天劳苦奔波，几乎没有停脚的时间，每个会必发言，每到一个地方必做报告，又可怜，又可笑。太辛苦了，不会抓主要矛盾。

仇恨冲击着胸膛，满腔的怒火在心中燃烧，四川的战友，革命同志，一个又一个地倒下了，阶级敌人夺去了我们多少好同志……在血泊中多少颗忠于毛泽东思想的赤胆忠心停止了跳动……不，哪止文化大革命中的牺牲？几天的调查，悉知了前所未闻的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这一小撮混蛋把持着的四川，残害了多少好同志，残害了多少好干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何时照遍四川？……

坚决砸“临联”¹⁶，借此会展开全面的攻势。我简直有点沉不住气了。南充的革命如此地“平静”，也许是爆发前的沉默吧。

勇敢的海燕，迎着暴雨前的黑暗，飞翔！

1967年5月29日

要相信群众。按葛苏的逻辑，南充的材料还没有上报中央，我们怎么会把当地的群众当成阿斗？……

到成都去的同学，一去不复返。什么原因？在途中死了？可能。是工作没做完？不可能。是成都联络站不让他们回来？也可能。一天天地盼，望眼欲穿。学校的情况，北京的情况，成都的情况，都无法了解到。无可奈何！

1967年5月30日

……张国栋等六人来南充了。上午就做了报告，大张旗鼓地渲染了所谓“东方红革命委员会的声明”，不知此声明是真是假。……我不相信总部神通广大，这确实错得太远了。……这是阶级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而绝不是儿戏，不是小学生作业。……

1967年6月1日

……我们发表了声明，轰动了全城。……我们这些干将都赤膊上阵了。在广播中大喊大叫起来。真有意思。

¹⁶ 临联：全称为南充革命造反临时联络站，四川省南充地区的一派群众组织，因得到军分区支持，在“二月镇反”中协助镇压了另一些造反派，曾被造反派视为保守派，当造反派分裂为两派后，因“临联”坚决打倒四川省革筹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立场，而得到重庆八一五、成都红成等造反派和“支左”的五十四军的支持。

今天南充罐头厂的大会造反并不成功……红色造反团的领导严重的右倾情绪。甚至发展到了放弃原则，投降妥协。……

陈凤英回来谈及蒋良朴和张玉锁等人对她的态度，使人十分气愤。当然不能纯粹听一面之辞……我们这些反朱派（被诬为蔡派）¹⁷在地院终究是没有好下场的。……

1967年6月4日

怒火中烧！对我们实行大反扑。深夜一群暴徒气势汹汹地冲入我们驻地，声嘶力竭地叫骂，赶我们出校门。抓走了陈凤英。连续几天的冲突和武斗，使人头脑更清醒，看清了所谓“解放军”的真面目。……眼看着他们那样疯狂地镇压革命派，挑起群众斗群众……军分区和7795¹⁸已到了不择手段地镇压群众的地步。我坚信造反派的血和眼泪会唤起民众的。但枪杆子呢？！

我们克服了重重障碍……终于看到了陈凤英。她失去了人身自由……我们一共取得了五个回合的胜利，这样的战役太有趣了！

1967年6月7日

天有不测风云。昨天那样突如其来就少了一个同志了。这突然的不幸压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罗建是个多么有朝气的年青小伙子，就这样被激流夺去了生命。悲痛笼罩着我们。难道我们会被这悲痛缠住而变得萎靡不振，每天垂头丧气？不！振作起来，活着的就要继续战斗！

1967年6月12日

昨晚回到了北京……北京城里那样安宁，那样平静。触景生情，我立刻想到四川，南充，每天有多少造反派在血泊中倒下……

1967年6月13日

今天得悉张玉锁到南充发表声明。这在我的意料之中……

1967年6月15日

北大“0”派、“黑派”、“东风派”向聂元梓静坐示威。好得很！百思不得其解，用自己以前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在群众头上……

没有和工农群众真正相结合，就绝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派。

¹⁷ 反朱派，指当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内反对原总部主要负责人朱成昭的一些成员，蔡新平是其代表人物，故又被称作“蔡派”。

¹⁸ 即当时在南充地区参加“支左”的五十四军134师。

1967年6月17日

去年的今天，是燃起反对工作组火种的一天。……一年，是在大风大浪中游泳的一年，形势发展到今天，若在新形势下还去重复旧的口号，那必将会成为运动的阻力。也许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要及时学习，适应新的形势发展。……

1967年6月19日

运动发展到某阶段，矛盾是会转化的。革命队伍里的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亦可转化为主要矛盾，从北京运动的状况可看出这点。……饱喝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迷魂酒，在政治舞台上大搞赌博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学校里同学们精神状况不佳，革命热情低落……作了一点调查，我系女同学思想混乱到惊人的可怕，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她们游离于政治运动之外，精神空虚，饱食终日地呆在小屋子里打毛衣，抄歌，唱歌，写信……国家的前途，当前的运动，在她们的脑子里哪有占几分空间，实在可悲！

1967年6月20日

今天是光辉的“六二〇”，去年的今天……

整风已是迫不及待了。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掌权后会发展为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是么？我们有人政治、思想、生活堕落得惊人。他们堕落的步子比何长工、聂克¹⁹还快，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很有可能又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恶果，而是没有改造好的人在运动中的必然暴露。这就叫触及灵魂。

1967年6月21日

下午欢迎赞比亚总统。太阳暴晒，汗如雨下，嗓子一直在冒烟。但我还是一直兴致勃勃地昂着头、挺起胸在走……李一鸣跟着队伍走，吃力地迈着双腿，艰难地走，但她一直不离开队伍。……

1967年6月22日

破天荒第一次去卖报²⁰。……开始觉得难为情，想到一个姑娘在街上叫卖……瞬间觉得这思想多不健康……小资产阶级的“自尊”“自爱”总在我身上体现，难道我要把它们一起带到棺材里去不成？岂有此理！……我要贪婪地学习，

¹⁹ 何长工是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聂克是北京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当时都遭到了批判。

²⁰ 指上街去卖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所办的《东方红报》。

去吸取那源泉，它会使那永远扑不灭的火焰越燃越旺。

1967年6月25日

怎样正确地估计形势，怎样解释当前运动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肖华支持军队造反派为何被揪？被斗？谁批准？

谢副总理对北大和聂元梓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

中央文革小组为何常到北航而不来我校？

为何总理邀请卡翁达总统现在访问我国？

对重庆五十四军支左的赞扬是否事实²¹？

现群众组织的领导班子如何过渡到党政领导机构？

文化大革命如何收场？

……？？

1967年6月27日

今天做了整风运动报告。调子之高和决心之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那些政治投机商十分灵巧地见机行事。把整风的调子唱得比谁都高。而王大宾却不承认身旁睡着的赫鲁晓夫，我们急也是徒劳。……

写了一篇大字报《论威胁年青红色政权的一股反动暗流》，抨击了革命的同路人，反响是大的，可见触及了灵魂。……

这些革命的同路人，在地位发生改变以后，就以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发展成反动性……当然，历史的车轮会将他们压得粉碎……必须为保卫红色政权而战！

1967年6月28日

……蔡派们在朱成昭问题上的立场是对的。他们揭露朱的反动言行，怎么却成了帮朱（成昭）宣传反动观点？真是弥天大谎！……

美其名为批判朱成昭，却不能写大字报，不准触及其他人员问题，不准写通令……难怪同学们都说看破了红尘。整风的调子那么高！……我相信，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1967年6月29日

昨晚大宾的报告中所定的清规戒律简直把我完全投到蔡新平一边去了，今天

²¹ 指毛泽东对五十四军的表扬。1967年5月27日，毛泽东将五十四军有关重庆问题的电报批发给各军区、各军、各兵种，并以中央军委名义批示：“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这与当时现实中五十四军“支左”时明显的支一派压一派的表现不符。日记作者在南充就有亲身体会。

跟“托派”们共商对策。在朱（成昭）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但对大宾为首的委员会我是毫不含糊要保的，对他们的真正爱护，就是毫不留情地经常敲打他们，使他们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发自内心爱的最巧妙和高明的方式……

1967年6月30日

……第一次揭发批斗朱成昭大会。无论哪派力量都作了多方面的推敲和精心的安排……会上谁优谁劣，以群众的气氛来评价。对田春林较友好，对宋云，当然不客气！

处于王大宾的地位，也确实难，只好和稀泥。……

1967年7月1日

……最近在贪婪地学习。国际、国内的政治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

现从各种迹象表明，大宾在这次整风中依靠的力量完全是错误的，他是像巫师一样不能发现自己用符咒呼唤出的魔鬼……

1967年7月2日

“七一”整风串联会在频繁活动着，每天在商讨对策，分析力量对比，分析大宾的态度。

……整风如何整下来？多焦虑……

1967年7月3日

整风中各种矛盾交错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局面，我们虽上窜下跳的，但也觉得筋疲力尽了。……郑敏华专门跑回来叫我去参加“赤卫兵”开的联合会议，我没去，以此来发泄一下闷气……

1967年7月4日

第二次揭发批判朱成昭大会。有谁去揭发？千篇一律的批判词单调得催人入睡。我离开了会场……大字报栏里也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1967年7月5日

……我被扣上一个典型的、不折不扣的、名符其实的“喝菜汤”派²²。这一切又是多么地富有戏剧性。……蔡们敢于在一片谩骂声中逆着潮流而上……以近乎疯狂的热情去战斗……当然，周、蔡之辈的狂妄自大也是惊人的，自命不凡，

²² 当时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内部，支持朱成昭的被戏称为“啃猪蹄”派，支持蔡新平观点的被戏称为“喝菜汤”派。

总要做出与众不同的动作，摆出超越凡人的姿态……从最坏的方面去想，若他们继续目中无人，自我欣赏，那么他们的下场也不见得比朱成昭更好。

大宾对蔡新平们的态度是缺乏一个革命者的胸怀的……工作中有反对派经常敲打自己，就常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任何昂贵的代价也难以得到的好处。

1967年7月6日

要复课闹革命了。是时候了。同学们的思想状况，再拖下去真不堪设想。精神太空虚……

1967年7月7日

看《形式逻辑初步》……

1967年7月8日

看巴金小说《寒夜》……

1967年7月10日

为了不做“沉舟”，今天到游泳池一口气游了一千米，因抽筋而结束……

开了个串联会，还是针对总部的整风而来，蔡新平、周永璋等对形势的估计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不能同意……他们抨击了以王大宾为首的总部所执行不相信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的处境是困难的……但绝不能当两面派。

1967年7月19日

已经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竟然用武斗来压服我们。这岂不是自取灭亡吗？……是批判邓，还是压群众；是大联合还是搞分裂……大宾的态度基本上是正确的。……

1967年8月14日

忽闻我院外出战士牺牲的消息。沉重，悲痛。但革命是要付出高昂代价的。我准备到广州去。无疑危险性还是很大的。……

1967年8月16日

审讯叶向真……我们哪能对付得了她？凭着我们掌握的真理，就能战胜她？……我和郑敏华决定主持群众审问叶向真，利用群众的力量去打击他们的反革命气焰……曹敏九他真有点迂，使人哭笑不得。他怎么总是这样工作得没条理，

毕竟太年轻……

往广州去的车什么时候能开出？……

1967年8月17日

东方红公社成立一周年纪念。一年前的今天……回顾一年的斗争，再看看现在……没改造好世界观的知识分子要扛起革命的大旗多困难！……创业难，守业更难！啊！红色的政权，年轻的当权派！

看晚上的庆祝大会，红旗林立，红灯高挂，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我好像才恍然大悟：嘿！东方红的老本还没吃完呢，仍可拿到银行去取利息……

1967年8月22日

我从来没有这样逍遙过。环境的感染使我无法挣脱。可怕极了。还不如到广州。……

1967年8月26日

现在武汉车站的站台上，两天以来几乎粒米未进口。但无奈。南下的火车一直没开。……抢上国际列车，先到衡阳再说。……5次车还未到。啊！艰苦的历程。

1967年8月27日

现在在衡阳车站站台上。在汉口抢上5次国际列车十分顺利。离开蒸笼式的武汉，满以为会松一口气，谁知上车后拥挤得几乎无插针之地，汗流满面……这样坚持站了十小时之久。上帝保佑，总算没有昏死过去。在长沙的北岸站，车停了两个小时，抓走了两个湖南红旗军²³，获三支枪，连放了三枪，是否有人应声倒下不清楚。株洲站不知何故停了一小时之久，来到衡阳。5次车无法再南下。到广州去的车简直没有。……从武汉以南到处是一片备战气氛，扛枪者林立，严阵以待。……

1967年8月29日

昨晚终于回到广州。……途中几天，疲劳极了。今天休息，明天上街看形势。后天到我院联络站……

²³ 湖南红旗军：湖南省于1966年底由一批原解放军荣誉、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组成的群众组织，1967年初因中央明令不准荣复退转军人单独成立组织，曾一度被解散，部分成员遭到抓捕，后恢复组织，不再强调荣复退转军人身份，吸收了其他人员，是湖南较激进的造反派组织。

1967年8月30日

到交协大楼去找我院同学。爬上八楼，见红代会各校同学分别住在各房。……外国人住的宾馆也未必有这样华丽。我紧锁着双眉，和我院仅有的几个同学了解了一下情况……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有干，只是住在高楼大厦，心安理得……现阶段，串联已完全失去意义了。……

1967年8月31日

参加了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的成立大会²⁴……军管会按黄永胜的指示支持了大会，并授了一面红旗。……

罪该万死的“地总”²⁵用炮打伤了越南、日本各一只国际商船，他们还派了三艘军艇封锁了黄埔港，我真怀疑他们是不是中国人。在氮肥厂二百多支左解放军为抗议“地总”的法西斯暴行而进行绝食斗争。昨晚水厂被“地总”用机枪扫射。不知有否伤亡？……商店关门，工厂停工，机关就更别说了。……文化大革命要如何收场？……

1967年9月2日

悲愤突然袭来，何力行死了。像做梦一样。越秀山开会我还和他详谈。他要我去华工学院找他。知他是个头目，而他今天已离开了人世，中了汤姆弹。……

昨晚枪声炮声彻夜未停。枪声几次将我从梦中惊醒。房子都在震动，枪声、机关枪、大炮也连续地响，“地总”去抢了河南（广州珠江以南）的出口仓库。“旗派”便武装起来，坐着三艘汽艇去保仓库。……秘密军火库被袭，最新备战武器被抢。黄埔港被“地总”控制……

让这些学生掌握了枪杆子就会取得革命胜利？我不相信！……我们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铁军的整齐步伐。

1967年9月3日

无数的北京来电都报道了北京轰林杰和谭厚兰的消息……

昨晚“地总”抢仓库，用炮攻打，仓库着火。十几辆救火车忘我地奔去抢救也无效。几万吨粮食化为乌有。亡命之徒！丧家之狗！简直是在出卖祖国。他们闭起眼睛乱扫枪，将一无辜的司机和一乘客白白打死，杀人不眨眼的暴君！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快开了，面对此混乱的局面如何收拾。让外国人看见我

²⁴ 当天，广州“红旗派”的工商联、红旗工人、八一战斗兵团、工人红司、广州工人、财贸红旗工人、交运红旗、新地总等组成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工革联。孔石泉代表广州军区到会向工革联授旗，并在讲话中承认军区在“支左”中犯了错误。

²⁵ 地总：全称为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是广州“东风派”的主要工人组织，得到广州军区支持，但该派曾被周恩来称为“保守的群众组织”。

们在自相残杀，影响有多坏。……

1967年9月4日

今天来到东莞茶山公社²⁶。中午一点多到后，连饭都没吃就随社员一起上工，拔秧……这里是文化大革命的世外桃源。城里换了皇帝这里都不知道……

1967年9月9日

……“战广州兵团”已解散，我校同学都要回京。……

看来我校对林杰问题可能会犯错误。谭厚兰亦可能因林杰问题而被揪……局势如此动荡，斗争如此变幻，而我们又是如此年轻，怎可能保证不犯错误？……

1967年9月10日

传说林杰、关锋、王力被撤职。震惊！不可能。若是这样，中央文革还剩几人？毛主席司令部还剩几人？……岂不是又打击了一大片？……

1967年9月12日

昨天大街又发生了一骇人听闻的大惨案，目睹惨无人道的杀人，谁不怒发冲冠？无辜的群众在一片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中倒在血泊里，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今早4点到6点炮声不停，房子在摇动着。新桥对面的“工联”总部被“地总”轰平……越秀在默哀，白云在怒吼……

1967年9月14日

……奔波了几天仍未搞到回京的机票……

1967年9月27日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在这样的社会里，特权的势力是很强的。特权思想不仅存在于特权者身上，而且大量地存在于非特权者之中。这就是特权的社会基础。没有这种社会基础，特权者也无以生存。……这就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1967年10月16日

参加秋收劳动回来。几天的劳动……除了累之外，思想收获不大……

真的要全面复课闹革命了。回校后将立即投入一场新的战斗……

²⁶ 作者去看望在东莞下乡插队的二姐古宝新。

1967年10月27日

复课第二天了。老康²⁷绝不能在我系教改中占主导地位，否则教改就会演成流产的悲剧。……连教改此关都通不过，又何谓叫造反派。因此我们以“打倒康有为战斗队”写了两张大字报，就引起昨天几乎全班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大家对71654班造反不上课的事争论不休，万般指责……

面临一场更尖锐更复杂的斗争。这是更高意识形态的斗争……才使教改出现如此艰难的局面。……

1967年10月30日

今天展开了全系关于教改的大辩论……通过辩论，自己思想确实有不少提高。以前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现变得明朗了。……

1967年11月1日

难道知识分子能统治和领导工人阶级才是有前途的？……

访问了地质部。在那里，那些知识分子坐在沙发上空谈革命……

1967年11月5日

昨夜和吴坤正谈心。有不少新的启发。运动发展到现阶段，已不能那样醉心于自由了。毫不加限制的自由并不比危险来得更好。我们不要刘少奇的黑修养，但我们应该有革命的修养……必须使自己在政治上成熟起来。

1967年11月9日

高尔基的《没用人的一生》并无多少战斗的价值。不过是一本现实主义的小说……

1967年11月10日

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在党内长期反党，反列宁。在革命的每一个转折关头都反对革命，然而却长期未被清除出党。但1921年苏共清洗了25%的党员，什么原因？一个党将25%的党员清洗出党，难道还不是打击了一大片？可列宁却肯定这次整党是巩固了党，并使群众和党更接近了。怎样解释？

²⁷ 老康：指康有为式的改良派。

1967年11月13日

《联共党史》最大的优点就是深刻地反映党内两条路线尖锐而又复杂的斗争，尤其前面绝大部分，都以党内路线斗争为纲。明确和如实地记下了伟大的苏联人民斗争的历史……

1967年11月15日

今天红卫兵临时总部宣布红卫兵取缔共青团。像我们不是红卫兵的共青困难道要重新申请加入红卫兵²⁸? ……否定一切的人最终也否定了自己，甚至毁了自己……

1967年11月17日

……对复杂的社会，要提高阶级警惕性。不可轻易信任你所不了解的人……和老九（曹鸣九）分析陈闯²⁹，要他提高警惕。……老九实在太幼稚，被狐狸的眼泪感化了……必须擦亮眼睛，分清是非！

1967年11月20日

……每天手不离卷地看书，沉醉在知识的海洋之中……

1967年11月21日

教改始终深入不下去……每迈出一步都如此艰辛，分析原因有四：……

1967年11月29日

……追悼刘彩云、卢福田、杜洪涛三烈士。不用低着头默哀，昂起头，直视着前方，继续战斗……

1967年12月1日

形势串联会今天开得比任何时候好……政治理论学习必须结合实际，才不会脱离现实。……

1967年12月2日

²⁸ 各学校中同一派的造反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群众组织最初有出身成份的区别，红卫兵要求“红五类”出身才能参加，而造反派组织则不限出身成份，类似于该校造反派红卫兵的外围组织。但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这种强调出身成份的“血统论”观点遭到否定，后来东方红公社成员全都戴上了“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的袖章，在外也都被视为红卫兵。但一些如古宝琳这样的非“红五类”出身的成员仍认为自己没有参加红卫兵。

²⁹ 陈闯，一作“程闯”，外地来京串联的青年女教师，十分活跃，常进出于地院，还常在中央首长接见三司成员等场合出现。

今晚批准了大宾、聂树人入党，并以李贵、王大宾、聂树人为首成立了中共地质学院核心小组。

入党，意味着身上压了一副重担，而不是标上一个光荣榜。……祝贺他。

1967年12月4日

王焕是个无所作为的政治庸人。没主见，没气魄，没胆量，唯唯诺诺，这样的人很难想象他能立场坚定，坚持真理……高元贵是必须批判，但他和王焕不同……但现实中，唯唯诺诺的人反而会吃香。……

1967年12月8日

到底要什么样的党员，要什么样的整党小组，怎样整党？

1967年12月10日

……整党开始了。……

自信的人往往被诬为骄傲，但一个人必须有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只有自信的人才会有所作为。……

1967年12月13日

……思想不交锋，矛盾不暴露，保持一团和气是最可怕的。一潭不流动的死水终将不会获得奔腾与飞跃的生命……每天和吴坤正、黄亚元吵，尽管吵翻了天，也不会彼此抱有丝毫的成见。……今晚的争论谁也不留情。

1967年12月17日

怎能心安理得地去做运动的“观潮派”。逍遥时的心情比奔忙时痛苦和难受得多。必须干起来，于是今天就办了《野火》刊物，并出了第一期。

1967年12月18日

对我们《野火》的出刊，我系同学还是很重视的，我们必须紧接着走下去，不要辜负同学们的期望。然而，我们不是“玉”，只是“砖”。……

1967年12月19日

去访问田春林，去了解其错误的真相。如带着派性和成见去看一切问题，都会有偏见，势必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任何调查研究如果预先带观点而不客观地去看，也会走向歪道。……

1967年12月23日

……访问陆炎德，调查61—63大反扑时期的材料，意外地得到其他一些收获。……李仲学的活动使我心越来越不安，我总预感到他会走向反面。这将是可怕的结局……我很想拉他一把，但无法和他详谈，一言半语也无法说服人……他在尽力地避免和我接触……

1968年1月11日

李仲学找我谈，要我放心，说他是能鉴别香花毒草的……他提到大宾曾给他一封信。……

1968年1月15日

……我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课了。……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6年6月30日《昨天》第63期)

工作组召开的一次批判大会

——文革回忆录

梅村

1966年5月，我们北京地质学院古专二班分成两组到外省实习，大多数人去了湘鄂交界的恩施、桑植，少数学生到了陕西汉中。我去了汉中，由赵锡文老师带队。

那次实习，从城固许家庙开始，当搬家到土垣时，接到学校通知：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这时工作队已入驻学校。有一次召开批判大会，地点大概是学2楼二楼。由工作队事先组织安排好的会场鸦雀无声，一派萧杀。大家都正襟危坐坐好了，突然一声大喝：“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祖如押上来！”江祖如是我们的老师，大学没有班主任，一个年级有2个辅导员，负责日常学生的思想、学习和处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

但这事谁也不会多想，工作队是上面派下来的，是党的代表。既然把反革命分子江祖如“压上来！”肯定有其原因，不会有错，要相信党吗！那时学生思想单纯，党说干啥就干啥，党说谁反动谁就是反革命！以往“土改”、“四清”不都是这一套吗？于是跟着高呼口号。

这惊天动地的口号声确实令人胆战心惊，不由得想起1957年反右时的一幕。那时我13岁，刚上初中。晚上召开批判右派大会，每个班只让年龄大的学生代表参加，我因为年龄小，没有去，和其他同学都已经熄灯入睡了。在这农村静谧的夜晚，远远传来从会场发出的惊天动地的令人恐怖的口号声，这是在批判一个女几何老师，因为她教课教得好，有才，出身不好，于是右派便轮到了她的头上。这个女几何老师姓吴，平时叫她吴老师。打成右派后，便没人叫她吴老师了，都叫她“吴老右”。她见人低三下气，尽管如此也没人理她，多半是不敢。后来得了气管炎，据说没几年就死了。

现在再回到会场，批判江老师的是他平时发展的入党积极分子，他的得意门生，怎么翻脸不认人了？批判的内容是：江祖如这个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竟然反对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原来，这个学生为了入党，晚上等大家都熄灯入睡后，他一人到楼道里昏暗的灯光下学“毛著”。有一次江老师碰到后说：“楼道的灯光太暗，别把眼睛看坏了”，这可是个重要的反革命证据，看毛主席著作只能是越看眼睛越明亮，怎么能把眼睛看坏呢？这不是反革命又是什么？！

奇怪？奇怪？那个年代确实奇怪？！在那个心理扭曲、黑白颠倒的年代，无论谁都要这样做的，江老师也没有怪罪那个同学，因为叫谁都会这样做的，责任都归到四人帮身上吧。

编者按： 梅村 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古生物专业。

【外地串联】

我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与处理的两个事件

丁育民

作者简介：丁育民，上海人，文革爆发时为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63级学生，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成员，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办公室主任。1966-1967年间，参与了上海“安亭事件”和新疆乌鲁木齐的“八楼事件”的处理全过程。

(右图：作者近照。)



楔子

五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了，但回忆起来，还犹如昨天。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我被偶然的机遇，推到了当时一些重大事情的风口浪尖上。事件经过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当时却是震惊全国，震惊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大事件！尤其是前一个事件，它的结果多多少少影响了中国以后十年的局势。我亲历介入了那两个大事件。久有用文字记下来之意，但却因种种顾虑而没动笔。今蔡新平和田春林等老同学发起写回忆录活动，他们动员我把那段历史写下来，我觉得再不写下来以后可能就没人知道了，所以也就欣然动笔了。

我是一个愿过世外桃源式生活的人，却卷入了如此重大的事件，也不知老天爷是怎么安排的。

书归正传吧，那两个事件，就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七年一月相继发生的上海的“安亭事件”和新疆乌鲁木齐的“八楼事件”。这两个事件是文革开始以来的两个第一：第一次几千工人卧轨拦火车，第一次几千学生静坐继而绝食示威（也许是解放后的两个第一）。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却在短短的两个月里都让我碰上了。事件中的高层机密我当然不清楚，我只是就我亲历亲为的事实照实叙述罢了。

事件一、上海安亭事件

一、走进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

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号召广大青少年进一步发扬革命大串联精神，让青少年到全国各地熟悉社会，经受锻炼。那时留在各高校和中学里的学生已经很少，基本上都已到全国各地搞“串联”去了，我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内也已是学生寥寥。反正早已不上课了，学校的运动在群众中已显得平静多了，留在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无所事事。到了十月二十六日，我在学校感到无聊，也就乘上火车（反正那时学生坐车也不用花钱）回到了上海家中。

十月二十八日我去一个老同学家，得知我们一个同班同学也在上海。到了十一月三日，我联系到了那位同学，他原来和一些北京地院同学在上海静安寺愚园路311号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刚成立了几天，站长是北京地院勘探系的江涛，后来我得知他原名姜金柱。十一月四日，我见到了那位同学，他告诉我联络站刚成立，缺少人手，动员我到联络站去帮忙。十一月五日我和那位同学到了愚园路311号，那是路边的一座带院子的独立的三层楼小洋房，是江涛等与上海市委作了一番争取后上海市委划给联络站的房子，市委同时拨给联络站一辆吉普车，一辆摩托车和几辆自行车，两架打字机及油印机和电话机等，还拨了两三千元活动经费。这个联络站开始是北地东方红发起，以后陆续又有三司其他学校和北航红旗等学生来加入。因属初创，联络站里显得比较混乱。我去的时候大约有二三十人，当天江涛就让我去接待上海各界的来访者，来访者还真多，联络站虽是初创，却已有不少人来访，我第一天就接待了五批来访者。我这个“散人”第二天就被江涛任命为联络站的办公室主任，站里的这些车和经费等都交由我管理，每天还继续接待各路来访者。因此天天也就在忙忙碌碌中度过，有时甚至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觉。

我记得我刚接管钱财那天下午，江涛带来两个人对我说：“这是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代表，他们没有经费买纸和笔，站里先借给他们二百元钱吧。”我拿出了二百元钱，并让他们写一张借条，他们中的一个约三十来岁的长得比较清秀文雅的男人给我写了一张借条，并在下面签下了他的名字：王洪文。就是这个王洪文，几天后和我以及张春桥等进行了一场较量！但那天我根本没太注意到这个人。这张借条在我以后去新疆时随其它钱物一起转给了接手办公室主任的彭善慈同学。

这样一直忙碌了近一个星期，到十一月九日，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

二、安亭事件的由来

在我到上海的前后几天，上海的一群人，主要是一些工人，也有一些工厂的基层干部，酝酿成立了一个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组织，他们的负责人有后来扰乱了上海甚至全国的著名人物王洪文、王秀珍、潘国平和陈阿大等。开始他们由几十个人很快联系发展到了几万人。他们向上海市委提出了一些要求，尤其是要求上海市委正式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上海市委一直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在十一月九日强行分乘了三列火车出发去北京，声称有一万多工人要去北京向中央告状。中央得到上海市委的报告后，认为绝不能开启工人串联的先例，命令立即将这三列火车就地停驶，结果这三列火车分别停在了南京、苏州和上海西面的安亭。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都在停在安亭的这列火车上，这些人进而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他们让一些工人坐卧在铁轨上，有几个人站在路中间挥舞着大红旗，并让人用红布包住了火车通行的绿色信号灯，致使正要快速通过安亭车站的14次特快列车紧急刹车，因14次特快在安亭是不停车的，所以车速很快，紧急刹车造成了车窗玻璃碎裂，车内物品乱倒乱飞，乘客一片惊慌，车上还有人受了伤，而且车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外国朋友，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从九日早晨起，上海西行的铁路一直就不能通行，严重影响了京沪线的交通。这就是后来称之为“安亭事件”的大事件。

三、参与解决安亭事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十一点，三司驻沪联络站里的其他人都在上海各个地方进行活动，主要是在了解安亭的情况，站里就我一人留守。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我他是张春桥的秘书，现在张春桥刚从北京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是专为解决安亭问题而来的。这位秘书要求我在联络站里等着，他们马上派车来接我去虹桥机场，以便和张春桥一起去安亭车站，协助解决安亭的问题。

当时站里就我一个人，我这之前从没见过张春桥或他的秘书，他们大概只要有三司的学生陪同去安亭就行，可见当时是如何的倚重三司。张春桥当时不仅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而且已经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在当时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过了大约十来分钟，站里回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北京地院的徐娟娟，一个是新北大的董新中。我就简要地把情况跟他们说了一下，让他们等着跟我一起去虹桥机场。

大约半小时后，张春桥派来接我们的那位秘书乘上海牌小车到了联络站，我们上车后立即开向虹桥机场。

我们的车一直开到了虹桥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门口，下车后那位秘书领我们直接进了休息室。张春桥过去我只在新闻片里见过，但见了面还是能认出来的。当时他坐在休息室正中的沙发上，披着军大衣，夹着香烟的手指被烟熏得蜡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尖削的脸显得有点严肃，他周围围坐着一些领导模样的人，后来经他介绍我才知道是上海市的一些领导。他见我们进来，立即站起身来和我们握手，跟我们说：“我是张春桥，欢迎同学们！”我也说：“我是三司联络站的丁育民，见到你很高兴！”几句寒暄和相互介绍了其他人后，他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我们立即进入了正题。张春桥拿出了一张约5厘米宽、15厘米长的字条递给我，上面用铅笔很潦草地写了一句话：“不解决安亭的事情就别回北京”，张春桥告诉我，是毛主席亲自让他来的，当天北京飞上海的班机已没有了，毛主席派了一架专机送他来上海。他离开北京时，当时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写了这张字条给张春桥。他并把十日和十一日陈伯达打到安亭的电报手稿让我们过目。他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工人同志立即回上海，不能去北京，一切问题在上海解决，以免影响生产和交通，也以免开创工人串联的先例。”我们当即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表示愿意立即去安亭协助解决那里的问题。我们立即起身出来上了一辆等在外面的小汽车，张春桥坐在后排的中间，他让我和董新中坐在他的两边，徐娟娟坐在副驾驶位上，车子就立刻开往安亭，我们的后面跟了一溜十几辆车，那是上海市的一些领导和随行工作人员。

这里我要插几句题外话：二十多年前我看了上海的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写的“四人帮传”，其中《张春桥传》里有一章专门写安亭事件，那里面写的东西有一些与事实有出入，比如说，他写是包炮陪同张春桥坐车去安亭的。包炮是中央美术学院学生，他当时是以首都一司成员的身份来上海的，但是也在三司驻沪联络站参加过活动，因为当时来上海的学生还不大注意一司、三司的区别，反正是北京南下学生就在一起活动。正是他鼓动了上海工人去北京“告状”，他这时正和那些工总司的头头在安亭。我在这里为叶永烈先生作个更正。

话说我们在车上，张春桥和我们说了好多与安亭无关的话。比如，他谈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二月份左右毛主席在上海的情况，北京目前的情况，十一日当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七次接见一百七十万革命师生的情况，有关上海市委的问题，等等。他甚至指着他脚上穿的一双咖啡色的皮凉鞋对我们说：“今年夏天中央召我到北京，一直忙碌工作到现在，连买双鞋子的时间都没有，现在天冷了还穿着凉鞋。”真奇怪他当时怎么没有说我们到了安亭怎么行动的问题。

当车行到离安亭不太远的地方时，只见对面疾驶过来一辆轿车，向我们闪

着车灯，似乎是在向我们发信号，我们的车队就停了下来，那辆车停到马路对面，从车上下来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急匆匆跑到我们车旁，我们的司机打开车窗，那位男子焦急地说道：“安亭车站外围聚了很多手持铁棍的工人，形势紧张，为了安全，请你们暂时不要到车站去。”

当时张春桥简单问了几句，就说：“这有什么可怕的，到工人中间去，不怕！马上去安亭车站！”于是我们的车队继续前行，很快就到了安亭车站外。这时已是十二日凌晨一点多钟了，我透过车窗见到许多工人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持齐肩长的铁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从车站铁栏杆上卸下来的铁条），围站在车站前和马路上，气氛显得非常紧张。

这时很多工人围了上来，车队停了下来，张春桥让我们都下车，那些工人见张春桥下了车，可能有人认出了张春桥，就大叫着“春桥同志来了”、“春桥同志来了”，我们这几个人就被他们半簇拥半推挤地弄到了附近的安亭无线电电器厂里，拥进了一个有着一条长会议桌的会议室里。

会议室里乱哄哄的。不一会儿，进来了一小群人，自称是工总司的负责人。当时他们也都很热情很激动地叫着“春桥同志”，张春桥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双方在长条桌前坐下了。他们工总司的人坐在桌子的南面一排，张春桥让我和徐娟娟及董新中在他左右坐在桌子北面，然后市里的那些领导也在我们两边坐了下来，俨然形成了隔着桌子的谈判双方。

双方作了自我介绍，对方工总司的人员（好些名字是我后来记下的）有：潘国平、陈阿大、王洪文（就是那个借钱的）等，还有北京一司的包炮也和他们坐在一起。

接着，张春桥传达了中央对安亭问题的指示精神，指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非常关心发生的事情，工人们无论如何要遵照中央的指示办，迅速回上海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问题可提出来，在上海就地解决。中央授权给张春桥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力。工人的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在场的上海市领导和张本人可以和工人代表们当场协商解决，如实在解决不了的，可以马上请示中央，问题总是能解决的。

张春桥说完后，会场上静止了几分钟，没有人说话，张春桥也在静静地等着对方回答。

突然，潘国平（当时给我的印象，无论在穿着或气质上潘国平和陈阿大是典型的大老粗，看着他们总让我想起电影中的地痞流氓，可后来他们竟成了上海市总工会的负责人）声音很高地叫了起来，他说：“不行！我们一定要上北京，向中央当面要求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有一万多人，我们绝不会回上海！”他也不说为何不行，总之，就是要去北京！这就是无赖的逻辑。接着，对面一些人以

及后来陆续挤进来的一大群工人都七嘴八舌地高声附和及支持着潘国平，陈阿大还拍着桌子叫道：“不行，我们要去北京！”有人甚至举起手中的铁棍挥舞着。会议室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当时我也急了，站起来高声对大家说：“大家静一静，好好考虑一下中央指示的精神，千万不要冲动！”但我的声音完全被那些喧嚣掩没了。当时市里的一些领导都面面相觑，后来都站起来说：“大家静一静，听春桥同志说！”慢慢地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张春桥。

张春桥站了起来，神情还显得非常镇静，他当时讲的话我清楚地记得，他说：“工人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你们要去北京，这不是小事情，如果你们去了，那么江苏的工人也要去，浙江的，江西的也要去，全国的工人都要去北京，你们想想，这将是什么样的情景？这可要全国大乱呀！工厂没人做工，弄不好农民也要去，那怎么办？所以千万要冷静，不能因为你们而影响了全国的局势！”这下子，工人们渐渐静了下来，好像有所醒悟，都在互相低声议论起来。

但没几分钟，那个包炮的几句话又点燃了工人们的激烈情绪，包炮看上去很文静，一张白净的脸，一双机灵的大眼睛，他说：“说这些没用，我们是下了决心要去北京找中央面呈我们的意见的，我们是下了决心要去北京的。”他这几句话说得很轻松，脸上很平静，但就是这几句话，刚刚有点安静的工人和潘国平，陈阿大们又都大叫大嚷起来，无论上海市委的人如何摆手让大家静一静，都起作用。那个王洪文当时在我印象里好像显得很镇静，自始至终没叫嚷过，只是不停地和包炮、潘国平他们窃窃私语。

乱了好一阵子，我实在忍不住了，也许那时年轻气盛，也许是初生牛犊不畏虎，我突然学着陈阿大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叫道：“你们想违抗中央命令？你们想违抗毛主席？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做会是什么结果吗？包炮你是什么居心？”没想到经我这么一声断喝，会议室里登时鸦雀无声，很快静了下来。过了一小忽儿，包炮才慢慢说道：“我们不敢违抗中央的命令，我们只是想让中央直接听到我们的声音。”王洪文、潘国平他们低语了一阵后，潘国平站起来粘粘的说：“我们服从中央的指示。”刚才那嚣张的气焰一下子都没了。

后来想想，这也是以蛮制蛮的方法吧。被那么多手持铁棍的工人们包围着，我竟没有丝毫害怕，还拍桌怒斥，真是年少不知天高地厚啊。

这以后才开始进入了比较心平气和的谈判。经过几轮的反复讨价还价，最后张春桥代表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他们向上海市委提出的各项要求等回到上海后逐条协商解决。工总司方面同意在安亭的上海工人立即返回上海，由市委方面组织车辆接回上海，并商定了由我们三司联络站派出一些学生，会同工总司的一些代表，上海

市委市政府也派几名有关负责人，一同赶赴南京和苏州，劝说停在那里的上海工人立即返回上海。

事情有了着落，我即由接我来的车子送我回联络站向站里汇报，并准备组织去苏州和南京的学生代表。到上海时已是上午九点多钟了，可是我刚到联络站和江涛说了没几句话，又接到张春桥亲自从安亭打来的电话，说工人代表和包炮在去车站内的路上，突然改变了主意，又重新回到了会议室，仍旧要求去北京！安亭的情况又紧张起来了，张要求我们多去些学生到工人中间去做工作，并说已派车来接我们。这样我和江涛及在站里的好几位同学一起又回到了安亭。

到了安亭的那个会议室，张春桥向我们介绍了我离开后的情况，要求我们立即到车站现场去做工作。我们马不停蹄地到了火车站内，几个人分头向他们的头头和工人群众陈说利害，反复宣传中央指示精神，这才将那些在场的头头和工人说动同意马上返沪。正在这时，另外一部分工人用大卡车把张春桥从会议室拉到了车站内的列车车厢旁，当时在场的工人们突然激动起来，大家都高呼起“毛主席万岁”来。此时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大家都淋着雨，围在张春桥站立的卡车周围。当时记得有一个小插曲，有人在车上给张春桥撑起了一把伞，张春桥却推开说：“工人同志们都在淋雨，我不要撑伞！”这就感动了工人群众。张春桥站在卡车上重申了中央的指示，反复劝说大家返回上海。我们的同志也散在工人当中极力说服动员，最后大多数工人上了几十辆由市政府派来的大客车和大卡车离开了安亭驶回上海。

雨停了，但还有二三百名工人留在车站里不同意回上海，他们在一名叫“左坚”的北京化工学院学生的煽动下，开始向张春桥进行围攻，他们把张围在卡车上不让休息，并不准我们开来的几辆汽车离开车站，也不准我们的任何人离开车站。当时张春桥让我上了卡车，低声叫我马上回上海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他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叫我电话向中央汇报安亭的情况。

我和他的秘书马上准备出站回上海，但车不让开出，人也不让出站。我绕了一个圈子，找了个空档一人出了车站，正好一个北京中学生开着我们的摩托车到了站外，我立即让他带我回到了联络站，此时已是下午三点来钟了，我立即打电话到中央文革小组，一位姓钱的工作人员接了电话，他告诉我文革小组成员都在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开会，不能来接电话，我将安亭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他说马上去人民大会堂汇报。

我紧接着又把电话打到了三司总部，是田春林接的电话，我把情况也向他详细说了。打完电话，我这才感到了饥饿，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三点多，我还没吃过东西，所以我马上到附近小店买了包饼干，回站里和着开水吃了。

到了傍晚，江涛他们才从安亭回来，告诉我，我们的人和张春桥等做了大

量工作，后来又接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打来的电报，留下的工人才答应全部返回上海，等工人全部离开安亭后，我们的同志和张春桥才回到了上海。

四、安亭事件后续问题的解决

虽然在安亭的上海工人全部回沪了，但在苏州和南京还有不少上海工人留在那里，我们从安亭回上海后已派了几个人去那两个地方做工作，已劝说了一部分工人返回了上海，但还有一部分工人不肯回来。到了十一月十九日晚上八点，我和江涛等八位同学一起到当时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和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上海市负责工业口的周璧，上海市委的梁国斌，《解放军报》记者刘占玺，以及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丁学雷（即后来的市委副书记徐景贤）开了一个会，讨论解决了当时上海的一些问题，并研究决定，我站再派出九位同志，会同市委的两位同志，明天分头开车去苏州和南京，劝说尚留在那里的少数工人回上海。会议一直开到夜里十一点才结束。

这次会议上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会议开始前，我们同去的一位北京中学生，叫李民华，发现市长曹荻秋穿了一双长长的黑色尖头皮鞋，这位同学有点气愤地指着曹说：“你怎么还穿这种资产阶级的尖头皮鞋？”曹市长当时显得非常惊慌，甚至有点唯唯诺诺地回答道：“你批评得对，我今天回去马上换掉！”两天后在另一个会议上，我注意到曹市长果然已换了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上他都穿着这双布鞋。一个堂堂的上海市长，对一个普通中学生，竟如此态度，在现在简直不可想象。

第二天一早，派去苏州和南京的人就出发了，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凌晨，终于将留在南京和苏州的上海工人全部接回了上海。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多，张春桥在上海红都剧场（离联络站很近），接见了刚从南京和苏州回来的及部分从安亭回来的共一千多名工人代表，市长曹荻秋也参加了接见。我也被通知去了。坐在主席台上往下看，我发现前排座位上坐着一个好像面熟的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姚文元，他为什么坐在下面，他什么时候来的上海，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近距离见到姚文元。

下午三点，张春桥到我们联络站来会见了在站内的全体同志，感谢我们在安亭事件的解决上做出的努力，和我们举行了座谈，用写大字报的毛笔和纸给联络站题了词。刚从南京回来的我院朱德瑜为座谈会拍了好多照片，至今我仍保留着一张当时他照的照片。

从那以后，除了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见过一次张春桥外，我再也没见过张春桥。

大约在十一月二十五号左右，我们征得了上海市委的同意（当时上海市委派了一位处长叫沈宗平的专门做市委和我们之间的联络员，沈经常和我见面联系。还有一位叫周璧的上海工业口的负责人也经常和我见面联系。我好几次帮他们参加一些群众大会等），由周璧签署了一张字条，让《解放日报》的总编马达负责帮我们印发两份当时最新的《首都红卫兵》报，我拿着这张字条和那两份《首都红卫兵》报到解放日报社找到了马达总编，他已经接到了上海市委的通知，所以马上答应付印。我为了尽快出报，当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马达说：“你可得开足你的这台马达尽快把报纸给我印出来！”他笑着说：“后天保证把报纸送到你们站里！”

果然，他按时把报纸送到了我们联络站。每份 20000 张，一共 40000 张。当天下午我就发动了在站里的所有同学分头拿着报纸上街去卖，每份卖 3 分钱。没想到上海市民都排队抢着买！到第二天上午除留下的一小部分分送有关单位外，全部都卖完了。收回了大约 1000 元钱，我把这钱交到了解放日报社财务科，财务科给的收据我一直保存着，时间长了，认真找的话可能还能找出来。

十二月三日，联络站和上海市委派我和朱德瑜同学陪同工总司的十二名代表乘十四次特快列车去北京，这十二名代表中有王洪文、王秀珍等人。到北京后，由朱德瑜联系这些工人代表去见中央文革负责人。我在北京待了两三天，就乘车回上海了。

让我以一首打油诗结束这段回忆吧：

张春桥深藏不露蛇蝎心
王洪文貌似文静实狰狞
上海滩二人联手乱中国
和江姚四人结帮风浪兴

事件二、新疆乌鲁木齐八楼事件

一、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晚七点左右，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里就我一个人在值班，其他的人大多数去参加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上海市委写作班丁学雷（即徐景贤为首的写作班的化名）起来揭发上海市委问题的大会了。前两天夜里近 12 点钟徐景贤派人把我和江涛等三四个人接到他们写作班驻地，向我们通报了他们要起来揭市委盖子，我们那天凌晨两点才回联络站。

这时联络站里进来了两个人，和我握手后，其中较年轻的一位对我说：“这位是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同志，他想和你们认识一下，我是他的秘书。”

魏文伯我没见过，但是知道他是当时华东局的书记。我当时很客气地请他们在一楼的一间房间里坐下，并作了自我介绍，告诉他们站里现在就我一个人在值班。刚说了没几句，挂在楼梯旁墙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我起身去接了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先问是首都红卫兵三司联络站的同志吗？我刚说了一句是，那声音就说：“你好！我是周恩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激动地连声叫起来：“总理你好！总理你好！我叫丁育民。”

周恩来接着说道：“丁育民，好。丁育民同志，有件要紧的事情想请你们帮助办理。”

我连忙说：“总理你请说！”

听到我激动的叫声，魏文伯立即过来站在我身边。周恩来在电话里继续说：“最近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万名群众静坐示威，新疆自治区有关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静坐的人愈来愈多。我想请你们那里派一些学生火速赶赴乌鲁木齐，去协助新疆自治区人委妥善解决这次群众运动。你们的意见如何？”

我赶忙说：“请总理放心，我们马上组织同志去新疆！”稍停了一下，我又迟疑地说道：“总理，只是距离太远，现在火车很难上去……”

我话还没说完，身旁的魏文伯抢过话筒大声说：“总理，我是魏文伯，他们去新疆的车票我负责马上解决，请总理放心！”接着周恩来在电话里对魏文伯说了一些话，我只见魏文伯一边说好，一边点着头。

然后，魏文伯把话筒又递给了我，周恩来在电话里继续对我说：“你们到了乌鲁木齐，自治区有关方面会和你们见面并向你们介绍情况，请你们好好配合他们，务必要妥善解决问题。”

我向总理大声说道：“保证完成总理交给的光荣任务！”

周恩来说：“好！祝你们成功！再见！”就挂了电话。

之后魏文伯匆匆地说道：“丁育民同志，我们已经认识了，以后再找时间联系，我先回去为你们办理去新疆的火车票，明天一早给你们送来。请你遵照总理的指示组织好去新疆的人员。”说完他就握手和我道了再见，匆匆走了。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魏文伯，我也不知道周总理为什么从北京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我们让去新疆，反正我们毫不犹豫地准备明天立即去新疆！

二、赴新疆完成总理交办的任务

十二月十九日一早，魏文伯派昨天来过的那位秘书给我们送来了二十多张

去新疆的火车票，一半是卧铺票一半是坐票。我和江涛等几个人挑选了十二名各校的学生，其中北京地院五名（我，钱XX，邱锡华，殷志山，还有一位我忘了），清华大学三名青年教师（蒙国庆，曹维涤，另一名也忘了）和一名学生顾元德。还有三名我记不得他们的学校和名字了。另外还有上海的三位学生以及一名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的初中学生，维吾尔小姑娘阿斯娅，她可以当我们的维语翻译。还有新疆兵团医学院的十来名学生，组成了二十多人的队伍，由我带队，于当天晚上十一点三十五分乘52次特快同赴新疆。在车上我们轮流在卧铺上睡觉，因时间太长了。上海联络站办公室的事情我交给了我的同学彭善慈。

列车载着我们过长江，越平原，向西出潼关，走河西走廊，再出嘉峪关，穿山洞，走戈壁，往西一直开了七十多个小时，于二十三日北京时间凌晨零点三十分抵达乌鲁木齐车站。

三、参与解决八楼事件和建立三司驻新疆联络站

一下火车，就感到这儿的气氛有点异样。经我们跟车站工作人员了解，才知道在八楼静坐的人中有近两千人已绝食两天多了，两天来有几十万人次游行支持绝食学生。有少数工人也加入了绝食行列，已有几十家工厂开始罢工，公共汽车也罢工了，致使大冬天没有公共汽车可乘。水电厂的工人也声称要参与罢工，但现在还没有实施。静坐的学生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和生产建设兵团司令丁盛等和学生见面解答学生的问题，而王恩茂和丁盛迟迟不出来见学生。这两天，出乌市的火车被学生拦住开不出去，电报和电话都已封锁不让打，所以学生想以阻止火车开出的方式让中央知道新疆的事情，听说已有几个绝食学生晕倒了。

我们在来接我们的汽车开到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后，扔下行李就立即驱车前往八楼。

八楼，在乌鲁木齐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地方。直到歌手刀郎特红的90年代，也在他的歌里唱到“八楼前的二路公共汽车”。八楼在当时是乌鲁木齐最有名的宾馆，是地标性的建筑。当时绝食的学生都在八楼，我们到那里时，看到楼前和楼里面到处都是静坐的人，好多民族的人，绝食的学生都在二三楼。我们顾不得旅途劳顿，立即分散到静坐和绝食的人们中间，跟他们说，我们是周总理派来慰问大家的，周总理要求大家爱护身体，结束静坐和绝食，你们提出的要求我们一定尽快和自治区领导联系解决等等。

当时静坐的人也很激动，认为终于让中央知道了他们的斗争。好多人发出了欢呼声。

我们在那里连续工作了近三个小时，这时自治区有人来接我们，把我们领到一家工厂传达室后面的一间大房子里。进去一看，里面坐了好多人，有穿便装的，有穿军装的，经介绍才知是以自治区党委第一副书记武光为首的自治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有武光（他原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刚调新疆不久，有一张和善的脸），有生产建设兵团司令丁盛，有军区副政委柴达诺夫，有自治区副书记祁果和任戈白等。互道辛苦后他们立即给我们介绍了新疆的一些情况，他们要求我们到静坐者中间去多做工作，中央也正在研究解决的方案。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我们刚才在八楼的活动情况，向他们说明了周总理的关心，是周总理派我们来新疆的。他们说他们知道这些，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配合协调，尽快解决问题，让中央放心，让周总理放心。接着又商讨了一些具体的做法。最后他们让我们回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休息一下，他们将向总理报告我们的情况。

我们回到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时已是北京时间凌晨七点多，但新疆时间只有五点多。我们和衣睡到天亮，已是北京时间九点多了，吃了点东西后立即分头去了自治区党委，新疆地质局和八楼。去地质局的同志向地质局的孙副局长借回了一些棉衣棉裤、皮衣皮帽之类的御寒衣物，因为乌鲁木齐太冷了，夜里温度近零下四十度，我们这些从上海赶来的人穿着太单薄了，实在抵御不了这里的严寒。刚到那里时我们这几个人走在马路上就不断有人滑倒，因为路面不是冰就是雪。这些衣物我们回学校后都交还给了学校后勤部门。去自治区党委的是和有关人员协商学生提出的问题如何解决以及打电话到国务院办公室报告具体工作情况，去八楼的是继续对静坐和绝食的学生做工作。

一直到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多钟（新疆时间），中央来电表示支持静坐群众的革命行动，并命令自治区党委接受学生提出的五个条件，令王恩茂立即出来接见群众代表，静坐和绝食的行动请立即结束。

向群众宣读完中央的电报后，现场一片欢呼，学生们决定下午三点半停止绝食，但还有一小部分学生一直到六点王恩茂来了后才开始进食。静坐的群众也停止了静坐。

我们接着又忙着给复食的学生安排休息的地方，在人民饭店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房间，又让兵团医专的有关人员为他们检查身体。我们忙到很晚才回到休息的地方。

以后的两天是处理善后事宜，经各方协商，新疆的各派群众组织选派了代表，组成了一个代表团，经中央电话批准，代表团乘一架专机去北京见中央领导反映新疆的情况。我们到新疆的任务到此也就圆满完成。

我前几年看过武光同志有关八楼事件的回忆录，但里面一句也没提到周总

理派我们去新疆协助解决八楼事件的事情，不知是出于政治家的什么考虑呢还是有意无意间把这事忘了，我觉得这本应是武光可以好好描写的一个过程。

之后，我们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一次总结大会，本意只是在乌鲁木齐最大的剧院人民剧院召开，但要参加的人太多了，只好将乌市所有的剧场的有线广播连在一起，但所有剧场又都涌满了人，还有不少人要参加而进不去，当时乌鲁木齐市的负责人建议将全市的有线广播全开通，原来乌市全市都联有有线广播，这才解决了问题。这次会议新疆的很多领导如丁盛等都参加了。

顺便说几句：我们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初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新疆联络站”（事先取得了总部的同意，是我打电话到三司总部，由聂树人接的电话），我被选为站长，清华的顾元德为副站长。我立即与国务院办公室通了电话（因为我们是周总理派来新疆的，在新疆的情况理应向总理汇报），报告了我们在新疆的情况，并说明了建联络站的事。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总理给自治区人委来了电话，让转告我们，他同意建联络站，但人要少些。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了，联络站只有十来个人。

就我们这次来新疆一事，就可以明显感到周总理处理事情的细致和有始有终。

到了元月十八日上海联络站来电让我回上海，我就乘火车回上海了。新疆联络站的站长就由顾元德接替。我从此再也没去过新疆。

也以一首打油诗作为结束吧：

大西北新疆八楼风云起
千万里总理指示急行西
报国家风雪严寒何所惧
排忧难小小学子心头喜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7年11月30日《昨天》第100期）

编者按：

丁育民 1963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

我在成都“二月镇反”前后的经历

陈永迪



作者简介: 陈永迪, 1943年5月生, 四川广安人。

1966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石油物探专业。

1967年分配到四川石油管理局, 先后在地调处、科技处任技术员、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左图: 作者近照。)

文革时期我是北京地质学院66届的学生, 也是北地东方红的一员。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6月, 我的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度过, 经历了成都的“二月镇反”, 那是一段惊心动魄的记忆。

一、大串联到成都

1966年11月下旬, 我和几位同学踏上北京到成都超级拥挤的火车, 煎熬了两天两夜到达成都。四川省地质局将机关大食堂改成接待站, 用稻草铺在地上形成一个大通铺, 我们就住在那里。我妈在成都军区机关作军医, 军区机关比较场离地质局很近, 所以我是两地轮流住, 大多数时间住在地质局。

北地东方红在地质局设了一个联络站, 主要作用是提供食宿, 交流信息, 组织活动。由于人员流动频繁, 联络站的负责人经常变更, 我都闹不清楚有哪些人, 比较固定的负责人是我们同系同年级的谭宝华, 有什么事总是他通知我。联络站不是一级组织, 负责人就是接接电话、动员大家参加活动, 我们在外边代表北地东方红表态, 讲话也从来不向联络站请示、汇报。我来成都以前, 发生了导致成都红卫兵分裂的11·13事件, 据说我们联络站的人参与了冲击红成主持的大会进行造反。但我来成都后的印象中, 我们对红成内部两派没有明显的倾向, 只是略偏向8·26, 真正对红成不满是在“二月镇反”后。我们与红成勤务组主要负责人、成都地质学院学生武陵江关系很好, 有重大活动都事前协调。

我到成都想实现一个雄心壮志: 步行到革命圣地井冈山。我约了4个同学, 两位大学同学, 两位中学时的同学, “朝圣”路线是重庆——遵义——韶山——井冈山。12月7日从成都出发。

串联中遇到不少有趣的事情，印象深刻的有两件。

12月8日从龙泉驿到简阳石桥铺，要翻越龙泉山，这座山不高，但中间有一段异常陡峭，对我们这些走惯了平路的城里人是不小的考验。就在大家筋疲力尽时，前面响起了悦耳的童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很提神哦！走了不久，又听见童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是一个小男孩。我和一位同学停下来称赞他：“小朋友，真了不起！这么晚了还在学毛主席著作，我们要向你学习！”他说：“是公社干部要我们来这里守岁，看到红卫兵过来就大声读毛主席语录，守半天记一天工分。”

12月10日到达铜梁，铜梁是邱少云烈士的故乡，在一处可以俯视全城的高坡上建有《邱少云烈士纪念馆》。晚上我们慕名而去，正在名人题词室参观时，突然来了几位戴红袖套的中学生，进门就乱砸，把放有金日成题词的展柜砸得稀里哗啦，纪念馆的两位女服务员吓得浑身发抖不知所措。我们赶紧上前拦住，这几个中学生看袖套认出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停止了打砸。我问他们为什么要砸，其中一位眼睛一瞪振振有词：“金日成是修正主义头子，忘恩负义的家伙！”

走了5天到重庆。在重庆大学接待站住了一天，那里条件太差，14日又搬进城里。表哥在重庆医学会工作，他们单位在邹容支路有一个接待站，吃住很方便，地处解放碑，是信息集散地与活动中心。从重大搬到解放碑后不久，看到中央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4位同学陆续离开重庆各奔东西。

送走4位同学后，我在临江门沧白路重庆市政协内的北地东方红驻渝联络站遇到王大宾。我和王大宾都是四川老乡，大一的时候还一起上过大课，文革前就比较熟悉。他告诉我，接到中央文革的任务：到成都把彭德怀揪回北京。我和王大宾以及驻渝联络站的一群同学紧急赶回成都。在成都听取已经和彭德怀有接触的同学汇报情况，他们和彭德怀进行过深入的交谈，认为彭德怀反对刘少奇、拥护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他。王大宾也同意这个意见，还派了郑文卿和王大来飞到北京去向中央汇报。几天后东方红总部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宣布：王大宾犯了右倾错误，必须把彭德怀揪回北京！12月23日，我们将彭德怀从成都地质学院抢回地质局，12月25日成都铁路局安排专列将彭德怀、成都军区派的押送部队一个排和我们学校的同学送回北京。（有关详情见拙文“我参与的揪彭德怀行动”，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很遗憾，由于专列上的人太多，我没挤上去，没能与彭德怀同车去北京。

在成都过了元旦，有几位已经参加工作的好友要我带路去北京，他们要到中央部委告状。1月2日我和好友们又踏上北京的路程，在北京待了二十多天。好友们都住在我们学校，那时，学校内部有一条“潜规则”，出去串联的同学不能收铺盖卷，人走了要将宿舍的钥匙交给留在学校的同学，以便接待外地进京的

学生和群众。我们每天奔波在学校和部委之间，好在取得了好友们比较满意的结果，他们提前回蓉，我大概是1月25日回到成都。

回到成都已是“二月镇反”前夕，1月28日下达《军委八条》，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到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此事被定为“冲击公安机关”的“反革命事件”，开始抓捕有关人员，气氛已经开始紧张。

二、成都军区黄、郭垮台，甘、韦主政

为了说清成都“二月镇反”的来龙去脉，有必要交代成都军区领导的变动情况，因为他们是“二月镇反”的主角（有关情况都是我在驻成都联络站期间了解到的）。

1966年10月15日，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黄新廷在大会上传达军委指示：成都军区机关从即日起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大会成了埋葬他和成都军区政委郭林祥的动员会。军区的“四大”开展不久，矛头就直指黄、郭，不久黄、郭被停职，6个月后就被定为“党内最大走资派的顽固追随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牢狱之灾。

据秘书揭发，黄新廷到北京开会从不去看望林副主席，带去的四川特产只送贺龙、罗瑞卿。贺、罗到四川视察时，黄新廷陪他们钓鱼、看戏、打牌。黄新廷警告那些不听话的高干时常将两句话挂在嘴边：“老子到贺老总那里去告你！”“老子到罗总长那里去告你！”以炫耀他与贺老总、罗总长有不同一般的关系，这才是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贺老总在毛、刘之间站错了队，已不被毛信任。毛要打倒贺龙，采取“剥笋策略”，由外向内逐层剥离，黄新廷等将军就是被剥掉的第一层。

黄、郭被军委召到北京隔离审查后，主持成都军区日常工作的首长换成甘渭汉和韦杰。甘渭汉1965年11月从总政干部部部长任上调成都军区任第四政委，韦杰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甘渭汉新来乍到，与黄、郭没有历史渊源，因而上阵一身轻。韦杰论资历论能力不在黄新廷之下，但他在朝鲜战场吃了败仗，他领导的志愿军60军180师在第五次战役中被美军围歼（据说，毛泽东曾对韦杰讲责任不能完全由他负），文革前在成都军区一直受排挤。此二人上任时形势险恶，地方上西南局、省、市委已处于瘫痪状态，李井泉被斗得东躲西藏，属下“揭竿而起”纷纷向造反派靠拢。甘、韦接手时，军区班子已残缺不全，原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副政委共10人，已有4人被打成“黑帮”，他们是司令员黄新廷、政委郭林祥，主持业务工作的副司令何正文，主持政治工作的副政委余述生。问题还在于此时甘、韦说话不灵权威下降，稍有不慎就会被人抓住把柄，打上门

来批斗、抄家，主持工作如履薄冰。

甘、韦上台初期很少公开表态，他们对文革不满但没有胆量直接反对，他们对造反派恨之入骨但没有拿到尚方宝剑。

1月28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央颁布《中央军委命令》（八条），尚方宝剑不请自来。

1月29日，叶剑英向军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委八条”时说：“谁想把部队搞乱，绝不会有好下场！”

1月30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了将在次日由《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篇社论的五个部分中篇幅最长的第五部分，专门讲镇反，指出：“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

受此鼓舞，韦杰在2月5日召集成都公安负责人说：“现在牛鬼蛇神出来了，就是要他们暴露，暴露出来才好打。”

2月8日，韦杰敦促省公安厅成立“镇反”领导小组。

2月10日，韦杰正式向公安部门下达镇反命令：“打击重点是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中的反坏分子。”

2月11日凌晨2点，军区机关的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红色造反军”被逮捕30多人；上午9时，北较场内逮捕了空字028部队（空军第十三航空学校）造反派16人。

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发布《紧急公告》称：“凡冲击军事机关的，都要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三、参加对军区的静坐示威

2月11日下午，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开始上街游行，要求成都军区释放被捕的军内造反派及兵团人员。

当天下午，我正在地质局北地东方红联络站睡觉，文革以来我们都成了“夜猫子”，晚上活动白天睡觉已成常态。联络站负责人谭宝华来把我们叫醒，他简单介绍了形势和任务，听说要去北较场东营门静坐，我还傻呵呵的高兴。为了壮声威，把地质局一辆客车装上高音喇叭改成宣传车，我们一行人喊着口号向北较

场进军，到了东营门，将宣传车堵在门口。静坐的这条街叫白下路，一条东西走向、长约百米的死胡同，街西头是军区东营门，街北面是军区大院围墙，街南面是民房，街东头与人民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是静坐者唯一的出口，一旦被封锁即成瓮中捉鳖之势，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担心不是多余的。

静坐初期气氛宽松，没有整齐的队伍，有人站有人坐，我还常回家看看。当时脑子里完全没有危机感紧迫感，1967年“一月风暴”以来到处“夺权”，我们都“战无不胜”，头脑里充满一种虚幻的“成就感”。“军委八条”下达了，对八条的警示麻木不仁，也没把军区抓人当回事，那时候抓人、放人很常见。

我还到距东营门大约一两公里远的东通顺街去看过，那里是军区战旗文工团的驻地，昔日大作家巴金的祖居，小说《家》描写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那。东通顺街静坐的人比白下路的还多，打着红旗和横幅的队伍排列整齐，许多大叔大妈模样的人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这些人就是成都人叫的“居民老娘儿”，看样子他（她）们已经做了长期准备。战旗文工团的大门被桌椅板凳堵死，谁也别想进出，这场景使我想起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打出的横幅辨认，大部份人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2月11日晚，军区派部队去战旗文工团抓人，有人大喊：“老保抓人了！”喊叫声吵闹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人们闻讯赶来堵住了大门，抓人的部队只有一个排，被困在大院内动弹不得。街道分团派代表与部队谈判，提出立即放人，部队方拒绝放人，街道分团方拒绝撤离，由此双方僵持不下。

2月11日以后，军区大院出奇的安静，没有继续抓人，也没有镇压静坐示威的群众。平静使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像以往一样，只要把横幅一打，人往那儿一坐，当权派就会乖乖地投降。

四、中央军委2·17信件

2月17日晚大约十点，突然传来了《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公开信》（简称：2·17信件），信中严厉指出：“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后来知道此信是由叶剑英批准下发的。

这时军区东营门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反复播放信件的内容，有军人从东营门出来向我们散发印有2·17信件的传单。一位同学递给我一张，就在我埋头读传单时，静坐队伍中突然冒出一些人，大喊大叫：“抓反革命！”原来是产业军埋伏的卧底乘机制造混乱。再看白下路东头静坐者唯一的出口，已经有产业军组织的队伍手挽手组成方队喊叫着压过来……

形势异常危急，所幸我方还有不少人，他们迎着产业军的方队冲上去混战一场。这时有同学提醒开车冲出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开车的师傅了。危急时一位高个、腿有点微瘸的同学宣称他会开车，在我们怀疑的眼光中，他已爬上司机座位将宣传车开动起来了，车子像巨大的推土机将挡路的人群推开，我们紧随其后往外冲，刚冲过路口，大伙一哄而散，各奔东西。

我正顺着文殊院街往东走，准备去一位最可靠的中学同学家里避难，突然听见从北边万福桥方向传来汽车的轰鸣声，转瞬间十几辆摩托车开道的军车杀到白下路，从车上跳下大批带枪的士兵，杀气腾腾地将路口封锁。好险！幸亏冲出来了。我继续往东走，只见大街小巷已经有戴袖标的人在巡逻，不时盘查行人，一张大网正在向我们罩下来。

2•17 信件拉开了四川地区镇反的序幕。

据《四川省志·大事记述》（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记载，这次“镇反”在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共抓捕造反派头头及骨干分子8万余人，其中成都地区抓了33000余人。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向群众组织开枪的流血惨案。

五、逃回北京

深夜到了同学家里，他们对我十分友好，叫我放心休息。同学一家人还帮我出主意，商讨怎样回北京。回北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直接从火车北站乘车直达北京，这条路省事方便，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谁都想得到火车北站一定重兵把守，对乘客严加盘查，火车北站的广场上还有许多“点水”的人（成都人对告密者的贬称），走这条路是找死；另一条路走重庆顺长江经武汉回北京，这条路绕道，但是安全也方便。我在重庆有表哥，他们的接待站也还在运行，武汉也不陌生，一年前我们在湖北省地质局搞“四清”，住过地质局黄浦路招待所。为了避开火车北站，计划先出城到龙泉驿，再步行到简阳石桥铺上车，只要避开公路上的盘查点就可行。朋友也认为此路线为上策。

2月18日上午，朋友将我送到九眼桥，看着我坐上九眼桥到龙泉驿的班车。车到一个叫大面铺的地方时出现了险情，大面铺的路口设了检查站，有带枪的民兵把守，所有的人都要下车接受检查。民兵旁边站了几个“点水”的，他们的魔爪指向谁，谁就必须出列，出列后立即五花大绑。说实话，轮到检查我时心里很紧张，检查的民兵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到龙泉看亲戚。”民兵手一挥，放行！估计刚才被“点水”的几位是川师和本地的兵团、八二六的人，他们不认识我。

经过一番折腾，下午到了龙泉驿镇，找到两个月前步行串联时的接待站，进去倒在厚厚的草堆上就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2月19日出了龙泉驿镇，我沿着步行串联时的小路往简阳石桥铺方向走，昏头昏脑走迷了路，走到一个叫五凤溪的小站上了到重庆的慢车。2月20日早晨终于到了重庆，表哥的接待站还在运行，表哥替我买了6天后（2月26日）到武汉的船票，还给我妈发了一封报平安的信。解放碑真热闹，每天晚上都有摆擂台辩论的，因为我对重庆的情况不熟，不知道他们在辩些啥，感觉重庆的气氛比成都好，五十四军还没有对本地造反派实施大规模抓捕，从大字报上还看到一些消息：

△重庆革联会得悉“2·17信件”后，要求下属把川大八二六和兵团的人抓起来，并布置砸八二六驻渝联络站。

△成都保守组织“三军一旗”抄了兵团总部。

△川大八二六的学生在人民南路广场跪成一片，以示请罪。

△2月23日，八二六负责人江海云在成都19中被捕，全城贴出《特大号外》。

.....

2月26日晨，我在朝天门码头上了东方红33号，那是一艘大型客轮。当晚12点驶到万县码头，船上广播：“东方红33号船要在万县码头停2小时……”坐了一天船，想上岸找点吃的，我沿着长长的陡坡石梯气喘吁吁地爬上码头，一条阴暗狭窄的小街呈现在眼前，街两边店铺的大门紧闭，行人稀少，枯树在风中像鬼影摇晃，寒风吹得我直打冷战。我注意到墙上的大字报被撕扯过，好奇心驱使我走近观看，大字报字迹依稀可辨，上面写着：2月22日在万县××（字迹不清，后来在资料上查到是个教堂，叫“真元堂”）军队开枪打死了××名群众，“主力军”组织了抬尸游行，已有许多人被抓捕……怪不得，万县码头如此阴森恐怖。

经过2小时停靠，早晨6点船进夔门，两岸悬崖壁立气势磅礴，江涛怒吼仿佛愤怒的控诉。出了南津关，船平稳地行驶在江汉平原的河道上，下午5点到了沙市。

在沙市码头要停靠半小时，我远远看见码头上有一群人，正打着旗帜不停的喊叫：“33号靠过来！33号靠过来！”船刚靠上码头，那帮家伙蜂拥而至，像“鬼子进村”一样冲进船舱，对着房门咚咚乱敲，不开门或开慢点就用脚踹，通道里只要挡路的一掌推开，嘴里喊着要“抓反革命”。船上的乘客对此极为气愤，有的乘客和他们大声争吵，有的还打起来。我站在船的前舷看着这场闹剧，只觉得这帮混蛋太过分了。不远处一个人背对着我，看得出他是指挥者，喽啰们不时跑来向他请示。当他转过身来时我惊讶地发现这是我们北京地院的同学，同为“北

地东方红”的战友，我一激动叫不出他的名字了，我们都在物探系，他是四年级我是五年级，在学校里常碰面彼此认识。我问他，你们到底要干啥？他说抓沙市军分区通缉的反革命！我说我们在成都是军队要抓的“反革命”，你在这里帮军队抓“反革命”，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整自己人吗？劝他不要被别人当枪使。他听了后觉得有理，于是一声令下，撤！那帮横冲直闯的家伙还真听他的，立马撤离。可是船上的乘客不答应了，在撤离的混乱中乘机扣了他们几个人。船又启航了，那帮人到岸上才发现少了几个同伙，立马又挥动旗帜高喊：“33号靠过来！33号靠过来！”船长不予理会，东方红33号在长长的汽笛声中扬长而去。

2月28日下午3点到达汉口，下船后在码头附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在去火车站购票的路上，看见全副武装的军车在大街上巡逻，墙上贴满“反革命××被捉拿”的消息，一张大字报上写着：“今天凌晨，奉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命令，逮捕武汉军区高级步校反革命分子××多人！……”有人正在地上书写大标语“长江日报的××社论好得很！”……武汉已成为一个恐怖的城市，来了就想尽快离开。

3月3日终于回到北京。

六、中央解决四川问题

回到北京，心在四川，那些不幸深陷牢笼的同学和朋友们的身影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3月11日上午，“首都大专院校西南联络组”在我院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北翼楼401室，我也参加了其中的工作。这个联络组除了接待四川来京申诉、告状的朋友外，还成立了资料组，所谓资料组就是收集甘渭汉、韦杰的“罪行材料”，资料组下设甘渭汉、韦杰、李文清等小组，我参加了甘渭汉小组，负责的同学给了我一大堆甘渭汉的讲话，总政的揭发材料，叫我摘抄甘的“反动言论”。

归纳起来甘渭汉的材料有这样几类：红军时期的表现，甘渭汉是一方面军三军团彭德怀的部下，证明他是彭、黄死党；在总政主管干部工作期间的表现，证明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成都军区主政的表现，证明他以造反派为敌，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

材料整理一段时间就开小组会讨论，组长叫大家谈看法。有一天，讨论甘渭汉的“反动言论”时，有一位同学说，看到甘渭汉文革前在全军干部会上的报告，甘说“我军高级干部年龄偏大，军长、军政委的平均年龄51岁”。这位同学据此发挥：“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毛主席说‘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甘渭汉居然嫌他们老了！这不是反动言论什么才是反动言论！”我提出不同意见：“甘

渭汉是总政主管干部的负责人，向与会代表报告干部的状况是他的职责，他说的是客观情况，没有说超过 50 岁的军级干部一律免职。这一条加在‘甘渭汉的反动言论集’里有点牵强。”可是，大多数同学不同意我的意见，我也不坚持了。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材料，都是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垃圾，当年我们就是垃圾制造者。

由于我的精力完全放在整理资料上，没有参与西南联络组的其它活动。记得谭宝华告诉我周总理见过他：

3月中旬的一天，东方红总部通知谭宝华到中南海北门等候，大约 1 点钟工作人员将他引到一个小会议室，一会儿周总理从里屋走来，和他握手问好，问他怎样到的四川，四川镇反的情况，周总理用铅笔在一张纸上认真记录。谭宝华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周总理没有作任何表态，临走时将他用的铅笔送给谭宝华。这件事对我们鼓舞很大，虽然周总理没有对四川镇反表态，但是四川镇反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听取被镇压一方的意见本身就说明问题。

3月 14 日，中央文革记者站收到原宜宾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田禾的来信，记者摘编后冠以“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的标题，刊登在 3 月 26 日《文化革命简报》435 期上，分别呈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阅。毛作出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也应来，请商总理酌办为盼。”

此后，解决四川问题的步伐明显加快。

△4 月 3 日，成都军区发出电令：放人、平反、销毁材料，向被拘留的人赔礼道歉。

△4 月 4 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宜宾地区刘结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中发〔67〕154 号），为刘结挺、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平反。154 号文件的发出标志解决四川问题的基调已经形成，天平向“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倾斜。

△4 月 8 日，川大八二六勤务组被捕成员全部释放。

4 月 12 日，关押在成都大慈寺的人员被释放。

4 月 18 日，关押在成都市大监的人员集体出狱……

我们曾在四川串联过的同学又开始跃跃欲试了，邀约再次“杀”回四川去。因为中央在 3 月 8 日、3 月 18 日两次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这次回成都不敢大张旗鼓。4 月 22 日，我和清华的一位同学（中学的老同学）坐火车回到成都。刚回成都时仍住在地质局，已经有几位同学先到了，负责人还是谭宝华。地质局没有接待经费，也没有专人管理，不能名正言顺地接待我们，能住在那里全凭已经翻过来的造反派的老关系。大约一周后我就回家住了，但是经常到地质局，

有事就去找谭宝华，平常独自活动。

此时的成都已今非昔比天翻地覆了，“二月镇反”时关在监狱里的军内外“反革命分子”绝大部分已释放，他们像凯旋的英雄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

刚到成都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到朋友家去。这位朋友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姓刘，一起在军区大院长大的“铁哥们”，他是国防科委一个研究所造反派的头，“二月镇反”时被产业军抓进了市大监。“2·17”信件公布后，产业军天天抓人往市大监送，市大监对产业军送来的人来者不拒，一律照收。朋友的父亲是军区的二级部长，我叫他刘叔叔，镇反时被派到成都市邮电局当军管会主任，刘叔叔白天在单位理直气壮抓人，晚上回到家里垂头丧气挨骂，王阿姨（朋友的母亲）哭着向他要人，说：“你天天在外面抓人，你儿子被抓到哪儿都不知道，你把人给我找回来！”王阿姨曾经到所里打听，人家回答：“他是反革命，已经抓到监狱里去了，具体在哪里我们不晓得！”朋友的父亲也很为难，自己的儿子是“反革命”本不是光彩的事，若去要人更有立场站错的风险。有一天，刘叔叔终于鼓起勇气，给他的老战友、成都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打了电话，说：“我儿子被你抓起来了，抓到哪儿去了？是死是活，你给我打听一下。”对方大吃一惊，说：“怎么你儿子也成了反革命？我赶快给你查！”几天后回话：“查到了，关在市大监，我下令马上放人！”就这样朋友有幸提前出狱，出狱后在家休养。我每天晚上都去看望他，他给我讲了监狱里的一些黑幕，进去先“退神光”，几耳光打在脸上让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犯人”了，不服再打，打到你不敢喊冤叫屈为止。初次进监狱的还要排成纵队通过产业军的人墙，产业军以打人为乐，比赛谁打得凶、谁打得狠，打晕打残在所不惜。朋友的右手已被打成骨折。粮食供应不上，饿饭是常事，监狱里关的人实在太多，多到睡觉都不能翻身。朋友从小在优裕的环境长大，从没吃过这份苦，说起来失声痛哭。刘叔叔在旁边静静地听儿子诉苦，一声不吭，王阿姨则情绪激动，痛骂产业军不是个东西。

“红十条”下达后，市邮电局军管会办公室每天都有造反派光顾，他们来帮助军管会转变立场。刘叔叔表示坚决执行“红十条”，向他们赔礼道歉，造反派依然拍桌子打巴掌不依不饶，有一天，刘叔叔忍不住了，使出杀手锏：“你们不要这么凶嘛！你们是造反派，我儿子也是造反派，你们坐过牢，我儿子也被抓到市大监！”造反派听了很惊讶！原来军管会刘主任和我们一样都是“二月镇反”的受害者，从此不来闹了。

七、“五六”事件后张国华、梁兴初入川

平反后的造反派怨气冲天，产业军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成都陆续发生了

几起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5月4日，川棉厂武斗事件……

△5月6日，132厂武斗事件（简称“五六”事件）最为惨烈，双方直接参与的武斗人员达数千人之多，现场声援、助威、围观群众达10万人以上，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轻重伤2000多人的大血案。

下午3点左右，北京地院勘探系二年级学生李全华，跟随6名解放军战士组成的宣传车从正门开进厂区，宣读厂军管会当天发布的关于停止武斗的《紧急通告》。据守大楼的产业军枪手向宣传车开枪，李全华被一颗子弹击中喉部并从后颈穿出当即身亡，他成了“五六”事件的第一个死难者。

当天，我去见一位因造反在“二月镇反”中被关进市大监的朋友，请他加入我们联络站。在路上听说132厂发生了武斗，立即搭车前往，一路上见到不少救护车拉着警报飞跑，有人从窗口将血衣伸出，我们的车在人民公园附近被堵得动弹不得，错过了去现场的机会。

当晚，北地东方红、清华井冈山、中科院等80多个单位在北京地质学院召开为地院学生李全华等“死难烈士”报仇誓师大会。“五六”事件惊动了中央，也促进了四川问题的迅速解决。

5月7日下达《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文件共有十条，因此简称“红十条”。

5月16日，成都军区新任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到达成都。当天早晨，听说张、梁要到，我们都兴奋地来到北较场等候，空军派来的雷达指挥车几天前就驻扎在那里，几天来直升机反复演练起降，预示有大人物要降临。

大约十点过，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可是从机舱里走出来的不是张、梁。后来听说，张、梁坐车从危机四伏的被产业军武装控制的机场路直接到达市区，他们受到造反派和产业军双方的热烈欢迎，赢得了双方的赞扬。

张、梁到成都后，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发表讲话、大张旗鼓宣传“红十条”，为“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组织和群众平反，道歉。当时，成都军区不少干部战士对“二月镇反”被否定想不通，而社会上受压的产业军也跑到军区大院来出气，产业军在大院内横行霸道，抄家、打人、砸车、撕大字报。他们抄了副司令员李文清的家，在他家海吃海喝赖着不走，因为他宣布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左派”，有人甚至叫嚣：“哪个要打倒产业军就不要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

5月20日晚上，即梁兴初到达成都的第四天。机关部分干部、战士、家属在一所（军区第一招待所，张、梁当时的住地）围住梁司令，有人问梁：“‘打倒产匪军’对不对？”

梁说：“那是错误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

又有人问：“梁司令在北京表态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

梁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是造谣，我正式辟谣！你们想一想红纵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支持他们？”

有人说：“我们上街被骂为‘保皇兵’……”

梁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兵！”

梁对待造反派的态度和他的前任甘渭汉、韦杰并没有实质的区别。

不过，梁兴初也有令人起敬的另一面。梁刚到成都不久，在军区第一招待所3号楼会议室与成都各派群众组织见面，当时我也在场。开会前大家围着他闲聊，有人问他：“梁司令，听说在朝鲜彭德怀把你骂惨了！”我们都以为梁兴初会对彭德怀痛加斥责，以显示他正确并与彭划清了界限，可是梁兴初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说：“打完第二次战役，彭德怀向我道歉，他表扬三十八军是‘万岁军’！”梁兴初是第一批入朝作战的三十八军军长，三十八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没打好，彭在总结会上大拍桌子。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表现英勇顽强，在关键时刻卡住了美军的脖子，为围歼联合国军立下重大功劳。志愿军总部通电表扬，彭德怀在电报上亲自写下：“38军万岁！”从此“万岁军”的美名传遍天下。文革期间，彭德怀已“臭名昭著”，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哪敢说他的好话？梁兴初在这一点上的表现令人肃然起敬。

以后的事实表明，张、梁、刘、张四个人三种态度：刘、张二挺和兵团、八二六“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梁兴初同情保守派，支持红成，利用他和五十四军的老关系在重庆另立中心；他们表面喊团结，实际搞分裂，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为一把手的张国华是骑墙派，两边和稀泥，人称“八级泥水匠”。张国华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与梁有区别，他吸取了在西藏差点被打成走资派的教训，坚决按照中央“红十条”，以及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态度支持造反派，支持刘、张，不像梁那样与造反派和刘、张格格不入，由此而与梁产生分歧，梁怒而出走到重庆另立中心。

八、在成都“民委联络站”

回到成都后，谭宝华派我联系军内造反派。我和川大八二六、清华井冈山以及西安的老同学商量成立了一个联络站，联络站设在离军区东营门不远的省民委机关大院内，因此称为“民委联络站”，主要任务是支持军内造反派，向军区机关的干部战士宣传“红十条”。我们印了一些传单在军区大院内散发，办了一张小报《红雷达》。后来又增加了八二六派的中学生，5月中旬来了几位中国科学

院红旗派的人，他们和中八二六逐步替代我成了联络站的骨干。

在民委联络站期间，有一件事印象深刻。

(下图：1967年成都民委联络站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右1为中科院老王，右3为本文作者。)

5月下旬的一天，中科院物理所的老王带来两位女士，老王介绍其中一位气度不凡的女士是徐向前元帅的女儿徐鲁溪，另一位陪同者姓乔，乔女士也学历不凡，是莫斯科大学物理学博士，她们想了解成都军区的文革情况，我请来曾是军区司令部造反组织“红纵”勤务组的负责人徐耀明向她们作介绍，我当时作了详细的记录(根据当时的笔记整理的记录见附录)。



5月30日，中央文革致电成都军区，请转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在四川的同学，“四川省革筹已成立，所有首都红代会和外省去川同学，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校，成为执行中央指示的模范。”

6月初，我回到北京，结束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附录：

以下是1967年成都军区“红纵”勤务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根据我当时笔记整理：

2·11突然抓人起于军区作战部的王××，他是红纵的成员。“军委八条”(1月28日)下达后，军区机关的形势逆转，围攻红纵的现象频频发生。2月10日王××在老保的围攻下写了一个材料(也可能他没有写过材料，而是被逼供的记录)，说红纵的办公室设在黄新廷(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家里，在黄家里开过黑会，要成立什么“治安治乱委员会”，保黄、郭过关。根据这个材料，当天晚上军区党委决定抓人。从2月11日上午开始，陆续在军区机关、空字028部队、战旗文工团抓了许多人，被抓的人大部分属于军艺西南造反队(成员主要是军区

战旗文工团的干部)、红纵(军区司令部红色造反纵队)、千钧棒(军区政治部千钧棒战斗队)等造反派组织。在抓战旗文工团的人时遇到了阻力。战旗文工团的驻地孤悬在北较场外的正通顺街，2月11日晚，军区派了一个排去抓人。被抓的人当时大喊大叫：“老保抓人了！”喊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居民们自发地赶来堵住战旗文工团的大门，那一排战士被居民们围得无法动步。居民们提出不放人就不准走，围了4天，直到2月15日军区派部队增援才解围，可见镇压造反派不得人心。后来，兵团、826等造反派得到消息后，也组织了大批造反派战士将军区大营门和东营门围住，要求放人，由此而引来了2·17信件。

3月21日王××被拉到司令部批斗，在场的有军区司令部朱副参谋长、温副参谋长。王拒不承认他说过这些话，当场将王打翻在地，逼他承认红纵是“黄霸天”的保皇派(军区开展“四大”后，有大字报说黄新廷是军区一霸，称之为“黄霸天”)。从此，红纵是“黄霸天”的保皇派在军区机关广为流传，直到“红十条”下达后也没有消毒。张、梁到四川后，红纵曾给梁司令汇报过这个情况，梁始终不表态。

军区的形势总的是好的，表现在有部分干部的立场已转变或正在转变，认识有了提高。军区原来的领导不管心里怎么想，表面上还是说红纵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的领导还说徐耀明同志态度好，我们要给他平反，向他学习……有的领导表示向徐耀明同志道歉，愿意诚恳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且随叫随到！中央的“红十条”下达及时、打中要害，打乱了他们的部署。

但是，张、梁到成都军区后，我们的困难处境没有显著的改善，甚至有恶化的趋向。究其原因，中央决定下达后反动的东西必然要垂死挣扎；其次老保要给张、梁首长制造麻烦，打乱他们的部署，还有走资派也会在暗中耍阴谋放暗箭。

张、梁首长在公开场合姿态很高，刚到时张政委表示成都军区坚决支持造反派，但为时不久态度就变了。特别是梁司令单独接见红纵的谈话，接见前梁的秘书通知红纵的人说梁司令要先听汇报，然后请红纵的同志谈点对工作的建议。但是，当晚一见面梁就说：“红纵还在活动吗？再活动就是违反八条了，你们要注意团结，不要搞分裂！”好像分裂是红纵搞起的。红纵汇报完后，梁承认红纵大方向是正确的，但调子很低。接下来就开始数落红纵的枝节问题，还把战旗文工团指责得一塌糊涂(5·19晚上梁接见战旗文工团全体干部，有两个人企图给他戴高帽)。那次谈话红纵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5·20晚上，机关部分干部、战士、家属在一所(军区第一招待所，当时张、梁住地)围住梁司令，控诉红纵的“罪行”。梁叫人打电话给徐耀明，要他来听听群众的意见。那些人“控诉”：红纵是黄、郭一手扶持起来的保皇组织，还在搞“四大”、和地方搞串联，参加支持宜宾造反派的大会等等，应该取缔、解散。

梁听后武断地宣布：“你们红纵搞‘四大’就是非法的，要派人去查一查。”又说：“军委命令机关一律不搞四大！”有人问梁，“打倒产匪军”的口号对不对，梁说：“那是错误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又有人问：“梁司令在北京表态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梁说：“我没有说过这些话，这是造谣，我正式辟谣！你们想一想红纵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支持他们？”有人向梁司令反映：“我们上街被骂为‘保皇兵’……”梁说：“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兵！”正在这时有人来汇报说，火车南站武斗，有战旗文工团的人受伤，梁说：“谁叫他们去的？”谈话到此结束。

从5月20日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5月21日当晚就传红纵是非法组织，要取缔，要砸烂红纵的狗头。在军区大院凡支持兵团、826的人都被骂成红纵，砸汽车，打人（也有产业军混进来的人搞打砸抢），撕大字报，凡揭发二月逆流的大字报都被撕，而红成贴的大字报就不撕。老保们20日前还比较谨慎，20日后（即梁接见后）就敢公开活动，如：政治部几个主任的通讯员公开组织“支产战团联络站”，很猖狂！成电红旗³⁰在军区大院的办公区、家属区、二营门等地到处刷标语：“三军一旗³¹好得很！”成电红旗出了小报《战线火报》，北较场内有专人和他们联系。他们散布：梁司令说红纵是非法的！红纵要血洗北较场，要与司、政、后干战血站到底！中和场、火车南站的武斗就是红纵挑起来的，要集中力量把红纵搞下去。

张、梁来之前，相当大部分干部向红纵靠拢，现在反而不敢了。5月23日下午，军区机关召开大会，政治部的董秘书长说：“有战士给我打电话：‘哪个要打倒产业军就不要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过去我们提着脑袋斗黄、郭，现在居然成了老保，你们说怪不怪，我们要打倒真正的保皇派！”他说的“真正的保皇派”实际上是暗指红纵。

总的来说，张、梁来后情况更恶化，原来的希望变为失望。但是造反派不能拆台，还要看下去。现在要警惕老保分裂造反派，我们也担心造反派打内战，还担心张、梁受原班子的影响。张、梁的工作班子要看几个关键部门：张梁办公室、省革筹办公室、支左办公室的组成人员的立场。张梁办公室（除了梁从广州军区带了两个秘书和一个作战部长外）工作班子里没有一个造反派，这些人先投靠黄、郭，后投靠甘、韦，如：谢×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提拔的黑干将，张××是政治部副秘书长，紧跟余××（时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贴心豆瓣。省革筹办公室由张西挺筹办，她提出要红纵的人，军区党委不同意，估计是甘、韦继

30 成电红旗：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与当时的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等站在一起的群众组织，被认为是保守派。“二月镇反”时期非常活跃，其首领多为干部子弟。“红十条”下达后迅速瓦解。

31 “三军一旗”，被称为“保守派”的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造反军或称八一荣复军、成电红旗。

续发挥影响的结果。支左办基本是原班人马，我们称它为支保办，只增加了青年部副部长刘××。这样的班子组成，我们很担心造反派的声音反映不上去。

红成的立场很成问题，他们在街上刷大标语“决不能抹杀红卫兵小将在镇反中的功劳”，红成认为韦杰的镇反要否定，但是群众的主观愿望是好的，问题是人抓多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对甘、韦说，他们（指兵团、826）要打倒你们，我们（红成）不打倒你们。军区的老保到处散布红成和他们观点是一致的。

作者注:以上是根据徐耀明当时谈话的记录整理的，由于时间久远，加上笔记本字迹不清，可能有个别错漏之处，但是，可以肯定基本信息是准确的，其中反映出的观点当然都是当时形势下才有的，不等于是正确的，但它是那段历史中讲述者的经历和思想的真实反映。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7年11月30日《昨天》第100期）

我当逍遙派后的“大串联”故事

张华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张华府长篇回忆录《无罪的囚徒》。（右图：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张华府，河南人，1965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矿工程系，东方红公社的发起人之一，东方红战斗队的成立宣言起草人，虽然在地院东方红走向全胜之后的1966年10月下旬就当了逍遙派，但在朱成昭被打成“叶向真、朱成昭反革命叛国集团”大案首犯后，仍被划为该“反革命叛国集团”核心成员，遭受长期牢狱之灾。由中央专案组审查多年后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直到文革结束后，1980年底才得到彻底平反。



1966年10月下旬，戴良吉（我校水文系学生，东方红成员）找到我，说他要去大串联，想邀我同去。我当时正好已对无休无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失去了热情，特别是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布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已经显露出来了。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运动似乎已经沦为了上层权力斗争的工具，对继续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劲头不大了，于是我想当逍遙派了。三司刚成立时，朱成昭要我做他的代表常驻三司，我都没同意，确实不想再干了。现在正好是个机会，就答应了和戴良吉同去串联。

我去找朱成昭请假，朱成昭很是吃惊，说，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对我们十分有利。你怎么现在突然要离开了？我说我已经厌倦了，失去了热情，想当逍遙派了。我想去大串联，去游山玩水，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朱成昭感到十分惋惜，却又无法挽留。最后，他说，人各有志，我也不好强留你。总部的位置给你留着，等你串联回来随时都可以回总部来。两人握手告别。

对广州、桂林的好印象

我遂与戴良吉乘车南下串联。我们先到郑州下了车，我回家看了看，待了一

天。我们又到了武汉，在武汉待了几天，到武汉大学转了转，看了看武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接着就南下广州。

这还是我第一次去广州。我们在广州吃饭吃冰激凌，发现都是先吃，吃完了再给钱，觉得非常稀罕，我们北方都是先交了钱然后才吃饭。我对戴良吉说，要是要饭的来了，吃完了不给钱怎么办呢？他说，可能是广州富，没有要饭的。哪像你们河南，要饭的那么多。我想，这可能和当地的富裕程度有关，也和当地人的修养、素质和习惯有关。广州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随后我们乘车到了桂林，我记得我们住在师范学院。我们在桂林住了好几天，每天都会在桂林的市区游览。有一天，我们来到伏波山游玩，碰到两个小姑娘在山下的河里游泳。戴良吉是我们学校游泳队的，看到水心里就痒痒，他随身带有游泳裤，外衣一脱，一个跳水动作就扎到了水里。那两个小姑娘大约有十三四岁，看到了他潜水就大声地喊他。等他从水里出来，她们就告诉他，这里水很深，下面是地下河，潜得太深了会被急流卷走的。叫我替戴良吉担心了一回。

随后我们和小姑娘攀谈了起来。她们一个叫阳征云，一个叫毛向林，都是刚上初中。现在学校不上课，她们天天出来玩。我觉得毛向林的名字很像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新改的名字，问她是不是，她说不是，是从小她父母给她起的。我赞叹她的父母真有先见之明。当她们得知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时，显得很兴奋，打听北京的事情，听到北京的什么事都觉得新鲜。她们自告奋勇，说明天带我们去七星岩和芦笛岩玩。我们说，七星岩我们已经去过了，但不知道芦笛岩在哪里，还没去过。她们俩说，第二天就领我们去芦笛岩玩。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芦笛岩。我觉得七星岩一般般，但芦笛岩十分好看，只是离市区很远。如果没有她们俩带路我们很难找到去的路。

我们要离开桂林了，两个小姑娘很想跟我们一起去串联。我和戴良吉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不带她们比较好。年龄小不是大问题，主要是性别不同，住起来很不方便。

在贵阳斥退抄家的中学生

离开桂林，我们就直奔了贵阳。戴良吉的哥哥在贵阳，而我的梅姐姐（我大姨的大女儿）也在贵阳。在贵阳下了车，肚子已经很饿了。我们决定先吃饭，吃过饭再各去自己的亲戚家。我们来到了一家小饭馆，像大排档一样，是露天的。当街摆着几张桌子，卖面条。我们很饿了，一人要了两碗面条。老板问，要辣的不要？戴良吉喜欢吃辣，大声说，要。我不敢吃辣，想说不要，戴良吉说，这里山高水寒，吃点辣的好。我犹豫了一下，心想，要一碗辣的一碗不辣的吧，万一

太辣了可以两碗兑起来，就不会太辣了。我就要了一碗辣的一碗不辣的。面条很快端上来了，一吃，哇，还真辣！幸亏我有先见之明，于是我把辣的那碗面条捞到了不辣的碗里，搅了搅，开始吃起来。哎哟，不辣的这碗面条也被染辣了。哎哟，那个辣呀，我至今还忘不了，直辣得我满脸流汗，像过夏天一样，汗水顺着脸往下流，每吃一口都要吸溜半天舌头。把那个女老板看得都很心疼，说，哎哟哟，没见过这么不能吃辣的人，过夏天也出不了这么多汗，你看看辣的！早知道不给你辣的了。最后，勉强吃了一半，再也吃不下去了，但辣也辣饱了，也不觉得饿了。贵州的辣椒真辣，到现在想起来我还害怕。

我们在贵阳住了好几天。我住在我梅姐姐家，那是一栋单独的楼房。但是没见到我姐夫，我问我姐，姐夫去哪儿了？我姐叹口气说，快一个月没回家了，几乎天天晚上在大十字（贵阳的市中心，是个十字路口，所以叫大十字）挨斗。我听了，默默无语。我姐夫是贵州省管文教的书记。整个教育战线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他是管文教的，挨斗自然是首当其冲。

到了晚上，我一个人跑到大十字，去看批斗大会。我看到台上站着五六个挨斗的人，低着头站成一排。我姐夫站在中间，其他几个估计是陪斗的。整个批斗会还比较文明，不像北京，搞体罚，揪着头发按着头，拧着胳膊往上抬，叫做坐飞机。我仔细听那些批斗的人念的发言稿的内容，除了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涉及生活作风方面的内容。我回去后，对我梅姐姐说，放心吧，我姐夫没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作风方面的问题，主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国都是，过了这一段儿时间就没事了。我梅姐姐听了，稍微安心了一点儿。

没想到，我姐夫第二天还回家了一趟。我给他讲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刘少奇。我姐夫听了，吓得连忙制止，连听都不敢听，慌忙说，可不敢乱说呀，可不敢乱说呀……我还想继续开导他，他吓得不敢听，连忙就退了出去。他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很快又跟着陪他来的人走了。仔细想想，我觉得他们这个级别的干部也很可怜。从上面下来的文件都是中央文件，他们都是按中央文件办事的。现在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那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件，他们都是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办事的，那还不吓死他们。

又有一天，快到中午的时候，大门突然响起“咣咣咣”的打门声，声音又大又急。我问我姐，什么人哪，怎么这样敲门？我姐脸色都变了，说又是红卫兵来抄家了。每次来抄家，见什么东西好就拿什么，见什么好吃的就吃什么。中午来了还要给他们做饭吃。我说，还有这事？我下去看看。说完我就往楼下走去。

这时已经听到“开门开门”的叫喊声。我快步走去，把门打开，看见是两个

十五六岁的红卫兵站在门前。他们显然没有想到开门的是个陌生的年轻男子（我姐姐没有男孩儿，只有三个女儿）。他们愣怔了一下，又看见了我戴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袖章，顿时就没有了刚才的气焰，在犹豫着进不进去。我问他们，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说，抄家。我又问，你们是哪个学校，哪个红卫兵组织的？他们两个扭捏着不肯说。我说，你们不知道抄家是要由红卫兵组织出面按规定执行的吗？他们无语。我又说，你们知道抄家对拿走的每一件东西都要登记造册，不能见什么拿什么，见什么吃什么吗？他们突然大声说，你是什么人，要你管？我说，我是首都三司的。我现在可以跟你们到你们学校去，和你们学校的红卫兵组织谈谈这个事。他们又不说话了。我接着说，走啊，前面带路，现在就去！他们两个突然以退为进，大声说，我们今天不抄了，改天多带些人再来抄。说完扭头就走，很快速地拐个弯就不见了。我对联动的抄家一向反感，我们“东方红”也没有抄过家。倒是原来的院文革、“斗批改兵团”在学校大肆抄家，烧“四旧”。

我回到屋里，我姐姐和我的小表妹们还很担心，怕他们以后再来。我安慰她们说，这两个毛孩子是私自过来捞好处的。以后再有人来抄家，要问清是什么学校，什么组织，要记下来。抄了什么东西，要他们写个清单签上字，留起来。这都是符合手续的，不用怕。

平静的思茅

我和戴良吉在贵阳待了五六天，又搭火车去了昆明。在昆明我们住进了云南大学。昆明的文化大革命还处在初始的阶段，很多学生还不知道可以免费乘车，可以自由地去北京串联。我有两个高中同学在昆明上大学，我去大学找他们，他们班的同学告诉我，他们刚刚去长征了。很是不巧，没能见面。

昆明有一种红梨，个儿很大，看起来肉很粗，可吃起来，口感很细腻，香甜可口，而且水分很多。可惜北京没有卖的。我们到滇池去玩了一天，石林就没有去。后来，我们决定去西双版纳，那是我向往的地方。在电影里看到的傣族风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来了一定不能错过。

我们坐上长途汽车，先到了思茅。思茅是西双版纳的首府，这里十分平静，还看不到有文化大革命的迹象。所幸，这里还设有接待站。我们两个住进去后，又认识了五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和两个郑州的高中生。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想到景洪去。但州政府不让去，说那里是边境，没有上级批准，不允许去，他们还在这里等消息。第二天我和戴良吉到思茅中学去看了看，发现那里一切按部就班，学生们都在上课，没有任何文化大革命的动静。等到下课了，我们和学生们攀谈，他们很关心北京的事，也问起大串联的事。我们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事情，他们

十分惊异，他们还不相信大串联这样的事。我们告诉他们，学生都可以到北京去串联，而且坐车住宿都是免费的，他们更是不敢相信，好像是天方夜谭。学生们告诉我们，学校还有他们的老师，都告诉他们不能离开学校，更不让到外地去。当地的政治形势和内地的形势整个是脱节的。

我和戴良吉同清华的五个学生讨论了这里的情况，决定给思茅的当地政府写大字报，批评他们跟不上形势，不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大字报贴到了州政府。引来了很多人来看，也惊动了当地的官员。他们连忙找我们座谈，询问北京的情况。我们给他们做了介绍，都是他们从未听过的很不顺耳的话。他们听着听着就有点坐不住了，觉得我们说的好像是反革命言论一样。在他们头头的暗示下，那些手下人没敢轻举妄动。毕竟顾及我们是北京来的，而他们对当前的形势又是满头雾水。他们还是以谦虚的态度向我们请教了很多他们还不明白的问题。他们问，为什么现在党中央不发指示，我们都要听中央一个文革小组的呢？我们说，因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有一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听了都噤若寒蝉，不敢做声。有一个人问，现在成立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权力这么大，这几个人过去都没怎么听说过呀，陈伯达还知道一些，其他的都不熟悉。我们问，江青同志你们也不知道吗？他们摇摇头，说，也不熟悉。我只好亮出底牌，说，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爱人，现在知道了吧？他们恍然大悟，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好像是茅塞顿开了。几个人几乎是同时说，知道了，知道了。一副受益匪浅的表情。

清华的同学又提出了去景洪的事，他们回答说，上级回复，说景洪是边境地区，一般人不允许去那里。我说，边境也是中国，为什么就不能去呢？他们中有一个人说，就是前一段有北京来的红卫兵从那里跑到越南去了，参加抗美援越去了。上级就来了个通知，不让红卫兵到景洪去了。我们是按上级的指示做的。我说，我们想参观少数民族的寨子，那怎么办？听了这个问题，他们绷紧的神经又松弛了下来，甚至还笑了一下，说，那容易，少数民族寨子到处都是，除了景洪暂时不能去，其他地方的寨子都可以去。我说，我们准备步行，长征，考察社会，考察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们一脸轻松地站了起来，一个头头模样的人说，欢迎啊，有什么困难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帮你们解决。有点像会谈一样的这么一个座谈会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回到住处，接着就开始筹划我们长征的路线了。

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征”见闻

离我们不远就是澜沧江，附近又没有桥可以走过去，我们必须先穿过澜沧江，才能先向北，经过临沧、保山、大理，然后折向东南，经过楚雄，再回到昆明。现在要想办法怎么样渡过澜沧江。我们跑到澜沧江边上考察，澜沧江水黄黄的，

好像黄河水，但实际上它的含沙量比黄河少多了。澜沧江很安静地流着，站在高处，觉得它很平静。从高处下来，来到岸边，才发现它很湍急，有波无浪，高速地向前奔流，流速十分惊人。我们几个人，除了戴良吉能够游泳过去，其余的人都不可能游过去。我们开始想的办法是，把我们打背包的行李带接起来，由戴良吉拉着一头游过去，然后把两头都绑在树上，其余的人拉着这条绳子游过去。商议完毕，戴良吉就动手把绳子的一头系在他的左胳膊上，我们用手拉住另一头。戴良吉下水了，他跳到江里，奋力向对岸游去，还没到江心，绳子就被江水冲成一个大大的弧线，巨大的后拽力，使戴良吉无法再向前进，无论他怎样用力，都无法拉直绳子，反而被绳子拖着不断地向下游移去。最后他筋疲力尽，只好放弃去对岸的努力，借着江水对绳子的冲力，回到了出发岸下游的岸边。很明显，这个办法行不通了。

我们站在岸边，望着湍急的江水，苦无良策。难道我们要被迫放弃吗？我们又想了很多办法过江，例如，砍竹子，抱着竹子游过去，但太不安全。我们又想到，找周围的老乡借船划船过去，但这里的老乡没有船。他们不用船过江，他们用竹筏过江。这太好了，我们可以砍竹子，做竹筏，划着竹筏过江。主意已定，我们准备找老乡借砍刀砍竹子了。这时突然看到上游有两个竹筏正向我们这里急速地漂来，每个竹筏上都坐了几个人，都有两个人拿着竹耙子，划着水，掌控着方向，正准备向我们这边靠岸。霎时间，就稳稳地靠在了岸边。我一时觉得我好像处在了神话故事之中了。愣怔了一下，我们就欢叫着向竹筏跑去。

他们都是傣族老乡，懂一点汉语。我们问他们这竹筏怎么做，他们懂了我们的意思，说，竹筏他们用完了，不要了，我们可以拿去，连同划水的耙子一起送给我们了。耙子也是竹子做的，做得很巧妙。这个构造不容易说清楚，我借个比喻，可能会表达得清楚一点。好像我们用的伞，伞柄，他们是用一根长长的竹杆。伞面，他们用的是竹片编的，是平面的正方形，不像伞面那样是弧形的。每个边长大约一尺左右。竹竿从竹片的正中间穿过去，竹片的四个角用竹子皮拧在竹竿上固定起来。划水的时候，要两个人配合，一个站在筏头，一个站在筏尾。用耙子扒水，不用向前扒水，因为江水本身已经流速很快了，而是向对岸的方向扒，控制住竹筏不要打横就行了。

那时还正是上午，我们当即留下两个人看守竹筏，其余人就回去收拾好行李，当天就准备过江了。把行李都带过来后，九个人（还有两个郑州的中学生），分乘两个竹筏。我和一个清华的学生划一个竹筏，戴良吉和另一个清华的学生划另一个竹筏。一个清华的学生负责照相，其余的人照看好行李，避免行李掉到江里去。

那时候也不懂得害怕，就这样匆匆忙忙就过江了。我和那个清华的同学奋力

向对岸扒水，竹筏艰难地向对岸缓慢地移动，同时还在水流的作用下向下游急速地下行，组成了一个合运动。当我们到达对岸时，由于速度快，控制不住，一下子撞在河岸上，人差一点儿栽倒，我趴在了竹筏上。而另一个竹筏也是碰在了河岸上，有一个人没站稳，掉到了河里。所幸是在岸边，很快被拉了上来。我们上了岸，看了看出发地，我们的到达地至少比出发地下移了一里多地。我们很激动，很兴奋。我们很冒险，但是，我们成功了！

过了江就是过了我们这次长征的最大的坎儿，剩下的路程只是翻山越岭走旱路了，没有大河险滩了。所以这一天我们也不用赶路，就近找了一个寨子就住下了。这是一个佤族寨子。一进寨子，先找管事儿的。我们内地以前叫村长，现在叫生产队长，不知道这里叫什么，是叫寨长吗？但是实际情况却很省事儿，我们进了一家人家的竹屋（佤族人不住竹楼，是在平地上造的竹屋）。家里的主人一见是生人来了，也不多说，直接就领我们去了负责的人的家里。负责人是一个汉人，是上面派来管这个寨子的。问了几句，知道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是在长征，找住的地方。就很爽快地说，好办，每两个人安排住一家，你们九个人，安排五家，又指着我说，你一个人住一家吧。住谁家就在他们家吃饭，按规定是每人每天一毛五分钱，你们给他们一毛两毛也行，不给也行。伙食不好，就是米饭，有点青菜，没有肉。另外，这里没有厕所，在外边随便屙，这里不讲究。说完就领着我们到各个家里去。

我一个人被安排到了一户人家里。我进了门，屋里光线不好，有一个小窗户，窗户没有玻璃，遮挡窗户的是用草做的草片子，用个小棍儿撑起来。竹房子的顶部也是用这种草铺盖的。一进门，有一块儿相当宽敞的地方，像内地房子的厅。平常人们就在这个厅里活动，聊天，吸烟，做饭，吃饭等等。四面墙，有相邻的两面，都有小房间，是家庭成员的住室。主人领我到了一个小房间门口，我今晚就住在这一间。我打量了一下，房间很小，但也显得精致，也有一个可以撑开的小窗户。床也是竹子做的，但是，这个床是不能移动的，它是用竹子和三面墙编在一起的，真是巧妙的设计。床上没有被褥之类的东西。这里不冷，可能也不需要吧，反正我们带有简单的行李。屋里也没有其他任何家具。我放下东西，就出来和主人说话。这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只有两口子和一个女儿。目前只有男主人在家，老伴儿和女儿在地里干活还没有回来。男主人懂少量汉语，我只能和他进行简单的对话。

晚上，女主人和女儿回来了。见家里有客人，微笑着点了点头，打了招呼，就忙着做饭。饮食很简单，就是糯米饭和青菜汤。按城里人的观点，营养可能不够，但糯米饭很香，很好吃，我以前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米饭。这里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任何娱乐，所以很早就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洗漱完毕，吃过早饭。我留下三毛钱，他们笑笑，就收下了。走到门外，大家住得都很近，一出门，都互相看得见，很快就聚在一起出发了。一路走一路说着各自的感受。我说，电影上，小说里，总是说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点着篝火，唱歌跳舞，通宵达旦。这里怎么冷冷清清，没有一点动静啊？大家都有同感，有的说，电影里的净是瞎编的，实际上，哪有这回事啊？劳动了一天，累得要死，哪还有劲儿载歌载舞呀！

一路上，自然风光不错，青山黄水——不是绿水，因为澜沧江水是黄的，满山的竹林，茂密得也是遮天蔽日。我看到竹子也分了很多种，有的竹筒很粗，长得像杨树一样高的筒竹——这是我自己的瞎起的名字，还有细小而婀娜多姿的，我们在内地常见的庭院竹，还有很多其它品种，都叫不出名字。

在思茅时，听说山里有旱蚂蟥，走过山里有草的小路时，就会爬到你身上咬你。我当时忙打听怎么样防止这种旱蚂蟥，当地人告诉我，穿上麂皮鞋就没事儿了，蚂蟥怕闻麂子皮的味道。我还专门花了十五块钱买了一双麂子皮做的皮鞋。现在看来，还没派上用场。

山路走了一整天，我们来到一个坝子里，坝子是当地人的叫法，就是小盆地的意思。坝子四周群山环绕，中间是一马平川，河水，稻田，芭蕉树，竹楼，真是人间美景。终于看到竹楼了，这里是傣族的居住地。傣族分两支，一支叫水傣，他们是云南众多少数民族中文化最先进的，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居住地往往也是当地最好的，就是在盆地里。另一支叫旱傣，他们的居住地一般在半山腰。哈尼族一般住在更高一点的地方，佤族一般住在山的最高处。我们在电影、歌舞晚会看到的傣族一般都是水傣。他们的衣着一般以浅色为主，比较艳丽。旱傣和其他几个少数民族的衣着以深色为主，主要是黑色，再加上一些服饰做点缀。

我们来到坝子时已是下午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了，正好看到傣族同胞放工的景象。他们当天收割的稻谷就在田里打好，收工时就挑回家去。我们看到一溜溜的傣族姑娘挑着装满稻谷的箩筐走在田埂上和田间小路上，她们的白色上衣很短，下着彩色筒裙，中间露着肚皮，肩上挑着箩筐，风尘仆仆地走过我们身旁。这一担稻谷很重，我估计至少也有七八十斤吧。她们的脸色红扑扑的，散出的少许头发被汗水沾在脸颊上。噗，噗，噗，噗，她们的赤脚沉重而轻盈地踏在细沙土地上，当她们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感到我脚下的土地好像也在轻轻颤动着。

很奇怪，这些收工回家的人群几乎都是女性，鲜见男子的身影。难道农活都是由妇女从事吗？我很疑惑。

晚上，我们照例由寨子的汉人主管安排到各个傣家竹楼。竹楼离地面有一米多高，我沿着竹梯，好奇地喜悦地一级一级登上竹楼，心情是那样的舒畅、美妙，确是妙不可言。竹楼上的格局和我住过的其他民族的竹舍差不多，大同小异。但

光线明显好多了，气流通畅多了。我住的这一家，人口也不多，夫妻两个和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位女性已经去河里洗完澡回来了，换好了衣服，正在准备晚饭。傣族妇女下河洗澡是不避人的，她们成群结队地到河里洗澡，嬉戏打闹，驱散一天的疲劳。汉人很喜欢去看她们洗澡，我不好意思走近去看，只是远远地观望。她们洗澡很有技巧，她们从岸边走到河里，筒裙是一点一点往上掀的，水漫过身体一点，筒裙就往上掀一点，水漫到了腰部，才褪去筒裙。水漫过了胸部才褪去上衣。然后，有的是把衣服盘到头上，有的是把衣服递到岸边。洗完澡，穿衣服时，是反过来的程序，真是聪慧绝伦。

他们家的儿子没回来，说是去会姑娘了。他们的女儿大约十四五岁，发育得很好，比我们汉人同样年龄的女孩子显得更成熟。她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抓了好多蜘蛛，用了很多蜘蛛网把它们裹起来带回家，她说要炒熟了吃。她把锅烧热了，把蜘蛛网扯开一个口，把里面的蜘蛛倒到锅里。我看到这些蜘蛛不是我们通常看到的蜘蛛，它们好像是硬壳的，蜘蛛腿也很长，硬壳上还有花纹。那些蜘蛛掉到了锅里，感到了热，慌慌张张地往外爬，小姑娘用手一个一个地又把它们扒拉下去。一会儿功夫，它们就不动了，长腿也僵直地缩了起来。小姑娘把它们倒在一个盘子里，拿了一个给我吃，我不敢吃，摇摇手谢绝了。小姑娘就一个人吃，一个一个地放到嘴里，像吃花生米一样。晚饭很简单，就是糯米团子，把蒸好的糯米用手团成团子，拿在手里吃。当地的糯米很香，不用就着菜也能吃。吃饭期间，我问男主人，为什么下地干活的都是妇女，男人在做什么？男主人说，男人只管耕田耙地，剩下的农活都是妇女干。平常，男人就是拿着猎枪上山打打猎。这里的男人真舒服，我不禁有些羡慕起来。

这里的风景好，乡土人情与内地有很大不同，我们决定在这里多住一天。

第二天，他们几个都要去坝子里转。我想去看看旱傣的寨子。打听好了离这里不远的半山上就有一个旱傣的寨子，我就一个人去爬山了。走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我来到了寨子边上，看到他们住的也是竹楼，不同的是，他们的竹楼下面养着牛和猪，竹楼的周围都是芭蕉树。我就信步走进了寨子。我看到这里的竹楼在楼梯顶端和门口之间还有一个宽敞的地方，像内地的阳台一样，有竹椅子摆上面。这真是个聊天喝茶打牌下棋的好地方，我很欣赏。

我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就顺着声音走了过去，想和他们说话。走近了，看到是几个带小孩的妇女在楼梯口那个类似阳台的地方聊天，她们都没有穿上衣，上身完全裸露着，没有乳罩（傣族妇女不戴乳罩），乳房也完全袒露着。她们怀里抱的孩子都很小，有的正含着奶头吃奶。她们看到了我这个外地人，露出很惊奇的神情，接着就笑着和我打招呼。我不敢走近前去，只感到她们的上身是白花花的一片，不好意思多看她们，怕别人说我有不健康的思想。就这样僵直地站了

一会儿，我好像被自己强制着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我走走停停，观察着寨子的结构和布局……

下午，我回到坝子里，见了我们长征队的同伴，交流着彼此的见闻。他们在坝子里转了一大圈，把美景看了个够，还顺着河走了很长一段路。这里的小河，水流平缓，河水清澈，不像澜沧江那样浑浊，而是呈淡淡的绿色，很是漂亮。他们略带遗憾地说，我们想参观一下傣族妇女在河里洗澡的场面，可惜没有看到。我说，人家洗澡是在傍晚，收工以后。这大白天的，谁去洗澡？我给他们述说了我的所见，他们也啧啧称奇，后悔没有跟我一块儿去。我们说好了明天早上吃过早饭就出发，争取在明天傍晚前赶到下一个目的地，那是一个哈尼族的寨子。

第二天上午八点左右，我们就出发了。一天基本上都是上坡路，比较辛苦。我们一人砍了一根细竹子做拐杖，上山可以省点劲儿。山间小路曲曲弯弯，路边的小草还挂着露珠，空气十分清新。路很窄，无法并排走，我们九个人拉开了不小的距离。走着走着，前面的人突然停住了，紧张地说，蛇，一条蛇拦住路了，不让过。后面的人一阵紧张，都停了下来。一个大胆的清华学生说，我去看一看，不用紧张，我看看是什么蛇。他拿着竹竿挤到前面去了，其他的人都停了下来，等着他，看他怎么处理。我听到他说，这条蛇横在路上，昂着头看着我，看样子是不想让我们过去。我说，那怎么办？蛇大不大？他说，蛇倒是不大，可尾巴是秃的，可能是毒蛇。我刚想说，那怎么办？要不要绕路？就听见啪的一声，接着又是啪啪啪的几声。然后是他略带紧张的声音，没事了，被我打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纷纷挤了上去。我看到一条绿色略带灰色的蛇横在小路上，大约有一米那么长，蛇脑袋快被打破了。大家在议论到底是不是毒蛇，我说，尾巴有点秃，像毒蛇。可颜色又不太鲜艳，不知道是不是毒蛇。一个老大哥说，管它是不是毒蛇，反正拦路的都不是好蛇。走走走，赶路要紧。大家又哈着腰拄着竹竿，呼哧呼哧地赶路。

终于，我们在下午五点以前赶到了哈尼族寨子。管理寨子的汉人又为我们安排住处。我问他，都说少数民族在晚上点着篝火，跳舞唱歌。怎么我们经过的寨子都冷冷清清啊？他很干脆地说，跳舞唱歌，那是“四旧”，资产阶级的东西，早就破掉了。我说，这怎么是“四旧”呢？都是民族传统的东西。他见我反驳了他的说法，又说，是不是“四旧”我也弄不清楚，反正上级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说，我们这次长征，就是考察少数民族的民族风情，你能不能给我们安排一下，晚上让我们看一下民族歌舞？他看了我一眼，犹豫着，没有说话。我接着说，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就是想考察一下少数民族的民族风情。他又看了我一下，终于下了决心，说，好吧，我去安排，你们吃过饭就到场上吧。吃罢饭，我们九个人都来到了晒场上，看见了十几个小姑娘，都是十三四岁，一个成年人都没

有。我问那个管理人，怎么都是小孩子？大人呢？他嘿嘿一笑，说，大人干了一天活，都累了，小孩子也会跳舞。我也不再追问他，毕竟有小孩子跳舞也可以。

我们期盼的少数民族歌舞晚会就要开始了。小孩子们先是排成了一排，手牵着手，唱起了歌，跳起舞来。队形也不断变换，手拉着手，一会变成了一个圆圈，一会又变成两排。歌曲的旋律比较简单，听几遍后就可以跟着哼哼了。舞蹈动作也不复杂，甩手，抬腿，转圈等动作，都比较朴素，远没有专业演员表演的歌舞那么优美。这是两个范畴，一个是自然和朴素，一个是加工提炼和雕琢。我们看了一会儿，也纷纷加入了队伍，跟着比划着也跳了起来。跳了一会儿，又变换队形，变成了脸对脸的两排，对面的两个人拉拉手，互相交换一下位置，又松开手，在各自的脸旁拍拍手。这时，我对面的小姑娘把她的两手搭在我肩上，接下来的一个动作吓了我一跳，她两手扒着我的肩一用劲，身体往上一跳，两条腿就夹住了我的腰，两个脚腕在我的腰后就搭在一起了。我连忙用手推她，示意她下来，心里又紧张了一次。她跳下来了，我示意她和她旁边的小女伴一起跳给我看。她很机灵地就懂了我的意思，转向了她的小女伴，两个人一起跳给我看。原来这个舞蹈动作是，女方跳起来用两腿夹住男方的腰，男方用两手扶着女方的后背。女方腾出两手，在自己脸颊的两旁分别拍拍手，然后再跳下来。这个舞蹈动作还是蛮有创意的，我能够想象出青年男女载歌载舞的欢乐场景。这些流传了千百年的歌舞也算“四旧”吗？也算“资产阶级”的东西吗？不能吧！

这是我们整个长征路上看到的唯一的一次由少数民族自己表演自己民族的歌舞，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

我们继续北上，但基本上已是汉族居住区了，沿途已很少在少数民族寨子里居住了。长征队的其他人怀念西双版纳的风土人情，他们决定再重返西双版纳，不想再继续北上了。于是大家分手，我和戴良吉继续按着原来的计划前进。一路上确实比较乏味，只是为了到大理看看白族的风貌，才支撑着我们继续前行。

到了大理，到了白族居住区，竟然没有进入了少数民族居住区的感觉，因为白族和我们汉族比较起来，除了服饰有些不同，而且主要是女性的服饰和汉族不同，男性平时穿的衣服也和汉族一样。其他的方面和我们汉族也没什么区别，讲的是汉语，写的是汉字，没有什么民族特点。我们在那里待了两天就不想再住下去了，很快就回到了昆明，又很快回到了贵阳。戴良吉决定在他哥哥家多住一段时间，而我一个人回到了北京。这次大串联就这样结束了，其时已经是元月份了。

上海之行

回校以后，我的几个小伙伴程希平、王白沙、童隆美、石白河听我讲了大串

联的经历，很是向往，一个劲抱怨为什么不带他们一起去。我说，我敢吗？把总部的骨干带几个走，朱头不骂死我。他们说，我们现在都是逍遥派了，现在可以带我们出去了吧？我说好，我在北京待几天，然后我们就走。

1967年初，我和几个好伙伴开始准备外出串联的事，王白沙是地院附中最早加入地院东方红的，所以她是附中东方红的负责人，也是地院东方红总部成员。她父亲是王光美的四哥，所以她叫王光美姑姑。她对我说，她妈妈听她说要和我一起去串联，想见见我。要我晚上跟她一起到她家里去，我就跟她去了。

她家住在红霞公寓，是一个在王府井附近的高级住宅区。我到了他们家，见了她妈妈。她妈妈很和蔼，拉了些家常，又问了我大串联的情况。坐了大约两个小时，我怕误了回学校的公交车，就告辞了。后来王白沙告诉我，她妈妈说，我跟着你去大串联她很放心。此时，上海已经发生了一月夺权风暴，这一事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和我的伙伴们商量，上海我们都还没有去过，不如我们先到上海去，在上海玩几天，顺便看看上海的形势。接着先玩江南，再到广州，然后再去云南。等到我们决定出发的时候，我想到这次一出去就得几个月的时间，想先拐到家看看。临时决定我和程希平先到郑州，停两天，再去武汉，然后乘船到上海。王白沙、童隆裴和石白河，直接从北京到上海，我们在上海会合。

我和程希平一起到了郑州，住在我家里。我父母除了被人贴了不少大字报以外，别的倒也没什么，还算平安。我觉得我有两年没见到我修哥了。修哥是我大姨的孩子，我贵州梅姐姐的弟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想见见他。我只知道他在密县地质队工作，并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我想密县并不大，干脆先去密县，到那里再打听。就和程希平一起坐火车到了密县。结果到了密县一问人，谁都不知道地质队在哪里，说地质队都在山沟里，不在县城。浪费了我们一天时间，也没见到我修哥。我们当天又从密县回到了郑州。更让我不敢相信的是，等我再见到我修哥的时候，竟会是在十多年以后。

第二天，我和程希平乘车到了武昌，住在邮电学院。我和程希平到长江大桥看了看，在那里转了大半天。下午我们又转到了汉口，打听到汉口有一个叫六渡桥的地方比较热闹，就坐公共汽车去六渡桥。上了车，我对售票员说去六渡桥。结果售票员听不懂，我拿出了写有六渡桥的字条，售票员才明白，说，哦，是漏斗桥。我听她说的六渡桥的发音像漏斗桥，那个桥字的发音还向上扬。中国的语言真有意思，方言太多，差不多一个地方一种方言。幸亏文字是相同的，要不然真麻烦。我们在汉口码头办好了去上海的船票。第二天，我们提前到了码头，顺利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客船。

我是第一次坐这样的客船，感觉挺新鲜的。我们的客舱有十几个人，每个人都有一张床，都是上下铺。船上还有洗澡的地方，吃饭还有专门的餐厅。我感到

很舒服也很好奇，我到船上的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到处转悠。船到了黄石，因预报船在黄石停的时间不长，我们没有下船。我转到船的下层，站在船边看江面上的风景。忽然看见一艘小的快艇从上游驶来，靠在了客船的边上，从小船上下来了几个人，登上了客船。我感到很奇怪，就注意地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进了船上的广播室，有一个人留在广播室的外面，像是个把门的。我就上去问他，你们是黄石的？他说，不是，我们是武汉的。我说我看到你们是坐着小船来的，不是黄石当地的吗？他看了看我，看到我戴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袖章，也不避讳我，说，我们是开快艇从武汉追过来的。有一个反革命组织的头头，坐上了这条船准备跑到上海去，我们在这里拦住他，现在要抓他回去。我说，怎么抓？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搜吗？他说，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过了一会儿，船上的广播响了，说，××同志请注意，您的东西掉了，请您到广播室来领取。一连广播了好多遍。当时的形势是，各地各单位都是派别林立，某一派占了上风就去抓另一派的人。我可以救这个人，我只要站在上面的楼梯口，看到有人想下来，告诉他不要下来就可以了。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万一真是坏人呢？所以我只好袖手旁观，站在那里看。过了一会儿，又广播了几遍。又等了很久，下来了一个人，进了广播室。一会儿，这个人被几个人簇拥着出来了，这个人正是他们要找的人。这个人被他们拥着上了小船，小船很快就开走了。小船离开以后又过了十多分钟，我们的船才启动。我们坐的客船因为这个事，延误了两个多小时。

这件事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总是在问自己，我应不应该救这个人，万一他是个好人呢？另一种想法是，也可能他就是坏人呢？真是折磨了我好长一段时间。

到了上海，我们两个就和其他三个伙伴会师了。我们住在地质东方红在上海的联络站，这是一座小洋楼。据说这里原是某个外国，可能是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所在地。领事馆的人员可能撤走得较匆忙，还遗留了一些小东西。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留下的飞镖和靶子。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玩具，十分喜欢，我每天都会抽时间练习在靶上投掷飞镖。我的小伙伴们也喜欢，但是都没有我的兴趣浓。我们东方红常驻上海的代表徐娟娟，看到我喜欢，就收集了一下，大约有六七个，全部给了我。

我没想到蒋良朴和杨雨忠也来了上海，很高兴在上海又见到他们。杨雨忠是上海人，他住在他自己的家里。他执意要请我和蒋良朴到他家里吃饭，那一天，我和蒋良朴跟着他到了他的家。杨雨忠的父母都是上海的工人阶级。我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母，两个老实巴交善良好客的叔叔阿姨。他们亲自下厨做了几个上海菜，端上了自己酿制的米酒。米酒酿得非常好，口感宜人，我和蒋良朴每人喝了一大玻璃杯。上海家常菜也非常可口，清淡而不咸不腻，我觉得比河南菜好吃，

河南菜有些偏咸。米酒的度数感觉不高，没想到喝完以后，竟迷迷糊糊地想睡觉。杨雨忠连忙安排我和蒋良朴在他的房间小睡一会儿，我和蒋良朴躺到了床上就沉睡了过去。醒来时已经下午五点多了。结果是，杨雨忠和他的父母已经做好了晚饭，坚持要我和蒋良朴在他们家吃晚饭，我和蒋良朴又在他家里吃过晚饭才回去。杨雨忠和蒋良朴来上海是干革命的，所以他们又忙着干革命去了，我后来就很少再见到杨雨忠和蒋良朴了。我来上海是看革命的，所以我空闲时间就多，我和我的伙伴们每天在上海溜溜达达。后来有一天，杨雨忠和蒋良朴对我说，朱头叫他们尽快回北京。他们两个就马上回北京了。

接下来就该我们去大串联了，可我心里总觉得有个什么事儿放心不下，这种感觉怪怪的。这时，我的四个伙伴已经找到了学工的活儿，在一艘货船上除锈和刷油漆。我和他们在船上干了一天。船上的人说，这艘船很快就会开往大连，在大连卸了货，再装货回来，前后得十来天时间。我想，我何不利用这十来天的时间，回一趟北京，看看情况，然后再回到上海，和我的伙伴们会合，再安安心心地去串联呢？

主意已定，我就对程希平、王白沙、童隆裴、石白河说，你们先跟着船去一趟大连，我利用这个时间回北京看看，如果北京一切如旧，我就赶回上海和你们会合，咱们再安安心心地去串联。程希平和王白沙说，管它北京有什么事呢，我们串联我们的。按说，我们已经逍遙了，那就逍遙呗，北京就是翻天覆地了，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我当时心里就有那么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北京要出什么事了，想去看一看才觉得安心。现在再回首往事，我已清楚地知道，这是个劫数，我是在劫难逃。但在当时，我还是坚持说我要回北京看看情况，然后再回来。伙伴们看我主意已定，不好再说什么，同意我回北京，并嘱咐我早去早回。就这样，我告别了我的好朋友好伙伴，独自一人，踏上了回北京的征程。

回北京不久，朱成昭出事了，被中央文革责令“闭门思过”，“东方红”的工作暂由王大宾负责。我觉得自己的朋友遭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出去大串联，去游山玩水，在感情上是说不过去的。我告诉在上海的伙伴们，朱头出事了，在短期内我去不了上海了。

南下广州

朱成昭的事基本上告一段落，王大宾正式成为地质东方红的一把手。地质东方红继续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前行。我又有了充足的时间，可以和伙伴们去大串联了。但是大串联当时在全国已经停止了，免费乘车免费住宿的条件已经没有了。我们这些没有收入的学生再想去周游全国已经不可能了。

当时梅建明和杜金山已经去了东方红广州联络站，我一个人待在学校感到非常乏味。梅建明和杜金山建议我到广州去待一段时间，我对广州印象不错，也想故地重游，于是我便去了广州。

广州的东方红联络站设在广东省地质局。梅建明和杜金山都住在地质局招待所。我开始也想住在那里。但是我的姑姑和姑父当时在广州的中南局工作，我看他们的时候，我姑姑说，傻孩儿啊，住在那里怎么行啊，吃又吃不好，住又住不好，就住在家里，这里离地质局又不远，走路去就行了。于是我就住在了我姑姑家，每天走路到联络站去。

当时我们地质东方红的报纸《东方红报》在广州发行，从北京发航空版到广州，在广州印刷后发行。每份卖2分钱，很多地派的中学红卫兵自愿地去卖报纸。他们从联络站领了报纸到大街上去卖。地质东方红在广州的影响很大，地派的实力也很大。我们的《东方红报》很好卖，每次出报，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卖完了。后来我和那些自愿卖报纸的中学红卫兵混得很熟了，能和他们打成一片。有一个胖胖的女孩儿就开始和我开玩笑，她看我戴了副眼镜，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四眼狗，而且是用广东话叫我四眼狗，搞得我还一时找不到办法对付她。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我问她，白毛女用广东话怎么说？她说的是拔毛内。我学会了。我又请教她，肥用广东话怎么说？她说的是肥。我又学会了。然后我把学会的话组合起来，组合成了白毛肥女，我会用广东话说白毛肥女了，这样我就有了对付她的武器。当她又用广东话叫我四眼狗的时候，我就用广东话叫她白毛肥女。她大吃一惊，气愤得不得了，说想不到我还会用广东话骂人。我说是跟你学的，你骂我，我就骂你。你不骂我了，我就不骂你了。以后，每逢她叫我一句四眼狗，我就回敬她一句白毛肥女。几次以后，她就和我讲和了，从此不再用四眼狗骂我，我也不再叫她白毛肥女了。接下来就是大家友好相处，相敬如宾，玩笑照样开，但是不过分。

地派在广州的影响很大，还有专门的文艺宣传队，差不多每周都有文艺演出。梅建明和杜金山和这些文艺界的演员很熟，梅建明和杜金山介绍我和他们认识，其中有大辣椒，小辣椒，还有一个广州歌舞团的小高，她们都是舞蹈演员。后来我和她们也熟悉了，还认识了一位独唱歌手叫朱敏。广州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也分派系，两派也辩论，但是基本上不搞武斗，我对这一点还是比较欣赏的。梅建明后来家里有事，先回了北京。只剩下我和杜金山继续留在广州。梅建明走了以后，《东方红报》卖报的经费就由我保管。又过了一段时间杜金山也回了北京。广州就剩下我一个人。

返校后又随朱成昭南下

我在广州又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个人也觉得无聊。我也回北京了。到了北京，下了火车，再乘公交车去学校。到学校已经是傍晚了。我心里还提醒我自己，到明天别忘了把报费交到报社去。晚上早早就睡觉了。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多吧，我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被人推醒了，睁眼一看，原来是张华清，他小声对我说，朱头找你，叫你去一下。我说，太晚了，明天吧。张华清说，他现在在小梅家，在等你，叫你现在就去。在屋里说话怕影响别人睡觉，我只好穿上衣服，跟着张华清来到宿舍外面。我说，又没有什么急事，明天去不行么？张华清说，就是有急事才来叫你的。他们明天就要出去串联了。刚知道你今天回来了，叫来叫你。要不然他们明天就走了。刚好我的小行李背囊还没有打开，我就回到宿舍提了小背包就跟着张华清走了。张华清骑个自行车带着我就去了梅建明家里。到了小梅家里一看，朱成昭和小梅都在那里。朱成昭看到我就说，你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我们还以为你会在广州待上一段时间呢。我说，一个人住那儿没意思就跑回来了。你们准备去哪里串联啊？朱成昭说，先去上海待几天，然后去广州，在广州玩几天，就去西双版纳。你不是说去西双版纳玩你当向导么？我说，你们要去广州也不告诉我一声，我要知道你们要去广州，我就不回来了。朱成昭说，主要是没想到你会突然回来，所以没通知你。蒋良朴、李尤江、杜金山和叶向真今天刚走，去广州找你去了。结果你跑回来了，两岔了。我说，那你们先去上海吧，上海我去过了，我就不去上海了。我休息两天，然后我直接去广州，在广州找你们。梅建明说，这么晚了再跑到学校去？再待一会儿天就亮了，吃点东西就该去车站了，还折腾什么？一块儿走吧。朱成昭说，车票还差一张，华清先不去吧，先让狗头（我的绰号）去。过几天再办一张去广州的票，华清可以直接去广州找我们。朱成昭又问我，你在广州卖报的报费带回来没有？我说，带回来了，我准备明天就交到报社去。朱成昭说，你看现在我们都没有经济来源，这次出去串联肯定花费不少，能不能先用一下这笔费用，以后由我出面归还。我当时不懂得通融，直截了当地说，那不行，这是公款，由我经手保管，我要负责交回去。串联的费用，我们得自己解决。朱成昭看了我一眼，稍微沉思了一下，接着说，那这样吧，费用等我到上海后筹措一下吧。后来我们几个人说话一直到天亮。我们在梅建明家简单吃了点儿早餐，然后就去了火车站。张华清一个人回到了学校。

直到几十年以后，在 2014 年，我去都江堰看望王大宾。有一次闲聊，在谈到往事时，王大宾问我，你和朱成昭那一次出去串联，之前，朱成昭曾经给东方红上海联络站的庄一龙打过电话，说要借 3000 块钱的卖报经费用一下。庄一龙已经把钱准备好了，欠条也预先写好了。朱成昭过去签个字就可以把钱拿走了。

怎么后来没有去拿呀？那个借条现在还保存着呢。我才突然回味过来，我推测事情应该是，在我没有从广州回北京以前，朱成昭原准备从东方红上海联络站借报费的，所以先打电话给庄一龙，让他先把钱准备好，等他到了上海去拿。后来我回到了北京，朱成昭就想就近从我这里借报费，没想到被我一口拒绝。他并没有责怪我，可能是我的态度触动了他，他到上海后根本就没有去找庄一龙去拿钱。那应该是他当时就决定不用公款了。那肯定是他在自己家里筹措了一些钱。我们去串联一路上花的钱，实际上是他从家里筹措的钱。我当时当着王大宾的面不觉眼睛就湿润了。朱成昭当时被批判得一塌糊涂，但实际上他在大节上是光明磊落的，人格上是使人钦佩的。我十分悔恨我那时的死板脑筋，竟没有把我保管的报费拿出来帮我的难友们度过那段困难时期。后来我精心保管的报费还有我自己的积蓄被学校专案组的李士田一股脑儿地掳了去，真不如我们在串联的时候痛痛快快地花了它。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了王大宾听，王大宾也唏嘘不已。当时蔡派们污蔑朱成昭带着什么机密数据要叛国外逃，真是一派胡言，哪有这回事？

游了杭州再去广州

我们到上海后，在朱成昭家里停留了两天，然后就去杭州，准备去游灵隐寺和西湖。到杭州时已经是晚上了。出了火车站，我们不知道地质局招待所在哪里，看见有拉三轮的，就问他地质局招待所在哪里？三轮车夫说，呵，那远了，走路是不行的，我拉你们去吧。我们人生地不熟，天已经很晚了，就决定坐三轮车去地质局。一辆车五块钱，我们三个搭了一辆三轮车。三轮车拉着我们晃晃悠悠地走，三轮车夫一路上还和我们聊着天。觉得走了好长时间，才到了地方。我觉得这么远啊，真不亏花了五块钱。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招待所吃完了早餐，地质局的人说领我们出去转转。出了门，刚拐出一个路口，就看见一个大广场。我觉得怎么这个地方有点眼熟啊，就问，这儿怎么和火车站这么像啊？地质局的人说，什么像啊，这儿就是火车站啊。我们听了，都愣了，说，昨天晚上我们坐三轮车走了半天才到，现在一看怎么就在跟前啊？地质局的人一听就笑了，说，哎哟，你们上当了。他们是为了赚你们的钱哄你们的。其实根本不用坐车，就在火车站旁边。我仔细想想，拉三轮车的人为了赚这五块钱，拉着我们转了半天，走了那么远的路，多累啊，赚点儿钱真不容易呀。

我们在杭州看了灵隐寺，游了西湖，又专门去虎跑泉去喝了龙井茶。一杯茶三毛钱，当时还觉得挺贵的。小梅（建明）是喝茶品酒的专家，他品着茶说，好茶，这虽然不是最好的龙井茶，也是当地产的上好的龙井。三毛钱，值。

我们还跑到钱塘江去看钱塘潮，但当时没有潮。我们就跑上钱塘江大桥，准备照相留念。小梅刚拿出相机准备照相，我们还没有站好，一个佩枪的解放军战士就走过来了。他对我说，这里是军事禁区，禁止照相。我感到不解，不就是一个大桥吗？怎么连照相都不准呢？但我们还得听解放军的，就没有照相。我们在杭州玩了两天就又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

第二天上午，火车到了湖南境内。我们看到有一条大河并行在铁路旁边。有很长一段时间，火车一直顺着河边走。朱成昭说，湖南有这么大的一条河，不知道这条河是不是湘江。咱们下去看看吧，我想下去游泳。我们就在一个叫耒阳的小站下了车。走到了江边，当地可能刚下了大雨，河水浑浊，河面十分宽阔。朱成昭和小梅都是游泳能手，跳到河里就游了起来。我不善于游泳，就没有下水，站在岸上观看。玩了一阵，又在这个小火车站等下一班去广州的车。等到下一班去广州的车来了，我们并没有这班车的票。我们先上了车，让列车员看了看我们上一班车的票，又说了说情况，列车员就叫我们坐在那里了。第二天上午，火车快到广州时，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停了很久都不开。我们问列车员什么时候开车，到广州还有多远，列车员说，这里已经是广州了。什么时候开车还不知道，前面好像出什么事了。我问列车员，你说这里已经是广州了？这里有公交车到东山吗？列车员说有。我和朱成昭、小梅他们商量说，这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不如我们坐公交车到市中心去。

于是我们下了车，改乘公交车去了广州市中心地区。

到了广州东山，先到了我姑姑家小歇片刻，大家也顺便认认地方。接着小梅就打电话给马万祺的二公子，我们都叫他二马，请他当导游领我们在广东旅游。朱成昭打电话联系上了叶向真、蒋良朴、李尤江和杜金山，约他们到我姑姑家会面。在我姑姑家大约待了一个多小时，约来的人都到齐了。小梅给二马讲了我们准备游广东的风景名胜，请他帮我们设计一下行程。二马说可以先游一下广州附近的西樵山和从化的温泉，然后再游肇庆。当下决定先去游西樵山。

我们八个人随后就乘车去了西樵山。西樵山风景秀丽，到如今还给我留下印象的还有三样东西，一是西樵大饼。西樵大饼是当地的一种食品，类似北方的烧饼，但口味和北方的烧饼完全不同。二是山顶的一个湖泊。就在山顶的中央有一个大湖泊。我怀疑这里在远古时期可能是个火山口，后来成了湖泊。只是猜测，还没有科学依据来支持这一观点。三是半山腰有一个溶洞。溶洞里是一池清水，十分清澈透明，十分平静，没有一丝波纹。目视可以看得很深很深，深不见底。这个洞十分迷人，小梅和朱成昭想跳下去游泳。我看到这水异常清澈平静，竟怀疑这水的比重是不是有问题。我让他们稍等片刻，我去洞外找了一块大石块和一根小树枝，然后进到洞里。我先把大石头投到水里，噗通一声大石头就掉进了水

里，只见大石头晃晃悠悠向水底沉去，一直到大石头小得看不到了，仍然见不到水的底部，可见这水是极深的。我又把树枝抛到了水里，树枝也稳稳地飘在水面上，可见这水并无异常，我才放下心来。我对他们说这水就是普通的水，只是太清了，其他并无异常，可以下去游泳。于是小梅和朱成昭跳下去畅游了一通。西樵山一游，二马全程导游，不辞辛苦。全部费用，二马一人承担，十分义气。我们在西樵山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起床后，吃了早餐就动身回广州。在当天中午刚过就回到了广州。约好了第二天一早就去从化温泉，当天下午各人自由活动。

警备区军官陪同到从化参观领袖“行宫”

我们在广州玩得高兴，却不知在北京我们学校已经炸翻了锅。蔡派们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朱成昭从北京走了，并危言耸听地散布说，朱成昭逃跑了，而且连夜把我也带走了，甚至煞有介事地说，朱成昭带了机密文件去叛国投敌了。他们连番地向中央文革和周恩来举报，把中央文革和周恩来也搞得十分紧张，连忙指示广州警备区查找朱成昭等人。中央的办事效率很高，很快查到了我的姑姑和姑父在广州中南局工作，又很快地找到了我的姑父。他们询问我姑父有没有见到我们这几个人。我姑父说，有啊，他们昨天来的，已经到西樵山旅游去了。他们叮嘱我姑父，等我们一回来要马上通知他们，并且要对此事保密。但是我们当时对此还一无所知。我们中午回到广州后，把随身物品往我姑姑家一放，当天下午各人自由活动去了。我和杜金山就去了地派的文艺宣传队，看了看我们的老朋友，小高（高慧兰），小辣椒（易韵仪），大辣椒（潘淑仪）和朱敏等人。大家说了一会儿话，说了说北京的情况和我们这次在广州游玩的大致安排。我们在那里聊了一会儿，我和杜金山就告辞回到了我姑姑家。

一进门，没有看到我姑姑和我姑姑家里的人，客厅里坐着两个年轻的军官。这两个年轻军官见了我们进来，他们就站了起来，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广州警备区的。根据中央的指示，特地来请我们到警备区招待所去住。我有点怀疑，说，我们几个学生是来玩的，怎么可能会中央出面叫你们来找我们去你们那里住呢？他们说，我们只是奉命办事，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但我们可以负责地说，这绝对不是我们广州警备区自己的决定，我们是奉中央的指示请你们过去住的。我说，我们还有好几个人没回来呢，等他们回来了一块儿去。他们一笑说，他们已经先过去了。你们两个回来得晚，我们是专门接你们两位的。我听到朱成昭他们已经先过去了，也不再说什么，我和杜金山分别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行李，就坐上了他们的吉普车跟着他们去了广州警备区招待所。我当时心里十分疑惑，怎么我们几个普通学生出来旅游，中央还会管这种事呢。

到了警备区招待所，见了朱成昭、小梅等几个人，他们也是分别回到我姑姑家后，被分别接到这里来的。接我们的军人说，这里条件不错，你们安心在这里住下，我们听从中央下一步的安排。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说，我们定好了明天要去从化温泉玩的。他们说，这个问题我们请示以后再答复你们。

第二天早上，我们刚吃罢早餐，回到房间没一会儿，就听见招待所大门口处有很多人一起在喊“小梅，小梅”，“杜金山，杜金山”，还有我的名字。我们正感到奇怪，一个军官匆匆赶了过来对我们说，门口聚了很多红卫兵，怀疑我们把你们绑架了，要求我们放人。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请你们出去向他们解释一下吧。于是，小梅、杜金山和我一起来到了大门口。一看，都是地派的造反派，有几十人。他们看到我们出来了，显得很高兴，围在一起说话。原来是昨天下午，小梅他们几个被接到这里时，在大门口一下车，正好有个地派的红卫兵从这里经过，他认识小梅。他看到小梅他们几个人被军车拉到这里，怀疑是被绑架来的，就躲在旁边看动静。没多久，又看见我和杜金山也被军车和军人送过来了，更是怀疑我们是被军队绑架了，连忙到总部报告了这个情况。于是地派红卫兵总部就在今天早上拉了一车人来，要求放人。经我们解释，知道了没什么事，是一场误会。说了一会儿话，他们就回去了。

陪我们的军官看到事情圆满解决，没闹成大事，也显得很高兴。过了半个小时左右，那个军官又兴冲冲地跑来了，说，你们想去从化参观的事，经请示，上级批准了。现在就带你们去从化参观，中午在那边吃饭。我们都很高兴，把行装一整，坐上车就出发了。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广州警备区设在从化的招待所。午饭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把行装往各自的房间一放，就来到了食堂。餐桌上摆上了一桌子菜，很丰盛。陪同我们的两个年轻军官在接待方面十分得体，每个菜都向我们做了简单介绍。吃饭时，他们也是灵活地观察着客人们吃饭的情况，很优雅地在盘子边上夹菜吃。我们这七个人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胃口好，饭量大，也不讲究什么礼节，就狼吞虎咽起来。那两个年轻军官看看我们这吃饭的架势，担心菜不够吃。他们就很少动筷子夹菜了。我注意到他们俩只是象征性地动动筷子，只吃饭，基本不夹菜吃了。有一盘菜，叫苦瓜牛肉，我吃了一口，感觉很苦，就问，这个菜怎么这么苦啊？是不是坏了？年轻军官一笑说，不是坏了，这是苦瓜，味道就是苦的。我们之中，只有蒋良朴吃过苦瓜，他是湖南人。蒋良朴说，苦瓜，就是吃它的苦味的，好吃。剩下我们几个人都吃不惯这个菜。我们这几个人的食欲之好，饭量之大，出乎意料。我估计那两个年轻军官可能没有吃饱。随后可能他们通知了食堂，要加大菜的分量。因为随后几餐，菜的量明显增加了。

下午，陪同我们的两名军官带我们去参观毛主席在从化的一个疗养地，其实

就是行宫。那是一个两层的中式楼房，楼房是封闭着的。我们只能绕着楼看看外围，趴在窗子上透过玻璃看里面的情况。里面的家具全是仿古的中式家具。楼房周围有很多开花的树木，我叫不出名字。我看到每棵树的树枝上都挂了许许多多的小玻璃瓶。我不解其意，问那两个军官，才知道因为广东的蚊虫较多，那些小瓶是装驱蚊油用的。平常不装，只有在毛主席来住的时候才把驱蚊油装进去。我感到吃惊，这么多小瓶，有很多还挂得很高，怎么装啊？得多少人去装啊。这个住宅区并没有围墙，但是它的外围种了一圈细藤条。这些藤条有手指粗细，种得十分紧密。藤条并不是只栽了一层，而是几层，密密麻麻。不要说人，就是大一点儿的老鼠都钻不进去。而且整个住宅区周围数里之内都看不到有任何住家。军官告诉我们说，这里只有毛主席来了才能住。其他人，包括江青同志单独来了也不能住这里。随后又领我们去看了刘少奇的别墅（我们就叫别墅吧，其实也是行宫）。刘少奇的这栋楼是西式风格的建筑，阳台及里面的家具设施也都是西式格调，外围设施和毛的差不多。两个地方大约相距有几公里。最后，我们又去看了准备给林彪盖的疗养地。但是那里才刚刚打了地基，完全还看不出规模。距刚才看过的那两个地方也有几公里。但不知为什么，当时看不到动工的迹象，好像已经停工了。

第二天，我们又参观了当地的一些风景名胜，下午就回到了广州。到了广州，我们还住在原来的招待所。这时，小梅的大哥梅项明已经来到了广州，要接小梅回北京。原来是中央有关部门向小梅家里通报了这个情况，小梅的大哥就连忙赶到了广州，接小梅回家，用以向上面显示配合之意。但是小梅不愿意一个人回去，要拉着我跟他一起回去。我其实还想在广州多玩几天，但小梅这么说了，我就不再留恋广州，痛快答应和他一起回北京。项明大哥随即买了当天晚上回北京的车票，三个人当晚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的火车很慢，到北京差不多要两天两夜。我们在车上无聊，项明大哥就教我和小梅打桥牌。我发现我对桥牌很感兴趣。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时期，中国兴起桥牌热的时候，我是个积极的参与者。我的桥牌启蒙老师就是项明大哥。

我们到北京的第二天，蒋良朴、李尤江和杜金山也乘火车回到了北京。而朱成昭和叶向真则是中央安排坐飞机在第三天回到了北京。

南京印象

我们回到北京后，又过了一段枯燥单调的日子。杜金山想回家看看他的父亲，他的家在南京。南京我没有去过，就决定跟他一起去南京，探望他的父亲。杜金山的父亲患了精神病，在南京精神病院住院。杜金山打电话联系了精神病医院，

约好了探视时间。我就和杜金山一起到了精神病院。精神病医院的门是个铁门，进出检查十分严格。病房的门平常都是锁着的，病房的窗户全部安有铁栅栏，看起来像个监狱。我感到很不舒服，就问杜金山，你父亲不能在家里养病吗？一定要住在这里吗？杜金山叹口气说，我们家里没有人能照顾他。你看，我在北京上学，我姐姐在北京工作。在南京的家人也都在上班，没有人能整天陪着他。不住在这里又能去哪里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呀。我听了以后，心里觉得难受，却又无能为力，不禁哀叹，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对南京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绿化得好，路两边都是树，以法国梧桐最多，走在路上感觉很舒服。另一个是物价低，那时全国的物价都低，但我还是对南京的物价很满意。我在街上转悠的时候，看到街上开的私人小饭馆，就进去吃饭，一饭一菜一汤，才三毛钱。饭随便吃，菜是青椒炒肉丝，汤是西红柿鸡蛋汤。味道好，吃起来很舒服。我在南京待了几天就回了北京。杜金山说他还想在家里多住一段时间，晚一点再回北京。

到海边去

我回北京后，仍然是无所事事，既不上课，又没有什么事可做，实在是无聊透顶。就和小梅、张华清结伴去外地转转。我们决定先去张华清的老家山东荣成的海边去住一段时间。

我们先到了青岛，住到了小梅的二哥昌明的家里。小梅的二哥和二嫂都在青岛的一所大学里教书。后来昌明二哥成了那个大学的校长。我们去的那个时候是八月份，天气很热。晚上我们跑到海边去游泳，游完了才睡觉。第二天去栈桥玩，我们看到离岸很远的海面上用大型浮标架起的一排大标语，“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小梅想游到那里去，我也很想游过去，但我学游泳还没有多长时间，担心游不到那么远。小梅说，没事，你如果游不动了，我就拖你回来。为了验证他能不能拖动我，决定先试试。我就扬脸飘在海面上，小梅拖着我的一只胳膊拖着我移动，我感觉还可以，就跟着小梅一起跳到海里，向海里游去。张华清先不去，在岸边看衣服。等我游回来，他再跟着小梅一起游过去。我用的是狗刨式，游得很慢。小梅耐心地游在我身边，慢慢地陪着我游。估计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游到那排大标语那里。标语是架在由很多大竹子做成的浮标上的，浮标由一些铁链子拉着固定在海底。我们坐在浮标上休息了一会儿，就又跳下水向岸边游去。又游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游上了岸。张华清说，游得那么慢，我都在这里等烦了，都三个小时了。随后由我在岸边看衣服，小梅又陪着张华清向海里游去。我站在岸边看他们游，果然觉得他们游得很慢。我把衣服收到一起裹成一团，

提起衣服在岸边到处转。转了很长时间，才看到他们开始往回游了。一直看到他们快回到岸边了，我才走过去等他们。我和张华清都不怎么会游泳，这次是我游的时间最长，也是游的距离最远的一次。

两天后，我们就来到了张华清的老家。那是一个紧靠大海的村庄。张华清的父母都在北京工作，老家只有他舅舅一家人了。我们住在他的舅舅家里。张华清的舅舅十分好客，和我们很谈得来。离村庄很近，就是一片浅海，大片大片地方的海水只有一米多深左右，盛产螃蟹。华清的舅舅说夜里带我们去扎螃蟹。

到了后半夜，我们划着小木船去了浅海。船头上吊着一个大汽灯，十分耀眼十分明亮。加上海水本来就很清澈，所以海底的水草、沙石、螃蟹、鱼类，看得一清二楚。我们用来叉螃蟹的工具是小鱼叉，鱼叉很简单，就是一根棍儿或一根竹竿，在头上绑一个铁做的三个齿的或一排齿的叉头就行了。我们每个人拿一柄小鱼叉，华清的舅舅站在船头，我们分别站在船的两侧，看到有鱼从船边游过就用鱼叉去叉。看到海底有螃蟹在爬，也用鱼叉去叉。叉到了鱼或螃蟹就丢到船舱里去。当时不知道是不是螃蟹的交配季节，看到很多两个螃蟹摞在一起的情况，下面是个个头比较大的螃蟹，上面驮了一个个头比较小的螃蟹，可能是在交配。我看到两个摞在一起的螃蟹，不忍心去叉它们，放了过去。华清的舅舅看到了，毫不犹豫地一叉下去，一叉就叉起来两个。那天夜里我们还叉到了一条一尺多长、长得像鲨鱼一样的鱼，我们叫它小鲨鱼，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鲨鱼。黎明之前，我们已经叉了很多螃蟹和鱼，困意也上来了，我们准备回去。四周一片漆黑，我不知道如何辨别方向，如何在这四周没有参照物的浅海中找到回家的路。华清的舅舅十分了得，他竟然可以在看不见周遭环境的黑暗之中，仅凭着感觉，不需要任何仪器来定位，就把船划回了自己村庄的岸边。当我们下船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刚开始消退，东方显现出一抹浅浅的鱼肚白色。

到了家，我们已经困得要命，眼皮子几乎抬不起来。我、华清和小梅，到了屋里倒头便睡。而华清舅舅一个人在剖鱼蒸蟹，准备早餐。等华清舅舅叫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一觉，顿时又感到体力充沛，食欲也大开，一个个摩拳擦掌地准备享用这地道而丰盛的海鲜大餐。华清舅舅蒸了一大锅螃蟹，煎了几条鱼，调了一盘自己腌的咸萝卜丝，摊了一摞山东煎饼，还熬了一大锅玉米面粥，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美味可口的早餐。吃早餐期间，华清舅舅告诉我们，现在是夏天，是螃蟹最瘦的时候。如果我们十月份来，那时的螃蟹很肥，比现在好吃多了。我、小梅和华清，兴趣盎然，不住地说，我们争取十月份再来，尝尝秋末肥蟹的味道。

我们在华清舅舅家住了几天，准备前往大连了，这是我们出发时计划好的行程。从大连再到长春，再到哈尔滨，然后到沈阳，再回北京。但在我们要出发时，

华清舅舅坚持要华清在家多住几天。华清舅舅说，多少年才见一次面，哪能才住了几天就走？一定要华清多住几天。华清不好意思薄了舅舅的面子，答应在家多住一段时间。

在大连看到武斗死者

我和小梅两个踏上了旅行的征程。我们看到山东风光秀丽，决定徒步旅行，前往威海，从威海再到烟台，然后从烟台乘船到大连。从荣成到威海，再到烟台，我们一路走的基本上都是山间小路，当时正是瓜果飘香的季节。我们阅尽了胶东半岛的秀美景色，也尝遍了胶东半岛美味的苹果和梨，西瓜和甜瓜。喜欢搞地质的人，大都喜欢徒步旅行，融入大自然之中，感到遍体通透，心旷神怡。路上的小旅馆很便宜，一两块钱就住一个晚上。小餐馆的菜也便宜，一个柿子椒炒肉丝才一毛五分钱。

我们游了威海，那时威海还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我们停了一天多就离开了。又前往烟台。第二天晚上，我们坐上了轮船，一觉还没有睡醒，一大早就到了大连。我和小梅下了船，坐电车去找小梅哥哥的同学郑曼凯医生，他在大连的一个大医院工作。我们在离开北京前，小梅已经打过电话联系好了。我们是坐电车过去的。我十分欣赏大连的公共交通，大连的有轨电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车次很多，也比较准时，间隔时间很短，往往前一辆刚刚过去，还没有从视野中消失，下一辆车已经露头进入了你的眼帘。而且车票便宜，两分钱一张，一次可以买很多张，不分车次日期，随便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我们在大连住了几天。

这期间，大连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我和小梅跑到街上去看，大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们不知道参加武斗的是哪两个派别，只看到有一个派别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在大街上飞驰而过。卡车驾驶室两个门的车窗的玻璃都摇了下去，两边车门的踏板上各站着一个手拿长矛的工人，戴着手套，戴着藤头盔，腰上扎着皮带。他们一只手拿着长矛，另一只手从摇下玻璃的车窗口伸到车里面把住车门来固定自己的身体。他们拿的长矛是用做铁栅栏的长铁棍一头磨尖了做成的。几十辆车，统一的配制，人员也是统一的打扮。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呼啸而过，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开过来的，也不知道他们要开到哪里去。

等我们从大街上回到医院，看到医院里已经熙熙攘攘，送来了一些伤员，还有一位男性死者。人们都在忙着抢救伤者，那个死者被放在医院走廊上一张带靠背的长条凳上，无人过问。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死人，我大着胆子走近长条凳去看那个死者。那是一个年轻人，年轻到我估计只有十七八岁，肯定还不到二十岁。他仰面躺在长条凳子上，身上看不到血迹，也没有看到明显的伤口。不知道是为

了什么，也不知道是怎样的情况，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失去了。他的面部看起来似乎很安详。我在小说中经常看到对死人的描写，总是说，脸色苍白，手脚冰凉。现在我看到真正的死人了，我觉得小说里描写的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觉得他的脸色是蜡黄的，根本就谈不上苍白。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是不是冰凉的，我很想去触摸他一下，以便验证一下是不是冰凉的，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大着胆子用手背轻轻触碰了一下他的手臂，就像触电一样不由自主地迅速地把手又缩了回来。我嘘了一口气，我的大胆尝试没有白费，小说的描写还是不准确的，死者的体温并不是冰凉的，我觉得是和他周围的物体的温度一样的，就和他躺着的那张长凳的温度是一样的。

太阳岛的奇遇和哈尔滨的机枪声

我们在大连待了几天，就坐火车去了长春。下了车，我们就直接去找长春地质学院，准备住在学校里。到了地质学院门口，往里面一看，竟看不到一个人影。学校内的主要路口，都有用装满沙土的大麻袋堆成的掩体。正对着学校大门的教学大楼，每一层的窗户的窗框几乎都没有了，窗户台上也堆着沙袋，变成了对外射击的工事，整个是一副大战后的衰败景象。我们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学校大院内没看到一个人经过或出现。我说，这算什么地方啊，整个是个荒凉的废墟啊，长春的武斗这么厉害啊！这地方我们不能住，长春我们也不能待，早点儿离开吧。我们随即又赶回了车站，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

小梅有几个同学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有两个同学在这个学校上学。我们到了哈尔滨，就直奔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小梅很顺利地找到了他的两个同学。当时因为不上课，很多学生并不在学校，去串联的，回家的，都有。宿舍里没有几个人住，所以我们的住处很好安排。学校的设施很好，还有室内游泳池。我们去室内游泳池游泳，小梅很有两下子，他站在10米高的跳台上跳水，那么高，我可不敢跳，可小梅一个展翅高飞的动作，就从10米高的跳台很优雅地栽到了水里。我正在游泳池的边上，边游泳，边看着他跳水，两只手腾不出来，要不然我就举双手为他鼓掌。小梅又上去跳，我也被激励了，也上去跳。不过我不敢跳10米跳台，我上了3米跳台。模仿着小梅的动作，姿势肯定不好看，头朝下就栽进了水里。等我从水里浮出来，才发现我的游泳帽掉到水底了。我仰着脸对小梅喊，我的游泳帽掉水里了。小梅在上面说，知道了。然后就从10米跳台跳了下来，当他从水底浮上来时，手里拿着我的游泳帽，已经捡上来了。

我的两个同学，当时只有李军在学校，另一个同学史里武没见到。第二天，

我和小梅去太阳岛玩。我看到松花江的水也是浑浊的，黄黄的。我以前总觉得松花江的水应该是碧绿的清澈的，没想到竟也这么浑浊。我们在太阳岛上转悠，看到有个老农在卖甜瓜，甜瓜的个头很小，是比苹果的个头还要小的瓜蛋蛋。我很纳闷，是这里太靠北了，生长期短，瓜长不大呢，还是恰巧叫我们碰到的这个卖瓜人只有小甜瓜呢？这个问题不去管它了，我们继续在太阳岛上转悠。转了一会儿，忽然有几个当兵的出现，他们嘴里吹着哨子，手里挥舞着小红旗，叫所有在岛上的人离开。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出了岛。我们并没有离开，还站在那里看。过了一会儿，突然看见一个类似潜艇一样密封的土黄色的庞大的东西从水里钻了出来，以很快的速度冲上了岸，在岸上又滑行了很长一段距离，接着又钻进了江水里。我看到那个东西并没有装有轮子，不知道它是怎么在陆地上滑行的。前后大概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就什么都没有了。人们又可以上岛了，我和小梅很好奇，又跑到岛上去看，看到太阳岛的沙地上只留下一些轻微的擦痕，别的什么也没有，而且当时在滑行的时候也没有听到有发动机的响声。真是奇怪，是什么新式武器吗？一点都猜不透。我们回到哈军工，告诉了同学们这件奇事，他们都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又过了一天，哈军工的同学们对我们说，今天外面要武斗了，大家今天都别出去了。我们都待在学校里，不出门。快到中午的时分，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一串枪声，像是机枪或冲锋枪的枪声，嘟嘟嘟的一串儿。只听到这一串儿枪声，其后没再听到别的枪声。傍晚，有同学从外面回来，给我们讲述了外面发生的事。说是有一派开着卡车拉着人去武斗的时候，坦克制造厂所属的另一派，派出了坦克开上街去迎战。对方看到坦克出来了，吓得马上把卡车掉转头就跑了，坦克开快了去追。跑在最后面的一辆卡车，看到坦克跑得这么快，吓得把卡车一停，人从车上跳下来就跑光了，坦克一下子冲了上去，撞到了卡车上，坦克的前半部差点爬到卡车上，坦克车身斜了一下，可能那时机枪手的手正扣在扳机上，身子一歪，不由自主地扣动了扳机，就打出了一串子弹。坦克看起来挺笨重的，能跑这么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们本来还想在哈尔滨多住一段时间，后来小梅给他妈妈打电话，问家里的情况。梅妈妈说，学校的李贵给家里打了几次电话，问小梅去哪里了，要她一定要转告小梅，现在学校复课闹革命了，别在外面瞎转悠了，快回来上课吧。我和小梅早就想上课了，整天在学校游手好闲有什么意思。于是我们决定尽快返回北京，开始上课。这两年什么课都没上，我们急迫需要充实一下文化知识。我和小梅很快就乘车回到了北京。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2017年11月30日《昨天》第100期)

文革中在地院、上海和北京的几件事

庄一龙

《昨天》编者按：本篇摘录自作者正在撰写的长篇回忆录。原文后有当年《首都抗癌联络站工作简报》等附件略。

和旷伏兆的一段交往

我出去串联有 20 多天，10 月上旬回到学校，伏庆是说也要去串联，朱成昭就让我去顶替伏庆担任总部办公室主任。这时期，有一件事印象比较深：有一天，地质部的几个副部长都被揪到地质学院，准备接受批斗。我在查看有关材料时，发现旷伏兆连批判材料都没有，怎么批斗？旷伏兆说他心脏不舒服，我当时有点同情他，就单独让他站到一边去，又让人给了他一只凳子。

后来我就请求把旷伏兆交由我来管理，我把他安排在我的 13 楼宿舍房间，让他在房间里写检查，并在大楼门口贴了个通告：鉴于旷伏兆有心脏病，经总部同意，勒令其在屋内“闭门思过，交代问题”。所以一直没有让他参加体罚性劳动（扫地、清洁厕所等）。每天我晚上回来，常常和他聊到深夜。

事实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只过去了一个多星期，周恩来总理就打来电话，要让旷伏兆出来主持地质部的“抓革命、促生产”工作。旷伏兆临走时想同我见个面，但没有找到我，就在桌子上给我留下一封信：“庄一龙同志：总理来电话，让我去地质部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这段时间相互有了了解，谢谢你的帮助，以后我们还是会见面的。旷伏兆”。

果然，我和他以后不但还见了面，对我的人生还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1967 年 9 月，我搞抗癌联络站时，需要设立一个医疗点，没有房子，旷伏兆把当时空闲着不用的地质部政治干校的一栋楼房借给我（不过，后来我看了一下，大部分窗子都被打烂了，没有要）。在我毕业分配到青海省地质队工作后，卫生部给青海省地质局发了一个盖有卫生部大印的调查公函，内容是通过庄一龙调查有关“516”分子的事情。虽然我根本都不知道“516”是怎么回事情，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容许你争辩的。就在我被追查“516”的问题时，正好地质部的“保矿兵团”骨干、原勘探局党委书记田实斋下放到青海省担任地质局党委书记，他把这公函扣下了。他派人把我找来，给我看了卫生部的公函，让

我写一个情况说明，便把卫生部函顶了回去，使我避免了一次牢狱之灾。

后来我到了青海省地质十队工作，十队的党委书记魏砥卿也是原地质部政治处的处长，他知道我同旷伏兆的关系较好，即使旷伏兆后来去了江西省五七干校还给我来信。魏砥卿给旷伏兆写信时告知，庄一龙就在他的地质队里。旷伏兆回信让他好好关照。所以，在十队时，魏砥卿一直给我有所照顾。

但是，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背景下，即使在地质队也是很危险的。在北京已经有人传说“庄一龙已经被逮捕”的流言。我向魏砥卿提出回上海老家休养，魏砥卿在党委会上通过了我回上海治病的要求。因此我才有了一段4年多的上海休养的时间。正是利用了这段时间，我研究出了“斥力子假说”理论，并且也是魏砥卿让地质队给我开的报考研究生的证明，使我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以后，魏砥卿调任天津地质局党委书记时，还专门来华东师范大学看我。

关于上海联络站和《首都红卫兵》报（上海版）

我从广西等地串联回来后，朱成昭让我接替伏庆是的地质学院东方红办公室主任，可是只当了两个多月，王大宾就让我去管广播台，当时学校的人大部分都去串联了，学校里有点冷清。有一天，我在安排广播节目中，有一支电影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想不到马上遭到大字报炮轰，说是有人在公然播放靡靡之音，广播台内部人员也有非议。我觉得广播台不是自己合适的工作，就提出要去上海发展的要求。

我是1966年12月初到上海的。当时首都三司上海联络站已经有了，总部设在愚园路311号，负责人是江涛，还有徐炼，彭善慈、包谷熙、朱德瑜等，311号总部那里实际上仅仅是个公开的对外联络点。

我去上海起初是想推广《首都红卫兵》报，但是发现模板运输、翻印，当时条件不能及时实现，就决定自己办一份《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我就去找解放日报社社长马达商量，要求利用解放日报社的力量出版这份报纸。马达不敢得罪北京红卫兵，乐得做个人情，同意在解放日报社出版《首都红卫兵》（上海版），对开版面，和《解放日报》同样大小。发行量是我同马达商量确定的，为5万份。起初组稿、编辑、排版、校对就我一个人，为了要在1967年元旦出版，我还在第一版亲自写了《元旦献辞》，还挑选了一张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研究问题的通栏照片，套红出版。

报纸印刷出来后，马达电话通知我，报纸印了5万份，我说少了，要再增加5万份。马达说印刷已经完成，没有保留纸型，不能再增加印刷数量。于是《首

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印刷数量以后一直保持 5 万份。

我来到解放日报社印刷工厂，一看见报纸大吃一惊，5 万份报纸堆了满满一房间，要我马上运走。这完全是出乎我的预料，我原来以为报纸出来后，解放日报社就会把报纸发送到全市读者手里，现在这一切发行工作都要我自己去完成，真的没有准备。我只得把这批报纸先运到自己的住处。

其实首都三司上海联络站在上海掌握着很多处房子，都是一些当时被红卫兵抄家后赶走的前资本家的别墅。联络站的主要成员都有自己的住房，成员之间也相互不知道住宿地方。除了愚园路 311 号总部外，我所知道的还有建国西路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总经理的别墅，还有乌鲁木齐路 19 弄 1 号的别墅，愚园路 490（586？）号工商银行 2 楼等。

我起初同江涛、朱德瑜等住在建国西路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总经理的别墅，这里很大，有个大草坪，仓库房间里堆放了许多外国名酒，后来被江涛喝了不少。当时陈丕显还亲自来过，给了一辆吉普车和一些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派来送车的人匆匆在车上讲了一下开车要领就走了，几个人就上了车，由徐烁驾驶车，在花园大草坪转了几圈，就上街了。胆子真够大。后来，我为了搞一个红卫兵通讯社的需要，搬到了愚园路 490 号，那里原来是上海戏剧界红旗造反团的总部，他们撤走后，就由红卫兵通讯社接收下来了。当时还有地质学院的宏良（邬孝梁）和几个上海的中学生（王念申等）。

我让王念申发动一批上海的中学生去上街卖报纸，每人每天发 5 毛钱补贴，中学生热情很高，每人都抱着一大捆报纸出去了。我为了想了解市民反映，特地去南京路看看，当车经过国际饭店时，看见买《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的队伍从国际饭店排到了大光明电影院。我真是得意极了。回来后，各方面一清点，当天共销售了 5000 多份报纸。虽然成绩不错，但是对于 5 万份总数来说，这差得太远了。

为了解决发行问题，我去找邮电总部，请邮局帮助发行《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答应给邮局 25% 的分成。从第二期开始，报纸发行便交给了邮局。只要报纸一旦印刷完成，我就电话通知邮局，邮局的专车便把报纸拉走，第二天，《首都红卫兵》（上海版）就会出现在全市数百个零售点上。

从第三期以后，《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的编辑工作就交由朱德瑜、潘人龙等负责，由他们二人长驻解放日报社。

《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纸由解放日报社出版、印刷，发行是由邮局负责的，我在每次报纸印刷出来后通知邮局。本来以为报纸交给邮局后，报纸出版任务就完成了。可是有一天，解放日报社财务找我要计算费用，我这才知道还有费用问题存在。我马上同邮局发行科联系，邮局说发行报纸的钱都在邮局，等我

去结算。

《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报自己根本没有账户,为了要设立账户,我就到黄浦区人民银行申请了一个“首都红卫兵通讯社”账户,让邮局发行科以后就把结算后的钱都打到这账户上。我从邮局发行科提了两次钱给“首都红卫兵通讯社”账户,第一次是 5883.30 元,第二次 2296.20 元,共 8179.50 元。奇怪的是后来文汇报社也来向我要钱,可是,《首都红卫兵》(上海版)根本同文汇报社没有关系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一度也没有搞清楚。以后才领悟到,大概是其它北京来沪的红卫兵组织在文汇报社也印了一些小报和宣传品,在邮局发行科累计了一部分没有账户的钱,现在既然有了一个“首都红卫兵通讯社”账户,因此邮局发行科就把这些钱都转到“首都红卫兵通讯社”账户上来了。而我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这一家在邮局发行科应该有多少钱,反正只要邮局发行科转过来的钱,我都照收。

但是,我从来不用这个账户里的钱。原来设想以后在上海发展事业时用,可是形势急转,中央要求学生一律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必须妥善处理掉这些钱。一直到离开上海前,把这个账户里的钱分别送还了解放日报社和文汇报社。等于给每家报社发了个红包。所以来两报社再没有来找过麻烦。

附当年二张:

收条一

今收到庄一龙交来的:

现钞叁百拾肆元整

存折壹千元整

转交解放日报社款回单一张,回单总额:

肆千叁百捌拾叁元叁角整

封存零钱陆元肆角柒分整

经手: 鲁雷 潘人龙 (签字)

收条二

67 年 2 月中曾收到北京地质学院庄一龙同志交来银行转账发票两张,其中一张转文汇报社 1000 元,另张转上海解放日报社 1296.20 元。后此两张单据由我转给潘人龙(北地)同志负责处理。特此

证明

北京工业大学革委会 6222 班战士

周祖通 (签字)

67 年 10 月 31 日

1966 年 12 月底，我参加过一次在静安寺百乐门淮剧场由张春桥、姚文元召集的上海一些重要造反派负责人会议，我和江涛、朱德瑜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内容是分析形势和布置任务。

“一月革命”期间，上海各派斗得很厉害，当时，上海警备司令部政治处一位军人拿着司令部的介绍信找到三司上海联络站，告诉我，根据毛主席“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指示精神，如果你们活动需要军队的帮助，可以同他联系，并且把他的联系电话告诉了我。这虽然给北京来的红卫兵以后行动壮了胆，但是，一直到我离开上海，都没有联系过军队。

“一月革命”后，紧接着筹备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 10 万人的大会，我参加了几次在上海社科院由朱永嘉等召开的筹备会，并写好了大会发言稿，可是到了开会那天，从社科院去人民广场的大会主席团代表的汽车就要开动前，江涛匆匆赶来找到我，说是要看一下发言稿，我把发言稿给了他，他很快看了一下，就说，这个发言由他去。大会筹备组一下惊了，主席团代表突然换人，不知道三司内部出了什么事情。朱永嘉打圆场：“你们自己商量一下，谁去都可以。”我很生气地离开了。

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来上海，我和朱德瑜、江涛随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到机场迎接，我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欢迎来自“山鹰之国”的朋友》。

后来在 1967 年 7 月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晚上，朱成昭来上海，在广东路地质部招待所要见我，他知道我办报纸掌握有一部分钱，他说最近想去广东考察调查一下，想探索一条“南斯拉夫的道路”，问我是否可以借一些钱给他。我问他要多少？他说最好多一些。我答应给他 2000 元，约好第二天晚上送来。可是第二天下午，就有人电话告诉我，朱成昭已经回北京了。以后才知道，是公安部副部长于桑把朱成昭带回北京去的。朱成昭没有来得及从我手里拿到钱。

为“抗癌骗案”调查翻案和首都抗癌联络站

首都抗癌联络站是地质学院东方红插手卫生部系统文革运动的产物。

还在我担任东方红总部办公室主任时，曾经接待过一个地质部航测大队的医生纽韵雯（其丈夫许端是章士钊义子），知道存在一个跨越地质部、卫生部、军队总参、301 医院，涉及多名高级干部的“抗癌骗案”。当时由于其它事情忙，一直没有处理。过了几个月后，我从上海回来，由于地质学院东方红内部派系斗争，正在反“托派”（也就是蔡派），把我和“托派”联系在一起，我没有什么事

情可做了。

一天，纽韵雯带着医学院的两位学生又来找我，要我出来帮助他们调查“抗癌骗案”。我让他们去找田春林和李贵，田春林和李贵同意参加“抗癌骗案”调查，由我代表地质学院参加。于是我组织了物探系几个学生一起参加。

地质东方红在当时是红卫兵三司领袖，我联络了北京的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铁道医学院、中医学院、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和反帝（协和）医院、日坛（肿瘤）医院、工农兵（同仁）医院、反修（友谊）医院等几个大医院，还有卫生部、铁路总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地派力量成立了一个“首都抗癌联络站”，总部设在地质部西五楼，开始了对“抗癌骗案”的全面调查。

地质东方红在“首都抗癌联络站”里起着组织，策划，行动实施的主要作用，我是“首都抗癌联络站”的负责人，骨干成员有赵宜（二医）、刘淑珍、宋乃光（中医）、董宝玮、端木奇（医科大）、何欣培、张延铭（铁医）、洪朝宗、赵文翰（师院），还有后来商业部一个支持民间方法治疗肿瘤的王继武局长也加入联络站，在商业部大楼里成立了“首都抗癌联络站第一分站”，负责人是罗冬苏。由于王继武在长期革命斗争历史中，以公开身份担保过四、五十个革命干部，文革时期，这些人都已经成为全国各地的高级干部，如许世友（南京）、南萍（浙江）、王建安（济南）、王少庸（上海）、王效禹（山东），这为联络站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

在调查案件涉及的政治背景的同时，在对“抗癌片”疗效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民间存在的“抗癌防癌”的好方法、好苗子。当时李富春副总理知道后，很高兴。在有关“抗癌骗案”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可以翻案，把翻案的方案报告给总理。”

以后，我们开始扩大调查范围，除了“抗癌片”疗效调查，还对各种民间的抗癌医疗成果进行挖掘，在北京部分大医院对“抗癌片”和其它中医疗效观察试验。并且建立了“家庭病床”医疗制度，采用医生通信治疗和邮寄药物，成立了由病人组成的病人委员会，负责协助管理在家治疗的患者，解决了床位不够的矛盾。

后来，首都抗癌联络站在洛阳、安阳、营口、天津、青岛设立分站，以后首都抗癌联络站发展成为首都抗癌协会。首都抗癌联络站原来的组成单位就成为协会成员单位，我是协会的第一任负责人。

那一段时期我和不少重要人物有交往，请求得到他们支持。除了旷伏兆，还有王舜畊，王季范、徐特立、徐运北、章士钊等。通过调查发现，在我国的中医药宝库中，有大量的抗肿瘤的民间成果，它们急等待挖掘。当时比较典型的地方

有：河南洛阳的郭琦中医大夫、成都的刘福远中医大夫、北京的徐兴立中医大夫，王审耕中医大夫，天津东风医院孙秉严大夫的血液癌毒分析等。

为了解河南地区食道癌的高发原因，在河南省委耿起昌和卫生厅高任平厅长的支持下，联络站纽韵雯等人对林县等山区农村进行癌症的发病率与矿藏、水文资料的研究，发现河南地区食道癌的高发同太行山的放射性矿产分布有关，提出加强疾病地理的研究，并且制作成了有关图件，通过总理联络员王文政转交总理。

首都抗癌联络站的工作一直得到总理办公室的不断关心。总理联络员王文政、王成智经常同联络站保持着联系。周总理在癌症晚期的时候，他还曾经指着桌子上的肿瘤发病分布图对卫生部的同志说：“不进行调查，哪里会知道这些情况。”

通过调查，基本搞清楚了所谓“抗癌骗案”的来龙去脉：此案的起因，是由鞍山铁东医院的医生杨雨田自己研究出一种有显着疗效的新药物，并且已经有 2000 多的成功病例，在社会上有了相当影响。纽韵雯最初是航测队医务室一个医生，也是肿瘤患者，使用抗癌片后肿瘤消失，于是就帮助医生杨雨田宣传和推广抗癌片。而当时的 301 医院副院长李奕肯定杨雨田和纽韵雯的革命行为，并支持推广抗癌片。但是在当时卫生部专家看来，“抗癌片”能够治好肿瘤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骗局，李奕的支持“抗癌片”又把支持李奕的肖华和罗瑞卿之间的军队内部的斗争牵涉进来了，于是在卫生部、总参和地质部的反对势力联合下，利用“抗癌片”的疗效问题，把李奕、杨雨田、纽韵雯三人打成一个宣扬“抗癌片”疗效的诈骗集团，并且通报全国。这是一个错案。当年抗癌联络站的一份简报中说：“这期间，纽韵雯在地院东方红总部王大宾、李阴增等同志的帮助下一直在同卫生部一小撮走资派进行斗争，到处告状，到处宣传、揭露，十二月又串联了上海医学院来京的红卫兵，打进卫生部，抢出了有关‘抗癌骗案’的黑档案材料。为‘骗案’进一步翻案找到了大量材料。”“在铁的人证、物证面前，终于在 3 月 21 日出文撤销了‘黑通报’。并向受黑通报迫害打击的同志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在新华社国内文革报道部的帮助下，《内部参考》上发表了抗癌片及联络站工作的消息，此消息是同氢弹爆炸同时作为国内科技动态发表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首都抗癌联络站在后期改名为首都抗癌协会，结束了“抗癌骗案”的调查，重点转移到抗癌工作，由卫生部有关部门进行人员调整监管。

（编者注：该文发表在 2016 年 7 月 30 日《昨天》第 73 期）

编者按：

庄一龙 1963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物探系（6163 班）

【保护老干部】

地院東方紅成了部分被衝擊的老幹部的避難所

王大賓

自《紅旗》十三期社論發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後，地院東方紅公社就掌控了地院權力。後雖有內部不同意見的分歧與對立，但地院始終保持了統一的局面，1967年4月3日成立了三結合的革委會。加之地院東方紅公社當時已成為全國反工作組造反派的一面旗幟，受到毛主席、周總理、中央文革的重視，上下聯絡管道暢通。因此，當時受到不當衝擊、迫害與冤屈的一些老幹部，紛紛找到地院東方紅，請求幫助向中央申訴，尋求暫時的避難。對這些老幹部，東方紅調查瞭解情況後，多予安置在地院暫住，並給予盡可能的幫助。給我印象深刻的有鄧墾，時為“第二號最大走資派”鄧小平同胞弟弟，1939年赴延安參加革命，文革開始時任武漢副市長。文革運動開始後，鄧墾受到衝擊。1967年一天，探工系二年級學生李雲生同學，突然到辦公室向我彙報說：最大走資派、劉鄧司令部的鄧小平的弟弟鄧墾，從武漢跑到我們地院，請求避難來了，我們接不接待？我簡單瞭解一下鄧墾受衝擊的情況後，就決定接待鄧墺在地院避難。我說：“我們四川的老鄉衝著我們東方紅來了，為什麼不接待？他哥哥是他哥哥，他是他。鄧小平一不是叛徒，二不是特務，祇是路線上的問題，鄧小平有什麼問題不應該株連他弟弟。”就這樣，鄧墺在地院住了下來，住了很長時間，直到他安全有保證後才離開。

文革後，鄧墺出任湖北省副省長等職務。地院有同學去看望他，心存感激的他態度友好熱情，有求之處，還儘量給予幫助。

文革運動期間，地院先後接待保護過十多個省市的老幹部。他們其中有四川甘孜軍區領導人、藏族老紅軍天寶，宜賓的劉結挺、張西挺。重慶來的幹部較多，有重慶市委組織部長肖澤寬，重慶市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李正舟，市辦公廳副主任、市團委書記廖伯康，1938年就在重慶人黨的老地下黨員吳海如等人。

還有小說《紅岩》的作者之一楊益言也來地院避難，並來為另一作者羅廣

斌被迫害致死鳴冤叫屈。楊益言是帶著一提包《紅岩》小說的手稿，被直接引到我的辦公室相見的。他和其他人一樣，都被安置在我們專門騰出用來接待的原研究生宿舍樓住。地院還組織了一個調查小組，專門到重慶去調查羅廣斌迫害致死的真相。後還在地院召開一個為羅廣斌申冤的大會，“東方紅”發了報導文章，在北京的一些作家也出席了大會。

對地院東方紅保護老幹部的事，引起了江青的不滿，1967年4月17日，在周總理、李先念、謝富治與中央文革領導人的接見講話中，江青批評我：“你把全國的一些叛徒、特務、走資派窩藏在地院。你曉不曉得，《紅岩》小說寫的華鎣山遊擊隊，許多人都是叛徒。”我不服氣，當場就辯解頂了江青。我在頭排位置，當時就看到坐在主席臺上的周總理、李先念、謝富治都一直在看著我。這時還是康生講了話：“王大賓是個學生，許多事他不瞭解，但他們也保護了許多好幹部。”康生講話了，就給我下了一個臺階。

散會後，謝富治把我留下來，讓我坐他的車去了他公安部的辦公室。謝狠狠地把我批評了一頓，批評我在今天會上的表現不好。說：“你這個犟脾氣，首長講話，批評你是千萬不能當面頂撞的。有什麼不同意見，會下再講。”謝要我吸取教訓。談話後才把我送回人大會堂門外。地院一同參加這次接見的李貴等人還在這裡等我。見到我，他們就說：“我們還以為謝副總理把你弄走了，一下回不來了呢。”

不管如何，當年凡是被我們接待安置在地院避難的外地幹部，還真沒有任何人敢到地院來要人抓人。

周總理對我們敢於保護老幹部很高興。一次在人大會堂接見開會前，見到我就對我說：“你們保護地質學家李四光同志做得很好。像北大的周培源同志這樣的科學家，在北大還受到批判。這些專家都是我們國家的寶貴人才，應該保護。”

聽了周總理的這個講話，第二天晚上，我就同探工系的唐咸正老師偷偷地跑到北大，去見周培源副校長。周培源住在北大校園內的一個小樓，他正好在家。我就向他傳達了周總理對他的關心。周培源聽後，非常激動，一再表示感謝。

（编者注：该文引自 2015 年 10 月出版的《王大宾回忆录》第 116-118 页）

【忆旧思亲】

学友战友难友荒友——怀念王白沙（节选）

石白河

一、前言

王白沙，很多荒友以及后来她大学前后的朋友们只知道她叫王征，而不知道她的本名，尤其并不知道她极富色彩的一生。我的荒友——一个资深的媒体朋友李晓奇，曾两次向我约稿要我写一写王征，我都没有写，因此总觉得欠了朋友一笔账。我最近经常想，李晓奇为什么总让我来写王征呢？也许第一，在很大程度上她文革中的遭遇（包括在黑龙江建设兵团一师六团的那些年）有其典型性；第二，王征 43 年的人生在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这代人（上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出生的那一代，即现在人经常提起而又行将被人们忘却的“老三届”。）的坎坷经历；第三，也算是 20 年之后对我的学友、战友、难友、荒友的怀念；既有约稿，悬揣写成文字世间会有读者。也由于我已退休，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回忆往事，因此，写出来放到博客上，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不想对王白沙的一生做什么评价，因为我实在没有这个资格。我只是把我亲身经历的，亲眼见过的王白沙的事情罗列起来，供人们去读，道听途说的绝不下笔。因为我要对历史负责，对她的家人负责，对朋友负责。文中人物说的话，凡带引号的一定是原话，不带引号的则是原意。事情绝对是真实的。

王白沙在文化革命中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本文所记的也都是一些有关她的琐事，但在文革中又有多少做过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的大事的人呢？能做个逍遥派，平安度过已属不易，甚至可以说福莫大焉。王白沙就没有那么幸运，她落难了。一个没有去做轰轰烈烈的大事，只想平平安安度过文革却不能，最终落得一个轰轰烈烈的灾难结局，其悲剧色彩更浓。

二、我们从相识而成为学友

王白沙，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中 644 班学生，1969 年下乡前改名为王征，我是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中 654 班学生，她长我一岁，高我一个年级，所以说我们是学友；文革中观点相同，基本都未参加附中的文革运动，而主要参加了地院的运动，所以说我们是战友；文革中因同样的原因，受同一伙人的陷害，同时遭

难——我身陷囹圄一年多，她则被学院群众专政一年多，我们又同一年解除监管，所以说我们是难友；我们同一年下乡，到同一个地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一营五连，所以说我们是荒友。

我们初次相识是在文革刚刚开始时，那时学校已经停课，有一些学生开始批斗教师。一天下午，一些学生将我们班的班主任拉到了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上，开始批斗。老师胸前挂了一张写着“走资派”的牌子，弯着腰，低着头任由学生们侮辱着。这时一个学生跳到球台上，大声历数教师的罪恶，并说我早已不想考那资产阶级统治的大学了。说完拿起蘸着黑墨汁的毛笔重重地在老师白白的衬衣上写上“反革命”三个大字，那次批斗会由于是我文革中见到的第一次批斗，觉得相当凄惨，相当恐怖，给我心灵极大的震动，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文革了。那次批斗会虽是极少数人之所为，但多数人仿佛是伸长了脖子的鸭，鉴赏着这一英雄圣举。

我当时小声嘀咕道（假如当时我没有嘀咕这一声，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故事）：不愿考大学，还考高中干什么。这时一直站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学生，侧过脸小声对我说：这是咱们学校高三有名的混混，什么不考了，他是根本哪个大学也考不上。我仔细端详了她一下，她穿一件女式的列宁装，中等身材，眉目端正，虽谈不上是个美女，但绝对漂亮；牙齿雪白，上齿虽微微外翘，但绝不过分，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美感；她肤色不白，但绝不黑，恰给人一种健康的美感。记得当时我曾问她：你是高三的吗？一个普通的老师又不当权，怎么成了走资派呢？她说，我是644班的，这个老师不是你们高一的教师吗？她是学校中唯一的一个普通教师而又是党支部委员的。于是她就从这位教师开始讲起，讲到了学校的各个方面，慢慢地她的情绪开始激动起来，语调也从一般交谈变成了富有激情的演讲。内容大致是讲学校各方面工作的不足，其中也讲到了食堂中的种种问题，而食堂的问题是最容易引起学生们共鸣的。我们高一的学生本来就因为来校时间短，对学校各方面都了解不足，因此听得格外认真，态度也极为虔诚。这回该轮到我们这些高一的学生一个个像伸长了脖子的鸭了，聆听着这位漂亮的女演说家的演讲。她确实是个演说家，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不紧不慢，落落大方，张弛有度。讲到后来也许她有点累了，声音不像开始时那样洪亮了，像是不想继续讲了。但当时我们这些高一听众却是意犹未尽，记得我曾经问她：停课大概会持续多少时间。她不耐烦地说：你们太小，说了你们也不懂，不跟你们说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就此结束。

当天晚上我和同学聊起白天的事来，有人问那个高二的女学生是谁。我班一个同学说，你连她都不知道，那不就是王光美的侄女王白沙吗。我当时一愣，心想就是她呀——我进学校不久就听同学们说王光美的侄女在我们学校，但那时觉得她是谁和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这时，我依旧认为白天的偶遇是不会和我有任何关系的。其后我也没有再见到她，对她的演讲也淡忘了。

大约过了十天左右，文化革命渐进高潮了，我当时很是茫然，不知该做些什么。一天晚上我在学校操场上独自溜达着，忽然听到一个女学生说：高一的那个学生你过来一下。我看正是王白沙，当时她正跟几个女学生坐在地上，好像是在聊天。我说：你是在叫我吗？她冲我一招手说，你过来吧。问过我姓名、班级后，她便又和那些女学生聊了起来，并不时问我一些对学校文革运动的看法，我则按自己的想法、看法回答了她的问题。我记得她们聊的大都是对学校工作队不满的内容。临走时她说，以后吃过晚饭，没事儿就到这儿来聊一聊。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明白，学校那么多学生，其中更有很多干部子女，为什么她会跟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平民子弟聊天呢？我只记得她曾对她的同学说过，这个人挺有头脑。可她又是怎么判断出我有头脑的呢？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即使在后来我们的交往中，我也从没向她问起过这个问题。不过，从这一天起我们也算是认识了。

我和王白沙认识后，确实和她们在晚上聊过几次，至于她的那个小圈子里的其他几个人，我确实是记不得都有谁了。聊的都是什么也大多记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她们对工作队越来越不满，大有“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劲头。而我多数情况下都是做看客或听客——虽然有时也插上几句，虽然也因受其影响而反对工作队。王白沙显然是这个人员并不固定的小圈子里的主导者，这从她讲话的语气便能觉察到：“就到这儿吧。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看他行。”等语气坚定，不容反驳，一锤定音的语句经常挂在她嘴上，俨然一个学生领袖，一个战役的最高指挥官。其时我为认识她们而高兴，因为在学校里能和高年级的学生交往，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更何况她们已经把我当成她们圈子里的一员了，而我又是那个圈子里的唯一的一个男学生。后来我从教多年，我觉得相差一个年级的学生之间，好像不像我们那时觉得差距那么大，也可能是学生和教师看的角度不同吧。

认识时间长了，聊天次数多了，慢慢地我自觉已融入了这个小圈子里了，和她们尤其是和王白沙已成了真正的学友了。但谁能想到，在其后相当长的岁月中，我们那时的相识竟几乎改变了我的整个青春。也许看到后面读者会觉得我文革中的落难和我认识了王白沙有关系，而我却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相反文革中我如能全都听她的，则我完全可能避免这场灾难，起码可以逃过这场灾难。这篇文章不是写我，至于我遭难的原因，那就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过多涉及的内容了。

三、文革中我们成了战友

有一天晚上我们聊得很晚，学校里多数学生都睡了，我正准备回去，她突然问我“你知道红卫兵吗？”我说：“好像听说过。”她说：正好，那你就跟我们来吧。我记得好像是到了一个办公室，里面已有不少人，男生女生都有，个个都很严肃，窗户已经用什么东西遮住了。是一个男学生主持会议，会议内容就是成立地院附中红卫兵。誓词已挂在墙上，领誓的就是王白沙。她神情凝重，严肃而又虔诚，她举着右臂，一句句念着誓词，声音不大，但语气坚定，铿锵有力。我们则一句一句跟着她念。誓词的全文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第一句是：“我们是红色政权的卫兵。”宣誓后她首先报出自己的名字——“宣誓人王白沙”。接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小声地报出自己的姓名，颇有地下工作者的样子。（就其程序来看倒和后来我入党时情景有些相似，我没有入过团，不知入团是不是也这样。）从这时起我觉得在这场文化革命的战斗中，我和她已成为战友了。尽管多年后，觉得我们实在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参加了一场不知是为了谁在打，和谁在打，而又打了谁，谁又打了我的错误战争。但在当时我还是充满激情，兴奋无比的。

红卫兵——现在文学作品中好像凡是出身好的年轻人，戴上个红箍就是了。其实最早的红卫兵绝对是非法的，而且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它不是经党组织批准和领导下的群众组织。那时的红卫兵没有固定的宗旨，更没有什么标志，而是根据学校的某些问题，看法一致或相似的一个群体而组织起来的一个群众组织。对待出身的要求，不同红卫兵组织也并不一样。因此会有这种情况，一个学校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红卫兵组织，但又彼此都不清楚对方的存在。到红卫兵完全合法后，同一所学校一下涌现出两个甚至更多的红卫兵组织，观点不同甚至完全相左，这就是文革中最早的所谓派性。

其实红卫兵成立后王白沙在附中也没干什么，基本上也没参加学校的文革运动，多数时间她是和地质学院的大学生们在一起，参加了大学的运动，和同处秘密状态（虽然时间更短）下的地院东方红（秘密成立于当年的7月份）频繁接触，我所记得的就是给学院工作队贴大字报等，更深层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多年后想起文革初期的那段岁月，我和王白沙因基本未参加附中的文革运动而少了附中的许多是非非，但却因过深地卷入了大学的文革运动而给我和王白沙埋下了祸根。

文革开始两个多月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处在秘密状态下的红卫兵，突然间变成了英雄，因为红卫兵得到了领袖的肯定了。8月8日地质学院东方红正式公开了自己的组织，主要领导人朱成昭、张华府、田春林、梅建民等（网上《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忘却的名字》错写为梅建明）。（我的好友李晓奇建议我文中交代一下朱成昭，要想讲清楚，那实在是太难了。我只能作如下的简介：朱成昭，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发起人和灵魂人物，是文革中大名鼎鼎的“首都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的司令，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是他的副手。他因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早结束了一个单位的派性，而使整个单位免受派性斗争之苦的人而名噪一时，他是那个时代青年中最早开始觉悟而走上反叛中央文革道路的人，结局当然相当的惨。感兴趣的人可以在网上看一下我前边提到的那篇文章。）那段时间，全国老少男女几乎人人都戴上了红胳膊箍，可我也敏感地意识到：此时的红卫兵已绝非彼时的红卫兵了，所担当的角色和要执行的任务也大相径庭了。这时的红卫兵主要的任务——这里我主要指中学的，他们走出学校，开始造反了——破四旧，抄家等等。我对这种打人抄家的事是很反感的，王白沙对此更是深恶痛绝，多次告诉我不要参加此类伤天害理的事情。那时王白沙身穿一身女军装，腰束一条军用皮带，英姿飒爽。我曾目睹了一次地质学院两派为争夺学院广播室而发生的冲突，王白沙当时站在最高处，发表着慷慨激昂而又激动人心的演说，她的演讲极富鼓动性，很像一个指挥战役的女指挥官，威风凛凛，叱咤风云。我则因无事可做感到苦闷，找到王白沙，我想她是最红最红的五类，问问她，总会给我出主意的。她劝我说，她是地院东方红的核心成员，已经无路可退了。而我虽已加入了东方红，但涉入并不深，千万不要过于激进。她还告诉我，现在地院的两派都有中央领导在支持，让我一定多加小心。她说：你要实在觉得没意思，就先到外地转一转；我在北京再观察一下，如果外地不错而学校运动不顺利的话，我就多约几个人一起到外地去，这次就算你先探个路吧；如果东方红胜利了，你就回来；回来之前，一定要给我家打电话（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她家的电话号

码:556573),这样我就约了几个人一起去了西安。半个月后手里带的那点钱快花光了,我决定先回北京,回北京前我也没给她打电话,因为那时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打长途电话。但当时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回去后可以告诉她,外地还是可以的,有必要的话可以组织一些人到外地去。也就是说,她交给我的任务我已完成了。

回北京后,学校还是乱哄哄的,只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包括附中在内,地质学院已经是东方一片红了,所有派系都归依了东方红。而我和王白沙等最早加入东方红的几个附中学生,突然变成左派了。但我对附中的文革并不感兴趣,因为我深知:我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因此我不会去争什么红卫兵的领导,自觉也没那个资格。且当时王白沙已经以东方红附中支队负责人的身份,成了地院东方红的核心成员了。她和当时的负责人朱成昭、田春林、张华府、程希平、梅建民等来往密切,我自然也就跟他们有了来往。来往时间长了,我慢慢体会到,我们之间的来往其实和学校的运动没有太大关系,只是一种个人之间的往来,觉得有些乏味。我把这种感觉和王白沙讲了,她说她也有同感。于是她就约了几个外校和本校她的同学或朋友,连同我一起去了广州。

一路上看上去她好像很高兴,总是带头唱歌,其实在我看来她歌唱得并不算很好,但绝不跑调(因为她以前唱歌我曾笑她跑调,自那后她特别注意)。后我们在武汉换车,乘的是闷罐货车,由于车里就我们七八个人,她一高兴又跳起新疆舞来,她跳得很投入,脖子还真能像舞蹈演员那样水平地左右摆动,不仅形似,尤其神似,我们当时都说她科班学过,但她却决口否认。昨天我在一个北京101中学的班级博客上看到了一篇文章,里边介绍了他们在初中时曾排过一个大型节目,总导演便是王白沙,且参加那个节目的多数学生,过后多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所以现在我仍怀疑她是受过训练的,不然她怎么会跳的那么好呢。(我提到的博客是新浪网“北京101中学64届初三(3)班”的博客。感兴趣王白沙样子的人可以去那个博客的相册里找“老照片”,里面有一张王白沙初中时的一寸照片。我手里的王白沙照片在文革中全部被抄走没收了,这是我一直非常痛心的事情。)

在广州我们游览了许多的地方,每天要到哪儿去都由她来定。参观广州烈士陵园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她是最仔细的一个,到后来我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因,那是后话了。在广州我们待了很长时间,那段时间,由于前去的多是她的同学和朋友,我和她很少交谈。那次我自做聪明地以为又发现了她性格的另一面:她是

个大大咧咧的人。在广州我们住在一个学校的大食堂里，前去串联的红卫兵们来自全国各地，打着地铺，中间隔开，男女分住，总有上百人吧。期间她两次丢钱——虽然又找到了；她带了一个德国产的“莱卡”相机，那时简直可以说是顶级奢侈品了。一天我们出去玩儿，她竟忘了带了，问她放到哪儿了，她说忘了。晚上回来一看，相机就扔在地铺上。好在那时政治上虽很乱，但社会治安却还不错。那次和她一起出去，总的感觉她是一个多才多艺，性格豪爽的人。但后来（那是很久以后了）我慢慢地悟出她豪爽的背后是在掩饰着什么，其实她内心是很苦的。具体说她那次又说又唱又跳是在掩饰她的泪水，丢三落四是她战栗的心的外在表现——因为那时《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人们纷纷猜测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司令。多数人已经明白：矛头直指刘少奇。作为王光美侄女的她，刘少奇的前景不妙，对她意味着什么，那么聪明的她是再清楚也不过的了。一个生活在前途未卜，充满未知甚至是凶险的世界里的人，该是怎样的憋闷、痛苦甚至恐惧呀！何况她还是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孩子呀！

回北京后，她就不怎么来学校了，而我则多是在宿舍下围棋，并开始学着打桥牌，仿佛是战斗中的短暂的休整。那时附中的文革运动几乎停顿了，多数人对运动已失去了初时的激情；地质学院的运动中心也已转入地质部了。期间我和王白沙去过几次，但她已不见了文革开始时的那种热情了。甚至有一天还叫我和她（还有两个人，是谁我忘了）去了一位地质部副部长的家——要知道那位副部长当时正是地质学院炮轰的对象，她还管那位副部长叫伯伯，可见她那时已对文革有看法了，或者说已开始觉醒了——尽管是被动的、初始的、肤浅的。借用那时一句时髦的话，已由“造反派转向保皇派”了。而我由于经常和她在一起，自觉不自觉地肯定会受她的影响，较之一般人也算清醒的早了些——尽管我们为过早清醒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谁让我们清醒的早了些呢？当多数人还在昏睡时，有人大声喊叫，唤起少数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而这少数人虽不时发出喊声，但这喊声不仅于事无补，反使他们饱受苦难；那么唤醒之事，唤醒之人也是悲哀的。哲学上讲，跟不上局势发展叫做“右”，跑到局势之前叫做“左”，王白沙和我尤其是我都左了。

也就是那天，她第一次跟我说：到我家去认认门吧。后来我经常想，那时她叫我到她家去，是不是她已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她家住在王府井旁边的红霞公寓里，我是随她从她家后门进去的，她家住在一层，先经过厨房，再走进她家的客厅。她给我指了指她的卧室说那是她的屋子，她的衣服和书籍都在那里。大约

是傍晚的时候，他父亲回家了，我说了一句伯父好后就站在那里了。他老人家很是客气（31年后当我再见到他时，他依旧是那么客气），简单地问我几句，得知我是她同学时，便说：“请坐，小将们谈吧。”那天从她家出来，她执意请我在一个小饭馆里吃了一顿饭（其实她是要和我讲点什么），吃的是什么我也忘了，反正那时无外乎就是一些小吃。那天她和我讲了很长时间，内容都是有关她家庭的情况：甚至连她家人的出生年月都告诉了我。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父亲是一位老革命，其时是四机部副部长；她的母亲也是一位老革命，其时是某某部（如果没记错的话，应是邮电部）的一位司局级领导；她与她的姑姑王光美的关系很好，文革前有一阵她每周都到中南海去看她姑姑。后来让他父亲知道后，狠狠地批了她一顿，并放出狠话，如果以后不经他允许擅自去中南海要打断她的腿，此后她再也不敢去了（多年后我想起这件事来，我以为一是知识分子的迁使然，二是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有优越感，也许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当然其中她也讲了一些为王光美抱不平的话。她的哥哥对她很好，但不经常回家，并给我讲了个中的原因；她的妹妹正上初中，也住校而不经常回家。他还给我讲了他父母的传奇婚姻，她的父亲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学的是无线电，大学毕业后即参加了革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讲的就是她父母的故事。（这就是文中说的“有很多我本不应知道的但却让我知道了”的其中一小部分）她还说她父亲对她要求极严，但又非常疼爱她，视她为掌上明珠。讲这些事时她神情凝重，黯然神伤。现在我以六十岁人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她：一个负重千钧，蹒跚行走在没有人给她指路，而她自己又看不清前行道路的花季少女，这该是怎样的悲哀啊！

后来她基本不来学校了，我则经常到她家里去，跟她聊聊学校的事，我能觉察到她对文革运动已不感兴趣了，有时我还没讲完，她就不耐烦地说：“算了，我们还是打羽毛球去吧。”于是就在她家外边两棵树上拉一根绳子，便打起羽毛球来。那段时间我在她家里又见过她父母几次，每次都是打打招呼，基本上没怎么说话。

1967年初，文革的基本格局连普通百姓都能基本看清楚了，这时的王白沙倒显得从容多了。现在我想那大概和下棋一样，双方胶着在一起时，那是最惊心动魄的时候，优势者不敢掉以轻心；劣势者还心存侥幸更是小心翼翼，而一旦胜券在握或败局已定的时候，反而会镇定下来。大概是一月中旬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上海现在挺热闹，约上几个人我们去看看吧。于是王白沙、我、程希平，大概还有地院的其他几个人，我们一起去了上海。

那时上海很乱，我们这些外来的弄不清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一会儿是“安亭事件”，一会儿是“昆山事件”；市政府刚刚挂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一会儿又挂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人民广场上有集不完的会。那时我们住在“建国西路1号”，那是一栋小别墅，外观很美，听说那曾是法国领事馆，里边却乱得很，横七竖八的住满了许多人，也不知他们到底都是干什么的，就如同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一样。

这便是“建国西路1号”。据说这座小楼曾是法国领事馆，不知它现在还是否存在。这张照片是王白沙拍的，当时正在学摄影的我 觉得这张照片照的不错，就让她加印了一张给我。

后来，我们到朱成昭家里去了一趟。那时朱成昭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是一个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其时他不和中央文革合作，甚至反对中央文革的态度已初露端倪。在他家里，他分析了北京乃至全国的文革形势，其中他还说了一些对中央文革大不敬的话，（《朱成昭——一个红卫兵史上不应忘却的名字》一文中讲的在梅建民家的会议，是不是这次会议？）听众大都是地院东方红的领导们，后来这次聚会被称为“上海黑会”。从他家出来后，王白沙闷闷不乐，忧愁甚至于焦虑的表情流露无遗，我猜想她焦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朱成昭对中央文革的大不敬，而是因为朱成昭对刘少奇问题的分析造成的吧。——朱成昭在那里讲道：刘少奇的问题才刚刚开始，预计他的结局是会很严重的。那时在建国西路1号住着一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他总是给“语录”谱曲，并大声吟唱。看得出来王白沙很是不愉快，流露出极不耐烦的表情（主要是他太吵，弄得大家都不得安宁）。终于在这一天她爆发了，和那个人吵了起来，我和程希平还上去搡了那个大学生一把，双方很有大打出手的样子。见到这种情况她说：算了，不在这儿住了，我们走吧。

那时中央正号召学工学农，于是我们便到上海港务局联系，上了“战斗61号”轮船开始学工。学工的内容开始时是极其枯燥的，具体说就是每天给正在港口维修的轮船刷油漆，而我们三个学工的则每天都是拿着小锤——锤口是扁的，蹲在甲板上，叮叮当当地将船体上的铁锈敲打下来，然后由工人们再刷漆。王白沙干活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甚至连中间休息她都继续干而不肯停下来，船上的员工都对她印象极好。现在我猜想，当时她大概是想用身体的疲惫来淹没她心中的痛苦吧。没过几天，这条船修好以后，便空着开往大连去装货，正在船上学工的我们是可以和他们一起去的，其时正值春节前。由于船上只有王白沙是女的，

所以船上对她的安排还算挺好的。船是空的，在黄渤海交界处摇晃得很厉害，连许多船员都呕吐不止，我们当时狼狈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到大连后，船装的很慢，大概将近一个星期左右，而我们又基本插不上手。船刚到大连时，我一连三天都觉得大连的地面是摇晃的，因此我不想再乘那个船回上海了，因为我一看到船就害怕，想坐火车回北京。但王白沙说不管多难受也得回上海，学工绝不能半途而废。

回上海后王白沙提出，我们还没有徒步串联过，这个经历一定要有，这样才算我们完整地经历了文化革命。这时程希平提出，可以从上海出发，沿长江到芜湖，去他的老家安徽青弋江畔的泾县去。王白沙表示同意。于是我们整理了一下行囊——一人一个大地质背包，第二天便上路了。

这次我们出去的时间不短，而且多数情况下都是王白沙主导，通过这次徒步串联，我对她又有了新的认识：坚强、有耐力、吃苦精神比一般人强；有主见、有号召力、领导能力比一般人强。但多年以后，当我重新审视这段经历时，我觉得实际情况远比当时想象得要复杂。在上海她情绪几次起伏，她宁肯在外地过年也要学工；她宁肯忍受颠簸之苦也不愿从大连返回北京；她宁肯徒步苦行也不愿早些回家；难道是只用坚强、有主见就能解释的了吗？我想那时她不愿回北京，恐怕她害怕不知哪一天，悲剧会降落在她自己亲人的身上。所以她宁肯一个人在外过年，也不愿亲身经历亲人随时可能被迫分离的场面；她宁肯自己挑破自己的脚，也不愿见到亲人的身体被挑破；她宁肯自己心里滴血，也不愿看到亲人身上流血。

回到北京了，这回她不能只是待在家里了，也不能只是待在地质学院了。最高指示发表了，谁都得回学校了。

回附中的第一天，一直在学校领导运动的东方红负责人，也就是学校负责人，把我们两人叫到学校临时办公室，说是开会，其实就是想把王白沙彻底地从领导职务上拉下来。会议刚刚开始，几个人轮番劈头盖脸地把王白沙数落了一顿，大意是说她凭着参加学院东方红早了些居功自傲，这么长时间不来学校她是个逍遥派，她一向凭着是王光美的侄女高高在上，在现在的形势下还敢吗等等。我现在仍记得她当时的表情：眼睛时而环顾四周，时而仰望天花板，完全是不屑一顾的表情，但又什么都不说，好像此事和她并无关系。而我则非常气愤，几乎他们说一条我反驳一条。大意是：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用这种态度和她讲话，她带领我

们附中红卫兵集体参加学院东方红，怎么现在倒成了居功自傲了呢？她是学院东方红的核心成员，你们凭什么跟批判敌人似的对待她。她到上海是去开会，是去学工，是去徒步串联，怎么就成了逍遥派了呢？她以前什么时候以王光美侄女自居过？就是现在中央也还没最后给王光美定性，你们不要拿王光美侄女说事儿。她现在回学校不是来要权的，她回学校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要来读书的，现在她连学院核心组都主动退出了，你们放心，她不会与你们争权的。在我慷慨激昂地讲话时，王白沙几次用脚碰我的脚，而我当时正情绪激昂，根本没有理睬，甚至连她用脚碰我是什么意思，我都没来得及考虑。我很了解我自己，如果没有对手，“荷戟独彷徨”时，我的话很少，一旦有了对手，我确实会不顾一切地和对手辩论下去。

散会后，我还笑着对她说：你这个有名的演说家那么能说，到了关键的时候，怎么哑巴了，难道连给自己辩护都不会了吗？她说：我看你比我还能说；再说，你觉得现在我还能说什么呢？他们还会听我的吗？刚才你把他们说得哑口无言，你嘴上痛快，我心里更是痛快，但你就不怕将来给你戴上一顶帽子。说完后她眼神中流露出的只有痛苦和无奈、凄怆和酸楚。现在我想起她那时的眼神，心里仍感到很痛。没见过当时她那眼神的人，不了解她经历的人，没听过她演讲的人，是很难想象当时是多么令人心痛。文革结束后我经常思索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谁，将一个我在文章开头写到的一个伶牙俐齿、活泼可爱，颇似一个演说家的小姑娘变成了这么一个少年老成、悲怆伤感、痛苦无奈的人了呢？是什么，是谁将一个威风凛凛、叱咤风云，颇似指挥官似的人变成这么一个能够忍辱负重、忧郁悲凉的人了呢？悲哀啊，是她的悲哀，是有着和她相似经历人的悲哀，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文革之后她弃文从理，考了医科大学，当了医生；如果不是文革呢，我想她会学文，因为她实在是太喜欢又太擅长文了。看了北京 101 中她初中所在班级的博客，我更相信这种判断了，甚至我想她去搞艺术也未可知。

那天，我们两人在地质学院东门附近，席地而坐，谈了很长时间，我记得大概从下午两点多一直谈到黄昏。都谈了什么我记不清楚了。

我还记得的是：她说将来她有可能要遭殃，以后我们还是少接触，如果因为我而株连了你，我心里会不安的。我说那怎么可能呢，你已经够倒霉的了，还能坏到哪儿去呢。少接触可以，株连我是不怕的。从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看，她是有预见的；而我则是幼稚得多。所以在一般人看来，或者说按事情发展的一般逻

辑来说，最后所遭灾难她应比我大得多。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几乎同时遭了灭顶之灾。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一点儿都不奇怪，她处处小心谨慎，除了和我、程希平说了一些“危险”的话外，她很少和别人说心里话。因为她心里清楚，我们两个是不会出卖她的。但我则不同，在很多场合下，对很多人讲过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做了很多在当时人们看来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

那天她还讲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件事。她在我一点儿都没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说，你做我的弟弟吧。我一愣说：怎么个弟弟法。她说：这个事儿我已想了很久了，如果就是咱俩在一起时，你叫我白沙姐或者干脆叫姐姐；咱们俩再认识新人时，我叫林军，你叫林林，咱俩以亲姐弟出现。（其时在地院东方红的核心小圈子里都有别名，只不过别人不知道而已。朱成昭叫林木，我叫林林，程希平叫林兵，王白沙叫林军）只是在熟人面前千万别暴露，否则对你不好（但后来她告诉了程希平，我则谁也没告诉——一直到湖北省组织部给我平反的文件中，我才晓得组织上也知道。上面写道：石白河，文革中也叫林林，曾和王白沙以姐弟相称）。记得当时我曾说：我们是同学，就咱两人在一起时，我叫你什么不行？你本来就比我大一岁，本来就应该叫你姐姐。她说：那你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是想告诉你，我叫你弟弟时，你必须听我的。比如你现在就很危险，而你自己一点儿都没感觉，今天，你舌战群儒，好像是个英雄，你一上来那个劲，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嘴上一点儿都不饶人。都到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替王光美说话呢？我几次踢你的脚，你就跟没感觉到一样。咱俩是同学，你可以不听我的；但我是你姐姐就不一样了，我说的话你必须得听。我想了一下说，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办吧。我们俩的这个约定一直未变过，直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她误会我为止。

过了不久“复课闹革命”很快成了一句空话，王白沙又回家了，且基本不去学校。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咱们到人艺去吧，那里很不错。人艺即人民艺术剧院，那儿离她家很近。其时，那里聚集了全国文艺界的很多艺术家、演员。且人艺本身就是艺术家的聚集地，名演员、名导演、名作家比比皆是。我们到那里倒真的成了逍遥派，认识了很多艺术家，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演员，王白沙脸上又有了以前的笑容——起码表面上是这样。白天我们和那些艺术家、演员聊天，或看那里的大字报；晚上，她回家，我就住在人艺的单身宿舍里。那里的人们一直以为我们两个是亲姐弟俩。

期间在学校食堂里，因为我们有段时间未在公共场合出现了，已经叫惯了，脱口叫了一声“白沙姐”，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弄得我很尴尬。事后，她见我不高兴，就跟我说，不要在意，只是我现在更担心了，我要是真的倒霉了，看来一定会牵连到你了。记住现在已到了关键的时候了，你可一定要听我的啊。（这就是我在《开博感言》中所写：“我们仍是好姐弟”的由来。）

但这样相对安宁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灾难便开始降落到我们的头上了，从此我们便开始了几年的梦魇般的生活。

四、同时落难

1967年的春天，我和王白沙等一回到北京，便听说了朱成昭的事情，其时他已经开始落难。朱成昭的落难，实际上也是即将拉开我们悲剧的序幕。我和程希平、王白沙一同去看朱成昭。他所住房间的门上贴了一张纸，上写：奉中央文革之命，本人闭门思过一个月，此期间概不见任何人。下面有他的签名，日期记不准了。我们进屋后，里面已有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女的我从未见过，王白沙主动和她攀谈了几句，看样子好像她们原来就认识。看到人多，我们就出来了。我问王白沙，那个女的是谁，她告诉了我她叫什么，原来是一位中央首长的女儿。以后我在朱成昭那里又见过她几次，也打了招呼，算是熟人了吧。后来我还和她的哥哥、弟弟曾在同一个学习班，住同一个屋，睡同一个通铺。

其时，朱成昭和中央文革已彻底闹翻，我在那里听到他很多对中央文革大不敬的话，也看到了一些平时我们都没有听说过的资料或文件。我将这些向王白沙讲了之后，记得她当时很严厉地告诉我：外边已有传言，说你和朱成昭走得近，你以后不要再到朱成昭那里去了，但我没有听，仍然经常去。但当王白沙问起时，我总说没有去过。但我猜想，她是知道的，不然她老问我这个干什么。我落难之后，在四面墙内经常反思这段经历，很后悔我没有听王白沙的。我确实是不应该总到朱成昭那里去，去了就会听到不应该听的东西，去了就会看到不应该看的东西。人啊，不应该听的最好不要听，不应该看的最好不要看，因为听了、看了就会想，有些事想一想都是危险的。因为想了你就可能说，说了你就会招来祸。

我在朱成昭那里听到的一些话，在不同场合确实讲过不少，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加重了我的“罪行”，甚至也给朱成昭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在刑讯逼供之下，我是不可能一点不讲朱成昭的事的。王白沙只长我一岁，但从她文革中多次在关键时刻对我的提醒来看，她在政治上要比我成熟多了。遗憾的是我除了下乡后在

五连那次以外（其实那时我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自己也已成熟了），基本上没有听过她的。如果说她政治上可以做我导师的话，我则是一个不合格的学生。从那次遇难后，我在政治上再也没有跌过大的跟头，包括“一打三反”时在六团五连，我问题最严重，但相对所受摧残和折磨却不是最重的，这当然是因为自己经历了一般同龄人所未经历的磨难的结果，可与王白沙对我的影响不无关系。

这年的夏天，天气格外热，地质学院的文革运动也格外热，我们这些人一个个都先后进入了梦魔。抓的抓、关的关、斗的斗、捕的捕。第一个是朱成昭，他闭门思过一个月后，向中央文革要求再闭门思过一个月。其后又绝不认错，拒不向中央文革低头认错。中央文革批示说他是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下令限制他的自由，交由群众专政，开始他被关在一间学生宿舍里，或是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一张上下铺的床。我邀王白沙去看他，王白沙说：你这次要是敢去，从此，咱们连一般同学的关系都不是了。但我还是去了（主要是“义气”在作怪吧——义气二字随我走过了大半辈子，虽因这二字多了一些朋友，但也给我带来大半生的麻烦）。我进门时，门口对我的情况一一作了记录。那时朱成昭已绝食两天了，以抗议中央文革的决定，当时他躺在下铺有气无力地和我打了个招呼，我只记得当时我劝他不要再绝食了。我回来见到王白沙后，她说全地质学院都知道你去看朱成昭了，看来你还真是讲义气，我不知道她当时的话对我是褒是贬，是肯定还是讽刺。我则把我看到的朱成昭的情况告诉了王白沙，她听得还很仔细，看来她并不是不关心朱成昭，而实在是为我着想。其后开始揪斗、批判朱成昭，气氛相当惨烈。主持批判会的和批判他的人，多数都是他昔日的战友。接着公安部宣布将其逮捕，一个呼风唤雨的时代人物就此终结了。朱成昭这一关便是十年，直到1977年才被释放，1980年由中组部给予正式平反。

进入秋天，王白沙被关起来了；和地质学院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王白沙的父亲也被揪到地质学院，批斗了一番后可能是被部里接走关起来了，也可能是被保护起来了。一年后被投入了秦城，这一关便是7年，直到1975年才重获自由；接着听说她的母亲也被关起来了，后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王白沙被关起来的那一天，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和寂寞，凄怆和恐惧。那天我独自一个人爬到了香山顶峰。时值秋季，很有屈原“风飒飒兮木萧萧”的感觉，满目凄凉。环顾四周，感到我已无路可走。“人穷则反本，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仰望苍穹，天呀，我的孤独和寂寞又该向谁去倾诉啊！；“疾痛惨怛，未尝不呼地也”俯览尘寰，地呀，你能不能帮一帮我的朋友们啊！

从香山一回到学校，我便开始找寻王白沙的关押地。有人劝我说算了吧，别人唯恐躲之不及呢，你还主动去找她，不是没事找事吗。到底我算找到了——地质学院女生宿舍楼里的一间宿舍，门口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看押她的人——一个地质学院大一的女大学生，我和她很熟。这一天这位女大学生是让我进到王白沙屋里，去和王白沙见面的。她的情绪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还有说有笑的。那天我给她带了一点杏脯，她见了后，拿来打开便吃，还说真好吃。我说那以后我再给你带，她说不用了，并说如果再来就到我家给我拿些书来，说着便给我写了一张长长的书单。我还能记得的大概有《共产党宣言》、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十讲》、黑格尔的《逻辑学》等七八本吧。说着她把她家的钥匙交给了我，我说家中没人吗，她说预防万一吧。还说她很惦念她的妹妹，希望我能到她妹妹的学校去看看她。从她那里出来后，我心情好多了，可能是因为我看她情绪不错的缘故吧。

但从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来看，我觉得那天她的表现是装出来的。她为什么不问一问她父母的情况呢，她显然是全知道了。自己的父母都失去自由了，她能笑得出来吗？她这样做无非是在并非亲人的人面前保持一下自己的矜持，倘若是她的亲人来了呢，她会哭的，而且可能会嚎啕大哭的。她为什么要把她家的钥匙交给我呢？她讲的“万一”又是什么呢？显然她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家里的人，全部失去了自由，包括她家的保姆。她说只是让我到她家拿些书，其实也是想知道她家中的一些情况；让我了解一下她妹妹的情况，可能她确实还不知道她妹妹的情况。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她家，我是叫门进的她家，开门的是她家的保姆。（王白沙管这个阿姨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她们之间就是一家人一样，这里我不敬地叫她保姆）老人个子不高，比较瘦，很慈祥，原先我到她家时，老人就喜欢和我聊。她说王白沙的妹妹已被学校带走了，近期不会回来了。我说王白沙要一些书，她打开了她的房间——就是我第一次到她家时她给我指的那间屋，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她当时有预感。那时她可能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也许不知哪一天她家里不再有人了，让我知道哪一间屋是她的，关键的时候我可以找到她所要的东西，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猜测。很快书就找到了，但黑格尔的逻辑学没有找到。保姆跟我说有人来翻过她家——其实那叫抄家，说只拿走了一些书和有字的东西，我想逻辑学可能就是那时被拿走的。阿姨不让我走，一定要给我做饭吃，我拧她不过，她一边做饭一边和我聊王白沙家里的情况。吃完饭后还没完没了地和我说个不停，

她说王白沙有很多同学和朋友，但她就看我最可靠——这话可能是真的，因为王白沙也曾跟我说过，她家阿姨说她的同学和朋友中就我可靠这类的话。那次她还对我说，王白沙是在打仗（好像当时说的是白沙战役，但我后来查了很多资料，只查到了海南有个白沙战役，老人的一些说法看来还是有出入的。）的时候出生的，出生后放在了老家，是以后又找到的等等。（我到现在也无法查证这种说法的真假，我和王白沙重获自由后，我也没问过王白沙这件事，可能是谁都不愿再说起过去吧。现在我更不想向她的母亲问起此事，甚至我连见一见老人家都怕勾起她的痛苦回忆）我几次要回去，老人都不让我走，最后干脆叫我住在她家。我想大概是老人一个人感到寂寞想找个人说说话的缘故吧。她让我住在王白沙的屋子里，我坚决不同意；她又说她住王白沙的屋，让我住她的屋；我还是没同意，最后我在她家的地板上睡了一宿。那天夜里实际上我一点儿也没睡着，从文革我们相认识到其时的局面，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流过，想到那时我们的处境，眼中噙满泪水。这泪水既是为王白沙忧虑，更是为自己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感到恐惧。想一想我和王白沙文革初期“中原北望气如山”，“剑指三秦，一战东归”，“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的“勇猛气势”，那是多么的不自量力，是多么的可笑！如今落了个“事无两样人心别”，“山川满目泪沾衣”的局面是多么的可悲！

隔了一天我把书给她送去。看管她的人已经换了，态度也明显变得冷酷无情。她先把我的基本情况作了记录，又把我带去的书翻了一个遍，检查的很仔细，每本书都翻了，然后才把王白沙从屋里叫了出来，不是叫我进屋去谈，是叫我们站着说。两天没见，再见她时我有些讶异了：脸色惨白，原来漂亮的眼睛充满了血丝，一身漂亮的女军装也满是褶皱。我吃惊地说了一句：你这是怎么了？她还没说话，看管她的人便说，不要乱问，有事快说。我说：逻辑学没有找到，你妹妹没在家也没在学校，可能是到外地串联去了吧。她听后倦怠的脸上好像若有所思，什么也没说。看得出来她好像觉察到了什么，只是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也可能是看押她的人对她早有规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然后我说，这是杏脯，你留着吃吧。看管马上说，凡吃的东西一律不准带。那天我是怀着困惑、痛苦、恐惧的心情离开的。刚走了几步，她突然又叫我回去，说让我再到她家给她拿一件衬衣来。（现在我以一个六十岁的人，来想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孩子，我简直佩服甚至惊讶，她怎么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想得那么周到呢？也许是从他父母那里遗传来的做地下工作的基因在起作用吧。）我去了她家，衬衣也拿了。当天，我便给她送去了。但到门口，看管却说：今天不行，两天后再来。

两天后我再送去时，她的脸色、眼睛、衣服和两天前比，好像更坏一些，且乌黑的头发看上去也有些凌乱，脑门上还多了一道血痕，我猜想镜子一定是没收了。（后两次我看她，她的变化和随后对她的批斗，我在草稿中是没有写的。见文后小注。）我临走时，她说你以后再也不要来了，如果有事我会叫人找你的，需要钱时我也会让人去找你，钱就在我的屋子里。“这本《诗词格律十讲》我看完了，你拿回去仔细看看吧，好好看看会对你写诗有帮助的，看完了，看懂了你就送给别人或扔了。”说完她趁看管翻书的时候给我使了个眼色。看押她的人翻了翻，确定没夹带什么就给了我。

我在路上仔细地翻了翻，确实没夹带什么。那她为什么要给我使眼色呢？是我的错觉吗？我就一页一页地翻，还是没看出什么来，我已确定她给我使眼色是我的错觉了。但我突然又想到她为什么说：“看懂了你就送给别人或扔了”呢？为什么不送回她家或送给我呢？于是我坐下来再仔仔细细一页一页地看，看到了！终于看到了！我很激动，也很紧张。中间部分一页一个字，而且写在什么地方是没有规律的，和书上的字一样工整，一样大小。共十四个字，是用钢笔写的，这十四个字是：弟弟快去串联越远越好云南新疆。晚上我仔细想了想这十四个字的含义：第一：我想对她的审问已涉及到了我，我处境危险；第二：问题严重，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第三：时间不多，一定要快；第四：再仔细分析她的话，如果没有钱可以到她家去拿，第五：看完后立即销毁。但为什么要写弟弟两字呢，要知道多一个字就会多一份风险。令人费解。但只一会儿我就明白了，当初我们的约定就是：“我以亲人的身份跟你说话时，你必须得听。”分量绝对不一样，我处境危险了，我是该走了。过了两天程希平被隔离了；梅建民也被隔离了；凡和朱成昭关系密切的一个个都被隔离了。我是应该走了，走得越远越好。可我走了，他们怎么办？可我留下来又能给他们帮什么忙呢？又有什么用呢？我是应该走了，而且走得越远越好。但我一走了之，让他们受苦，那够朋友吗？那还是战友吗？我心一横，不走了，要坐牢一起坐，要死一块儿死。大有“虽九死而不悔”，“终刚强兮不可凌，魂魄毅兮为鬼雄。”的大无畏劲头。我知道，下一个该轮到我了，但我完全没想到，在我失去自由之前，他们非得让我亲眼目睹集悲凉、悲痛、悲惨、悲悯、悲泣于一体的伴我终生的揪斗王白沙的惨剧，这是多么的残酷，多么不人道啊！人性啊，怎么扭曲成了这样呢？

既然打定主意不走了，我就赶紧做了些准备。坐牢甚至杀头的思想都有了，那还准备什么呢？还是有需要准备的。一是，不能让他们拿到我的证据，以最大

限度地减轻罪名；二是，不能让他们拿到朋友们的证据；以给朋友添麻烦；三是，看能否再看一次王白沙，希望能再得到点儿什么暗示。

首先是将日记销毁（从那以后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写过日记），用现在的眼光看那简直太可惜了，我此篇文章所写文字大都没有具体日期而只有年和季节，就是这个原因；和朋友们的所有来往信件全部销毁，哪怕是觉得极为珍贵应保留一生的；书呢，照片呢，当然应当销毁，因照片后面的字有我们活动的轨迹；书呢，仔细翻了翻，问题倒不大，还是放在床上吧。但有几样东西我犹豫了：王白沙、程希平、梅建民、还有北京女11中的张青（关于张青，本文就不讲了）的照片我实在不想销毁；还有那本《诗词格律十讲》我真的舍不得，但又必须销毁，否则便是王白沙的罪证。可我又想，就这十四个字谁能看得到呢，我是在她反复提醒下，连看三遍的才看到的。退一步讲，即使看到了，别人又能把她把我怎么样呢？不就是让我去串联吗？可这十四个字对我而言太宝贵了，是值得我珍惜一辈子的。最后我决定保留这些照片和这本书，但应转移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于是当天我便把这些东西拿到我朝阳区的家中。

可我太幼稚了，我被隔离后，不但抄了我在附中的宿舍和我在地院的宿舍，万没想到的是连我朝阳区的家也抄（这次抄我的家，对我的家庭造成了极大的心灵上的伤害，我获自由后只有父亲和我长谈了一次，此后家庭所有成员均没有再提及此事。）了，拿走了他们认为一切有用东西，包括所有的照片，这也就是为什么此文照片极少的原因。那本写有王白沙名字的《诗词格律十讲》的书当然是在其列的。

在这里我要较详细地说一说那本《诗词格律十讲》的传奇经历。最初学院的红卫兵倒是对这本书没看出什么，也没问过这本书的事情。可到了公安局专业侦查人员手里，一眼就看出来了，（我估计也许是因为我从王白沙那里拿回那本书时，看押她的人曾作了记录，才引起他们注意的。）那当然是以后的事了：审讯人员拿着那本书：“这本书中有没有王白沙给你写的信？”没有。“为什么让你到新疆去？是不是叫你投奔苏修？”我不知道，她从未叫我去新疆。“新疆不是离苏联最近吗？”新疆还离阿富汗近呢？于是在我多个罪名里又加了一个想通过阿富汗逃到苏联投奔苏修。这件事会给王白沙带来什么呢？她是怎么解释那十四个字的呢？后来我没问过她，她也没问过我，看来我们都没有勇气再去面对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但从给我所加罪名来看，我觉得肯定会给她造成极大的麻烦。

1979年初湖北省组织部到黑龙江建三江我的家中给我平反，当问我有什么

要求时，他们一定觉得我会提出要回北京一类的要求，因为之前他们已流露出了这个意思（他们说过，北京青年和本地青年结婚的，回京较难。但我们湖北省组织部可以和北京组织部联系，因为你的情况很特殊，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是没有明说。我没有提任何让他们可能为难的要求，我只提了一个简单的要求：能否将那本《诗词格律十讲》还给我。可能我的要求太低了，他们一口答应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帮我找回。可结果令人失望，一个多月后他们回信给我，现将信的全文转抄如下：“所有有关你的材料全部由中央文革第二专案组转到了中组部，中组部又全部转到了湖北省组织部，经我们反复查找没有这本书，也许在转交的那个环节上丢失了，谨表歉意，如果需要我们可以给你买一本。”多么可悲的结局啊！难道我要的是这本书吗？我要的是难友之间的那份在危难时不顾个人安危，只为难友着想的那份情谊！我要的是能充分反映她聪明机智，遇大事时的沉着冷静的证明；我找它是想用它来教育我们的后代：告诉他们，他们的父母曾生活在怎样令人心酸的年代；告诉他们，他们应珍惜现在的美好时代，好好生活。同时，我也想告诉那些自认为看透人生，甚至玩世不恭的年轻人：谁说人到了危难时刻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此外，我也想告诉王白沙的亲人：王白沙在文革中的高尚品质——他们可能并不知道或全部知道。王白沙遭难后的的苦难经历和表现出来的崇高人格，也可能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告诉王白沙的孩子（我的荒友李晓奇告诉我王白沙有个很好的孩子，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他的母亲在十八岁时就已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和聪明才智，他有一个足以令他骄傲的妈妈。我还想告诉我们的同龄人：虽然我们所处环境不一样，个人的境遇不一样，受害的形式不一样，受害的程度不一样，但别忘了——我们都是受害人。是该我们好好反思反思那段历史了，如果不反思，谁能保证，悲剧不会发生在我们后代的后代的身上。

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我紧张的心稍微感到轻松了一些，就剩下最后一件事了，和她再见上一面，颇有诀别的苦涩和心酸，颇有即将告别战友的感觉和想法。到了那里，那里的人告诉我，她已被转移到别处，让我去找专案组。专案组的人明确地告诉我，你要找的几个人都已不能见任何人了。并告诉我：你来得正好，明天晚上七点在小礼堂开王白沙的批斗会，你得参加。我说明天晚上我有事，我参加不了——那实在是我最怕的场面呀！“谁不参加你也得去！”我估计其时春节刚过不久，学院里没有多少人，所以地点选在小礼堂。我被安排在了最好的位置——头排正中间，左右都是我熟悉的面孔，多多少少和朱成昭都沾点儿边。那天

的惨剧是我最不想回顾的（这也就是我不愿在草稿中写出的原因），会场上布满了诸如“孝子贤孙”、“花岗岩的脑袋”、“不投降就灭亡”一类的标语。当主持人说“带上来”之后，三个东方红的女红卫兵将王白沙带上台来，她的两边一边一个，肩是往下压的，两臂是在后拧着往上抬的，批的是什么我几乎没听见，大概和标语上差不多吧。随着批斗的进行，一会儿将她乌黑的头发使劲往下拽，一会儿又将她乌黑的头发往后拽，（下乡在五连王白沙曾在宿舍号召同宿舍的女生剃光头，还真有几个剃了，但她最后并没剃。其实她那是在做最坏的打算，她知道头发被拽来拽去的滋味。但当李某某说完“没有头发揪耳朵”之后，她就打消了剃光头的打算，她真的不是在涮别人。）说是让大家看看她那花岗岩的脑袋。我是从始至终基本上没抬头看，愤怒？恐惧？心痛？悲哀？也许兼而有之。当让大家看一看她那花岗岩脑袋时，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她那漂亮的容貌，让认识她且又同情她的人不忍心再看了。那一刻她那平时炯炯有神的双眼噙满泪水，这泪水是愤怒？委屈？悲哀？平时深邃的目光现在变成了痛苦、无奈、无助、迷茫、甚至有些呆滞，当然也有仇恨。我闭上了双眼，双手紧握，心在战栗，身在抖动。当时的场面台上相当的惨烈，但台下相对要平静一些。可能与会的多是早已成人的大学生，他们对眼前的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弱女子还有一点恻隐之心吧。现在影视文学作品中我们见多了，我这里所写的远不如文学作品中的更惨烈，可人们想过没有：如果说台上是你的父母，如果是你的刚满十八岁的孩子，如果是你的亲兄弟姐妹，你又如何呢？那天会议后来怎么继续进行的，又是怎么结束的会，该记得的我的脑子已是一片空白了。我只记得总部的那个人和我说了一句：她的批斗会要连续进行三天，你每天都必须参加。这话对我简直如同五雷轰顶，他们这样做是想彻底摧垮我的精神么？我已忍受不了这种锥心的疼痛了，就是拉我我也不去了。第二天晚饭后，天色渐晚，我从附中的西北角跳铁丝网逃离了附中（那时附中的西部是一片稻田），为的是躲避王白沙的批斗会。到了颐和园，33路末班车已过，我便一直走到香山，那时香山东门往北不远处便是一条山沟，从那里可以一直爬到山顶，我一个人夜爬香山，走到顶天还是黑的，那时香山顶上什么也没有。冬天的寒风格外刺骨，我早已没了感觉。力图一个人将那几天所发生的一切理出个头绪来，结果越理越乱，也许王白沙说的让我快跑是我唯一的选择，“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往什么地方跑呢？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真的就往而不返了吗？再说朋友们在受难我却跑了“伤怀永哀，汨徂南土”，那实在又不是我的性格。天高地迥，路在何方？下午，我一个人无目的地回了学校。

地质学院的专案组就在附中等着我呢。我被隔离了。群众专政了。

我并没有感到意外，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审讯我的人我倒认识几个，文革初期都是朱成昭的对立面。这时我才明白，我和王白沙文革初期卷入地院文革运动埋下的祸根开始作祟了。审讯开始是平静的，但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时，这些大学生们开始恼怒了。刑讯逼供是在预料中的，但其残酷性是我没想到的，两条腿绑在下铺，两只手绑在上铺的床栏上。椅子上坐着的人开始审讯，我已出离愤怒了，拒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我说要关要杀由你们我就是不知道。“朱成昭绝食 4 8 小时不是你还去看过吗，先饿你 4 8 小时再说。”期间，除解手以外，均是这样捆着。他们轮流看着，手持一根木棍，我稍一打盹儿，棍子就落在我的脑门上，这种状态约维持了 3 0 多个小时，期间没吃没睡，摧残可谓极致。不知这时为什么，我想起了我后两次看王白沙时，她满脸的倦色，形容枯槁，褶皱的衣服，凌乱的黑发，是不是也受到过和我差不多的惨无人道的虐待（这一段群众专政的时光，草稿中是没有的，是我不愿记起的，但为了说清我三次探望王白沙的变化也只能把锥心的事情写出来了）。接着是哄骗我们互相揭发，他们给我念程希平、王白沙揭发我的东西。因为我最后隔离，精神上早有准备。我仔细听他们到底已知道了哪些，王白沙到底承认了哪些。当我得出结论，王白沙只承认自己和揭发了我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时，我则以鸡毛蒜皮的小事来对付。但对王白沙及她的家人，即使小事我也格外小心。比如说，她父亲说你是革命小将，是不是想利用你，拉拢你。我坚决否认，说她父亲绝没和我讲过这样的话，为这句话我还吃了不少苦头。但对我攻击中央文革的言论我供认不讳，因为我当时已在多种场合讲过此类言论——甚至在宿舍里，想不承认也不行了。当然他们对我穷追不舍，问我既然你在那么多的场合下都讲过这些言论，为什么却没跟王白沙讲过呢？我回答，我想讲，但她不让我讲。在这过程中我确实说过对不起朱成昭、程希平的话，在这里我想向朱成昭、程希平道一声晚来的歉。但我可以扪心无愧地说，我没讲过一句对不起王白沙的话。原因很简单：她们家对我不错；她们家因王光美的关系已遭大难，我绝不能再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了；更重要的是，她在我可能要遭难的时候，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首先想到的是让我躲开这场灾难，我再做对不起她的事，还算个人吗？

1968 年二月底的一个傍晚，北京市公安局将我带走，没有戴手铐，但头发是被拽得很低的，头快碰到地了。楼门口站满了许多仿佛伸长了脖子的鸭的人们，鉴赏着这一抓人的圣举。先是德胜门外的功德林，后是宣武门外的半步桥，前后

长达一年之久。网络小说《四面墙》认真拜读过，其中的场景我没有遇到过。因为和我同在一室的都是相当级别的干部、艺术家、大学生，只有我一个中学生。但管教我们的军管会的人们却没有《四面墙》中的管教那样客气了。这篇文章是写给难友王白沙的，无关她的，在这里我不想多写，等我怀念学友战友难友荒友的心绪平静以后，也可能写一写那段岁月的文章。

1969年初春，从四面墙中走出，先参加了一个学习班，主要是和外面自由世界接一下轨，程希平、梅建民也在其中。那个学习班集中了几乎所有的文革中被打倒的，半被打倒的国家领导人的孩子们。其时我和他们下围棋、打桥牌倒也快乐，提到王白沙他们也大都知道。

五、一起下乡成了荒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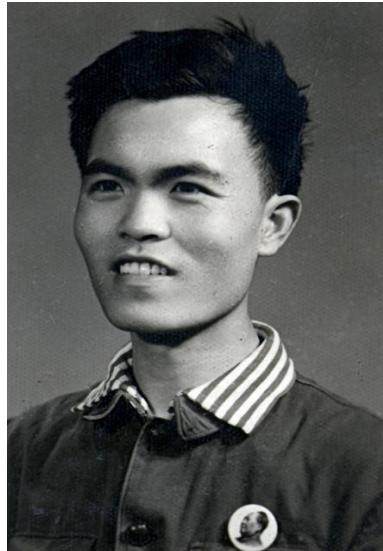
从学习班回到了学校，学校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我还记得有一个叫陈林的高三学生，他和我讲文革中曾有个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那时我还在四面墙中，学校发生的事情我不清楚。）即使文革最高潮时，学校也没有教师自杀或被打死，但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却自杀了好几个——和学生们无关；教师整教师更可怕呀。不知什么原因，高二的一个女学生，她也是最早参加红卫兵的，但没有什么活动。清理阶级队伍时，她在学校跳楼自杀了一——也可能是他杀。不知为什么当时怀疑陈林与这个女生的死有关系，因此有关部门始终没让他离开北京，最后当然是无中生有。这对他来说竟变好事，留在了北京且分到了首都机场工作，现在我们早已失去了联系。还有一个后来和我一起到黑龙江兵团五连的高中同班同学——他不怎么来学校，他为什么拖到那时还没走，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和我们这个圈子连边儿都不沾，对我和王白沙的事基本上一点儿都不知道，知道的也就是地质学院里风传的结论性的东西——尽管多数都是不着边际的结论。下乡后在“一打三反”时，连队里让他揭发我们，那纯属是找错了人。）也可能还有其他的人，但我不记得了。文中前边提到的张青还经常去我们学校，张青她终究没有下乡，开始还有联系，后来慢慢断了消息，不知她现在在哪里。我之所以讲讲这几个人，是因为我今后回忆我的文革生涯时，可能要说到这几个人。

再就是王白沙了。我是让学校的教师从学习班接回学校的（梅建民和程希平是被学院接回去的），路上老师告诉我，王白沙还在学校，也是刚刚解除监管。她大概知道我那天要回学校，我到学校时，她正站在学校食堂和宿舍楼之间的空地上。见到王白沙后我很高兴，很有战友、难友重逢的感觉。她则没有我想象中

的那样高兴，只是很随意地说了一句“你好像长高了么。”我则回答可能是太瘦了显的吧，后来一量我还真长了三公分。当天她告诉我她已将名字改为王征了（我一直弄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改名呢，难道是想连同自己的名字一起忘掉那段梦魇般经历吗），虽然她已恢复了往日的容颜，但她眼神中仍充满着忧郁、茫然和落寞，每天仍只是看书。有一天，我和她聊天，我问她为什么总不高兴，也不出去散散心。她说：能高兴起来吗，你想过未来没有。我说：那有什么，我们档案上是没有任何记载的啊。她随便用手一指，知道我们经历的人都是档案。当时我不以为然，事后证明她说的是对的。

我那时心情很不错，白天经常和程希平、梅建民等一起出去玩儿，在一起谈天说地，当然再也不谈文化革命了。期间我们两次登香山（我和香山很有缘，痛苦的时候愿去，高兴的时候也愿去，前些年为了锻炼身体每周必登香山一次，直到后来迷上网球为止）。晚上在学校就和陈林、王征在一起。王征又找来一本《诗词格律十讲》，开始研究起来，她对此显然研究很深。王征像是个杂家，什么书都爱看。我也是一个看书成瘾的人，且各方面的书也多有涉猎，这倒是对我其后的教师生涯颇有益处。那时王征也许是为了打发时间，也许是她对医学感兴趣

——从恢复高考后，她考北医大并被录取来看，可能是她对医学确实感兴趣——那时她忽然迷上了针灸，天天拿着银针对着人体模型扎。有一天我对她说：你老对着模型扎，还不如在我身上试一试。她说：你有什么病，我确实可以试一试。我说我总失眠，你有办法吗？于是她拿针在我后脖颈上扎了好几针，边扎边对我说，这是安眠 1，这是安眠 2 等，陈林说，今天晚上保你睡个好觉。但晚上我并没有觉得管事，依旧失眠。



这是我离开北京前照的最后一张照片，摄于

1969 年 10 月

几个月后，黑龙江建设兵团来北京招人，我和王征商量，我去还是不去。她冷冷地对我说：和我商量什么，你自己决定就是了，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我当时也很不耐烦地说，这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吗，我又没问你去还是不去。她说你要

是听我的话，早去云南或新疆了。这时我才明白，她是对文革中我几次没听她的建议，尤其是她冒着风险让我快走而我没走还在生气（也可能那十四个字真的曾给她带来过很大的麻烦），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后来她给我分析：兵团有建制，青年又多，发工资，生活有保证，应该去。于是我们便决定去建设兵团。当我们两人在海淀东升派出所办完户口转移手续后，工作人员将我们的户口卡片一撕随手扔在了纸篓里。那一刻我看到王征脸上闪过一丝惆怅的眼神。是啊，这一撕便将她扔在了黑龙江近六年之久，要知道，其他下乡青年期间尚可回京探亲，而她则孤寂一人，无家可归、无亲可探（她的哥哥好像去看过她一次，但比较了解她的高秀萍说绝无此种可能，1972年她也曾回过北京一趟，说是探亲，其实到了北京也就是和她事先约好回京的妹妹见上一面，父母都见不到，家也没了，只借住在她的好友高秀萍家中）。而我则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一年，当然我的情况和她还是不相同的，我后来主要生活在六师，那里政治气氛之宽松，对老高中生之重视，和五连比完全两重天地。

临走前的那些日子里，王征一个人静静地在宿舍看书，哪里也不去。而我则每天和梅建民、程希平等地院的大学生们做着告别前的最后几天的聚会。喝酒——从那时起我开始学着喝酒；吸烟——梅建民吸烟很厉害，我是和他开始学吸烟的，现在他是不是早已戒烟了，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他们俩的消息。一天我们去爬香山，坐在香山顶峰上，我把王白沙开始蒙难时，我当时的心情向他们讲了，他们听后也感慨良多，并随口编了几句“诗”，只记得最后一句是：“白沙他年返京日，必定攀上鬼见愁”。这其中包含了朋友们对她的美好祝愿。我把这首诗念给王白沙听，她说：你们写得都是什么歪诗。但她还是很认真的把它记了下来，我想大概是诗写得怎么样并不要紧，毕竟其中饱含朋友们对她的未来寄予美好祝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每人发了一件军用大衣，还有军用棉衣棉裤，写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及其他的一段最高指示的白搪瓷缸。后来我们曾用那白瓷缸，大口大口地喝65度的白酒，大概每缸也有一斤吧。

踏上了前往黑龙江的火车。当火车开动的那一刻，我又看了看北京站站台上写着的“北京”两个字，想起了在东升派出所户籍管理员撕碎户籍卡片的那一刻，当时我明白，北京——中国的首都已离我越来越远了。虽然我们三个地院附中和五个钢院附中的高中生没像那些六九届的，十五六岁的孩子们那样放声大哭，但

我的心里也是酸酸的。火车上六九届的孩子们过了一会儿就高兴起来，有说有唱，我们八个高中生则一路无言。我对未来既充满期待和幻想，也充满疑惑和迷茫，一路上情绪复杂；而王征则从上火车的那一刻开始，一直是忧郁、惆怅、甚至是痛苦的表情，一路四十多个小时她基本没有说话，这我能理解：父母在哪里，一定在受罪；她一直惦念的妹妹，在陕北的穷乡僻壤受苦，且一直到走都没能和妹妹见上一面（那年九月我曾去过陕北一趟，但目的没有达到），她心里能不苦吗？

下火车时天还没亮，车站的名字是二龙山屯，我们上了一辆汽车还是拖拉机，我已记不清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把我们拉到哪里去，沿途经常有人下车，被分到某一个连队。我后来的好友邢俊和她的妹妹就在四连下了车。六九届的孩子们又叽叽喳喳起来，问北大荒的冬天到底有多冷，问到连队都干些什么，问连队里有电没有……除了我同班去的那个同学以外，其他七个高中生基本没怎么说话。我瞥了一眼王征，她眼神中流露出的依然是忧郁和无奈。天蒙蒙亮时，我放眼望去，那是根本见不到人烟、望不到尽头的大片土地，这种景象在关内是绝对看不到的。成片成片的黄色的，我知道那是土地；大片的黑色的是什么呢，给地里上的肥吗，又不像。天全亮了，我看清楚了，泛黄的是尚未翻过的庄稼茬地，而黑色的才是刚刚翻过的土地。学地理时知道有黑土，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会有这么黑的土地。车到了一个高岗，去接我们的人往前下方一指说：到了，这就是五连。我看了看，一个小小的村庄静静地坐落在曲曲弯弯的讷谟尔河畔，其后的三年半的时光，我的青春就在这里流浪着。三年多的时间，我在这里结识了很多终生的荒友，现在还经常往来的朋友：李晓奇、曲培平、王灿寿、郭晓民、程正东、赵光明、徐卫平、张铁梅、郎克华、杨静、陈海燕……他们都是很好的人，在我和王征最不幸的时候，他们没有落井下石，而继续和我们这些另类交往着。还有许多虽然几十年未曾见面的，只要一个电话，也会感到分外亲切。昨天我和高秀萍通了一个电话，她便说了很多关于王征的事情，并告诉了我一些上海知青的情况，很有老朋友的感觉，因此五连有很多值得我回忆的美好东西。但五连也是我的伤心地，那里给我重重地上了一堂人生课，它使我懂得了很多人生道理，真正理解了鲁迅先生“中国人如何卖友，如何吮血”的深刻含义。王征在这里也度过了难熬的三年半时光，只不过我们后来的去向不一样。

编者按： 石白河 1965 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中 654 班